# 牢记新使命
# 奋进新时代
# 建设新天堂

——纪念中共杭州小组成立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

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杭州市社会科学院） 编

# 前　言

1922 年 9 月初，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在皮市巷成立，并在 1923 年春扩建为中共杭州支部，1926 年进一步扩建为中共杭州地委。中共杭州小组是浙江省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给深受压迫和剥削的杭州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掀开了杭州历史的崭新一页，也为浙江各地党组织的建立和国民革命在浙江的蓬勃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学习贯彻省十五次党代会、市十三次党代会之际，为纪念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100 周年，守住红色根脉，牢记初心使命，继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会同中共杭州市委宣传部、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杭州市社会科学院）、中共上城区委等联合开展了“牢记新使命　奋进新时代　建设新天堂”主题系列活动：发布《纪念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面向学术界征集理论、学术研究文章；举行学术研讨会，探讨红色精神谱系与杭州城市人文精神、杭州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百年杭州发展史的与时俱进的品格等；举办文艺晚会，展现中共杭州地方组织带领全市人民用鲜血和汗水、勇气和智慧，在革命、建设、改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奋斗历程和成果等。

这些活动从不用形式、不同角度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杭州的百年历程，加深了社会各界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有利于推动党史工作部门进一步加强杭州地方党史资料的挖掘、搜集，深化杭州地方党史研究，推出更多厚重的研究成果；有利于加强党史宣传教育，进一步展现共产党人的革命情怀和理想信念，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好的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有利于人民群众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开

创未来，以一流的精神状态创造一流的业绩，推动杭州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为记载和保存这次学术研讨会和征文的成果，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将研讨会上专家代表的发言与通过专家评审的征文汇编成册。在汇编过程中，为尊重专家和作者、发扬学术民主，除对个别文字和标点差错作了修改，并作了统一和规范体例等技术性工作外，各篇发言和征文基本保持原貌，相关观点不代表编者观点。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文集中错谬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22 年 10 月

# 目　录

## 上篇　专家代表发言

1. 中共杭州小组创建的历史意义 ……李辉毅（11）
2. 金佛庄与与伟大建党精神 ……苗体君（15）
3. 杭州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 ……史晋川（29）
4. 数字化发展与共同富裕 ……张旭光（32）
5. 从诞生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说起 ……方益波（36）
6. 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法院的建立与党的依法治国理念 ……胡　铭（41）
7. 以社会信用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汪锦军（44）
8. 红色精神谱系与杭州城市人文精神 ……公方彬（48）
9. 百年奋斗彰显与时俱进杭州品格 ……邱　巍（55）
10. 衡量后来人的几个视角 ……安蓉泉（59）

## 下篇　征文选录

### 一、杭州党小组的历史地位

1. 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
——以“杭州党小组”为例 ……朱　珏（69）
2. 大党史视域下的地方党史研究探析
——以中共杭州小组研究为例 ……薛　燕（81）

3. 中共杭州小组创建者的革命实践及其历史意义 …… 吴焕根（90）
4. 中共杭州小组成立与建德党组织的发展 …… 洪淳生（113）
5. 对杭州党团组织创建有关问题的思考及考证 …… 骆小峰（120）
6. 浅议中共杭州党小组的诞生及其历史意义 …… 朱淼水（130）
7. 中共杭州小组与闸口机厂工人自修夜校研究 …… 张其梅（144）
8. 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金佛庄服役部队及担任职务考证 吴焕根（155）
9. 试论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对浙江革命发展的
重要作用和启示…… 于 嘉（168）
10. 中共杭州小组创建价值探究 …… 陈 灏（175）
11. 中共杭州小组与伟大建党精神 …… 周 阳（185）

**二、杭州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

12. 衢前农民运动的内涵、地位和时代价值 …… 陈 灏（203）
13. 近年来衢前农民运动研究综述及启示 …… 刘祯贵（212）
14.“成为新青年”：施存统早期个人生命史及其思考
…… 程德兴 蔡宜旦（240）
15. 从三个维度探究中共杭州小组建立与发展经验
对上城区党建事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谷小洁（252）
16. 关于中共鸭兰村支部研究和宣传的几点断想 …… 游海华（268）
17. 于树德合作理论与实践对教育的启示 …… 张东亚（276）
18. 契合与吸纳：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与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建构
…… 王学梦 黄鹏进（288）
1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杭州与皖东南地区
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互动关系的初步研究…… 杨云翠 陈虎山（308）
20. 粟裕经典运动歼灭战：天目山战役 …… 李 雪（318）

21. 红色根脉强基视阈下：打造生态、智治党建模式探索
…… 陶启付　潘承恩（325）
22. 杭州“红色基因”焕发新时代发展动力 …… 楼韵佳（335）
23. 红色资源“隐入”爱国主义教育的三维析论 …… 任雅楠（345）
24. 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教学的三重维度
…… 朱金玲　林　洁（357）
25. 场域嵌入：新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探析
…… 高仓健（365）
26. 在传承红色基因背景下杭州党史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
现状和对策研究…… 陶莲君（373）
27. 新时代非公企业红色基因的传承——杭州万事利集团的新丝路
…… 吕明艳（385）

**三、探寻共富之路**

28. 高质量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杭州密码” …… 周　爽（397）
29. 乡村共同富裕过程中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机制及其作用
…… 杨曦娥（407）
30. 杭州共同富裕模式创新：生态效应转向价值链效益的模式探究
…… 孙　丽（421）
31. 赓续红巷精神赋能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
…… 高明明　刘　毅（431）
32. 共同富裕视野下杭州未来社区建设探微 …… 吴　帅（443）
33. 全域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 吴　昌　喻　佳（453）

34. 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样板”效应对全国县域经济借鉴作用研究
…… 杨乃如（464）

**四、启航新征程　奋进新时代**

35. 呈现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
——杭州城市文化建设的实践逻辑及其启示…… 沈小勇（475）
36. 抓住亚运会契机促进杭州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 …… 张敬业（486）
37. 为世界赋码，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契机…… 徐李萍（493）
38. 餐饮油烟污染监管市监困境与对策——以萧山为例 … 陈　莹（502）
39.“八八战略”下基于直觉模糊的杭州营商环境评估与对策研究
…… 赵　江（511）
40. 县域经济产业集聚规模化效应的孵化机制研究
——以桐庐快递业为参照…… 潘承恩（527）
41. 基于中外城市比较的杭州创业环境国际化研究 …… 高国东（537）

# 上篇　专家代表发言

# 中共杭州小组创建的历史意义

◎李辉毅[1]

一百年前的1922年9月初，中共杭州小组在上城区皮市巷3号成立了。这是杭州近代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件大事。自此，杭州人民在革命斗争的征程上就有了领导核心。

## 一、中共杭州小组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20世纪初中国历史发展和国际环境影响的产物。20世纪初，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革命力量的成长，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到来创造了客观的社会基础。特别是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明的冲击，俄国十月革命和欧亚反殖民主义斗争浪潮的高涨，则为新的人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顺应世界潮流和时代的呼唤，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杭州地处祖国东南沿海，唐宋以来成为中国经济和文化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也是近代以来最早遭到西方列强侵略的地方之一。富有革命传统和爱国精神的杭州人民不堪奴役和压迫，进行了一次次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爱国运动，杭州都是斗争的重要

---

① **专家简介**：李辉毅，男，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史志编研处处长，长期从事杭州地方党史资料征集、编辑和研究。

城市。20 世纪初，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沈尹默、沈钧儒等一大批著名思想家曾在杭州学习或任教，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新文化传播得比较早。杭州得风气之先，加之，毗邻上海，和上海存在频繁的经济、文化和人员往来。这使杭州成为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地方，1909 年发生的“木瓜之役”就是新旧思想的一次交锋。1915 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加速了新思想新文化在杭州的传播。五四运动爆发后，杭州迅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斗争。在响应五四运动的过程中，杭州涌现出宣中华、俞秀松、施存统、徐白民等一大批先进分子。

五四运动后，浙江一师在校长经亨颐的主持下，坚持“与时俱进”教育革新思想，实施了“职员专任”、“学生自治”、“改授国语”、“学科制”等重大教育改革，引进陈望道、李叔同等一批新式教师，使校风为之一新，学生自治更趋活跃。《浙江新潮》《钱江评论》等各种进步刊物纷纷创刊，宣传的内容逐渐由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新村”主义等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北有北京大学，南有湘浙两师”。杭州成为浙江乃至周边地区传播新思想的中心。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为杭州地方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浙江一师的教育改革也激起了守旧势力的仇视，引发了 1920 年初的“一师风潮”。“一师风潮”后，杭州的进步师生纷纷走向工厂、走向农村，走上了和现代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譬如沈乃熙（夏衍）到杭州纬成公司写出关于丝绸工人状况的调查报告。浙江一师学生宣中华等人深入印刷工人中间，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1920 年七八月间，浙江最早的现代工会组织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成立。这也是全国最早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他们还创办了浙江最早的工人刊物——《曲江工潮》，这也是全国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杭州党组织的创始人徐梅坤就是互助会的宣传股长，负责《曲江工潮》的出版工作。1921 年 9 月，在沈玄庐、宣中华等人的宣传发动下，萧山爆发了衙前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是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现代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杭州地方党组织的成立奠定了社会与群众

基础。同时，在五四运动、“一师风潮”和现代工农运动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先进分子，为杭州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准备了干部基础。

在此基础上，1922 年 4 月，浙江省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在皮市巷 3 号成立，俞秀松任书记，有团员 27 名。这也是全国最早建立的 17 个青年团组织之一。9 月初，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徐梅坤召集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在上城区皮市巷 3 号成立中共杭州小组。这也是浙江省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组织。

## 二、中共杭州小组创建的历史意义

中共杭州小组的成立在浙江、杭州的革命斗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1）中共杭州党小组的创建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和城市斗争相结合的成果。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中华民族的沉重灾难，杭州的志士仁人和全国的仁人志士一样，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挽救民族危亡的探索奋斗，杭州一直是全国革命斗争和新旧思想交锋的重要城市之一。新文化运动后，各种思想在杭州广泛传播，并深深地影响着杭州的先进分子。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播。杭州的先进分子在研究、实验、对比中自觉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最先自觉走上了和现代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茅盾）、沈泽民、沈玄庐等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杭州成为全国最早有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城市之一。中共杭州小组虽然成立于全国建党后，但这“决不会减损浙江和杭州地区早期建党历史的光辉”。

（2）杭州地方党组织成立后推动了全省各地党的组织机构的建立。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后，立即着手在全省各地建立党的组织机构。杭州党组织先后派人到绍兴、台州、宁波、嘉兴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党员人数在 1927 年初一度达到 3000 多人。在 1927 年 6 月中共浙江省委成立前，杭州地方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承担着在全省建党的工作。

（3）杭州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浙江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和浙江的国民

革命。中共三大作出国共合作的决策后，瞿秋白、徐梅坤立即召开杭州支部党员大会进行传达。1924 年 2 月，中共党员沈玄庐、俞秀松、宣中华等在杭州着手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各级地方党部。3 月 30 日，中国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成立。在当选的 14 名中国国民党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中，跨党的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有 7 人，他们是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骨干和实际负责人。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的成立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在浙江的实现。随后，杭州党组织帮助国民党在全省各地建立各级党部、发动响应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等运动，召开“东山会议”与“西山会议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巩固了国共统一战线的暂时团结。为策应北伐军，杭州党组织策划“夏超独立”，动摇了军阀孙传芳在浙江的统治基础，掀起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配合北伐军在浙江的胜利进军。

（4）从杭州走出去的浙籍先进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全国的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杭州的先进分子属于杭州，也属于全中国，他们的舞台在杭州，也在全中国。他们的贡献具有全国性意义。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不仅有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全译本、邵飘萍出版的《新俄国之研究》，还有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等参加的与“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论战等。二是从杭州走出去的浙籍先进分子，参加了上海、广州、旅日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三是从杭州走出去的浙籍先进分子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也作出了特殊贡献。1920 年 8 月，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任书记。在 8 位发起人中，有 5 人是从杭州走出去的浙籍先进分子。俞秀松领导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还起着国内团的发起组的作用。1922 年 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施存统、俞秀松先后担任团中央书记。四是从杭州走出去的浙籍先进分子活跃在全国大革命的舞台上，对全国的国民大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群星灿烂，人才辈出，杭州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 金佛庄与伟大建党精神[1]

◎苗体君[2]

**内容提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铸就出的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金佛庄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是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的3名成员之一，还是中共三大代表，他的一系列革命实践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伟大建党精神存在着内在的契合性：其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中践行、诠释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理论品格；，在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践行、诠释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政治品格，在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践行、诠释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实践品格，在强化自身建设的革命实践中践行、诠释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道德品格。金佛庄不仅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者，而且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体现者，他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金佛庄；伟大建党精神；中共杭州小组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实践中，铸就出了伟大建党精神，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之源。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在探索

---

① 2022年6月30日，苗体君教授以本文为依据，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根据作者意见，以本文代替作者会上发言要点。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20年度特别委托项目“解放战争时期广东南路人民武装的建立和发展”（GD20TW05-05）的阶段性成果。

② **专家简介：**苗体君，男，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联系电话：13610394006；电子信件：mtj1969@126.com。

革命的道路中培育、铸造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理论品格；在追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培育、阐释出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政治品格；在领导工人运动的革命实践中培育、铸造出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实践品格；在强化自身建设的革命实践中培育、铸造出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道德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把伟大建党精神高度概括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①]，四句话，共 32 个字。

伴随着伟大建党精神的产生，金佛庄也由一名团员发展成为党员，并成为中共早期的优秀军事干部。金佛庄（1897–1926），浙江省东阳县横店乡良渡村人。1922 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军校读书期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 7 月，金佛庄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后被分配到浙军第二师陈仪部任排长。同年秋，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委负责人徐梅坤到杭州开展建党工作，经过考察了解，由徐梅坤介绍，“后由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批准转为中共党员，时任浙军陈仪师连副”[②]。“1922 年 9 月初的一天，徐梅坤召集在杭的 3 位党员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会聚于皮市巷 3 号，召开建立杭州党组织的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即中共杭州小组）”[③]。这样，“金佛庄就成为党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组织——中共杭州小组最初的三个党员之一，并在一九二三年夏，和杭州小组的另一个党员于树德，被指定为浙江的代表，去广州列席了党的‘三大’。”[④] 关于中共三大应该划归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党史学界普遍认为应该划归在中国共产

---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杭州地方史略（1919–1949）》，准印证号：浙出书临（92）第 4 号，第 24 页。

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87 页。

④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69–70 页。

党的创建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胡华在其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将党的三大划归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2006 年 6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倪兴样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也“将中共三大划归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①]。由此可见，金佛庄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后来，金佛庄在黄埔军校担任要职，北伐战争期间，被军阀孙传芳杀害于南京。金佛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活动的重要实践者之一，通过这一系列的革命实践，用行动践行了伟大建党精神，他还通过撰写日记、自述及在杂志上发表论文的方式，从理论上铸就伟大建党精神。

## 一、践行、铸就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理论品格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内容，而且放在伟大建党精神四个要素的首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真理，把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理想，即中国共产党“手握真理、胸怀理想，发端于建党之时”[②]。100 年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彰显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品格。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③]

金佛庄选择并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及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1915 年，金佛庄怀揣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考进浙江省东阳县立中学，并与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严济慈是同班同学。后来，严济慈在回忆他对家乡东阳的印象时说：“其他的事都记不清楚了，只有在东阳县立中学时，

---

①李良明：《共产国际与中共三大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中共三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州出版社 2006 年，第 109 页。

②《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人民观点）——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②》，《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8 日。

③《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人民观点）——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②》，《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8 日。

同金佛庄两个人，每次考试时都要互相激烈争夺第一名这件事最有趣，至今念念不忘。”[①] 本来金佛庄具有与严济慈一样成为科学家的可能，但很快金佛庄就放弃了“科学救国”的理想。在东阳县立中学期间，恰逢袁世凯为了让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他登基称帝，竟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性刚直，然富于感情”的金佛庄得知消息后，便放弃了原来的“科学救国”的理想，“志欲舍去研究科学而从军报国”。[②]

1918 年，金佛庄从东阳县立中学毕业后，考进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金佛庄又目睹了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及旧军队的黑暗腐败，这又使得金佛庄对“从军报国”的道路产生怀疑。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在各种新思潮的冲击下，金佛庄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此，金佛庄曾记述道：“‘五四’运动起，思想大变，厌恨军阀并自厌为军人之心甚切，企图改业。”[③]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的金佛庄想放弃“从军报国”的道路，另找出路，恰在这时，直皖军阀开战，保定军校一度关门停办。很快金佛庄又考进了厦门大学，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非常盛行，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金佛庄改而“研究教育与文学，而要求改造社会之心甚切，祇思想浪漫，近于无政府主义者”[④]。

由于厦门大学在思想上比保定军校开放的多，这就使得金佛庄能自由接触、探索各种新学说及新思潮。但在保定军校读书时，可以一切享受公费，而且还发放一些生活津贴，但在厦门大学读书，学费、生活费及其他一切费用都要由家庭来负担，这就使得金佛庄在厦门大学的生活异常地困难。金佛

---

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69–70 页。

②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25 页。

③ 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25 页。

④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25–26 页。

庄的父母实在无力供金佛庄在厦门大学读书，“只好请同村十几户亲邻友好共设一个‘银会’，每户拿出十块钱的份子钱，借给他做学费”[①]。这样勉强在厦门大学读了一年书后，金佛庄也觉得这样实在不行，恰在这时保定军校又重新复课了，“因受家庭催促及朋友以‘新军人’相救劝，重回保定军校求学”。[②]可以说，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生活的困顿，使得金佛庄放弃了厦门大学，也放弃了对无政府主义的追求与探索，被迫重回“从军报国”的道路。

1921 年 10 月 3 日，金佛庄从厦门乘海轮到天津，然后经北京，回到保定。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马列主义已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刚刚回到北方的金佛庄便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各种新思潮、新学说，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1 年 10 月 16 日，金佛庄以《手段与目的》[③]为主题写下了《佛庄日录》，记述了自己探求人生真谛的过程。在保定军校金佛庄除接受严格军事训练外，“即从事研究社会政治等学，而尤信仰马克思主义”[④]。1922 年，他在保定军校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此后，金佛庄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并开始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事业。

总之，金佛庄在学生时代通过曲折的探索，最终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实现共产主义就是自己的理想，而后又用自己 29 岁短暂辉煌的人生，践行、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中的要坚持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要坚守的理想，就是实现共产主义。

## 二、践行、铸就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政治品格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处在被世界帝国主义剥削之下，

---

①转引自 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25 页。

②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承印，1986 年，第 26 页。

③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承印，1986 年，第 43-72 页。

④张宝琛：《金佛庄同志事略》，《黄埔日刊》第 221 号（1926 年 12 月 22 日）。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想摆脱世界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就必须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组织。为摆脱世界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剥削，近代中国人民曾进行过多次尝试，但均遭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受阻，此后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便把目光投向了共产国际，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很快一个矢志不渝为人民谋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便宣告成立，所以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①。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中共十九大上，谈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③ 同样，金佛庄的初心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使命也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金佛庄的家境非常清寒，其父亲是一位乡村中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医术在东阳横店附近农村颇有些名气。其母亲除操持家务外，还要外出采桑叶卖，以补贴家用，正是在这种贫困家境下，“遣儿求学，吃尽艰辛，佛庄亦深感其痛苦”④。正常情况下，金佛庄会与其他贫困人家的孩子一样，通过埋头读书以改变自己及家庭贫穷状况。但金佛庄并不是这样，在东阳县立中学读书期间，当看到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金佛庄再也坐不住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痛心疾首，拍案而起，立刻

---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97 页。

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27/content_41805113.htm

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

④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25 页。

忘记了家庭的贫困，自己生活的拮据，想到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并大声疾呼："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①] 由此可见，金佛庄没有因为家境的贫寒，而忙于改变自身的命运与不幸，金佛庄小时候就具有为人民谋幸福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基因。

在金佛庄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按照东阳当地的惯例，金佛庄的父母给金佛庄订了一门亲事。金佛庄的未婚妻严瑞珍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对这门婚事，金佛庄当即表示反对。为此，还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论婚姻问题》，用以反驳自己的父母。金佛庄的父亲气得拿旱烟筒要打金佛庄，并严厉地说："你不要嫌她没有文化，只要人品好，等你将来出去做了事、有了线，难道不好培养她读书吗？"[②] 最后，金佛庄遵从父命和严瑞珍结了婚，婚后二人感情很好。当金佛庄到保定军校去学习时，就带着妻子一同前往，而后让妻子去读桑蚕学校。近代的中国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封建的婚姻受到挑战，许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女性成为婚姻的遗弃者，成为反封建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甚至有不少男性借反封建婚姻为名，向女性不负责任的耍流氓。而金佛庄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例外，这更彰显出了金佛庄对婚姻家庭的责任与担当，可谓是有了对婚姻家庭的责任与担当，才会有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与担当。可见，学生时代的金佛庄已具有了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担当的基因。

1922 年，金佛庄在保定军校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背年团，随后，便开始了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1922 年 7 月，金佛庄即将从保定军校毕业前，以改造社会、救国救民为宗旨，与校内 40 多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因 1922 年是中国农历的壬戌年，所以社团被命名为"壬戌社"，创办壬戌社的目的就是用以"罗致各省革命军人

---

①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25 页。

②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25 页。

同志，以谋中国之革命”[1]。考虑到“壬戌社”的成员马上要毕业离开保定军校，“不久就要分散各处，不能聚首一堂互相亲口研究对付社会的方法了”，所以，金佛庄提出“不能不先有一个准备”。并且提出了一个逐步掌握军事实力以改造中国的方案，方案分三阶段：“第一步是个人的方法，其历程自[初级军]官至中级官。第二步是部分的方法，其历程自中级军官，至据有势力之中坚人物。第三步是全体的方法，是中国改造的实现。”[2]金佛庄还告诫“壬戌社”的成员，日后如果当真有了军事实权，决不能忘却和背版革命的宗旨。这也是金佛庄成为共产主义者后，首次提出改造中国的蓝图。他自己都承认“这些方法，总有不完备的地方”，甚至有些方法根本行不通。但这些都充分展示了金佛庄夺取全国政权，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迫切心情与愿望，他已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当作了己任。

总之，金佛庄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通过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践行、铸就伟大建党精神中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从而铸造出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政治品格。

### 三、践行、铸就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实践品格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效仿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积极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开展斗争，他们不畏强权，不怕流血牺牲，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培育、铸造出了“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伟大建党精神这一实践品格。2021 年 2 月 20 日，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同时还“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

①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26 页。

②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83 页。

烈士”[1]，而金佛庄就是这一时期革命烈士中最杰出的代表。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协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官学校，把金佛庄派往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并被任命为军校第一期第三（学生）队上尉队长。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金佛庄曾率领以黄埔军校学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以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三营营长的职务，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滇军军阀杨希闵、桂军军阀刘震寰的叛乱，还参加了讨伐粤系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可以说金佛庄“历次战役，冲锋陷阵，无不身先士卒。作战计划，尤为周密，盖金君智勇兼备，〔不〕特能决胜疆场，且能运筹帷幄也”[2]。第一次东征时，在淡水、鲤湖、兴宁等战役中，金佛庄指挥的第三营，“勇敢善战，勋绩灿然，为第二团获得党军荣誉旗。回师广州时，龙眼洞、观音山诸役，第三营常为战线之中坚者”[3]。所以，当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时，金佛庄凭借战功卓著，被擢升为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很快又改任团长。廖仲恺被刺杀后，金佛庄又率部参加镇压反革命势力的行动，“解散梁张郑莫，拘留熊克武及第二次东征诸役，莫不参与”[4]。可以说，金佛庄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军事实践，充分展示出了他“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品格。

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南昌后，直系军阀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职，率军盘踞苏、浙、皖诸省负隅顽抗。孙传芳还“聘请了日本人冈村宁茨为首席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军队，参与制定作战方略”[5]。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则为了尽快占领江浙地区，并以自己的家乡浙江作为自己的政治根基，开始加紧策划对孙传芳各部的分化与瓦解工作。为此，

---

①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21-03/31/c_1127278288.htm

②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八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74 页。

③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26-27 页。

④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27 页。

⑤吴红梅：《金佛庄被出卖的原因追溯》，《党史文汇》2011 年第 1 期。

还专门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商议此事，金佛庄列席此次会议。在会上金佛庄主动提出回到浙江、上海等地，通过他以前在浙军中的人脉关系，在浙军中秘密策划起义。当时北伐军与孙传芳各部交战正酣，孙传芳对所属各部的动态保持着高度的戒备性，所以此时金佛庄去浙军中策划起义，危险性极大，如果泄露机密就会引来杀身之祸。但作为共产党人的金佛庄，为了早日完成北伐大业，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自告奋勇地说："为了革命的胜利，虽赴汤蹈火，皆所不辞！"[①] 说是秘密军事会议，"鉴于参与此次会议的高级将领及各军师党代表等就有 30 余人，很难做到严守秘密"[②]。很快金佛庄在执行策反任务的途中被俘。通过这件事，金佛庄也被誉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最忠实、最积极、最勇敢、最富于牺牲精神的先锋战士"[③]，把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实践品格发挥到了极致。

1926 年 12 月上旬，金佛庄化装成洋行买办，从九江搭乘英商轮船奔赴上海，不料上船后，其行踪就被泄露，"是不是蒋介石或与会的高层人物有意对外泄密抑或是有人无意中泄密？由于年代久远，都很难查证"[④]。船到南京下关码头，金佛庄就遭孙传芳部驻南京的卫成司令孟昭月和宪兵司令汪其昌逮捕，与金佛庄一同被俘的还有金佛庄的随从顾名世。金佛庄被俘的消息传出后，在国共两党中引起了震动，随后，上海的国、共两党组织开始多方设法营教，并通过各种关系，托"沪上某君"，电请金佛庄的老上司、当时尚归附孙传芳的浙江省省长陈仪出面，向南京方面说情疏通。但到 12 月 13 日，陈仪的答复是，营教不及，金佛庄已被杀害了。最终，金佛庄用牺牲践行了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实践品格。

---

①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76 页。

②吴红梅：《金佛庄被出卖的原因追溯》，《党史文汇》2011 年第 1 期。

③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76 页。

④吴红梅：《金佛庄被出卖的原因追溯》，《党史文汇》2011 年第 1 期。

## 四、践行、铸就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道德品格

在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进程中，早期共产党人积极保持自身的纯洁性，从而培育、铸造了伟大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道德品格。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谈到对党忠诚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艰险和磨难，但任何困难都没有压垮我们，任何敌人都没能打倒我们，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①] 关于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②]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③] 金佛庄出生在“半农半医贫苦家庭”，[④] 对广大贫苦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北伐战争时期，当北伐军攻克南昌后，由金佛庄的警卫团负责南昌城的警戒及维持城内秩序。金佛庄被任命为南昌城检查司令，他依据法律之规定，“接受民众怨诉，除暴安良，视民如子”[⑤]，得到南昌民众的衷心爱戴。时任总司令部秘书长的邵力子曾评价说：“当时南昌民众只有金司令，几乎忘记一切官吏矣！”[⑥] 这也是金佛庄“不负人民”的道德品格最好的历史见证。

金佛庄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在浙军第二师陈仪部任排长，因能文能武，才华出众，在浙军中得到广泛的赞誉，他很快从排长被提升为连副，又很快

---

①《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301/c64094-32039744.html

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③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④闻参：《北伐名将金佛庄》，《今日浙江》2000年第22期。

⑤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八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6页。

⑥闻参：《北伐名将金佛庄》，《今日浙江》2000年第22期。

升任为营长。这期间，在党的领导下，他思想进步也很快，“从事革命，宣传革命运动，革命思想益进，乃能应用唯物观察一切”[①]。他还积极参与杭州进步刊物《协进》、《浙民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以“宣传主义，鼓吹青年”“吸收同志，向外活动”[②]，以此为公开的舆论阵地，来传播革命思想。一次，因通信泄密，金佛庄被反动当局拘捕入狱，当时的“社会名流”蒋百里、殷汝丽等都出面营救，并致函当时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信中对金佛庄大加赞美，说“中国二十年来无此人才，公宜爱护之”[③]，最后，金佛庄才被释放出狱。

金佛庄的杰出才华，也得到了中共江浙区委的充分肯定与重视。1923 年 8 月 5 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出席指导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第六次会议，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徐梅坤就曾极力向毛泽东推荐金佛庄，“说这是个很有用的入才，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调他出来”[④]。

在黄埔军校期间，金佛庄充分发挥在保定军校所学的丰富的军事知识，“平日除军事教育外，尤努力于政治工作，及党务活动”[⑤]，并因此受到了黄埔军校首任党代表、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格外器重与赏识。此外，金佛庄在黄埔军校广大师生中也有着极高的威信。1924 年 7 月 6 日，黄埔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党部时，金佛庄被选为特别党部的五名执行委员之一，这是一次由民意决定的选举，足见金佛庄在黄埔军校的人气与威望。

当然这一时期最欣赏金佛庄的当属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蒋介石赏识金佛庄的原因很简单，“一者金佛庄颇有才华，又具备实干精神，品行端正，

---

①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26 页。

②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70 页。

③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70 页。

④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 年，第 5 页。

⑤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二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71 页。

作风正派，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带兵官，正在组建中的黄埔军校最需要这样的人才；二者金佛庄是浙籍人氏，乡音亲切”[①]。为此，蒋介石对金佛庄极力拉拢，并有意进行栽培，很快金佛庄就升任第一军第一师第2团党代表、团长职务。“与后来成为黄埔八大金刚的顾祝同、陈继承等平起平坐”[②]。

1926年3月12日，蒋介石为了夺取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领导权，亲自策划了“中山舰事件”，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迫全部退出第一军。当时，率领第二团驻扎在汕头前线的金佛庄，也被解除了团长职务，调回黄埔军校，改任步兵第一团军事学主任教官，兼改组委员长及法规编审委员长，负责编审黄埔军校的法规、制度。蒋介石知道金佛庄是共产党员，但非常赏识金佛庄的才华，企图趁“中山舰事件”，利用“浙江同乡”的关系再次拉拢金佛庄，蒋介石不止一次地暗示金佛庄，要他脱离共产党，然后委以重任。关键时刻，金佛庄不为名利所动，表现出了对党的忠诚，据江浙区委书记徐行之回忆：“中山舰事件后，金佛庄被迫回黄埔军校任教官，当时在军校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很有成信，因此蒋介石很想拉扰他，但他始终立场坚定，未受拉拢。”[③]

其实蒋介石拉拢金佛庄不止这一次，而是多次拉拢。早在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时，在闽粤前线的一次战斗中，金佛庄亲率部队打死陈炯明的亲信师长林虎，并歼灭了林虎所率领的整个师，此事当时震动很大，“蒋介石用各种办法更想拉扰这个奇才人物为自己效劳”[④]。北伐战争开始后，金佛庄就“把蒋介石拉拢他的情况曾忠诚地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指示他佯作被拉拢去担

---

①刘冰：《蒋介石与金佛庄之死》，《民国春秋》2000年第6期。

②刘冰：《蒋介石与金佛庄之死》，《民国春秋》2000年第6期。

③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年，第2页。

④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年，第2页。

任蒋介石总司令部警卫团长，秘密监视蒋介石”[1]。可以说，“蒋介石对金佛庄的争取和拉拢是非常有力度的，可以说是机关算尽，委之以重权，饵之以乡情”[2]，但金佛庄的表现彰显出了他“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道德品格，通过这件事，金佛庄也践行、铸就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综上所述，金佛庄从192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26年12月被军阀孙传芳杀害，在其革命生涯的4年里，通过自身的革命实践，用行动践行了伟大建党精神。他还通过撰写文章，从理论上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金佛庄不仅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者，还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体现者，他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

①转引自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内部发行），浙江省东阳县印刷厂，1986年，第2页。

②刘冰：《蒋介石与金佛庄之死》，《民国春秋》2000年第6期。

# 杭州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

◎ 史晋川[①]

100 年前，中国共产党在杭州的第一个组织，杭州中共党小组成立。这 100 年是杭州近代史上非常重要一百年，也是杭州百年现代化的历史，今天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纪念和研讨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100 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00 年前，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杭州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一座城市，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也是比较落后的，经济结构也是比较传统的，城市功能的是比较单一的，城市的建设格局也是比较狭窄。 经历了百年历史，我们的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不懈的奋斗，把我们的社会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变成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然后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当中，杭州的发展是在整个中国的区域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多年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

杭州现在已经是一个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现代化城市，全市 2021 年的地方生产总值达到 1.81 万亿元，人均水平超过了 15 万，折合美元已经超过 2 万多美元。同时，杭州也建立了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相互促进，特别是近二十年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及互联网 + 产业的发展，催生了众多的城市发展中新的经济增长点，

---

①专家简介：史晋川，男，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和法律经济学。

在推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经济结构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占比已经高达 68%。杭州的整个城市空间也通过不断的撤县建区及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有了很大的拓展，城市框架更加舒展，城市的功能更加完善，城市吸引和集聚高水平和高素质要素的能力不断的增强。八年前在国际城市综合排名中，杭州市还是处在 100 位之外，杭州现在全球国际城市的综合排名已经进入到第 80 位，上升非常之快。

杭州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由我们党所开辟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开直接来推动的。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发展是推动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力量，而发展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改革开放。

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视角来看改革，实际上就是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资源配置的主体的变化，二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资源配置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包括农村的人民公社。资源配置的主体在改革开放之后变成包括个体、私营、外企等等在内这样的一些经济主体。以公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这样一种资源配置主体的变化，实际上就是改革的非常重要一个成就，这些新成长起来的资源配置主体，就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及城市现代化非常重要的力量。改革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同样从资源配置的视角来看，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资源配置在计划经济中是通过政府的计划方式来配置的，改革开放之后，资源配置方式开始逐渐过渡到以市场为主，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到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九大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通过深化改革 —— 资源配置主体的民营化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就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及城市现代化发展。

从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视角来看发展，也是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资源在不同的产业部门的流动和优化的配置，这个过程就是工业化；二是资源在不同空间的流动和优化的配置，这个过程就是城市化。区域经济发展一定是资源从广大分散的农村地区及从农业这样的初级产业部门，不断向具有区位优势空间的地区例如城市，向工业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部门不断流动和优化配置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发展。一个是工业化，一个是城市化，发展

推动了现代化，而发展的背后就是就是改革。杭州在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使得改革和发展成为非常好的互动。

同样，杭州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现代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两者之间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互动。在改革开放初期，杭州的工业化是以农村工业化为主，分散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农村工业化为主的工业化，这个发展阶段的工业化，最好的集聚空间就是县域经济。所以杭州当时发展出许多全国百强县，通过强县战略来推动来推动工业化的初期发展及县域经济发展。90 年代中后期，杭州的进入工业化的中期之后，这个发展阶段，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多高端的生产要素来支撑，而这些高端的生产要素不可能分散在各个县域经济当中来集聚。加快高端生产要素集聚，必须要通过大城市及中心城市这样具有区位优势的城市来解决。这个过程当中，杭州市在全省最早撤县建区，通过都市化的空间发展战略来推动新型工业化，来提升工业化的能级，使得整个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升级时代。最近 20 年，新型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的互动，，不仅先进制造业发展起来了，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计算机与信息技术，互联网 + 这样一些现代服务业都迅速的发展起来了，建立了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也极大推动了城市化建设的现代化。所以，杭州在现代化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是，不仅形成了改革与发展的互动，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良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互动。

杭州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现在仍然在持续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继续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及城市的现代化建立。另一方面，杭州从强县战略转到都市战略之后，现在又进入了都市联动发展战略，通过杭州和宁波的“双城记”的发展，引领全省大湾区的发展，同时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 展望未来，杭州未来 5–10 年的发展很有希望跨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也应该能够达到 85% 或以上，同时共同富裕的橄榄型社会的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共生共荣的城市建设，也会取得非常大的进展，将会为杭州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打下很好的基础。

# 数字化发展与共同富裕

◎张旭光[①]

四十年前我们邓小平同志放在深圳的改革开放试点，引领了我们整个中国大地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当年邓小平同志划定深圳作为改革开放试验区，他有两句经典语录：一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句是“摸着石头过河”。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今天，这“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目标已经实现，在奔向第二个一百年发展目标的征程中，要改革再继续，我们浙江省委与时俱进提出“数字化改革”，这场新的“数字化改革”特征也是两句话，第一句是“共同富裕”，所以习总书记要求浙江成为全国第一个共同富裕的示范省。第二句是“顶层设计”，大家可以看去年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会议精神，习总书记在总结发言中讲到了要用顶层设计的理念规划好未来发展，用新思维引领未来数字经济，所以浙江的“数字化改革”极其有政治高度和未来引领意义。

在2021年2月18日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上，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同志提出数字化改革定义，定义第一句就说要围绕建设“数字浙江”目标，这就表

---

①**专家简介**：张旭光，男，浙江省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会会长、浙商总会数字资产及交易委员会执行主席兼专家委员会主任。

明了我们浙江数字化改革的政治高度，因为2003年，我们习总书记在浙江当省委书记的时候由他亲自提出 “数字浙江”发展计划，今天的数字化改革就是如何将19年前习近平书记描绘的“数字浙江”这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数字化改革定义指出：“围绕建设“数字浙江”目标，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的过程，从整体上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根本上实现全省域整体智治、高效协同，努力成为“重要窗口”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所以，这一场“数字化改革”不只是从信息化到数字化递进的技术升级改革，而是一场新的伟大的社会改革。时代发展到今天，更广泛、更深入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正是交汇在一个全球数字化浪潮席卷而来的大时代背景之中，数字化将会改变我们社会、政府、经济、城市的种种形态，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我们省委袁家军书记提出了数字化改革定义和一个非常宏伟的数字化改革目标：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我相信这个大目标一定是代表我们国家的发展目标，它代表着第二个一百年发展的“重要窗口”，浙江数字化改革大会提出要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也就是代表了中国的数字变革高地，我理解这也是赋予浙江“重要窗口”的重要嘱托。也是未来浙江践行“两个先行”奋斗目标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数字化改革发展中的浙江案例，一个是“城市大脑＋未来社区”，第二个是“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第三个是“教育魔方＋未来学校“”，第四个我称之为“农文旅生态大脑＋未来乡村”。就是“大脑＋未来”模式。这“大脑”是什么？它体现了抓住数据这个新关键要素，打造一体化、智能化的公共数据平台，实现数据要素的共享、协同、融合、集聚、相关。去年首次提出打造数字化改革四梁八柱的“152”工作体系，今年2月28号，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推进大会把“152”工作体系继续升级迭代为“1612”工作体系，其中“1”就是一体化、智能化的公共数据平台，是“平台＋大脑”，“6”即党建统领

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法制六大系统，第二个“1”即基层治理系统，最后的“2”即理论体系与制度规范体系。浙江省在数字化发展当中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们浙江还推出全国第一部省域法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还相继出台《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用立法立规为数字化改革保驾护航，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不久前，6 月 22 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26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所有这些大的政策背景让我们可以看到，数据已然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性资源和数字资产，它也是继劳动力、土地、技术、资本之后的第五大关键要素。

在数字化改革打造数字变革高地的前进道路上，我们怎么样做好共同富裕先行呢？我正带领旗下团队用数字化赋能打造“服务型制造”和“组织型制造”新产业形态，帮助小微企业抱团取暖、扬长避短，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小微企业发展遇到瓶颈甚至很困难，小微企业怎样运用资源整合、抱团取暖和数字化赋能实现共同富裕？例如，我们对各类小微服装加工业企业用“组织型制造模式 + 工业互联网平台 + 线上线下协同运营 + 商业银行供应链金融服务”构建行业“虚拟集团”，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组织型制造创新，服务型制造创新，打造共同富裕新生态。服装加工业的“虚拟集团”，如果没有工业互联网平台，没有数字科技赋能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它需要线上线下的结合，服务与运营的融合，进而达到降本、增效、提质、创新。

我还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创立了一个《旭光讲坛》，旨在帮助各地各级干部和企业家们提升数字经济新认知，建立数字经济新思维，如何在数字化改革发展道路中“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积极促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习总书记那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典论述，我们不仅要看到保护绿水青山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更要站在哲学的高度看到绿水青山背后的道法自然哲学观、天人合一观。我们应该如何顺势而为、因势利

导、因地制宜？践行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观，我所理解的数字化认知，就是“工业化异化的人性回归趋势下的以人为本之生态文明观”，认知的本源是以人为本的生态文明观。数字化认知，就是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实现人性回归；那什么又是数字化思维呢？它是数字化认知下的思维方式，数字化思维中最基本的思维是连接改变世界的“连接思维”，从“万物互联”到“万物信联”进而再到“万物智联”，它由此带来“用户思维、关联思维、新时空思维、价值链思维、生态思维”等数字化思维集；数字化技术本身也呈现生态化融合之应用，我们业界把它称之为“AIOT+”，数字科技也会呈现科技生命体形态：生态化、协同化、融合化。只有深刻领会数字化改革定义中提出的“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我们才能感悟到这统筹运用后的“数字化”之智慧。

什么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创造精神呢？我曾经总结过一句话：不拘泥于当前资源条件限制下对机会的追寻，通过资源整合打造生态、挖掘需求、开发机会并创造新价值的过程。今天，我们杭州在省委提出的“两个先行”奋斗目标指引下，要抓住数字化改革的契机，运用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创造精神，实现融合共生、协同共享、扬长避短、共荣共赢、共创共富。

# 从诞生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说起

◎方益波[①]

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谈一些从事新闻工作那么多年的观察和体会。过去我长期从事政治报道、党建报道，上城区是中共第一个党小组诞生地，还有小营巷这种红色地标，都来过很多次，做过不少调研采访。记得 2009 年第一次来参观中国社区建设展示中心，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进门，一首儿歌在播放："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投到好人碗里头……"这个是陕甘宁边区当年关于共产党民主制度的路径展示，历史的足迹，印象非常深刻。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延安时期民主选举的票选法、烧洞法、投纸团法、背箱子和乍胳膊等选举方式，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的发展历史。

杭州是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的诞生地。1949 年 5 月 23 日杭州解放，当时的社会秩序很混乱，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保甲制度，并不是很配合，当时的杭州市长江华果断下决心要废除保甲制，10 月 13 日，上城区公所开始建立居民委员会，最后选举出了一位三轮车夫当选主任，旧的那些保甲长站在旁边，接受教育，完全按照选举投票的记录，这是新中国最早的居民委员会。这个居民委员会里面有工人、小手工业者、小商人、知识分子、教师、银行职员、茶店老板、工厂经理，甚至还有伪政府的职员，按照当时江华市长的定性，这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到了 1949 年的 12 月 1 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取消保甲制建立居民委员会的工作指示》，明确新的居委会的性质，是人

---

①专家简介：方益波，男，新华社高级记者。

民自己当主人、自己来办事的组织，是建立人民民主管理城市的基础。

这样一步步发展过来，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杭州的社区建设，包括社区党建等等，在全国都是在走在前列的。尤其是社区党建，中央领导到杭州来，充分肯定杭州的党建，走在全国前列。可以说杭州的社区不断更新创造着基层民主自治的新经验。近些年来开始建设数字化社区，推进改革创新实践。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所在的这个上羊市街，当年是全杭州市第一个实现无线宽带全覆盖的社区。在 2009 年的时候，还是属于非常先进的。他们是立志要做到历史第一和现实第一的相交融。类似等等，相关的这些指标，杭州都是排在全国前列。

杭州的社区建设体现的正是人民城市的思想“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体现的是治理模式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同时还体现技术创新和传承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这一党的传家宝的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我国城市发展和治理的鲜明导向，重要的战略思想，在杭州的社区治理和建设中都可以找到鲜活生动的相关素材。

总书记多次讲，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国家决策的参与者。这些创新实践，有着鲜活的、丰富的中国国情特色，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有事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

多年调研采访中，我印象比较深、比较有典型意义的还有几个点：

一个是上城区的“湖滨晴雨”工作室，体现“三治”融合——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有大量的热心的民情观察员，搜集大量的信息，然后报给政府，对政府发挥监督建议“挑刺”的作用，广泛地汇聚民意，集中民智来解决问题。意见都很小，都非常具体，但同时也正是民生所在，是城市治理需要用“绣花”功夫下力气的地方，往往也是传统治理容易忽略的地方，必须依托广大的人民群众去发挥作用，因为与切身利益相关。这是2009年成立的的全国第一个“民主促民生”社区互动平台，也是中组部、中宣部、中国社科院的社会舆情直

报点，也是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基层联系点”。我当时去调研的时候，认为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大量信息，反映的是最基层的民意，是老百姓的心里话，是专家学者说不出的大白话，是直接反映国计民生政策在基层效应的大实话。通过这样的桥梁纽带，通过这样的渠道，实现“政府常通气，百姓不憋气”这样的一种效应，使老百姓主动参与社会治理，从被管理者变为参与治理的决策者，那么政府和民众就不是一个单向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治理和被治理的关系，而是共同来应对发展中的问题，不是“我”和“你”，而是“我们”，形成一个治理的共同体。

第二个，就是咱们开会所在的这个小营巷，历经历史风雨青春长在的“红巷”，在这种“红色根脉”的传承中，守阵地、提效能，面积只有 0.3 平方公里，承载着百年党史，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两代领导人都亲自关心，这其中大量的品牌几乎形成了一个红色品牌的矩阵。这里有浙江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附近就是第一个浙江省党组织的旧址，拐弯就是钱学森故居，是打破西方“卡脖子”的先贤，附近还有郁达夫的故居风雨茅庐，还有蒋筑英纪念馆等大量红色资源。在传承中，小营巷打造了大量的新品牌，像红巷老舅妈、红管家、红墙门生活共同体等，“支部建在小区上”，形成了社区党委、准物业和议事协商会三位一体运行机制，带动周边区域党建和基层治理的创新。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内涵“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社区治理的精神内核，构建了城市治理、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就是“民主促民生”的基础民主协商机制。

在 2007 年的时候，杭州市委提出“四问四权”，最早是源于 2007 年的光复路分厕所事件，逐步延伸出来。当时政府实行危旧房改造改造，按道理政府给老百姓房子做加法是好事，但最后引发了新的矛盾，可见光是建设还不够，我们还得在治理层面不断创新。当年光复路分厕所的事情，延续了两年的时间，一直延续到 2008 年，各种会开了 30 多次，投票和热议的民主协商平台上，参与的热心市民达上万人次，目的只是解决三户居民上厕所的问题。由此之后，杭州大量的城市建设，旧房改造、背街小巷、外立面整治等等，

都体现这个思路。此外就是2016年秋水山庄事件，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在面对纷繁的舆情，面对大量的批评指责甚至情绪化的言论的时候，市委市政府没有回避，而是直面问题。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市委提出来——政府、市民、城市“共同成长”。大家是一起共同成长的过程，站在同一个立场上，都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党委政府肯定市民的热情，感谢群众的监督，党委政府主动站到同样的位置来，带领大家把事情去做好。当时杭州日报发文肯定，首先是称赞市民把城市当自家的一种热情，然后市委政府也发表了感谢信等等，这都是在我们国家面对社会层面的问题时，推进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杭州在这些重要事件上的表现，具有符号意义的价值。

再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今年西湖换柳事件，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在这样一个复杂的领域，有理工科的学科体系，同时又有人文的评判标准，相关的判断、抉择、应对都是比较到位的，最终获得普遍肯定和好评。

此外，还有一些理念和举措，比如说若干年来实行的杭州市的开放式决策，这个也非常重要。还有2009年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叫社会复合自治主体，四界联动，不同领域的人共同参与，实际上它打破了传统士农工商的阶层，从条条到块块，有助于推动社会共识。一般都是站在什么立场说什么话，屁股决定脑袋，往往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但是杭州这个“社会复合主体”的概念，从低层次的简配版的利益共同体、身份共同体，走向文化认同共同体、价值观的共同体，消弭社会阶层裂痕，升级成为更高层次的广泛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

2021年杭州市的“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专题活动，这是全省党史学习教育中，杭州的一项代表性活动。这里面有一种人格化的表达“知冷知暖”，城市是一个有机体，进行有机更新，城市能否以共情力、同理心，高效率地给社会角角落落的诉求以准确的回应。这是在数字化时代里面尤其需要的一种真情。这种理念，这种语言的转换，在实现了传统行政场景向数智场景转换的同时，还要实现工作视角向群众视角的转换、技术语言向生活语言的转换、文件思维向传播思维的转换，让主题活动和技术平台都可亲可感，从内在精

神到外在形式都“知冷知暖”，既好看、易懂，又好使、管用。这是虚实结合，是时代需求。

还有数字治理，健康码、最多跑一次、亲清在线等等，这些都是杭州的治理品牌。我们用数字平台进行经济建设，推动数字化改革、系统化重塑的同时，我还注意到杭州一些基层一些区县，甚至开始用算法来描画当地政治生态图像，非常有意义。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也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基础部份。总书记多次讲过，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础工作做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社区工作要做好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在前天还看到领导同志到武汉市视察，还专门深入到社区，了解社区的情况，再次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优势就是要把城乡社区的基础筑牢，把更多资源下沉到社区，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风险挑战，赢得发展。我们杭州从 1949 年 5 月一直到今天，在社区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方面是有历史荣誉与实践积累的，有先行一步的创新优势，只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绣花功夫不断开拓，就一定能够赓续红色根脉、创造更大的光荣。

# 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法院建立与党的依法治国理念

◎ 胡　铭[1]

2017 年 8 月，杭州市首开先河，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互联网法院。这不仅令我们这些杭州在地的学者感到振奋和骄傲，而且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在杭州互联网法院，数字与法治的深度融合随处可见，包括在线申请立案、以电子邮件等方式远程在线送达、证据交换动态更新、电子笔录等诉讼材料数字化以及在线庭审等。

第一，在司法信息化的进程之中，党的依法治国理念体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要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而互联网法院的建立、数字法治的发展，是全面依法治国理念的重要一环。杭州互联网法院处理的一系列案件也走在了世界前沿。如我们从信息时代迈向数字时代，而又快速地从数字时代向元宇宙时代迈进。而在大部分学者尚未接触元宇宙这一概念时，杭州互联网法院便已办理了“元宇宙第一案”。除此之外，“在线审判第一案”“区块链司法存证第一案”和“网络黑灰产

①专家简介：胡铭，男，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

第一案”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案件，也在杭州互联网法院得以宣判。

杭州作为互联网之都，是一个极具创新精神的城市。社会数字化转型给传统法律体系带来了严峻挑战，网络黑灰产、信息泄露、数据安全、电信诈骗、侵犯虚拟财产等网络犯罪层出不穷，技术手段也日新月异。而杭州互联网法院针对此类新型案件也作出了积极地探索，合理运用技术手段推进法治发展。如“共享法庭”“移动微法院”等审判模式的创新，通过提前梳理案件的法律争点，自动提示证据交换状态，使当事人在空闲时间完成举证质证等诉讼活动，将复杂案件的开庭审理简单化，双方围绕争议焦点进行调查和辩论，大大提升了司法效率。据统计，杭州互联网法院线上审判的平均审理天数为32天，而线下审判的天数为61天，且线上庭审的平均用时为28分钟，线下庭审的平均用时为68分钟。明显的是，在线诉讼模式在节省庭审时间、提高审判效率方面优势显著。但是，效率的提升只是司法信息化的一个方面。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杭州互联网法院实现了起诉、立案、送达、举证、开庭以及审判全诉讼流程在线化，这是浙江省全域司法信息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和标杆。在这样的背景下，诉讼参与人的任何诉讼活动都及时地、连续地留下了痕迹，而全面留痕则是关键所在。

“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全面留痕不仅有助于推进诉讼进程、减少纠纷，而且有助于规范诉讼参与人的行为，不仅包括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也包括审判人员的言行。通过全面留痕，案件能够受到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司法不公的乱象将得到限制，而司法公信力也随之提升。因此，诉讼活动全流程在线化，与全面依法治国的理念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杭州互联网法院打破传统司法的物理空间限制，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力量源泉，法治建设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建设，是司法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体现。随着互联网走进千家万户，涉网纠纷呈现井喷式增长，传统司法模式处理此类案件会遇到案多人少、司法资源配置的难题。同时，新冠疫情也给传统司法带

来了严峻挑战。在此种背景下，与传统诉讼模式相比，互联网审批、异地审理的优势就非常明显，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的实效。以电子证据为例，当下大量的证据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呈现，但如何针对电子证据举证质证成为传统审判方式的难题。而通过网络在线审判的同时，引入区块链技术能够防止电子证据被篡改的问题，能够有效解决传统审判中电子证据真实性的争议问题。如此一来，电子证据的存证、举证、质证、认证都更加便利且公开，便捷、高效且安全的技术手段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也使得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精神在法治领域真正落地。

第三，互联网法院、智慧法院的建设体现了数字时代的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如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是当下司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而互联网法院则在此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通过对大数据等技术的合理运用，对类案进行高效的类比分析，使得我们能够发现大量存疑的案件。例如，借由案件当事人、案件标的、案由、出庭方式、证据方法等重要要素的抽取类比，我们发现了大量虚假诉讼案件，这是传统方法无法企及的。

总之，杭州互联网法院在以上三个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大量的实践经验。杭州互联网法院与党的依法治国理念是紧密相关的，它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精神。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建设，不仅提高了办案效率，更提升了办案质量，减少错案发生的同时提高了司法公信力。通过推进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法治的深度融合，传统司法模式在起诉、立案、审理以及类案检索等方面都得到了新的创新发展。在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经验基础之上，北京互联网法院和广州互联网法院也相继成立，各地也在纷纷探索互联网法庭和异地审理模式。借由司法领域的创新精神，杭州互联网法院为实现公平正义做出了自身的贡献。

# 以社会信用助力社会治理创新

◎汪锦军[①]

杭州的社会治理创新生态是非常丰富的，不过现在创新很难说是体系化的，但是呢，有一个领域它的创新生态已经逐渐丰富，就是社会信用怎么来助力社会治理创新，下面我谈一点粗浅的认识。说到信用，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适当或不适当的信任，它是传统社会的信任在现代社会的一种自动化的表现形态。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这就是信任的本质。但事实上，信用在不同的场景下，它的含义是不同的。《辞海》对信用有三个解释，一是信任使用；二是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三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多产生于货币借贷和商品交易的赊销和预付中。那么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信用问题它不光是我们交易层面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整个社会治理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个背景，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最近几年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拉开序幕，而这方面，杭州的社会信用建设实际上是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02 年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建设信用杭州设想。2017 年成为全国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举办首届中国城市信用建设高峰论坛，在首届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信用门户网站建设观摩会上荣

---

①专家简介：汪锦军，男，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杭州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获“示范性平台网站”称号。2018 年，杭州成为全国首批守信激励创新试点城市，2019 年又率先实现信用场景跨城市互认。实际上最近几年在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月度排名中常居副省级城市第二。而随着社会治理工作的推进，最近几年杭州以“信用 +”为突破，按照省数字化改革“1+5+2”工作体系和省一体化公共信用信息平台“531X”工程建设要求，积极探索推进的党建引领下的“信用 +”未来社区，信用 + 美丽乡村、信用 + 数字园区、信用 + 区域合作、信用 + 品牌营运、信用 + 数字经济等创新。在这些领域涌现了比如说建德的三都镇政府村民信用美好治理、富阳区东洲街道黄公望村公望家庭诚信指数、萧山河上镇“信用 + 社会治理”模式、拱墅区的“信易 +”应用产品等多种类型的社会信用机制创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机融入社会治理工作的创新，实际上进一步助力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目前杭州的这些信用创新，它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推动了我们的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我觉得主要是三个方面或者三个层面来解剖。

第一，以社会信用机制创新实现了社会治理制度的生活化。这个词大家一听应该也能明白，虽然制度是比较刚性，而生活化的东西就是融入我们日常的，我们的行为和我们的习惯当中。我们知道，良好的社会治理，有赖于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治的良性互动和有机结合。因此呢，社会治理他需要解决的实际上是国家的制度如何在基层社会有效落实的问题。也就是说，来自国家的我国法律刚性的制度要求如何与日常社会生活有机结合，而从而使刚性制度转化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这方面杭州最近几年的社会信用创新，通过将国家的法律、上级的政策和基层社会的乡规民约、居民公约有机结合，以信用积分、信用奖惩的形式转化为居民日常需要遵循的行为规范。比如说萧山河上镇，大家都熟悉的就是众联村，当然我们对众联村的了解和解释有不同的角度。实际上我们现在从社会信用角度来解释，可以发现它的整个治理实际上是依赖于信用的，它的主要做法就是出台“五和众联”的村民通则，构建一个党建引领、自治主导、法治托底和德治润心的治理体系。这个村民通则它是由和善村民、和美家庭，和睦邻里，和煦村庄，和谐社会

的“五和”集中构成的，所以这里面重点是一个积分，这个积分它包括了35条加分和25条扣分。这个具体内容是比较复杂，而我们对这个村的关注关键是它构成一个信用体系，这个信用体系操作尽管很复杂，但是它内在的逻辑对我们思考未来的社会治理非常具有指导意义。这些方面内容它涵盖了村民的素质提升、志愿公益服务、慈善救助等方面，通过量化考核的方式将政策文件中的各项工作任务，就是上级的、来自于区级的、来自于乡镇的，各项考核任务分解到每一户，每一个家庭。以积分评比激发居民的干事激情，通过这个方式，它改变了以往干部连轴转，群众站着看的难题，就是把居民的行为跟我们上级的考核要求，通过信用体系，信用积分，激发居民的干事激情。实际上它这里面的基本原理就是使国家治理制度的要求逐渐融入我们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个就特别有意思，实现了社会治理制度的生活化。

我们来理解社会信用机制创新的第二个层面，实际上实现了社会制定规约的制度化，那么怎么来理解呢？我们知道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需要有效地解决我们传统熟人社会的社会治理范式，向现代多元社会治理范式的转型，那么这个转型既包括如何将社会治理范式从传统熟人社会的伦理、道德为主导，转向现代与法律制度为主，也包括如何将传统社会伦理道德的制度化，就是道德层面的东西发生，现在的法律跟我们刚性的制度之间怎么衔接，这就是伦理道德的制度化。而社会信用机制，它恰恰在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现代法治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通过将乡规民约和传统伦理道德要求诸如孝心敬老、勤劳节俭、环境保护转化为可记录的信用积分。并将这些信用分跟社区治理有机结合，成为社区居民的日常遵守规范，所以将软性的非正式的社会治理规约，转化为可操作性的制度化的微观治理机制，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原理。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杭州建德的三都镇。三都镇它依托建设“乡村钉”的平台，推行村民美好信用账本，美好信用账本设立美好信用积分和美好信用负面清单，将垃圾分类、美丽庭院、爱心公益、邻里和睦、说事议事、创业致富的6件小事，以及勤劳节俭、孝心敬老等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纳入信用积分。逐步将村里事变成家家事，最终变成村里的大家事，形成村民公

共意识和道德规范。从而实现社会规约的制度化，推动构建社会的共同体意识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推动了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治理制度的生活化和社会治理规约的制度化，两者相辅相成，它最后推动形成了内生性的社会秩序的形成。因为这种以社会信用制度建设为载体，它一方面将政府的制度和上级的政策，通过创新的信用机制转化为社会的日常行为规范，另外一方面，他又将传统社会的道德和习俗转化为更加制度化的社会规范，从而实现了政策法律制度的生活化和非正式的社会习俗的制度化。社会自己的内生性的社会秩序也因此得以形成。这种社区它有机融合了法律制度，乡约民约、传统习俗，通过信用体系，复合性地构建了社会生活中的治理规范和交往规则。从而既保障了社会治理的社会秩序，也激发了社会的活力。政府的管理和社会的支持通过社会信用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实现了良性互动。所以总体而言，尽管杭州的社会信用的创新，目前还很难说体系化，我们甚至在逻辑上离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说最近几个礼拜，我们除了走访杭州的一些创新，我们在浙江省其他地方，下个礼拜我们还跑到山东去调研管理的一个系统问题，那么整体现在都还没有体系化，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探讨，包括这个奖惩的运用问题，法律化的问题等等，每一个拿出来都是非常之复杂的。但是我们觉得目前的杭州的社会信用机制的创新，在社会治理层面呈现了非常丰富的生态，而这种生态我们如果把它放在目前的我们说全面数字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实际上他实现了在党建引领的“六和塔”的社会治理工作机制框架之下，致力于创新一个社会信用的体系，这具有一个方向性意义，它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跟社会治理的体系建设紧密结合，逐渐推动形成一种现代社会的，我觉得是一种内生性的社会秩序的建构，从而为信用助力社会治理的系统发展，可以说是探索出了一条新的可能的发展路径。这个路径我觉得结合我们现在提出的信用体系建设，结合我们的社会治理创新，结合我们杭州提出的社区治理现代化，是非常值得探索、肯定、总结和期待的一个方向。

# 红色精神谱系与杭州城市人文精神

◎公方彬[1]

我围绕“红色精神谱系与杭州城市人文精神”谈点看法。

第一，杭州城市人文精神或杭州文化之魂是什么?

我注意到杭州曾经提出过“精致和谐，开放大气。”不管这是否官方定见，至少让我们找到一个认识杭州城市特色抑或人文精神的切入点和路径，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杭州的某些人文景象和精神气韵，及其背后蕴含的特色文化与民族文化基因。

如果将此概括与张艺谋的《印象杭州》结合起来分析抽象，往往能够撷取这样一些概念或描述：清秀、婉约、优雅、宁静、平和……。在我看来，当今中国最能彰显或折射宋代文化的是杭州，无有匹敌者。这显然也是我们认识杭州城市人文精神的方向和侧重。

回溯历代文人雅士所描绘的苏杭人文景象，也多为婉约秀美，玲珑剔透。这本就是宋代鲜明的柔性政治和人文特色，后人印象深刻的宋代书法绘画乃至雕版印刷，无不透射出这样的品质特征。

再比如北宋宫廷园林就极喜欢苏杭园林的瘦漏透，未必不是缘于此才有了花石纲与水泊梁山农民起义军的故事。直到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草原与森林人文气质才成为皇家园林主格调，因此有了动辄千亩万亩的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由皇家园林说开去，中国南北方人文性格的差异便是“骏马

①专家简介：公方彬，男，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也就是刚性美与柔性美。

到这里有必要将重点集中于杭州城市人文精神特别是其间蕴含的文化之魂讨论问题。在座的大多数是各大学的专家教授，大学里有个获得广泛认同的说法，大学不在大楼，而在大师和大树。大师是大学之基，大学之魂，大树反映着较长久的建校史。因为大楼短时间即可建成，大树却是由一圈圈的年轮长成。那么城市呢？因为要生活舒适，所以既要精神也要大楼，但基础建设完成或大楼林立后，重心一定转向人文精神，这也是跳出千城一面的核心支撑。

进一步梳理，感受汉唐文化去西安；感受宋代文化到杭州（北宋该到开封，只是因为人为与自然灾害的原因，那里没有留下多少古风神韵，这就如同东汉该到河南，但历史太久远，同样缺少遗存而无法承载汉代文化抑或人文精神）；感受明清文化与当代文化去北京。

问题清楚了，但敢不敢大力张扬宋代文化及其抽象那个时代的精神，需要稍作辨析，因为我们有过将之作为“封资修”加以批判，又在宣传或认知中突出宋代政治腐朽，历史观和价值评价系统中是将南宋和晚清并作“落后就要挨打”的论据，从而影响并形成了大众对宋代的负面印象。

在我看来其间存在很大的误读成分，至少缺乏全面分析和辩证思维。原本那就是个野蛮征服文明的时代，即使从实际情况分析，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可谓所向披靡无有抗衡者，而北宋南宋共抵抗了 45 年，尤其崖山之战 10 万军民和皇帝一起跳海殉国，这样的壮烈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有一个较为一致的看法，中国古典文明断裂于南宋。或许因此才有了一位日本学人或许偏颇的说法，他“更敬佩宋代以前的中国人”。不可否认的是宋代的确将中华文化推向新高度，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同化力，就如“罗马征服了希腊，希腊的文化改造了罗马”，蒙古人入主中原，最后也被代表民族文化传统的宋文化所改造，这才保证了中华民族精神血脉延续而非被改造。

宋代属于弱政权强文化，这也反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维度或两条主线——政权延续与文脉延续。从文化和精神血脉分析问题，我认为中华五千

年文明史中有五个不可或缺的时代，以及这几个朝代的人文特征：春秋思想、汉代开创、唐代包容、宋代人文、当代政治。

春秋以思想见长。世界三大思想繁荣期：轴心时代（中国的春秋时期）、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我们只参与了第一次。因为列国并立争雄，没有一家有力量统一人们的思想，故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因此完成中国文化建模，且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脉。所谓古希腊解决了人与自然抑或客观世界的关系，古印度解决了人和超验世界亦即人与神的关系（有争议），春秋时期先贤解决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至少解决了农业文明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这是中国思想文化最活跃最灿烂的时期。

汉代以开拓立国。或许与农耕社会的饮食有关，中华民族形成了平和人文性格或气质，发展起来的文化也便具有柔性特征，这才有了较有代表性的民族更少冒险和征服。即便这样也还是出现了汉武帝西击匈奴，不仅改变中原的政治生态和安全环境，甚至改变西方发展史。因为被汉军击溃的匈奴人西迁，将当地的游牧民族继续往西赶，最后把日尔曼民族赶进了西罗马，致使罗马帝国瓦解。当然，汉代的开拓或开创不限于此，还反映在文化领域，通过“拾遗校刊”挽救“秦火”对中国先秦典籍的毁灭性打击，而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造就了中国不可撼动的文化主脉（其间存在正反两面性），加上司马迁作《史记》，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血缘道统，进而形成汉人自我意识及其汉人自称。这些显然具有开创文化新局面的性质。

唐代以阔大雄国。中国人历史情结或最引以为豪的当属唐代，因为这个时期出现了“万国趋河洛”的开元盛世。直到今天中国人旅居海外集中地仍被称为唐人街（早期叫“大唐街”）。及至宋代，东南诸国都以唐为中国代称。1673 年，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说：“日本，唐时始有人往彼，而居留者谓之‘大唐街’，今且长十里矣。”唐朝时长安居住外国人数万，波斯王子朝中做官至今天的“省部”级，朱雀大街宽度比今天的北京的长安街还要宽。那是一种雄浑阔大，包容天下之气概。

宋代以人文见长。人们经常引用“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之说，也就是中原屡屡被游牧民族所征服，政权因此更替，却又强调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古老民族中唯一精神血脉未中断者，其实指的是文化绵延不断。比如元代写史，辽金宋谁为正统？争论激烈，最后承相脱脱以“各为正统”化解。虽然各为正统，但最终还是以宋文化抑或中原文化为主脉。比如，忽必烈曾下令全国推行国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创立的文字，并建设纪念巴思巴的庙宇以替代纪念孔子的文庙，目的是改变国家精神系统，去汉人心态，结果终不敌中原文化之强势。在这方面宋朝功不可没。很大程度上中国的人文性格和审美情趣也成型于宋代。

当代的政治主要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建构了特有的政治系统，产生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强大社会发展能力，推动中国走向世界，步入前列。只是我们理论界没有真正解释清楚中国模式的内涵外延。

结合杭州城市精神建设，或者可以说这座城市已经和继续着两种精神注入，一种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进行的开创精神，最突出的则是引风气之先，形成了 IT 产业和数字经济，由此使杭州成为弄潮者。另一种是包括对杭州小组初创精神挖掘，对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时提出“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大力张扬，走出自己特色鲜明的发展道路，已经或正在产生国家范围的引领作用。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在生动鲜明丰厚的杭州城市人文精神中注入红色基因？

如上所述，杭州城市人文精神原本就拥有丰厚的红色基因，并且是主色调。当然，这并不仅反映在杭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过革命和建设长达百年历程的社会主义中国，任何地方的人文精神无不内含丰厚红色基因，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所蕴含的精神元素，更准确讲无不接受了红色基因和红色精神的重塑。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强调红色基因注入？原因在几个方面：其一，逻辑的必然性；其二，以区分求融合，区分越清楚越是需要明确融合的内容、

方式和路径；其三，突出城市自身特征追求独特性的必要工作，红色基因和精神元素相同，但人文精神却存在一定的差异。后两点不在这里展开分析，只着力于第一点，也就是逻辑的必然，因为这关系到过程中的认知和自觉性。

有两个关联度很高的原因决定着红色基因和精神注入。杭州在全国范围内都属于经济社会快速成长且更为发达地区，又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抬升了社会人文基础，促进了人民群众追求更加丰富的精神生活。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其将率先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时代迈进。这并不仅为发达国家的社会形态所映现，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规律使然。正所谓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寻求精神享受。亦如古人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有了社会规律与经济基础支持，另一个问题同时产生出来，这就是在人文建设中以何为骨干，或者起点和落脚点置于何处？这是架构城市人文精神必须先行回答的问题。此观点借助核心价值观分析更容易理解把握。讨论核心价值观一定涉及两个直接关联概念或要素，即价值和价值观。价值是指有用性，无倾向性色彩。价值观存在多元性，有符合主流与游离、偏离之分。核心价值观则兼具人文和意识形态二重色彩，这才有了包容多元与坚持主流引导。

在确定人文精神中注入红色元素之时，还要讲清其必要性特别是必然性。与西方社会相比较，其精神归宿是宗教信仰而非政党政治，中华民族原本就是一个非宗教传统的民族，我们的精神系统或精神大厦建筑于历史神圣化，道德神圣化，尤其是革命党人牺牲精神的神圣化。后者背后是成长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

所以，我们要保证正确弘扬地域特色或朝代特色的人文精神，必须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保证不偏离核心价值与红色精神这一主色调。如此逻辑推演的结果便是将红色基因注入人文精神，也就是在区域特色鲜明的宋文化中注入红色基因。

第三个问题，怎样才能更好地将红色基因注入杭州城市人文精神？

正如文无定式，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和路径将红色基因注入杭州城市人

文精神，这更多反映为实践，故而难以统一模式和要求，所以这里只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罗列几点。

第一，自身定位和奋斗目标决定着起点和高度。作为已经立身潮头的杭州必须确立高起点。正所谓取其上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树立什么目标，设定什么的高位，直接影响着努力方向、奋斗精神及其成果和成效。也就是说杭州小组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其精神抽象却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城市人文精神也是如此，有什么样的历史认知与精神抽象，就有什么样的建设基础和提升空间，既然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发展史中宋代人文极富代表性，那么杭州这座城市努力恢复和展现一些宋代人文景观，就是重要选项，且要放到弘扬传统文化大系中来对待。这一点已经由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繁荣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奠定政治和思想基础，理应做出大的成绩。

第二，找到与国家民族奋斗方向和精神脉动契合点、切入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同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回看中国共产党承担的“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大历史使命，尤其相应的马克思主义三次中国化，我们会看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我们亟待大的理论创造和突破，因为站起来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基础与苏联老大哥引路，富起来虽然带有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创性，但还是从正反两方面经验中进行了探索，正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强起来的道路上，尤其是“最接近世界中心”，已经承担起“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样的极其重大使命任务的情况下，必须强化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从党和国家角度讲，需要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从人民群众或一些走在前面的发达地区看，杭州应当努力开展开创性工作，力争取得更多经验做法，充实到时国家制度完善中去。

这就是说，不管是挖掘杭州小组的革命创造精神，还是挖掘以宋代文化元素为代表的杭州城市人文精神，都应当是基于当地特点又要超越地域性，争取更大突破。

第三，作为系统工程而要求整体设计，同时提供可操作性。讲这个问题，我想强调的是，专家们讨论只是停留在内部交流状态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把这些讨论成果加以总结，抽取有用的东西呈报杭州市委，为政策和决策提供参考或咨询。因为将红色精神注入杭州人文精神，这显然是市委市政府决策的范畴，唯有化作市委市政府的意志，才能有效动员全市干部群众参与其中。

至于载体和抓手角度讲，也有可以参考借鉴之处。2011 年我参加了北京精神的抽象，尤其是正式发布那天我和怀进鹏院士、于丹教授、阎崇年研究员，一起通过电视直播解读了北京精神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北京市委市政府为什么将此活动搞得

如此隆重？就是借此聚焦北京形象，激发全市精神力量于各项工作中。我想杭州市假如在这方面做工作，也应该作为一个抓手和载体，去拓展和增强人民对杭州的认知，利于全市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最后强调一点，红色精神注入主要还是在多元中拥有主流和主导，而不是改变人文精神的品质和呈现方式。

# 百年奋斗彰显与时俱进杭州品格

◎邱　巍[1]

## 一、杭州的历史文化为与时俱进品格提供了深厚基础

杭州文化积淀深厚，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和明清文化在江南一脉传承，特别是传统社会文化高峰之一的南宋以杭州为首都，奠定了杭州独特的历史文化地位。而地处长三角，依江临海，又使杭州在近代较早受到西方经济文化冲击，形成了中西文化交融演进的独特格局，形成了杭州城市品格与时俱进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对杭州的新文化新思想传播最有影响的机构是浙江一师。“一师”是浙江新文化的重要策源地，马克思主义传播基地，“一师风潮”奠定了此后浙江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人事基础，我们党早期的很多人其实都是和“一师”有很深刻的关系。这一些都离不开当时“一师”的校长经亨颐。经亨颐在“一师”的办学方针正是“与时俱进”这四个字。经亨颐“一师”办学方针当然没有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办学方针有名。但这四个字对杭州乃至浙江的作用和影响却未遑多让。而与时俱进概念正是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首先提出，他把散见于中国古书中的“与时偕行”“与时俱化”“与时俱新”等概念概括综合为“与时俱进”。蔡元培和经亨颐都是辛亥革命中发挥作用的一代，但他们都与时俱进，为新文化传播开启了闸门。

---

①专家简介：邱巍，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

杭州是辛亥革命的重要基地，是国民党力量发展的重要省份。也使杭州能够与时俱进地成为见证两次国共合作的城市。1922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即西湖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以解决国共合作的形式和途径问题。会议灵活地将当时难以实现的国共两党党外合作设想转变为切实可行的党内合作策略。1937 年 3 月，周恩来在张冲陪同下，先从西安飞抵上海，再与潘汉年一起来到杭州，住进了由张冲安排的柏庐别墅，开始了谈判。这次会谈被史学界称为国共“西湖秘密会谈”。周恩来和蒋介石在杭州的会谈，初步议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诸多框架性问题。西湖会议和西湖会谈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革命洪流中与时俱进的鲜明标识。

## 二、百年的伟大奋斗为与时俱进品格刻下了杭州印迹

改革开放以后，杭州同样与时俱进地走在时代前列。1979 年一部外国文学译著《飘》在杭州出版，引起很大的一个震动和反响。当时的很多报纸都在批评这个东西，一个大报上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叫《飘到哪里去》。最终，因邓小平 1980 年会见外宾时的表态而平息了风波。邓小平讲，“小说写得不错，中国现在对这本书有争论……出版了也没有关系嘛，大家看一看，评论一下。”这是改革开放后，除北京、上海以外的地方出版社翻译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名著。《飘》的首版销售高达 60 万册，成为当时的现象级图书，也打破了地方出版社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限定。这本影响一时的译作为什么能在杭州诞生，还是和杭州的地利之便和文化基础有关。《飘》原来的译者傅东华，是上海的一个老翻译家，他杭州也有很紧密关系，使最后把这个小说在杭州出版成为可能。

干静被媒体称为杭州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位个体户，可能并不准确，但确实是有代表性的。干静是西湖边搞摄影的个体户，她在西湖边做生意受到国营摄影企业的阻拦和欺负。1982 年 11 月，杭州市委批转市园管局党委《关于欺负个体经营户干静事件的检查报告》，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肃清“左”

的思想影响，正确认识个体经济的作用，积极扶持和指导个体经济和合作经济。温州的章华妹被称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个体户，她是经营小商品纽扣的，而杭州的第一个个体户和杭州旅游城市的定位有关，是旅游服务行业的。

下面的表格大致梳理的新中国成立后，杭州的城市定位。也能非常鲜明的体现出杭州与时俱进，不断寻找城市发展新方向新坐标的特质和特点。

| 时间 | 定位 |
| --- | --- |
| 1953 | 以游览、休养、文化为主，适当发展轻工业的风景城市。 |
| 1958 | 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
| 1969 | 社会主义工业城市和革命化的风景城市。 |
| 1978 | 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 |
| 1983 | 全国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浙江省政治、文化中心。 |
| 1993 | 长江三角洲南翼重要的经济、政治、科教、文化中心和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 |

| 时间 | 定位 |
| --- | --- |
| 2002 | 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 |
| 2007 | 名城强市。生活品质之城。 |
| 2012 | 东方品质之城、幸福和谐杭州。高技术产业基地、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
| 2017 | 创新活力之城、历史文化名城、生态文明之都和东方品质之城。 |
| 2021 | 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

### 三、新的起点和复杂变局需要杭州与时俱进再闯新路

杭州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新时代杭州同样也面临很多复杂的形势和局面，需要杭州与时俱进再闯新路。时代在变，很多东西和过去不一样，我们经常说的百年变局，世纪疫情，这些东西对杭州都很深刻影响。比如，世界格局深刻变化，我们原来经济发展中对外依存度很大，

那么它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我们原来发展的路径也会面临新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础和特点，一个是民营经济，还有一个杭州是互联网之都，这两年发展的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改变。比如对于互联网平台企业，大家都看到中央在强调要规范和健康发展，那么实际上它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杭州怎么解决继续走的问题，确确实实要求与时俱进再闯新路。市委刘捷书记十三届党代会报告当中，对我触动最大的是这样一句话："杭州是一座伟大的城市，浸透着江南韵味，凝结着世代匠心。"这句话它不光是说杭州的整个历史，整个文化，它更是体现了一种责任。新时代杭州的领导者，包括杭州人事实上应该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怎么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怎么面对变化格局，使杭州要继续成为伟大城市，不断创造新的光荣。我们相信，与时俱进中不断的变革杭州会更伟大。

# 衡量后来人的几个视角

◎安蓉泉[1]

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参加这个会很亲切。除了因为党史研究室是我原来的老单位以外，还有小营巷的党小组纪念馆建设，11 年前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们和我一起，跑了很多趟，对这个地方、这个主题都有感情。

我拟《衡量后来人的几个视角》这么个题目，是因为既然我们纪念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既然革命先烈怀揣理想、流血牺牲、前仆后继，做了那么多可歌可泣的事情，100 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后来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杭州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党员同志们，做得怎么样？接班接得怎么样？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分析。我选了几个视角，谈谈个人想法。

第一，衡量后来的各级党组织接班接得怎么样，主要不是看有没有优秀的领导人，而是看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对民意的重视、吸取和实际采纳的情况怎么样。

刚才方益波社长讲了很多杭州十多年前“以民主促民生”的做法。我在党校工作了 30 年，杭州的各级领导接触也不少。经过层层选拔，多岗位锻炼，杭州的各级领导人，很多人确实水平很高，见多识广，工作努力，是我们党的财富。但我们看后来人接班接得怎么样，主要不是看他们个人的水平怎么

---

①专家简介：安蓉泉，男，杭州市宋韵文化研究传承中心专家委员、教授，资深党史专家。

样，而主要看他们吸取民意、争取老百姓支持、最终决策给民众带来的福祉，这个怎么样。

我们党给自己定位为“先锋队”，先锋队是什么意思？先锋队是相对于大部队而言的，党是相对于它后面浩浩荡荡的的老百姓而言的。当他动员能力强、后面那些老百姓跟着它走的时候，党成为引领大部队的先锋队。当人数众多的老百姓若即若离的时候，不紧不慢的时候，没有跟上来的时候，先锋队实际就是一支小部队。在这个意义上，少奇同志当年说，“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在这个意义上，领导人很优秀，我们的组织力很强，很重要，打铁先要自身硬。但我们更敬佩他们的，是会了解群众痛痒，会动员和说服群众，会在关心和说服过程中，在群众支持下实现自己的执政意图。而这一点，杭州的领导是下了很大功夫的。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对于各级党组织而言，昨天的历史就是党史。我在杭州调研几十年，有一个例子印象很深。就在离我们这个会场不远的地方，凤起路 558 号，杭州前些年正在搞危旧房和庭院项目改造。小区业主告诉我：我们这个小区真没法弄，弄不好。我问怎么回事。原来小区内部庭院改造，方案征求居民们的意见。中老年同志认为小区里要搞绿化，要搞健身房，因为他们退休了，要在小区里遛弯锻炼身体。但中青年不同意，希望多开辟一些停车位，停车太难了。结果讨论来讨论去，两种意见总是人数差不太多，45% 对 55% 这个样子，谁也不服从谁，一共来了五次座谈会，都是这么个结果。社区和街道的领导没有简单按照“少数服从多数”来定方案，那样差不多一半人都不能接受。他们好言和居民们商量：大家再想想有没更好的办法，再征求意见商量商量。

经过进一步地做工作，有位居民出了个主意，对面有一个企业“都锦生丝织厂”，把车停到他们那里去行不行？社区同志去厂里提出这个请求，人家没表情。社区同志补上一句：我们交停车费，收多少可以商量。企业办事

人脸上好看了一些，人家也要向上级汇报嘛！很快就商量好了一个方案。回来再开第六次居民座谈会，结果顺利通过！老同志们首先开心了，我们胜利了！车停过去了后，原来想搞的健身器械、绿化扩面没问题了；中青年也高兴，原来这个地方停车，小孩儿打打闹闹，经常把车划伤，今后整个停到对面去呀，还有保安站岗，非常开心；想买车一直不敢买的人，这下也高兴了，对面企业那个地方很大，买车不用发愁了；厂里也高兴呀，多了一笔收入。

像这种事情，在杭州可以找出很多。群众之中有智慧，但能不能把老百姓的智慧启发出来，吸收进来，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胸怀和能力是一种考验。一个领导人，一个党组织再优秀，最后能在吸取民意过程中做到让居民满意，提高市民生活的满足度幸福感，才是真优秀。

第二，衡量后来的各级党组织接班接得怎么样，不是看党组织、党的领导人是不是跟着群众走，而是要看在锐意改革持续创新过程中，会不会动员群众、能不能带动群众跟上党组织的改革发展意图。

刚才很多专家都谈到了杭州的创新。杭州这几十年确实很想做好，也很努力在做。但在创新的过程中，在你一马当先走在前面的时候，群众有没有跟上，群众愿不愿意跟着你走，这是个大问题。在这方面，杭州的各级党组织，其实做了很多很多艰苦做细致的工作。看到桌上的矿泉水，我想起来杭州的“娃哈哈矿泉水”。

在工作调研中，我曾了解到原市委副书记沈者寿的一段往事。杭州进入新世纪前的那十年，市场经济开始了，国有企业一下子还不适应，特别是九零、九一年杭州很困难，困难到什么程度呢？杭州市直机关干部的工资发不出来了，要到银行借款发工资。那时很多国有企业几乎趴下了，东西卖不掉，堆在仓库里面变质贬值，但各种各样的费用还在增加。市领导很着急。当时的市委书记吴仁源提出，现在许多国有企业都亏损，小的亏损管不过来，先把大的管起来。找出亏损最严重的几个企业，每个常委、每个副市长认领一个“穷孩子”，千方百计把它扭亏转赢。市里很多领导话很多时间跑企业，为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沈书记（时任市委秘书长）“认领”的是杭州罐头食品厂。他接到任务后很快就到厂去了，结果厂长在住院，工资发不出来，工人们意见大，厂长心脏病发作了。沈书记就到医院里去看望他，又开职工座谈会。调研后他感觉，这个厂问题很严重，包袱也很重。后来他路过娃哈哈厂，外面很多大车在排队，等着买它的营养液，娃哈哈旁边的小旅馆都住满了人，供不应求而且急需扩张。沈书记把宗庆后叫到办公室，问他愿不愿意把罐头食品厂也“管”起来。宗庆后说那他要去看一看。沈书记工作很细，提醒他说“你不能光明正大地去看，只能悄悄地去看，如果职工们突然知道你想干什么，容易引起思想混乱”。看了以后，宗庆有说设备、流水线都能用，愿意借此扩大生产，也承担起罐头食品厂的发展任务。

沈书记马上找到上城区委书记林依南（娃哈哈属于上城区委管），又找了轻工业局局长、经委主任、财税局长、体改办主任等。三天里谈了十多个人，然后向卢文舸市长汇报。卢市长说“好极了！我也正想推动杭州国有企业的改革”，说“我举双手拥护。杭州罐头厂是个大黑洞，三年来每年八百万掼下去，两千四百万丢了下去，今年还要八百万啊！”沈书记又向市委书记吴仁源作了汇报，也得到了支持。

但和杭罐厂职工沟通时，职工们的思想一时做不通了，认为是“寄人篱下”，认为兼并是“小鱼吃大鱼”，“面上无光”，认为是“败社会主义的家业”，“挖国有企业的墙角”，有的还提出这是“和平演变”。有天晚上都快十二点了，沈书记接到体改委主任湛青的电话，说这个事情职代会没通过。沈书记说：“通不过？你不要慌，明天我和宗庆后一起去。”当晚和宗庆后通了电话。

第二天，市里把罐头食品厂班组长以上干部和党员职工全部集中起来。沈书记先请宗庆后讲改革以后的蓝图，讲如果两个企业在一起的生产经营思路，讲大家的工资什么时候发，奖金什么时候发。接着，沈书记直接面对职工讲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事情。那时没有空调，大夏天人人都满头大汗。沈书记在大会上讲：有的同志担心这样做“败了社会主义家业”，如果不搞兼并，你们厂再这样继续垮下去，那就真的要败社会主义家业了。兼并了以后，企

业恢复了生机，社会主义事业是增强了呀！还有职工担心国有企业变民营企业“没有了地位”，什么是地位？企业的地位就是经济效益，没有经济效益中央企业也没有地位。有人担心“寄人篱下”，“没有面子”，你三年亏损下去，今年第四年再亏损下去，没有给国家做贡献，还要国家财政补贴这么多，走出去才没有面子呀！针对思想疑虑一个一个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第二天再开职代会，这件事情顺利通过了。这个事件在当时震动很大。上海的《解放日报》还做了报道。企业兼并三个月以后，退休工人的全部工资都发了。再后来，奖金也都有了，有的职工喊出了“宗庆后万岁”的口号。

我想说的是，中共杭州党小组的后来人，他们不仅关注群众的情绪和需求，不仅尊重群众，而且也很重视领导群众，当好重大改革的引领工作。这个非常重要。杭州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创新和发展的思路很多，为什么能够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支持，都是在不断的沟通交流过程中，先锋队带动了大部队。

第三，衡量后来的各级党组织接班接得怎么样，不是看党组织、党的领导人手上有多少真理，而是看其能不能够坚持和实践真理。

我们现在的领导人学习能力大都比较强，而且党校、干校、中心组学习听课的机会也很多，满脑子都是革命的道理，工作职责需要他们经常对部下讲话，因此他们都多指多懂，很会讲道理。但是，衡量一个后来人他们接班接得好不好，主要不是看他们说得好不好，而是要看他们做得实不实。坚持真理并努力实践真理，在今天社会中的价值意义十分重要。

刚才第一个发言的李辉毅处长，我们俩加上地方志办公室的几位同志，我们曾经一起去北京，采访前任的市长仇保兴。仇市长给我们讲了一些在杭州做市长时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特别能体现杭州领导人那么一种执着、果敢精神。就是我们钱江新城差点变成一个热电厂的故事。当时杭州要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但在钱江新城还在设计过程中，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原来这里有一个热电厂正在开工建设。这个热电厂的规模很大，国务院都已经批准开工了，2500 多根桩已经打下去了，设备也早已订好了，木已成

舟了。但如果这个厂建成投产，那整个钱江新城建设，或者说杭州城市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就成了句空话，因为热电厂正好在钱江新城中心地带。当时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就这个问题讨论了一次，意见也不统一。

但市政府好不容易作出了争取让热电厂下马的决定，省政府又作了一个决定，这个热电厂还要继续上。因为这个热电厂是由当时很知名的香港大企业家投资的。

当时市领导很为难。仇市长提出：这个热电厂正处在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的战略通道上，未来城市发展的中心点上。如果每年有一百万吨煤拉进来，几万吨的煤灰扬出去，周边五六平方公里就会成为煤灰区，钱江新城还怎么建？这还能建什么城市 CBD 啊？这是关系到杭州城市未来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件事情非争取不可。

在这种情况下，仇保兴市长专程到北京找到当时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和副主任张国宝。他们作为浙江同乡也了解杭州。他们听了我的汇报以后觉得有道理，既然杭州要走向钱塘江时代，此事非解决不可。曾培炎说："我支持你们。"

仇市长回到杭州后，就开始着手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整，国家计委已经有态度了嘛！当时采取了几个措施：第一，断电断水，工程全部叫停。第二，组织人马，分成四个小组分赴各地，设备在哪里订货，就到哪个厂家去跟他们谈赔偿事宜。第三，通过赔偿收回土地。当时实际赔偿了 4 亿元，但是土地收回改变用途以后，还增值了 15 亿元。

这些工作做完了以后，这个项目下马了，钱江新城顺利往前走了。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市领导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不仅是来自内部的不同声音，还有上面的批评指责。仇市长临离开杭州时，有一位省领导对他说：仇保兴你在杭州做了很多事情。有一件事情没做好。就是说热电厂硬生生拉下马这件事情。仇保兴市长对我们说；我在杭州做的事情不多，但这件事情是关系到杭州长远发展，这是个很重要的决策，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想说意思是什么呢？大道理谁都会讲，但遇到具体事情，遇到明明知

道应该怎么去努力的时候，因为各种顾虑、杂念的羁绊，能不能坚持真理，事业为重，把平时说得很溜的大道理，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这对我们的各级领导人诗歌考研。杭州各级干部中，有很多是这样在努力的。

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100 年了， 回过头来看，我刚才说的三个观点，三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事情：不管党、党组织的水平怎么样，能力怎么样，身上还存在多少问题，我们要确立一个理念：评价执政党，我们主要看它执政执得怎么样。当他手握政权，能够很大程度把业绩实实在在做出来，老百姓跟着你干，生活质量在不断提升，幸福感也越来越强，老杭州人心生自豪，新杭州人来了就不想走，那么，这批接班人总体上就是合格的，没有愧对 100 年前的先辈们。

# 下篇　征文选录

## 一、杭州党小组的历史地位

#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历史贡献

## ——以“杭州党小组”为例

◎朱珏[①]

**内容提要：**1922 年 9 月，杭州党小组建立，自此浙江地区的革命运动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杭州党小组的建立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党的“一大”、“二大”的召开以及上海、北京等党组织的领导与支持为杭州党小组的建立准备了良好的理论指导与人员条件；浙江省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为杭州党小组的建立提供了的有利的革命形势；同一时期相继建立的团组织与社会团体，为杭州党小组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杭州党小组建立后，立即着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进一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杭州地区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将杭州地区的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杭州党小组的建立有着伟大的历史贡献，它的建立成为浙江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逐步完善、不断发展壮大的起始点，并成为领导浙江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浙江的革命运动最终取得胜利。

**关键词：**杭州党小组；历史贡献；应运而生

1921 年 8 月初，在浙江嘉兴南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顺利闭幕，由此，浙江嘉兴成为了中国革命的起航地。1921 年 9 月中旬，在距离

①作者简介：朱珏，女，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联系电话：13588254675，邮箱：932418439@qq.com

嘉兴南湖不远的萧山衙前，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成立了，领导萧绍平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由此，衙前农民运动成为现代农民运动的开篇之作。一年之后的 1922 年 9 月，浙江首个党的组织——杭州党小组成立，由此，浙江的革命运动掀起一轮新的革命高潮……

## 一、杭州党小组的建立

关于杭州党小组的建立时间，目前学界的意见比较一致。此前，有学者指出，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共产主义小组就在杭州成立起来了。对于这一观点，学者叶炳南于 1982 年在《浙江学刊》上刊发的论文对这一观点进行质疑，认为根据上海“共产党”小组浙江籍成员、党的主要创建人以及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的回忆，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杭州没有成立党小组。在相关档案记录中也映证了这一观点。另 1922 年 6 月 30 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报告中的记录：“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五十人，长沙三十人，广东三十二人，湖北二十人，北京二十人，山东九人，郑州八人，四川三人，留俄国八人，留日本四人，留法国二人，留德国八人，留美国一人，共计一百九十五人，内有女子四人，工人二十一人。”[①] 据此可知，在 1922 年 6 月底之前，杭州还没成立党小组。据相关人士回忆，杭州党小组成立于 1922 年 9 月初（也有另一说法，杭州党小组成立于 1922 年 6、7 月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杭州党小组的成立时间是在党的“一大”之后。然正如叶炳南所指出的：杭州党小组的成立时间，“决不会减损浙江和杭州地区早期建党历史的光辉”[②]。

杭州党小组成立，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杭州党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及党的“一大”、“二大”之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已有的党的早期组织的领导与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位于中心城市的党的地方组织。

---

①《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浙江省档案馆，档案号：G001-002-640。

②叶炳南：《“杭州共产主义小组”质疑》，《浙江学刊》1982 年第 2 期。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北京两地率先传播。杭州毗邻上海，也较早地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受到上海《星期评论》、北京《每周评论》、长沙《湘江评论》这“三大评论”的影响，浙江的青年学生和进步的知识分子相继创办了《浙江新潮》《杭州学生联合会报》《钱江评论》《浙人》等传播新思想的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刊物上所刊发的文章，如《钱江评论》刊发的《“社会共产主义”与“人情”》、《杭州学生联合会报》刊发的《庆祝“五四纪念”的真意义》等文章，有利地推动了新思想在杭州的传播，为杭州党小组的建立准备好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全新的指导理论。①

1921 年 7、8 月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并在浙江嘉兴圆满闭幕。党的“一大”确定了党的名称，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成立了临时领导机构，中国的革命运动从此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对于浙江的进步人士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党的“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并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着手与国民党等革命团体建立联合战线工作。1922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专题讨论国共合作的形式和途径。党的“一大”、“二大”以及“西湖会议”后，无论是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还是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战线的需要，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迅速在各地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机构，而“杭州党小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上海建立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为最早的党的组织。之后，在党的“一大”召开之前，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也率先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一般称之为“中国共产党 XX 发起组”或“XX 共产主义小组”②。在“上海发起组”的 14 名成员中，就有 5 名浙江籍成员——

①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传播情况，参见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年，第 44 至 49 页。

②关于党的早期组织的名称问题，参见董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相关表述探微》，《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 年第 11 期。

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沈雁冰、俞秀松。在旅日中共早期组织中也有1名浙江籍成员——施存统。[①] 这些浙江籍进步人士为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以及日后杭州党小组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

1922年8月底，上海的党组织（当时称“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成员徐梅坤来到杭州，指导建立杭州的党组织。与此同时，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也派出了于树德来到杭州。9月初，在上海、北京等党组织的指导与帮助下，杭州党小组成立，小组成员3名，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其中于树德任组长。于树德为浙江法政专门学校的教师，金佛庄为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连副，沈干城为沪杭铁路闸口机修厂工人。[②] 由此，由先进的知识分子、进步的年青军官以及接受了新思想的先进工人代表所组成的杭州党小组正式建立。

由此，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党的“一大”、“二大”的召开以及上海、北京等党组织的领导与支持为杭州党小组的建立准备了良好的理论指导与人员条件。

其次，杭州党小组是在浙江省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高涨时建立的，是随着革命形势的需要应运而生。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日益广泛传播，一部分工人开始接受、学习新思想，杭州的印刷工人就是因为帮助先进的知识分子印刷进步刊物时最先接触到新思想，从而开始觉醒的先进工人代表。1920年七八月间，杭州印刷工人组建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以下简称“互助会”），颁布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草章》，确立了互助会的政治目标，设置了领导机构“评议会”，选举产生了倪忧天任总干事长，徐梅坤任宣传股长，田恺任总务股长，陈豪谦任社交股长。该“互助会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完善的组织机构。

---

①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名录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第29至30页。

②《杭州通鉴》编纂委员会：《杭州通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5页。

它不仅是全省最早的工会组织，而且也是全国第一批出现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①] 此后，互助会创办了工人业余补习学校，旨在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同时在一师学生的帮助下，创办了全国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曲江工潮》，对于启发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互助会的相关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杭州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1921 年的“五一”节，互助会起草了《杭州工人协会对国民会议决议案》，欲筹建“杭州工人协会”，并组织杭州各行各业的工人举行了大游行。杭州理发业工人积极响应，为了改善自身的经济待遇而进行罢工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此后，萧山临浦纸业工人因不满当地“过塘行”（指的是地痞恶棍勾结土豪劣绅和封建官府所建，凡货过临浦，便强行收取规费）的强取豪夺，于 1921 年 8 月举行暴动并取得了一定的胜利。[②]

在工人运动不断开展的同时，现代农民运动也发端于浙江萧山。浙江萧山衙前地区的农民，经常受到各种水、旱、虫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且常年受到来自地主豪绅、地方官僚及其军阀政府的残酷盘剥，致使当时的农民生活常常是困苦不堪。“吃也精光，穿也精光，哪有东西交地王（指地主）”。[③] 这句当时流传于江浙一带的民谣不但道出了广大农民的艰辛心声，更是当时农民拮据生活的生动写照。恰在此时，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的沈定一回到家乡萧山衙前，当他看到家乡农民的惨况后，就着手引导家乡农民组织起来反抗政府与地主的残酷剥削。1921 年 9 月 27 日，衙前上千名农民在东岳庙集会，宣告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一致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农协委员。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成立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整个萧绍平原地区的农民，他们纷纷仿效，成立农协，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年，第 59 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年，第 63 至 66 页。

③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衙前农民运动》(内部资料)，第 1 页。

开展农民运动。[1] 萧山衙前农民运动亦被学界认为是“现代意义上的第一次”农民运动[2]。

由此，1920–1922 年，浙江省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为杭州党小组的建立提供了的有利的革命形势。

再次，杭州党小组与浙江地区的团组织、妇女运动组织等社会团体同时建立。

1920 年 8 月，全国各地在准备建党的同时也开始着手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地方组织。22 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俞秀松、施存统等 8 人发起建立，后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也相继建立团的地方组织。1922 年 4 月，上海党组织、团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俞秀松来到杭州，筹建团的地方组织。19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在杭州皮市巷 3 号（此地也是后来杭州党小组的成立之地）建立，这是浙江省第一个团组织。至 1922 年 5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已经建立的地方团组织共有 17 个，而杭州支部也就成为了中国最早建立的 17 处团组织之一。[3] 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建立时，共有团员 27 人，其中金佛庄、倪忧天、华林等团员也是之后杭州党小组以及浙江党组织的骨干成员。

1922 年 10 月，浙江女权运动大同盟在杭州成立。由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的种种束缚，中国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三代以下，女界之黑暗极矣。缠足以弱其身体，不学以愚其知识，而女子遂丧其固有之人格，等于动物，仅足供男子之玩好。男子益利用其愚弱之术以压抑之，而女权遂亡。”[4]

---

①关于萧山衙前农协及农运情况，参见《衙前农民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和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衙前农民运动》(内部资料）二书。

②参见成汉昌：《中国现代农民运动最早发生于何时何地？》，《教学与研究》1980 年第 4 期。

③《杭州通鉴》编纂委员会：《杭州通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11 页。

④《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61 页。

而“浙江女权大同盟”就是以“参与政治，谋求女子在法律上、教育上、职业权利上的地位平等”[①] 为宗旨。这一妇女运动组织的建立，使浙江女子参政运动“颇有风发雷动之势”。

可见，杭州党小组与共青团杭州支部、浙江女权大同盟等社会团体同时建立，它们既各有工作的重心，又相互援应，推动着浙江新一轮的革命高潮。

由此，1922 年 4 月至 10 月间相继建立的团组织与社会团体，为杭州党小组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 二、杭州党小组建立后的相关工作

杭州党小组一经建立，便开展了一系列的革命工作。

第一，进一步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其主要途径包括：介绍和总结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组织各种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利用报刊杂志等多种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不断宣传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队伍。[②] 杭州党小组建立后，也持续开展了以上工作。1922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确立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召开之后，杭州党小组的成员之一金佛庄就担任了《协进报》（“杭州青年协进会”主办）、《嘉言报》《浙民日报》等进步刊物的编辑与撰文工作，宣传新思想，抨击封建军阀的统治。共青团杭州支部早期团员，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倪忧天利用担任杭州文化印务局协理的身份，发起成立“杭州

---

①《杭州通鉴》编纂委员会：《杭州通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17 页。

②王明钦：《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史学月刊》1991 年第 4 期。

印刷工人俱乐部”，设有“新文化报刊贩卖部”，除向社会公开出售《新青年》等传播新思想的书刊外，还秘密出售《向导》《中国青年》等，向广大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①

第二，团结工人阶级，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杭州党小组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组织夜校，促进工人阶级学习新思想。1922 年 10 月，杭州党小组成员之一沈干城在闸口铁路机厂创办工人自修学校，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学习新思想，参加学习的大多为青年工人和学徒工。沈干城自任语文教员，他还动员了钳工周新生、陈天民、王绍昌等担任数学、英语教员，通过组织工人学习来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通过创办夜校培养了一批工人骨干，并发展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二是指导工人阶级创立自己的工人组织。杭州党小组建立后，十分重视把广大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创立自己的组织，如上文所述之“浙江印出公司工人互助会”“闸口铁路机厂工人自修学校”“印刷工人俱乐部”等都是杭州党小组的成员组织工人创立的，成为杭州现代工会组织的萌芽。三、直接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作为建党后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1922 年 5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通过了《罢工援助案》《八小时工作制案》等议案，同年 8 月，书记部又发布了《劳动法大纲》19 条，这些文件进一步奠定了工人运动的基础。而此时，杭州地区的工人运动也在杭州党小组的领导下迎来了高潮。1922 年，杭州地区工人为声援香港海员工人的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而开展了一系列革命运动；1923 年，杭州工人举行“五·九”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活动；1924 年，杭州铁路工人为纪念“二·七”惨案一周年，配合上海工人斗争进行罢工……②

实践证明，“工人阶级一旦有了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了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年，第 88 页。

②有关杭州地区这一时期工人运动情况，可参见杭州市总工会编：《杭州工人运动史》，工商出版社，1996 年，第 21 至 25 页。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人运动就能向新的高度不断发展。”①

第三，走近农民阶级，与农民阶级结成牢固的革命同盟。1919年7月28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农民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种田的诸君！田主怎样待遇我们？租税是重还是轻？我们的房子适不适？肚子饱不饱？田不少吗？村里没有没田作的人吗？这许多问题，我们应该时时去求解答。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② 其后，几番深入农村调研的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中国农民占全部人口底数的大多数，无论是在革命预备时期和革命实行时期，它们都占有重要位置。”③“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④ 所以，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极其重视并积极派出先进分子和骨干力量去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杭州党小组建立后，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与农民阶级结盟，组织领导杭州地区的农民运动。上文述及，现代意义上的农民运动发端于浙江萧山衙前，这场农民运动虽只坚持两月有余，最终失败，但其影响深远。而在杭州党小组成立后，就借助着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的影响，进一步组织领导农民阶级开展革命运动。1922年11月，《责任》周刊创刊于萧山龛山，主要撰稿人为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等，多为杭州地区党组织、团组织的早期成员和先进的知识分子。《责任》周刊的撰稿者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占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必须注意和帮助他们。⑤1923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地

---

①杭州市总工会编：《杭州工人运动史》，工商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②原载于《湘江评论》第2、3、4号，转载于林军：《红色衙前的革命往事——访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杭州》2021年第7期。

③汪信砚：《李达全集》（第一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356页。

④汪信砚：《李达全集》（第五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347页。

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74至75页。

方组织的组织领导下，杭州市郊勾庄地区千余农民掀起“免租缓赋”的斗争，宣中华在《责任》周刊上发文支持这场农民斗争，《民国日报》《申报》也发了新闻和快讯，认为勾庄农民风潮日渐扩大，在广大农民的英勇斗争和社会舆论压力下，这场运动和平解决，取得了初步胜利。①

由此，杭州党小组建立后，立即着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进一步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杭州地区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将杭州地区的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 三、杭州党小组建立的历史贡献

杭州党小组的建立，有着伟大的历史贡献。

首先，杭州党小组的建立成为浙江中国共产党领导机构逐步完善、不断发展壮大的起始点。一方面，杭州党小组成立后，积极在杭州周边地区乃至整个浙江地区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杭州党小组实际上肩负起过浙江全省党的发展工作。如 1923 年 6 月，党员何赤华赴绍兴开展组织工作，并于同年 7 月成立了绍兴党团组织。② 另一方面，以杭州党小组为起点，浙江地区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机构不断健全。1922 年 9 月，杭州党小组成立，组长于树德，党员三名，隶属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领导。1923 年春，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委为尽快开展杭州党的活动，批准四人入党，决定将杭州党小组改为党支部，原组长改任书记，至 1923 年 10 月，分别由于树德、安体诚任支部书记。党的三大以后，为配合国共合作，暂时将杭州地区的党员编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五组。1924 年 1 月，重新恢复杭州支部建制，此时党员已有 30 余人，分为三个支部（中共闸口支部、中共“省党部”支部、中共大江支部）。1926 年 1 月，中共杭州地方委员会成立，

---

①关于杭州党小组成立后组织领导农民运动情况，参见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杭州党史大事记（1919–1949）》，团结出版社，1992 年，第 51 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3 年，第 88 页。

隶属上海区委领，共辖 12 个支部，工作机构包括组织部、宣传部、工人部、农民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国民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宣传工作委员会等，至 1927 年 6 月，杭州地委下辖本埠支部共 16 个。1927 年，按照中央决议，成立中共浙江省委员会，在横河桥新建中共杭州中心区委员会，负责领导杭州城区党的工作。[①] 同时，杭州地区的党员数不断增加，截止 1927 年，党员数已从最初的 3 人增加至 1400 余人 [②]，党员队伍不断扩大。

由此，杭州党小组的建立为杭州地区及至整个浙江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完善、党员队伍的扩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杭州党小组成为领导浙江革命运动的领导核心，领导浙江的革命运动最终取得胜利。如前文所述，从 1922 年杭州党小组建立至 1927 年中共浙江省委成立，短短 5 年时间，全省党员从 3 人发展到 4000 余人，党的组织由 1 个发展到 30 多个 [③]。随着其队伍的不断壮大与组织机构的不断完善，它肩负起了整个浙江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重任。1927 年 6 月至 1929 年 4 月，当整个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浙江地区的革命运动在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下依旧坚持开展。据统计，从 1927 年下半年至 1930 年底，全省发生了大小 60 多次农民武装暴动，涉及 50 多个县。[④] 之后 5 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浙江地区的党组织几经变革，但其依然组织领导着全省的革命运动。1935 年 10 月，刘英、粟裕率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后，建立了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并在临近的温州、丽水、台州等地建立党组织。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 年 11 月，成立了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后改为“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在浙江省工委和闽浙边省时省委的共同领导下，浙江地区的抗日运动取得了胜利。解放战争时

---

①中共杭州市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杭州市组织史资料（1922–1987）》，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20 至 26 页。

②中共杭州市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浙江省杭州市组织史资料（1922–1987）》，浙江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43 页。

③曾林平：《中国共产党在浙江 100 年》，《浙江档案》2021 年第 2 期。

④朱健：《日破云涛万里红——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的 85 年历程》，《今日浙江》2006 年第 12 期。

期，浙江各地党组织在不同上级组织的领导下，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 年 5 月 3 日，杭州解放，5 月 6 日建立了新的中共浙江省委。由此，从 1922 年 9 月杭州党小组成立至 1949 年 5 月新的浙江省委成立，历经 20 多年的艰难发展，浙江地区党的基层组织已达 2300 多个，有党员 47000 多人。[①] 以杭州党小组建立为起点，至 1949 年 5 月杭州解放，浙江党的历史走过了光辉的 27 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②] 杭州党小组的建立就是浙江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杭州党小组建立于浙江革命形势高涨之时，其建立后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又将浙江的革命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杭州党小组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我们必须学习好、研究好，使其永不过时，永不褪色，并继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

---

①曾林平：《中国共产党在浙江 100 年》，《浙江档案》2021 年第 2 期。

②《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人民日报》2021 年 2 月 21 日。

# 大党史视域下的地方党史研究探析

## ——以中共杭州小组研究为例

◎薛　燕[①]

**内容提要：**地方党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地方党史研究，可以增强全国大党史研究的学术性与立体感。中共杭州小组作为地方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突破了区域限制，其成立离不开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引导，其成员参与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事件，并见证了全国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史。将中共杭州小组放在大党史领域下进行分析和解读，有助于找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与规律。

**关键词：**地方党史；大党史；中共杭州小组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术化研究是由宏大叙事的大党史和个性多样的地方党史共同推进的。大党史和地方党史是整体与局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大党史主要是指利用国家层面的党史资源，诠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所蕴涵的全局性历史史实。地方党史是以地域性为特征的中共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是指利用地方层面的党史资源，比如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在各个地区留下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财富。

①作者简介：薛燕，女，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联系电话：13857151710。

2022 年是中共杭州小组成立一百周年。1922 年 9 月初，时任上海地委兼江浙区委委员长徐梅坤召集在杭的 3 位党员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在皮市巷 3 号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中共杭州小组的历史发展与中共党史同频共振，是中共党史研究从宏观转至微观的重要视角，是中共党史宏大叙事下的地域注解。中共杭州小组的成立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地域传承。其中徐梅坤、于树德、金佛庄三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见证并推动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沈干城投身沪杭铁路工人运动，其领导与参与的革命活动是全国铁路工人运动史的缩影。因此，中共杭州小组的历史就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共产党在杭州、浙江乃至全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史，需要在大党史视域下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摆脱地域研究的局限性。

## 一、大党史与地方党史的内在逻辑关系

中共党史研究具有显著的自上而下性，而地方党史是全国党史框架下的地方注脚。两者的契合可以挖掘党史发展进程中一些未曾发现的地方模式或规律，可以窥见大党史在地方党史中的某些分野，显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关系。

### 1、地方党史可以弥补大党史宏大叙事的阈限困境

有学者认为大党史在研究过程中具有阈限困境的弊端，比如会“认定整体性历史叙事的可能，在历史意识上只是研究主题的一种假设。尽管在这种假设框架下确实可以生产历史叙事，可是，恰恰也因对这种假设的认同，所有的研究就不得不被整体性思维所覆盖。”[①] 因此，这样的整体性历史研究容易出现以下问题：第一，整体性历史研究意识覆盖了与之相异的具体性，可能会误导研究的求真求实方向；第二，整体性研究叙述历史可能会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失去了历史本身内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第三，整体性历史研究为了体现其主导价值，在历史语言表述时容易陷入政论式论述风格。

---

①郭若平：《中共历史学中的地域史研究再思》，《中共党史研究》2018 年第 5 期。

地方党史具有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研究价值，既可以增强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和叙述的立体感，也“可以恢复地方性知识的鲜明特色及其价值，从而重新排列组合并修正由通史体系所铸塑的集体记忆”①。因此，若要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整体历史进程，就应该首先了解地方党史，其直接反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情况。地方党史的地域个性可以弥补大党史宏大叙事的阈限困境，可以拓展大党史学术研究的多元化视野，在挖掘地方性文献中可以凸显史实描述和历史再现的历史学术性，使大党史更为真实、丰满和细腻，而且学术史一再证明“最有价值的作品往往不是那些高谈宏论，而是可能一开始会被看不起的所谓‘微观’的研究。……年鉴学派主张研究‘整体历史’，但其代表性的著作绝大多数是区域性或专题性的研究”②。

2、大党史研究视域可以避免地方党史的“碎片化”研究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是指“研究题目琐碎、微观，杂乱无章；缺乏整体史关怀，缺乏全面联系和贯通；疏离宏大叙事，轻视理论思考，缺乏共识”③。地方党史研究人员若把地方空间视为一个封闭式的实体，容易出现重复性、同质性乃至片面化、碎片化的研究成果，缺乏“整体史”关怀和研究“碎片化”的批判。

对党史研究而言，“碎片化”倾向容易导致研究偏离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流和本质，难以对中共成长的历史进程和逻辑规律做出准确的分析和把握。研究人员面对浩如烟海的地方档案资料，如果不具备整体历史意识，只是片面、割裂地利用，只注意聚焦特定时空的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其研究的主题就容易坠入“碎片化”的误区，难以将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语境。因此，地方党史需要在大党史研究视域下，以更为丰满的叙述、更为宽阔的分析，分析历史内部各要素的复杂关系，描述它是如何与宏大党

---

①吴志军：《地域史：学术化进程中的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 年第 4 期。

②陈春声：《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历史研究》1993 年第 2 期。

③李金铮：《整体史：历史研究的“三位一体”》，《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5 期。

史之间发生互动关系，并从地方文化特色意义上进行历史阐释，从而彰显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多样性与客观性。

## 二、大党史视域下的中共杭州小组历史研究

中共杭州小组的成立离不开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引导，其革命活动离不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潮流，更是全国铁路工人运动史在杭州的缩影。如果将中共杭州小组的研究跳出地方党史的地域局限，将会呈现出一幅视野宏大的全国党史画卷。

### 1、全国建党初期视域下的中共杭州小组

中国共产党最早是由陈独秀、李大钊组织发起的。1920 年 8 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 10 月，李大钊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因此，中国共产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佳话。而中共杭州小组的筹建者徐梅坤和成员于树德分别由陈独秀、李大钊介绍入党，可以说，中共杭州小组是中央党组织区域性传承发展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浙江党组织的创建工作。1921 年冬，徐梅坤通过邵力子介绍进入上海《民国日报》印刷厂当临时工，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江浙地区第一位工人党员[①]。1922 年 7 月，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徐梅坤任委员长。

李大钊是于树德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和直接领导者。1909 年至 1917 年，于树德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与校友李大钊成为志同道合的终生好友。1922 年 1 月，经李大钊推荐，于树德作为执行干事代表新中学会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他的思想进步，6 月，于树德回国后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8 月，于树德遵照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到杭州开展党的工作。

1922 年 9 月初，徐梅坤来到杭州筹建浙江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85 页。

组，于树德任组长。1923 年春，中共杭州小组扩建为中共杭州支部，于树德任书记。中共杭州小组顺利完成了“南北相约”筹建浙江地方党组织的革命接力。

2、国共第一次合作视域下的中共杭州小组

中共杭州小组见证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历史。1923 年 6 月 12 日至 20 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徐梅坤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中共三大，并当选为第三届中共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于树德和金佛庄作为浙江代表列席会议①。会后，按照中共中央决定，于树德和金佛庄等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4 年 1 月，于树德参加国民党一大，被孙中山指定为宣言审查委员会委员。李大钊、于树德、谭平山等 3 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人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4 年 4 月 20 日，为推动北方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李大钊任组织部长，于树德任青年部长。1925 年下半年，于树德受党的指派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6 年 1 月 1 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于树德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实现后，党组织派金佛庄赴广州参加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创建工作。1924 年 6 月 17 日，金佛庄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队第三队队长。同年 7 月 6 日，黄埔军校举行特别区党部第一届执监委员选举会，成立国民党特别区党部，金佛庄当选为执行委员，后来成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得力助手。1924 年至 1925 年，金佛庄历任黄埔军校教导第二团三营营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等职务，参与平定滇、桂系军阀刘杨叛乱以及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部的两次东征，立下赫赫战功。1926 年 7 月，北伐战争开始后，金佛庄任北伐军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负责保卫司令部机关和苏联顾问团的安全。

3、全国早期铁路工人运动视域下的中共杭州小组

---

①徐梅坤：《九旬忆旧》，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 27 页。

在全国工人运动史上，浙江省境内的沪杭铁路工人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中共杭州小组成员之一——沈干城与建党初期的全国铁路工人运动命运与共、休戚相关。1921 年 8 月 11 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并决定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中挑选得力干将到沪杭铁路开拓工人运动。1922 年初，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的沈干城被派遣到沪杭铁路担任特派员，以沪杭铁路闸口机厂钳工这个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工人运动①。同年 4 月 9 日，沈干城作为沪杭铁路代表，出席京汉铁路长辛店俱乐部成立大会。回杭后不久，他由时任中共中央局委员、组织部主任张国焘介绍给中共上海地方兼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徐梅坤，于五六月间，由徐梅坤发展为中共党员。9 月初，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组成了中共杭州小组。

沈干城是中国共产党员领导铁路工人运动的先驱。1922 年 10 月，他创办闸口工人自修夜校，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铁路工人运动进入新阶段。1923 年 2 月 1 日，他作为沪杭铁路代表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二七惨案”发生后，他积极筹款救济受难工人家属和被开除的罢工工人。1924 年 2 月 7 日，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举行，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遵照全国铁路总工会指示，沈干城组织杭州铁路工人集会，开展“二七惨案”周年纪念活动。同年 4 月，他领导和发动了沪杭铁路闸口机厂第一次大罢工，席卷全厂并取得胜利，使机厂的机车修配工作陷入停顿，最终迫使厂方答应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生活等要求。

从担任的职务来看，沈干城的工作范围日益突破地域局限，从杭州逐步走向全国。1926 年 1 月，中共杭州地方委员会成立，沈干城任工人部部长。1926 年 2 月 7 日至 16 日，沈干城赴天津参加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全国铁路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1927 年 3 月 15 日，沪杭甬铁路全线大罢工。19 日，沪宁、沪杭两路罢工委员会成立，沈干城被推选为罢工委员会副总指挥，中共杭州小组筹建者——徐梅坤担任南市区工人起义总指

---

①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三——组织史》，1990 年，第 11 页。

挥，负责工人纠察队联络事宜，两者有力地支援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 年 3 月 22 日，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沈干城任副委员长兼宣传部长。3 月 28 日，沪宁、沪杭两路总工会成立，沈干城为常务委员兼副委员长。

### 三、大党史视域下地方党史研究的发展路径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因此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呈现出层次性和多样性。如何处理党史“全国普遍性”与“地方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在党史研究中如何做到眼中有“地方”，心中有“全国”，如何让地方党史成为全国性问题的“地方现象”，这已成为地方党史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新时代地方党史研究者不仅要挖好、挖深地方史料，还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相关理论对地方党史进行分析和解读，找出其中隐藏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逻辑和历史规律，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真正体现地方党史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深邃的历史穿透力。

1、处理好大党史问题意识与地方党史“碎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

从事地方党史研究，需要梳理地方史料中所记录的中国共产党在某一地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并挖掘这些实践所体现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实践逻辑和发展规律。因此，只有带着大党史问题意识出发，以考察某个历史事件为起点，并基于一定的理论框架才能深入研究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逻辑和发展趋势。如果地方党史研究还继续停留在“深描”或“细述”地方史料中的某一历史事件的浅显层次，是无法凸显其学术价值的，即“过分地注意了具体的史料，然后把这些史料堆积出来……而缺乏了对历史的深层次思考，存在着对理论的轻视”①。

研究地方党史时要注重培育在地方史料中把握宏观理论关怀的能力，培养问题意识，注重宏观历史背景对地方党史的内在影响。通过大党史问题意

①韩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争辩与思考——“中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研讨会”学术观点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8 年第 2 期。

识的引导，地方党史可以避免出现就事论事式的“碎片化”研究，有效揭示地方史学者研究成果的真正价值。比如，在从事中共杭州小组研究时，利用所掌握的地方档案资料，尽量避免就史料谈史料、就区域谈区域、就事件谈事件，深刻挖掘中共杭州小组革命活动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历史规律和历史逻辑。

2、处理好地方党史与政治史、社会史之间的关系

从学科属性上来看，中共党史与其他史学门类相比，最明显的一个特质就是政治性，所以地方党史的核心也是政治史，要充分了解当地政治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地方党史比宏观史具有更接地气的优势，可以触及到社会史相关内容，可以使党史研究向社会史化方向发展。对地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可以从社会史的高度去把握，包括历史事件和对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思想及实践进行社会生活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中共杭州小组的研究也会涉及到社会史，可以放在多学科背景下进行研究，特别是小组成员们在当地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时，产生的社会影响还有待挖掘。

3、处理好地方党史研究与现实运用之间的关系

地方党史资料的挖掘与利用，有助于真实展现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不同区域、坚守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可以实证性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地方党史研究应该围绕着一定的政治主题展开，充分发挥“资政育人”现实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对于中共党史而言，无论是研究整体党史，还是研究地方党史，均应紧扣这个政治主题。

---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中共杭州小组是浙江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组织，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杭州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徐梅坤作为上海和江浙地区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1927 年被捕后，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坚强气节；于树德是作为北方地区和浙江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为中共早期合作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开创性工作；金佛庄作为浙江建党初期的革命先驱和北伐名将，为贯彻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而英勇献身，是第一位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中共烈士；沈干城作为铁路工人运动先驱，为创建和壮大党组织、组织早期铁路工人运动做出重要贡献，被捕入狱后，面对严刑拷打视死如归，坚持斗争至生命最后一刻。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承载着百年初心、书写百年奋斗的壮烈革命史诗。

因此，从事地方党史研究不仅需要有丰富的地方史料支撑，还需要有宏观的历史视野引领；既需要有严谨的历史求证，也需要有深厚的问题意识与理论关怀，从而才能摆脱“画地为牢”的地域研究困境，使地方党史在大党史视域下彰显真正的典型性或代表性。

# 中共杭州小组创建者的革命实践及其历史意义

◎吴焕根[①]

**内容提要：**中共杭州小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与杭州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小组成员的身份构成，在建党初期的地方党组织中绝无仅有。他们组成了一个英雄的群体，践行伟大的建党精神而创造的英雄业迹，展示的悲壮人生，树立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弘扬和践行建党精神，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接续奋斗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中共杭州小组；创建者；革命实践；历史意义

中共杭州小组成立100周年了。经过100年的风雨兼程和砥砺前行，杭州乃至浙江全省的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谱写了史无前例的伟大篇章。

## 一、中共杭州小组的成立背景和在建党初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浙江特别是杭州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等地迅速传播，进步刊物如《杭州学生联合会报》《钱江评论》

①作者简介：吴焕根，男，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萧山历史（第三卷）》编撰人员，联系方式：82898837/13867158299，1458274992@qq.com。

等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特别是1920年初“一师风潮”和随后的“驱齐逐夏”的胜利，使浙江的形势呈现出喜人的局面。

几乎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成立同时，杭州的工人运动在进步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开始兴起。1920年七八月间，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组建；年底，浙江第一份工人刊物《曲江工潮》创办。翌年5月，杭州理发工人举行同盟总罢工并取得了胜利。浙籍人士与上海党团组织的创建关系密切。至党的一大召开前，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17名成员中，浙籍人士达7人之多，其中杭州籍或在杭州学习工作过的有4人[①]；1922年8月22日，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8位发起人中，有5位浙江人[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由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在萧山衙前爆发，运动席卷萧绍平原。虽然这场运动在反动当局的镇压下失败了，但星火不灭。1922年2月，俞秀松受团中央指派，到杭州筹建团的组织。4月19日，在皮市巷3号成立了团杭州支部，团员人数达27人[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是全省范围内第一个团组织，也是全国最早建立和恢复的17处团组织之一。

浙江特别是杭州的情况，为中国共产党在杭州建立地方组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1年底，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建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由于中共中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54页。浙籍7人为：陈望道（义乌）、施存统（金华）、邵力子（绍兴）、俞秀松（诸暨）、沈定一（萧山）、沈雁冰和沈泽民（桐乡）。杭州籍或在杭州学习和工作过的4人为：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和沈定一。

②“红色印记”《纪念共青团成立100周年 青年团的创世人俞秀松（之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共有8位：“俞秀松（诸暨）、施存统（金华）、沈玄庐（萧山）、陈望道（义乌）、李汉俊、叶天底（上虞）、袁振英、金家凤。”学习强国·浙江学习平台·浙里学史，2022年5月9日。

③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成员，《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21–1949）》列出16人：金佛庄、宣中华、唐公宪、徐白民、倪忱天、王贯三、邵季昂、钱义璋、华林、俞尔衡、魏金枝、钱耕莘、李宪仲、郭静唐、瞿文候、赵并欢。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列出25人，另9人为：俞秀松、何赤华、庄文恭、王华芬、朱文瑞、施荣庆、傅君亮、张春浩、俞庆源。

央在上海，上海的群众斗争和群众工作，都由中央直接决定，所以中央局指示，中共上海地委的首要任务是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①]。翌年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上海与江苏、浙江的工作，但前期的职责基本不变。委员会由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三人组成。徐梅坤任书记，沈雁冰负责宣传。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等9个决议案。《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②]《中国共产党章程》”组织“一章”中，规定了党组织的成立条件、组织领导的产生办法与任期等。第四条规定：“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附近，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③]

在担任中共上海地方和（江浙）区执委会书记后，徐梅坤着手在杭州的建党工作，8月底到杭州。9月初，同样在皮市巷3号，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有党员3人：于树德、沈干城、金佛庄。于树德任小组长。

中共杭州小组是除上海以外江浙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与浙江特别是杭州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小组的建立，标志着杭州乃至整个浙江省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①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②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二大”和“三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③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二大”和“三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杭州小组成立后，迅即开展工作。第一，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指导、联合团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揭露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深入工农群众，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沈干城仿效京汉铁路举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做法，在沪杭铁路闸口机厂创办工人自修夜校，培养工人运动骨干。金佛庄参加团杭州地委的有关工作，承担《浙民日报》的编辑任务。第二，积极发展党员，扩大组织。1923 年春，中共杭州小组发展了徐白民、唐公宪、何赤华、倪忧天等人入党。党的组织迅速扩大，小组也扩建为党支部，于树德任支部书记。第三，立足省城优势，在杭州周边及全省各地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团员①。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共杭州小组一个时期还担负着浙江全省党组织和党员的发展工作。

另外，几乎与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同时，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西湖会议在杭州召开②。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和马林、张太雷。徐梅坤“于 1922 年 8 月底专程到杭州开展建党活动”③，两件事情时间相同，是否有联系？参加西湖会议的 7 个人中，除陈独秀 1909 年 9 月至 1911 年 12 月任浙江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在杭州工作生活过两年多，高君宇

---

①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绍兴历史（1923.7 ~ 1949.5）》：“1923 年春，徐梅坤派何赤华到绍兴县，……开展建党、建团工作。3 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委的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绍兴支部建立，有团员 3 名。”“徐梅坤派共产党员徐白民、唐公宪等到绍兴女师任教。”“6 月中旬，在海宁开展工作的何赤华再次回绍兴县，……开展建党工作。7 月，中共绍兴（党、团）地方支部在县城龙山仓颉祠成立，何赤华任书记，有党 6 名、青年团员 3 名，直属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领导。”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年，第 31–32 页。

②西湖会议的召开日期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 8 月 28–30 日，马林《工作记录》：“8 月 28 日至 30 日：杭州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 83 页。杜魏华大事记和李玉贞《马林传》（第 170 页）采用此说。二是 29–30 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第 84 页。《中共浙江党史大事记（1919–1949）》和《中共杭州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均采用此说。

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86 页。

数次短期到过杭州外[1]，其余 5 人均没有到过杭州。这样 7 人（其中一个是外国人）到杭州开会，无论住宿还是开会的场地，均得有人给予巧妙的安排，这其中是谁在运作，由于当事人没有交代，至今仍然是个谜。是否有杭州小组的人员参与其中，值得研究。

## 二、中共杭州小组英雄群体：巍峨的丰碑，永远的怀念

中共杭州小组的4位创建人(其中三人为小组成员),组成了一个英雄群体，为后人树立起一座巍峨的丰碑。

这个群体中，创建人徐梅坤（又名徐行之），浙江萧山县长山镇人，1893 年 8 月出生。他从小在钱塘江边割草、打柴，13 岁即外出谋生，先后在杭州郭记装订作坊、浙江省官制印刷局当杂工和印刷工。1920 年，在浙江印刷公司当印刷工人的徐梅坤，与倪忧天等共同发起成立杭州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创办了浙江第一张工人报纸——《曲江工潮》。1921 年，领导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人的罢工斗争，并在家乡参加了声势浩大的衙前农民运动。是年冬到上海，约翌年 1 月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上海和江浙地区第一个工人党员。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

组长于树德，河北静海(今天津市静海县)人，1894 年出生。早年曾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 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入天津北洋法政学堂读书，是李大钊的同学（比李迟 2 年入学）。1918 年考取公费赴日本留学，入京都帝国大学学习，曾听河上肇教授讲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1 年回国后，在母校任教，并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9 月，任天津工余补习学校校长。1922 年 3 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成立，任书记部主任；6 月，经李大钊介绍

---

①王庆华《高君宇传》：高君宇 1921 年 7 月初在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第二次年会后，与刘仁静一道到杭州游览，经上海后即回北京；8 月初到上海，又与刘仁静到杭游览。翌年 7 月 2 日至 3 日到杭州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第三次年会。三次到杭，时间均很短暂。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43、150、192 页。另参见邵维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邵维正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9 年，第 8 页。

加入中国共产党。因“补校”被查封，为避免被缉捕，按照中共北方区委指示，暑假时到杭州教书。当时在杭州浙江法政专门学校任教。

沈干城，上海浦东（今上海市浦东区）三林镇人，1898 年出生。小学毕业后在家乡任教。1921 年在南京结识了津浦铁路浦口机厂“中华工会会长”王荷波。受其影响，于 11 月以通讯报名的方式，加入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成为第一批会员，开始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1921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沈干城与书记部的负责人多有来往，参加其中的活动，被该部聘为沪杭铁路特派员。1922 年初，他放下教鞭，到位于杭州钱塘江边白塔岭的沪杭铁路闸口机厂当工人，6 月经徐梅枰介绍入党。他是上海浦东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时任沪杭铁路闸口机厂钳工①。

金佛庄，浙江东阳县横店镇人，1897 年出生，1917 年底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东阳县立中学。1918 年 10 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先在京郊当兵，翌年 8 月到保定入学，步科三队。1920 年 7 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学校提前进行考试并立即放暑假。直系军队在军校宿营，将学生的生活用品洗劫一空，学校的教学设备毁坏殆尽。军校因此通知休假的学生暂缓来校，军校暂时停办。此时恰逢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厦门大学招生，金佛庄南下考入厦大师范部文科，成为厦门大学第一批学生，于 1921 年 4 月入校学习。同年 10 月，军校复课，在军校同学和家人的催劝下，考虑到经济压力等因素，他结束厦大的学习，重回军校就读。1922 年 7 月，从保定军校毕业，先在上海闸北淞

①缪君奇：《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沈干城》，《浦东英烈》编写组编《浦东英烈》（第一辑 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58 页。关于沈干城当时供职的单位，《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料（1922.4–1987.12）》称为“沪杭路闸口机修厂”，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 年，第 19 页；《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1921–1949）称为“沪杭铁路闸口机修厂”，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94 页；《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称为“沪杭铁路杭州闸口铁路机修厂”，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86 页。正式名称应该是“沪杭铁路闸口机厂”，参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总工会编《上海铁路工人运动史（沪宁、沪杭甬部分）》第二章第二节“两路局机构设置及其变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第 13 页。

沪护军使署当见习排长，不久到杭州浙军第二师任职[①]。他于年初在保定军校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②]，徐梅坤到杭州后介绍他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时任浙军第二师连附。

这个英雄群体的 4 人，从出身来说，2 名工人，1 名知识分子，1 名军人；从职业来说，1 名专职党的工作者，1 名教师，1 名工人，1 名职业军人。

刚刚建立的中共杭州小组 3 名成员，知识分子、工人、军人各 1 名。这样的构成，在建党初期的地方党组织中可以说绝无仅有。上年 10 月成立的中共长辛店党小组，书记是北大的学生党员吴汝铭，成员是铁路工人，也只有两种职业的人。这说明杭州小组的成立和它的成员构成，充分体现了党的二

---

①关于金佛庄在杭州时服役的部队和所任职务，《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料（1922.4–1987.12）》《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大事记》《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等各家记载不一。《浙江省军事志》记载：1924 年 9 月，孙传芳任浙省督军后，任命陈仪为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金佛庄《传略自述》：“十二年，到浙江陆军第二师充当排长并从事宣传革命运动”，已经说明了他供职的部队名称。金佛庄当时担任的职务是“连附”而不是“连副”。对其服役部队和所任职务，笔者有《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金佛庄服役部队及担任职务考证》一文专作考证。

②关于金佛庄入团时间，朱梅燕《金佛庄传》：“1922 年 2 月 10 日（农历辛酉年正月十四日，引者注），在邓中夏的指导下，保定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思想进步的金佛庄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投身早期共产主义运动。”“1922 年春，直奉战争爆发，……军校人心大乱，操课停顿，大有复蹈第一次浩劫的危险。于是学校宣布放假，学生纷纷离校避难。金佛庄因此回到杭州，却有幸亲历了杭州团组织的建立。”《（杭州地方）团员调查表（1924 年 3 月 12 日）》记载，金佛庄的入团时间为“1922 年”，具体月份不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及其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记录（一九二二年五月 – 一九二三年八月）》1922 年 8 月 2 日（上海）会议记录：列席委员：（施）存统、尚德（高君宇）、春木（张太雷）、（俞）秀松。“（1）保定军官学校一部份学生毕业，组有壬戌社，主义与本团相同，并愿与本团联络，彼此保持密切的关系。北方同志已与该社社员有所联络，感情甚为融洽。约二星期前，由邓仲澥同志介绍该社社员金佛庄来沪与书记方国昌接洽过一次，交换意见，甚为相得。太原地方团，亦有来信请示对待该社方针。因此中央议决：（1）各地方团，在一般活动上得与该社支部或社员联络进行；但政治活动，须得中央之许可。（2）该社社员与本团各级机关联络时，须有该社负责人或本团各级机关负责人之介绍书。此事中央须发一通告，并须致函于壬戌社说明本团之决议（序号原文如此，引者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2012 年第 1 期。从这一记录可以看出：1. 这是金佛庄刚保定军校毕业后来沪；2. 金佛庄的身份是壬戌社社员，至少没有说金佛庄是青年团员。

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的决议案》中“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中的第一律：“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组织里面去。”①

以上是他们在中共杭州小组成立之前和成立时的情况。追寻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后他们的革命生涯，我们便会有惊人的发现。

第一，三人参加了中共三大。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② 徐梅坤作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是大会的正式代表。据他回忆，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有两2名正式代表，另一位是王振一（王仲一）③。“我曾向中央提出，杭州支部的于树德和金佛庄，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三大’，得到中央同意。”④

从杭州和上海到广州参加三大，困难可想而知。首先是经济问题。“根据规定，出席‘三大’的正式代表是‘公费’，列席代表是‘私费’。记得于树德当时的生活很困难，没有钱买船票，急得没有办法来找我商量。我给

---

①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二大”和“三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增订本）》，正文说代表“共40名”，后面列出的代表名单为42人（两名列席：刘仁静、梁复燃）；另有1人尚未确定代表资格（江浩），国际国际代表2人。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9–11页。

③上海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江苏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浙江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档案馆合编《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上海、江苏、浙江党组织发展概况》：一九二三年“六月，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派正式代表三人、列席代表两人，参加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王荷波为津浦铁路浦镇工会的正式代表；杭州的于树德、金佛庄为列席代表。”《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十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183页。

④《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25页。《于树德关于“三大”前后的回忆（1979年10月）》：“一九二三年六月，李大钊在北京写信通知我去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二大”和“三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659页。

他出主意，他就把邻居一位朋友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1] 其次是安全问题。按照徐梅坤回忆，当时轮船从上海出发，在香港停留一天，然后再到广州。路上的时间，算起来得 5 天左右。开会时间 9 天，加上来回的时间，总共需要近 20 天。作为教师的于树德情况相对好一点；身为军官的金佛庄，要从军队中请假，难度就大了。当时驻浙的是皖系卢永祥的军队，虽然卢永祥为了抗衡直系军阀，倡议联省自治，宣布废去督军名义，宣布裁兵整军和整理省务，杭州的整个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但这仅仅是收买人心之举，他毕竟是北洋军阀的一部分。这样长时间到广州参加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而不为人知，其难度可想而知。

无论于树德、金佛庄是正式代表还是列席代表，总之参与中共杭州小组创建的 4 人当中，有 3 人参加了中共三大。杭州小组的 3 人中，有 2 人参加了三大。出席三大代表总共 42 人（不含国际代表），他们竟然占 14% 之多。而且他们是在克服经济、安全等困难的情况下去广州参加会议的。7 月 12 日，杭州党组织召开会议，由徐梅坤传达三大精神，金佛庄与宣中华等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推动即将开展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第二，两人当过黄埔军校教官。

国共合作，以俄为师，孙中山按照苏联红军的模式创办了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自任总理。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创办的、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所军事政治学校。它见证了国民党改组和第一次国共合作，见证了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中共杭州小组群体的 4 人中，有两人当过教官，金佛庄还是黄浦军校的创建人之一，并担任校军军官。

1924 年春，金佛庄受党组织委派参加黄浦军校的创建工作，经军校党代

---

①《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 25–26 页。于树德自己也这样说：“我当时没有路费，就把邻居一位朋友的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买了船票。”《“二大”和“三大” 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第 659 页。

表廖仲恺推荐，担任第一期学生队第三队上尉队长（下设三个区队）[①]。《广州民国日报》1924 年 6 月 21 日以《孙大元帅委金佛庄等任职令》为题进行报道[②]。他参加了 6 月 16 日黄浦军校的开学典礼，聆听了孙中山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讲，深受感动，作为一名革命军人的自豪感、荣誉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由于金佛庄是保定军校科班出身，又有基层带兵经验，他管理的第三队生机勃勃，秩序井然，后来大名鼎鼎的陈赓、曹渊、杜聿明、关征麟等均出自该队。他还是中国国民党黄浦军校特别区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③]。

在黄浦军校成立之初，孙中山就考虑到，有了革命之干部，还要成立军队，以树立党军之楷模。他指示军校领导编练新军。于是军校从沪、浙、苏、皖、鲁、豫等地招募士兵。当年 11 月中旬，成立军校教导团第一团；12 月初，成立教导二团，金佛庄任二团第三营营长[④]。1925 年初，以教导团两个团为基础，

---

①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浦军校》，广州出版社，2013 年，第 15 页。《（第二表）黄浦军校学生队之组织（开创时期）》，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浦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 5 月，第 98 页。

②报道全文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呈请任命吕梦熊为陆军军官学校第一队队长，茅延桢为第二队队长，金佛庄为第三队队长，李伟章为第四队队长。均照准，此令。"陈以沛、邹志红、赵丽屏合编《黄浦军校史料续编（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3 月，第 2 页。

③"1924 年 7 月 6 日，军校举行国民党特别区党部第 1 届执、监委选举，选举结果，蒋介石、严凤仪、金佛庄、陈复、李之龙 5 人当选为执行委员，蒋介石兼任监察委员，国民党黄浦（军校）特别区党部正式成立，直属于中央党部。"陈宇：《中国黄浦军校》，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第 104–105 页。陈宇著《中国黄浦军校》第九章《军校党争·"宣侠父事件"初显党争征兆》（第 272 页）："蒋介石对此是既喜又忧，喜的是自己顺利当选，忧的是 5 名执委中，除自己外，全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同书附录 2《黄浦军校大事记》（第 592 页）："7 月 8 日　军校国民党特别区党部成立……。其中，严、金、李 3 人是共产党员。"按：陈复，江苏海门人，1892 年出生，保定军校三期（步科五连）生（郑志挺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抗日将帅之摇篮》第 394 页）。黄浦军校第一期学生队第一队副队长（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浦军校史料（1924–1927）》第 504 页）。曾庆榴著《共产党人与黄浦军校》第一章《黄浦建校·首批黄浦红色教官·最早涉足黄浦军校的中共党员》（第 12 页）有一张 9 人的名单，其中没有陈复。

④《（第三表）黄浦军校校军之组织（民国十三年教导团组织时期）》，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浦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 年 5 月，第 99 页。

成立中国国民党党军第一旅，金佛庄任第一旅第二团第三营营长。后党军第一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金佛庄任该军第一师第二团党代表，不久改任团长。

金佛庄不仅会带兵打仗，而且对于加强革命军队建设进行思考和研究，撰写了《军官的心理》和《黄浦教导团的战斗历程》等文章。前者深刻揭露旧式军队存在的腐败黑暗现象，为改造旧军队、建设新型革命军队制造舆论；后者总结黄浦军校教导团历次战斗取得胜利的原因，为北伐的开展大造声势①。

国民党一大上，于树德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二大他继续当选。1926 年 3 月 1 日，黄浦军校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归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树德以国民党中央执委的身份，担任黄浦军校第四期（1926 年 3 月至 10 月）政治教官②。

中共杭州小组 3 名党员中，两人在黄浦军校担任教官，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③。

第三，两人曾被囚于浙江陆军监狱。

浙江陆军监狱存续时间是 1927 年 2 月至 1937 年 8 月，前后总共 10 年半④。了解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里成为国民党在杭州关押、屠杀全省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最主要的一所监狱。据记载，从 1927 年至 1937 年，被囚于浙江

---

①《军官的心理》，原载上海《新建设》1924 年第 2 卷第 1、2 期，收录在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1986 年 10 月）；《黄浦教导团的战斗历程》原载 1925 年《党刊》“总理纪念号”，收录在陈以沛、邹志红、赵丽屏合编的《黄浦军校史料续编（1924–1927）》。

②陈宇：《中国黄浦军校》，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第 100 页。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浦军校》，广州出版社，2013 年，第 228 页。

③接替于树德担任中共杭州支部（由中共杭州小组扩建）书记的安体诚，与于树德一起担任黄浦四期政治教官。陈宇：《中国黄浦军校》，解放军出版社，2007 年，第 101 页。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浦军校》，广州出版社，2013 年，第 228 页。

④黄仁柯：《陆军监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 359 页。

陆军监狱的中共党员和其他革命者共 1512 人，而牺牲者多达 150 余人，这其中包括 4 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人、罗学瓒、徐英、卓兰芳），另外还有 14 位省委常委以及 32 位县委书记。

中共杭州小组的 4 人中，徐梅坤、沈干城两人曾经被囚禁在这个魔窟里。

1927 年“七·一五”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徐梅坤受党的指派，从武汉回到上海；不久到宁波、余姚、定海等地搞一批弹药，准备武装暴动。7 月末，他从余姚盐民区经绍兴去杭州，在绍兴搭车时被王华芬发现，并暗地跟踪。在萧山家中，被当地军警抓走，送到浙江省公安局看守所关押，受尽折磨①。翌年 4 月，从看守所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先被判死刑，后改无期徒刑；经邵力子周旋，改判为 9 年 11 个月有期徒刑，后减为 6 年 4 个月，实际被囚禁 7 年 7 个月。在狱中，染上肺病，且越来越重，全身浮肿，高烧昏迷。1934 年初，按照狱中党组织的意见，表示“悔过”后由陆军监狱转至浙江省反省院。由于病情严重，于 1935 年初被保释回家②。

沈干城一直在杭州开展工人运动。1925 年 8 月，在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帮助指导下，在沪杭铁路闸口机厂建立了工人夜校，物色建党对象，发展钟鼎祥、洪德生入党。经中共江浙区委批准，成立了中共沪杭铁路独立支部，隶属中共杭州支部。这是沪杭铁路的第一个中共党小组。不久又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中共沪杭铁路支部，由沈干城负责③。中共杭州地委成立，他任工人部长；根据杭州地委指示，秘密组织杭州市总工会，他任总工会执行委员兼总

---

①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沈玄庐其人》：“这年 7 月，时任全国印刷工会主席的中共党员徐梅坤（萧山人），因事从浙东回杭，碰巧与王华芬（浙江余姚人，1920 年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就读，1922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嫁与沈定一为妻，引者注）同上了一辆汽车。……王华芬可翻脸不认人了，车到萧山就急急下车，跑到县党部通知手下，无情地将徐梅坤逮捕了。后由沈玄庐一手经办，将他投入了杭州陆军监狱，险些遭到杀害。”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 年 9 月，第 111 页。

②姜华宣等：《徐梅坤》，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64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428–431 页。

③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上海市总工会编《上海铁路工人运动史（沪宁、沪杭甬部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 5 月，第 63 页。

指导员。北伐军占领浙江后，积极支援北伐军进攻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杭州组织罢工。1927 年 3 月 22 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当日，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成立，他任副委员长兼宣传部长。6 月 27 日，在临平召开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先后被囚于杭州公安局柴木巷看守所、杭州地方法院看守所。8 月，反动当局组成特别刑事法庭审理所谓的“铁路工潮案”。他除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国共合作时期他的中共党员身份已经公开）外，坚不吐实，为其他 4 名执委开脱。12 月 25 日，他被转押到浙江陆军监狱。浙江省特别法庭以“煽动工潮，图谋不轨罪”判处他 11 年的“一类刑”。在监狱中，他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罗学瓒等组成一个小组，领导狱中斗争。1930 年 9 月，他被转到国民政府军政部下属位于苏州的江苏陆军监狱。他被囚于浙江陆军监狱近 3 年。

4 人当中，两人被囚禁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浙江陆军监狱，可见那时斗争的激烈和残酷。

第四，两人英勇牺牲，成为革命烈士。

1926 年 6 月 4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翌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授权其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7 月 4 日，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9 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北伐战争的号角响彻云霄。

为了拉拢金佛庄，蒋介石任命他为北伐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三科科长。军队进入湖南后，改任总司令部警卫团少将团长，负责保卫总司令部和苏联军事顾问的安全。在这个过程中，他率领的警卫团还作为作战部队参与攻打南昌的战斗。攻克南昌后，金佛庄被任命为检查司令，检查进入城内北伐军各路部队的军纪，负责南昌城的秩序。

1926 年 11 月底，北伐总司令部在南昌举行军事会议，讨论下步计划。当时，盘踞在苏、浙、皖的是自称是“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的军队。为了减少牺牲和尽快取得战争的胜利，要对孙的部队特别是已有归顺之心的陈

仪的部队进行策反，当务之急是要派出一员干将，到浙江、上海做策反工作。列席会议的金佛庄自告奋勇承担这一极其危险的任务。12 月初，金佛庄妆扮成洋行买办模样，与他的助手顾名世一道，在九江登上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三号轮，顺流东下。5 日，船到南京，即遭被捕[①]。消息传出，国共两党都组织进行营救。心狠手辣的孙传芳不待审讯，即下令将二人枪杀于雨花台。

原来，金佛庄等被拘捕后，为了保护尚是孙传芳属下的陈仪等将领，不承认自己是蒋介石派来的代表，自认侦探，遂被残忍杀害。

得知金佛庄被害的消息，蒋介石一怒之下，枪毙了孙传芳手下 2 名被俘的军长，以示报复[②]。12 月 21 日，黄浦军校校刊《黄浦日刊》在头版以显著位置刊登了《金佛庄顾名世两同志突被孙逆传芳枪毙》的报道。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得知噩耗后，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加强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里的革命警惕性。”据徐梅坤回忆，金佛庄到上海的另一任务是“找我联系工作”，“党中央多方营救无效被害。曾从上海拍电报到他家”[③]。

1927 年 3 月 24 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金佛庄妻子严瑞珍在其大哥的陪同下到南京寻找他的遗骸。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寻找，终于在雨花台的一座荒坟中找到。消息传出，金佛庄的好友、同学、同乡呈文蒋介石，要求将金佛庄安葬于杭州西湖旁，并获得批准。翌年 4 月，遗骸入棺；8 月，在南京下关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与会人员护送灵柩上火车，运抵杭州。

---

①关于金佛庄二人离开九江和在南京被捕（害）时间，有多种说法。李文娟《金佛庄》（《中华著名烈士 2》，第 463 页）、叶炳南《金佛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二卷，第 77 页）：“12 月上旬离开九江”；李新勇《风向与信仰　金佛庄烈士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年，第 132 页）：“12 月 9 日晚”从九江顺流东下。金佛庄烈士陵园内烈士雕像前的文字介绍：“1926 年 12 月 2 日在南京被军阀孙传芳部杀害。”朱梅燕《金佛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97 页）：12 月初离开九江，5 日到南京时在船上被捕。其主要依据是 1926 年 12 月 8 日《申报》报道：“五日晚十二时，船过下关停泊码头，金、顾二人突被军警在船上捕去。”

②陈以沛、邹志红、赵丽屏合编《黄浦军校史料续编（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594 页。

③《原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徐行之给＜金佛庄＞作者叶炳南的复信》。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1986 年 10 月），第 3 页。

当时杭州正在筹建首届西湖博览会，有“西湖附近山麓禁止营葬”的规定。建墓于西湖旁的计划只得搁置，灵柩寄于里西湖的叠翠山庄。在杭州被冷落了6年之后，严瑞珍在金佛庄弟弟金为周的陪同下，走水路从钱塘江、富春江、兰江、金华江、东阳江，将金佛庄灵柩运至横店，再走陆路，安葬于他的家乡良渡村西的牛尾山。

金佛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军人身份的党员①，是最早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中共烈士之一②。

徐梅坤回忆说：“金佛庄这个人很好，不但懂军事，文章也写得很好、很快，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是很拔尖的一个。毕业后派到浙江的军队里，开始是个连附，我曾经对〔向〕毛主席推荐过他，说这是个很好的人才，需

---

①徐梅坤《九旬忆旧》，光明出版社，1985年，第19页。李新勇《风向与信仰金佛庄烈士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155页。朱梅燕《金佛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001页。《黄浦建校·首批黄浦红色教官·最早涉足黄浦军校的中共党员》9人名单中，第一期学生队第二队上尉队长茅延桢（1897年出生，安徽寿县人，保定军校工科，黄浦青年军人联合会负责人，1925年被刺身亡）入党时间是1922年7月，保定军校九期。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浦军校》，广州出版社，2013年，第12页。郑志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抗日将帅的摇篮》：保定军校第九期入学时间为民国十年（1921）九月，毕业时间为民国十二年（1923）八月，在校时间一年又十一个月。如此算来，茅延桢入党时尚在军校就读，是个准军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63、490页。另：范宝俊、朱建华主编《中华英烈大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下册第2139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著名烈士（第二卷）·郭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64页）均说金佛庄的保定军校同期同学郭俊1922年7月军校毕业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浦军校》的9人名单中，郭俊的入党时间是1923年。经询问湖北省孝感市史志研究中心，他们回答也是1923年（因是秘密入党，具体月份不清楚）。

②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编、赵永艳主编《雨花台烈士陵园志》按牺牲年份排序的《烈士名录》，排在第一的是华亮（1905–1925），江苏无锡人；第二、三分别是顾名世和金佛庄。南京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155、156、186页。经询问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下属的雨花英烈研究院，尚无华亮的详细生平事迹资料。但《雨花台烈士陵园志·知名烈士》和雨花台烈士纪念馆VR全景纪念馆中，金佛庄照片下的介绍：“金佛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军人身份的党员，也是最早牺牲于雨花台的烈士。”同书第156页。

要的时候马上可以调他出来。”[①]1923 年 8 月 5 日由毛泽东同志参加的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江浙军事问题作出的决议，第二点为:“金佛庄同志相机作反对战争之宣传,应随营上阵,不可失掉原有位置。”[②]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召开前夕，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了《死难烈士英名录》，金佛庄的名字载入其中[③]。6 月 11 日，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以七大的名义召开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定》：“大会决定在大会闭幕后，在延安召开扩大的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以纪念三个革命时期死难的人民与党的烈士。”[④]6 月 17 日，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在党校大礼堂举行。七大代表和延安各界代表参加大会。毛泽东担任主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担任陪祭。会上宣读了《中共七大代表、各界代表对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的祭文》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悼词》。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大会上讲话，毛泽东还发表了演说。会议决定，

---

①《徐行之回忆金佛庄》，政协东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一九八五年四月）, 第 13 页。另见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1986 年 10 月），第 5 页。

②《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记录（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节录〕》。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1986 年 10 月），第 100 页。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修订本 1923 年 8 月 5 日条：“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第六次会议，进行指导。参加会议的有徐梅坤、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密令金佛庄（当时在浙江省警务处处长夏超的警备团任营长）相机作反宣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15 页。

③《死难烈士英名录（节录）》载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1986 年 10 月），第 154 页。烈士英名录中金佛庄的事迹，大意是：“金佛庄同志，浙江人，曾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并在该校群众团体中活动。毕业后，回浙江在陈仪部队任下级军官。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军事工作，大革命时期到广州曾任黄浦军官学校一期教官、蒋介石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一军一师二团团长。‘四·一二’事变后（应为 1926 年 12 月——编者），党派他回浙江，于九江至南京的轮船上被孙传芳捕去杀害于南京雨花台。牺牲时 1926 年（一说是 1927 年）。”转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优抚局函》，同前书，第 156 页。将金佛庄当时服役的部队误为“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或许出于此材料。

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第 617 页。

在延安清凉山建筑中国革命死难烈士纪念塔[①]。

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金佛庄和他的家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恤。1963 年 9 月 2 日，金佛庄 88 岁的母亲施玉英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要求给金佛庄以烈士身份进行安葬，给家属以烈属处理。10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优抚局致函东阳县人委民政科，要求进一步查对，“如施玉英确系金佛庄烈士的家属，应当予以烈属待遇”。翌年 5 月 14 日，东阳县人委民政科向省民政厅提出《关于要求追认金佛庄为革命烈士的报告》；5 月 18 日，省民政厅批复，追认金佛庄为革命烈士[②]。

沈干城 1930 年 9 月被转到江苏陆军监狱后，翌年 1 月转至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2 年 10 月又押回江苏陆军监狱。在监狱里，他受到了无休止的折磨摧残，加上反复转押折腾，狱中恶劣的环境和伙食，营养极差，使沈干城完全失去了健康，患上了肺病，全身浮肿，双眼难睁开，双腿迈不动。1934 年 9 月 22 日，是这年中秋节的前一天，当难友将家中送来的几只月饼放在他身边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难友给他喂月饼，他吃力地咬一口，却不能下咽。下午 7 时许，在狱中病逝，时年 37 岁。他的遗体被运回家乡，埋葬在自家老屋旁边，长眠在浦东的大地上。1952 年，沈干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③]。

这个英雄群体中的两人，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受了 8 年牢狱之灾的徐梅坤，出狱后在家养了半年时间的病，又回到上海，还是做印刷方面的工作。由于对王明等“左倾”错误领导不满，他拒绝回到党内。1939 年在重庆时，他向周恩来表示回到党里来，希望党考察自己。周恩来叫他暂时不要到党里来，在党外做工作更方便，效果也更大。1946 年冬，

---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第 683–691 页。

②中共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1986 年 10 月），第 155–158 页。

③缪君奇：《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沈干城》。《浦东英烈》（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65–166 页。

他参加民主建国会。1947 年，担任上海中央化学玻璃厂厂长。1948 年底，为逃避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到香港。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与其他民主党派人士一道于 1949 年 1 月回到内地。他利用与浙江省国民党当局负责人的关系，为杭州的解放特别是钱塘江大桥和杭州市有关资料档案的保护作出了贡献。全国解放后，担任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参事。1956 年 2 月起，任国务院参事。1954 年 11 月，他向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到组织中来。1981 年 6 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党龄从 1954 年 11 月算起。1997 年 1 月 17 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 104 岁。

于树德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同中共脱离组织关系，长期从事农村合作社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是中国最早讲授合作社理论的学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等职。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合作社），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合作社、无党派爱国人士）[①]。对于自己的历史，1976 年 1 月在全国政协学习组悼念周恩来逝世的会上，他痛心疾首说："在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面临大挫折的紧要关头，自己畏险而退，脱离了革命队伍。虽然，这以后我也把握住自己不要做对国家民族有害的事情，而且还做了一些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有益的事，然而我从中流砥柱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这是我一生的耻辱。"[②]1982 年 2 月 18 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8 岁。党和政府对他的评价是："于树德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他在患病期间，仍十分关心国家的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深切期望台湾故旧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①《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委员名单》，人民政协报编《风雨同舟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年，第 186、196、202、207、212、219 页。

②汪东林：《远去的背影：政协人物记·于树德先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年，第 46 页。

作出贡献。”[①]

### 三、继承和发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00 年前，徐梅坤等 4 人组成的这个英雄群体，创建了中共杭州小组。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过程中，他们作出了自己贡献，而且坚定不移地践行这种精神，为理想奋斗。今天，纪念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100 周年，缅怀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个英雄群体特别是两位牺牲了宝贵生命的革命烈士，深感应该在新的起点上，继承他们的遗志，做好自己的工作。

第一，大力宣传中共杭州小组及其成员特别是两位烈士的英雄事迹。

2021 年在全党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后，今年 3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4 月，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实施意见》，对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出了要求。浙江全省特别是杭州市的党员干部，要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以守好“红色根脉”的政治担当，进一步推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更好地用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增长智慧、增进团结、增加信心、增强斗志。各级党组织要把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来抓，要把大力宣传中共杭州小组及其成员特别是两位烈士的英雄事迹，作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在具体的方式方法上，要按照“党史六进”的要求，各级党组织在建党

---

①1982 年 3 月 13 日《人民日报》第 4 版《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同志在京逝世》。

纪念日、小组成立纪念日前后，党组织开展组织生活，新党员入党新团员入团，组织大家到中国杭州小组纪念馆参观瞻仰，重温和学习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奋斗精神。有关部门要通过研究，编写、拍摄宣传中共杭州小组的专门书籍、资料和影视作品，让小组的有关内容特别是小组成员的英勇事迹，进入党校和各类学校，进入地方史志和地方教材、乡土教材。总之，只有让公众知道、了解，才能起到引导、教育和激励的作用。

第二，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建功立业。

过去，伟大的建党精神给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以无穷的力量，从而赢得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中共杭州小组英雄群体正是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光辉榜样。

百年正是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全省特别是杭州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必须像中共杭州小组的英雄群体那样，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承和发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努力学习，积极工作。无论在发展经济和科技、改善民生、繁荣文化、管理城市，还是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必须走在前列。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为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而勤奋工作。

当年，金佛庄烈士说："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①] 沈干城烈士临终时说："我小时候读过夏完淳的两句诗，'毅魄归来日，灵旗天际看'。我如果在死后能成为刚毅的鬼，高举义旗，同敌人斗争到底，

①金佛庄：《传略自述》，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编"雨花英烈史料丛书"《雨花英烈文集》，南京出版社，2016年，第2页。《传略自述》抄件存东阳县档案馆，影印件载中共浙江省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1986年10月），第25–27页。

有多好！”[1] 时代不同了，虽然斗争的对象、方式不同，但斗争的总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人民。我们应当牢记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那段深情的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我们要以中共杭州小组英雄群体为榜样，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工作、学习、生活，在单位、家庭、社会，记住我是谁、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保持强健的体魄、乐观的心态、认真的态度、负责的精神和自律的意识，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什么样的学习都能搞好，什么样的工作都能做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建功立业。

第三，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为中共杭州小组留下看得见的纪念物。

2011 年，为纪念建党 90 周年，杭州市上城区和小营街道精心筹建，在方谷园 3 号设立了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7 月 1 日，纪念馆开馆典礼隆重举行。2020 年 7 月，位于小营巷 61 号的新馆开馆。由于城市道路扩建，皮市巷 3 号的房屋早已不复存在。无论方谷园 3 号还是小营巷 61 号，虽然与皮市巷 3 号相近，且纪念馆紧邻小营公园，交通便利，但终归不是原址，令人有些遗憾。

在杭州，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与我党相关的著名事件和人物的遗址留存已经不多。西湖会议由于当时没有确切记载，当事人回忆比较简单，地点尚待考证。浙江省陆军监狱，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建宾馆，旧房子全部拆除；只在庆春路西端路边绿化带里立了一块约 2 米高的花岗岩石碑，另外在云居山建了一个纪念亭。续范亭烈士在杭州疗养时住了将近半年的香山精舍也成了酒店。“续范亭题刻”虽然被确定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香山洞只留下了一个门廊、一条小弄和将军题写的“盡此一報”4 个大字和“民国念五年”“山右续范亭题”的上下款。经省、市、区三级党史部门的考证，确定下城区天

---

①缪君奇：《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先驱——沈干城》。《浦东英烈》（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65 页。

水街道戒坛寺巷社区的狮虎桥河下 2 号为中共浙江省委机关（1927–1929）旧址之一，并建立了陈列馆[①]。中共杭州小组及其成员在杭州留下的东西少之又少。据了解，因沈干城所在的沪杭铁路闸口机厂解放后改为杭州铁路分局杭州机务段，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省民政厅、杭州铁路分局及分局政治部、机务段等单位在机务段建立了沈干城、沈乐山[②]烈士塑像，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沈氏兄弟”的战友薛暮桥为塑像题字。1987 年 4 月 4 日，浙江省民政厅和原杭州铁路分局及各界代表 450 多人，在浙江革命火种点燃的闸口机厂（原杭州铁路机务段）隆重集会，举行塑像揭幕仪式。1990 年 4 月，原江干区人民政府批准，两位烈士的塑像为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区级保护单位。在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穿过序厅，是一组这个群体的立姿雕像，房间里有他们 4 人开会情形的蜡像。两组雕（蜡）像做得非常好，英姿焕发，栩栩如生。

在东阳金佛庄老家，有金佛庄烈士陵园，园内有烈士雕像、烈士故居、烈士墓和纪念馆，村子里有金佛庄路；在东阳中学南门，也有一座金佛庄烈士的雕像：烈士身着戎装，骑着飞奔的战马，高举左手，正指挥他麾下的将士们冲锋陷阵。

金佛庄的灵柩回乡安葬，对于烈士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在外奋斗了短暂一生的他，终于回到故乡母亲的怀抱；但对于“青山有幸埋忠骨”的杭州和西湖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这里有岳飞、于谦、张苍水、秋瑾以及后来的于子三的墓，就因为要举办西湖博览会而不给烈士以安葬，让他的灵柩在叠翠山庄搁置了 6 年之多。对于生者，这是多么寒心的一件事情！“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

---

①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考证课题组：《杭州狮虎桥河下 2 号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旧址考证报告》，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足迹》，2020 年第 6 期。

②沈乐山，1901 年 8 月出生，浙江省余姚县人。在沪杭甬铁路闸口机厂担任门警。1927 年 1 月经沈干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1927 年 11 月 25 日，在狮虎桥省委机关被捕。1928 年 1 月 9 日被枪杀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刑场。

祠。”[1]“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2]这些诗句说出了多么深刻的道理！乘凉要念种树者，吃水不忘挖井人。所以笔者建议，在西湖旁建立中共杭州小组英雄群体特别是金佛庄烈士的雕像，请有关部门予以研究论证。

回首峥嵘岁月，缅怀先辈业绩，让我们向中共杭州小组英雄群体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

①张煌言《入武林》诗句。全诗为：“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尽鸱夷！”王荣初选注“西湖文艺丛书”《西湖诗词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年，第 268 页

②袁枚《谒岳王墓作十五绝句（之十五）》诗句。全诗为：“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王荣初选注“西湖文艺丛书”《西湖诗词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年，第 302 页。

# 中共杭州小组成立与建德党组织的发展

◎洪淳生[①]

**内容提要：**杭州党小组成立后，就有计划地到各地发展党的组织。1925年春，唐公宪受中共杭州支部派遣，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到浙江省立第九中学（现严州中学）小学部任教。唐公宪将《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委托思想倾向革命的进步教师竹均之代售。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教师竹均之和学生童祖恺、严汝清、祝光焘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建德县党组织成立之后，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为后来革命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中共杭州小组；建德党组织；农民运动发展

距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1年零1个多月，也即1922年9月，中共杭州小组就在杭州成立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讨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纲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直至消灭阶

①**作者简介：**洪淳生，男，建德市党史与地方志编纂研究室原主任、编辑，联系电话：18105718378，邮箱：779492545@qq.com。

级差别；确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还规定了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中共杭州小组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起来的，从此，开启了浙江党组织的发展历程。

## 一、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和党员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非常重视浙江党组织的创建工作。1921 年底，中共上海地委成立，陈望道任书记。1922 年 7 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地委兼区委，领导上海与江苏、浙江两省的工作，委员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都为浙江人，其中徐梅坤任委员长。8 月底，徐梅坤专程到杭州开展建党工作。徐梅坤 (1893–1997)，后名徐行之，出生于萧山长山镇 ( 今属新街街道 ) 富家塔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10 岁起做学徒，后在杭州当印刷工人。五四运动时期，受新思潮影响，与同事倪忧天发起成立“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领导开展工人罢工斗争，聘请浙江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创办了浙江第一张工人报纸《曲江工潮》。

1921 年底回乡参加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后到上海，进入《民国日报》社工作。1922 年初由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 年 6 月出席党的“三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

从 1922 年起，他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上海印刷总工会委员长、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和全国印刷总工会委员长等职，并兼管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的印刷发行工作。后受党的委派，赴杭州建党，赴绍兴、宁波发展党的组织，大革命时期参与了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等党的重要活动，为党在创建时期的组织建设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时，中共北京地委也派一批骨干到各地建党，其中于树德被派到杭州，在浙江法政学校任教，并与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取得了联系。他们还与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连副金佛庄和沪杭铁路闸口机修厂工人沈干城取得了联系。金佛庄在保定军校时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沈干城当时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驻沪杭铁路特派员、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徐梅坤首先将沈干城发展入党，随后又将金佛庄转为中共党员。

1922 年 9 月初，中共杭州小组在皮市巷 3 号正式成立，于树德任组长，成员有金佛庄、沈干城，隶属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中共杭州小组建立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共二大关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努力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积极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金佛庄积极撰写文章，在杭州《嘉言报》等报刊上宣传新思潮，抨击吴佩孚等军阀的反动统治，还积极参加杭州青年协会和《协进报》的编辑出版工作。沈干城则在闸口铁路机修厂创办了工人自修夜校，培养工人运动骨干。1923 年春，中共杭州小组发展了第一批党员，杭州小组扩大为支部，于树德任书记。5 月，于树德、金佛庄作为浙江代表赴广州，后列席中共三大，安体诚接任中共杭州支部书记。

中共杭州小组是浙江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组织，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杭州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是浙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浙江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刚刚起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浙江的推进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其中，有一位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迪青年学生唐公宪，应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沈定一的邀请，与浙江省早期的党团负责人宣中华及徐白民、杨之华、王贯三、张春浩、赵并欢等人在浙江萧山衙前农村，以沈定一出资兴办的小学为依托，点燃了浙江省农民运动的第一把烈火。影响扩及萧山、绍兴、上虞等 82 个农村，在中共“一大”思想的指引下，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有组织、有纲领的减租、减息、抗税为中心的革命风暴。次年 (1922 年 )4 月，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俞秀松在杭州建立团组织，唐公宪首批入团，并加入进步团

体“任社”，与宣中华、魏金枝、钱义璋等人以《责任周刊》为阵地，大力宣传中共“二大”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决议亲自撰写了《怎样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社会的教育》等切中时弊的专论。1923 年春天，唐公宪由中共上海地方江浙区执委徐梅坤介绍入党，成为浙江省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

**二、唐公宪来建德发展党员，为组建中共建德小组打下良好基础**

唐公宪（1898—1938），名政，字海潮，学名伯宣，遂昌县校溪乡庄后村人。1920 年在浙江省立第一你范读书时，任杭州学生联合会评议部议长，积极参加“一师风潮”。1921 年，任浙江省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兼任全国学生联合会评议员。同年 9 月，同宣中华等到萧山衙前，举办“农村小学”，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一师”毕业后，唐公宪入上海同文大学。1923 年春，在杭州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上海地委指派到绍兴开展建党、建团活动。同年 9 月，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1925 年春，唐公宪受中共杭州支部派遣，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到浙江省立第九中学 ( 现严州中学 ) 小学部任教。唐公宪将《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委托思想倾向革命的进步教师竹均之代售。刊物在九中学生中传阅，学校的沉闷空气为之一振。竹均之 (1898—1961)，乳名水老，原名秉窗，又名启桢，嵊县东乡仁村人。1921 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五师范 ( 地址绍兴 ) 旧制本科。任绍兴县立第二小学教师时加入国民党。1924 年冬，参与绍兴二小学潮，被校方解聘。

1925 年春，竹均之来建德，在浙江省立第九中学小学部任教。与同时到达学校的唐公宪通过日常接触交谈，思想上很合拍，两人关系渐渐好起来，互相之间有信任感。5 月底，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他俩一起投入严州各界群众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发表《反基督教宣言》，和外国传教士开展面对面的辩论，以铁的事实痛斥帝国主义以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他和唐公宪积极发动学生罢课，组织游行示威。竹均之积极追随革命，常与唐公宪一起议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协助唐公宪一起在学生中发售进步刊物。半年后，

竹均之经唐公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建德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同年秋，唐公宪奉调去了绍兴。11 月，中共杭州独立支部决定唐公宪和竹均之分别为绍兴和严州的通讯员。1926 年春天，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进步知识分子张石樵来九中任国文教师。经过五四运动的熏陶，他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张石樵老师上课不用当时发行的课本，而把鲁迅的《孔乙己》《风波》《故乡》，具有鲜明人民性的我国古代作品《石壕吏》《卖炭翁》，以及苏联马耶可夫斯基的诗，俄国托尔斯泰的《一文钱》选入他的国文讲义。他曾用“一盆脏水抹桌数次桌子还是脏的，必须将脏水倒了，另换一盆清水，桌子才能抹干净”的事例，启发学生向旧时代宣战。在唐公宪、竹均之、张石樵等同志的教育和影响下，九中学生祖恺、严汝清、祝光焘等迅速成长起来。

唐公宪离开建德后，中共杭州地方组织 ( 始为中共杭州独立支部，1926 年 1 月起为中共杭州地委 ) 便通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 左派 ) 开始和竹均之联系，并指示在建德秘密组织国民党县党部，通过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当时浙江处在直系军阀孙传芳的统治之下，其爪牙遍布各地，对“赤化分子”是格杀勿论的，因而开展革命活动十分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竹均之便暗中联络九中的进步学生，为筹建国民党建德县党部进行活动。1926 年 11 月，为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中共杭州地委通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 左派 ) 派俞升群 ( 中共党员 ) 来到建德，协助竹均之开展工作，发展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筹备在国民党建德县党部内建立共产党的核心组织。至年底，有童祖恺、严汝清、胡耀先、关启先、邵梦仙、席绍忠、郑瑞芝、翁义明、关启昌、胡潮生、胡潮清等人先后加入共产党。1927 年 2 月，在国民革命军途经建德的胜利进军中，国民党建德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梅城召开，正式成立国民党建德县党部。在大会选出的县党部成员中，大多数为共产党员所担任：竹均之为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翁义明为执行委员兼农人部长，车素英为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关尔康为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候补执行委员有关启先、邵梦仙；童祖恺为监察委员。北伐军克复杭州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 ( 左派 )

任命竹均之为建德县政治监察员兼严属六县党务指导。为有共产党的组织在县党部内起骨于作用，竹均之召集有关同志，在九中小学部开会，成立了建德县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中共建德小组。其成员有竹均之、童祖恺、翁义明、胡耀先、关尔康、关启先等，竹均之为负责人。中共建德小组成立后，利用国民党建德县党部的合法身份，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在梅城、大洋、洋溪、三都等地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至 4 月前后，建德全县有共产党员 20 余人。

**三、建德党组织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建德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

1927 年 4 月，蒋介石撕下了革命的假面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这黑云压城的时刻，社会上的封建势力、国民党右派分子也趁机活跃起来。4 月 17 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右派），派苏德钧到建德“清党”，5 月，又调严有容来建德任县党部指导员，负责建德的“清党”工作。4 月 27 日，共产党员童祖恺等人在九中操场上召开了有数千名群众参加的县民大会。痛斥国民党右派和地主劣绅捣毁县党部的罪行，号召群众给予有力的回击。嗣后，为保存革命力量，大部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离开国民党县党部，转移到农村活动。竹均之离开建德去汉口工作。

同年 9 月，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指示，中共建德临时县委在大洋建南小学召开全县党员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中共建德县委。选出书记童祖恺，委员严汝清、关汝藩、关启先、胡耀先。县委兼管淳、遂、寿三县工作，其中，遂安有特支 1 个，党员 40 人；淳安有党员 2 人；寿昌有党员 2 人。

这年秋天，中共浙江省委派徐英、白云舟来建德，他们经常和童祖恺、翁义明、邵梦仙等人联系，商讨工作。10 月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姜挺来建德，在大洋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此后，县委先后两次召开会议，讨论基层党组织发展问题。

1930 年春夏间，中共建德中心县委成立，管辖建德、义乌、遂安、桐庐、分水、淳安、浦江、寿昌等县，隶属中央领导。4 月为迅速组织建德农民暴动，原中共浙西特委委员姚鹤廷在大洋南山召集县委扩大会议，会议对建德党组

织领导成员作了变动。5 月 9 日，童祖恺应姚鹤廷之邀，从上海回到大洋，参与建德农民暴动的准备工作。

6 月 11 日，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中旬，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在大洋童祖恺家召开会议，有 100 多人参加。会上贯彻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决定建德提前暴动。6 月中旬在建德党组织的大力宣传发动下，全县先后参加分粮斗争的群众达万余人。有 20 余人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虽然在国民党武装力量的镇压下，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失败了，但他们播下的革命火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对杭州党团组织创建有关问题的思考及考证

◎骆小峰 ①

**内容提要：**1922 年，杭州的党团组织先后在皮市巷 3 号成立。本文就为什么杭州早期党团组织都在皮市巷 3 号诞生、杭州籍早期党员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杭州早期党团组织对全国党团组织建设的作用又有哪些等三个方面问题进行梳理研究，认为杭州早期党团组织都在皮市巷3号诞生是有其必然性，是天时地利人和所致。浙江籍早期党员为杭州党团组织建设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直接组织或推动了杭州党团的创建，更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人才，为全国党团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全国贡献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教育，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二是积极服务中央，做好了党刊的发行；三是致力统战，推动国共合作。

**关键词：**杭州；党团；创建问题；考证

经过“五四”运动和 1920 年春“一师风潮”的洗礼和锻炼，杭州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投身工农运动，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22 年初，党派俞秀松来杭州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4 月 19 日，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杭州市皮市巷3号正式成立。俞秀松兼任书记，共有团员27人。

①作者简介：骆小峰，男，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处长，联系电话：0571—85253288，电子邮箱：lxf442962862@163.com。

6 月 7 日，杭州团支部扩建为团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 5 人，分别是庄文恭、徐白民、吴明、詹炎和胡公冕。

1922 年 7 月，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徐梅坤任委员长，领导上海与江苏、浙江等地的工作，并着手在杭州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同年 8 月底，徐梅坤到杭州开展建党活动。9 月初，徐梅坤召集在杭州的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等三名党员，在皮市巷 3 号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

杭州的党团组织都诞生于皮市巷 3 号，这些人从各个地方到皮市巷 3 号商议，又从皮市巷 3 号走向全省、全国各地，为革命而奋斗。为什么杭州早期党团组织都在皮市巷3号诞生？杭州籍早期党员在其中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杭州早期党团组织对全国党团组织建设的作用又有哪些呢？本文试就上述问题进行思考及论证。

## 一、为什么杭州早期党团组织都在皮市巷 3 号诞生？

1922 年，皮市巷 3 号是刘大白的家，又称“白屋”。刘大白是中国第一代白话诗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因受到监视，被迫展转南洋。1916 年 6 月，刘大白从南洋回国，定居在杭州皮市巷3号，先在《杭州报》任职谋生。1919 年，他应经亨颐之聘到浙一师任教。因受“一师风潮”影响，1920 年 6 月后，刘大白往返于杭州、萧山、绍兴等地，先后在崇文、安定、春晖等中学任教。那么，为什么他的家，就是皮市巷 3 号会成为杭州早期党团组织的诞生地呢？

从有关条件来说。作为党团组织的诞生地，在当时那个风云变换的年代是需要很多必要的条件，如安全。这是底线，人员之间彼此要信任；二是交通便利，便于人员往来。既要利于寻找，又要便于撤离等。三是房屋主人在当地有较好的基础，处于社会的中上层，交际相对比较广，来往中陌生人也较多，这样不容易引人起疑。皮市巷 3 号的白屋就具有以上的条件。就交通而言，比较便利，处于浙江一师（当时许多团员都是一师等学校师生）与杭州火车站（发展了不少铁路工人党团员）的中间，到当时法政学校（部分党

团成员为学校教授），以及西湖都还较近，从地理上讲具有优势。

从人员交集上来论。这与刘大白和当时党团组织领导人的关系有关。刘大白、徐梅坤和沈定一都是萧（山）绍（兴）人，山水相连，文化相近，又都在文化界。此前，受沈定一的邀请，都到衙前参加了农民运动。可以说，在“一师风潮”前相互就已认识，彼此间都很熟悉。而俞秀松作为作“一师”的学生，与宣中华等人领导了杭州的“五四运动”，又推出了《浙江新潮》等，与刘大白等也是相互熟悉的。1920 年在上海，俞秀松与沈定一、邵力子等浙江人都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都是党的创建成员之一。

所以，1922 年 3 月，俞秀松从苏俄回国后，受组织委派到杭州等地筹建团组织。在杭州他就住到了皮市巷 3 号的“白屋”，并在此向团负责人施存统写了几封信，汇报建团有关情况。1922 年 4 月 19 日下午，杭州团组织成立大会就在皮市巷 3 号召开。会后，俞秀松返回到上海汇报有关情况。

而徐梅坤也是如此。1922 年 8 月底，他专程到杭州开展建党工作，并将自己的落脚点定在皮市巷 3 号。此时，由李大钊介绍入党、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部主任的于树德也来到杭州，在法政学校任教。随后，徐梅坤、于树德还和沪杭铁路闸口机厂钳工沈干城、在浙军第一师任连副的金佛庄取得联系。徐梅坤先后将沈干城、金佛庄发展为党员。9 月初，中共杭州小组在皮市巷 3 号正式成立，于树德任组长，成员有金佛庄、沈干城。1923 年春，由于党员人数的增加，中共杭州党小组扩建为党支部，于树德任书记。

从刘大白意愿来讲。刘大白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同盟会，1912 年在他的家乡绍兴主办过《禹域新闻》，用诗文反对袁世凯的窃国称帝。反袁运动失败，他被迫流亡南洋，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卖布谣》等就是他倡导用新诗反帝反封建的代表作。同时，刘大白的新诗中有不少是涉及底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的。到杭州后，在浙一师与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一起改革国文教育，被称为“四大金刚”。在“一师风潮”中他也积极支持学生，倾向革命运动。再加上他对这些人员都熟悉，所以愿

意提供场所，并且事实上也提供了场所。另外，在当时刘大白已基本不住在这里了，这样，也给杭州党团组织的创建留下了更多的空间。

可见，杭州早期党团组织都在皮市巷 3 号诞生是有其必然性，是天时地利人和所致。一方面刘大白与这些早期党团领导人都相互熟悉，愿意提供场所。另一方面，这里具有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优势，作为著名诗人和教师的家，有些人员来往，特别是陌生人的来往，是不会引起周边人注意和怀疑的。而且，当时“白屋”也一直来都经常有人出入，成为杭州党团创建时的重要办公场所。

**二、浙江籍早期党员在杭州党团组织创建中起到了什么的作用？**

从现有的资料看，杭州籍或在杭州学习工作过的先进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党的一大召开前，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有成员 17 人，其中杭州籍或在杭州学习工作过的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定一等 4 人。浙江籍的还有邵力子等人，那么这些人对杭州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参与了什么工作呢，或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作为党的早期成员，俞秀松为杭州党团组织创建作了重要的贡献，不仅在杭州成立了最早的团组织，还积极向党组织推荐人员，促进党组织的壮大。在杭州建团过程中，俞秀松还和宣中华等“一师”校友一起在杭州太平门外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夜校学生都是黄包车夫、泥瓦木匠、机织工人和附近的菜农，开学时有五六十人。所学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反封建礼教、实行男女平等、团结就是力量等。俞秀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解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道理，鼓励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同旧社会的恶势力作坚决的斗争，并吸收了其中一些先进分子成为杭州团组织成员。

1922 年 5 月 1 日，俞秀松以杭州团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与蔡和森、施存统一起负责团中央日常工作，但仍然关心杭州的党团组织建设。6 月 7 日，青年团杭州支部扩大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曾为

“一师”学生的庄文恭任书记。

陈望道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杭州的党团建设，但也向党组织推荐了一批人才。如富阳入党第一人华林，就是由他介绍到上海的外国语学社学习并到苏俄留学，随后加入共产党。回国后，华林参与杭州党团组织的建设，先后担任杭州党团组织的重要领导人，是宁波地委的第一任书记，他还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团的三大、中共江浙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为候补代表出席了党的五大。

施存统也没有直接参加杭州党团组织的建设，但作为当时团中央负责人，他直接领导了杭州团组织的创建。而且他在浙江一师读过书，在《浙江新潮》发表的《非孝》直接引发了“一师风潮”。第一批 27 名团员中，很多曾是一师的学生，如宣中华、徐白民等，这些人都与施有过交集，应该说他也为杭州党团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邵力子也没有直接参与，但他也作了贡献。1921 年 12 月，徐梅坤为避开迫害离开衙前到了上海，就是通过早年结识的邵力子，进了上海《民国日报》印刷厂当临时工。不久由陈独秀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江浙地区第一位工人党员，直接领导杭州党小组的成立。

那么萧山的沈定一又在杭州早期党团组织创建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其实他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如在组织衙前农民运动中，为了迅速建立农民组织，他独资创办衙前农村小学，作为开展农民运动的基地，邀请浙江一师和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进步师生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杨之华等来校任教，以学校为阵地帮助农民学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引导青年学生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发动农民，筹建农民协会，主张“农民自决”。后来，这些师生很多都成为党团员，为党团员队伍扩大和建设打下了基础。他还和徐梅坤等一起，指导绍兴农民骨干先后在前梅、钱清等地组织 50 个乡村农民协会，有力地推进了衙前农民运动，是衙前农民运动的重要精神支柱。可以说他为杭州党团组织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另外，他也直接参与杭州党团创建的一些工作。如 1922 年 7 月 28 日，团杭州地委报告第三号中的第四点明确提出“本

地方团根据杭州现象，施行一服‘兴奋剂’，发起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地点——皮市巷三号，现请玄庐起草章程。成立后，再行详告”[①]。，文中所说的“玄庐”就是沈定一。这说明，当时沈定一应杭州团地委之邀专门起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章程。由此可见，沈是参与了杭州党团工作的。报告的时间与杭州党小组成立的时间也较为相近，不久，徐梅坤就到了皮市巷 3 号进行党组织的创建。作为省议长的沈定一也可以为杭州党团组织的活动提供一些便利，当然这些还有待相关史料的佐证。

综上，浙江籍早期党员为杭州党团组织建设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一是他们直接组织或间接推动了杭州党团的创建；二是他们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参与党团建设的人才；三是他们为全国党团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地贡献。

### 三、杭州早期党团组织对全国党团组织建设的作用有哪些?

1922 年 9 月，杭州党小组成立。1923 年春，中共杭州小组在发展了徐白民、唐公宪、何赤华、倪忧天等人入党后，扩建为中共杭州支部。1925 年 8 月，中共杭州支部更名为中共杭州独立支部。1926 年 1 月，中共杭州地委建立。这一时期，杭州党组织的机关驻地随着主要领导的调整，从皮市巷 3 号到马坡巷，即浙江法政专门学校，再到大塔儿巷 21 号，再到皇诰巷 24 号。同时，早期的党团组织的成员很多既是团员又是党员，如俞秀松、金佛庄、宣中华、庄文恭、华林等。他们对党团两边的工作都有兼顾，都作出了贡献。那么杭州早期党团组织对全国党团建设的作用有哪些呢？结合史料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教育，培养输送人才。早期杭州党团很多成员的职业与教育相关，或参与教育活动，所以在教育培养人才方面有优势。他们利用自己的职业与特长，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启发民众，培养了大批的人才。杭州自身的党员数量也从 1922 年 9 月的 3 人到发展到 1927 年 4 月的 4000 余人。

---

①中央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年——1926 年)》，1985 年，第 11 页。

如，兼任团杭州地委会计的安体诚，利用杭州法政专门学校任政治经济学教授的机会，在授课中，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同时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后来，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第五组即杭州组组长、杭州独立支部书记、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发行主任等职。而宣中华、俞秀松、施存统、何今亮（汪寿华）、谢文锦、杨贤江、叶天底（叶天瑞）、梁伯台、王贯三、徐白民、韩伯涛、庄文恭、郭静唐、寿松涛、张本芝、宋庆祥、唐公宪、魏金枝等“一师”学生，不仅是建党建团时期的骨干，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了党团领导人。所以说，杭州党团组织的创建，不仅为全省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各地党团组织培养输送了大量人才，也为全国党团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俞秀松、宣中华、施存统等人作为全国党团领导人，为全国党团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杭州团组织成立后的皮市巷 3 号，作为团地委工作地点，经常有报告会、讲演会，许多青年在这里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明确了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唯一出路等革命道理，从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又如，1923 年春，由徐梅坤介绍入党的唐公宪，不仅与徐白民、何孟英等到绍兴发展新党员，建立起中共绍兴地区第一个党支部，还代表团杭州地方组织出席团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 年 11 月，唐公宪到上海和邵力子、俞秀松等人一起参与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12 月，促成会如期召开，唐公宪在会上作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宗旨”的讲演，推动 1925 年 3 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举行，也推动了全国的国民运动和革命。

在早期杭州党团组织中，很多人后来都走出杭州，走向全国各地，推动各级党团组织建设。如俞秀松、安体诚、黄中美、谢文锦等。1922 年 8 月，俞秀松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赴福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工作，担任东路讨伐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一等书记官，实际任机要工作，并参加广州战役，是我党最早参加军队与作战的军事工作先行者。1925 年 10 月 28 日，俞秀松第二次赴苏俄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当天亲笔签名给中共旅莫

支部的信中，告知此行进中山大学学员人数 103 人，途中由 5 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中央指定负责人为俞秀松，任书记。1935 年 6 月，联共 ( 布 ) 中央决定，以俞秀松为组长，张逸凡 ( 万献廷 ) 为副组长的共 25 人组成的小组进入新疆。俞秀松从伯力到莫斯科报到的逗留时间，受到斯大林的亲切接见，并接受具体指示。1927 年 2 月 22 日，上海工人在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下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徐梅坤担任了南市区工人起义总指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徐梅坤又护送周恩来到码头登上长江英商“怡和”号轮船离沪。像安体诚，他后来到了黄埔军校，先后担任政治教官、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共党团干事、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主编《黄埔日刊》，并兼任广州劳动学院教授、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等职，为全国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诸如此类，足可见早期杭州党团成员在推动全国革命和党团建设中的作用。

二是服务中央，做好党刊发行。杭州因地理和人员等关系，与上海的领导集体又有许多的交集，能够很好的贯彻落实中央的要求，做好中央相关工作的服务，特别是在党刊发行等方面，做了较为重要和突出的工作。党自成立之日始，就对党报党刊工作就给予高度重视。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一切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论中央或地方出版的一切出版物，其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①] 早期的杭州党团组织为此作出重要的贡献。1923 年 1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中央报刊、书籍的编撰和宣传教育工作，杭州早期党团组织成员徐白民和罗章龙、恽代英等为委员。第一次会议决定统一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发行事宜。原在上海南市民国路小北门设立上海书店，经整顿后，由徐白民任上海书店经理，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建立全国书报刊物发行网，杭州法政专门学校安体诚则作为地方负责人。

---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2 册，1979 年( 内部出版 )，第 200 页。

在中共中央早期的机关刊物《向导》发行上，杭州更是作出了重要贡献。《向导》是在西湖会议上决定的。在此次会议上，明确蔡和森担任主编负责刊物，并明确了刊物的名称和刊期以及经费等问题。另外，徐梅坤受党中央指派，利用工作之便，负责《向导》印刷发行工作长达 2 年之久。《向导》发行后，由于反动军阀的政治迫害，不断更改发行机关。如第一期至第三期，总发行所为上海老西门肇嘉路兰发里三号，徐白民为发行人。第二十六期，改由杭州马坡巷法政学校安存真（安体诚）转。第二十九期，杭州发行处因故撤销。第三十期至第三十三期，又取消州发行处，恢复杭州原址。第三十四期撤销杭州发行处。第四十四期起，又恢复杭州原址。从《向导》发行不断变更地址，足可见其处境的艰难。因为，各处发行地址，大多数都被军警机关搜查过，杭州法政学校就常为此遭到检查，发行人也受到侦缉。当然，上述史实也反映了，杭州为中央刊物《向导》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另外，在党的交通上，杭州党团组织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如当年中央特别经费案中，运送线就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杭州为其重要的中转站。又如，曾担任艮山门车站党总支书记的赵刚（后曾任杭县县委书记），他的公开身份是火车站的行李司磅，实际上他参与了党内重要文件物资传送工作，还接送过很多的党团领导人，如方志敏等人。

三是致力统战，推动国共合作。杭州党团组织积极贯彻中央的统战方针，特别是有力地推进了浙江的国共合作。1924 年 3 月，安体诚任中国国民党浙江省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12 月，任浙江省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参加领导杭州的国民革命运动。1924 年 1 月，俞秀松任中共上海、杭州地方书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常委，中共党团书记。响应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倡议，与邵力子、陈望道等一起起草《我们所要的国民社会主义是什么》，指导全国开展国民会议运动。

1924 年初，宣中华服从党的决定，参加了国民党，并接受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指派，在杭州做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各级党部的工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期间，宣中华作为浙江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会后，

他以国民党筹备浙江省党部负责人之一的身份，根据党的指示和国民党“一大”精神，来往于上海、杭州之间，奔波于浙江各县市，进行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及各级党部的工作。在宣中华等人的努力下，临时省党部于 3 月 30 日宣告成立，宣中华被选为 9 个临时执行委员之一。接着，宣中华开始着手领导各县市开展建立党部的工作。杭县、萧山、宁波、绍兴 4 县市临时党部先后成立，平湖、海宁、临海、永嘉等县筹备员也先后派出。到国民党“二大”时，浙江已有 23 个县建立了国民党的组织。大量工农分子和青年加入了国民党，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这不仅壮大了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巩固和发展了统一战线，也大大推动了反帝反封建革命高潮的到来。

宣中华等杭州早期党团员不仅是推进革命的优秀组织者、宣传者、推动者，也是发动工农群众运动的实干者。1926 年 3 月，宣中华当选为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团书记，负责省党部的全面工作。同年 12 月，他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与中共杭州地委共同领导浙江人民掀起自治运动，有力配合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战争。在配合北伐进军中，沈干城和沈乐山等人秘密组织了“铁道兵团”，开展随军服务支援北伐军进攻上海，并且组织团员和道班工人赶制了铁甲车，还取名“中山号”，为北伐胜利作出了贡献。总之，在这一过程之中，党充分借助国共合作的契机，开展国民革命，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风暴，极大地扩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余论**

对于杭州党团组织创建史，还有许多值得考证与研究的地方，如早期成员之间的关系，人员思想分化的原因；大革命发展与杭州党团组织的关系及相关经验总结，以及相关影响等等。特别是杭州党小组的成立时间考证，都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以彰显这段不平凡的

# 浅议中共杭州党小组的诞生及其历史意义

◎朱淼水[①]

**内容提要：**1922年9月，中共杭州党组织的诞生，不仅是杭州自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也促进了浙江全省党建工作的开展，使浙江全省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大精神，以及后来的党的三大、四大精神，带领广大革命者开展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革命斗争，推动了杭州乃至全省国民革命运动的展开。

**关键词：**中共杭州党小组；诞生；历史意义

## 一、中共杭州党小组的时代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首先健全了党中央的组织机构，建立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并着手各地党建工作的开展。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就各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军阀混战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前途在哪里？中国共产党人抱着为推翻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信念，在革命实践中开始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并不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首先要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以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也认识到，共产国际必须指导已经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国家，首先完成推翻外国资本主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这对刚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正确把握中国革命前进方向起到了重要作

①作者简介：朱淼水，男，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退休干部。

用。因而，党的二大制定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从这个最低纲领出发，通过扩大党的建设，扩大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首先取得民主革命的成功，才有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所以，党的二大提出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党的内部必须要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要求每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议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共产主义者。由此，通过了主旨为民主集中制的第一部党章。

党的二大结束不久，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建议，于 1922 年 8 月底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一次特别会议，正式确立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的决定。同时在广泛开展工人运动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加强工人运动的同时，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国，加强党对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领导，并在斗争中不断壮大党的队伍，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 二、中共杭州党小组的建立

1921 年年底，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上海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最早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至次年 7 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上海地方执委兼区执委），领导上海与江苏、浙江两省的工作。委员会由徐梅坤、沈雁冰、俞秀松三人组成，徐梅坤任书记。

徐梅坤萧山长山镇（今属新街街道）人，因家贫，10 岁出门当商店学徒，稍长后进入浙江贫民习艺所，并领导习艺工人罢工后遭到通缉，回乡后正好遇到了衙前农民运动的展开，他先到了南钱清外婆家观察了农民运动开展情况，后又回到长山开展以对折减租的斗争。但这场运动至年底被军阀政府武力镇压，他经人介绍到了上海，进入由早期党员邵力子负责的上海《民国日报》印刷厂做了排字工人。因他既有过开展工人运动，又参与过衙前农民运动的经历，引起了因工作关系经常到该厂的陈独秀的关注，并于 1922 年初找他谈话，并由陈独秀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江浙地区第一名工人党员。

因徐梅坤在贫民习所工作时曾由浙江一师学生钱耕莘帮助下创办过《曲江工潮》的小报，以及开展了其他反对资本家压迫等斗争，对杭州的地情、政情比较了解，所以党的二大结束后，他首选杭州发展党的地方组织。

当时通过组织关系，中共北京地方执委调派了一批骨干到外地开展建党工作，其中由李大钊介绍入党、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部主任的于树德来到杭州，被聘为浙江法政学校教员，并与上海地方执委兼区委接上关系。徐梅坤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物色到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驻沪杭铁路特派员、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闸口机厂当钳工的沈干城，并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又找到了原在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已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任连副的金佛庄转为党员。

1922 年 9 月初，徐梅坤选择杭州皮市巷三号，此地是原浙江一师教师刘大白的居所，也是浙江一师学生的活动地，徐梅坤召集了以上三人，在此庄严宣布中国共产党杭州党小组正式成立，党小组组成成员有树德任、金佛庄、沈干城，于树德任组长。党小组隶属上海地方执委兼区执委，是当年浙江省最早建立的中共地方组织。其间，党中央也曾派党员庄文恭到杭开展过建党活动。[①]1923 年春中共杭州党小组发展了徐白民、唐公宪、何赤华、倪忧天等人入党后，扩建为支部，于树德任书记。

中共杭州党组织的诞生，极大地提升了党的革命工作的展开。金佛庄参加了团杭州地委组织的杭州青年协进会及其编辑出版的《协进报》半月刊工作，并在团杭州地委的安排下，承担公开发行的《浙江民报》的编辑工作，同时又为杭州《嘉言报》等进步报刊撰写文章，宣传新思想，抨击封建军阀的统治。

沈干城于 1922 年 10 月创办了工人自修夜校，亲自担任国文教师，并动员有文化的工人任教，通过夜校学习，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

---

①据庄文恭解放后历次填写的履历表和多次回忆，以及他所写的回忆资料均谈到：1922 年 7 月，他从苏联回国后，立即根据中央的意图，于 9 月上旬到杭州建党，曾组织了一个直属中央的中共杭州支部书记，并担任书记职务。他在杭州活动一个月，接上级通知回上海任职，组织消失。

党员倪忧天利用担任杭州文化印务局协理的身份，组织武林、弘文印刷厂和《全浙公报》的排字工人50余人，于1923年3月，在琵琶街文化印书局楼上，发起成立了“杭州印刷工人俱乐部”，倪忧天任部长。该部以“联络感情、增加知识、促进道德、完全人格”为宗旨，不久，成员发展到150余人。俱乐部还设有“新文化报刊贩卖部”，除公开向社会出售《新青年》等传播新思想的书刊外，还秘密出售《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

1923年5月，于树德、金佛庄作为党的三大列席代表去了广州，上海地方执委兼区执委即派党员安体诚到杭，接替于树德任杭州支部书记。安体诚还接受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编辑部的委托，用“安存真”之名，作为该刊在杭州的发行人，并在受聘的浙江法政学校任教的有利条件，以该校为联络点和《向导》的发行通讯处。

党员何赤华于1923年6月，受徐梅坤的委派到绍兴开展组织工作。7月成立了绍兴党团支部，隶属于上海地执委兼区执委领导，何赤华任书记。

中国共产党杭州党小组的建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杭州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它给深受压迫和剥削的杭州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也为此后开展更广泛的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三、中共杭州党小组建立后开展的活动

1、全面贯彻党的二大决议，旨在开展民主革命和实现国共合作。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党中央曾想让沈定一参加三大，但因他对党不够重视农民运动等方面有意见，第二次代表大会请他参加而未参加，当时的沈定一还在热衷于军阀省督卢永祥在搞的省宪自治，企图退党，但中央仍想挽留他，没有把他开除出党。党的三大通过《国民运动决议案》后，全党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在此形势下，由于孙中山在与中共商定后，建立了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代表团去莫斯科考察，党中央便决定沈定一与张太雷代表共产党参加了这次考察。这次考察使沈定一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联社会现实的教育，表示不退党，

服从党中央的安排，并于是年底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①] ②

1924 年初，党中央决定由沈定一负责召集在浙江的国民党员和部分革命者，在西湖刘庄召开会议，选举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除沈定一、戴季陶、杭辛斋为指定代表外，另选举了国民党员戴任、中共党员胡公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宣中华为正式代表。会议还商定了议案，请沈定一代表浙江国民党将议案提交大会审议。

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隆重召开，出席开幕式的代表共 165 人，其中共产党员 23 人，尽管人数不多，但在大会上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共中央讨论了派遣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中央和各省组织的人选问题，决定派遣李大钊、张国焘等 9 人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林祖涵（林伯渠）、沈定一等参加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各省市党部委员由国共双方经地方党部决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级工运干部，原则上不参加国民党。依此原则，中共中央向孙中山提出了参加选举名单。选举结果浙江籍代表戴季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沈定一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2 月 4 日至 6 日，国民党召开一届一中全会，决定派遣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分赴各重要区域组成地方执行部，发展各地党务。其中由中央执委胡汉民、汪精卫、叶楚伧、于右任、张静江和候补执委毛泽东、邵元冲、茅祖权、瞿秋白、沈定一等 10 人组成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管辖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的党务。2 月 25 日，上海执行部宣布成立，浙江籍的施存统、沈泽民、胡公冕、张君谋、杨之华等曾在执行部任职。在上海执行部的直接领导下，浙江国民党组织的筹备工作迅速开展。1924 年 3 月初，根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上海执行部决定，由沈定一担任国民党浙江支部筹备员，会同在浙江的宣中华、俞秀松等，着手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各级地方党组织。

经过对老国民党员的登记甄别，同年 3 月 30 日，在中共党员的帮助下，

---

①参见蔡和森于 1926 年编写的中共党史。杭辛斋因病未出席，临时改选张君谋出席，结果他也没有到会。

浙江省国民党员会议召开，宣中华传达了国民党一大精神，俞秀松报告了浙江省国民党党部筹备处工作情况，沈定一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进一步阐明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以及中国国民党章程要点，包括国民党的历史、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纲的内容和意义，以及国民党总章中有关纪律、组织等问题。会议选举产生了浙江临时省党部组成成员，宣告中国国民党浙江省临时省党部正式成立。沈定一、宣中华、戴任、沈尔乔、沈肃文、俞秀松、安体诚、经亨颐、陈廉斋等九人当选为执行委员；倪忧天、刘无畏、陈为人、应山三、唐公宪等 5 人当选为候补执委。[①] 在当选的 14 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沈定一、宣中华、俞秀松、安体诚、倪忧天、陈为人、唐公宪等 7 人为跨党的中共党员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他们在临时省党部中起着骨干作用。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的建立，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实现。

临时省党部的建立后，浙江的国民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当时统治浙江的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了抵制直系军阀入浙的意图，希望得到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南方革命势力的支持，因而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组织及其活动，没有采取强硬态度，加上孙中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使国民党组织在浙江能够公开或半公开地活动，临时省党部利用这一有利条件，遵照国民党中央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各省党务进行计划决议案》，选择重要城市、区域，开展国民党的组织工作。自 1924 年 4 月至 1926 年 1 月，全省建立国民党组织的正式县（市）党部的有杭县（今属杭州市区）萧山、绍兴、宁波、永嘉、海宁；建立临时县党部的有平湖、嘉兴、奉化；建立区分部的有镇海、象山、诸暨、富阳、嵊县、浦江、临海、吴兴、天台、兰溪、建德、定海、昌化（今属临安）、桐乡、仙居、金华。此外，还有直属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吴兴南浔区党部。全省共有国民党员约 2000 余人。这些组织在刚成立时均能够推行民主革命的三大政策，扩大革命力量，从而推动了各地区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

2、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在各地的发展和壮大

---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4 年 4 月 1 日地方新闻。

国共合作之初，中共把主要精力用于帮助建立各级国民党组织，这就极大地影响了中共地方组织的自身发展。1924 年 5 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纠正了上述错误倾向，看到了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矛盾，认识到从国民党的社会成分及历史关系来分析，在客观上是不能有严格的集中主义及明显的组织形式。因此提出“凡在可能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①] 同时明确指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我们的职责在于训练产业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基础。中共上海地委检查了在发展党员工作上的迟缓问题，并要求各地开始注意发展党的队伍。自此，浙江全省的党员人数开始较快地增加，从而使党的力量逐步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如杭州的党员在 1923 年 10 月，因部分党员根据工作需要调离了杭州，在杭的党员只有 5 人。为此，经上海地委兼区委研究决定，将杭州党员编为中共上海地委第五组，组长安体诚。1924 年 1 月，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讨论通过了宣中华、戴任两人加入党组织，将杭州小组恢复为中共杭州支部。1924 年 4 月上海地委兼区委改为上海地委，杭州支部改属中央直接领导。嗣后，杭州支部在斗争中尽可能地培养和发展党员，特别是在铁路杭州闸口机厂和艮山门车站的工人中发展了多名党员。至次年 9 月杭州支部更名为中共杭州独立支部，共有党员 18 名，下辖闸口、省党部、大江、金华 4 个支部，并指定了余姚、建德、余杭、奉化等地的通信员，并在所在地开展工作。

其他的主要城市，绍兴于 1924 年 4 月成立地方支部，归属中央直接领导。后绍兴支部一度改建为绍兴地委，下辖 23 个支部，以及国民党绍兴县党部中共党团。宁波于 1924 年下半年开始，在张秋人和徐梅坤的努力下，发展了杨眉山、许汉城等加入党组织，1925 年二三月间，由上海地委决定成立了中共宁波支部。至是年底宁波支部共有党员 64 名。1926 年 1 月，徐梅坤到宁波开展工作，将宁波支部扩建为宁波地委，下属支部发展至 7 个，有党员 113 名。

---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4 年 7 月 24 日

浙南地区，中央派谢文锦于 1924 年 8 月回温州老家开始筹建党团组织，通过多种形式，发展了郑恻尘、胡识因夫妇加入中共组织，至同年底成立了温州独立支部， 由中央直接领导。嘉兴的建党始于 1924 年夏， 中共党员顾作之受上海地委指派回家乡嘉兴从事建党工作，至 1925 年底共有党员 9 名，建立了嘉兴独立支部，发展工作扩展至桐乡、崇德等县。1926 年 4 月嘉善建立了中共枫径独立支部，有党员 40 名，直属上海地委。金华地区于 1925 年秋，金华七中师范部学生千家驹由宣中华介绍加入中共组织。又通过千家驹的努力发展党员，建立了隶属杭州独立支部的的金华支部。①

3、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展

在全省中共组织发展的同时，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23 年 9 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团杭州地委进行改组和支部的划分。当时共有团员 23 人，下辖 6 个支部。1924 年 3 月发展到 33 人，因负责人调动频繁，杭州团地委曾有数次改组。1924 年 6 月，俞秀松奉命调查考察杭绍甬国民党党务工作，检查了绍兴、宁波两地团组织。1925 年 1 月，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决定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撤销团江浙皖兼上海地委，杭州、宁波、绍兴的团组织均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归属团中央领导。但直至大革命期间，浙江和杭州的团组织还没有普遍建立。革命青年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走在反帝反封建军阀斗争的前例，发挥了重要作用。

4、推进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

⑴ 1924 年的五一纪念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由杭州劳工协会提出纪念五一节的提议，国民党浙江临时省部、杭州印刷工人俱乐部、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等 20 多个团体纷纷响应，成立了筹备处，印发了大量传单号召工人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为口号，与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开展斗争。5 月 1 日，杭州 2000 多工人

---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 1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第 196 页。

在杭州湖滨公众运动场举行五一节纪念大会。会场上竖起了纪念大旗，四周插满了无数小旗，上面写着“工人参加国民革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男女工资平等”“打倒军阀”“反抗帝国主义”等口号。充分体现了党在当时的政治主张。大会由宣中华任主席，报告了筹备经过及纪念五一节的意义，号召劳动者联合起来保护自身利益，反抗资本家及一切剥削阶级的压迫。沈定一、张秋人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先后登台演讲。演讲结束后，与会者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邵季昂任指挥，以红色的“五一纪念”大旗为先导，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沿街群众热烈响应。

当天，宁波、绍兴、平湖等地也有上千工人在国共两党的组织下，冲破军阀政府的阻挠，举行游行示威。这次五一纪念活动，是大革命运动高潮前夕，浙江和杭州第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不仅使广大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受到深刻教育，也显示出党的强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

1925 年初，由于受江浙军阀为争夺在沪利益而展开的战争影响，杭州的传统丝绸业产销受到阻，工人工资对折发放，丝绸工人多次交涉无效，于 2 月 15 日起开始实行同盟总罢工，参加者达 1 万余人。与此同时，上海日资内外棉八厂工人因日本领班毒打童工，开除男工，引发罢工工潮。消息传来，中共杭州支部指示杭州劳工协会致电上海罢工工人，以示声援，并通电全国各工团及全体国民，“一致以反对东洋的资本家之口号，为联合阵线之奋斗，庶几可与侵略者以严重打击，否则，吾工友既将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全民族亦复受莫大侮辱矣。”[①] 自此，杭州丝绸工人由经济斗争转为政治斗争。至 3 月初，资方被迫答应工人要求，罢工取得胜利。

同年 4 月，萧山临浦镇也爆发了农民捣毁米行的斗争。该镇米市米价向以执浙东乃至上海之牛耳。每年青黄不接之际，奸商总会囤积居奇，哄抬米价，农民们不堪奸商压榨，自发召集 600 余人，捣毁了该镇所有米行米店，迫使奸商恢复平价。

---

①上海《民国日报》1925 年 2 月 20 日。

⑵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为主旨的全国性革命青年运动。1924 年 2 月，党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上海大学师生为基础，成立了全市性的非基督教大同盟。自此，“非基”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根据党的指示，团中央派恽代英、张秋人到杭州等地进行反帝宣传。杭州团地委也发起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杭州支部，展开“反对奴化教育”“收回教育权”的宣传活动。

在这场斗争中，英帝国主义在杭州开办的广济医药专门学堂学生的斗争行动，具有较大影响。1925 年 6 月 3 日，广济医专的学生为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准备全体上街游行。校方竟然以开除学籍相威胁，不准学生上街游行。爱国学生不顾一切地冲出校门，向社会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呼吁市民团结一致参与反帝斗争。次日，校方竟然开除参加游行学生，激怒了学生。他们当即商定，凡为爱国行动，不管发生什么事件，全体一致行动。5 日，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学生、团杭州特别支部组织干事俞晓舫向杭州学生联合会汇报了上述情况。在地方党团组织和学生联合会的协调下，决定由浙江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增加班级，接收广济医专的离校学生。离校学生手执“打倒帝国主义”“收回教育权”等小旗，集体离校转入浙江公立医专。

该事件发生后，杭州的“非基”运动进一步高涨，影响到其他一些地方学校，强化了广大青年的民族意识，也使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深刻的反帝教育。

⑶响应促成国民会议运动

1923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是，并强调“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①

1924 年 10 月 23 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77 ~ 178 页。

政府，北方出现了皖系军阀段祺瑞、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冯玉祥三派暂时联合局面。此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建立共和政权。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统一大计。11 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上，并于 10 日发表《北上宣言》，提出扫除军阀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目标，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并须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①②

1924 年 11 月，中共杭州支部组织 17 个团体，发起成立了浙江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期间，孙中山特派沈定一为浙江省国民会议宣传员，与统治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会谈，解释北上主张。12 月中旬，在中共杭州支部的组织下，机器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以杭州工人协会的名义，发表了促成国民会议意见书，主要内容包括：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列强在中国的一切强权，收回海关与关税权；军政属于国民会议，废除督军制度，民选省、县长；……废除一切剥削压迫工人的法令及包工制度，制定劳动法规……。此意见书在各报刊刊登后，影响极大。

1925 年 1 月 4 日，筹备会在杭州召开会议，正式成立浙江省国民会议促成会，推选宣中华、俞秀松、安体诚等为委员。会议提出“一致促成国民会议召开”，“反对善后会议”、“民众赶快起来，力争自己的利益”等口号，制定了宣传大纲，并要求全省各地均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然而北洋军阀的段祺瑞政府为了抵制国民会议，准备召开“善后会议”，企图以假和平的手段欺骗民众。中共杭州支部书记安体诚以“青年协进会”的名义通电反对，并组成由安体诚、孙斌、黄文霞、周百强等为代表的浙江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团，赴京参加计划于 3 月 1 日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

遗憾的是，正当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之际，孙中山先生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在京病逝。嗣后，又掀起了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活动。

无论是国民会议促成运动或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活动，萧山全县在国共

---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第 305 页。

合作的国民党萧山县党部的领导下，有序地展开。

⑷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声援五卅惨案运动

是年 5 月底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激起了每个中国人的愤恨。31 日下午，宣中华受上海地委兼区执委的指派，在杭州召集各界人士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会上通报了五卅惨案的经过详情，号召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中共杭州支部连夜召开会议，决定统一指挥，分头负责，发动群众罢工、罢市，以响应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与此同时，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发出动员令，号召全省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立即声援五卅运动。

6 月初，杭州安定、崇文、工业、蕙兰等校学生，先后来到萧山县城，向民众宣讲五卅惨案经过，控诉帝国主义暴行。接着他们分头到义桥、临浦等集镇宣传募捐。杭州工业学校学生钱启忠，在途中轮船上不慎落水身亡，为五卅运动献出了青春。

在强烈的爱国激情感召下，县城各校师生迅速行动起来，自发组织起临时联合会，于 6 月 12 日、13 日举行罢课，并分队上街游行示威，举行演讲、募捐，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抵制仇货！”“与帝国主义经济绝交！”等口号，临浦、义桥等地学校师生，也纷纷组织游行，散发传单，宣传上海工人群众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全县很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五卅运动在萧山持续了两个多月，极大地促进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深入人心，是萧山现代革命史上自衙前农民运动后，声势最为浩大的一次爱国运动。

杭州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促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觉醒，对杭州革命力量的壮大和地方组织的发展，对国共合作后杭州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 四、中共杭州地委的成立

随着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在帮助国民党建立省市各级组织的过程

中，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人民群众中得到广泛宣传和传播；党在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的斗争中也得到了锻炼，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从而使党组织有了长足发展。1925 年 8 月，曾一度划归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共杭州支部重新划归上海区委领导，并更名为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不久安体诚调离杭州，华林接任独立支部书记。党的四大以后，杭州地方党组织开始注重在斗争中培养和发展党员。10 月，沈干城秘密发展翻砂工人钟鼎祥、钳工洪德生入党，组成中共沪杭铁路独立支部；不久又发展艮山门车站行李员赵刚、闸口机厂车房司炉方仁郎入党，铁路党小组扩建为中共闸口支部，书记余怀茂。至 1925 年底，杭州独立支部在五卅反帝反军阀中获得新的发展，党员已经发展到 30 余人，市区下辖闸口支部、省党部支部、大江支部 3 个基层组织，并向建德、余杭、绍兴、奉化、余姚盐场等地派出通信员，分头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外埠党小组也有所发展。1925 年秋，金华七中师范科学生千家驹在五卅运动中由宣中华介绍入党，千家驹又先后介绍 5 名同学入党，成立了中共金华支部，千家驹任书记，隶属杭州独立支部领导。

在上述基础上，1926 年 1 月，中共杭州地委成立，下辖安定中学、工业专门学校、省立一中、医药专科学校、英文专修学校、铁路工人、闸口机厂联合支部等 7 个支部及金华等外埠党组织，共有党员 60 人，上海区委派顾作之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宣传工作由允秉负责，工人运动由沈干城负责，农民运动由张寅仲负责。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由于顾作之为国民党党务经常奔波于杭嘉湖之间，地委书记曾暂时由张寅仲代理。7 月，上海区委根据杭州党组织现状，决定进行组织调整，派贺威圣担任杭州地委书记。在杭州地委的有力领导下，外埠党组织继续发展。8 月，千家驹等到武义发展了 6 名党员，成立了中共武义县支部，李守初任书记，下辖 8 个基层组织；9 月，中共宁海中学支部成立，由蒋如琮负责；同年夏秋间，中共杭州地委先后派屠仰慈、张寅仲到海宁建党，10 月，成立了中共硖石支部，居天籁任书记。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不断地深入发展，同时，以宣中华为核心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挫败了在萧山沈定一家里召开的企图分裂国共合作，

企图排斥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的所谓国民党浙江省临时省党部全体会议（史称“衙前会议”），企图以戴季陶的右派主张，篡改孙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义”，另立右派国民党省党部反动行径。宣中华在中共上海区委、杭州地委的领导下，在海宁硖石召开了东山会议，全面挫败了以沈定一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并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了沈定一等在浙江破坏国共合作，另立国民党伪中央的阴谋，成立了以宣中华为核心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呼吁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夺取国民革命的全面胜利，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舆论和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的建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杭州乃至浙江全省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它给深受压迫和剥削的的杭州和浙江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是中国共产党人贯彻党的二大、三大、四大精神的结果，并在斗争中由 3 名代表组成的党小组，至大革命前夕的 1926 年 10 月发展到全市共有 16 个基层支部、中共党员 100 余名的地委组织。[①] 为 1927 年 2 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浙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使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历史使命，在实践中懂得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即“布尔什维克化”的重要性，以及重视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在加强思想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党的队伍的重要性，提出了“务使本党更加发展，征集更多的革命工人农人与知识分子”。陈独秀致信全国各级中共党部负责同志，指出：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党员数量上的增加，乃是第一个重要问题。”由此，使党的队伍在党五大前全国党员发展到 41200 人，并涌现出一大批党的各级优秀指战员，为日后夺取党在民主革命全面胜利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②]

---

①参见《中共杭州党史》第一卷 96 页，及《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 170 页（仅供参考，具体应以组织史为准）。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236 页。

# 中共杭州小组与闸口机厂工人自修夜校研究

◎张其梅[①]

**内容提要：**中共杭州小组承前启后传播马列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发展党员、发展党的组织机构。工运先驱沈干城在沪杭铁路闸口机厂创办工人自修夜校、工人俱乐部，宣传革命道理，物色建党对象，这是浙江最早的工人组织。囿于各种因素，这些当事人老物件和原始史料稀见。本文根据有关党史文献资料及沈干城等同志的光辉足迹，挖掘梳理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发动工人运动，组织工人俱乐部史料，从而为“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汲取历史智慧和力量服务。

**关键词：**中共杭州小组；铁路闸口机厂；工人自修夜校研究

## 引　言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北方分部任沈干城为驻沪杭铁路特派员。1922 年二三月间，沈干城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去京汉铁路、长辛店等地考察职工运动，调查了解建立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的情况。1922 年 5 月，沈干城经人

①**作者简介：**张其梅，男，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兴车务段高铁车站行车车站值班员、车务技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军史、国史。联系电话：13175205091；电子邮箱；13175205091@163.com。

介绍进沪杭铁路闸口机厂（今杭州机务段前身）任钳工（当时称外国铜匠）[①]。1922 年 8 月底，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徐梅坤到杭组建党的工作，亲自发展沈干城为中共党员。9 月，在徐梅坤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中共杭州小组，有党员 沈干城、于树德、金佛庄 3 人，于树德任组长。10 月，沈干城在闸口机厂（今杭州机务段前身）办起了工人自修夜校，并自任语文老师，宣传革命道理，物色建党对象[②]。之后，在工人自修夜校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人俱乐部（沪杭铁路工会的前身）。

中共杭州小组的成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浙江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是浙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浙江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刚刚起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浙江的推进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从此，中国共产党分别在宁波、嘉兴、绍兴、海门（今椒江）、温州、金华等地党的组建活动成星火燎原之势。

沈干城是杭州市第一个产业工人的中共党员，研究铁路工运史，沈干城是重点之一。

## 一、弃文从工的革命者

沈干城是一个从出生清贫耕读之家的教书先生，到投身革命的先锋战士。他舍小家顾大家无私无畏地踏上了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征途，最终不惧牺牲、英勇就义，展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与觉悟。

沈干城原名逢甲，又名敬贤，上海县三林塘南沈家宅口人（今属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1989 年生，有弟妹各一人，父亲沈守常，祖父沈懿卿是清末秀才，深受儒学熏陶，一生热心平民教育，在乡里先办私塾，后创办懿德小学。沈干城 8 岁上懿德小学读书，14 岁入三林镇书院，在校品学兼优，

---

①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编：《组织史汇编·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三》（内部发行），1990 年，第 11 页。

②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编：《组织史汇编·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三》（内部发行），1990 年，第 11 页。

受辛亥革命影响，从小崇敬爱国的英雄人物。毕业后，曾留懿德小学任教。1919 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沈干城产生进步新思想，组织学生大会，声援学生罢课游行等爱国行动。在此期间，沈干城接触了《新青年》杂志等进步书刊，在课堂上给学生介绍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1 年，沈干城结识了津浦铁路津浦机厂机匠、该厂“中华工会”会长王荷波。并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编辑部主任张特立(国焘)认识，随后，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罗章龙取得联系，担任该部驻沪杭铁路特派员。他经常来到沪杭铁路闸口机厂（今杭州机务段前身），以看望同乡顾玉堂、陈天民等为名，向他们了解铁路工人的要求和生活情况。这时，《北京大学月刊》发表消息，公开征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他前去报名，成为该会会员。

1922 年，受王荷波影响，沈干城决定放下教鞭去当工人，经人介绍成为沪杭铁路闸口机厂（今杭州机务段前身）钳工。

1922 年二三月间，他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遣去京汉铁路长辛店等地考察职工运动，调查了解建立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的情况。1922 年 4 月，京汉铁路召开第一次全路代表会议，沈干城作为沪杭铁路的代表应邀出席。8 月底，由徐梅坤直接发展入党。9 月，他为中共杭州小组成员。

1922 年 10 月，在取得具有进步思想的沪杭铁路闸口机厂（今杭州机务段前身）厂长康巨金支持后，创办了闸口机厂工人自修夜校，聘请了几位老师，自任语文教师，组织工人读书，并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党员。1923 年，京汉铁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该路南段的工会领导人在上海设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沈干城赴沪了解京汉铁路罢工情况，并积极筹款救济受难工人家属和被开除的罢工工人。以后，京汉和津浦铁路派了 8 位工会代表到沪杭甬铁路介绍惨案真相，揭露军阀摧残工会、杀害工人的罪行。沈干城秘密接待这些工会代表，并在他的住

处组织工运骨干和积极分子秘密集会，听取传达[1]。后来，沈干城根据党的决定，参加了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筹备处的活动。接着他又和吴淞机厂工人、中共党员孙津川一起培养工运骨干，组织了秘密工会，开拓了浙江铁路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1924 年 2 月，他遵照全国铁路总工会指示，迅速组织杭州铁路工人集会，开展“二七”惨案周年纪念活动，声讨军阀暴行。4 月，发动和领导了沪杭铁路闸口机厂第一次大罢工，并取得胜利。1925 年 2 月 1 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他被推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五卅”运动后，沪杭铁路闸口机厂在工人自修夜校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人俱乐部。10 月，沈干城任中共沪杭铁路小组长，直属中共杭州支部领导。12 月，任中共沪杭铁路支部书记。1926 年 2 月 7 日，参加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3 月 6 日，他又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国民党浙江省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党部候补执行委员，参与领导浙江省职工运动。1926 年 4 月任中共杭州地委工人部长[2]。并根据中共杭州地委的指示，和陈之一（陈钧）、蒋振东一起筹建杭州总工会[3]。

1926 年 12 月，沈干城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精神，为配合北伐军入浙，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和沈乐山等秘密组织工人武装“铁路工人纠察队”，又以党、团员为骨干，组成“铁道兵团”，率队拆毁杭州至艮山门、嘉兴至石湖荡、笕桥至许村沿线的铁轨，卸去机车主要部件，阻止军阀孙传芳部队乘车逃逸。

1927 年 2 月 14 日，中共杭州地委发动杭州工人起义，沈干城率铁路工人纠察队参加袭击孙传芳残部。17 日，又与沈乐山率纠察队员 500 余人去徐村、

---

① 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编：《英雄谱·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二》（内部发行），1990 年，第 24 页。

② 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编：《组织史汇编·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三》（内部发行），1990 年，第 14 页。

③ 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编：《英雄谱·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二》（内部发行），1990 年，第 26 页。

梵村一带迎接北伐军，杭州当日光复。3 月上旬，北伐军向嘉兴、上海挺进，遭遇军阀张宗昌雇佣的白俄“铁甲车队”顽抗。按地委指示，沈干城与洪德生等党、团员奋力三昼夜，把机车改装成 6 辆“中山号”铁甲车供北伐军使用，在“嘉兴战役”中重创敌军。

1927 年 2 月 18 日，沈干城任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委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夕，他领导沪杭铁路党支部配合吴淞铁路机厂工人斗争多次组织罢工。3 月 19 日，成立“两路罢工委员会”，沈干城任被推选为这次罢工委员会的副总指挥，统一指挥“两路”罢工事宜。1927 年 3 月 22 日，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成立，他当选为总工会副委员长兼宣传部长。28 日，“两路”总工会在沪成立，沈干城被推选为副委员长。

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他继续领导组织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工人举行大罢工。由于叛徒告密，6 月 27 日上午 10 时，沈干城和薛雨霖、钟鼎祥、王汝高、许重平等 5 位执委在总工会会所同时被捕[①]。先后被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浙江陆军监狱、苏州江苏陆军军人监狱、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2 年 10 月，复押回苏州江苏陆军军人监狱。1934 年 9 月 22 日下午 7 时，沈干城终因不堪长期折磨，病逝于狱中，时年 37 岁。沈干城牺牲后，他的遗体由他的妻子陆秋云和胞弟沈逢介运回原籍，埋葬在离故居数十步处[②]。

沈干城是浙江早期重要党史人物和工运史上著名烈士，铁路工运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和王荷波、孙津川一起，当时被誉称为沪宁、沪杭甬两路的“铁道三杰”，他的革命英雄事迹永垂青史。

## 二、中共杭州小组的年轻人

根据原中共杭州铁路分局组织部编著《中共浙江铁路组织史汇编》记载；

---

①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编：《英雄谱·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二》（内部发行），1990 年，第 30 页。

②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编：《英雄谱·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二》（内部发行），1990 年，第 31 页。

1922 年 8 月，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徐梅坤到杭州开辟党的工作。9 月，在徐梅坤组织领导下建立了中共杭州小组，有党员 3 人，组长于树德（杭州政法学校教员）、金佛庄（保定军校毕业生，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连副）、沈干城①。中共杭州小组隶属于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是浙江省最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来杭州发展党组织的徐梅坤是陈独秀介绍入的党。

于树德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 年参加辛亥革命，后入天津北洋政法学堂读书，与李大钊是同学。1917 年毕业，参与组织天津“新中学会”。1918 年考取公费，赴日本留学，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经济，1921 年回国后，在母校担任教员，与老校友李大钊往来密切。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结识了罗章龙等一批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同年 9 月，天津工余补习学校正式开学，于树德任校长。1922 年 1 月，经李大钊推荐，于树德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他将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向师生进行介绍，从中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2 年 3 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部主任。1926 年 6 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8 月，遵照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来杭开展工作，任浙江政法学校教师，并与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接上关系，历任中共杭州小组长，中共杭州支部书记。于树德是我国早期合作社思想的传播者之一，从事合作社工作，对合作社的理论颇有研究。是我国近代信用合作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应毛泽东、周恩来邀请，由南方来到北京，历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

金佛庄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时任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队连副。能文能武，曾协助周恩来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是个党内难得的人才。徐梅坤在当时的党中央委员毛泽东面前推荐过他。1923 年 6 月，金佛庄和于树德被指定为浙江的代表，去广州出席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党内

---

①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编：《组织史汇编·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三》（内部发行），1990 年，第 1 页。

高级别会议，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8 月 5 日，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出席指导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的第六次会议，会议上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密令金佛庄保存自己在军队中的实力，今后可为革命所用①。

沈干城于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年结识了津浦铁路机厂“中华工会”会长王荷波。受其影响，决定弃文从工。同年 11 月 17 日，《北京大学月刊》发表消息，公开征求“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沈干城报名成为该会会员。又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编辑部主任张特立（国焘）认识，随后又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罗章龙取得联系，担任该部驻沪杭铁路特派员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逐渐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发挥着吸引群众扩大影响的作用。设有 3 个特别研究组和 11 个固定研究组，会员共 60 余人。后来会员发展到一百二十余人，不仅有学生，而且有工人参加。研究会成立初成员主要为北大学生，后大量征求会员，尤其是注重吸收进步青年入会。根据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罗章龙的回忆：“研究会为扩大吸收会员采取了很多不同以往的做法，在入会方式上，除在北京的人可直接入会，外地的可以通信入会。征求的对象身份也有所扩大，不仅仅局限于学生，还扩大到工人范围内。解放后，罗章龙找到了一份 151 人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名单，其中有 25 人为工人，且大多是铁路工人，沪杭铁路工人沈干城便是其中之一。”③

1926 年初，中共杭州地委指示沈干城等秘密组织杭州市总工会，沈干城任总工会执行委员，并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精神，为配合北伐军入浙胜利做了大量的艰苦卓绝的工作。2 月 7 日，由李大钊、邓培等主持，在天津召开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沈干城

---

①《金佛庄》，360 百科，https://baike.so.com/doc/9262068-9595708.html。

②《沈干城》，杭州党史与地方志网站，http://hangzhouds.org.cn/index.aspx。

③《【人物春秋】沈干城：浦东中共党员第一人》，上海市浦东新区档案局网站，https://www.pudong.gov.cn/019015003/20211216/275412.html。

在会上作了《沪宁、沪杭“两路”代表团工作报告》。

综上，中共杭州小组的年轻人都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有交集，有往来，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中共杭州小组规模虽小，但战斗力特强，徐梅坤和于树德俩人入党介绍人是“南陈北李”。其中金佛庄、沈干城先后牺牲，他们用鲜活的生命燃起红色火种。百年前，这批年轻人为了共同的目标，有着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走到了一起，改变了自己，也影响了浙江革命的发展。

### 三、稀见史料

1922 年 9 月，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后，一方面积极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机构。

1922 年 10 月，沈干城根据党的指示在沪杭铁路闸口机厂（今杭州机务段前身）办起了工人自修夜校，自任语文教师，宣传革命道理，物色建党对象。1923 年春，中共杭州小组扩建为党支部，于树德任书记，派党员帮助闸口机厂（今杭州机务段前身）建立工人俱乐部（工会的前身），以扩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当时杭州地区党员有所发展[①]。沈干城通过工人自修夜校涌现的积极分子，加以培养考察，发展入党。经常在自己的住所，以及闸口钟鼎祥家里，组织建党对象学习，进一步教育培养。1925 年 8 月 12 日，闸口机厂（今杭州机务段前身）正式建立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同月，由沈干城、余茂怀（后叛变[②]）介绍钟鼎祥、洪德生两人入党。10 月，入党仪式在沈干城住处举行，由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书记华林到场监誓。余茂怀在宣誓仪式上代表中共上海区委宣布成立中共沪杭铁路独立党小组，直属杭州独立支部领导[③]。这是沪杭铁路第一个中共党小组。1925 年 10 月至 1925 年 12 月中共沪

---

① 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编：《组织史汇集·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三》（内部发行），1990 年，第 11 页。

② 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编：《英雄谱·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二》（内部发行）1990 年，第 32 页。

③ 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编：《组织史汇集·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三》（内部发行），1990 年，第 13 页。

杭铁路小组，组长沈干城，党员钟鼎祥、洪德生、赵刚。1925 年 12 月，中共杭州地委成立，遂建立沪杭铁路党支部。共有党员 7 名[①]。

由于中共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存档史料匮乏。本节着重考证沪杭铁路闸口机厂工人俱乐部会员具体参加人数。

一是有关部门为抢救挖掘中共杭州小组史料，曾派人赴北京，采访了徐梅坤的儿子徐昆明、于树德的儿子于传林。通过后代捐赠老照片和老物件，使中共杭州小组史料更加充实丰满。相比沈干城、金佛庄的老物件和文献史料收集难度更大。随着史志部门不断挖掘深入研究，最近又有新发现。据杭州日报 2019 年 12 月 27 日《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新馆即将落成将再现他们的筚路蓝缕“先锋路”》的报道：“..... 史料征集组联系了上海档案馆，并从其官网上找到关于沈干城的介绍，然而照片部分仍是空白。为了获取更多史料，征集组锲而不舍地从档案馆和网络上寻找线索——在网上一个旧书店，工作人员意外“淘”到了一本名为《不朽的战士——浙江革命英烈传》的旧书。这本旧书里记载了包括俞秀松、张秋人等在内的很多早期革命烈士的生平和经历，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其中，就有关于金佛庄和沈干城的具体记述，在与党史正本和相关文章对照后，征集组发现，这对把握两位人物的形象以及找寻线索至关重要。通过这本旧书，征集组发现沈干城在发展党组织和党员上的很多历史细节。比如 1925 年“五卅”运动前不久，沈干城经常组织建党对象学习，进行教育培养，并建立了闸口机修厂工人俱乐部，努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物色建党对象，半年内成员从四十余人增加到了三百余人。同年 11 月，建立了由他负责的沪杭铁路党支部[②]。

二是原中共杭州铁路分局组织部编《中共浙江铁路组织史汇编》一书记载更为翔实，这本《组织史汇编》主要是通过老党员的回忆，查阅有关党的

---

①中共杭州铁路分局委员会组织部党史编写组编：《组织史汇集·浙江铁路党史资料之三》，（内部发行），1990 年，第 12 页。

②《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新馆即将落成 将再现他们的筚路蓝缕“先锋路”》，浙江省文物局网站，http://wwj.zj.gov.cn/art/2019/12/27/art_1641248_41303732.html。

历史文献和参阅省、市、县的党史资料后写成。1925 年 8 月 12 日，闸口机厂正式建立工人俱乐部，全国铁总拨给一定的经费。3 个月后虽然被军阀孙传芳封闭，但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俱乐部主任（称委员长）是曾松林。至 1926 年 5 月，会员达 335 人。这本《组织史汇编》确定沪杭铁路闸口机厂俱乐部会员人数为 335 人，《组织史汇编》党史是原中共杭州铁路分局组织部编著，有绝对的权威性。沪杭铁路闸口机厂俱乐部是在工人自修夜校的基础上发展组建的，是浙江最早的工人组织，也是沪杭铁路工会组织的前身。这本《组织史汇编》党史，给研究浙江早期铁路工运史，浙江铁路早期中共组织发展斗争史提供了翔实的历史依据。

## 结　语

1922 年 8 月，时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徐梅坤到杭州创建党的地方组织发展工作。他受五四运动影响，是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的亲历者，陈独秀是他的革命引路人。1923 年 6 月，徐梅坤出席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候补执委。“坚决跟着党干革命，永不变心！”这是徐梅坤一生不变的初心誓言。他一直战斗在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线，被捕关押长达 8 年多，尽管失去组织联系，但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积极参加狱中的政治斗争，严守党的秘密，经受了长期镣铐加身等酷刑虐待，受到难友们的敬重。1935 年 9 月因重病保释出狱。以后继续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建国后，徐梅坤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参事、监察部参事。1956 年 2 月任国务院参事。1981 年 6 月 8 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已 88 岁高龄的徐梅坤老人，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

于树德 1918 年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经济，1921 年回国后，在母校担任教员，与老校友李大钊往来密切。不久，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是他的入党介绍人。1922 年，他来杭开展党的工作，历任中共杭州小组长，中共杭州党支部书记。他曾经说道：“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及被压迫者，向国际帝国主义侵略者进攻，谋全世界人民的解放！”

金佛庄少年时期曾经立志科学救国，但在袁世凯签定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痛心疾首，写道：“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国家兴亡之际他毅然地弃笔从戎。他协助周恩来，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并率军两次东征。是第一位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黄浦学生的中共党员身份烈士。

沈干城在狱中饱受酷刑，除承认在国共合作期间已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外，对党的秘密毫不吐实，并竭力为其他四位同志开脱。1928 年春，被特别法庭以“煽动工潮，图谋不轨”罪名判重刑。狱中，沈干城心胸坦荡，毫不畏惧，他笑着对难友们说：“一登龙门（指判重刑），身价百倍”，表示对敌人的极端鄙视。

百年前，有着马克思主义共同信仰的徐梅坤、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走到了一起，组建了中共杭州小组。使杭州和浙江的革命斗争有了领导核心，对革命力量壮大和党组织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革命斗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他们当时尽管力量尚弱，但为浙江的革命斗争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他们以生命、青春与热血，扛住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点亮了前进的灯塔。他们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稚到成熟、从九死一生到坚如磐石，中共杭州地方组织始终在“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中奋斗探索中发展壮大。此后，宁波、嘉兴、嘉善、上虞、绍兴、临海、温州、金华等地相继建立中共地方党组织，革命斗争活动遂成星火燎原之势。

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告慰中共杭州小组的先辈们，令他们忧虑重重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今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纪念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100 周年之际，我们继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根脉，从而为“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汲取历史智慧和力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 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金佛庄服役部队及担任职务考证

◎吴焕根[①]

**内容提要：**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小组成员之一、刚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不久的金佛庄，在浙江陆军部队服役。其所在部队及担任的职务，有关党史著作和传记记载不一。本文在参阅各种资料的基础上，对上述事项进行考证，以更准确地还原烈士生平，更好地学习、宣传烈士的光辉事迹。

**关键词：**中共杭州小组；金佛庄；服役部队；职务；考证

1922 年 9 月初，中共杭州小组在杭州市皮市巷 3 号成立，作为三位小组成员之一的金佛庄，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军人身份的党员，是最早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中共烈士之一。

关于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金佛庄服役部队和担任职务，省市的史志记载不一（见下表），金佛庄的一些传记也据此进行撰写。[②]

---

①**作者简介：**吴焕根，男，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萧山历史（第三卷）》编撰人员，联系方式：82898837/13867158299，1458274992@qq.com。

②李文娟《金佛庄》（《中华著名烈士 2》，第 458 页）：“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任连副”。叶炳南《金佛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十二卷，第 69 页）：“浙军第二师陈仪部任排长”。李新勇《风向与信仰　金佛庄烈士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年，第 45 页）：“浙军第二师陈仪部下任排长”。

**浙江省杭州市党史资料、史志关于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金佛庄服役部队和担任职务一览表**

| 著作 | 作（编）者 | 页次 | 内容 | 版本 |
|---|---|---|---|---|
|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1922.4–1987.12） |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档案馆 | 19 | 金佛庄（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连附） | 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 |
| 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大事记 | 《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编纂委员会 | 30 | 金佛庄（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连附） |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
| 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人物·金佛庄 | 同前 | 932 | 军校毕业分配到浙军二师陈仪部下任排长 | 同前 |
| 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1921–1949） |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 94 | 他们还与浙军陈仪师连附金佛庄…… |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
| 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 | 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 86 | 他们还和浙军第一师连副的金佛庄…… |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 |
| 浙江人物简志（下册） | 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 | 227 | 在陆军第二师陈仪部下任排长、连附 |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
| 浙江通志（第一百三十卷）·人物传 | 《浙江通志》编纂委员会 | 812 | 任陆军第二师陈仪部排长、副连长 |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 |

另外，《中共浙江党史大事记1919–1949》和《中共杭州党史大事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均为“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连附”。

今年正值中共杭州小组成立100周年，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金佛庄当时服役部队和担任职务进行考证，以更准确地还原烈士生平，也有利于更好地

学习、宣传烈士的光辉事迹。

## 一、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金佛庄服役部队考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队的建制和番号比较混乱，既有北洋政府军（中央军），又有各省的地方军；北洋军分为皖、直、奉三大派系，还有许多小派系，并且部队调防频繁，战争频繁，真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根据前述史志所载，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金佛庄服役部队为“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浙军陈仪师”“浙军第一师”“陆军第二师陈仪部”等，笔者认为均存在舛误。

要厘清该问题，首先要搞清楚当时驻浙江特别是杭州的军事机构和军队情况。

对于北洋政府驻浙部队的情况，《浙江省军事志》记载：“民国6年（1917）1月，北洋政府军第四师（亦称北洋军第四师、中央陆军第四师）自沪入浙。师部带1个团驻杭州，其余旅团分驻沪杭线，师长杨善德。民国8年（1919）8月，北洋政府军第十师（又称北洋军第十师、中央陆军第十师，师长卢永祥）辖2个旅由沪入浙。师部及所属第二十旅驻杭州，第十九旅驻嘉兴。原驻杭州的第四师师部及所属第七旅移驻松江，第八旅驻嘉善。……民国12年（1923），第四师从松江等地移驻杭州地区，师长陈乐山。……民国13年（1924）9月，驻福建的孙传芳趁江浙战争之机，率领所属第二师……等部队进入浙江。同月底，卢永祥离浙赴沪，孙传芳收编了第四师等部队。第十师被江苏督军齐燮元收编[①]。

除北洋军队外，浙江境内还有地方军，即浙江省防军（一个时期也称浙江护国军，亦称浙军或浙江陆军）。《浙江省军事志》记载：“民国5年(1916)，（黎元洪）任命吕公望为浙江督军署省长。……浙江陆军第六师改称浙江第一师，浙江陆军第四十九旅扩编为浙江第二师。（9月）11日，任命童保暄为浙江

①浙江省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志丛书”《浙江省军事志》，方志出版社，1999年，第180、234-235页。

第一师师长，张载阳为浙江第二师师长。……民国 6 年（1917）1 月 1 日，北洋政府任命杨善德为浙江督军，免吕公望浙江督军之职，……同月 11 日，杨善德入浙就任督军。所辖部队共 2 个师（浙江第一、第二师），约 1.3 万人。11 月浙江第一师进驻宁波。次年 4 月，童保暄率浙江第一师赴闽，驻厦门……。民国 8 年（1919）8 月 13 日，浙江督军杨善德病逝。次日，北洋政府令松〔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兼署浙江督军。……同月，浙军第一师由闽返浙，师部与第一旅驻宁波，第二旅驻绍兴。是时，浙军第二师驻金华、衢州。民国 9 年（1920）7 月 2 日，北洋政府特任卢永祥为浙江督军。……民国 11 年（1922）6 月 15 日，卢永祥宣布废除督军，自称军务善后督办。”①

《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辛亥革命时各省新军响应革命并协同围攻南京清守军。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时，黄兴任南京留守，先后将驻在苏、皖、浙、闽的军队加以整顿。4 月 24 日，浙江奉命成立第五军，下辖第六师及第二十五师，朱瑞任军长兼第六师师长。8 月，由吕公望继任。……袁世凯为削弱南方革命力量，授意北京陆军部，以编制和军饷缺乏等理由，迫使黄兴裁撤南方各省军队。浙江第五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五十旅在这种情况下先后撤销，仅剩下第六师和四十九旅。”② “1916 年袁世凯称帝后，各省纷起讨袁。是年 4 月，浙江宣告独立。镇守使吕公望起兵驱逐浙江巡按使屈映光，担任浙江省都督。他恢复二十七〔五〕师，并添募新兵编为浙江第一混成旅。9 月，将第六师、第二十五师分别改编为浙江第一、第二师，两师兵员约为 13，000 余人。”③ 第一师（1916 年 9 月由第六师更名），师长董〔童〕保暄（1916.9.11–1919.5.27. 死亡）；第二师（1916 年 9 月由第二十五师更名），师长张载阳（1916.9.11. 任）。浙军二个师此时加上“暂编”二字：暂编浙江

---

①浙江省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志丛书”《浙江省军事志》，方志出版社，1999 年，第 179–180 页。

②郭友卿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62 页。

③郭友卿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90 页。朱顺佐等主编《绍兴名人辞典·张载阳》：“1916 年任浙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嘉湖卫戍司令。1918 年任浙军二师师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第 56 页。

陆军第一师，师长张载阳（1919.5.27. 调任）、潘国纲（1919.6.21. 署）；暂编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未注明，应该也是张载阳，吴注）[①]。

“卢永祥任浙督后不久，即废除督军名义，自称浙江总司令，不受北京政府节制。卢又收编皖系残部改编为边防军，遂起事端。（1924 年 9 月）苏督齐燮元以卢收容客军破坏《江浙公约》为由发起战争。卢永祥将浙军及驻浙北军易战时编制，称‘浙沪联军’，顽强抵抗。后齐部苏军在鲁豫援军及孙传芳支援下败卢。1924 年 9 月 20 日，北京政府任命孙传芳为浙省督军后，孙整顿浙军，以陈仪为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周凤岐为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②] 当时浙军二个师：暂编浙江陆军第一师，驻防宁波、绍兴，师长潘国纲（1924.9.6. 褫夺）；暂编浙江陆军第二师，驻防金华、衢州，师长张载阳（任职至 1924 年 9 月止）。

《浙江历史大事记》载：1916 年“9 月 11 日，北京政府分别任命童保暄、张载阳为暂编浙江第一、第二师师长。（《政府公报》第 249 号，命令，1916 年 9 月 12 日）”童保暄 1919 年 5 月 23 日在厦门病逝后，“27 日，北京政府追赠浙江第一师师长童保暄为陆军上将衔勋三位……其遗缺由张载阳接充。（《政府公报》第 1190 号，命令，1919 年 5 月 28 日）”“6 月 21 日，北京政府任命张载阳仍回暂编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原任，任命潘国纲署暂编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张载阳曾于童保暄病故后接充童职。（《政府公报》

---

①郭友卿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291 页。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下册）为“童葆暄”，东方出版中心，2019 年，第 1237 页。《浙江通志·人物传》、宁海县地方志办公室编《革命志士 童保喧》为“童保喧”。童自题落款和印章均为“喧”，但许多人写作“暄”，参见“乡土宁海”公众号 2019 年 4 月 4 日文“民国旧事”《为国民党主席吴伯雄的白字题词正名》。

②郭友卿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12 页。浙江省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军事志·大事记》：“13 年（1924）9 月 20 日，北洋政府任命孙传芳为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兼闽浙巡阅使。”“10 月 9 日，孙传芳任命陈仪为浙军第一师师长。浙军第二师改称浙军第三师，周凤岐任师长。”方志出版社，1999 年，第 62 页。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陈仪军政生涯·陈仪生平简表》（后面引用）和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修订版）》，孙传芳的职务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东方出版中心，2019 年，下册第 839 页。

第 1214 号，命令，1919 年 6 月 22 日）”1922 年“10 月 28 日，北京政府令浙江省省长沈金鉴进京另候任用，以张载阳接任浙江省省长。（《政府公报》第 2389 号，命令，1922 年 10 月 29 日）”由于张载阳是军人，“31 日，浙江省议会开紧急会议，并致函张载阳，反对其出任浙江省省长，以维护军民分治。（北京《顺天时报》，1922 年 11 月 4 日）”在军阀统治时期，议会仅是个摆设，反对无效：“11 月 3 日，沈金鉴交卸省长赴京，张载阳接任浙江省省长。（北京《顺天时报》，1922 年 11 月 7 日）”张载阳在任省长的同时，仍兼任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趁着“江浙战争”（亦称“齐卢战争”），孙传芳的军队越过仙霞岭，进占江山，1924 年“9 月 17 日，卢永祥闻江山失守，……宣布将浙江交还浙人自治。本人移沪督师。张载阳声明卸职，委警务处处长夏超代理省长，所兼第二师师长委警备队总参议周凤岐代理，……浙江地区战事遂告结束。（《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 10 辑）”“20 日，北京政府任命孙传芳督理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兼闽浙巡阅使，浙江省督军一职裁撤。（《政府公报》第 3053 号，命令，1924 年 9 月 21 日）”“22 日，曹锟特任夏超为浙江省省长，原浙江省省长张载阳免职。（《政府公报》第 3055 号，命令，1924 年 9 月 23 日）”同月“26 日，北京政府令，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恃众抗违，免职缉办。（《政府公报》第 3058 号，命令，1924 年 9 月 27 日）”10 月 9 日，浙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在上海通电辞职，由旅长伍文渊继任师长。“同日，孙传芳任命陈仪为浙江第一师师长，周凤岐为浙江第二师师长，夏超为浙江省长兼浙江保安队统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 286 页）”①

《浙江历史大事记》一书，各条大事均注明出处，特别是引用北京政府的公报，史实和军队名称的可信度比较高。

《杭州市志》和《杭州市军事志》的记载都比较简单。《杭州市志》记载：

---

①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浙江历史大事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514、531、532、553、568、569 页。

“民国 9 年至 12 年（1920–1923），在杭州驻有浙军第一师、第二师等部队。”[①]《杭州市军事志》记载：“民国 5 年（1916）8 月，浙江陆军第 6 师改称浙江第 1 师（师长童保暄），师司令部驻杭州梅东高桥。……民国 12 年（1923），浙军第 1 师分驻杭州、鄞县、镇海等地。”“民国 5 年（1916）8 月，浙江陆军第 49 旅改扩编为浙江第 2 师（师长张载阳），师司令部驻杭州上仓桥。……民国 12 年（1923），浙江第 2 师分驻杭县、绍兴、建德、衢县等地。”[②]

除了有关驻军的记载，我们从几位当事人的传记中看军队情况。《卢永祥全传》记载：卢永祥搞“浙省自治”（即 1922 年 6 月废除督军），在督署开会，因卢要离浙赴沪，地方治安由各师师长共同负责，有人说“好在第十师师长由督军自兼，仍可以师长资格负地方之责者”。在“江浙战争”开战前，卢永祥的兵力为：“陆军第四师陈乐山部一万人，陆军第十师卢部一万人，浙江第一师潘国纲部八千人，浙江第二师张载阳部六千人……。”[③]《张载阳——浙江地方实力派人物》记载：“张载阳等人遂于（1916 年 4 月）12 日宣布浙江脱离袁氏独立，成为全国独立倒袁的第五个省份。……吕公望继任浙江省督军兼省长。张载阳升任浙江暂编第二师师长兼嘉湖镇守使和戒严司令。”[④]

上述资料，有的因过于简单而有疏漏，且相互之间也有抵牾之处。为了对辛亥革命后、江浙战争前的浙江军队的情况更加清晰，笔者进行下列梳理和概括：

第一，北洋（中央）军，共两个师。第四师，师长杨善德于民国六年（1917）任浙江督军时入驻杭州。民国八年（1919）8 月，杨善德病逝，卢永祥继任浙

---

①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杭州市志》（第八卷），中华书局，1999 年，第 598 页。

②杭州市警备区：《杭州市军事志》（内部资料，2009 年 12 月），第 194 页。

③竞智图书馆：《卢永祥全传》，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出版，第 3、7 页。

④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阜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皖系北洋人物》，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00 页。另：浙江宣布独立，加入护国运动，成立浙江护国军政府，浙军改称护国军第一师、护国军第三师。徐和雍、郑云山、赵世铭著《浙江近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281 页。

江督军，将其任师长的第十师带入杭州；第四师（陈乐山继任师长）移驻松江。民国十二年（1923），第四师从松江等地移驻杭州地区。民国十三年（1924）9 月，江浙战争中卢永祥失败，第四师被孙传芳收编，第十师被齐燮元收编。

第二，浙军，也是两个师。南京光复后，援宁浙军扩编为陆军第六师，朱瑞任师长；驻守浙江的军队随后扩编为陆军第二十五师，两师合编为第五军，朱瑞任军长兼第六师师长。1912 年 8 月，朱瑞出任浙江都督，为迎合袁世凯消灭异己的需要，擢升其陆师学堂同学叶颂清为第六师师长，裁撤第五军，将第二十五师缩编为独立四十九旅。1916 年 5 月初，吕公望任浙江都督，通电反袁，将第六师改称浙江护国军第一师（护国运动结束后，改称暂编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童保暄。童保暄病逝后，张载阳“接充”童职，不到一个月即由潘国纲继任师长。1924 年 9 月，孙传芳趁江浙战争由闽入浙；10 月 9 日，陈仪任师长。独立第四十九旅在吕公望任都督时恢复（第二十五师）编制，随即改称浙江护国军第三师（护国运动结束后，改称暂编浙江陆军第二师；孙传芳入浙后，又改称第三师），师长张载阳[①]。1924 年 10 月 9 日，周凤岐任师长[②]。在这个过程中，因袁世凯死亡，“护国军”与“护国军政府”一样，名称随即取消。从《浙江历史大事记》可以看出，1916 年“9 月 11 日，北京政府分别任命童保暄、张载阳为暂编浙江第一、第二师师长”开始，一直到 1919 年“6 月 21 日，北京政府任命张载阳仍回暂编浙江陆军第二师原任，任命潘国纲署暂编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为止，官方文件中这两个师的名称分

①张立平：《童保喧年表》，宁海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海文史资料·童保喧专辑》（一九九〇年八月）第 21 页。唐燮军：《光复浙江的义军临时都督——记童保暄》，王永杰总编“宁波文史系列丛书”第二辑《政坛名人　民国政治舞台上的浙东人物》，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年，第 132 页。1922 年 10 月，张载阳任浙江省长后，继续兼任二师师长。《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1840–1949）》，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81 页。

②参见徐和雍、郑云山、赵世铭著《浙江近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78、281 页。

别是暂编浙江陆军第一、第二师[①]。“暂编”二字是否取消或何时取消，有待进一步考证。这就是说，从 1916 年 9 月 11 日张载阳任暂编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至 1924 年 10 月 9 日周凤岐任浙江第二师师长，（暂编）浙江陆军二师的番号一直没有改变。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正好在这一时期。

我们再来看这一时期陈仪的履历：1907 年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任清廷陆军部二等科员。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 年初蒋尊簋任浙江省第二任都督，陈仪任都督府军政部长，不久离职，到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1916 年因袁世凯称帝而借故离职。“1917 年，他（陈仪）偕夫人沈蕙再一次东渡日本。……报考陆军大学，并被录取。这是陆军大学第一批中国留学生。……经过三年的学习，陈仪满怀信心地携眷归国。然而，他见到祖国仍然是满目疮痍，人民饥寒交迫，政局更是激烈动荡。……陈仪憋闷至极，他仰天长叹，真是报国无门，空悲切啊！经与多位友人商量，决定暂以经营商贸来观望时局的发展。……他与友人合资，在江苏东台举办了一家裕华垦殖公司。”陈仪在此时结识张謇。因张举办的盐垦公司面临经济困难，张委托他到日本筹借资金。陈仪于 1922 年初东渡日本，9 月 22 日从日本归来。“孙传芳入浙后不久，即被直系曹锟为首的北京中央政府于 1924 年 9 月 20 日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还收编了卢永祥的五个师。……孙传芳为安坐督军之位，几经考虑，乃亲赴上海敦请陈仪屈尊出任浙一师师长之职。……陈仪想到能以自己的一臂之力为家乡浙江的安宁作出贡献，乃毅然结束上海和江苏的多项经营，接受孙传芳之敦请，抵杭就职。”该书附录《陈仪生平大事纪年》中载：“1924 年（民国十三年） 四十一岁 9 月，应浙江省长夏超之请，至桐庐劝言由闽入浙之孙传芳息兵。受孙传芳之任命，为浙军第一师师长。”[②]

---

①除郭友卿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外，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修订版）·北洋军阀人物志·张载阳》：“后任暂编浙江第二师师长。”东方出版中心，2019，第 1202 页。

②严如平、贺渊著：《陈仪全传》，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15、16、17、21、478 页。

以上资料表明，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陈仪还在日本为张謇的盐垦公司筹款。陈仪担任浙江陆军一师师长的时间是 1924 年 10 月 9 日。他就任时，第一师的防地在宁波；他就职后不久，第一师司令部迁回杭州①。由此可见，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金佛庄服役部队是皖系卢永祥部队，驻扎地在杭州南星桥②，而非后来直系孙传芳统辖下的陈仪部队。江浙战争 9 月 3 日爆发，孙传芳 9 月 20 日任浙江军务督理，陈仪 10 月 9 日任浙军一师师长，金佛庄是年春已经赴广州，开始军校的筹建工作。他参加了 6 月 16 日黄浦军校的开学典礼，聆听了孙中山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演讲。因此说当时金佛庄服役的部队是“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浙军陈仪师”和“浙军第一师”均系误记。

实际上，金佛庄《传略自述》“十二年（应是十一年，即 1922 年，吴注）到浙江陆军第二师充当排长并从事宣传革命运动”，已经说明了他服役的部队名称。时任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撰写的《警卫团团长金佛庄行略》，也作同样的记载③。

那么，怎么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优抚局函》[（63）局群浙字 3–1748–1 号] 记载：“经我们与中共中央组织部联系，在烈士英名录中记载有金佛庄同志的事迹，大意是：‘金佛庄同志，浙江人，曾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并在该校群众团体中活动。毕业后，回浙江在陈仪部队任下级军官。192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作军事工作，大革命时期到广州曾任黄浦军官学校一期教官、蒋介石总司令部警卫团团长、一军一师二团团长。‘四·一二’事变后（应为 1926 年 12 月，编者），党派他回浙江，于九江

①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陈仪军政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6–27 页。

②李文娟《金佛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著名烈士 2》，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458 页。

③金佛庄：《传略自述》，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编“雨花英烈史料丛书”《雨花英烈文集》，南京出版社，2016 年，第 2 页。《传略自述》抄件存东阳县档案馆，影印件载中共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1986 年 10 月），第 25–27 页。邵力子撰《警卫团团长金佛庄行略》载《金佛庄烈士传集》第 139 页。

至南京的轮船上被孙传芳捕去杀害于南京雨花台。’[①]

另外，时任卢永祥警卫团团长的马葆珩在《齐卢之战纪略》中，分析卢永祥的军事力量时说：“陈仪的第一师和周凤歧〔岐〕的第三师，都属于浙江地方武装，装备、纪律都很差（陈、周两师情况与齐军的白、马两师情况完全相同）。”该文也将陈仪、周凤岐由孙传芳任命为浙军第一、第三师师长，误记为由卢永祥统治时期就任命[②]。

笔者根据上述资料推测：金佛庄自己说在“浙江陆军第二师充当排长”，烈士英名录中说他“在陈仪部队任下级军官”，两者一结合，就出现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料（1922.4–1987.12）》等所称的“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陆军第二师陈仪部”。或许《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1921–1949）编写者仅注意到内务部优抚局的函，于是写成“浙军陈仪师”；而《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编写者发现了陈仪担任的是浙军一师师长，于是写为“浙军第一师”。

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由于北伐势如破竹，周凤岐的第三师、陈仪的第一师先后于1926年12月和翌年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军和第19军。周凤岐任第26军军长；陈仪因被孙传芳软禁在南京，被19军官兵遥奉为军长（之前陈仪派参谋长葛敬恩与北伐军联系时，已经取得了北伐军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19军军长的委任状）。国民革命军第19军和第26军，就是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浙军第一师、第二师（该师先后有第二十五师、第三师等名称）。因为陈、周后来任国民革命军军长，名气大了，人们习惯于以他们的名字来指代其率领的部队，而忽略了他们任职时间和“主子”的不同。实事求是地说，这是不够严谨的。

金佛庄《传略自述》中，作者落款是“十五、三、二十于汕头洪家花园”，也就是1926年3月20日。当时金佛庄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正

---

①中共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第156页。

②《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37页。

是这一天，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蒋介石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驻防汕头前线的金佛庄，出于对时局的忧虑和对自身命运的预感，写下了这份材料，一式三份，一份寄回家，另两份交给挚友保存。两天后的 22 日，蒋介石提出在黄浦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排除共产党员等提案。不久，金佛庄被解除军事指挥权，调回黄浦军校。

《传略自述》的写作距他来驻杭部队服役仅 3 年多时间，写的又是自己的事情，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印《死难烈士英名录》在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召开前夕。这时距 1922 年已经有 23 年之多，而且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处于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在延安搜集到完整准确资料的难度很大，编印的党史资料误记的可能性比较大。

金佛庄先在上海闸北淞沪护军使署当见习排长①，任职时间很短，不久到浙江陆军第二师任职。当时统治浙江的是卢永祥，沪浙同属皖系的势力范围，所以金佛庄在上海见习一段时间后就调来浙军部队。加入党组织后，金佛庄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当局逮捕，党组织开展营救，就是通过蒋百里、殷汝骊等社会名流向卢永祥求情使其得以获释的。

那么，金佛庄服役的浙军二师是哪个师呢？笔者以为，是由浙江陆军第 49 旅改扩编和更名而来的暂编浙江陆军第 2 师（师长张载阳）。张载阳任职至 1924 年 9 月止，接任的是周凤岐。孙传芳整顿浙军后，该师复称为“浙江陆军第三师”（浙江陆军第二师的番号给了原北洋第二师，师长卢香亭）②。

## 二、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金佛庄部队职务考证

金佛庄当时担任的职务有写成“连附”的，也有写成“连副”甚至“副连长”

①《严济慈同志回忆金佛庄》：“1921 年（应是 1922 年）暑假，我访他于闸北营次。当时他是淞沪护军使属下的见习排长。”政协东阳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 9 页。

②郭友卿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333 页。

的。笔者认为，应该是“连附”而不是“连副”，更不是“副连长”。

要弄清这个问题，先得了解晚清新军和民国军队中的军官职位设置。当时的军队里，团、营、连等有“附属官”这一官职，根据具体职级简称为“×附”。“× 附”并不是各级副职的简称。民国元年出版的《军语类解》，把“团附”解释为“附于团长办事之官”，“营附”的解释为“附于营长办事之官”。在军队职务称谓中，“副”和“附”有不同的含义。“副”主要有“居于第二位的”的含义，与“正”相对，如“副军长”等；“附”则有“附属”的含义。“× 附”与“副官”也不同，副官是贴身随从。曾参与辛亥革命和沪军北伐的国民党元老樊崧甫在浙军就任过连附①。网上可以搜到一份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1 月 1 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司令部令，内容为：“命令 兹委侯克圣代理第十四师第四十团中校团附 此令 军长顾祝同、副军长卫立煌。”可供参考。

另外，著名的上海四行保卫战的指挥官谢晋元，是国军 88 师 262 旅 524 团的中校团附，他率领保卫仓库的是该团的一营而非整个团②。

徐梅坤说金佛庄“毕业后派到浙江的军队里，开始是个连附”，是准确的③。

以上是笔者对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金佛庄服役部队和担任职务的考证，未必允当，惟望引起学界关注，以更好地还原历史。

---

①樊崧甫：《“龙头将军”沉浮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年，第 9 页。樊崧甫（1894–1979），浙江缙云县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投身军界，历经讨袁、北伐、内战、抗战诸役，累官至国民党中将集团军副司令、上将衔军风纪巡察团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从事反蒋活动。解放后历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

②戴胜德、谭元亨：《挥剑四行 谢晋元传》，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98 页。

③中共东阳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金佛庄烈士传集》（1986 年 10 月），第 5 页。

# 试论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对浙江革命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启示

◎于嘉[①]

**内容提要：**中共杭州小组作为浙江省第一个党组织，在历经自身发展后，它[②]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一定程度上代行了浙江省委职能，领导了全省范围内的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为全省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杭州地方党组织虽然存在人数少、力量弱等客观问题，但对杭州乃至浙江革命的蓬勃发展具有以下三点重要作用：一是弥补了杭州这座浙江省会城市党组织缺失的空白；二是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发展工人、农民、学生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三是促进了国共合作期间浙江党团组织的大力发展。

**关键词：**中共杭州小组；浙江革命；重要地位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以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等为代表的浙江籍先进知识分子纷纷前往上海，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对党成立起决定性作用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占了7名，在中国共产党“雏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占了6名，浙江籍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共组织创建初期发挥了巨大影响力。

---

①作者简介：于嘉，男，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杭州市方志馆）文博中级馆员，联系电话：15382321659。

②1927年6月，在中共杭州地委的基础上建立中共浙江省委。

距离上海非常近的杭州，虽然是浙江的省会，并为上海等地输送了大量人才，但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却一直没有成立本地共产主义小组。一直到 1922 年 9 月初，经上海地委兼区委书记徐梅坤召集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三名党员开会，并在皮市巷 3 号正式成立中共杭州小组。刚建立起来的杭州地方党组织虽然存在人数少、力量弱等客观问题，但对杭州乃至浙江革命的蓬勃发展具有以下三点重要作用。

## 一、弥补了杭州这座浙江省会城市党组织缺失的空白

根据史料显示，“1920 年 8 月，为了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当年秋天到 1921 年上半年，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小组。”[①]1922 年 6 月 30 日，陈独秀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上说：“去年（1921 年）开常会时，只有党员 50 余人，现在党员人数计上海 50 人，长沙 30 人，广东 32 人，湖北 20 人，北京 20 人，山东 9 人，郑州 8 人，四川 3 人，留俄国 8 人，留日本 4 人，留法国 2 人，留德国 8 人，留美国 1 人，共计 195 人。”[②] 另根据张太雷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说：“到 1921 年 5 月 1 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香港和南京都有了共产主义小组。”[③] 由此可见，从 1921 年召开中共一大以来，杭州还没有成立中共组织。

杭州作为沿海的省会城市，经济发达，思想开放，是早期开展共产主义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19 年五四运动期间，杭州之江大学学生率先声援北京、上海的学生爱国运动。随后之江大学和杭州 14 所中等以上学校分别成立“劝用国货会”及“杭州学生联合会”，大力开展爱国学生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杭州的青年学生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 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年，第 322 页。

③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资料研究》1981 年第 6、7 期。

发挥了先锋作用。1920 年 2 月，浙江一师师生掀起震惊全国的“一师风潮”。当守旧的浙江教育厅官员免去一师校长经亨颐职务时，立即遭到了广大师生强烈反对，并以“挽经护校”为号召，拉开了“一师风潮”的序幕，成为了中国学运史上光辉的一页篇章，并使一大批进步师生得到了革命锻炼，逐步走上了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杭州的创立奠定了基础。1921 年 4 月爆发的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在中共党员的领导下，萧山衙前农民协会在东岳庙宣告诞生，并发表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斗争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展现了农民群众潜在的革命力量。1922 年 8 月 29 日至 30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翻译张太雷 7 人出席。会议为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建立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奠定了思想基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在中共杭州地方组织成立之前，杭州革命运动已经在工人、农民、学生等不同人群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1922 年 9 月初，经中共党组织安排，来自萧山的工人党员徐梅坤会聚 3 名党员来到早期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刘大白的家——皮市巷 3 号（史称“白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小组隶属于上海地委兼区委。此前，在 4 月 19 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俞秀松已经在刘大白的家中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这是浙江省第一个团支部，也是全国最早建立的 17 个团地方组织之一。1923 年春，随着中共杭州小组党员人数的增加，小组扩建为党支部，于树德任书记。通过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杭州党团组织的相继建立和发展为杭州乃至浙江省弥补了党组织缺失的空白。

## 二、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浙江发展工人、农民、学生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20 世纪 20 年代，杭州是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产业工人较

为集中的城市。中共杭州地方组织建立后，就积极组织开展工人运动，指导和联合团组织，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的二大制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揭露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并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推动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共杭州小组党员金佛庄在杭州《嘉言报》等报刊上，积极撰写文章，宣传新思潮，抨击吴佩孚等军阀政治。同时积极参加团杭州地委组织的杭州青年协进会和编辑出版的《协进报》半月刊的工作，并由团杭州地委安排，为公开发行《浙民日报》分担编辑责任。[①] 党员沈干城在闸口铁路机修厂仿照京汉铁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自办工人自修夜校，培养工人运动骨干。党员倪忧天发起成立杭州印刷工人俱乐部，向社会发行《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后，杭州党团组织和国民党左派，共同推动杭州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1924 年 4 月 22 日，国民党临时省党部代表宣中华、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方组织代表黄中美、傅君亮，青年协进会代表、中共杭州支部书记安体诚等共同召开杭州劳工协会纪念“五一”筹备会议，向全国劳工发出通电和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快快竖起反抗之旗，向他们实行革命，赤手空拳只要齐心协力，无论怎样总有成功的一天。”[②]1924 年 2 月，党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上海大学师生为基础，成立全市性的非基督教大同盟，团杭州地委也同步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同盟杭州支部，并展开宣传活动。1924 年 11 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北上共商统一大计，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争取国家和平统一。中共杭州支部进行了热烈响应，领导杭州印刷工人俱乐部致电孙中山，拥护其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12 月中旬，在中共杭州支部的组织下，机器工人和手工业工人以杭州工人协会的名义，发表促成国民会议意见书，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1925 年 3 月 12 日，中共杭州支部组织发起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筹备会，号召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宣传“联俄、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88 页。

②上海《民国日报》1924 年 4 月 25、26 日。

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 年 5 月爆发五卅运动，宣中华受上海地委兼区委的指派，召开紧急动员大会，通报五卅惨案的经过详情，中共杭州支部通过召开会议，发动群众罢工、罢课、罢市，以响应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通过策划这些活动，中共杭州地方组织在杭州城区、各县以及杭州以外许多地区都开辟了党的阵地，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党员人数一度达到 3000 余人。推进了杭州国民革命运动向深入发展，极大地启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思想觉悟。

### 三、促进了国共合作期间浙江党团组织的大力发展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浙江各地党组织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1923 年 6 月，党中央派人通知徐梅坤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中共三大，中共杭州地方组织成员于树德、金佛庄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会议。根据徐梅坤在他晚年口述《九旬忆旧》中回忆，“我记得出席‘三大’的代表有二十多人，他们是北方区：李大钊、邓培；两湖区：毛泽东（湖南）、陈潭秋（湖北）；江浙区：徐梅坤、王振一；……杭州支部：于树德、金佛庄。”[①] 杭州地区党组织终于在全国舞台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党的三大以后，徐梅坤来到杭州向党员传达会议精神，按照会议精神把工作重心迅速转移到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上来，调派杭州地方党组织精干党员从事国民党的筹建工作。会后，江浙区及杭州党团组织成员宣中华、沈玄庐、金佛庄、黄中美、安体诚、唐公宪、胡公冕、倪忧天、王贯三、汪性天等 20 余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团杭州地委亦召开团员大会，表示要“宣传国民革命和政党救国，随时加入并介绍加入国民党作政治的奋斗”，从而迈出了浙江国共合作的第一步。[②] 中共三大在《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提出：“我们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组织于

---

①《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第 27 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 7 月，第 94 页。

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①] 为贯彻这一精神，1924 年 2 月，中共党员、国民党一大代表沈玄庐与宣中华、俞秀松等在杭州着手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各级地方党组织。3 月 30 日，中国国民党临时省党部在杭州正式成立。

在积极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建立和发展各级组织的同时，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也得到了发展。先由中共杭州小组发展成为中共杭州支部，后发展成为中共杭州地委。1923 年 6 月中共三大之前，浙江地方党组织只有中共杭州支部。至 1927 年 6 月，中共浙江省委才在杭州地委的基础上正式建立。在这期间，杭州地委担负起了全省发展党员，建立组织的重要工作。1923 年 6 月，徐梅坤派党员何赤华到绍兴负责建党工作。7 月，中共绍兴（党团）地方支部在城区龙山仓颉寺宣告成立，何赤华任书记，隶属于上海地委兼区委领导。1924 年 3 月，台州地区中共组织由团杭州地委秘书宣侠父到海门省立甲种水产学校进行建党活动，发展了金辅华等人入党，建立了海门党小组，隶属杭州支部领导。1923 年起，张秋人、徐梅坤先后来到宁波开展革命活动。1925 年二三月间，中共宁波支部成立，周天明任书记。1924 年夏，中共党员顾作之来到嘉兴从事建党工作，1925 年 3 月，中共嘉兴独立支部正式成立。1925 年秋，金华七中师范部学生千家驹由宣中华介绍加入中共组织，并成立中共金华支部，书记千家驹，隶属中共杭州独立支部。由此可见，中共杭州小组作为浙江省第一个党组织，在历经自身发展的同时，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一定程度上代行了浙江省委职能，领导了全省范围内的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为全省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四、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

---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 147–148 页。

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922 年成立的中共杭州小组就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重要一环，从此杭州人民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在大革命期间，伟大的共产党人在残酷革命斗争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并积极发动和领导杭州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发展壮大自身组织的同时，策动拥护国民革命的浙江独立运动，直接支援北伐战争，为国民革命的胜利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历经百年风雨，杭州从 1922 年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时的 3 名党员，到现在的 76 万多名党员，4 万余个党组织。[①] 如此巨大的发展，离不开 100 年前为杭州革命事业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先烈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要始终铭记他们为党和国家做出的伟大成就，永远将他们的光荣传统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①据《杭州日报》2021 年 7 月 1 日报道，截止 2021 年 6 月 5 日，杭州全市共有党员 765742 名，基层党组织 43831 个。

# 中共杭州小组创建价值探究

◎陈　灏[①]

**内容摘要：**“坚决跟着党干革命，永不变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徐梅坤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创建中共杭州小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实现成功创建中共浙江省委的目标，清晰展现浙江籍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实践，集中彰显浙江籍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品质、道德风尚、优良作风和精神追求，生动展示浙江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特质，让“红色根脉”深深扎根于浙江大地。

**关键词：**中国共产；杭州小组；价值探究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支部是“党组织的基础”。[②] 中国共产党支部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在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进程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展了群众动员工作，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任何一个共产党，如果它在工厂、矿山、铁路等中没有建立起巩固的基层组织，就不能算是一个力量

① **作者简介：**陈灏，醴陵市党史和市志研究室副主任。联系电话：18867306688，电子信箱：434781081@qq.com 。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第 25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0)》，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390 页。

强大、组织严密的群众性的共产党”[①]。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有机结合，是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是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

## 一、培植“红色根脉”，中共杭州小组在艰难困苦中蓬勃发展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徐梅坤等共产党员用奋斗、牺牲、创造推动中共杭州小组的建立。杭州小组从组织层面、政治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健全党的组织体系，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

（一）敢为人先建立党小组。“眼见国家将亡，不应徒作书生默默以终也。”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上下求索。1920 年 11 月，杭州先进知识分子建立“悟社”组织，成员参与筹办衙前农村小学。“悟社”和衙前农村小学为杭州革命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为杭州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打下基础。“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党的一大召开后，党重视把各企业工会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力量。1922 年 1 月，杭州印刷工人徐梅坤在陈独秀的介绍下，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江浙地区第一位工人党员。[③] 徐梅坤在排版印刷书籍的过程中接触大量革命刊物，在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投身工农运动与早期革命活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

---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 年，第 384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283 页。

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年，第 85 页。

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私有制[①]。徐梅坤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参与创建浙江省最早的工会组织—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创办全省第一份工人刊物《曲江工潮》，参加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和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列宁说："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②]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基础。徐梅坤担任上海和江浙两省党的负责人后，推动上海和浙江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1922 年 4 月 19 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在刘大白家里宣告成立，成为浙江省第一个青年团组织，也是全国最早建立的团组织之一。刘大白家"白屋"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秘密的"红色据点"。1922 年 5、6 月间，徐梅坤在上海发展杭州闸口铁路机修厂钳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驻沪杭甬铁路特派员沈干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中国共产党杭州基层组织建设，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部主任于树德到杭州开展建党工作。1922 年 9 月，徐梅坤召集在杭州的于树德、沈干城、金佛庄聚集皮市巷 3 号，成立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③]于树德任组长，隶属中共上海地执委兼江浙区执委领导。中共杭州小组是浙江省最早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浙江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浙江人民革命斗争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百折不挠成立党支部。"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及被压迫者，向国际帝国主义侵略者进攻，谋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杭州实际相结合，坚持在革命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完成中共杭州小组的建立。面对复杂而艰巨的国内外形势，早

---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第 1 页。

②《列宁全集 (7)》，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第 410 页。

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简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第 17 页。

期先进知识分子充分认识到，改造中国，“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①] 其方法在于“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②],并且要“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③]，中共杭州小组是党的使命任务落地的“最初一公里”。中共杭州小组建立后，一方面积极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机构。中共杭州小组组织党员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念，宣讲中共二大关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阐述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内幕，还深入到工农群众中，组织开展工农运动。邓小平说：“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④] 中共杭州小组各成员借助报刊和讲台，宣传和推广新思想、新文化。金佛庄撰写革命新思潮文章，发表在杭州《嘉言报》等报刊，抨击军阀的反动统治。沈干城在闸口铁路机修厂创办了工人自修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培养工人运动骨干。1923 年春，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杭州的深入传播，中共杭州小组发展徐白民、唐公宪、何赤华、倪忧天等人入党，升级为为中共杭州支部，于树德任书记。同年 5 月，于树德、金佛庄作为浙江代表赴广州，列席中共三大，安体诚接任中共杭州支部书记。

（三）坚定理想取得新突破。中国共产党领导杭州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广大杭州人民摆脱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毛泽东说：“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⑤]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先进分子

---

①[日]芥川龙之介著，施小炜译:《中国游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 年，第 54 页。

②《俞秀松纪念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页，第 194 页。

③《李大钊全集 (3)》，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页，第 616 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27 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291–292 页。

对共产主义的追求，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政治理念的认同，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追求。为坚定信仰、信念、信心，李大钊劝诫民众“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炼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①] 中共杭州支部的党员用肩头扛起历史重任，用青春与热血书写着黑暗中的坚守。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杭州支部领导各界群众开展“罢工”“罢课”“罢市”，声援五卅运动。1925年8月，中共杭州支部更名为中共杭州独立支部。1926年1月，中共杭州地委建立，下辖闸口铁路工人和建德、富阳等多个支部，党员人数发展到1400余人。中共杭州地方党组织积极在全省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嘉兴、宁波、绍兴、金华、温州等地相继建立地方组织。中共杭州小组逐步发展壮大为中共杭州支部、独立支部、地委，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杭州得到广泛而深入地传播，推动和促进杭州工人运动顺利开展，增强了杭州人民革命斗争的信心和力量，开启杭州革命事业发展的新篇章。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成立，肩负起浙江全省党组织的发展和党的工作。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杭州乃至浙江的广泛传播，从理论到实践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极为艰巨、极具挑战的斗争和牺牲。瞿秋白“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②]。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即使面对牺牲，仍然以革命的乐观主义表达出“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③]。在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感召下，杭州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一批批仁人志士，延续着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勇毅前行力量。

## 二、守护“红色根脉”，中共杭州小组在锐意进取中确定地位

百年奋斗，沧桑巨变。中共杭州小组的建立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代表广大贫苦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

---

①《李大钊全集》第2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08页。

②瞿秋白：《多余的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4年，第13页。

③《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大典（上）》，红旗出版社,2001年，第677页。

（一）马列主义的成功范例。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工人阶级提供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①]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杭州革命斗争具体实际相结合，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徐梅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于杭州斗争实践中，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方法，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写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生动篇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杭州广泛传播、深入人心，赢得了杭州广大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接受、认同和拥护，从而真正成为杭州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和斗争本领。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各个发展阶段，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工人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在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在理论方面，共产党人透彻了解工人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②]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杭州得到充分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杭州得到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和时代性在杭州得到充分彰显。杭州小组是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典范。

（二）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中国共产党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中共杭州小组开展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在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③] 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广泛传播，特别是进步刊物的创办，促使青年学生与杭州印刷工人产生联系，实现思想和理念的沟通与传播。"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④]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创建起来。中共一大前后，中共党员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还没有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二大后，党中央在全国设北方区、两湖（湖南、湖北）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第 544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85 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499 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9 页。

区、广东区、江浙区（兼上海）等 4 个区委员会。上海光明印刷厂工人徐梅坤被推选为江浙区兼上海地委第一任书记，兼管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印刷出版工作，创造了工人阶级领导和参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事业的先河。徐梅坤除了杭州外，还到浙江绍兴、宁波活动，发展印刷工人、纺织工人等积极入党，为中共浙江省委的成立奠定基础。马克思强调指出：为反对资产阶级联合力量，工人阶级要团结成为一个阶级整体进行斗争，就务必组成与资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独立政党。[①] 面对压迫，面对苦难，杭州工人挺起脊梁、奋起抗争，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史诗。中共杭州小组成为广大杭州人民探寻和开辟革命道路过程中形成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依靠工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②] 以产业工人为核心的工人阶级经由革命斗争的陶铸、训练、培育成长起来，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围绕“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弘扬工人阶级的伟大品格，传承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再接再厉、再立新功，奋力推进“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用劳动把浙江打造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

（三）人民群众的全面参与。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动力。人民群众是力量之源，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只有坚持依靠群众，才能与群众结成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才能共同担负起推翻反动政权，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任务。人民群众是杭州党组织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中共杭州党小组广泛发动群众，有了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中国共产党才能团结带领杭州人民勇于斗争，取得杭州革命的胜利。在中共杭州小组革命斗争中，党员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决依靠群众支持和集中群众智慧，形成强大的革命斗争力量。中国共产党杭州党组织依靠人民群众，制定切实可行的革命斗争方针和策略，团结社会进步力量，发展人民武装力量，为夺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611 页。

②《邓小平文选》1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175 页。

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根本保障。

## 三、传承“红色根脉”，中共杭州小组在时代发展中彰显价值

“东风好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中共杭州小组矢志践行初心使命，以严密的组织体系、强大的组织功能、独特的组织优势、磅礴的组织力量，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开辟伟大道路、建立伟大功业。牢记“国之大者”，守好“红色根脉”，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保障。

（一）坚持党的领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工人阶级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工人阶级的革命道路，最终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历史和现实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实农村党建“浙江二十条”。围绕“数智杭州·宜居天堂”，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推进“红色领杭·争星晋位”行动，推动村（社区）党组织全面达标、整体创优。推进两新党建“双强创优”，实现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全面有效覆盖。大力推进“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升级“基层治理四平台”，健全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体系。树牢大抓基层、重抓党建鲜明导向，建立以“四力双评”为主架构的“红色根脉强基指数”。建立抓党建促“七张问题清单”落实机制，推动建立基层党组织主动发现、协同解决问题机制，提升基层党建的带动作用。

（二）坚定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组织是‘形’，思想是‘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既要‘造形’，更要‘铸魂’。”加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密切联系群众，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理想信念的坚定是共产党人取得胜

利的根本。理想信念关系到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工人阶级能够经受无数次挫折而又无数次奋起，主要原因在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在党的带领下工人阶级越过一道又一道沟坎，战胜一个有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工人阶级作出伟大历史贡献。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把崇高的理想信念转化为对共产主义的不懈追求，对本职工作的不懈进取，对奋斗目标的不懈坚持。

（三）坚持敢于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徐梅坤等共产党员在杭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带领工人阶级闯出光明道路，成为有工人阶级的地方就有党的工作、党的活动、党的形象、党的声音、党的威信和党的力量。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杭州工人阶级具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光荣传统，进入新时代，中国工人阶级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这是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奋斗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杭州始终坚定地走在时代在前列，展现出的历史责任和大局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发挥劳模作用，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用劳动圆梦，以实干筑梦，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性成就。

（四）坚守人民立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上海早期党组织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表明："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 411 页。

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①] 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劳动创造世界，人民创造历史，亿万人民群众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和基本依靠。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②] 中共杭州小组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谋利益。习近平总书记说：“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劳动者根本利益。坚守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不断展现工人阶级敢于担当精神，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辉煌。深刻把握社区作为“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意义，将群众需求作为社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社区服务提质增效。

“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死生安足论！”中共杭州小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创造出的党的组织，是广大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对历史最好的致敬，是书写新的奋斗历史。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展现“重要窗口”的“头雁风采”，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

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5 年，第 2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1004 页。

# 中共杭州小组与伟大建党精神

◎周　阳[1]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提伟大建党精神，百年前中共杭州小组的创建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深刻体现着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杭州组织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坚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刻画了浙江的红色根脉。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浙江红色根脉的源泉，是杭州党组织矢志不渝坚持贯彻的崇高精神。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中共杭州小组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2]伟大建党精神指引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发展，使党从幼小成长到今天的强大。

1922年9月，在党中央的领导和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下，党的先辈于杭州皮市巷3号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这也是浙江省最早建立的中

---

①作者简介：周阳，女，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联系电话：15268507396。

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共地方组织[1]。一百年来，杭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和经验，从根本上来讲，是杭州党组织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

## 一、把伟大建党精神带到浙江——中共杭州小组的成立

### （一）伟大真理——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传播

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能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共杭州小组的成立一个重要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广泛传播，真理被杭州人民掌握才有了后期的力量。

五四运动中，杭州学生成立联合救国会，声援这场伟大的运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杭州乃至全省新文化运动的中心。[2]该校师生组织的社团在校内外销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等书籍和进步刊物，如杭州学生创立的《浙江新潮》刊物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成为当时浙江甚至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毛泽东也曾是该刊在长沙的发行人[3]。伴随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杭州诞生了更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刊物，如《钱江评论》、《杭州学生联合会报》等[4]。1920 年 8 月，原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师陈望道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5]。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78 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31 页。

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34–35 页。

④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45 页。

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51 页。

马克思曾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经过这些进步的书籍刊物的宣传，使苦寻拯救国家人民的真理的杭州爱国人士看到了希望，也使他们渐渐地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来改造自身，并将先进的认识用于推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斗争实践。

（二）英勇斗争——早期杭州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中共杭州小组的成立是在人民群众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将真理结合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伟大斗争的实践中产生的。

在杭州工人运动中，后来成为中共杭州小组早期成员的革命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 1920 年夏，杭州印刷工人组建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徐梅坤任宣传股长、倪忧天任总干事长[②]。该互助会在 1920 年 12 月创办了全国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曲江工潮》[③]，向全社会揭露工人被剥削和压榨的悲惨生活，呼吁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同时互助会创办了工人业余补习学校，用以启发和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孕育了之后革命的有生力量。在互助会中的早期党员还积极组织工人通过请愿、罢工等方式获得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改善，如徐梅坤曾扮成乞丐进浙江贫民习艺厂工作三个多月，组织起该厂 200 多名无家可归又遭受残酷剥削的少年艺徒到省议会的请愿，提出"只要吃饱饭"的要求，举行罢工并取得了胜利。[④] 中共杭州小组早期成员在参与和领导工人运动的活动和斗争中，得到了磨炼。

杭州早期先进分子也关注农村和农民问题，并领导开展了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拉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⑤]。他们筹办农村小学，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9 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53 页。

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54 页。

④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57 页。

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67 页。

帮助农民科学分析贫困的原因，启发农民阶级的思想觉悟，促进农民的团结。他们秉持“牺牲的态度，斗争的手段”[①]的信念，为了斗争不畏惧一切。1921年9月27日，衙前农民协会成立[②]，革命先烈李成虎带领衙前农民英勇斗争使得农民的生活得到局部的改善，但是当年12月他就被捕入狱，1922年1月24日，李成虎因坚贞不屈被严刑拷打致死。[③]

（三）中共杭州小组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迫切需要在全国各地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各级地方组织。马克思主义在杭州的广泛传播武装了进步人士的思想，加上杭州地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斗争，锻炼了先进人士的实践，也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为建立杭州的地方党组织打好了根基。终于在1922年9月初，在中共上海地委兼浙江区委书记徐梅坤的支持下，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杭州皮市巷3号正式成立，组于树德任组长，成员有金佛庄、沈干城，小组隶属上海地执委兼区执委。从此，杭州人民有了党的领导和革命追随的对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带领着杭州人民走出家国破碎的痛苦岁月，指引很多杭州青年走向正确的救国道路。

##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共杭州党组织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

中共杭州小组带领杭州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指引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英勇斗争，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用实践深刻体现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一）大革命时期

---

①《萧山南沙组织农民团体宣言》，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12月20日。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64页。

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1923 年 6 月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中共杭州地方组织成员于树德、金佛庄列席会议，大会正式决定建立民主统一战线。[①] 杭州 20 余名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迈出了浙江国共合作的第一步。[②] 在杭州党组织的的领导下，举行了纪念五一活动、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运动、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抵制日货、建立杭州工会组织支持工人运动等斗争运动，极大地启发了广大群众的觉悟，推进了革命的进展。在这过程中，中共杭州组织也在发展壮大，在斗争中培养和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并在武义、海宁等多地建立基层党组织。1925 年 11 月，国民党右派召开“西山会议”[③]，其公然竖起反对国共合作的旗帜。为了反对分裂活动，巩固浙江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杭州党组织成员宣中华主持下召开了“东山会议”[④]，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最终迫使浙江国民党右派的分裂阴谋破产。1926 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引起了军阀内部的分化加剧，杭州党组织见势策动“夏超独立”事件[⑤]，不幸失败，杭州党组织的两位领导人贺威圣、汪性天被捕后牺牲[⑥]。1927 年，杭州党员人数一度达到 3000 余人[⑦]，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杭州地委所属党员仅剩 1200 余人[⑧]，许多党员都被捕遇害。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81 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82 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151 页。

④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02 页。

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04 页。

⑥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08 页。

⑦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15 页。

⑧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27 页。

（二）土地革命时期

1927 年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①]。中共杭州县委立即组织工人、学生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罢工、罢课斗争，并领导各地农民举行武装暴动。一些斗争的胜利使长期被压迫的人民体会到团结的力量，启发了觉悟，鼓舞了人民革命的斗志。这样的斗争也同时发生在监狱中，因大革命失败被捕关押在浙江陆军监狱的共产党员没有被酷刑吓倒，在监狱中坚持斗争，坚持学习。然而，因党内受“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影响，党组织损失惨重，1930 年末 1931 年初时，杭州市区的党员仅剩 21 人[②]。

（三）抗日战争时期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而国民党政府却固守“不抵抗”政策[③]。1932 年 1 月 28 日，淞沪抗战爆发，2 月 16 日，日本飞机袭击杭州，轰炸笕桥机场。而杭州党组织由于之前白色恐怖时遭受极大破坏，在 6 月有了新的中共杭州特别支部却又在 8 月遭到破坏[④]。1937 年 7 月 7 日，侵华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 月 23 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12 月，杭州沦陷，日军入侵杭州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杭州人民死伤不计其数。在如此家国失守、人民蒙难的情况下，党的先辈们冒着战火在杭州重建了浙江的党组织，1937 年 11 月，在杭州皮市巷成立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⑤]，在省临工委的发动和组织下，之前被破坏殆尽的杭州各县地方组织得以重建

---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237 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67 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333–334 页。

④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173–174 页。

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204 页。

和恢复，从而在杭州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基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人民群众投入全面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在1939年1月，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政策，抗战形势逆转。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反共，杭州各县党组织虽然遇到严重挫折，但依旧坚持团结抗日，坚持贯彻党中央隐蔽工作的“十六字”方针①，尽职尽责进行顽强的抗日斗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杭州党组织带领杭州人民英勇抗日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策略方针的胜利，是杭州人民不屈不挠保家卫国精神的胜利！

（四）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民主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和国家的期盼，在初期就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期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然而国民党一意反共，妄想实行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企图通过发动内战来毁灭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使中国被拖回黑暗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以往。杭州作为国民党统治地区的重要城市，成为国共两党斗争的重要战场。1945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留在杭州的党员面对国民党疯狂的清剿，执行中共中央“隐蔽精干”的方针②，坚持地下斗争和学习，保存有生力量，让杭州人民看到了希望，也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让杭州人民知道，共产党还在杭州并且和人民一起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中共杭州地方组织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及时调整斗争方式和策略，加强了对城市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领导进步学生举行要求“撤退美军、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制止内战”[1]、“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2]等声势浩大的运动，领导杭州工人进行持续不断的罢工斗争，领导发动产生巨大声势的于子三运动[3]，这些都为今后的斗争打下牢固的群众和组织基础。1949 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被基本扫除。但国民党不甘失败的结果，下令破坏杭州的重要设施，搬迁重要的工厂和学校。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市委发出“反破坏、反迁移、保卫城市、迎接大军解放”的指示，发动各方力量尽全力完成了护厂、护校、保卫钱塘江大桥、保护城市重要设施和开展对国民党军特人员的策反工作[4]。1949 年 5 月 3 日，杭州解放[5]，杭州人民在党的带领下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终结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杭州的黑暗统治，杭州的历史迎来了崭新的篇章。

纵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中共杭州小组的创建到杭州人民得到解放，杭州党组织的实践充分发扬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在之后的各个时期和将来，杭州党组织一直将伟大建党精神谨记于心，笃之于行。

### 三、杭州党组织在各个时期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杭州党组织一直紧跟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领导，围绕着各个时期杭州的发展目标，始终践行伟大建党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281 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287 页。

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299 页。

④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杭州历史要览》，杭州出版社，2011 年，第 68 页。

⑤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349 页。

精神。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中共杭州小组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真理，并将其运用于革命斗争的实践，尤其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应用，为领导广大杭州人民英勇斗争，提供了正确的道路，最终在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获得了杭州的解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杭州党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和理想的坚持主要体现于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权巩固的实践和经济建设以及哲学的辨析上。中国共产党秉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伟大实践，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针政策的落实进而实现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人民真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做了主人，中国真正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在这过程中，杭州党组织始终跟随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步伐，践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理想，带领全市人民进行了各项社会改造运动，顺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杭州党组织的带领下，“一五”计划期间，杭州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城市建设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较快发展，提前一年完成了计划。[①] 根据中共杭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到 1955 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 1949 年的 332.9%，手工业总产值为 1949 年的 336.86%，郊区农业总产值为 1949 年的 193.78%，杭州的经济面貌，从一个消费型城市改变为生产型城市[②]。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杭州党组织从领导开始带头学习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在杭州引起了持久而巨大的反响，1978 年 10 月，一份《实践是检验真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422 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381 页。

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报告在《杭州日报》上发表[①]。杭州的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通过深入学习，充分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因此能够更加完整而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杭州的后续发展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铺垫。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有了更丰富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诞生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杭州党组织带领杭州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忠实践行“八八战略”、“两山理论”等重要内容。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做到两个文明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紧跟党中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定下“科教兴市”的战略，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要求，结合杭州的实际，做出旅游业、工业等产业共同发展的策略，既抓住经济建设的主要矛盾又实事求是结合杭州实际联系地看待和解决问题。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带领下，推动杭州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杭州党组织对真理和理想的坚持体现在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杭州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为助力浙江省成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而努力，为成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奋斗。2016 年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坚强领导下，杭州市委带领杭州人民圆满完成 G20 杭州峰会服务保障任务，让世界见证了在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而诞生的美丽而又现代化的杭州。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889 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杭州党组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领导下，面对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刻领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杭州党组织为了国家的解放，为了人民对幸福安定生活的期盼，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领导下奋勇斗争和革命。在革命低潮时，杭州党组织转入地下做群众工作，团结广大群众，启发人民大众的觉悟，扩大统一战线。革命高潮时，杭州党组织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英勇的斗争。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时时刻刻坚持革命斗争，最终迎来了杭州的解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杭州党组织面临解放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权黑暗统治多年后遗留下的衰败城市，社会混乱、经济萧条、人民困苦是当时杭州城的写照。但是杭州党组织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领导下，稳定经济、恢复生产，最终使人民的生活有了质的改变，从各方面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1950 年初，杭州开展禁娼、禁毒、禁赌运动，成功完成社会改造，有力扫除旧社会遗毒，使社会风气焕然一新①。杭州在爱国卫生运动中积极行动，涌现了小营巷居民区等一批卫生模范单位，1958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来到杭州上城区小营巷视察卫生情况，充分肯定了小营巷的爱国卫生运动的工作②。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杭州党组织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经济、科技、民生等多方面做出了让人民认可的成绩，为国家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根据杭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报告，在经济方面，2011 年，杭州市生产总值达 7011.8 亿元，而 1978 时仅为 28.4 亿元；财政总收入达 1488.9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 785.2 亿元，分别比 2006 年增长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125 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531 页。

1.4 倍和 1.6 倍；到 2012 年，全市旅游总收入突破千亿元；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到 2012 年杭州市入选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的数量连续九年居全国城市首位。科技方面，1988 年，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中共杭州市委提出了“科技兴市”的战略方针。把经济发展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增强杭州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实力。在民生方面，一直坚持提高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经过努力，在 1992 年，杭州首次荣获“全国卫生先进城市”称号，并被评为全国“环保十佳城市”，到 2012 年，杭州连续九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杭州党组织始终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领导下，完成了许多为人民带来切实幸福感的事，办成了一些为祖国的发展有益的事。新时代，杭州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升。2021 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74700 元、42692 元，近五年年均分别增长 7.4% 和 8.9%，倍差由 1.87 缩小为 1.75，家庭年人均收入 1 万元以下现象全面消除。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实现“四连冠”，农村文化礼堂实现 500 人口规模以上村全覆盖。连续 15 年蝉联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被评为全国唯一的“幸福示范标杆城市”[①]。新时代，杭州党组织紧跟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指示，牢牢把握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到 3.6%，杭州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融合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21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 27.1%，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数达 10222 家[②]。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杭州在全国首创健康码，为统筹疫情防控贡献了力量，成为全国各地数字化防疫的标配，被誉为高科技的“战役神器”。

---

①刘捷：《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杭州》2022 年第 4 期。

②刘捷：《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杭州》2022 年第 4 期。

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杭州党组织始终坚守初心和使命，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领导下，为实现人民的幸福和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杭州的党组织遭遇了重重磨难，早期的成员许多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了宝贵的生命，宣中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杭州党组织，1927年4月14日在上海郊区龙华火车站被捕，17日被杀害①）、金佛庄（1922年秋加入共产党为早期中共杭州小组成员之一，1926年12月初，受命赴江浙瓦解军阀部队，12月11日在南京被捕，12日被秘密杀害）、沈干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杭州党组织，1927年5月27日在杭州被捕。1934年9月22日在狱中被折磨致死）……这样的英雄还有很多很多，虽然面临着生命危险，但这些革命先烈们不怕牺牲，为了革命的胜利而英勇斗争，视死如归。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杭州党组织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领导下，开展了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斗争运动。这个时期的斗争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的斗争，是为了保家卫国的斗争，是不惧怕帝国主义的斗争。杭州镇压反革命与国民党残余武装以及旧社会余孽斗争，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心。1951年2月下旬，国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专程到杭州指导镇反工作，并给与了高度评价，认为“成绩颇大，其中若干经验值得注意”，之后毛泽东做出批示“杭州的经验可在一切尚未这样做的城市应用”②。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侵朝美军直逼中朝边境，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安全，在危急关头，党中央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杭州党组织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大规模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使杭州人民明白抗美援朝的重要性和正义性，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党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98页。

正确认识美国以及加强战斗意志、提高胜利信心[①]。同时把志愿军在朝鲜前线英勇杀敌的事迹和取得的辉煌战绩传达给全市市民，1951 年劳动节期间，志愿军英模代表团到杭州向各界报告志愿军战士英勇战斗的事迹，轰动了整个杭州，听众达 27 万人，极大激发了杭州人民的爱国热情，进而广泛开展了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和增产捐献活动。全市市民在党的号召下，参军参战热情喷发，如杭州师范学校学生 95% 报名参军参战，新登县起初参军名额仅 500 人的情况下报名了 1 万人。此外广大铁路员工、汽车驾驶员和医护人员也踊跃报名要求到朝鲜前线做好服务工作[②]。在党组织的号召下，广大杭州人民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不顾个人得失甚至是安危，争着为抗美援朝贡献自己的力量！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杭州党组织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带领下，比较突出的斗争是和改善民生的难题做斗争，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等难题做斗争等方面。改善民生难题方面，从 2002 年起，杭州市委、市政府针对行路难停车难和困难群众生活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办事难、清洁杭州问题这“七大难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予以重点破解[③]。对付环境污染方面，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杭州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水源、大气、噪声等污染严重，通过杭州市委、市政府的着力整治，极大提升了杭州的环境质量并获得了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荣誉[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杭州党组织弘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突出体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敢于斗争上。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杭州党组织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领杭州人民勇敢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110 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119 页。

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杭州历史要览》，杭州出版社，2011 年，第 291 页。

④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改革之光：杭州市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专题集（四）》，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178 页。

迎战疫情，广大医务工作者不畏生命危险，逆行出征，无数人民群众跟随党的号召，坚决遵守抗疫政策，杭州党组织带领全市上下团结一致和疫情英勇斗争。精心调派 318 名医务工作者支援湖北，选派 1.1 万名干部助企渡难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1 个集体、4 名个人受到国家级表彰，33 个集体、104 名个人受到省级表彰，200 个集体、601 名个人受到市级表彰。[①]

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杭州党组织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坚强领导下，面对不同时期的矛盾和压力，敢于斗争、英勇斗争，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杭州的党组织经历了多次毁灭性的打击，时而几乎覆灭，但是依旧保持着一心向党的忠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带领人民走向解放，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让人民翻身做主人，结束中国人民被奴役压迫的历史。不负党就是不负人民，杭州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最终为杭州人民带来了胜利和解放。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杭州党组织对党的忠诚体现在对党的理论的学习宣传上，体现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上等方面。解放初思想文化建设基础薄弱，宣传工作被摆在重要地位。1951 年 1 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中共杭州市委在浙江省委的号召下紧接着就发出了《关于建立宣传员制度的意见》，组建的宣传队伍在杭州各地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③]，使人民群众在认识和实践上紧跟党的步伐，也使

---

①刘忻：《2021 年杭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杭州市人民政府公报》2021 年增刊第 1 期。

②《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7 日。

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207 页。

党内能及时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1956 年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①]，大会报告中强调“党的领导是胜利的保证”，“解放七年来巨大成就的获得，归根到底，是由于党的正确政策”，全市党组织“要不断加强党的团结和集体领导，进一步加强党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②]。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杭州党组织对党对人民的忠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国家的经济制度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转变，面对新的形势，杭州党组织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忠心在更基层更深入多元经济社会发展的层面得到了展现。2002 年 7 月 18 日，全国第一个楼道党支部在杭州市下城区长庆街道王马社区科普楼党支部诞生，完善并创新了党在城市的基层组织体系[③]。1998 年，杭州民营企业中的传化集团中设立了党委，开启了党建引领非公企业发展的新征程，成为全国非公党建的样板，为非公党建的发展探索出新的道路，推动非公企业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献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杭州党组织对党的忠诚、不负人民体现在坚定不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杭州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人民创造美好幸福生活；和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等各方面。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2022 年是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100 周年，杭州党组织将永续传承百年来的对党的忠诚。

---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380 页。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383 页。

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杭州历史要览》，杭州出版社，2011 年，第 290 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不同的时代形势和任务，杭州党组织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完成了各个时期党赋予的重大任务，达成了各个时期杭州人民的殷切期望。杭州党组织将永远秉持对党的忠心。永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①]

**四、伟大建党精神是浙江红色根脉的源泉，杭州党组织将永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指引了中共杭州小组的创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实践得到了巩固和全面的展现。中国共产党杭州党组织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坚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刻画了浙江的红色根脉，呈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浙江红色根脉的源泉，是杭州党组织矢志不渝坚持贯彻的崇高精神。中共杭州小组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下，追随中国共产党经历百年风风雨雨的光辉历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百年的实践有力证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真理性。理论指导实践又将在实践中得到提升，如今，党带领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杭州党组织将在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中，继续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让伟大建党精神在杭州谱写新的时代华章。杭州党组织将在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领导下，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下，坚持“不忘初心，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城市范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杭州力量！

---

①刘捷：《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杭州》2022 年第 4 期。

## 二、杭州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

# 衙前农民运动的内涵、地位和时代价值

◎陈　灏[①]

**内容摘要：**“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是被尊敬的人民”。1921 年 4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沈定一，回到家乡萧山衙前发动农民捍卫自身权益，组织农民开展革命运动，创办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衙前开创农民革命运动、农民协会、农民革命行动纲领、教育农民的农村学校等四个全国第一。衙前农民运动在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铸造出“敢为人先、永不满足”的精神，诠释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其精神具有深刻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衙前；农民运动；时代价值

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派出力量发动农民运动。[②] 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沈定一的领导下，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其影响涉及浙江萧绍地区，波及全国。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

---

①**作者简介：**陈灏，醴陵市党史和市志研究室副主任。联系电话：18867306688，电子信箱：434781081@qq.com

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年，第 94 页。

有纲领的农民运动，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声，开创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新纪元。1926 年 12 月，中共江浙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案指出："1921 年，萧山农民正式组织农民协会以反抗地主，实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在强大的反动势力围剿下暂时从公开活动转入地下活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序幕，为之后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蓄积起强大的力量。

## 一、衙前农民运动精神的深刻内涵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共早期党员沈定一看到中国机器工人不多，农民是社会主体的现实，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中国农民的实际问题，在衙前开展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无剥削、无压迫为理想的农民运动，敲响中国农民运动第一锤。衙前农民运动展现出"敢为人先、永不满足"的精神特质，在领导方面、组织方面、思想方面体现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

（一）水深火热与先进思想。1911 年 10 月，上海《申报》报道《萧山沙民暴动》，反映萧山沙民的生活状况堪忧，靠近钱塘江，水患常年不断，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地主剥削和社会矛盾激化，农民的生活处在崩溃边缘，地主花样翻新的剥削手段，导致农民走投无路。生于衙前镇大地主家庭的沈定一，早年接受新思想，经过不断磨砺，几经周折，五四运动前，他立足上海，大力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1919 年 6 月，在上海沈定一与李汉俊、戴季陶等创办《星期评论》周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理念。沈定一不满足于间接介绍或肤浅了解新思想，需要更广泛的理性思索，需要和救国救民、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进行更深层次的讨论。1920 年，怀揣革命理想的沈定一结识陈独秀等早期革命者。沈定一将马克思主义与救国救民实践有机的结合起来，

---

①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121 页。

在思考中不断的成长，在磨砺中不断的成熟。1920 年 5 月，沈定一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劳动界》《劳动与妇女》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广大民众觉悟。

（二）共产党员与中共一大。1920 年 8 月，沈定一与陈独秀以及浙江籍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邵力子等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沈定一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在组织工人运动的同时，重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1920 年 11 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把土地“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1921 年 4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刊物《共产党》月刊第 4 期上发表《告中国农民》文章指出，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在革命中农民占有重要位置，地主的土地是从农民手里强行占为己有，土地应该共有和共用，号召佃农“快起来抢回来”。号召同志们到“田间去”向农民宣传，以促进农民的“阶级自觉”。沈定一看到农民的重要性，1921 年 4 月，沈定一到衙前，组织策划农民运动。他仿照城市夜校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做法，自己出资、腾屋，在家中筹办衙前农村小学，主要招收本村农民，通过教育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唤起农民思想觉悟。萧山籍宣中华、杨之华等人回到乡里，投身宣传革命道理，萧山农民开阔眼界，提高思想觉悟。[①] 为了传播新思想，沈定一深入农民中间，与农民交朋友，为他们排难解忧，还从自己家里拿钱分给农民，帮助他们度过难关，逐渐与农民建立起密切关系，受到农民拥戴和信赖。他运用“一根麻杆易折断，一捆麻杆就折不断”等农民易于接受的形象语言作比喻，启发农民接受新思想，团结起来与封建压迫者进行斗争。在他的启发下，广大农民逐渐意识到，只有团结斗争，才能捍卫农民自身权益。沈定一从自己亲戚入手，率先打破压迫，当得知粮商们哄抬米价中有自己的亲戚，他全力支持李成虎等组织发动农民，首先组织农民说服内弟的“周和记米店”，随后附近哄抬粮价的米店恢复原价。之后沈定一说服绍兴县知事，为农民争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年，第 95 页。

取到捕鱼和养鱼权利。连续斗争的胜利，确立了沈定一在农民中的威信和地位，使得农民发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广大农民开展斗争的信心、决心和勇气。为了唤起广大农民投入压迫斗争，推动衙前及附近农民运动的开展，沈定一头戴毡帽，身着农民服装，走进农民中间运用方言和老百姓熟悉的语言进行演讲。在《谁是你底朋友》演讲中提出资本家是农民的敌人，出卖苦力的劳动者是农民的朋友。鼓动农民争回属于自己的权利。在《农民自决》演讲中提出应该废除私有制度，在农村实行土地公有，还预言这些目标总有实现的一天。经过酝酿和准备，1921 年 9 月 27 日，衙前村农民大会召开，大会选出 6 名农协委员，推举贫苦农民出身的李成虎为领导人。至此，中国第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正式成立。①

（三）斗争纲领和为民措施。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后，发表《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以下分别简称为《宣言》《章程》），《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斗争纲领。《宣言》称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是最被尊敬的人民，土地是农民通过劳动养活人类的工具，强调农民觉悟的重要性，农民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世界上的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土地该归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章程》规定协会与地主是对立地位。要求农民加入协会，成为会员。农民协会与生产工人及社会主义运动者都是朋友，协会认同的团体或个人，遇到需要帮助时，协会都会尽最大能力帮助。《章程》还阐明衙前农民协会的组织形式和减租政策。这份章程经过全村农民商量决定，其内容表达全村农民的愿望。根据《章程》的规定，李成虎、单夏兰、陈晋生、金如涛、汪瑞张、朱梅云等 6 人被推选为协会委员，经 6 名协会委员选举，李成虎当选议事员。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后，消息迅速传遍萧绍平原，广大农民看到了希望，纷纷欢欣鼓舞。许多村派代表到衙前入会，或前来领取《宣言》和《章程》，农民们拿到后高兴地说："这纸头可是个宝贝，是减租的把柄，拿出来照，地主就没二话了。"1921 年冬，绍兴、曹娥等县方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 年，第 95 页。

圆 150 公里内的几十个村庄的农民，纷纷行动起来，以衙前农民协会为示范，建立农民自己的协会组织 80 多个，协会把劳苦农民团结起来，为维护农民的权益，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斗争。[①]1921 年 11 月 24 日，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正式组建，领导农民开展抗租减租的斗争。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发布告示，作出“三折还租”( 即按原定租额三折交租 ) 和看年成好坏交租的决议，并监制标淮斗、升，改大斗 ( 每斗 17 市斤 ) 为公斗 ( 每斗 15 市斤 ) 量租，取消地主下乡收租另加的“东脚费”，反对交预租的规定，减轻农民的负担，保护农民的利益。

萧山南沙农民联合发表《萧山南沙组织农民团体宣言》，声称决心不怕牺牲，誓死与地主豪绅斗争到底，打破地主豪绅势力范围，直到地主豪绅屈服。《宣言》还呼吁：“无产阶级的人，大家起来呀！”为进一步扩大影响，沈定一带头从自己家开始实行减租，还动员家里的佣人集体罢工，说服家里人自己动手去处理家务。地主们受到农民抗租影响，收不到租金，联合起来集中收租船 80 余艘，强行让农民交租。农民协会闻讯后，立即聚集农民一千多人，向地主收租船扔掷泥块，地主们被吓得不敢上岸，只能留下空船逃跑。农民们通过集体游行，对抗地主收租，要求政府下令减租，体察民情。沈定一还联合 12 位省议员向省长提出农民减租等问题，鼓舞了萧绍地区广大农民团结一致，反抗地主压迫。

## 二、衙前农民运动历史地位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共产党意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所起的重要作用，并根据国情对农民问题提出很多新的见解，为共产党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组织革命斗争指明了路径。

（一）共产党人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度关注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共产党》刊登《告中国的农民》指出：“中国农民占全人

---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0 年，第 95 页。

口底大多数，无论在革命的预备时期，和革命的实行时期，他们都是占重要位置的。设若他们有了阶级的觉悟，可以起来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底社会革命，共产主义，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这篇文章指出革命者要面向农民，要走到农民中间，启发他们的觉悟；并号召农民联合起来，抢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和土地。动员农民团结起来，会得到共产主义者的支持和帮助，共产主义能帮助农民摆脱压迫和剥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既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者，也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肩负着教育群众的责任，尤其是用先进思想去启发群众，唤醒群众的思想觉悟。衙前农民运动的领导人沈定一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早期共产党员，运动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发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农民革命运动。中共一大对党领导的衙前农民运动具有指导意义，一大党纲规定：“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实现目标主要采取的手段，是革命手段。衙前农民运动，主要是开展减租抗租的斗争。减租是革命范畴，是贯彻落实中共一大党纲的具体实践。《宣言》《章程》《萧山南沙组织农民团体宣言》以及沈定一的演讲，都体现党的一大关于劳工专政、土地公有和阶级斗争的基本思想。衙前农民运动，得到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新青年》的大力推介，全文刊登衙前农民协会的《宣言》《章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农民运动在全国的广泛开展做了宣传。

（二）农村革命的实践探索。土地是农村延续的基础，是农民的根。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通过“分土地、减租减息”等土地政策可以取得农民的支持。杜润生称土地改革是“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民”。衙前农民运动领导者沈定一是探索乡村革命的主要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开展的农民运动，也开启新式乡村革命的实践，这场农民运动在乡村革命的组织机构、动员模式，经济方式、政治目标上进行了尝试和探索。衙前农民运动成立第一个农民协会，发布第一个农民革命行动纲领，创办第一所教育农民子女的农村小学校。农民协会声称“农民在中国历史上是最被尊敬的人民”。

农民运动打击压迫普通农民和掌握乡村统治权的地主势力，把分散在乡村社会的封建专制权力收归为国家公有政权，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对乡村社会的全覆盖。国家治理体系在乡村社会建立起基层政权管理组织，将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将土地分配给少地、缺地、无地的普通农民。

（三）农民运动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迅速建立农民组织，沈定一邀集进步知识分子刘大白和革命青年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杨之华等到衙前创办第一所教育农民子女的农村小学校——衙前农村小学校，在传授文化知识和实用知识的同时，向广大农民宣讲革命道理。每一次革命斗争，让农民发现了自身团结的力量，提高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勇敢地向着自己的命运之路大步向前。衙前农民运动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肯定，《中国现代史稿》中记载“浙江省萧山县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声”。衙前农民运动让革命者看到不足，为革命斗争积累经验，使社会大众对农民产生新的看法，出现新的认识，看到新的力量，农民运动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新生力量。衙前农民运动，显示农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拉开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

### 三、衙前农民运动精神的时代价值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强则国家强。衙前农民运动所创造的红色历史、红色故事、红色传统、红色精神，是乡村基层群众集体历史记忆的载体，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底蕴、底气和底色。新时代弘扬衙前农民运动精神，激发广大群众的奋斗意识、奋斗情感、奋斗精神，汇聚起乡村振兴的思想共识、行动自觉、动力源泉，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一）坚定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农村工作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强不强、农

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决定着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质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衙前农民运动顺利实施。党依靠智慧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亿万农民翻身获得解放，中国人民站了起来。乡村要振兴，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发展、农民全面进步，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

（二）坚持理论指导。理论是实践的先导。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农村具体实际相结合，正是指导衙前农民运动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广大农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脱贫攻坚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三农”工作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构筑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农业农村发展的科学理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推动乡村振兴，指导农业农村农民的根本遵循。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农村实际相联系，及时分析农村出现的新问题、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支撑。

（三）坚守为民宗旨。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农民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把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作为基础，把让农民满意，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政策、机制、资金、项目等措施，全方位推进乡村振兴，让亿万农民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守人民主体地位，和农民一块苦、一块累、一块干，增强

广大农民对党的信任和信心，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辉煌。

（四）永葆斗争精神。“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面对前进道路的风险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党领导的衙前农民运动正是有坚强斗争精神，才能不断战胜地主剥削，克服各种困难，从挫折走向胜利。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需要广大群众坚定信心不动摇，撸起袖子加油干，创新思路、真抓实干，一鼓作气、斗争到底。在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在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广大农民积极参加，始终坚定地走在前列，展现出广大农民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朽。衙前农民运动作为农村革命斗争的珍贵遗产，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经过不懈奋斗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开创者，蕴含着共产党执政密码。弘扬敢为人先、永不满足的衙前农民运动精神，激励广大农民去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为乡村振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 近年来衙前农民运动研究综述及启示

◎刘祯贵[①]

**内容提要：**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农民运动，是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大胆尝试，具有深远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相关专家从不同侧面对衙前农民运动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衙前农民运动薪火相传。本文对近年来衙前农民运动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时代的启示，旨在进一步学习衙前农民运动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从中汲取奋进力量。

**关键词：**衙前农民运动；研究；综述；启示

杭州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1921 年在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掀起的衙前农民运动，堪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农民运动、全国农民运动历史上最先发轫者，在中国两千年农民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由于受到衙前农民运动领导者沈定一身份转变等因素的影响，学术界对其关注与研究存在不足之处，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才开始受到国内党史学界的重视。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知网数据平台，以衙前农民协会为篇名，共有 5 条结果；以衙前农民运动为篇名，共有 21 条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强调：“我

① 作者简介：刘祯贵，男，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调研员，电话：13808230959，邮箱：592854767 @qq.com。

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庚续红色血脉，永远把建党精神继承下去、发扬光大！”[①] 笔者结合所藏资料及网络查询，对近年来衙前农民运动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以进一步学习衙前农民运动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从中明确衙前农民运动内在思想之内涵，达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目的，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从衙前农民运动所体现出来的革命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 一、关于衙前农民运动的整体研究状况

“衙前农民运动”被普遍地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农民运动”[②]。但由于受到运动领导者沈定一身份转变的影响，学术界对其关注和研究存在不足，鲜为史籍所记载与媒体所传扬。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国内已出版的党史、现代革命史著作，仅有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一书有简要的介绍，其他著作均避而不谈、语焉不详[③]。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衙前农民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一次农民运动，开始受到国内党史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一定的研究进展。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000 年，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运动性质地位的辩证、爆发原因的考究上，对衙前农民运动爆发的时代背景、运动期间所进行的反封建斗争等内容进行初步论述与分析。据统计，这一阶段关于衙前农民运动研究的公开发表论文有 8 篇，以衙前农民协会为篇名在中国知网数据平台查询 5 条结果，史料书 2 本，专著 1 本，论文集 1 本，纪实书 1 本。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于 1985 年 12 月联合编写了《衙前农民运动》一书，较全面地记述了衙前农民运动的光辉业绩，涉及衙前农民运动的历史文献、报刊资料、访问回忆，以及 8 篇有关衙前农民运动的研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 年 7 月 2 日。

② 夏征农、陈至立：《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 年，第 278 页。

③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90 周年论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 版，第 1 页。

究论文[①]。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于1987年联合编写了《衙前农民运动》一书，涉及衙前农民运动概述、报刊文献资料、回忆录与访问记、人物小传、论文选、参考资料[②]。1998年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还编印了《衙前农民运动文集》一书。1999年亚太同际出版社出版了旭烽、淼水著《英雄梦——衙前农民运动纪实》。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专著，可称开拓衙前农民运动研究初创期的代表作。

从1991年到2011年，衙前农民运动发生地萧山召开多次有关衙前农民运动的学术研讨会，征集到论文数十篇。这些论文，从衙前农民运动的兴起、发展过程、失败原因等多角度、多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促使衙前农民运动的研究向纵深发展。从2001年到2011年衙前农民运动90周年之际，是衙前农民运动研究的高潮期。据统计，这一阶段共有公开发表论文约30篇，以衙前农民协会为篇名在中国知网数据平台查询9条结果，论文集2本。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数量丰富，质量较高，在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继续深入开展衙前农民运动中的农民教育、宣传以及农民运动领导者等方面的研究。2002年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编印《衙前农民运动论文选编》一书，并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1年9月27日，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萧山区人民政府承办的纪念衙前农民运动90周年系列活动在浙江萧山举行，这一活动推动了衙前农民运动的深入研究。会议结束后，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共同编印的《纪念衙前农民运动90周年论文集》一书，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公开出版[③]。

---

① 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衙前农民运动》，1985年。

②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衙前农民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

③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纪念衙前农民运动90周年论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从 2012 年至今，学术界对衙前农民运动的关注度较低，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廖若晨星，以衙前农民协会为篇名在中国知网数据平台查询 9 条结果，主要论述了衙前农民运动中农民协会的发展状况。2019 年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王作仁著《论衙前农民运动》。值得肯定的是，2020 年陈超撰文对近四十年来有关衙前农民运动研究情况进行述评，对衙前农民运动地位、衙前农民运动爆发与失败原因、衙前农民运动组织与宣传工作、沈定一的农民运动思想与实践等研究状况进行梳理，认为当前研究对衙前农民运动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取得一批高质量发展成果，并不断走向深入，研究方法也趋向多样化。同时，陈超也指出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展望：研究视角有待拓宽、史料挖掘有待丰富、研究的关注度有待加强[①]。

随着建党百周年的到来，对衙前农民运动的研究也迎来高潮。2021 年 9 月，“传承百年火种·奔向共同富裕——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活动”在杭州萧山召开。研讨会召开的目的在于纪念衙前农民运动，就是要学习衙前农民运动先驱追求真理、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为民解困、为民谋利的使命担当，敢为人先、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崇高品质。与会专家学者纷纷提出，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革命运动，显示了中国农民的伟大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中国农民问题、开展土地革命的先声，在党的创建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次研讨会，既是为了“传承百年火种”，回顾总结衙前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深切缅怀衙前农民运动先驱的历史功绩；更是为了“奔向共同富裕”，充分挖掘利用红色资源，守好“红色根脉”，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②]。

---

① 陈超：《近四十年来有关衙前农民运动研究述评》，《南方论刊》2020 年第 8 期。

② 《传承百年火种 奔向共同富裕——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活动在杭州萧山召开》，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https://www.dswxyjy.org.cn/n1/2021/0930/c431725-32243949.html。

## 二、关于衙前农民运动基本过程的研究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共同编写的《衙前农民运动》一书综述部分详细衙前农民运动的前因后果[①]，相关论文也提及衙前农民运动情况。在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同全国其他农村地区一样，衙前广大劳苦大众深受其苦，当地民谣："吃也精光，穿也精光，哪有东西交点王。"中共早期党员沈定一于1921年4月从上海回到家乡萧山县衙前村，开始实施其"中国底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的革命实践。回乡后，沈定一立即从办教育入手，邀集原浙江第一师范进步教师刘大白和著名学生领袖宣中华、徐白民等，一面筹办衙前农村小学，一面通过访贫问苦和社会调查、民间演讲等形式，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②]。沈定一、刘大白、宣中华等经常向衙前及周围附近村庄农民讲解、宣传革命理论，号召"农民赶快组织起来，大地主总有一天会投降你们的。"经过4个多月的思想发动和紧张筹备，1921年9月25日，上千农民在衙前东岳庙集会，宣告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并一致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提出了世界的土地应该归农民使用，由农民所组织的团体保管分配的革命主张。并选举了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等6位贫苦农民为领导者。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推动了萧(山)绍(兴)各地农民运动的全面发展。在短短两个多月里，萧山、绍兴、上虞等县共有82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有10余万贫苦农民投入了这场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③]。11月24日，衙前农民协会联合会成立，并作出了"三折还租"、改大斗为公斗、反对交预租等规定，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各地的减租斗争迅速展开。随着各地的减租斗争迅速展开，萧绍及周围地区农民的斗争

---

①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萧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衙前农民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② 陈金冠：《萧山衙前之异样风光——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旧址》，《浙江档案》1993年第3期。

③ 诸葛达：《衙前农民运动述论》，《浙江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

使地主阶级惊恐不安，军阀逮捕了农协会委员，农民协会被强令解散。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抗租税运动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①]。

### 三、关于衙前农民运动地位的研究

如何确认和划分衙前农民运动在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的地位，目前学界持两种不同的观点：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屠正聪认为，衙前农民运动开创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四个第一”，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农民运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其发表的《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和《衙前农民协会宣言》，是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斗争纲领；创办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教育农民的农村小学[②]。李风华认为，1921 年 9 月在浙江萧山建立的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新型农会组织[③]。周明华也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领导的第一次农民运动，“实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④]。

曾林平、徐才杰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农民运动，它揭开了党领导的农民翻身求解放革命的序幕。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革命的发端、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百年社会革命的先声。衙前农民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实践和探索，是中国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农民革命问题的首次尝试[⑤]。杨福茂、王作仁早在 1980 年就

---

① 陈晓蓉：《略论浙东衙前农民运动》，《江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1 期；今哲：《衙前农民运动》，《今日浙江》1999 年第 6 期；《衙前农民运动》，360 百科，https://baike.so.com/doc/2396300-2533687.html；《红色故事专栏第六期：衙前农民运动》，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05630587_120381672，2020 年 7 月 3 日。

② 屠正聪：《衙前：竖起农民运动第一旗》，《台州日报》2011 年 7 月 3 日。

③ 李风华：《衙前农民协会：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新型农会组织述论》，《求索》2013 年第 3 期。

④ 周明华：《沈玄庐与衙前农民运动》，《杭州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

⑤ 曾林平、徐才杰：《衙前农民运动历史地位再认识》，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认为，衙前农民运动产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阶级团结战斗的革命组织——衙前农民协会，制定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运动的行动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因而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声[①]。同年成汉昌则发表文章，将衙前农民运动与传统农民运动、海陆丰农民运动进行比较性研究，指出衙前农民运动与前者有根本区别，与后者性质相同但时间更早，所以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农民运动[②]。

诸葛达分析认为，衙前农民运动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贯彻了中共一大党纲的基本精神、衙前农民运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各界许多进步团体和个人的支持，衙前农民运动为中国新型的农民运动掀开了第一页。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农民的新纪元[③]。谢俊美认为，沈定一等组织领导的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受苏俄十月革命建立的“劳农政权（即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影响下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开展的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中所建立的农民协会，是近代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农民协会。衙前农民运动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④]。刘学礼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由早期党团员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领导者沈定一是当时探索乡村革命的主要先进知识分子之一。衙前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在理论上对此前先进知识分子的探索进行了继承发展，更可贵的是开始了新式乡村革命的实践。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中共一大对其发生影响，它有别于中共一大的工作重点，在乡村革命的组织、动员模式，乡村革命的经济政治目标和斗争方式上都作了开拓

---

① 杨福茂、王作仁:《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声》,《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② 成汉昌：《中国现代农民运动最早发生于何时何地？》，《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4期。

③ 诸葛达：《衙前农民运动述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④ 谢俊美：《中共成立前后对农民的首次关注——历史大视野下的沈定一（玄庐）和萧山衙前农民运动》，《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12年第1期。

性的探索。衙前农民运动的不足是，忽视乡村党组织建设、武装斗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理论与实践存在脱节等[①]。

朱珏认为，在萧山衙前地区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这场被学界称作“现代意义上第一次”的农民运动，在运动开展的时间、理论指导与组织上，以及传播范围上都呈现出“先导性”的特点；在农民运动的发起人与广大农民之间则呈现出高度的“融合”性；在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则呈现出深度的“结合”性[②]。谢冠富认为，衙前农民运动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揭开了中国新型农民运动的序幕，掀开了中国现代史上新型农民运动的第一页[③]。陈志根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阶级觉醒的先兆。主要表现是衙前农民对《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的高度认同和积极的行为倾向。[④]

王铁成、王文兵分析了衙前农民运动的特点：一是有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二是有全新的组织形式——农民协会，三是有革命的组织者——中共早期党员[⑤]。丁晓强通过对衙前农民运动及其历史意义、衙前农民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衙前农民运动以及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衙前农民运动的局限与沈玄庐的思想变化等内容进行分析后认为，1921 年 9 月爆发的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序幕[⑥]。李永芳从农会组织的视角出发，将衙前农民运动中产生的农会组织与晚清、北洋时期的农会组

---

① 刘学礼：《试析衙前农民运动对中共创立时期乡村革命的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 年第 3 期。

② 朱珏：《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及其精神实质》，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③ 谢冠富：《衙前农民运动的“现代”形态论域》，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④ 陈志根：《衙前农民运动：中国农民阶级觉醒的先兆》，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⑤ 王铁成、王文兵：《揭开尘封的记忆：沈定一与衙前农民运动再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 年第 3 期。

⑥ 丁晓强：《衙前农民运动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织进行比较，指出萧山衙前、广东海丰以及湖南衡山岳北等农民协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批新型农会组织[①]。从而从农会组织的角度承认衙前农民运动是现代农民运动的发轫者。

陈明显认为，衙前农民协会是一个很适合农民参加的组织，是农民革命斗争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农民基层组织，是一个创造。衙前农民运动在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同时，还创办了衙前农村小学校，极大地为衙前农民运动增加了崭新的色彩[②]。姜义华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农民革命实践的首次尝试，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发动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揭开了中国农村无产者伟大觉醒的序章[③]。孙瑛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衙前农民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处于同一时期，由创党积极分子组织发动，是中国共产党拓展阶级基础的一次重要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区域积极分子的一次重要活动，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因而，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④]。

与此同时，有一小部分学者认为将衙前农民运动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农民运动这一观点还有待商榷。如陈志根在其研究论文中指出，1921 年 4 月沈定一回萧山衙前的目的并不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暴动，而是去参加议会换届选举，途径家乡时衙前农民运动已势在必发，因而在组织及思想上无法体现中共的领导。陈志根将衙前农民运动归纳为是旧式农民运动向以广东海丰为先导的党所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的过渡。陈志根认为，衙前农民运

---

① 李永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新型农会组织述论》，《中学学刊》2015 年第 8 期。

② 陈明显：《纪念衙前农民运动爆发 100 周年》，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③ 姜义华：《从自发走向自为：党的创建和中国无产者的伟大觉醒——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④ 孙瑛：《衙前农民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动在组织上、思想上同样体现不出共产党的领导；衙前农民运动期间沈玄庐的一系列言行，是和党的主张背道而驰的[①]。对此，王作仁《萧山衙前农民运动 90 周年祭》一文进行反驳，认为衙前农民运动体现出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民运动的高潮[②]。

**四、关于衙前农民运动爆发、失败原因的研究**

关于衙前农民运动爆发的主要原因，普遍认为是地主阶级的剥削所致。20 世纪初，位于钱塘江沿岸的南沙地区的衙前，水旱蝗灾频繁，且钱塘江失于治理，坍江日剧，农业连年歉收。地主却不顾农民死活，照常逼收高额地租，甚至强迫农民交“现租”（当年交清下年租种的地租），农民生活苦不堪言[③]。1921 年 4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沈定一从广州回到家乡萧山衙前，着手开展农民运动[④]。沈定一回到家乡萧山衙前期间，成立“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阶级团结战斗的革命组织”——衙前农民协会，发表了成文的斗争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并领导当地农民进行了一系列抗租减租活动，创办衙前农村小学，史称“衙前农民运动”[⑤]。李风华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新型农会组织之所以首先在萧山衙前创立，是由该地区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该地农村土地占有集中，自然灾害频繁，农民生计艰难，同时由于该地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孕育了农民信息的灵通，城市此起彼伏的工潮、学潮等对其产生着强烈的震荡[⑥]。

---

① 陈志根：《衙前农民运动性质辩证》，《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 年第 8 期。

②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90 周年论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 年，第 2—4 页。

③ 萧山县志编纂委员会：《萧山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057 页。

④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年，第 85 页。

⑤ 王全营、曾广兴、黄明鉴：《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第 54 页。

⑥ 李风华：《衙前农民协会：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新型农会组织述论》，《求索》2013 年第 3 期。

陈明显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爆发的第一个农民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掀起的第一个革命浪潮。它不是农民自发的斗争运动，其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原因[①]。戴鞍钢认为，衙前农民运动领导者沈玄庐青年时期就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其家乡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有着他开展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并扩大声势的有利条件[②]。陈志根认为，衙前农民运动体现中国农民阶级觉醒。衙前农民的这种觉醒，来自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先觉的先进知识分子实施的“觉醒”教育。主要得益于衙前农民运动领导人沈玄庐及其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衙前开办农村小学校、各地演讲、办阅书报社和交友相助，以势利导等[③]。

华正学等专家指出，衙前农民运动的爆发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浙江先进分子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和宣传密不可分[④]。李风华也认为，衙前农民协会建立的社会背景是衙前地区封建压迫深重、农民生计艰难、革命基础雄厚、新兴无产阶级开始涌现等。除此之外，早期中共党员及其他先进知识分子的宣传、发动和组织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⑤]。徐树林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是五四新文化在农村的继续和深入，五四运动为衙前农民运动准备了组织力量、奠定了思想基础、革新了宣传方式[⑥]。朱淼水强调，衙前农民运动的爆发应被视为是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结合下的结果，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⑦]。

---

① 陈明显：《纪念衙前农民运动爆发 100 周年》，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② 戴鞍钢：《序幕与启迪——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百年追思论纲》，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③ 陈志根：《衙前农民运动：中国农民阶级觉醒的先兆》，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④ 华正学、卢敦基：《浙江历史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96 页。

⑤ 李风华：《衙前农民协会：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新型农会组织述论》，《求索》2013 年第 3 期）

⑥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衙前农民运动论文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第 99—105 页。

⑦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衙前农民运动论文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13—121 页。

丁晓强认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俞秀松、邵力子、陈望道等都积极地推动并在党正式成立后进一步领导、支持和关注衙前农民运动的发展，使之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衙前农民运动反映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最初探索，他们阐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当然，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沈玄庐对实践中出现的剧烈的阶级斗争的犹疑，影响了这场运动的深度①。殷丽萍在《浙江衙前农民运动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将结果迥然不同的两次农民运动进行对比，指出两者在地理环境、认识过程、斗争方式上的差异是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②。

针对衙前农民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学界的观点集中在政治环境、理论指导以及农民运动领导人这三方面。谢俊美将以上三个方面又归为两大类，即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客观上说，辛亥革命后，中国虽然进入了民主共和时代，但在上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农村还是由地主和士绅占统治地位，他们与各级政权结合，维持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从主观上说，衙前农民运动的失败还与沈定一在领导上存在诸多不足有关③。刘学礼则认为，衙前农民运动除了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失败也不可避免地与忽视党组织建设、忽视武装农民，理论认识和实践脱节等挂钩④。

### 五、关于衙前农民运动组织、宣传工作的研究

组织与宣传工作是衙前农民运动的主体内容。衙前农民运动的组织工作，

---

① 丁晓强：《衙前农民运动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② 殷丽萍：《浙江衙前农民运动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

③ 谢俊美：《中共成立前后对农民的首次关注》，《上海革命史料与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④ 刘学礼：《试析衙前农民运动对中共创立时期乡村革命的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 年第 3 期。

即农民运动过程中农民协会的创建与发展等工作。李永芳将以衙前农民协会为代表的新型农会组织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农会组织进行比较，总结出新型农会具有以贫苦农民为主体、为推翻封建地主政权、以谋求农民自身利益的特点[①]。刘学礼认为，衙前农民协会的创立为之后的乡村革命提供了可借鉴的斗争方式[②]。李风华具体分析了衙前农民协会的创立过程，以及创立后的活动开展，并通过对《衙前农民协会章程》的考察，指出衙前农民协会是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有着革命纲领的组织[③]。中国金融政研会 、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所著《衙前农民协会设立的衙前信用合作社》一文介绍：1924 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第一个农民协会——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衙前信用合作社。当地农民对宗教迷信较重，农会便以此为题开展宣传教育，提议节制迷信浪费，节约开支，要求每户存入信用社一元，作为借贷基金，解决了初始基金，信用社得以初创成立[④]。

衙前农民运动的宣传工作，即：农民运动过程中沈定一、刘大白、宣中华等知识分子如何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以及宣传怎样的革命道理等。何扬鸣考察了衙前农民运动期间，组织利用《民国日报》《星期日报》等新闻报刊进一步扩大其宣传范围，激起社会舆论对衙前农民运动的关注和支持[⑤]。丁晓强具体分析了衙前农民运动中的宣传内容，如《谁是你们的朋友》《农民自决》等，指出以沈定一为代表的领导者，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状况，从中国的国情出

---

① 李永芳：《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新型农会组织述论》，《中学学刊》2015 年第 8 期。

② 刘学礼：《试析衙前农民运动对中共创立时期乡村革命的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 年第 3 期。

③ 李风华：《衙前农民协会：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新型农会组织述论》，《求索》2013 年第 3 期。

④ 中国金融政研会、中国金融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红色金融史编写组：《衙前农民协会设立的衙前信用合作社》，《吉林金融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⑤ 何扬鸣、郑建华：《衙前农运及其新闻舆论宣传》，《新闻大学》2001 年第 4 期。

发探索中国的社会变革之路[①]。杨胜华在其论文《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中，分析指出衙前农民运动主要通过开办农村小学、设立龙泉阅书报社、深入农民进行演讲等方式向农民宣讲革命道理。这种方式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农民教育理论的中国化，提高新时期农民的思想文化教育水平等都具有重要意义[②]。

王美娣介绍了衙前农民运动与理论刊物《责任》周刊之间的关系：衙前农民运动失败以后，以衙前农村小学校教员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仍然坚持在农村工作，在总结衙前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中国的农民运动，并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思考。1922 年 11 月 27 日，由他们组织的“任社”创办了《责任》周刊，编辑部设在萧山龛山，发行部设在杭州。《责任》周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十分重视农民问题，集中刊登了一批讨论中国农民问题的文章。作为衙前农民运动发起人的沈定一，还从思想方法上对当时党的路线进行了分析。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党的初创时期，《责任》周刊能够自觉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原理，分析中国农村的经济状况和阶级斗争状况，主张更加重视农民群体的作用，呼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这是走在时代之先、具有历史意义的。由于《责任》周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次年 3 月出刊至第 15 期时即被军阀政府查封[③]。

李维松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思想宣传发动工作的成功，关键是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作指导，自始至终贯穿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革命理念，代表了农民的根本利益。衙前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衙前农民运动的集中体现。以中共早期党员沈定一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宣传发

---

① 丁晓强：《衙前农民运动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② 杨胜华：《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1921—1927）》，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7—34 页。

③ 王美娣：《衙前农民运动与＜责任＞周刊》，《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04 年第 1 期；《责任》，浙江党史和文献网，http://www.zjds.org.cn/dsxx/zdtj/zgzjjs/201405/t20140530_4849.shtml，2014 年 5 月 30 日。

动衙前农民运动，体恤农民疾苦，反映农民关切，宣传形式为农民喜闻乐见；培养农运骨干，建立农民协会，依靠李成虎等农民运动领袖，让农民自己解放自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衙前农民运动实际相结合的具体体现，也是衙前农民运动宣传发动成功的根本原因[①]。

## 六、关于衙前农民运动相关人物的研究

沈定一（1883—1928），字剑侯，号玄庐，浙江萧山衙前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也是最早重视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人之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他的研究并不多，有限的研究论述关注较多的是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变化。熊彤从衙前农民运动分析了沈定一的农民运动思想[②]。屠正聪撰文详细介绍了沈定一相关事迹。1920 年沈定一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早期党员之一。1921 年 4 月，颇具才气的沈定一回到家乡衙前，开展农民运动，亮出了“废止私有财产、实现土地公有”的政治主张。为了迅速建立农民组织，沈定一出资兴办了衙前农村小学，邀请原浙江一师进步师生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等到衙前任教，在传授文化知识和实用知识的同时，向广大农民宣讲革命道理，培养和团结了一批农民积极分子，如萧山的李成虎、绍兴的单夏兰等[③]。

胡仲恺认为，沈玄庐是我国近现代史中一个值得研究而又颇多争议的人物，经历颇为复杂，生涯颇具传奇性，中后期思想上从中国共产党、共青团的创始人沉沦为国民党右派，1928 年死于政治暗杀，死因仍是历史之谜。沈玄庐的早期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以及中共领导下的农

---

① 李维松：《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是衙前农民运动的指导思想》，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② 熊彤：《从衙前农民运动看沈定一的农运思想》，《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2011 年第 1 期。

③ 屠正聪：《衙前：竖起农民运动第一旗》，《台州日报》2011 年 7 月 3 日。

民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①]。陶水木认为，沈定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而又极其复杂的人物。他出生地主家庭，却“自我革命”，发动领导了中国最早的现代农民运动；他是晚清政府州县命官，却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参与埋葬了清政府；他曾长期追随孙中山致力民主革命，但后来却成为西山会议派“笔杆子”，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他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后来却与中共分道扬镳，以致被开除出党。由于这样复杂的经历、变化多端的政治态度，九十余年来，沈定－研究也历经曲折，留给我们诸多思考[②]。

谢俊美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变迁也往往反映在一些人物的身上，沈玄庐就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时代风云的激荡下，最终走上了读书救国的道路，不仅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大活动，而且还投身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信奉马克思主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共第一个农民革命组织——衙前农民协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③]。李永芳、周明华等专家指出，1921 年 9 月由沈定一等创建的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新型农会组织，其为后来全国各地农民协会的广泛建立以及农民运动的蓬勃开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这一问题，近年来学术界曾不乏著述。但对于该组织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沈定一，因其后期背叛了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故学人或避而不提或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李永芳等专门撰文本文介绍沈定一与衙前农民协会的创建、衙前农民协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影响[④]。王明前论述了沈定一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

① 胡仲恺：《革命与人生——沈玄庐传奇》，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② 陶水木：《九十余年来沈定一研究述评》，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③ 谢俊美：《沈玄庐简论》，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④ 李永芳、常城:《沈定一与衙前农民协会》,《兰台世界》2013 年第 4 期; 周明华:《沈玄庐与衙前农民运动》，《杭州大学学报》1991 年第 4 期。

的贡献。辛亥革命前后，沈定一积极主张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建立正规化国家财政制度；五四运动前后，他猛烈抨击私有制的罪恶，富有远见地认识到中国没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鼓吹通过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发展国民经济，并较早注意到农民问题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做出独特的历史贡献①。

关于沈定一的农民运动思想，有学者认为沈定一对农民问题的认知，起源于其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这让他对农民悲惨的生活状况有着深刻的认知②。之后他加入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的经历，使其思想具有革命民主主义的色彩。当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这种新思潮的冲击下，沈定一开始转变为一个初步的共产主义者。谢国民等针对沈定一在衙前农民运动失败后，不再发动新的斗争转而实行乡村自治的缘由展开了思考，认为这是由于沈定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全面、不深入，受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影响造成的。他过分夸大人的内心的作用，认为可以用教育去启发剥削者的觉悟，可以用仁爱去感化剥削者③。王铁成、王文兵认为，沈定一在衙前农民运动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中国农民的实际问题，并用它指导农民运动，使衙前农民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和领导上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斗争，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王铁成等专家还从对农民生活惨状的关注、对农民生活悲惨原因的认识、解决农民贫穷问题的对策三个方面，分析了沈定一对农民运动的认知，介绍了沈定一发动农民运动的策略，即：宣传革命道理，启蒙革命思想；呼吁成立组织，共同反对地主④。

关于沈定一的农民运动策略，柳礼泉指出沈定一通过创办衙前农村小学，

---

① 王明前：《试论沈定一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纪念衙前农民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年9月。

② 王铁成：《沈定一的农运思想探析》，《理论界》2012年第5期。

③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衙前农民运动论文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186—199页。

④ 王铁成、王文兵：《揭开尘封的记忆：沈定一与衙前农民运动再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

免费吸收农民子弟入学而接近农民，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农民讲解革命道理来教化农民，创办新型农民协会来组织农民，在运动过程中采取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来动员农民。这为之后党的农民运动提供了可贵的经验[①]。陶水木指出，五四时期，沈定一介绍和宣传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接受了暴力革命学说，承认了无产阶级专政，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农民革命思想，这从农民运动中制定的各种章程、宣言以及演讲内容可以得到验证[②]。杨福茂则从沈定一生活的时代环境和家庭环境入手考察其思想的混杂性与矛盾性。沈定一出生官僚地主家庭，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旧有的制度腐败不堪，遂开始追求、接受新的社会思潮，而这其中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改良主义杂糅，让其摇摆不定[③]。

王铁成基于《农民自决》等文章的分析，论述了沈定一农运思想及其实践创新。沈定一是最早关注农民运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他在《农民自决》等文章中揭示和回答了农民运动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何以发起等问题。农民阶级的重要作用及受压迫性决定了农民运动的必要性，专制被打破后的国家治理赋予了农民运动的可能性，加强团结、组织起来是农民运动的前提条件，这些都展现了沈定一农运思想的要义和精髓[④]。

屠正聪《衙前：竖起农民运动第一旗》一文详细介绍李成虎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第一个倒下去的农民运动领袖。在共产党人的支持下，李成虎带领农民捣毁龛山“周和记米店”及附近哄抬物价的米店，迫使粮商恢复原价。9月27日，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共产党人起草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上第一个革命斗争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斗争的

---

①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衙前农民运动论文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9—36页。

② 陶水木：《五四时期沈玄庐思想述论》，《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3期。

③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衙前农民运动论文选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00—223页。

④ 王铁成：《沈定一农运思想及其实践创新——基于<农民自决>等文章的分析》，纪念衙前农民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年9月。

胜利使农友们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也显示了李成虎的反抗精神和组织才能。李成虎还领导农民夺回了在西小江的养鱼权和捕鱼权，成为衙前人眼中的英雄，大家称之为“虎将”。李成虎带领农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反霸斗争，不准地主高额收租，不准地主用大肚斗量租，一律使用农协监制的标准斗；取消地主下乡收租时的一切额外苛杂费用。农民群众的减租斗争，使地主豪绅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有的害怕不敢出门收租，有的同意“三折还租”。12 月 27 日，农民协会主要领导之一的李成虎在田里耙泥时被捕，于次年 1 月 24 日遇害。衙前农民运动影响波及萧山、绍兴、上虞 3 县 82 村 10 多万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减租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①]。万聿文专门介绍衙前农民运动先驱李成虎[②]。

### 七、关于衙前农民运动与其他农民运动比较的研究

周明华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发生的现代农民运动中，肇始于 1921 年的广东海丰农民运动和以后的湖南农民运动，是有口皆碑、有史皆载的。唯有发生在浙江萧山的衙前农民运动为史家所忽视，近人的史学著作中，或避而不提，或语焉不详，通观现有历史著作，只有胡华同志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有简略的叙述。这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缺陷，衙前农民运动应载入我国现代农民运动史册的首页。它兴起的时间比广东海丰农民运动早，较之湖南农民运动更早。衙前农民运动产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阶级团结战斗的革命组织——衙前农民协会，制定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运动的行动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衙前农民运动堪称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声。广东农民运动是从 1921 年 5 月彭湃同志在他的家乡海丰发动农民兴起的，到 1922 年 9 月才正式成立农民协会。而衙前农民运动在“民国九、十年时候，就曾经振动过全

① 屠正聪：《衙前：竖起农民运动第一旗》，《台州日报》2011 年 7 月 3 日。

② 万聿文：《衙前农民运动先驱李成虎》，《杭州》2021 年第 7 期。

国”[①]。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的制订与发布，二五减租的实现，以及其它一系列反封建斗争，反映了衙前农民运动的深刻性、广泛性和农民的创造精神，较之海丰农民运动毫无逊色。衙前农民运动固不如海丰农民运动声势规模大和坚持的时间长，然而海丰农民运动不见成文的农民运动宣言与章程[②]。

魏法谱也对海陆丰农民运动与衙前农民运动进行比较研究，认为稍晚于衙前农民运动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无论其规模还是影响都大大超过了前者，不仅组织了农民自卫军，还成立了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魏法谱还重点对海陆丰农民运动和衙前农民运动两个农会章程之异同及其原因进行分析[③]。殷丽萍也对浙江衙前农民运动与海陆丰农民运动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衙前农民运动与海陆丰农民运动，皆以农会为组织形式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由于社会环境、斗争目标和斗争方式的差异，两地农民运动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前者迅速陷于失败，而后者逐渐发展直至建立苏维埃政权。两地农民运动历史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农民运动相结合，采取切实可行的斗争方式，发挥群众的创造精神，才能使农民运动走上胜利的道路。两地农民运动的相同之处是：时代背景相同、基本内容相同、领导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殷丽萍还对两地农民运动的不同结果及原因进行分析：两地的社会环境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有个深化和修正的过程，说明中共早期领导人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经历不同。两地农民运动都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提高了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农民运动的自觉性，探索了先进理论与农民运动具体

---

① 中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纪念衙前农民运动90周年论文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第1页。

② 周明华：《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声——浙江萧山衙前农民斗争概述》，《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③ 魏法谱：《海陆丰农民运动与衙前农民运动之研究》，《汕尾日报》2016年10月23日。

实践相结合的途径[①]。

苗体君认为，衙前农民运动与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两次非常有影响的农运实践。农运的领导人沈定一与彭湃都是大地 主出身，都是最早看到农运在中国革命中重要性的共产党人。历史证明，彭湃至始至终坚守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并为农运事业而献身；而沈定一则在衙前农运后不久，便放弃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比较两次农运实践，都是从教育人手；发起前都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民运动是不可遏制的革命力量；都通过创作易懂、易传的诗歌、民谣，播撒革命火种；都用事实教育农民，启发农民组织团体与地主开展斗争；两位农运领导人，沈定一躲在幕后，彭湃则始终冲在最前方；都是在开展减租斗争中，惨遭反动当局和地主豪绅的残酷镇压[②]。

## 八、关于衙前农民运动影响的研究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先进分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中国农民革命问题的首次尝试，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显示了农民群众潜在的伟大力量[③]。周明华认为，衙前农民运动产生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阶级团结战斗的革命组织——衙前农民协会，制定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运动的行动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它是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声。所制定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正确地估计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农民指出了自身解放的道路，反映了几千年来广大农民对土地

① 殷丽萍：《浙江衙前农民运动与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学院学报》2008 年第 6 期。

② 苗体君：《衙前与海丰农运实践之比较》，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③ 《红色故事专栏第六期：衙前农民运动》，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05630587_120381672，2020 年 7 月 3 日。

的要求和愿望[①]。戴鞍钢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揭开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农民翻身求解放革命运动的序幕，并迅即引起周边贫苦农民的呼应[②]。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这次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显示了农民群众潜在的伟大力量[③]。陈晓蓉认为，衙前农民运动开创中国农民运动的新纪元，是“全国农民运动历史上最先发轫者”。衙前农民协会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通过的《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使农民组织有了自己的宣言、章程，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④]。李云波认为，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农民运动，在全国工农运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该农民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是沈玄庐为代表的浙籍先进分子经过长期的农村社会调查及深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动员后发起的有组织、有纲领的革命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在中国的第一次实践。衙前农民运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启发了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革命斗争意识，为中国共产党系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⑤]。

姜义华认为，1921 年 9 月 27 日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不仅是中国 2000 多年农民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件关乎农民利益的大事。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直至取得胜利，

---

① 周明华：《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声——浙江萧山衙前农民斗争概述》，《杭州大学学报》1980 年第 4 期。

② 戴鞍钢：《序幕与启迪——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百年追思论纲》，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③ 《衙前农民运动》，360 百科，https://baike.so.com/doc/2396300-2533687.html。

④ 陈晓蓉：《略论浙东衙前农民运动》，《江西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1 期。

⑤ 李云波:《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问题再审视》,《泰山学院学报》2022 年第 3 期。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当前，在中国社会转型，以及急剧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农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是与他们得到的利益存在差距，各种损农事件时有发生。为了维护农民的权益，有必要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①。李风华认为，衙前农民运动的主要活动表现为领导农民开展了抗租减租等捍卫自身利益的斗争，提出了破除迷信、扫除文盲、解放妇女、反对旧礼教等革命主张。这是一个具有鲜明阶级色彩的、以解决农村社会矛盾为己任的、真正属于农民阶级自己的新型农会组织。其为之后全国各地的农民协会的广泛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②。

刘学礼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乡村革命的继续，有别于中共一大的工作重点。衙前农民运动对中共乡村革命探索的贡献表现在：一是衙前农民运动开辟的乡村革命是以农民为主、先进知识分子为领导的革命，二是衙前农民运动重视对农民的文化革命教育与革命宣传，三是衙前农民运动重视发挥组织力量③。陈超对认为，1921年爆发的衙前农民运动被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④。魏法谱认为，衙前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农民运动，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发表了农会章程，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序幕⑤。王铁成、王文兵认为，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农民革命斗争，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滥觞⑥。

---

① 姜义华：《衙前农民协会成立：中国两千年农民运动史上的划时代意义》，《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1期。

② 李风华：《衙前农民协会：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新型农会组织述论》，《求索》2013年第3期。

③ 刘学礼：《试析衙前农民运动对中共创立时期乡村革命的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

④ 陈超：《近四十年来有关衙前农民运动研究述评》，《南方论刊》2020年第8期。

⑤ 魏法谱：《海陆丰农民运动与衙前农民运动之研究》，《汕尾日报》2016年10月23日。

⑥王铁成，王文兵：《揭开尘封的记忆：沈定一与衙前农民运动再认识》，《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3期。

骆小峰认为，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这次农民运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显示了农民群众潜在的伟大力量①。俞长寿认为，衙前农民运动促使中国社会的变化进步。1921 年 9 月 27 日成立的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早期农民革命运动，也是打破社会阶级体系的一次尝试，促进了贫困农民世俗观念的改变，让佃农阶层看到了集体力量的希望曙光，震慑了剥削阶级的贪婪欲望，地主们普遍产生了危机心里，从而影响了社会思想结构的变化，使中国知识阶层洞察到农民是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思想形成，也有重要的助益作用，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想体系的进步发展②。

**九、关于衙前农民运动时代价值的研究**

邓金松从大历史观出发，通过意义链、价值链和问题链三个视角，客观审视衙前农民运动在百年党史上的历史回响、使命召唤和现实观照，深入探讨衙前农民运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意义、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镜鉴意义和农村革命道路的探索意义；深刻剖析衙前农民运动所蕴含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使命、为民族谋振兴的历史使命和构建人类美好社会的崇高使命；系统梳理衙前农民运动所提出的解决中国农民的贫困问题、发动农民开展革命斗争的方法问题和推动中国农村革命运动的方式问题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深远影响③。

全根先认为，衙前农民运动的时代精神体现在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

---

① 骆小峰：《试论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② 俞长寿：《衙前农民运动促使中国社会的变化进步》，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③ 邓金松：《大历史观视野下的衙前农民运动》，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创精神；坚定信念、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奋斗精神。衙前农民运动革命实践说明，宣传工作是革命斗争的思想基础，组织工作是革命斗争的力量保证，良好的社会制度是保障民生必要的前提[①]。王铁成认为，衙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和切中时弊的组织方法，让这场由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农民运动表现出了和旧式农民起义不同的特点，为现代中国农民运动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②]。

陈灏专门论及衙前农民运动的时代价值。1921 年 4 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沈定一，回到家乡萧山衙前发动农民捍卫自身权益，组织农民开展革命运动，创办农民协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衙前开创农民革命运动、农民协会、农民革命行动纲领、教育农民的农村学校等四个全国第一。衙前农民运动在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铸造出“敢为人先、永不满足’的精神，诠释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精神密码，其精神具有深刻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③]。

谢冠富从衙前农民运动所呈现的“现代”形态论述其“敢为人先”精神与“新型”农民运动的义理，以历史纵向比较和逻辑推理相统一的方法，区别衙前农民运动“现代”形态与旧式农民运动在领导形态、时间形态、空间形态、表达形态和组织形态，展开对衙前农民运动的“现代”形态剖析，从理论上让我们进一步 理解衙前农民运动在中国现代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在中国农民运动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意义，更加深化对衙前农民运动的认识，也明理衙前农民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农民运动伟大开端的价值维度[④]。

---

① 全根先：《衙前农民运动的时代精神与重要启示》，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② 王铁成:《沈定一农运思想及其实践创新——基于＜农民自决＞等文章的分析》，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③ 陈灏：《衙前农民运动的时代价值》，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④ 谢冠富：《衙前农民运动的“现代”形态论域》，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李云波认为，沈玄庐是中共建党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的杰出代表和深人践行者，由其发起和领导的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在浙江乃至全国工农运动史上都极具典型意义，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亦充分彰显了浙籍先进分子在中共创建史上的卓越贡献①。朱珏认为，尽管衙前农民运动只坚持了两个多月就被镇压，但其呈现出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团结一致的奋斗精神、不畏艰险的牺牲精神”这些精神实质却永远为后人所铭记②。骆小峰梳理总结了衙前农民运动开展成敢为人先不怕牺牲的开拓精神，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斗争精神，团结协作心系民众的服务精神，并提出这些精神在当下还需要进一步传承和弘扬③。

## 十、新时代纪念衙前农民运动的几点启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教育引导青年党员永远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赓续党的红色血脉，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在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对近年来衙前农民运动研究情况进行梳理，追思百年前衙前农民运动的英勇斗争事迹，深受启示。那就是，要弘扬敢为人先、永不满足的衙前农民运动精神，激励人民群众去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为乡村振兴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

① 李云波：《衙前农民运动的理论动员及运动之回响》，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② 朱珏：《萧山衙前农民运动及其精神实质》，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③ 骆小峰：《试论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精神及其时代价值》，纪念衙前农民运动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杭州，2021 年 9 月。

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 年，第 69 页。

（一）大力弘扬衙前农民运动精神。百年奋斗一切成就的取得，可谓是对衙前农民运动先辈最好的告慰与纪念。百年前的杭州衙前，发出了“有要大家有，好要大家好”这振聋发聩的声音，闪耀着共产主义的价值与坚定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让衙前农民运动共富的革命火种薪火相传，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广阔前景。

（二）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始终代表中国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也因此能在百年征程中，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战胜中外反动势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衙前农民运动在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居于重要地位，从中可以领悟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初心使命、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和构建人类美好社会的崇高使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不忘初心，始终秉持一切为了人民， 切依靠人民的奋斗目标，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不断把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内的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衙前农民运动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农民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2020 年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了全国贫困农民一个不少的脱贫了，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①]。这是中国历史了从未有过的伟大奇迹，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也是衙前农民运动中革命者们追求的梦想。衙前农民运动是早期共产党人直面农民解放、贫困这一难题并寻求解决方案的创新实践，要大力传承弘扬其蕴含的“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努力有更多务实、创新、发展的举措和实践。

（四）永葆斗争精神。“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面对前进道路的风险挑战，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党领导的衙前农民

---

①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591398.htm。

运动正是有坚强斗争精神，才能不断战胜地主剥削，克服各种困难，从挫折走向胜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必须带领广大农民坚持发扬斗争精神，需要创新思路、真抓实干，一鼓作气、斗争到底，展现出广大农民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

（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先进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重要尝试，是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次光辉实践。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实际，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决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六）坚持经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历史。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生动案例，是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的一次伟大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仍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着力解决党存在的突出问题，持续推动自我净化、自我革新，不断把伟大的社会革命推向前进。

# “成为新青年”：施存统早期个人生命史及其思考

◎程德兴　蔡宜旦[①]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人之一，施存统在建党、建团的过程中，以及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早期青年运动作了大量的实践性工作和理论性工作。通过对施存统早期生命史的梳理研究发现：受传统的地域文化、家庭文化以及旧式私塾儒家文化教育的影响，少年时期的施存统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是一个忠实的“理学信徒”，推崇“孝道礼制”文化。但来到浙江一师这个新文化场域之后，施存统首先与原生家庭的文化氛围在空间距离上有了割裂，且通过社交网络、文字阅读等方式与新文化建立了勾连，从而使得他在新、旧文化价值取向的对抗和撕裂中，逐渐“成为新青年”。总之，施存统的早期自我身份认同呈现出了从“理学信徒”向“新青年”转变的过程。从施存统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青年随着生活环境和教育经历的变化而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认知也随之发生改变的过程。这对当下如何做好处于“思想易变期”的青少年以及流动青年的思想引领工作，具有比较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施存统；个人生命史；身份认同；青年思想工作

---

①**作者简介：**程德兴，女，浙江省团校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青年群体研究，联系电话：15167114231, 邮箱：bnumsx@163.com。蔡宜旦，女，浙江省团校党委副书记、教授，研究方向：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 一、引言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创建人之一，施存统在建党、建团的过程中，以及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中国早期青年运动作了大量的实践性工作和理论性工作。虽然在1927年施存统公开脱党，但在此后的不同历史时期他在翻译、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上，以及投身民主革命、抗日救亡活动和支持新中国建设等方面仍起到了很多积极作用。可以说，多变丰富的政治活动、活跃复杂的政治思想使得施存统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变幻、党派聚散离合、中国政治曲折发展等诸多历史事件的一个浓重缩影和反映①。因而，施存统也就成为史学家们争相言说的对象。目前学界关于施存统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研究方向：一是施存统早期在建党、建团以及传播马克思主义上的贡献。二是对施存统政治思想、中间路线思想和政治活动等方面的研究。三是对施存统思想发展转变历程的研究。对于第三个研究方向，现有的研究多从宏观角度分析施存统思想的大致演变路径及多方面影响因素，但对于施存统内心深处自我身份认同的变迁并未详细论述和分析。基于此，本文以1920年施存统离开杭州前往北京工读互助团前的社会环境作为宏观背景，以施存统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回忆性文字、文章、言论、信、及其他文献里所涉及的相关内容作为主体材料，并以同时段内与施存统发生关联的历史人物的回忆性文字、日记、书信等作为辅助材料，剖析施存统早期身份认同和思想认知发展转向的内在逻辑。

## 二、从“理学信徒”到“新青年”：施存统早期思想认知的发展转向

通览施存统的人生经历会发现，走出金华，来杭州在浙江一师读书是其早期生命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性事件。在这前后，他的生活环境、所接触的东西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他的思想认知和人生志向发生了比较大

①宋亚文：《施复亮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的转变，从“理学信徒”、孔家文化卫道士变成了一名反对传统、与原生家庭割裂的“新青年”。下文将以1920年施存统入读浙江一师为时间分界点，将他的早期个人生命史划分成两个阶段。

（一）“理学信徒”与“当官带兵”的人生理想：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少年施存统

在就读浙江一师之前，施存统主要活动空间便是家庭和学堂。原生家庭的氛围，以及早期的学堂教育对他的认知、思想理念和人生价值取向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1. 传统守旧的原生家庭：男性霸权虐待和母亲软性文化影响。施存统，1899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县叶村的一户四世同堂的农民家庭。施存统是家族中的长房长孙，辈分最小，因而常常受到那些年龄跟他相仿甚至年龄比他小但辈分比他高的“长辈”们欺负。但在家族辈分、规矩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年幼的施存统就算被“长辈”们欺负了，也只能忍气吞声，不能反抗。同时，施存统的父亲施长春，是一个精于农事但脾气暴躁又爱财的农民，对年少的施存统动则打骂、苛责。施存统16岁那年，在洗腌菜坛子时不小心将坛子打破，怕被父亲责罚便离家出走，但又无处可去，只好回去被父亲痛打一顿。[①] 这样的父权体制下的男性霸权主义式的家庭文化一方面给年少时的施存统带去了不少的伤害和痛苦，使得他不断地想逃离和反抗原生家庭。后来，施存统回忆道：“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痛苦和虐待，决不会如后来那样坚决地从事社会改造，以致破坏家庭。”但在另外一方面，家庭也是“孝”文化重要的生产、传播和实践的空间场所和阵地。所以，在一个如此守旧的传统大家庭中，施存统难免会受到传统孝道文化的浸淫和影响。

施存统的母亲徐氏出生于金华的一个书香门第，会识字，熟知一些《铡美案》《珍珠塔》等古代考取功名做官为民、忠孝节义的戏曲和民间故事。徐氏常将这些故事和戏文讲给施存统听，也常带他去看这些乡戏。彼时的施

①何民胜：《施复亮全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

存统受其影响，便以读书考取功名、做官、“扬名声，显父母”为人生理想，“一心一意地把全副精神都注在‘状元’二字身上”。可见，此时的施存统受到了仕文化传统基因的影响。但在1905年的时候科举制度被废除，施存统读书与仕宦的制度性途径从此中断。而此时在国家被外族侵略的背景下，施存统又立下了从军的志向，他在《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一文中写道：

“我在家里过了半年多地狱生活，急急想要跳出。而且我终不愿老死牖下，大丈夫当轰轰烈烈，战死沙场，已成为我有力的人生观”。

综上可以看到，施存统的原生家庭环境，尤其是他父母的言行举止给他幼年和少年时期的人生观和思想认知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也给他后续思想认知上出现分裂和转变埋下了种子。具体而言，一方面这样的家庭文化氛围给他的心里注入了礼、规矩、孝道等传统文化基因和仕宦的文化情怀，以及在旧式私塾儒家文化教育的影响下，施存统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是一个忠实的“理学信徒”，是孔家文化的卫道士，推崇“孝道礼制”文化。另外一方面他也看到传统家庭文化中“吃人”的一面：父权的霸道文化和迂腐的长幼规矩等，让他遭受到了来自原生家庭的不公正待遇，让他看到了传统文化中不合理的一面。而这些负面影响也是促使他与家庭决裂，走向另一面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2. 新旧交杂的启蒙教育：传统文化的洗礼和新学科的渗透。施存统十岁（1909年）的时候进入村里的一家私塾中求学，先后学完了《三字经》《孝经》《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深受影响，更加巩固了他对传统的孝道文化和仕文化的认同，立志要做孝子，甚至效仿书中的做法，在家里对父母做起“晨昏定省”。12岁时，他又进入村里的初等小学堂，仍是读《论语》《孟子》。只是，此时他的理解更加深刻，对孔子及其门徒尤其是子路十分的佩服，誓要做“圣人之徒”和忠实的卫道者。甚至给自己取号“志由”“子由”，以表达自己对孔子门徒子路的钦佩之情。[①] 值得注意的是，施存统读书时，科

①杨华丽：《“五四”新文化思潮中的＜非孝＞事件考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年第2期。

举考试已经被废除，但他接受启蒙教育仍是以学习传统儒家文化为主，这与当时金华的地域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尽管金华从南宋以来便是吕祖谦学派（也就是程朱学派）的一个理学重镇，在当时号称“小邹鲁”，传统文化的根基比较深厚。[①] 所以，金华这个地方，礼教势力和儒家文化仍然有比较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施存统 1912 年进入长山小学堂，接受到了国文、地理等新式学科的知识，这些知识学习开拓了他的眼界，对国破家危的社会环境、对共和政治等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打破了传统文化单一化的影响格局，也使他的思想认知和人生目标的设定突破了为己、为父母、为家的框架，站在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设定自己的理想和身份。如他曾在《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中提到，就是在读地理这门科目时，看到被割被租的地方，身上的爱国情怀被激发，立志从军做一个大将，“誓要恢复他（指被割被租的地方）”。这也意味着，当施存统走进了新式学堂，学习了新式科目知识，开拓了眼界，影响其价值观和思想认知的因素和渠道更加多元、前沿。这些也为他后续走出叶村、走出金华、反叛原生家庭埋下了伏笔，作了预备。

（二）“新青年”与“从事社会改造”的人生追求：新文化影响下的青年施存统

在走出原生家庭之后，施存统来到了杭州，并考入了浙江一师。他的活动空间、生活环境等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他的认知、理念和价值取向出现了重大转变。

1. 就读浙江一师：进入新文化传播的重要场域。施存统受不了原生家庭生活和父亲的粗暴对待，于 1916 年离家投奔在杭州工作的舅舅。来到杭州之后，一时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和出路。无意之间，他看到了浙江一师的招生广告，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考了浙江一师。从施存统的这段经历可以看到，此时传统的亲属社交关系网络在他远距离的空间流动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施存统可动用和联系得上的社交网络以亲属关系为主，

---

①叶文心：《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第 62–63 页。

而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个人社交圈的扩大，尤其是通过学业和个人文字建立起了脱离于亲属关系的社交网络，他所能接触到资源和人脉有了进一步的扩大。这些都会在他今后人生中的空间流动发挥重要的作用。

1917 年施存统正式考入浙江一师。这个时候的浙江一师在校长经亨颐的主政改革之下，学校充满自由民主气氛， 各式新报刊、杂志涌入校园。同时，经亨颐聘请了一批有革新思想、有真才实学的新派人物为教员，其中就包括时称浙江新文化运动的“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和夏丏尊。一时之间，浙江一师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推动社会进步等诸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因而被蔡元培誉为“浙江最负盛名的学校”。但施存统进入浙江一师以后，便成为“道学先生”单不庵的理学门徒。施存统“一切均以他（单不庵）为榜样，一举一动都模仿他（单不庵）”，并且督促自己“要切切实实地做到‘至德要道’的‘孝’字”。[①] 但单不庵是旧学楷模并不意味着他保守固执，相反，单不庵与钱玄同、胡适等北京新文化学者的密切联系，且其本人不仅能接纳新学，更对新学有自己的见解。依托业师的社会网络，施存统比其他同学更快地接触到了新思想。正如马楠在文章中明确指出，施存统转向激进，写作《非孝》一文，背后亦有单不庵的影响。[②]

同时，在进入浙江一师这个新文化生产和传播的场域之后，他的社交网络得以重塑，他结识到了这些新派学者，思想上受到他们的影响并通过他们开始了解到国内外的新思想。例如，在校期间，他就和夏丏尊关系密切。1920 年，夏丏尊在评论施存统反封建的表现时写道：“他现在底行动中，差不多可以说有一部分就是我底行动，或是我行动底变形。”[③] 在浙江一师的场域之中，施存统也更容易接触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出版物，这些新式刊物

---

①宋亚文：《施复亮研究综述》，《浙江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

②马楠：《“道学先生”门下出“新青年”——五四时施存统激进转向背后单不庵的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6 年第 5 期。

③齐卫平:《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民主革命时期施复亮的政治思想初探》，《宁波师院学报》1992 年第 4 期。

也成为影响他思想认知的重要因素。1917 年，施存统第一次看到《新青年》上陈独秀写的《复辟与孔子》一文，一开始难以接受，大骂陈独秀无理，过几日又拿出来再看时又觉得骂得有点道理。随着更多地接触《新青年》杂志，施存统对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领导者及新思想的接受度和认同度越来越高，直到成为忠实的追随者。正如他自己所言："到了 1919 年下半年，（对《新青年》中的观点）就全体都认同了。凡是《新青年》所说的话，总是不错的。"

总之，来到浙江一师这个新文化场域之后，施存统首先与原生家庭的文化氛围在空间距离上有了割裂，其次施存统通过社交网络、文字阅读等方式与新文化建立了勾连，新思想通过师承交流互动、文字阅读等方式对其思想认知产生影响，让他这位"理教信徒"的认知开始发生松动。

2. 家庭事务的冲击和催化：与家庭彻底决裂且成为新文化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之一。1919 年，施存统的母亲身染重疾。施存统借来三十多元钱交给他的父亲，让父亲给母亲治病。但父亲不仅把钱挪作他用，不给母亲治病，而且还对母亲恶语相向、虐待不堪。施存统回家之后看到母亲病危的场景，十分痛心。这件事情让他对"何为孝"以及孝道的合理性和正方性产生了怀疑和动摇："顺父逆母，不孝；帮母斗父，亦不孝，然则如之何而后可"[①]。这种现实场景的撕裂和矛盾冲击了他原有的价值观，并让他下定决心与原生家庭和传统孝道文化决裂、分道扬镳："我不再怀念我的家庭，我觉得我对于那样的父亲实在没有尽孝的义务"。激愤之下，他向旧制度和旧礼教开炮写下了《非孝》一文，发在《浙江新潮》杂志第 2 期。该文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成为舆论的焦点，也获得了进步人士的关注和支持。如陈独秀曾评价道"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的。"可以说，《非孝》不仅让施存统通过文章跟北京以及上海知识界的前沿发生文字上的联系，即以文字这种软实力，作了新的社会网络的建构；而且也意味着施存统不再仅仅是新文化、新思想的接收者、受众和传播者，同时也成为了新文化、新

①姜丹书：《施存统的〈非孝〉与"浙一师风潮"》，《民国春秋》1997 年第 3 期。

思想的生产者和建构者之一。《非孝》的出现意味着施存统与过去的自己、与传统文化和原生家庭的彻底决裂，标志着他认知和思想理念上出现了转变，坚定地站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阵营之中。正如他在《我写＜非孝＞的原因和经过》中所提到的："我的思想因为受了《新青年》杂志的影响而已有了很大的变动，甚至可以说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动，我对孔孟之道已不再信仰，对于旧礼教已表示反对"。[①]

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之下，在五四运动前夕，施存统对孔孟之道不再信仰，对"孝道"文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产生了质疑和不满，但并不意味着他就不愿意做"孝子"，只不过他愿意"有选择"的孝。正如他自己剖析的那般："对于'孝'字，我还没有多大的怀疑，还想做一个孝顺母亲的'孝子'"。同时，能写出《非孝》一文，并且母亲的遭遇之所以能给他带去如此巨大的冲击，正是因为他原本十分认同于"孝文化"并想要做一名"孝子"。可见，写出《非孝》的施存统在骨子里是想遵循"孝"文化的。

以上种种因素促使施存统的思想认知发生转变，使他从一名"理学卫道士"变成一名受新文化影响的"新青年"，成为新文化、新思想的拥护者、传播者和生产者、建构者。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人生志向也发生了转变，从"立志考取功名"到"立志从事社会改造"：少年时期的施存统在家庭文化、地域文化的影响之下，立志想考取功名，谋得一官半职。但随着他不断接触新的知识，他的人生志向也在不断发生改变。首先，在他被浙江一师录取之后，他的情绪被极大的调动起来。被浙江一师录取意味着他的人生会有新的变化，这些新的变化激励着他重新考量自己未来的人生路。正如他在《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中写到："从此之后（指被浙江一师录取之后），一个要做官带兵的存统，就变成一个要做大教育家的存统了！从前迷迷蒙蒙的人生观，此后才有正确的了解。"[②] 此后在浙江一师读书期间，受老师和同学

①施复亮：《我写〈非孝〉的原因和经过》，《展望》1948 年第 2 期。

②施复亮：《回头看二十二年的我》，《觉悟》1920 年 9 月 24 日。

（尤其是学长杨贤江）的影响，施存统立志要“做一个有发明的教育家”：

“我此时颇有明确的人生观，晓得一个人是不能独立的，我受社会的恩惠是很大的，我不当专做家庭的孝子，我还要做社会上一个有益的人，我于是便决计献身教育。我此时看教育是我底终身事业。但我不愿做一个平凡的教育家，我要做一个有发明的大教育家。”①

对于施存统上述人生志向的转变需要做以下两点说明：一是如果说施存统在收到浙江一师录取通知时立志“做大教育家”，这一想法是受外部事件刺激、情绪激动之下想出来的，具有瞬时性、情绪化的特征，而入学后要做一个“有发明的大教育家”，则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具体明显的反思性、内生性的特征。这意味着彼时的施存统在接受教育之后投身教育的志向更加坚定。二是施存统的此时的人生志向已经从从年少时立志做官，以显父母转变为不仅仅只做家庭的孝子，而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这种转变意味着他在设定人生志向的时候，参考的标准和考虑的因素已经从父母、家庭和小我扩大到了社会需要，涉及到了除“孝”和家庭以外更复杂的内容。

而在受到母亲事情刺激之后，施存统敏锐地意识到母亲事情的发生是由财产私有制、家庭制度和“孝”的奴隶道德等因素导致的。要想改变天下许许多多跟他母亲相似命运的人，就是要“改造社会，非从根本改造不”②。可见，此时的施存统人生志向则变得更加激进，生出要进行社会改造的想法。而在他因《非孝》一文而受到当局迫害，无奈退学北上到北京参加工读互助组之后，他更是看到了当局政府的腐败之处，从而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信奉无政府主义。

（三）“成为新青年”：施存统早期思想认知破立背景下的成长之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施存统的早期自我身份认同呈现出了从“理学信徒”向“新青年”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施存统是在新、旧价值取向的对抗和撕裂中，逐渐“成为新青年”。具体以写作《非孝》一事为例：施存统原本对孝道文化认同度和内化程度极高，早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均

①施复亮：《回头看二十二年的我》，《觉悟》1920 年 9 月 24 日。

②施复亮：《我写〈非孝〉的原因和经过》，《展望》1948 年第 2 期。

以“要做孝子”来要求自己的言行。但是，家庭中发生的事实以及新文化、新思想带给他的对于家庭事实的一些反思，最终让他新旧价值观的撕裂中写下《非孝》一文。如果施存统一开始并非至孝之人，那么家中母亲的遭遇也就不会给他带去如此之大的冲击和反感，进而也不会引起他作出如此深刻的反思。同理，如果施存统早年对理教抱有如此之高的认同，新文化和新思想也就不会对其思想和认知带去如此之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正是在新旧文化价值取向和认知的破立、对抗和撕裂之中，施存统最终成为了一名“反孔斗士”的新青年。

## 三、总结与思考

从前文分析中可以看到，施存统在成为新青年的过程最核心的原因是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而他之所以能接受到新思想、新思潮与他个人生活空间和生活环境的改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从施存统早期个人生命经历对于如何做好当下青年思想引领也有比较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 （一）新思想的影响：施存统成为新青年的核心因素

施存统的思想认知和人生志向发生较大的转变，与新思想对他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他回忆性文章文字中，他多次提到了新式出版物及新式知识分子（如陈独秀对他的肯定和鼓励）对他思想认知的影响。虽然他对新思想、《新青年》杂志和陈独秀的一些主张也经历了由反对、反感到认同和支持的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新思想与他个人对于家庭生活的反思，以及个人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一道，逐渐注入到他的内心，慢慢解构他原有的认知和“三观”，从而慢慢成为一名新青年。

### （二）空间场域的转变：理解施存统思想认知变化的角度之一

如前文所言，施存统早期思想认知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是进入浙江一师这个浙江新文化中心学习之后。而思想认知转变的背后是施存统生命历程中空间场域的转变。少年时期，施存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范围是在村落和家庭之中，影响其价值观的信息来源和信息渠道也相对闭塞，文化体系也比

较落后、单一。在这种文化空间场域之中，施存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传统思想的浸淫，成为“理学卫道士”。为了逃离原生家庭中的不公正对待，在传统亲属社交网络的帮助和支持之下，施存统得以离开家乡，去往杭州这一政治文化体系更为复杂多元的城市空间。而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新式教育体制得以建立，杭州作为浙江省的省城建立了一些新式的中等学校，这给来到杭州的施存统提供了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机会。在浙江一师这个新式学校空间里，他不断接受新式教育，汲取新思想、新文化。在以理学为文化根基的原生家庭与有着新文化氛围的浙江一师这两个场域之中，新旧文化、新旧价值观念的撕裂和冲击在施存统身上得以体现，而在家庭事务的冲击之下，施存统得以完全与旧文化、旧的思想认知彻底决裂，这也展现出了那个时候家庭和学校所主张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张力和对抗。在与家庭决裂、与父辈产生代沟之后，家乡成为施存统“回不去的故乡”，他已经无法适应家乡社会中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所以在被浙江一师退学之后，他没有回到家乡，而是走向了作为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北京和上海。在北京和上海，彼时的北京和上海是新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核心区域，也是新式知识分子的聚集区域。在这里，他与最前沿的思想、社会风气直接发生联系，直接加入到这些新式分子之中，参与新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从而成为推动社会改革先进力量中的一分子。在施存统的每一次空间场域的转变过程中，其思想认知都会或多或少的发生一些变化。如，在到杭州后，他从一个理教卫士变成一个立志从社会改造的新青年；在到北京之后，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让他意识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弊端；在到上海之后，借由戴季陶和沈玄庐而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发生勾连。这一系列空间场域变化的过程展现出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一位来自偏远山区的农村青年如何一步步走向社会革命发生的场景核心之中，更是体现了施存统在自己生命历程中不断求新求变的一种人生动向。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代中，很多年轻人同样经历着施存统身上的这种空间场域的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认知上的变化，比如，俞秀松、王会悟等等。他们都经历着出走家乡，来到一个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再走

作为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和上海。

（三）以史思今：对于当代青年思想引领工作的一些思考

从施存统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青少年随着生活环境、教育经历的变化而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认知也随之发生改变的过程。在施存统以后的时代里，有无数青年也会经历价值观和思想认知不断被解构、被重塑、不断经历破与立的过程。如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的《潘晓讨论》中所呈现出来的青年对于家庭关系、人际关系、人生理想的一些讨论、迷茫和困惑。再如，现在有很多青少年在从高中进入大学或是从大学到参加工作的过程中，会因所处环境的改变而在思想认知上经历一些挣扎和“破与立”。在这“破与立”、迷茫之间，青年人难免会经历思想上的阵痛和挣扎。对于每个青少年来讲，这是人生成长过程中的一节“必修课”，也正是在思想上的“破与立”之中才能更清楚的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内心。

但是结合施存统的经历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一是在各种思潮和观点层出不穷的今天，共青团、学校等组织机构和全社会如何有效建构一个正向价值观的强势输出体系，扩大主流价值观和思想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抓住青年思想认知容易发生变化的时机和场域，做好思想引领工作，帮助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减轻青年思想上的阵痛和挣扎，以防青年在思想的“易变期”内走上歪路。二是在“流动中国”的大背景之下，青年人空间流动和场域变动更加频繁和容易。从施存统身上，已经看到了空间场域的流动对于一个青年思想认知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那么，如何做好流动青年的思想引领工作，加大对流动青年的正向引导，也是共青团等组织和相关职能部门需要面对的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关于青年成长成才的重要讲话，开创性地围绕青年和青年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战略思考和指导部署，形成科学系统的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共青团组织和相关职能部门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引领当代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始终跟着中国共产党走，永远为人民服务。

# 从三个维度探究中共杭州小组建立与发展经验对上城区党建事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谷小洁[①]

**内容提要：**1922 年 9 月，浙江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在上城区皮市巷 3 号“白屋”正式成立，成为黑夜里的一簇薪火，点燃了中华革命志士的希冀夙愿，成为指导杭州人民前进的主心骨，开辟了杭州红色新天地。“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②] 为此，本文将从历史维度看中共杭州小组的建立背景，用史实探究回望它的来时路；从实践角度看中共杭州小组的革命成就，用意义细数丈量它的脚下路；从时代维度探究中共杭州小组革命精神为新时期党建事业带来的经验启示，用精神浇筑浸润新时代未来路。

**关键词：**中共杭州小组；经验启示；革命精神；上城区新时代党建

## 一、从三个维度探究中共杭州小组创立背景、成就经验及革命精神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上城区作为浙江红色根脉重要承载地，更要加强对红色资源的梳理分析。2011 年，时任中央政治局

---

①作者简介：谷小洁，女，中共杭州市上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联系电话：18311412665。

②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 年第 19 期。

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勉励小营巷社区党委，“以建设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为契机，发挥党史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中共杭州小组作为浙江省第一个党组织，在上城区、杭州市乃至浙江省的党史上都占据极其关键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此，谨从历史、实践、时代三个维度对中共杭州小组的创立背景、革命成就，以及革命精神对新时代党建事业发展的启示进行阐述分析。

（一）从历史维度看，中共杭州小组的创立，是党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的必然抉择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①] 中共杭州小组的应时、应势而生，充分印证了这一观点。“民族危、阶级分、人心向、民智开”的社会背景为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来杭创立中共杭州小组提供了现实“土壤”和思想“养分”。

第一，“民族危”为中共杭州小组的创立提供历史条件

从社会“气候条件”来看，1842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近代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侵略不断加剧，封建专制政权日益腐朽、没落，国家濒临灭亡边缘，中华民族深陷危机漩涡之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英、法、意、美等国把势力范围从上海、宁波扩展到杭州……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束缚着杭州，使杭州在列强残酷的掠夺压榨面前寸步难行。”[②]1895 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杭州被辟为通商口岸，次年 8 月正式开关后，英国人掌控了关务实权。1896 年，日、英、美、法等列强在杭州相继设立领事馆，日本则将清政府设在拱宸桥的通商场北半部辟为租界，行政权和司法权均被其侵占，其他诸国列强在通

---

①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 年 2 月 20 日）》，《求是》2021 年第 7 期。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杭州简史（1921—2021）》，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 页。

商场内亦纷纷租地经营。杭州进入了历史上最苦痛、最黑暗的时期，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遭封建主义奴役之苦，残山剩水，民不堪命。

第二，“阶级分”为中共杭州小组的创立打下社会基础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不断加剧，杭州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一方面近代化进程加快，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得到新发展，振兴实业的热情高涨，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产业工人数量剧增，“至1919年5月前，已有2万余人”①，且多为赤贫市民、城市无业者、贫雇农和流浪者等真正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扭曲变态特性，新旧事物互相阻滞但又并存演进，社会转型不得已在这种新旧对抗的历史阵痛下艰难进行。社会矛盾激化之“因”已种，苦难人民奋起反抗之“果”渐成。20世纪20年代初，杭州产业工人为求生存和改善恶劣的生产生活条件，多次掀起罢工、请愿、抵制美货等反帝反封建斗争。部分民族资本家也参加了抵制美货、保卫路权等反帝斗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断发展，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风雨飘摇中积蓄革命力量。

第三，“人心向”为中共杭州小组的创立做好政治准备

随着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的逐一失败，中国社会强烈呼唤真正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可带领人民走出被帝国主义压迫和被封建主义奴役的沼泽深渊、以人民利益至上的领导者。终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带来社会主义火种，中国共产党于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上应运而生后，在全国各地建立党的各级地方组织成为当务之急。此时，随着全国共产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和浙籍先进知识分子在上海从事的中国共产党建党活动，杭州工人阶级力量争生存、求解放的愿望进一步增长——“1920年七八月间，浙江印刷公司的倪忧天、徐梅坤等先进工人建立了浙江印刷公司互助会，这

①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杭州简史（1921—2021）》，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页。

也是杭州最早的工会组织”[①]；农民阶级革命热情高涨——1921 年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是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随之建立，先进的革命思想在农民中广泛传播；知识分子意识觉醒——经过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和 1920 年春“一师风潮”，杭州先进知识分子义无反顾投身工农运动，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1922 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支部在上城区皮市巷 3 号成立，成为浙江省首个团组织。杭州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及工农运动的并进发展，不仅锻炼出一批革命骨干，也为党组织建立做好了政治准备。

第四，“民智开”为中共杭州小组的创立扎牢思想根基

五四运动后，全国各地出版的文化刊物种类陡增，其中相当数量以传播新思潮、改造旧社会、反帝反封建为己任，马克思主义思潮渐成主流。“据不完全统计，从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到 1922 年底，浙江共创办报刊 58 种”[②]，仅仅“杭州一地，在短短六个月里，便出版了 16 种以教师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刊物，总期数达到 120 余卷”[③]。1919 年，《新青年》通过浙江省立一师学生成立的“书报贩卖部”、“学生贩卖团”广泛推销；《浙江新潮》作为浙江最早受十月革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猛烈抨击黑暗虚伪的社会制度、封建礼俗，产生广泛影响。1920 年，为迎接世界新潮流、适应“中国时势的趋向”和自由“发表新思想而创办”的《钱江评论》诞生，并作为《浙江江潮》精神的继续而广受欢迎。此外还有呼吁国民干救国事业的《杭州学生联合会报》、抨击腐朽社会的《浙江第一中学学生自治会半月刊》、主张普及女子教育的《进修团团刊》、主张改革非“人”社会的《浙人》旬刊、浙江工人

---

①《开篇：杭州工人阶级的诞生》，杭州工会网站，http://www.hzgh.org/100zn/view.aspx?id=85665。

②赵晓兰：《从“一师风潮”看“五四”时期的浙江报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

③郝斌、欧阳哲生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 1102、1103 页。

首份自己的报刊《曲江工潮》等[①]。杭州到处涌动着“红色热潮”，马克思主义为杭州和浙江建党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撑，造就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队伍，革命号角开始响彻大地。

鉴于此，无论从历史条件、社会基础、政治准备，还是从思想基础、理论基础等各方面而言，杭州建立党组织条件均已成熟。1922 年 8 月底，浙籍先进分子徐梅坤肩负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江浙区委书记一职，自沪返杭，计划建立并发展江浙地方党组织。9 月初，徐梅坤在杭州市上城区皮市巷 3 号秘密召集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于树德、浙江陆军第二师陈仪部队连副金佛庄、沪杭铁路杭州闸口机修厂钳工沈干城，四个 20 多岁的青年革命者在红色据点“白屋”里，成立了浙江省最早的地方党组织——中共杭州小组，于树德任组长。自此，革命的旭日朝阳光耀钱塘，感召一代又一代中共党员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使命，“勇往奋进以赴之、瘁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②]。

（二）从实践维度看，中共杭州小组的创立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共建党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应有之效

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后，立足革命实际需要，重视量的积累，不失时机促成杭州及周边革命组织、革命运动和革命理论向前拓展，实现质的飞越；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工农群众开展党的工作；发挥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与中共建党和革命实践要求相结合，勇毅担起浙江各地建党及党建重任，领导人民英勇斗争，让革命火种在杭州乃至浙江热土上熊熊燃烧。

第一，建组织、强队伍：于杭州及周边乃至全省各地建立党的组织机构，培养革命力量，逐渐壮大革命队伍

---

①赵晓兰：《从“一师风潮”看“五四”时期的浙江报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6 年第 1 期。

②杨立元、杨春：《李大钊的担当精神之深刻内涵与时代意义》，《光明日报》2019 年 9 月 26 日。

中共杭州小组的成立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建党行动，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后，一方面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一方面积极在全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3年春，杭州党小组“发展了徐白民、唐公宪、何赤华、倪忧天等人入党后，扩建为中共杭州支部”①。1925年9月，中共杭州支部更名为中共杭州独立支部，“十二月，杭州独支书记华林接上海区委通知组织杭州地委，这时党员已发展到三十余人②。1926年1月，中共杭州地方委员会扩建而成，下设7个支部，“四月，上海区委组织部统计……共有党员六十人”③。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特别是在杭州被克复后，地委先后下辖5个直属支部和建立24个（独立）支部或小组，党员达到3000余人④。与此同时，杭州党组织肩负着浙江全省党组织发展重任，在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成立前，先后派人至兰溪、诸暨、义乌等多地进行建党工作。“到1927年4月上旬，全省县、市级党组织已发展到30多个，党员达到4000余人，中共浙江地方组织得到了迅猛发展”⑤。

第二，联工农、齐斗争：深入工农群众，积极组织工农运动，领导开展革命斗争，为国民革命在浙江的蓬勃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工农革命运动的坚强领导者，杭州党组织深入工农群众中培养革命力量，维护工农权益，如：沈干城于1922年在闸口铁路机修厂创办工人自修夜校，培养工人运动骨干；倪忧天于1923年发起成立“杭州印刷工人俱乐部”，

①徐才杰:《革命星火燎之江——追寻浙江各地第一个党组织的建立》,《浙江档案》2022年第1期。

②浙江省档案馆：《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浙江党组织发展概况（上）》，《浙江档案工作》1984年第11期。

③浙江省档案馆：《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浙江党组织发展概况（下）》，《浙江档案工作》1984年第12期。

④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的1000个为什么(上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⑤徐才杰:《革命星火燎之江——追寻浙江各地第一个党组织的建立》,《浙江档案》2022年第1期。

发展会员至150余人等[①]。同时，杭州党组织领导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政治活动和革命斗争，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如1923年5月，于树德、金佛庄作为杭州代表列席党的三大，积极促进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1924年到1927年，杭州党组织先后领导开展了丝绸工人罢工、纪念“五一”“五四”运动、促成国民会议运动、追悼孙中山、声援五卅运动等一系列群众性革命斗争，尤其是策动“夏超独立”、支援北伐军及其在杭州地区的作战、建立杭州总工会和各业工会组织等，推动了杭州市乃至浙江省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②]。在杭州党组织带领下，杭州工农革命运动进入了新阶段，成为全国革命强有力的响应者及参与者。

第三，举旗帜、聚民心：宣传党的革命纲领及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帝国主义暴行，进一步促进革命运动蓬勃发展

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后，小组成员坚持不懈地向世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如金佛庄通过在《协进报》《浙江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针砭时弊、传播新思想；倪忧天通过“杭州印刷工人俱乐部”的“新文化报贩卖部”，向社会出售《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安体诚以杭州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经济系教员为公开职业，在党内先后任中共杭州小组组长、独立支部书记，并担任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在杭州的发行主任，同时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地方组织开展活动等[③]。

中共杭州小组的建立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是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重要成果，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伟大初心的孕育。一是标志着杭州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

---

①《开篇：杭州工人阶级的诞生》，杭州工会网站，http://www.hzgh.org/100zn/view.aspx?id=85665。

②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杭州简史（1921—2021）》，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4-35页。

③《“燕赵英烈谱”安体诚：中共早期优秀党员、陕西党组织创建人之一》，河北共产党员网站，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6865976104063582&wfr=spider&for=pc。

成为指导杭州人民奋起斗争的主心骨，为无产阶级反抗压迫注入了强心剂，指导了革命方法，积累了斗争经验；二是进一步促进了社会主义新思想传播，使工农群众充分认识到自身阶级地位及根本任务，进一步壮大团结了革命力量；三是在革命早期一度代行中共浙江省委职责，奠定了杭州乃至浙江党组织发展的基础，开辟了浙江红色新天地，为刚刚起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浙江的推进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从精神维度看，中共杭州小组的经验总结，是感悟党史发展的主线本质、破解革命前辈赓续奋斗的精神密码的题中之义

1992 年，杭州市委在皮市巷 3 号举行了杭州市首个党团组织成立旧址揭牌仪式，全省第一个党小组、团组织诞生地挂牌确认。大理石碑提醒着世人：历史河流奔腾向前，党的信念世代相传。2012 年 9 月，市委在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90 周年座谈会上正式发布以“敢为天下先、甘做孺子牛”为内涵的“红巷精神”。中共杭州小组作为浙江省第一个党组织，是“红巷精神”的最直接源头。中共杭州小组建立与发展的奋斗历程，就是一段革命党人永葆政治本色，不断推进正确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以人民为中心，敢为天下先、深化自我革新的历程，全面彰显了“牢记初心、笃行使命，追求真理、坚守信仰，忠诚于党、初心为民，敢为人先、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这些宝贵品质，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是激励上城区委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守正创新、不懈奋斗、勇立潮头中，积极传承“历史第一”、争做“现实第一”的红色养分。

其一，中共杭州小组的奋斗历程彰显了“牢记初心、笃行使命”的革命精神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也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是坚决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保持高

①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20 年 1 月 8 日）》，《求是》2020 年第 13 期。

度一致的必然要求。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是灵魂与根基。“我们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①。在波诡云谲、动荡不安的时代背景下，在白色恐怖、艰苦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中共杭州小组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守救亡图存的初心使命，逐渐发展壮大，开创了革命新局面，革命先驱们始终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践行跟党走的理想追求，为党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为深处黑暗的苦难人民带来革命曙光。

其二，中共杭州小组的奋斗历程彰显了“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的革命精神

“追求真理、坚守信仰”，是指党员干部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作为终身所求，坚定秉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武器，终生敬党爱党，为崇高理想不屈不挠不懈奋斗。2022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立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将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是“融入党的建设各个环节的先导性因素，为党的建设奠定思想基础，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动力。”② 正如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共杭州组织带领人民高举真理旗帜，汇聚个体关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将无数人的精神信仰质变为坚不可摧的革命力量，“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成为引领社会进步的核心支柱。

其三，中共杭州小组的奋斗历程彰显了“忠诚于党、初心为民”的革命精神

---

①2020 年 12 月 26 日至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②《思想建设：党的基础性建设》，求是网站，http://www.qstheory.cn/zt2018/ddjsxlzt/30jsxjs/index.htm。

党的百年发展历史充分说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党和国家事业成功推进的必然要求。自中共杭州小组成立至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步步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判断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理论基础，更是在实践中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方法。”[①]“忠诚于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初心为民”体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两者统一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走近中共杭州小组革命遗迹、珍贵文物、史料故事，每一处无不折射出革命先辈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崇高理想和高尚情操。

其四，中共杭州小组的奋斗历程彰显了“敢为人先、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实践证明，执政党自我革命不是封闭、静态的自我循环，而是开放、动态的，与社会革命形成互动的辩证统一体。”[②]我们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顺应时势和人民意愿，不断自我革新，推动社会革命向前发展，自觉成为时代先锋，赢得历史主动。在此过程中，势必经历艰巨到无法想象的困难与阻力，这就需要党员干部在变革发展中，具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勇气，通过创新理念、举措、机制，敢于并善于应对一切“新”“苦”“难”的风险挑战。回望百年前，中共杭州小组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就是对“敢为人先、不怕牺牲”这一革命精神的最好践行。浙江建党初期，有如金佛庄一样的革命者视死如归，为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而英勇献身；革命年代的11位省委（代理）书记，9位壮烈牺牲。“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他们用生命献祭民的理想，用血肉捍卫国的尊严，用敢为人先、勇于求真的精神开辟了浙江红色革命新天地，展现出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和坚忍不拔的大无畏气概。

---

①姚红、赵坚：《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解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改革与开放》2019年第12期。

②李琪：《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解放日报》2018年9月11日。

## 二、中共杭州小组革命精神对上城区党建事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功业彪炳史册。2022 年是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100 周年，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为上城区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奋勇争先、担当作为提供了历史借鉴、塑造了精神楷模、奠定了思想基础，起到了充分的引领作用。立足当下、面向未来，传承中共杭州小组建立发展过程中淬炼涵养的精神品格，对上城区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 （一）传承中共杭州小组“牢记初心、笃行使命”的革命精神，上城区着力加强政治统领，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做“两个维护”示范引领者

百年故去，初心如磐。2022 年是新上城区正式成立后第一届区委的开局之年，上城传承中共杭州小组“牢记初心、笃行使命”的革命精神，区委区政府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杭州，特别是对上城工作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程”，持续锤炼基层政治判断力、领悟力和执行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更多战略性成果。同时把讲政治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部主动，把党中央和省委、市委精神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着力党建引领主责主业发展，聚焦“共富典范发展好”，构建“一轴双核五星”发展新格局，全力打造“五个新高地”，全面实施“八大工程”，以全域党建联盟推动产业协作，不断拓宽强村富民、强社惠民路径等。党员干部用实绩彰显初心本色，用实干提升政治能力，用实力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接续奋斗。

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上城继续紧扣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围绕全区重点工作任务，坚持服务大局、强化政治引领，把讲政治贯穿工作全过程，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注重把大势，提高政治判断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着力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时刻保

持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提高对政治逻辑的把握能力；注重修内功，提高政治领悟力，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领会党中央及省市区委精神及行动要求的时代价值、理论意义，并落实贯彻到实践中去，使思想、政治、行动高度统一；注重展作为，提高政治执行力，争做“两个确立”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示范引领者，坚守“两个绝对”的政治品格，强化“核心意识”，勇于自我革命，严明政治纪律，持续反腐肃纪，推动政治生态更加清朗，为上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二）传承中共杭州小组“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的革命精神，上城区着力加强思想建党，强化党的科学理论武装，在高质量建设“重要窗口”中争做排头兵

跨越百年，上城区委传承中共杭州党小组“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的革命精神，赋予“真理”与“信仰”鲜明的上城特色、时代特色，紧紧围绕“党建强、发展强”目标，把思想建设作为终身的必修课，推进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持续开展“两学一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党史学习等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使党员提高党性觉悟，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倾力打造红色党性教育基地，成功创建“小营·江南红巷”红色景区，精修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等红色文化承载体，为引导党员干部赓续党的精神血脉，挖掘更丰富的理论意涵、增添源源不断的实践注脚；大力挖掘红色文脉，提炼和弘扬“敢为天下先，甘做孺子牛”的“红巷精神”，涵养政治文化，为省市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提供更多上城智慧、贡献上城力量。

现实经验指引未来，上城区加强党的建设将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守好“红色根脉”的政治担当，举旗铸魂固根本，全方位提升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精神境界和文化素质。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继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抓好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学习；加强党的宗旨教育，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扎实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发力：加强党风廉政

教育，使思想防线扎牢扎密，提高党性觉悟；建立健全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使广大党员干部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政治本色。坚持思想建党与赓续文化血脉相贯通：用好上城区红色资源，丰富上城红色精神谱系，使党员干部感悟党的百年奋斗精神伟力；把牢主题主线，发挥“互联网”舆论阵地作用，讲好上城品牌故事；弘扬传统文化，深入推进“宋韵传世工程”；对标先进典型，持续擦亮“最美”系列品牌等。

（三）传承中共杭州小组“忠诚于党、初心为民”的革命精神，上城区将为民服务作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找准全域发展与人民需求的契合点，全面建设独具韵味的国际化现代化共同富裕典范城区

面对新时代前进道路上的复杂矛盾和繁重任务，继承中共杭州党小组“忠诚于党、初心为民”的革命精神，上城区以增进辖区群众福祉为最大责任，全面建设独具韵味的国际化现代化共同富裕典范城区。2021 年行政区划调整以来，上城印发《杭州市上城区奋力当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排头兵行动计划（2021—2025 年）》，从人民角度勾画现代化美好蓝图。区委区政府坚定不移抓民生福祉，每年新增财力三分之二以上用于民生事业；党建统领全域打造“幸福邻里坊”，推进始版桥等未来社区试点建设，积极创立共富基本单元实践基地范例，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工作被评为全省优秀等次；以人民需求为导向，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群众身边“15 分钟优享服务圈”初步成型，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数连年排名全省第一，“健康浙江”考核实现三连优等[①]。上城涌现出小营街道小营巷社区党委（2021 年入选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一大批先进典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深入进行，一支“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逐步形成。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走好新时代“赶考”路，上城区继续强化宗旨意识，坚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不断增强人民群

①《上城区 2022 年区政府工作报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hzsc.gov.cn/art/2022/2/21/art_1229231327_4017775.html。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坚定党建为民发展方向，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突出问题导向，对照“七张问题清单”[①]，构建“问题发现靠党建、问题发生查党建、问题解决看党建”工作格局[②]；以基层所需为指向，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推动基层党建工作整体跃升；以群众满意为标尺，创新机制体制，打造“党建 + 互联网”，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智慧化。进一步坚持为人民利益谋发展，聚焦重点工作提质增效，紧扣迎亚运、战疫情、防汛情、抓整治、促安置、保民生、谋共富等中心大局及重难点工作[③]，继续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进一步打造符合新形势下“好干部”标准的党员干部队伍，持续推进干部队伍系统性重塑，建立健全干部培养选拔体系、任用管理体系和绩效奖惩机制，不断增强党员干部为民情怀、激发为民干事热情，践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履职承诺。

（四）传承中共杭州小组“敢为人先、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上城区以创新驱动党建质量全面提升、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奋力推进“两个先行”中发挥头雁精神

2022 年 6 月 20 日，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指出，推进“两个先行”必须突出把握创新致胜、变革塑造等工作导向[④]。上城区委区政府围绕省市部署，着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尤其在党的领导下，完成两区合并、破旧立新，更是由“西湖时代”与时俱进迈向“钱塘江时代”的新的生动实践。新形势下，

---

①“七张问题清单”：基于巡视、审计、督查、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网络舆情、群众信访等方面问题，围绕问题发现、生成、整改、评估、预防全周期，运用数字化改革理念、方式、手段赋能全流程精密智控、全要素综合分析、全方位党建统领的多跨场景应用。

②戚安琪：《我区召开“大党建工作会议” 为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提供坚强保证》，《上城报》2022 年 5 月 10 日。

③区人大常委会九堡街道工委:《履职尽责勇担当 为民解忧办实事 在奋力打造“领潮九堡 实力九堡 智治九堡”中贡献人大力量》，《上城报》2022 年 5 月 31 日。

④袁家军：《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在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 年 6 月 20 日）》，《浙江日报》2022 年 6 月 27 日。

上城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数字化改革引领系统性变革，率先将“湖滨街区智慧治理”等城市大脑应用于基层治理实践，“数智减负·一表通”场景走在全省前列，近五年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1家，引育市级以上高层次人才3537名，居全市前列等①。广大党员干部在促进创新发展过程中，以“争星晋位·全域建强”行动为指引，全面提升党建统领基层治理能力；同时在疫情防控、防汛抗洪等繁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开拓创新，推进党建在大战大考中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实现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党建、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在上城奋力推进“两个先行”发挥头雁精神上，率先垂范、躬身践行。

着眼未来，上城将继续秉持中共杭州小组“敢为人先、不怕牺牲”的光荣传统，坚持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勇立潮头，锚定奋斗目标，突出创新驱动，聚焦深化改革，全方位激发创新潜能、释放发展动能、发挥优势效能。其一推动数字赋能党建发展，开展自我革命，提升党建统领效能，赢得历史主动，同时紧盯全省第一方阵目标，以新时代党建引领数字化变革，以数智化发展撬动全领域变革重塑，抢占数字化改革制高点，推出更多具有上城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其二坚持制度重塑，逐步完善对改革需求的常态化追踪、落实的体制机制，优化改革创优的正向激励机制，健全防范化解改革中的重大风险机制等，以改革突破推动制度重塑，以制度重塑激发改革创新活力。其三注重完善生态，奋力构建创业创新生态圈，厚植上城区“拥江揽湖独特区位、一口两站交通枢纽、高端专业强力支撑”的特色优势，重点打造四大产业集群，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企业，优化营商环境，增强人才吸附力，以创新协同治理促进共建共治共享，打造“勇立潮头”的争先创优氛围。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共杭州小组创立发展过程凝炼的革命精神，百年来深深融入上城的骨血和灵魂，与“红船精神”、“浙江精神”、“红巷精神”共同滋养着党和人民，世代传衍，历久弥新，激励着、

①《上城区2022年区政府工作报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hzsc.gov.cn/art/2022/2/21/art_1229231327_4017775.html。

鼓舞着、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上城人不断求索笃行、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上城区将把此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持久精神动力，踔厉奋发、砥砺前行，为奋力打造“重要窗口”及新时代党建高地、推进“两个先行”、全面建设独具韵味的国际化现代化共同富裕典范城区提供强劲的精神养分和智囊支撑。

# 关于中共鸭兰村支部研究和宣传的几点断想

◎游海华 ①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鸭兰村支部，是杭县境内第一个村支部。鸭兰村为什么成为杭县第一个中共农村支部的所在地？必须从地缘、血缘、亲缘、人缘等地方关系资源入手进行分析，才能加以解答。四一二”政变后成立的西镇农民协会，名义上是国民党的但实际上为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关于鸭兰村支部的研究，应秉持基本的学术原则和学术逻辑展开；关于鸭兰村支部的宣传和利用，必须立足于基本史实和学术研究这一基本限界之上。只有这样，红色文化地标的宣传和利用，才能有生命、有活力、有信仰、能长远！

**关键词：**中共鸭兰村支部；地方关系资源；农民协会；马东林；马国华

中国共产党鸭兰村支部，是杭县境内第一个村支部，成立于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后的 1927 年 6 月。面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鸭兰党支部在此后的几年中，在中共西镇区委组织发展、西镇农民协会及其领导的减租减息斗争，以及杭县党的各项工作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地方党政部门日益认识到鸭兰村党支部这一红色地标的重要价值，在“鸭兰精神薪火相传”主旨下，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例如修整鸭兰村支部旧址、建设党史陈列馆、重整村容村貌，2021 年 6 月临平区第一届区委常委在鸭兰村举

①作者简介：游海华，男，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共产党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中共党史、区域社会（经济）史。联系方式：yhh1872@163.com；13958081353。

行“忆初心、谋发展”活动，同月杭州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在鸭兰村揭牌，2022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第一个村支部”在鸭兰村揭牌，6 月在鸭兰村启动首届大运河 1927 年红旅文化节、举办红色鸭兰与支部文化学术研讨会等，力图将红色文化保护与乡村文化传承结合起来、将红色资源利用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将红色文化弘扬和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为共同富裕样板建设注入精神源动力。

关于鸭兰村支部，目前学界几乎没有什么研究度和关注度，只在杭州地方党史人物的相关记述中提及①，或从景观设计的角度论述了进一步完善鸭兰村红色人文景观与绿色自然景观的融合②。关于鸭兰村支部的许多问题，如鸭兰村为什么成为杭县第一个中共农村支部的所在地？除创始人马东林外，第一届党支部书记马国华、副书记马久成，以及委员马云州、马阿祥、马幼良等都没有个人履历，相关记述均语焉不详；鸭兰村支部所在的西镇区农民协会，是国民党的农民协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农民协会？在鸭兰村支部的研究和宣传中，应该如何对其进行定位和宣传？等等，以上诸多的问题都值得探讨。在某种程度上说，鸭兰村支部的研究，还是一片处女地。基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谈谈关于鸭兰党支部研究和宣传的几点断想，以期抛砖引玉，推进学界关于鸭兰村支部的探讨，深化杭州乃至浙江地方党史党建相关研究。

## 一、不能忽视对地方关系资源的深入研究

鸭兰村为什么成为杭县第一个中共农村支部的所在地？相关资料中有一

---

①关于鸭兰村支部，在中共杭县县委书记赵刚、鸭兰村支部创始人马东林等人的传记中，有所提及和介绍；在《中共杭州历史要览》、《中共浙江党史大事记》、《中共浙江党史》第 1 卷中，均未提及。换言之，中共鸭兰村支部，并未进入杭州和乃至浙江省的地方党史通史叙事之中。分别参见《赵刚》、《马东林》，《杭州党史人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99、156 页；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杭州历史要览》，杭州出版社 2011 年版；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中共浙江党史大事记（1919–1949）》，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浙江党史》第 1 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刘天驰：《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红色文旅景观设计——鸭兰村支部旧址提升改造工程（二期）为例》，《现代园艺》2022 年第 10 期。

句话对此进行了说明，即鸭兰村处于水网地带，有利于农村党组织隐蔽和发展。[①] 此说似乎较有道理。但问题是，杭州城的城郊，交通便利、水网地带、利于党组织隐蔽和发展的村庄很多。在某种程度上说，可谓处处皆是。为什么鸭兰村成为第一个？其中的关键原因，应该在上面说的几个有利条件之外。

那么，到底是什么呢？显然只有从人着手，从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分析。

众所周知，中共鸭兰村支部的创建人，一是马东林，一是马国华。

关于马东林，他 1906 年出生于浙江嵊县一个农民家庭，原姓施，未满周岁父母双亡，后由杭州东山弄的表伯马阿兴收为养子，改姓马后长大成人。由于养父母相继亡故而至中学辍学。1924 年参加国民党，担任西湖区直属党部委员、杭县县党部农运主任，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他来到杭县农村，在西镇鸭兰村一带活动，发展了马久成、马云川等 10 名党员，建立了中共鸭兰村支部。[②]

关于马国华，他是杭县西镇区鸭兰村村民。1926 年春，经杭州石虎山朋友马瑞华介绍，在西湖区认识了马东林。当年冬，由马东林、林庆增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编入中共西湖区金沙港支部。1927 年初，马东林指示马国华带着同村青年马云州、马奎早、马阿祥等人来杭州旅游。马东林到他们所住的湖滨天然饭店去看望，用通俗的语言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对他们进行革命启蒙教育。此次见面，显然是马东林有意为之，为此后鸭兰党支部的成立奠定了初步基础。6 月，中共鸭兰村支部成立时，马国华任第一任书记，马国华的岳父马九成任副书记，马云州、马阿祥、马幼良为委员。10 月，马国华担任中共西镇区委第一任书记。

上述资料大致反映了鸭兰村支部的成立历史，但没有解答鸭兰村为何成为杭县第一个中共村支部所在地这一问题。循着上述资料，笔者有一系列问题，分别是：1. 马东林的养父马阿兴是哪里人，是否鸭兰村人？如果不是鸭兰村

---

①《中共鸭兰村党支部旧址文案（2021.6.6）》，未刊稿。

②《马东林》，《杭州党史人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 年，第 154–156 页。

人，那么马阿兴和鸭兰村人有什么关系？ 2. 马东林是如何认识马瑞华的？马瑞华是哪里人？当时是干什么的？马瑞华是否鸭兰村人，是否中共党员，他是如何认识马国华的？ 3. 马国华在 1926 年冬编入中共西湖区金沙港支部前，他在杭州以什么职业谋生？马国华的人生履历是什么（读过多少书，在什么学校毕业；马国华出生于地主家庭[①]，马家有多少田地、财产等；鸭兰村还有哪些家庭和马国华家一样富裕，大致情况怎样）？ 4. 马国华与马云州、马奎早、马阿祥等最早的一批党员除了同村人以外，是否同龄人、是否叔伯兄弟等？等等。显然，这些问题在笔者目力所及的资料中，皆语焉不详。但无疑，只有从地缘、血缘、亲缘、人缘等地方关系资源的角度，才能理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回答上述疑问，也才能回答鸭兰村为何成为杭县第一个中共农村支部的所在地这个重要问题。

## 二、关于“四一二”政变后西镇农民协会的记述应进一步厘清

“四一二”政变以后的西镇农民协会，到底是中共领导的合法的农民协会，还是中共领导的以国民党的名义存在的农民协会？相关资料记述：鸭兰党支部建立以后，利用农民协会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革命活动。共产党员马九成和姚培金还到朱家墩去发动群众，成立了朱家墩农民协会。1927 年 8 月，杭县西镇区在乡村建立农民协会的基础上组建了西镇区农民协会，郑秋林任主任，马国华任副主任，委员有丁扬美、沈宝玉、卜土康。[②]

上述资料关于西镇农民协会记述的政治属性是模糊不清的。作为读者，给人的印象是，这是中共领导的合法的农民协会，中共利用这一合法舞台，

---

①《薪火相传 血脉赓续——中共鸭兰村部口述史》，书名是一部口述史，但并非是一部严格学术意义上的口述史，例如该书仅对采访对象进行了一次访问，既未对口述内容进行考证，也未就口述内容进行多次回访，更多是一部相关资料的汇集和剪辑。《薪火相传 血脉赓续——中共鸭兰村部口述史》编委会编著：《薪火相传 血脉赓续——中共鸭兰村部口述史》，杭州出版社，2021 年，第 100 页。

②《中共鸭兰村党支部旧址文案（2021.6.6）》，未刊稿。

领导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可是问题是，在“四一二”政变以后，中共领导的公开的或合法的农民协会还能存在吗？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共还能在8月份公开成立西镇区农民协会，并领导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吗？对此，笔者是深表怀疑的。

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1927年7月24日的《中共浙江省委七月份报告书》记载：“清党运动发生后，农运就受了很大的摧残，一切受农运影响的人们，都乘机报复”；地主、土豪劣绅、军队、土匪等联合一起，“不但清党，而且‘清乡’，各地农会负责人，很多被土豪劣绅们捕去，私打和送官”；“凡是入会的农民，被捕毒打后”，都必须罚钱，“不认罚就以共党罪名加上，不但房屋焚毁，而且全家捕去受罪”。所以，“在这样的农村白色恐怖下，要使农协维持下去，是十分困难了”；“大概能保存组织者，不过一万五千左右”。[①] 这段史料说明，“四一二”政变以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浙江全省，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不但遭受了极大摧残，而且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不太可能以公开的合法的政治面目出现。

那么，西镇的农民协会是什么状况呢？1928年4月8日发表在《中央政治通讯》第22期上的《梅电龙关于杭州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记载：杭州农民，在北伐军“初来时始有组织，清党前完全在我们领导之下，清党后，受我们影响着仅有我们组织之西湖、西镇、皋塘、乔西【司】四区，但自省委破获，皋塘方面捕去几个首领，组织就无形崩溃”；“现我们可以领导者仅西湖西镇二区”。其中，西镇区，“有农民七万余，国民党的区农民协会，有会员一万左右，所属村农协约六十余，大部在我们同志掌握之中，但是这班同志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妥协性很深，不能坚决地执行党的政策，既不愿退出国民党，又只作减租运动，不作抗租运动。去年减租的成绩做到减少十分之五，因此农民对于农协颇有影响，而地主对于农协视如眼中之钉。党的支部有五个，但丝毫不起作用，区委负责同志 ××× 即农协常委，同时

①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70–171页。

又为县委常委之一，但实际与县委很少关系，而县委对之亦未积极加以指导”。[①]

这段史料说明：1.“四一二”政变以后，西镇农民协会确实存在，其下有60多个村农协，领导了农民进行减租运动，减少了十分之五的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2. 西镇区农民协会，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农协，但实际上大部分是中共掌握并领导。3. 中共西镇区委领导下的5个党支部，包括鸭兰村支部在内的工作，受到了省委常委梅电龙（即梅龚斌，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②]）的批评，认为支部领导的农协只做减租，“不作抗租运动”；认为支部同志是小资产积极分子，“妥协性很深”。在当时看来，中共西镇区委下各支部与省委的期望值相差很大。但在今天看来，客观说，在当时白色恐怖下，支部领导下的西镇区农协的减租措施是比较稳妥的和现实的，减租成效是积极的和显著的；省委的期望是过高的，作为“抗租”显然是比较左的措施，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即使实现，也是无法持久的。

对于以上史实，尤其是西镇区农民协会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农协、实际上大部分是中共掌握并领导的，应厘清并写清楚。史实理清、逻辑理顺，不致让读者有疑问。

### 三、中共鸭兰村支部的历史定位和现实宣传应有准确定位和基本限界

中共鸭兰党支部，是杭州市乃至浙江省的一个红色文化地标，对于红色文化弘扬、乡村振兴和社会经济发展等都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

关于中共鸭兰村支部的历史定位，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王光银有个提法与建议。他认为原来的定位是：鸭兰村支部是杭县第一个农民党支部、余杭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这个提法“抬头很小”；另外，现在临平和余杭分区，鸭兰村党支部现在临平区，老的名称余杭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已经不合适。因而他建议：可将鸭兰村支部定位为中国大运河畔的第一个农民党支部，或

①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64–365页。

②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1922.4–1987.12）》，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中国大运河（南段）（起点）第一个农民党支部，中国大运河畔的第一面党旗等。[①]

王光银的想法具有创新性，值得讨论。创新鸭兰村支部的宣传，确实是一个现实的课题。笔者没有做过宣传性质的课题，不敢妄论。但就该建议来说，笔者认为还可以进一步推敲、商讨。该建议涉及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大运河畔，二是农村党支部或农民党支部，即是否是第一个？从杭嘉湖地区看，大运河畔比鸭兰党支部早的至少有两个。一是中共嘉兴新塍支部，1925 年 12 月创建新塍小组，1927 年上半年改为支部；二是中共德清新市支部，1927 年 5 月成立。[②] 这两个地方都属于农村中的市镇或墟镇，不像鸭兰村是纯粹的农村，并且不是农民党支部。从江苏省看，据资料记载，1926 年 4 月至 10 月，中共无锡独立支部深入工厂、农村先后建立了申新、徐巷等 5 个党支部；1927 年 1 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下辖有两个农民支部；1926 年，中共武进县横山桥支部和西夏墅支部创建。[③] 虽然无锡和武进的党支部是否农民支部不清楚，但苏州明确记载有两个农民支部，都比鸭兰村支部早。因此，仅从浙西和江苏看，王光银所提的鸭兰村支部是中国大运河畔的第一个中共农民党支部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而中国大运河南段或起点的第一个中共农民党支部是基本成立的。当然，是否采用这个提法，那是另一回事。

## 四、基本限界：史实与逻辑

总之，关于中共鸭兰村支部的研究，应秉持基本的学术原则和学术逻辑展开，要不然就成为自说自话，走不出去。关于鸭兰党支部这一红色文化地

---

①王光银：《临平研讨会发言稿（2021.12.9）》。

②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1922.4–1987.12）》，人民日报出版社，1994 年，第 44、25、50 页。

③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浙江省档案馆：《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1922. 春 –1987.10）》，南京出版社，1993 年，第 38–39、40、42 页。

标的宣传和利用，必须立足于厘清基本史实基础上的客观评价，必须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既不能拔高，也不能贬低。换言之，必须在基本史实和学术研究的框架基础上。红色文化地标的宣传和利用，只有守住这个基本限界，它才是有根之木、有源之水，它才能有生命、有活力、有信仰、能长远！

# 于树德合作理论与实践对教育的启示

◎张东亚[①]

**内容提要：**于树德既是我国早期合作理论的传播者，也是最早讲授合作社理论的学者，还是农村信用合作事业的探索者。年轻时留学日本，带回当时先进的合作理论。一生耕耘合作事业，成果丰硕，实践经验丰富，是民国时期贵州省专职从事合作工作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对我国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借鉴于树德的合作理论和实践经验，建议借助我国发达的网络普及优势，在发达地区城市和落后地区农村之间建立帮扶小组，实施新形式的教育合作。

**关键词：**于树德；合作理论；理论与实践；教育启示

建党百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奋斗，让中华民族走上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康乐的道路。安居乐业的同时，我们作为中华儿女，究竟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做些什么，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或许，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组长于树德对合作理论的研究与实践，也能够为我们教育界人士带来一些思考和借鉴。

①**作者简介：**张东亚（1975— ），女，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国际贸易学院副教授，现在日本访学，电子邮箱 zhdy1999@163.com。

## 一、于树德生平简介

于树德，生于 1894 年 2 月 29 日，字永滋，河北静海（今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村人士，1922 年 6 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9 月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成立，于树德担任组长。杭州小组隶属于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领导，是浙江省建立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于树德于 1909 年入读北洋法政学堂[①]，1917 年毕业后，因成绩优异从而获得公费留学日本的资格。他家境相对不错，就将先前自筹的 300 大洋留学费用全部用于资助 1917 年 9 月赴日留学的周恩来，自己则于 1918 年（一说 1917 年）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并于 1921 年 5 月（另有两种说法分别为 1921 年夏和 1921 年 9 月）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毕业回国后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执教，后来又到燕京大学任教，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之一，同时也是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的亲密革命同志。

于树德是我国合作事业的先驱、合作泰斗[②]，长期从事农村合作社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是我国最早讲授合作社理论的学者之一，也是民国时期贵州省专职从事合作工作时间最长的领导人。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监事会副主任等职位，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2 年 2 月 18 日病逝于北京。

## 二、于树德合作理论、成果及实践

于树德作为我国早期合作社理论的传播者之一，终其一生都在为我国的农村合作事业勤耕不辍，著作颇丰，且在实践方面也进行了诸多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

①1906 年创办，位于天津新开河的西岸（现志成道 33 号），是中国最早的政法学校。历史上曾六易校名：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北洋法政学堂、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河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洋法政学堂》，百度百科：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B4%8B%E6%B3%95%E6%94%BF%E5%AD%A6%E5%A0%82/9482509?fr=aladdin）。

②泥手汉：《合作泰斗于永滋》，《天津合作（周刊）》1938 年（民国三十七年）。

（一）于树德合作理论的主要观点

于树德的合作理论从萌芽到一步步走向成熟和稳定，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中也有对自己的合作理论进行不断反思、修正的过程。概况起来，于树德的合作理论有以下几个要点[①]：

1. 合作社并不能真正消灭资本主义。合作社的目的不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只能使劳动者之间通过互助合作，缓解他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一时的困难。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的合作社是为其社会制度服务的，受到政府的提倡和鼓励。

2. 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组织。农村可分为“豪农富户”和“贫农小户”。要救济这些小农，只有使他们结合起来，互助互济，就必须组织合作社。

3. 不同的合作社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信用合作社（也称平民银行）对于农民来说应该既是放款机关也是储蓄机关；购买合作社可分为购买合作社（也称原料合作社）和消费品购买合作社（也称消费合作社）；贩卖合作社是为了减少商人的中间剥削；生产合作社和利用合作社帮助农民从事农产品加工制造以增加产值、获得更大收益。

4. 在发展各种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联合社。合作社发展起来以后，同类型合作社联合起来组织各种合作社联合会。联合会的任务是帮助会员社改善业务，促进合作社的发展。

5. 对中国前期合作社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期：中国合作运动诞生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之后的 1919 年到 1925 年为合作思想传播时期；1924 年至 1928 年为合作组织实验时期；1928 年至 1933 年为政府推行合作时期；1933 年到 1934 年为合作运动全盛时期。

（二）于树德合作理论的研究成果

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日本传播的拓荒者。于树德在日留学期间，通过他的课堂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

①杨德寿主编：《中国合作社经济思想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年，398—402 页。

并开始对日本的“产业组合”产生浓厚兴趣，着手研究日本的合作经济理论。

早在1919年，于树德就在《银行周报》发表文章《银行之合并与联合：告我国大小金融机关，此自富国之道也》[①]，阐述合作经济思想。1920年，中国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五省大旱，受灾317个县，灾民约2000万人，死亡50万人。虽远在日本，年轻的于树德忧国忧民，先后发表《农荒预防与产业协济会》[②]、《产业协济会之经营》[③]、《我国古代之农荒预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上、下）》[④]等多篇文章，宣传合作理论，强调合作共济、救灾防灾的重要性。

于树德其余主要文章及著作梳理如下[⑤]。

[1] 于树德:《银行之合并与联合: 告我国大小金融机关,此自富国之道也》,《银行周报》1919年。

[2] 于树德:《最录：邮政储金及储蓄银行储金用途底研究》,《东方杂志》1920年。

[3] 于树德:《合作问题：我之“产业合作社”观》,《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

[4]〔日〕河上肇著，于树德译:《脑筋问题》,《民国日报》1920年。[5] 于树德:《日本平民金融机关之研究》,《少年世界（上海1920）》1921年。

[6] 于树德《合作研究：救济大头瘟的经济组织的一个方法(产业合作社)》,《民国日报·平民》1921年。

[7] 于树德:《农村信用合作社经营的方法》,《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

---

①徐彤:《民国时期于树德农村合作经济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8年。

②于树德:《农荒预防与产业协济会》,《东方杂志》1920年。

③于树德:《产业协济会之经营》,《东方杂志》1921年。

④于树德:《我国古代之农荒豫防策：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东方杂志》1921年。

⑤徐彤:《民国时期于树德农村合作经济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8年。孙芮:《于树德合作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财经大学，2018年。

丛刊·乙种》1924 年。

[8] 于树德：《农民合作概论》，《中国农民》1926 年。

[9] 于永滋：《农业合作先从信用办起》，《合作月刊》1933 年。

[10] 于永滋：《本会农村合作事业之鸟瞰 ( 附图表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丛刊·乙种》1933 年。

[11] 于永滋：《谈谈黄灾农赈 ( 转载本年十月十八十九日天津大公报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丛刊·乙种》1933 年。

[12] 于永滋、杨水亭：《合作社与农村经济》，《乡村建设》1934 年。

[13] 于永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合作运动之现状及将来》，《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4 年。

[14] 于树德：《合作运动》，《海王社》1934 年。

[15] 于树德：《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水利道路工程及农业合作事业报告》，见 : 章元善：《乡村建设实验 ( 第一集 )》，中华书局，1934:146–147。

[16] 于树德：《合作金融制度之研究》，《大公报》1935 年。

[17] 于树德:《农村救济问题 : 中国合作社之进展》,《东方杂志》1935 年。

[18] 于永滋:《农利股报告》,《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丛刊·甲种》1935 年。

[19] 于永滋、邹毓秀：《农村合作社单营与兼营的检讨》，《华北合作》1936 年。

[20] 于树德:《我国合作事业革新运动刍议》,《江西合作通讯》1941 年。

[21] 于永滋：《县各级合作组织之实施在贵州 ( 附表 )》，《合作事业》1941 年。

[22] 于永滋：《我之参加工合协会》，《工业合作》1945 年。

[23] 于树德：《如何推进今后的工合》，《工业合作》1946 年。

[24] 于树德：《中国本位合作制度刍议》，《中国工业》1946 年。

[25] 于永滋:《论中国企业制度 : 再谈民营企业合作化》,《学识》1947 年。

[26] 于永滋：《民营企业合作化方案》，《合作供销通讯》1947 年。

[27] 于永滋：《全国民营企业合作化的创议》，《合作评论》1947 年。

[28] 于永滋：《论合作政策：防阻乎？疏导乎？开发乎？》，《合作评论》1948 年。

[29] 于树德：《信用合作社经营论》，中华书局，1921 年。

[30] 于树德：《农荒预防策》，商务印书馆，1923 年。

[31] 于树德：《合作社之理论与经营》，国光书店，1926 年。

[32] 于树德：《合作社之理论与经营》，中华书局，1929 年。

[33] 于树德：《消费合作社之理论与实际》，中华书局，1932 年。

[34] 于树德：《合作讲义》，中国合作学社，1934 年。

（三）于树德合作理论的工作实践

于树德是中国近代合作理论的重要传播者和积极倡导者。他不仅通过一系列学术著作大力传播国外合作经济理论，还用授课的形式广为宣传合作社思想。同时，他又是中国合作事业的重要发起人、实践家、推动者和领导人，长期耕耘在我国的农业、工业、教育的合作事业，做出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工作。

1921 年 9 月，同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的于树德和安体诚在李大钊指导下，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又称工人补习学校、劳动补习学校），校址在河北宇纬路东兴里 12 号，于树德任校长，安体诚任教务主任。他们不单传授文化知识，还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直至 1922 年底学校被查封，期间为党组织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骨干。

1922 年 11 月，“华洋义赈会”[①] 成立。为了合作事业能够顺利开展，“华洋义赈会”开设了农利股，并于 1923 年 11 月聘请于树德为合作指导员。此后，于树德利用救灾总会的赈灾款，在河北香河县建立了德国雷发舛式的农村信用社，指导开展河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正如章元善所言：“华洋义赈会”在河

① “华洋义赈会”可溯源至 1906 年，初时是一个由中外慈善人士设立的临时性公益机构，赈灾结束即自动解散。1920 年北方五省大旱之时，中外合办的慈善赈灾组织“华洋义赈会”再次出现，一度多达九个，彼此之间各自为政。至 1922 年 11 月，各界慈善人士以华北赈灾的余款，成立了统一的“华洋义赈会”（百度百科）。

北的合作种子是于树德播下的。”①

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于树德再次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为了不使“华洋义赈会”的合作事业受影响，同年 5 月，于树德辞去了在“华洋义赈会”的职务。此后，于树德在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地任教，担任《农民合作概论》等课程的主讲教师。

1932 年 10 月，于树德重新担任“华洋义赈会”代理农利股主任兼利用组组长。1933 年 7 月，于树德作为“华洋义赈会”的代表，出席了在山东邹平县举办的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水利道路工程及农业合作事业报告》的长篇报告。

1938 年 2 月，于树德出任贵州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总干事。1939 年 11 月，该会更名为贵州省合作委员会，于树德任总干事；1942 年 1 月，再次更名为贵州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于树德任处长。1942 年 7 月 1 日，贵州省合作事业工作辅导团二团成立，于树德出任团长。1938 年至 1945 年，于树德一直在贵州从事贵州省合作事业长达七年时间，是当时在贵州省从事合作工作时间最长的领导人。1945 年 2 月于树德离开贵州，应工业合作协会邀请，3 月份开始担任该会副总干事。1947 年 3 月，于树德担任合作指导委员会委员，并受该会委托拟定民营企业合作化的方案。

1939 年 12 月，周诒春创建贵州合作函授学校并出任首任校长，于树德自 1945 年起担任第二任校长，兼任讲义总编辑。该校培养了人数众多的合作指导人员、各地各级合作社职员等有志于从事合作事业的人士，学员遍布全国。

（四）于树德合作理论及实践的深远影响

于树德作为我国早期合作经济思想的理论家和实践人，无论是在理论的引入、宣传还是实践、推广等方面，都对我国合作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的合作理论对后来同领域诸多学者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

---

①薛毅：《留日学生于树德与中国早期合作事业》，《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

大力推行的合作事业同样对当时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 理论影响

于树德促成了我国早期的合作理论传播。

他作为爱国知识分子，1919 年在日留学期间便开始在《银行周报》、《东方杂志》、《民国日报》等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前后共计发表文章 30 余篇，出版专著 4 部，内容涉及广泛，包括金融储蓄、农村信用合作、农民合作、农荒预防、赈灾、水利、企业合作与制度等诸多问题，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开始关注农村和农民的民生问题以及农村信用合作制度的建设。

2. 实践影响

于树德指导的“华洋义赈会”对农村合作实践影响深远。

章元善作为创办人之一，邀请于树德参加“华洋义赈会”，专门设置机构“农利股”让于树德负责合作事业，并任命于树德为“农利股”负责人和“华洋义赈会”的合作指导员，为于树德推进合作社事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和诸多便利条件。

于树德指导下的“华洋义赈会”合作实践工作在中国合作事业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探索出了一条以“信用合作”为切入点的农村合作路径并成功试验，为合作运动推行至全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开创了商业银行资本流入农村的先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金融资源问题①。

于树德指导下的“华洋义赈会”最早把国外合作理论与中国的农村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合作实践的先河，农村信用合作社由此成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组织转型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②。

3. 教育影响

于树德培养了大量合作领域人才。

---

①徐彤：《民国时期于树德农村合作经济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18 年。

②薛毅：《留日学生于树德与中国早期合作事业》，《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2 期。

他始终关注中国“三农”问题，重视并努力推进农村信用合作。并且理论结合我国农村实际，不断修正自己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理论。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工余补习学校、燕京大学、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执教，开设并讲授《农村合作概论》、《合作运动与农村之关系》等课程，无私传授“华洋义赈会”推行合作事业的经验，还参与毛泽东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的编写工作，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农村信用合作人才，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合作人才培养体系，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确立早期农村合作思想和制定后续政策制定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时至今日，我国建立在农村信用合作社基础上的全国供销合作社体系仍在发挥重要作用。

### 三、于树德合作理论与实践对教育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农村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村是中国的根基。因此，“三农”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是我国在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经济能否稳步前行的重要基础保障。而包含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如何解决？于树德合作事业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成功经验，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帮助我们寻找到能够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 （一）于树德合作案例

于树德在河北主持“华洋义赈会”时，对农民进行合作教育，改良了农村风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重组农村的作用，建立了农村组合的新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宗法家族组织的一些社会功能，以“家”为核心展开的传统人际关系开始出现变化①。

出任贵州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时，他又开办农村合作助理员讲习所、合作讲习会等，接受中共贵州省工委选派党员进入讲习所学习。他在讲习所中建立中共秘密党支部，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县政府合作室，对当时全省抗日救

①薛毅：《留日学生于树德与中国早期合作事业》，《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亡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①]。

（二）教育合作启示

上述两个事例告诉我们，要解决农村地区“人”的问题，一要靠教育，二要靠结合实际。

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而且由于国土面积大，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教育发展程度也大有不同。因此，要解决落后地区农村学校的教育问题，仅仅依靠当地的教育资源，其实是远远不够的，引入相对发达地区和城市的教育资源是非常有必要的一种举措。

目前引进发达地区城市教育资源的普遍做法有两种：一是靠支教，二是靠高校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但是，以上两个途径都存在一定问题：支教的师资由于人员不稳定，一般几个月最多几年就会更换，由此造成教育活动的不连贯；暑期社会实践活动时间短，且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也解决不了长期的教育问题。

那么，该如何满足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需求呢？除了支教和暑期社会实践，还有没有别的补充途径可以解决师资和教育时长的问题？也许，我们可以运用于树德的合作理论，考虑在发达地区城市学校与落后地区农村学校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合作关系来有效解决以上问题。

当代中国的网络普及程度之高，可以说是全球罕见。借助这样的优势，我们可以在发达地区城市学校成立若干帮扶小组，相应的落后农村地区学校也成立被帮扶小组，具体设想如下：

1. 成员组成

帮扶小组：每组设组长 1 名，成员若干名。组长必须是干部或教师，且最好是家乡在落后农村地区的干部或高级职称教师；成员最好也是干部或教师，必要时可吸纳部分学生，成员最好也与组长来自同一地区。

---

①赵青、钟庆：《抗战时期贵州合作事业人物讲述》，《贵州文史丛刊》2014 年第 4 期。

被帮扶小组：每组设组长 1 名，成员若干名。组长最好是干部或具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师，便于后续工作开展；成员最好也是干部或教师，必要时配备部分学生。

2. 工作要求

平时工作：帮扶小组与被帮扶小组确立帮扶关系后，需定期举行线上交流会。线上交流会的主题、频次和时长可由双方协商确定，每次举行交流会之前双方商定交流主题，帮扶小组组长与成员之间根据主题提前共同备课。

寒暑假工作：学校寒暑假是一个很难得的交流机会，没有平时一样繁忙的工作压力。在此期间，帮扶小组应当确定人员轮流回到被帮扶农村地区学校开展面对面的交流，同样需要提前商定交流主题、频次和时长。

总结反馈：每次的线上交流和寒暑假交流，都需要由专人负责整理备忘录，帮扶小组所有成员共同进行反思、总结并进行交流。

3. 经费支持

帮扶小组所在学校应提供与支教和社会实践活动一样的支持力度，拨专款用于对口帮扶工作，比如每年给予一定额度的课时补助、寒暑假来往被帮扶地区的交通补贴等，并在干部选拔、晋升职称、评优评先时予以一定倾斜。

## 四、结语

于树德一生致力于解决农村合作事业，不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通过出版著作等宣传农村合作事业的重要性，还身体力行进行实践探索工作，以授课、担任合作组织负责人等方式为农村培养合作事业人才，为农业、工业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都提供了经验和思路。于树德的合作社理论及实践对于我们当代的教育领域来说，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结合教育工作，落后农村地区引进发达地区城市教育资源时，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做到以下三个结合：一要结合农村实际（农村与城镇做对比），二要结合地区实际（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做对比），三要结合时代实际（网络普及程度）。

我所在的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是由浙江省供销合作社举办的全日制公办高职学院，其前身是创办于 1979 年的浙江供销学校和创办于 1984 年的浙江省供销社职工学院。学校有合作经济学院、浙江合作经济研究所和产学研合作中心，具有良好的实施合作教育的基础，对今后探索与农村地区的教育合作事业会有较多助益。

# 契合与吸纳：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与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建构[1]

◎王学梦　黄鹏进[2]

**内容提要：**毛泽东群众工作法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对毛泽东群众工作法的历史考察及其与社会工作的内涵比较发现，二者在价值取向、伦理原则和实务方法上具有高度契合性，本质上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关系。本文指出，由于党的诞生具有深度的历史社会使命，可以从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中寻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的助益元素。这一理论视角启迪我们，在推进当代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进程中，需从价值理念的交汇融合、话语体系的通俗转换、适用原则的触类旁通、实务方法的互学互鉴、双主体服务的功能互补等视角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建构，探索形成切合特定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实践体系。

**关键词：**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中国社会工作；内在契合性；本土建构

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深度转型期，社会流动性持续加大，新社会阶层层出不穷，社会摩擦系数加大，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滋生。为有效

①本文是 2021 年度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地重点课题“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群众工作的治理效度及其适应性转化”（课题编号：2021JD09）的阶段性成果。

②作者简介：王学梦，女，社会学博士，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电话：15868109939，邮箱：271022107@qq.com；黄鹏进，博士，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乡基层治理，邮箱 pjhuang05@126.com。

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崭新挑战，发轫于西方的社会工作被委以重任，登上了中国社会治理的舞台。然而，当舶来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嵌入中国语境时，却遭遇了明显的水土不适，在价值理念、伦理原则、方法适用等方面与中国既有的社会文化结构难以兼容。在这一情境下，如何有效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成为备受学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既有研究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群众工作法，本身即是中国革命与社会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基于这一逻辑前提，明晰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法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内在契合性，更好地吸纳毛泽东群众工作法的深邃内涵，对于推进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无疑意义非凡。

## 一、毛泽东群众工作法：内涵、特征及意义

毛泽东群众工作法，是指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为实现民生幸福、民心向党和民族解放（复兴）所恪守和践行的基本原则、理念和方法的总和。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首次阐发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①]的群众工作思想。1943年，在为党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报告时，毛泽东又将群众工作法系统归纳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②]。此后，经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二次概纳和延伸，这一表述基本定型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从演进历程来看，毛泽东群众工作法大体经历了孕育萌芽（1921—1927）、初步形成（1927—1935）、走向成熟（1935—1944）、继续发展（1945—1956）、曲折发展（1957—1976）五个历史时期[③]。依据不同时期工作重心的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1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页。

③李丽丽：《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海南师范大学，2016年，第10-14页。

不同，又分别表现为树立群众观点、学会做群众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①]、民主集中制[②]等个性化创见和慧识。这些创见和慧识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探索高度结合[③]，成为当下聚合民众利益、重塑民众信念、凝聚民众心理的最好文本[④]，富有高屋建瓴的时代性意义。

就其理论价值而言，毛泽东群众工作法渗透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蕴含着炽热的人民情怀[⑤]，他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路线和方法，有效解决了政治群众化和群众政治化问题[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为其后的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⑦]。就其实践意义而言，毛泽东群众工作法准确把握时代主题，引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⑧]，是党团结带领人民探索“中国道路”的科学总结和伟大创造，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⑨]。

仔细考察毛泽东的相关著述还可以发现，其与发轫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诸多融通之处。譬如，党的群众工作对于“群众”的理解

---

①唐洲雁：《毛泽东群众观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 年 11 月 27 日。

②《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91 页。

③申权、王晓云：《论毛泽东的人民群众路线思想及其当代价值》，《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9 年第 8 期。

④张秀荣：《论毛泽东关于为群众工作的思想及其价值》，《东北师大学报》2015 年第 6 期。

⑤张勇：《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及其当代价值》，《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8 年第 2 期。

⑥张秀荣：《论毛泽东关于为群众工作的思想及其价值》，《东北师大学报》2015 年第 6 期。

⑦钟德涛：《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新论》，《江汉论坛》2003 年第 12 期。

⑧苏宇：《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贡献》，《人民论坛》2012 年第 17 期。

⑨冯俊：《毛泽东群众路线理论及其当代意义》，《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

类似于西方社会工作对于“社会”的解读，毛泽东所热爱的“人民群众”近似于为西方社会工作的基本对象——“案主”，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情结饱含了其对民生福祉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以及尊重、接纳、案主自决、个别化等伦理原则，而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中有关社会调查、组织动员和骨干挖掘的普及推广亦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小组、社区、个案三大方法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近似性。故而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与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具有深度的契合性，区别仅在于西方社会工作发端于工业文明席卷的城市地带，而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法则肇始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广袤乡村。限于篇幅，本文重点探讨早期毛泽东群众工作探索和实践与西方社会工作的内在契合性。

## 二、价值目标的契合：追求民生福祉，促进公平正义

社会工作既是一项“以实践为基础的职业”，同时还是一门“促进社会改变和发展、提高社会凝聚力、赋权并解放人类的学科”，“追求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是其核心准则”[①]。而这些充满民生福祉、助人自助、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也不谋而合地融入到了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思想中。

### （一）大力增进民生福祉

民生福祉指人们在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所得到的基本保障和人文关怀，用毛泽东的话说即“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具体地而不是讲话地去解决实际问题，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②]。毛泽东特别关注广大群众的民生福祉问题。早在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各种物资极度匮乏的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强调，“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③]。在这里，“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涵纳了土地问题、

---

①任文启、李灏哲：《中国社会工作的强政治性与推进策略探析》，《社会工作》2015 年第 2 期。

②《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467 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37–139 页。

劳动问题、穿衣问题、柴米油盐问题、住房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等等[①]。

毛泽东还积极带领广大党员以实际行动增进人民群众的民生福祉。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流行疫病，农村缺医少药，严重威胁群众健康。在毛泽东的体恤关照下，医务人员走村串户为群众送医送药，疫情很快得到控制，群众给毛泽东送来“人民救星”的牌匾[②]。

为了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竭尽所能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大力发展合作社运动，普遍建设谷仓，建设备荒仓……使生产品出口卖得适当的价钱，又从白区用低价买进盐布，分配给人民群众，抵制商人的剥削，大大改良了群众的生活[③]，有效克服了严重的物资困难，保障了抗日经费的及时补给。正是对民生福祉的深切关怀，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在异常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赢得了底层疾苦大众的真心拥护和爱戴。

（二）积极倡导助人自助

“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最终目的或本质，指社会工作者以利他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为基础，通过帮助有困难、有需要的人，使其在克服眼前困难的同时，增强面对和解决困难的能力。因而，使能者是社会工作者担负的重要角色。这样的角色与毛泽东所号召的“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群众工作思想显然是高度契合的。“相信群众自己可以解放自己”便是这一思想得定贯彻的基本体现。在这一价值理念的支配下，毛泽东强调：“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真正的英雄”[④]，为此他坚信在党的带领下群众有解决自身问题的权能和潜能。

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中，他特别指出，广大军民

---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2页。

②殷庆言：《试论毛泽东关于群众工作的思想》，《毛泽东党建思想暨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2014年，第55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要“自己动手”，实现“丰衣足食”。1943 年 10 月，毛泽东在视察南泥湾时再次强调：“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①] 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向全党提出：“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②]。这些价值理念贯穿于毛泽东群众工作思想的始终，也同样契合了社会工作所倡导的助人自助价值观。

（三）强烈追求公平正义

社会工作是一门具有强烈价值涉入的专业，欧美国家社会工作自诞生之初即将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工作发展的首要美德与核心使命，2014 年世界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发展联合大会就将平等、人权、社会公正与正义作为核心议题。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法同样映射出了强烈追求和践行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理想。

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看来，群众工作，首先要求一切为了群众，解决群众关心的各种生产生活中的基本问题，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好这些问题，归根到底要建设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少数地主手里，百分之四十以下在多数农民手里，这是农民受苦贫困的根源”[③]。为了摆脱地主及一切剥削阶级的压迫，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在寻乌等地实行土地分配政策“按照人口总数除土地总数的平田主义运动，受到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④]。这在以土地为生存命脉的旧社会，底层群众的公平正义得到了真正声张，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

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在为公平正义而奋斗，凡是所到

---

①毛胜：《毛泽东：“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学习时报》2018 年 9 月 10 日。

②《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096 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8 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35、379 页。

之地，均力推村民代表登记和选举制度，在一些地区，妇女代表的比例甚至达到过半以上[①]。为了打破轻辱妇女的社会歧视与社会压迫，毛泽东还号召广大女同胞结成各种自助性服务团体，使之真正获得自由与平等。“什么叫做女子有自由、有平等？就是女子有办事之权，开会之权，讲话之权，没有这些权利，就谈不上自由平等”[②]。诸如此类洋溢着强烈公平正义思想的价值诉求，感召着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紧紧地凝聚和团结在一起。

### 三、伦理原则的契合：尊重和接纳、案主自决、个案化

专业伦理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的行为规范或准则。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社会工作有着独特的价值伦理体系。张丽剑在综合《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伦理守则》和香港学者周永新等人有关社会工作伦理论述的基础上，将社会工作者在服务提供过程中需秉承的核心伦理原则概括为“尊重、接纳、非批判、案主至上、案主自决、保密、个案化（个别化）、发挥案主潜能”八大维度[③]。将之与毛泽东群众工作法比照发现，“尊重和接纳”、“个别化”、“案主自决”等主要原则，也是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中一以贯之的伦理原则。

#### （一）尊重和接纳原则

在社会工作方法中，“尊重”和“接纳”是指尊重案主的独特性，以平等、非歧视的态度对待案主，不因案主的出身、民族、性别、年龄、信仰、身体状况、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客观理性地接受其优缺点，设身处地地考虑服务对象的需要，帮助其解决面临的问题[④]。这一伦理原则同样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特别强调的保持干群关系融洽，对待人民群众要真心实意、相互尊重的观点。

---

①《毛泽东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25 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70–171 页。

③张丽剑：《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伦理》，科学出版社，2018 年。

④Horne, Michale. Values in Social Work,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15.

毛泽东向来认为，融洽的干群关系，首先应当做到“眼睛向下”，即领导干部必须尊重群众，和农民做朋友。在1941年《关于农村调查》一书中，毛泽东指出：“怎样使对方说真话？各个人特点不同，因此要采取的方法也不同。但是，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不知道你的来意是否于他们有利……我在兴国调查中，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的也比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①]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做不好的”[②]。正是这种尊重群众、积极接纳群众的工作态度，使得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干群关系亲密无间、血肉相连。

（二）案主自决原则

在西方社会工作方法中，案主自决指案主有自由选择和决定的需要与权力，社会工作者应当鼓励和促进案主面对生活做出自己的决定与选择，并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社会工作者不应当欺骗或驱使案主进入一个违背他真实意愿的行动过程[③]。这一原则同样在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方法中得到了充分诠释。

毛泽东主张必须要对广大群众进行组织动员，才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的压迫，战胜强大的敌人。然而，他又特别强调，“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而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的接受的方式”[④]，这种倡导群众自己做主和自我决定的方式融汇到了共产党所到之地的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当中。不仅如此，共产党在长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89页。

③Horne, Michale. Values in Social Work,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5页。

冈乡、才溪乡等地发动的广受群众欢迎的劳动互助社、耕牛互助社等，均实行自愿结合、互相帮助的原则[①]，对生产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如此，在领导农民逐步组织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时，毛泽东又强调“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②]。这种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基于自愿自决原则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策略，既为广大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也为共产党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三）个别化原则

社会工作中的个别化原则又称个案化、差异性原则，主张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不能用千篇一律的眼光去评估和类化案主的问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案主的独特感受与看法制定独特的服务计划[③]。这一原则同样在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中得到明显体现。

首先，对不同阶层采取不同的团结策略。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针对地主、富农、贫下中农、雇农等不同阶层，提出了不同的团结和斗争策略；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为了团结地主、富农共同抗日，又提出“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活下去”[④]，这一博大胸怀赢得了富农阶层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鼎力支持。其次，对不同兵种施以不同的政治训练。毛泽东在新兵、伤兵、病兵、俘虏兵等不同兵种的政治训练上，强调要通过“上政治课、集合讲话、个别谈话、游艺等工作方式，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并对新兵和青年士兵进行特别教育”[⑤]。最后，因材施教。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一文中，毛泽东指出“青年就是青年，

---

①《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35 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80 页。

③Horne, Michale. Values in Social Work, England: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p119.

④《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22 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03-105 页。

不然何必搞青年团呢？青年人和老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不同，不照顾这些特点，就会脱离群众[①]”。

简言之，毛泽东在群众工作中采取了差别团结的工作艺术，将普遍要求与分类指导、一般性特点与个别化特点权变统筹，充分尊重不同阶层、不同类别、不同年龄群众的个性特点，并依此灵活对待，显著提高了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 四、实务方法的契合：三大技术互为关联

个案、小组和社区被称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三大传统技术手法。尽管这些技术手法与毛泽东的群众工作法难以完全一一对应，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亦可寻到大同小异的实务方法原型，如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法不约而同地与毛泽东的抓典型、“解剖麻雀”工作法相契合，小组工作技巧与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技术颇为雷同，社区工作法中地区发展模式与毛泽东的组织动员法之间亦有关联。

### （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小组工作技巧是指在小组活动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通过科学设计和评估活动内容，组织和引导组员进行充分讨论、互动和分享，以确保服务效果的一种社会工作实务操作方法。社会工作学者王思斌将小组工作技巧分为一般性技巧、有效促进沟通的技巧、组织会议的技巧及小组工作者的角色[②]。其中，小组工作的活动设计、组织沟通的技巧和资料收集环节，与毛泽东广泛应用的社会调查技术具有内在相通性。毛泽东在寻乌、东塘、兴国、长冈乡、才溪乡等地的调查工作中，均创造性地融入了这种科学的调查思维和技术方法。

在调查技术上，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七个调查步骤：（1）调查会上做讨论式的调查。（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3）开调查会人

---

①《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79 页。

②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28–130 页。

多还是人少好？根据指挥能力确定人数，至少三人。（4）拟定调查纲目，按纲发问。（5）要亲身出马。（6）要深入。（7）要自己做记录。[①] 调查内容上，他强调要“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②]。在适用范围上，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又强调，“调查的典型可以分为三种：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依据这种分类，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③]。此外，“解剖麻雀”、“以点带面”等具体的调查方法，也都是屡试不爽的实践智慧。

这些周密细致、简洁易行的调查技术，对于当下小组工作的技术实施也同样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在毛泽东的身体力行与宣传推广下，共产党人大兴调查之风，为革命和建设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为党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指导。

（二）大量创设农民组织

邓纳姆（Dunham）认为，社区社会工作主要涵括三方面：一是调动社区资源，满足社区需要；二是培养社区居民的参与精神，提高合作意识和自决能力，协助居民克服困难；三是协调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部各群体之间的关系，优化社区内部的决策机制[④]。这些内容基本吻合了毛泽东组织、动员与统合中国原本一盘散沙的基层民众动员方式。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即十分敏锐地察觉到“民众的大联合”是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的“根本的一个方法”[⑤]。

在这一认知促动下，毛泽东高度重视广大群众的组织动员工作，即依托社区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将群众有效地组织起来，这种组织方式非常近似于小

---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4–18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114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3页。

④Dunham A. The new community organization,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 Co, 1970.

⑤邝柏林：《毛泽东与中国思维方式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方式的中国化》，《哲学研究》1993年第12期。

组社会工作。毛泽东对群众的组织动员主要沿着两种“组织化”脉络展开：一是组建正式的具有政治动员性质的革命组织。在长冈乡、才溪乡，共产党动员并组建了以村、乡、区等为单位的各种委员会，如红军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国有财产委员会、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等。这些涵盖不同类别和内容的工作委员会以正式登记、选举大会、工作报告等形式层层把关、规范和固化，被称为“苏维埃工作的模范”[①]。二是创设和孵化各类非正式的具有生产互助功能的自组织。如在苏区大力培育和发展劳动互助社、耕牛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并结合群众意愿，以村为单位全盘统筹计划生产，调剂人工。大部分群众都加入了互助社，在优待红属、社员互助与帮助孤老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毛泽东及其代表的共产党还发起成立了儿童团、消灭文盲协会、识字运动委员会、互济会等群众团体运动，组织开展了夜学、识字班、俱乐部、卫生运动、社会救济[②]等民间性活动。

这些有计划有组织的带有生产自救性质的互助性社会团体，其公众参与度和社会影响力甚至远远超出了现代社会工作的源头之一——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兴起于英美国家的睦邻组织运动。而依托于正式的政治组织网和非正式的群团组织网，党与群众实现了鱼水相依和水乳交融。

（三）挖掘典型培养居民领袖

社会工作中的个案工作是指“由专业社会工作者运用有关知识和技巧为个人和家庭提供物质或情感方面的支持与服务，目的在于帮助个人和家庭减轻压力、解决问题，达到个人和社会的良好福利状态”[③]。但不同于欧美国家在社会工作个案服务中的微观化、病理化、临床化倾向，毛泽东更加突出从优势视角出发，激发人民群众的自我潜能，并注重挖掘群众积极分子的示范性、能动性和建设性作用。

---

①《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77–290 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00–311 页。

③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96 页。

为了最大程度地吸引群众参与革命建设，毛泽东开创了两种居民骨干的培育方式。一是加强政治号召。1937 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工作报告中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要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①。在这里，群众领袖被赋予了崇高的历史性主体地位。二是重视以"先进"群众带"后进"群众。在居民骨干的培养方法上，毛泽东讲求"抓两头带中间"的行动策略，即任何一种情况都有先进和落后的"两头"，中间的状态又总是占多数。抓住两头就把中间带动起来了②。换而言之，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③。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显示：贫农领袖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④。这一评价既肯定了群众领袖的带头作用，也团结了愈来愈多的中间和落后分子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会建设运动中来。

## 五、毛泽东群众工作法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实践建构的启示

由上可知，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与西方社会工作在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实务方法上均有诸多契合性。这也启迪我们当下，要实现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适应，一个可行的路径即是从价值理念、话语体系、基本原则、实务方法等层面，重温、萃取和吸收毛泽东群众工作法的有益思想，并将这些思想因子融贯于社会工作的日常生活和服务实践中，从而构建起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

---

①《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77 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49 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897 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2 页。

（一）注重价值理念的交汇融合

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之所以富有成效，在于其在核心价值取向上蕴含着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真心实意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实现女性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追求，不仅融通了中国自古以来“民为天”、“民为贵”的儒家思想，又批判性地吸收了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实现了二者的有机“嫁接”和融会贯通。而当下西方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实践中之所以遭遇水土不服，一个重要的症结即在于未能在价值理念上形成中西方社会工作的互构性转化。因此，当下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首先要加快二者在价值理念上的交汇融合。

一是要找准价值的融合交汇点。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深受儒、释、道思想的浸染。实际上，儒家的秩序稳定和仁爱道义，道家的崇尚自然和生命至上，佛家的博爱众生、慈悲为怀等思想，以及当前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的民生保障、脱贫攻坚、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治国理政思想与西方社会工作所主张和倡导的基督教思想中的公益慈善、扶贫济困、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具有天然的内在互通性。这些核心的价值交汇点理应成为建构当前中国社会工作价值内核的基本前提。

二是要坚持求同存异。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开辟了中西方国家文化交流与共享的空间，但西方文化中的不利因素，极有可能侵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如西方国家强调权利优先、自由至上的个人主义原则与中国强调推己及人、家国同构的集体主义原则之间存在着内在紧张。因而中国社会工作要对中西方文化价值中正面、积极的“交汇点”予以接纳吸收，而对西方文化极力推崇的权利优先、自由至上等极端个人主义原则保持清晰的认识和必要的警惕，特别是对西方价值中的狂热宗教、种族主义、贵族崇拜等不合时宜的“糟粕”，坚决舍弃剔除，真正做到求同存异、为我所用。

三是要厘清转化路径。要善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去解释、解构和再造社会工作中源自西方的价值理念，使其符合中国大众的认知思维，符合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经验逻辑；要结合中国转型期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特征，使社会工作切实担负起追求民生福祉、促进公平正义的价

值理念，更加生动地体现在破解市场“大转型”所带来的就业能力、社会保障和利益冲突等具体问题解决上，从而回应和助力中国当代社会建设的迫切需要。

（二）加快话语体系的通俗转换

话语体系是“体系化了的话语集群，是思想观念与理论体系的表达系统，也是一种进行中的实践，与所在的社会环境相互影响、相互构建”[①]。中国当下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在建构过程中，主要由西方转译而来，存在着大量与中国大众话语体系不相兼容的概念语词与逻辑结构，这也是导致社会工作难以得到大众理解、信任和支持，服务“悬浮”的一个症结所在。而毛泽东群众工作方法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其所表述的语言是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其所传递的价值理念是老百姓能够悟得了的价值理念。因此，本土社会工作借鉴毛泽东群众工作法，还需要加快自身话语体系的通俗化、平民化转换。

一是要推进社会工作话语同党的政策话语接轨。党的政策话语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干群关系话语，这些表述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工作的话语表述存在同义转换的空间与可能，如“社会工作——群众工作——党群工作”、“案主——服务对象——人民群众”等在本质上是具有相通性；另一方面是民生服务话语，如“帮扶救助”“脱贫攻坚”“协商民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这些话语同样可“转译”为“扶贫济困”“助人自助”“民主自由”“公平公正”等。通过适度切换和“转译”，有助于实现社会工作精神要核与党的主流话语的有机接轨。

二是要促进社会工作理论话语向大众话语转化。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从理论的“神坛”走向大众的“凡间”，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汲取灵感和养分，再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话语形式融入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服务和实践中。在这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为我们建树了楷模。他们用群众所熟知的通俗话语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阐明党的政

①杨发祥、王杰：《中国社会工作的话语体系构建》，《学海》2018 年第 3 期。

治意图，武装群众思想，如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话语巧妙地替换为“革命”“敌人”“朋友”“自己”等群众语言，既兼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又符合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习惯和表述偏好，赢得了服务对象的热切拥护。

（三）促进适用原则的触类旁通

除了始终如一地将尊重、接纳、案主自决、个案化等原则落在实处外，毛泽东还拓展和丰富了更具中国地域政治和文化特质的情感融入、党组织吸纳、发展主义等原则，对于当前的社会工作发展无疑同样具有现实鉴示意义。

一是要坚持情感融入原则。情感是维系党群和干群关系的纽带，也是促进社会团结与谐和的桥梁。毛泽东、习近平向来主张“带着感情做工作”，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毛泽东在论述干群关系问题时，曾深刻指出，应当“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必须使人感到人们互相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①]。只有当领导干部和社会工作者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以对待亲人般的态度，俯下身子真心实意地为民谋利，无条件尊重和接纳服务对象时[②]，干群关系才能真正融洽和谐。

二是要坚持组织吸纳社会原则。毛泽东非常注重党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借鉴吸收和成果应用，在革命战争时期推广普及了具有政治动员性质的各种工作委员会和群众性社会团体。这些革命政体组织不断将广大群众吸收其中，以达到壮大、团结和发动革命群众的目的。而当下中国社会工作主要由民政部门单边策划主导，缺乏深度、有效的联动机制和平台，因而迫切需要打破体制壁垒，依托各级党组织、群团组织进行双向赋权，为社会工作发展提供话语指引和资源保障。

三是要坚持发展主义原则。即在为群众提供物质和生活救助的同时，更加强调赋权增能的视角，充分考虑和评估群众的主体性能力，激发和培育他

---

①《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355 页。

②实质上，“无条件尊重和接纳服务对象”本身也是社会工作实务所需坚守的最为重要的伦理原则之一。

们自强自立、自我发展的动机。毛泽东便积极践行了这一原则。他不仅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冷暖安危，还经常以乐观的、信任的眼光去理解和看待群众，以此激发广大群众的优势和潜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这些脍炙人口的表述，至今仍有振聋发聩之功效。因而，丰富、多元、赋能、发展的介入原则应成为今后社会工作和党群工作的一个重要走向。

（四）强化实务方法的互学互鉴

表面上看，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与社会工作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但仔细深究不难发现二者都将群众利益的满足和实现作为其使命追求，并且在实务方法上“心有灵犀”、兼容互通，因而在实践中互学互鉴、优势互补便是题中之义。换言之，毛泽东群众工作法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和社会动员的结合体，是基于中国本土革命战争的需要而提炼出来的实战经验，其优势在于喜闻乐见、深入民心，因而能够落在实处、胜在本土；但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在服务目标上过于强调宏观的社会变革，在方法论上较为零碎弥散，在理论框架上缺少体系化、连贯性论述，进而是一种较为朴素的社会工作方法，需要吸收西方社会工作的养分以弥补其短板。而西方社会工作虽然在方法论上较为系统、深入和成熟，但往往脱离了中国本土知识语境而造成适应“综合征”，因而也需要从毛泽东群众工作法中汲取营养、双向贯通。

一是要将社会调查落到实处。毛泽东历来将社会调查作为党政干部领导群众工作的首要任务和决策基础，曾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①]。而当下许多社会工作服务，需求调研满足于走过场，项目发包服务于部门偏好，服务对象沦为失语的多数，与毛泽东所倡导的社会调查精神背道而驰，亟待反思与改进。

---

①《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267–268 页。

二是要善于组织动员群众。毛泽东在革命斗争早期大力培育和孵化了各种具有民间互助性质的群众性团体，这些群众性团体按照自愿互利的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等形式助人自助，形成了一种类似“蜂窝状”的组织和社会生活共同体，既服务于生产发展和生活便利的需要，又凝聚了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共同革命和抗战。这一宝贵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大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是要重视不同方法的良性循环。毛泽东在群众工作法中，重点遵循了“抓两头、带中间”的群众工作法，即一般性地指导若干具有共同兴趣爱好和利益诉求的普通群众结成互助性团体和组织（小组工作法）；再利用这些组织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和宣传教育，从中发掘群众积极分子并个别化地培养成居民领袖（社区工作法）；最后以居民领袖为突破口，发挥其在矛盾化解和社区参与中的示范作用，并对少数经济和思想上的落后分子进行帮扶与感化（个案工作法）。如此循环往复，方能真正打通社会工作在方法整合上的壁垒与隔阂，达致一种互为促进、螺旋式上升的理想境界。

（五）突出双主体服务的功能互补

社会工作服务的最终落脚点在“人”，因而服务提供者的理念、价值、素质与能力决定了服务的层次、质量和水准。毛泽东在群众工作中特别突出“群众”和“干部”这两类主体的建设性作用，曾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上，毛泽东倾注了大量心血，提出了善于爱护党员干部的“五条办法”[①]。而当下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主体主要是由体制外的社会工作者单向供给。结合历史与现实，中国社会工作服务亟待迈向社会工作者与党员干部携手共进的“双主体”服务格局。

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在建党初期，毛泽东就提出要从思想上建设党，以党员首先从思想上入党，将理论融入实践、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加强

①殷庆言：《试论毛泽东关于群众工作的思想》，《毛泽东党建思想暨党的群众路线理论研讨会交流论文》，2014 年，第 526 页。

理想信念教育[①]。党员干部与社会工作者一旦接受和内化了这种理想信念，便能在思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行动上保持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进而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亲民爱民为民的权威形象。当下许多社会工作者虽然坚持了助人自助、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然而对于党委政府所极力宣扬的思想政治教育却格外生疏，因而需要紧跟时代步伐，深入钻研和吃透党的宗旨要求，将党的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要明确职业身份。“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早在1927年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即在每一个连队里都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更高层面是政治和宣传委员会），专门代表士兵利益做政治工作和民众工作[②]，为此共产党还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政工干部。这批政工干部，具有党内晋升的制度化空间和完善的待遇保障，在向广大党员和群众灌输阶级思想、开展批评教育、活跃政治氛围、凝聚人心力量等方面功不可没。而当下许多社会工作者被排斥在主流的党的组织系统之外，由于缺乏体制内晋升通道和职业发展空间，人才流失率高，组织稳定性差，服务效果难以为继。

三要探索党政干部与社工人才的通融式发展。当前，党政干部和社工人才尽管都是群众服务的重要主体，但却分别隶属于不同的组织机构和享有不同的身份待遇。党政干部对高深难懂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不感兴趣，社会工作者对专业服务浅尝辄止和生搬硬套，迫切需要从源头上强化此两类主体的良性互动。具体而言：其一，在体制内普及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如在党政干部的教育培训中，特别针对群团组织的特定党政领导，增设专业课程，并在政绩考核中体现社会工作的职业能力和服务要求。其二，在体制外强化党对社会工作的核心领导。如突出党对社区居委会和社工机构的组织战斗力和辐射力，着重从传统的群众工作法中汲取养分，加快社会工作的二次转化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5–95页。

②祝志伟：《毛泽东：“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湘潮》2017年第7期。

与服务升级。在这方面，广东省近几年推行的“双百计划”和“双百工程”，强调驻扎社区、融入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理念[①]，以及各地的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是对我国传统群众工作的强势回归，具有前瞻性意义。

①廖其能、张和清：《社会工作督导范式转向研究——以“双百计划”协同行动为例》，《社会工作》2019 年第 1 期。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杭州与皖东南地区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互动关系的初步研究

◎杨云翠　陈虎山[①]

**内容提要：**在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由于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的地缘及亲缘关系，浙江省杭州市区域内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与皖东南地区（今安徽省宣城市）多次产生密切的联系，或有党组织统属关系、或有相互开辟发展关系、或有携手共同发展关系，两地党组织为了共同的初心使命而顽强奋斗，其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和相互支持的战斗情谊成为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依据地方党史所载的有限史料对此作了一些初步梳理，希望对皖浙两省党史工作者拓展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浙江杭州；皖东南；党建；相互关系

安徽省宣城市历史悠久，历代被称为“上州”、“望郡”，今辖有宣州、宁国、广德、郎溪、泾县、绩溪和旌德 7 县市（区）。地处皖南山区与沿江平原过渡地带，南北窄而东西长。东临浙江，南倚黄山，西与芜湖毗邻，北和东北与江苏接壤，系皖东南之门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两地山水相连、人文相通的地缘及亲缘关系，杭州市党组织建设及党所领导的武装斗

①作者简介：杨云翠，女，中共宣城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党史编研科长，联系电话：13355634495。陈虎山，男，中共宣城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二级调研员，联系电话：13705631906。

争与皖东南地区（今安徽省宣城市）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但这些联系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地方党史研究部门足够的重视，基本上处于各自为阵的分散状态，相互联系不多，不能从整体上看出两地党组织建设的相互影响。

## 一、杭州党组织对宁国县东及东南部山区的开辟

宣城宁国市当年为宁国县，其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位于天目山西麓，与浙江省于潜、昌化（现均属杭州市临安区）、孝丰（现属湖州市安吉县）交界，这里地形险要，是浙江西部地区通向皖东南的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历史上民族英雄岳飞曾在此抗击金兵。

1928 年 4 月，中共浙西特委成立后，派党员傅金林到宁国东南部山区秘密进行革命活动。这一带的南极、仙霞、万家等乡镇与浙江昌化、于潜相邻，周围高山峻岭，道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这里山多田少，山田大都操纵在地主手中，山区农民过着贫困交加的生活。除本地人外，这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浙江遂昌的移民，他们以种山为生，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傅金林到达仙霞镇蓬山村后，利用他是遂昌人这一便利，积极在亲戚、同乡中发展党员。

1928 年 8 月，傅金林返回遂昌，参加了浙西特委领导的遂昌塘岭头暴动，任中共浙西特委联络员。暴动失败后，傅金林随浙西特委书记郑馨避难至分水县（今属桐庐市）。1929 年春，根据郑馨的指示，傅金林再次来到宁国东部的蓬山村，落脚在罗章文家，以给罗家管账为掩护，发展党的组织。

1929 年春，中共宁国特别支部在蓬山村成立，傅金林任支部书记。此时，由于于潜、分水、昌化、宁国党的组织迅速发展，经中共浙江省委同意，在于潜建立了中共于分昌中心领导小组，属中共杭州市委领导，成员有傅以和、赵坤、傅祖尧，负责领导于潜、分水、昌化、宁国东部的党组织。宁国特支间接处于杭州党组织的领导之下。

从 1928 年冬至 1930 年 8 月，于分昌中心领导小组领导下发展党员 250 余人，建立了 3 个直属区委，22 个支部，1 个特别支部。其中宁国特别支部下辖大佛地（书记朱顺发）和黄金塔（书记罗顺天）两个支部。

1930 年 7 月，浙江省委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暴动问题。傅金林代表宁国东部党组织参加了会议。西湖会议之后，傅以和随傅金林一同经于潜来到宁国蓬山村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向贫苦农民宣传“二五减租”的主张，领导党员、群众同残酷欺压、剥削农民的地主做斗争。他们还积极组织一些进步青年农民参加武装组织，由中共于分昌中心领导小组在三县边境组织三个打猎队，实际是青年武装突击队，名义上是为了上山打猎，实是集结训练，建立革命武装，为举行大暴动做准备。

1930 年秋，正当各地积极发展党组织和武装力量，为暴动做准备之时，浙江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派出大批军警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10 月，反动军警包围了宁国蓬山村，傅金林被捕，于分昌中心领导小组成员傅以和因躲进深山得以逃脱。至此，中共于分昌中心领导小组遭到破坏，宁国特支和大佛地、黄金塔两个支部也停止活动[①]。

## 二、中共上浙皖特委领导浙西和皖东南地区的武装斗争

1935 年初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后，中共泾（县）旌（德）宁（国）宣（城）中心县委先后在洪维恭和李步新的领导下，在皖东南的崇山峻岭中开展了一年多的游击战争。1936 年春，在敌人残酷“清剿”下，红军游击队无法在原地立足，由李步新率领转移到皖浙赣交界的鄣公山，与闽浙赣省委取得联系。4 月，为了统一和加强党的领导，闽浙赣省委在鄣公山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闽浙赣省委改为皖浙赣省委，并将所属地区划分为 5 个特委，上浙皖特委是其中之一。

安徽泾县、宣城、广德、郎溪、宁国 5 县与浙江孝丰（现属安吉县）、于潜、昌化（现均属临安县）3 县同属上浙皖地区，共同归属上浙皖特委领导。原共青团闽浙赣省委书记邵长河担任特委书记，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第 3 营政委阙怀仰担任特委副书记。宣城和杭州部分地区开始直接处于同一领导之下，并

①《宁国党史资料选编》，1–3 页。

肩开展战斗。

上浙皖特委成立后，根据省委“独立团要到更远一些地区去开展游击活动，扩大声势”的指示，在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的协助下，特委书记邵长河等率部转战上浙皖，沿途不断留下小股武装和红军干部，秘密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活动。在深入上浙皖地区活动过程中，先后建立 4 个县委：宁昌中心县委，书记余玉堂；宁广县委，书记黄耀武；孝广县委，书记老梅；孝丰中心县委，书记彭长清。同时，也在上浙皖地区开辟了 5 块游击区，如宁（国）昌（化）区。

1936 年 9 月上旬，省委秘书余玉堂（人称大老余）随红军独立团来到上浙皖地区，以宁国南部的洪家塔为活动据点，领导洪家塔、桥头、羊毫山等地的工作。洪家塔地区包括宁国南极、万家、大龙、银峰、杨山、仙霞和昌化龙井、岛石等地，由汪金水、杨彪（又名杨柳青）、彭长清（又名曹荣）先后负责；桥头地区包括宁国汪村、石口和孝丰桐坑、姚村，由余际青负责；羊毫山地区包括霞西、庄村、虹龙等地，由强达负责。余玉堂和红军干部在各地利用召开群众大会，张贴标语，唱歌谣等宣传形式，启发群众，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取消保甲制度，发动群众报名入册，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农民团、贫农团、儿童团等组织。到 1936 年底，建立起来的农民团有 100 多个，贫农团有 24 个，儿童团有 5 个。

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各地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36 年 12 月，余玉堂在宁国高坑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杨彪、强达等红军负责同志及一些地方骨干，会上对组建区委工作做了通盘计划，决定桥头地区为第一区，洪家塔地区为第二区，羊毫山地区为第三区。在强达领导下，羊毫山区委成立，由汪浩德、汪水顺负责。与此同时，各地建立地方游击队 7 支，130 人。其中汪金水领导的宁昌游击队，在协助独立团奇袭昌化城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

①《中共宣城地方史（1919–1949）》，87–89 页。

1936 年 12 月中旬，刘毓标率独立团一个营来到上浙皖地区，在宁国南乡找到邵长河及特委武装，接着袭击了当地一个国民党区公所，从缴获的报纸上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发动群众，独立团和宁昌中心县委书记余玉堂商量，决定就近攻打昌化县城。12 月 21 日拂晓，独立团、特委武装及宁昌游击队攻进了昌化县城，活捉了县党部执委兼株柳乡乡长章本范和马鹄乡乡长王道明，缴获步枪百余支，子弹 8 箱，释放“囚犯”百余人，焚烧监狱和国民党昌化县衙房屋 5 所。

1937 年 1 月，特委武装从孝丰出发，长途奔袭于潜。部队到达于潜四角田时，国民党浙江保安团一个排也在当晚到了天目山口，特委武装歼灭了这股敌人，毙敌 1 人，俘敌 20 余人，缴获步枪 24 条，轻机枪 1 挺，子弹 3000 发。此仗是上浙皖特委及独立营成立之后战果最大的一次战斗，它改善了部队的装备，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对之后战斗的胜利有重要的影响。

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给敌人以沉重地打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变本加厉地策划在一个月内消灭南方各游击根据地的共产党和红军。1937 年 1 月，国民党调集十余万兵力，分三路进攻皖浙赣游击区，其中一路从浙江开化向上浙皖地区进攻，兵力遍布宁国、广德、孝丰、于潜等地。上浙皖特委遭到重大损失，保存下来的部分武装后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

###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地党组织为打通联系而努力奋斗

1、成立中共宁东区委，成为沟通皖浙的桥梁。抗日战争时期，宁东地区成为属中共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双重领导的浙西特委联系东南局的必经之地。为了打通与中共中央东南局（驻泾县云岭）的联系，浙西特委决定开辟宁国东部地区。1939 年 5 月，根据浙西特委决定，中共于潜县委成立，浙西特委指示于潜县委开辟宁东地区。于是，1939 年 7、8 月间，于潜县委书记贺千秋等，进入宁东地区，在宁国仙霞虞家村秘密活动，发展党员。通过考察和培养，先发展了叶舟、虞朝宗、罗来发入党，后又发展郑先源入党。组织上委派郑先源打入仙霞伪乡公所内部，以事务长身份为掩护，进行党的

地下活动。虞朝宗在贺千秋的直接领导下，在仙霞、杨山、云梯一带，积极发动群众，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和政策，并在斗争中积极发展党员，由于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活动范围逐渐扩大，不久成立了中共虞家村支部（又称中共仙霞支部），1939 年秋和 1940 年 4 月，中共于潜县委（后改为中心县委）又两次派人进入宁东地区发展党组织，活动涉及万家、宁墩、狮桥、石门、梅林等地，党员人数发展到 60 多人，建立了仙霞、万家、狮桥等支部，于潜中心县委遂成立中共宁东区委，虞朝宗任书记。虞朝宗担任区委书记后，经常来往于宁东与浙西地区，及时把上级党委的指示贯彻到群众中去，又把群众斗争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①。

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宁东地区党组织在群众中广泛开展了以宣传中共七七宣言为中心内容的抗日宣传活动，揭露国民党统治集团投降分裂倒退的阴谋。皖南事变之后，由于国民党白色恐怖，于潜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赵澄于 1941 年 4 月被捕叛变，于潜中心县委所属党组织纷纷遭到破坏，中心县委机关驻地也处于危险之中，贺千秋准备把中心县委机关从浙江撤到宁东地区。6 月初，因宁东区委下属的万家支部领导人暴露，面对即将到来的危险，于潜中心县委领导人和宁东区委领导人决定成立游击队，6 月 8 日在仙霞举行暴动。浙西特委接到有关仙霞暴动失败的消息后，派联络员严月落到宁东，向区委有关领导传达指示：暴露的人员要分散隐蔽，由未暴露的同志组成新区委。1941 年 8 月，顽方加紧在宁东地区搜捕共产党员，虞朝宗等部分党员赴外地隐蔽。

1942 年春，虞朝宗奉于潜中心县委指示，重新回到宁国开展工作。1943 年 8 月，因叛徒出卖，虞朝宗被捕，并于 9 月遭杀害，宁东地区党组织遭破坏，革命转入低潮②。

2、开辟绩宁昌边区，发展皖南游击根据地。绩宁昌地区，位于皖浙两省

---

①《宁国党史资料选编》，27–28 页。

②《中共宣城地方史（1919–1949）》，137 页，181–182 页。

边区，山峦起伏，山高林密，是皖东南通向浙西和苏南的要道。1943 年春，皖南山地中心县委在粉碎敌人连续六个月的大“清缴”之后，决定“依靠老区，扩大新区”，指示唐辉所部自旌德向绩溪、宁国方向发展。唐辉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派王成信、舒梦熊等开辟绩宁昌地区。

为了开辟绩宁昌地区，王成信率游击小组首先在旌绩交界的百罗园建立基点，发展关系，以此为依托逐步向宁国境内推进。经过 1943 年的秘密工作，游击队由原来的五六人发展到 10 余人。活动地区包括当时宁国境内的丛山关以下之兵坑、金沙、黄土坑、常乐坑、观音桥（以上地方 1956 年划归绩溪县）以及龙源坞、浪荡坞、许竹坪等大片地区，还有旌德的考岭、里八都等地，在龙源坞成立了秘密党支部。由于龙源坞绝大部分是九华过来种山的移民，这就沟通了龙源坞与九华之间的联系[①]。

九华，俗称荆州，为绩溪一乡，与浙江昌化、宁国胡乐、歙县旱南等相邻，周围全是崇山峻岭，只有几条山路与外界相通。1943 年 3 月之后，旌绩宁工委（属旌绩县委）派人多次进入九华秘密开展工作。1944 年 10 月，建立了九华第一个党组织——麻叶岭党支部，到年底，在麻叶岭一带建立了民兵组织。12 月下旬，旌绩县委配合新四军七师侦察连一个排攻打宁国乡公所获胜后，又中途奔袭了九华乡公所。九华群众要求游击队进驻九华。1945 年 2 月，旌绩宁工委派舒梦雄、戴吉祥等 19 名游击战士进驻九华地区，地方党组织立即协助游击队作开辟工作。半个月中，在全乡建立了 800 多人的民兵组织，收集马枪、马刀，控制九华和外界相通的 13 处山口；迅速成立九华乡农民协会，行使抗日民主政权的职能；游击队也在开辟工作中发展壮大。随着新四军苏浙军区天目山第一次反顽战役的胜利，绩溪的戈溪、登塔、大障乡，浙江昌化的浙门、大许、仁溪、新桥、板桥以及宁国的甲路、胡乐乡的一部分地区，群众自发起来抗丁、抗税，要求九华游击队派人去领导。游击队适应群众要求主动出击，进一步发动了群众，游击区地跨浙皖两省，涉及 3 县 12 乡，纵

①《宁国党史资料选编》，36–40 页。

横 100 余华里，人口 4 万多[①]。根据斗争的发展，1945 年 6 月，旌绩工委决定正式成立绩宁昌边区工委（区级），书记王成信。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根据上级指示，皖南山区游击队留下坚持，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绩宁昌边区工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采取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歼灭敌人”的灵活战术。到 1947 年初，游击队在绩宁昌边区站稳了脚跟，为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也为链接皖南和苏浙皖两大游击区起了桥梁作用。在 1947 年的大发展中，绩宁昌边区工委在配合整个皖南游击战争中做出了贡献。根据斗争的发展，1948 年，绩宁昌地区划给苏浙皖边游击队和旌宁宣游击队[②]。

3、成立苏浙皖边工委、皖浙边工委，为迎接大军渡江准备前进基地。1947 年初，华东局成立以钱敏为书记的苏浙皖边工委，统一领导苏浙皖边游击战争，对江南国民党兵力形成牵制。1948 年苏浙皖边工委在粉碎了敌人的“清缴”以后，坚决贯彻执行华东局和皖南地委的指示，决定依托广宁孝老区，迅速向皖浙边的宁东、昌化、于潜、临安、孝丰一带发展，创建以天目山为中心的苏浙皖边区游击根据地，配合解放全国的战略反攻。为了顺应这一斗争形势，1948 年 3 月，苏浙皖边工委决定在边区大队的基础上，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边区支队。6 月，边工委派张思齐带一支武工队前往宁国桥头、石口一带活动，南进开辟天目山西部地区。为了配合苏浙皖边工委的南进工作，加强两地的联系，泾旌宁宣县委派人开辟宁东。1948 年 8 月，边区支队下属五、六中队和开辟天西的武工队在边区工委领导的带领下，翻越九十九湾大山，到达宁国昌化边境的虹龙、岛石坞地区，与王文石等率领的泾旌宁宣游击队胜利会师。苏南、皖南两块游击根据地联成一片。之后，天西武工队分赴宁墩、狮桥、虹龙、昌化、天目山 5 个地区发动群众，先后建立了 4 个区委。苏浙皖边区与各游击根据地的联系得到沟通，革命力量有所加强。

---

①《中共宣城地方史（1919–1949）》，203–204 页。

②《宁国党史资料选编》，36–40 页。

苏浙皖边区支队于1948年12月拔除了宁国万家桥敌人的据点，乘胜向于潜、临安、孝丰、东西天目山一带发展。1948年底，当边区支队由东、西天目山返回宁东时，浙保一团企图在孔夫关至仙霞间设伏。遭遇后，因边区支队有所准备，先头部队率先抢占山头猛烈反击，敌军不支狼狈溃逃。边区支队取得军事胜利后，边区的各项工作进程大大加快，“三抗斗争”“减租减息”在边区开展得轰轰烈烈。1949年渡江战役胜利后，钱敏带领部队主动出击，有力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杭嘉湖地区。新中国成立后，钱敏曾任杭州市委第一副书记。

1947年9月，根据皖南地委会议决议，皖浙边工委正式成立，唐辉任书记，决定开辟新安江北之歙县旱南地区。1947年11月1日，戴吉祥率武装40余人及一个武工队，以跃进方式长驱200余里，突入新安江北之歙县旱南地区活动共，攻打敌人乡公所，发展党组织，组建民兵，广泛地开展宣传工作，初步奠定皖浙边主力南进的基础。12月中旬，唐辉率地委特务营二连和工委一个连从绩溪上金山冒雪南征。与戴吉祥部会合后，连续打下深渡联防区署和昌溪乡公所，击溃偷袭英富坑之敌，很快打开旱南局面，1948年1月，路东工委书记王成信率90余人到达歙南与戴吉祥部会合，3月成立皖浙支队后，编为支队第四连。3月13日，皖浙工委又派王必达带领一支约30人的队伍，从旱南昌溪出发，越过新安江，开辟水南地区，为继续向东发展准备前进基地。

1948年5月，工委主力部队反击了安徽省保安二团、四团及浙江省淳安、昌化自卫队对旱南地区的五路围剿。8月，配合淳分昌武工队向浙西挺进，很快在天目山以南、富春江以西的昌化、淳安打开局面，至11月中旬，皖浙部队先后击溃敌人4次骚扰。控制了6个乡6万多人口的地区。此后，程灿率皖浙支队200多人，继续向浙西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为革命斗争的需要，宣城与杭州部分地区之间活动频繁，共同为了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而努力奋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宣城与浙江与杭州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人脉相通、发展相依，积极实施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实

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刚要》，宣城成为长三角 27 个中心区城市之一，战略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巩固。2019 年，宣城与杭州等地开展了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实行区域大气环境信息共享，深化服务共享，推进长三角“一网通办”，实现了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等[①]。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宣城将继续深度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持续加强与杭州的联系。

①《辉煌 20 年——宣城撤地设市大事实录》，黄山书社，167–170 页。

# 粟裕经典运动歼灭战：天目山战役

◎李　雪[①]

**内容提要：**1945 年，粟裕在杭州西北部天目山地区领导了一场载入中共军史的经典运动歼灭战，并取得了三次反顽战斗的胜利：率部南下，运动战中痛击“猴子军”；调虎离山，山地战中血战“黄泥冲”；以退为进，歼灭战中集中兵力“速战速决”。天目山战役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痛击国民党顽固派，这场运动战、歼灭战也成为中共军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关键词：**粟裕；反顽战斗；天目山战役；运动战

天目山，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北部临安区境内，浙皖两省交界处，距杭州 84 公里，距临安县城 30 余公里，现为杭州至黄山黄金旅游线中段。天目山东西长约 130 公里，南北宽 30 多公里。山高林密，风景优美，生产毛竹和茶叶，十分富庶。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此东西夹击，试图占据。国民党军队在此抵抗，仍保留有相当一部分主力和地方武装，用以同苏南红军新四军对峙。1944 年秋为适应抗日需要，粟裕率部到江南浙西北驻地发展，这让视新四军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国民党顽固派如坐针毡，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后在天目山地区发生了一场载入军史史册的以少胜多、诱敌深入的经典运动歼灭战。

① 作者简介：李雪，女，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党史国史。电话：15736881175，邮箱：2810807358@qq.com。

参加此次战役的主要是粟裕所率领的新四军第 1 师 3 旅和江南新四军 16 旅等改编成的新四军苏浙军区第 1、2、3、4 纵队，兵力有一万人。国民党顽军则有第 28 军、第 62 师、第 79 师、第 146 师、第 33 旅及突击第 1、2 纵队、“忠义救国军”等，兵力达七万人。两方相比，国民党军在兵力兵器上都占绝对优势。而粟裕所率部队刚刚驻扎，且对南方作战地形与环境不熟悉，南方山崎雨多。号称专打胜仗的粟裕硬是打出了一场经典运动歼灭战。天目山战役后，毛主席预言道：“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果然，粟裕不负众望，成为中共军史上的一代战神。

**第一次反顽战斗：率部南下，运动战中痛击“猴子军”**

1944 年秋，日军调整兵力部署，将进犯浙赣铁路的部分兵力转向东南沿海进攻，占领温州，另一部则占领福州。蒋介石为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下令毫不抵抗、向后撤退，粤汉铁路沿线及以东广大地区即将成为沦陷区。党中央认为：必须进行反攻。红军苏南部队在巩固现有地区外，应将中心工作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并率领一部渡江，承担南进任务。新四军第 1 师师长粟裕，分析到江南敌后的复杂情况和艰苦环境，自告奋勇请求率部南下，并同张云逸、赖传珠等共同拟定发展东南的计划。12 月中旬，新四军第 1 师第 3 旅誓师南征，在粟裕和陶勇的率领下，分两路从仪征、扬州附近渡江。无边夜幕下，战士们乘小木船隐蔽在江汊子芦苇中，等待过江时机，趁有利时机，部队迅速渡过了长江天险，突破了京（宁）沪铁路两侧日伪的严密封锁，穿越丹北、茅东等日伪岗哨林立、碉堡棋布的清乡区，到 1 月上旬与在江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第 16 旅会合。

1945 年 2 月 5 日，苏浙军区成立，粟裕任军区司令员，统一指挥苏南、浙江部队，以华中局名义领导江南、浙东两个区党委工作。随后，粟裕号召苏浙军区全体指战员要团结一致，以“准备反攻、驱逐日寇，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为便于指挥，军区将第 6 师第 16 旅整编为第 1 纵队；浙东游击

队为第 2 纵队；第 1 师第 3 旅为第 3 纵队；后来到达的第 1 师第 1 旅为第 4 纵队，每个纵队下辖 3 个支队。为提高作战水平和战术能力，粟裕司令员亲自给指挥员讲解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例，将毛主席的运动战、歼灭战思想剖解深入，开展山地战的战术训练，强调坚决执行命令、密切协同的重要性。同时，对部队还进行政治动员和思想纪律教育。

2 月初，1 纵队兴师东南挺进莫干山地区，沿途不断打击敌伪粉碎了安吉、梅溪地敌伪，乘势控制武康、德清两城，开辟了风景胜地莫干山根据地作为前进基地；3 纵队配合 1 纵队进至誓节渡、广德、泗安以南地区，1 个支队进至广德、泗安公路南北地区以掩护后方交通；2 纵队继续巩固四明山地区并向西发展，策应主力南进作战。

正当红军向日伪猛烈进攻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指令其 28 军、“忠义救国军”向孝丰西北地区红军第 7 支队发起进攻，妄图切断红军后路。顾祝同是一贯的反共分子，在“皖南事变”中欠下了大笔血债，这次他又想故技重施可惜遇到了硬茬子。第 7 支队即老 7 团，创造了辉煌战史，如黄桥决战、强攻车桥、痛歼保田大队、如中遭遇战，都痛击敌伪，威震战场。而“忠义救国军”则是顽军中最凶恶的，由流氓、兵痞组成的专门用以反共的军统特务武装，以卡宾枪、机关枪、六 O 炮美式武器武装，善打山地战，有“猴子军”之称。黄昏时刻，第 7 支队在第 8 支队 2 营的配合下展开猛烈反攻，第 3 纵队全部出击、第 1 纵队主力也参加战斗，经过 5 天的激战终于打垮了“猴子军”。阵地的多次失而复得实现了第一次反顽战役胜利，红军解放孝丰县城进而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同时这也是红军第一次缴获美式汤姆枪和卡宾枪，武装了红军。

**第二次反顽战斗：调虎离山，山地战中血战“黄泥冲”**

第一次进攻失败后顾祝同又纠集其第三战区第 52 师、第 62 师、第 192 师及“忠义救国军”第 1 纵队、保 4 纵队等部共 12 个团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孝丰城扑来，此时敌我兵力对比是 2 比 1。3 月 3 日，“忠义救国军”

四个团向红军第3支队西圩市阵地发起进攻：顽军大炮按区分面积袭击，轻重机枪按每平方米穿9发子弹密度射击，战地无处不落弹；而红军装备既“土”又“杂”，有武汉造、南京造、“中正式”、“三八式”。红军3支队以“土”式打法对敌人“美”式打法，以调虎离山之计，抗击了第二次顽军攻击。

在第二反顽战役中，胜败关键之战是血战“黄泥冲”。位于孝丰县西南部的黄泥冲高地，重山迭岭、绿树成荫。陶司令、彭副司令亲临第一线指挥战斗，命令3营长陈桂昌率领7、9连沿842高地下端插过去，拦腰切断敌人；3营教导员徐馨伯带8连抢占842高地，拦住敌人去路，争取实践调动部队实施全歼。一场血战就此展开。842高地是个近乎马蹄形的山头，西高东低，部队靠近高地东部，必须穿过东山方可占领主峰。由于红军在浙西生活艰苦、体质受损，又刚连夜奔袭、体力尚未恢复，在抢占高地时许多战士昏倒在半坡，当部队好不容易占领东半山，正要向顶峰冲去的时候，敌人已经占领了顶峰。在山地战中谁占领制高点，就决定了谁向胜利进了一步。敌52师擅长守备，还拥有自动火器。

“不能让敌人立下足来！”教导员徐馨伯与副教导员刘述清、连长刘兴分析敌52师有“好大喜功”的缺点，决定用“调虎离山计”抢占842高地。8连再次向高地发起进攻：战士们曲上身持枪，打打走走，站站藏藏，接近山头敌人开火后，8连迅速隐蔽，故作寸步难行，连连呐喊。刘兴望穿竹林，看到敌人调动部队准备反击，他立即命令号兵吹号，然后喊着杀声佯攻又假装受挫，再顺着原路退下来。敌人生怕错过“战机”，果然上当，一窝蜂地追了下来，8连也抓住战机，佯装逃跑一股劲地领着敌人向下跑，如此敌人便脱离了阵地，兵力散开快到山底的时候，高地那边响起了密集枪声。7、9连在营长率领下向高地发起攻击，用“调虎离山”计趁机一举攻占了西山高地。此时敌人四个营兵力全被红军压缩在两山之间，下山虎变成瓮中鳖，山上兵成了离散鸟。敌人发现中计后，立马掉头，趁红军立足未稳进行强攻，集中优势兵力分四路向山顶反扑。7班战士坚守好不容易得来的高地，寸步不让，打退顽军两次反扑。3排副季少青身负重伤，战士们也左右开弓向敌群投掷手

榴弹，敌群血肉横飞，季少青拉响最后的手榴弹向敌群扑去，与敌人同归于尽。顽52军向山头轰击半小时仍未攻下，东跑西窜想要冲出山谷，但此时已被红军主力部队包围，伴随着冲锋号，红军主力部队雄狮猛虎般将顽军一举歼灭，8连战士们坚守山头，顽强抗敌，最后下山时只剩18个战士。

**第三次反顽战斗：以退为进，歼灭战中集中主力“速战速决”**

1945年5月中旬，日军为缩短防线集中退守沿海地区，这为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内战创造了有利条件。蒋介石指令其嫡系部队“集中必胜兵力，统一指挥，迅速剿办”，“断起后路，一股歼灭”，对红军发起进攻，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副司令官上官云相将第25集团军总司令李觉接替陶广任前敌总指挥，集结十四个师分三路对红军发起第三次进攻。在经历两次失败后，国民党顽军吸取分兵直入的教训，决定集中兵力齐头缓进，以步步为营的战术逼迫红军决战，试图在美军登陆前肃清江南新四军。顽军先以一个师进攻富春江以北地区，切断天目山与金萧地区的联系，另一个师则向孝丰地区进发，主力分别向于潜、宁国东南部集结，杭喜湖地区的顽敌向莫甘山地区进拢。

此时红军四面围敌、形势紧迫，粟裕司令员决定争取主动，予以反击。为打乱敌方进军部署，以控制富春江两岸，确保浙西与浙东的联系，于5月29日晚，指令第1、7、第10等3个支队，并分三路朝新登方向运动，接连突破顽军第79师在大岭、永昌、松溪、方家井一线的防御，在6月1日抵达新登城下。驻守在新登城内的顽79师从龙游调防以来，强迫大量民工砍光周围树木建筑了多个碉堡，埋布大量地雷，遍投鹿砦障碍。红军1支队浴血冲杀在2日上午就攻克了新登城，与另2支队打退了英式训练的“国际纵队”第1队6000余人的援军与顽军79师的八次反扑，城内碉堡均被摧毁，攻歼顽军2000余人，取得了阶段胜利。可是粟裕接着却下令：全线分路撤离新登和撤出临安。许多战士在撤退的路上表示不理解，说，新登战役刚刚告捷不仅没有乘胜追击，反而匆匆撤退，真像打了“败仗”；同时粟裕指示战士们

抬着在战役中牺牲的第一支队支队长刘别生从城中过，还派后勤队员到处买粮买衣，造成“口粮恐慌”。6 月 13 日，红军在天目山地区的军械厂、被服厂、医疗队、仓库及后方机关也陆陆续续撤退，分赴苏南、皖南、浙西敌后地区，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力也全部集中于孝丰以北地区，有的武装部队甚至还参与了运输工作。被俘虏的顽军被丢下后跑回去向他们的长官报信，红军真的要作“战略撤退”了。新登战役撤退时第 25 集团军总司令李觉还告诫部下“切勿上当受骗，遭受埋伏，做周到准备后再进剿”，此时他们真的相信红军要“溃退”了。19 日，李觉下令左、右翼兵团分别从溪镇和新桥头同时向孝丰发起攻击。但顽 52 师提前行动，这把“皖南事变”的刽子手已按捺不住抢头功，同时顽第 33 旅先头部队尚未孝丰城就谎报已进城，顽 52 师遂派出侦察兵前去城内联系，被红军侦查部队抓住。粟裕综合敌情变化分析，顽 52 师已表现出急功近利的心思，甚至开始冒险孤军直入，可遇不可求的战机不可失去，粟裕司令员意识到，必须迅速集中兵力趋利避害，打他个回马枪，非要速战速决不可。

19 日，夜间星光闪闪，顽军以为是红军剩余部队的夜间袭扰，等到前方战斗枪火四起时，敌方部队已经被红军截断，前后都陷入了重围。粟裕超人的胆识打下的这一回马枪迅速而有力，当顽军的左翼被歼灭时，李觉都不知情，还下令“放胆行动，努力奋进”，谁知右翼兵力的迅速挺进让剩余的 52 师走入红军的包围圈，52 师几乎被全歼，残军第 33 旅也钻进了天目山中。顽军可谓倾巢而出，自投罗网，粟裕指令红军在休整补充弹药后，继续歼灭残军，同时警惕“忠义救国军”的增援，各支队集中兵力迅速包围孝丰城边的右翼顽 79 师和突击总队。敌顽军虽经受击，但仍保存相当强的战斗力，第 79 师有 3800 人，突击总队第 1 队有 4000 余人，第 2 队有 3600 余人，且队伍纵横绵延 30 里。红军 2 万余人虽占微小优势，但红军战士连续作战饥饿疲劳、武器受损，要分割作战、各个击破的相当困难，取胜也不容易。粟裕根据战况特点，一改常规作战打法，改分散打法为集中围歼打法。第二日晚，红军趁顽军收缩队伍，先占领外圈，以外圈据点集中炮火向内圈猛攻，阵地瞬间战雷滚滚、

硝烟灰灰。第三日夜，顽军右翼兵团被全逼进孝丰东南草明山、白水湾、港口的狭小山谷内，粟裕总司令一声令下，狭小谷内顽军大部被围歼，残敌寥寥。至此，第三次反顽战斗在粟裕过人的胆识和出奇制胜的战术下取得胜利。

天目山战役中，粟裕司令员灵活运用运动战、山地战、歼灭战取得了三次反顽战斗的胜利，这是他首次面对国民党正规军时就创造了中共军史上的经典运动歼灭战。这场战役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粉碎了蒋介石顽军的阴谋，其以少胜多的运动战经验为解放战争的大规模兵团作战提供了经验。胜利战果传到延安，毛主席大赞粟裕指挥有胆，战术有方。

# 红色根脉强基视阈下：打造生态、智治党建模式探索

◎陶启付　潘承恩[①]

**内容提要：**生态、智慧、依法治理的党建模式体现了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与时俱进，实现农村基层党建生态化目标、智慧化内涵和法治化手段，拓宽了党建工作的多元视角，提升了党建工作效率，改善了党建的生态语境。红色根脉强基视阈下，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生态、智治凸显了其强势的修正力，也生动践行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本文研究参照了杭州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的现状，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红色根脉；智慧党建；生态文明；乡村治理

红色根脉强基与生态党建、智慧党建，以及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智慧化治理模式的内生关系，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内生活力，更展现了红色根脉的精神驱动对基层党建工作的引领作用。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样板构建，突出基层党组织的堡垒作用。红色根脉实现了党建文化创新、手段创新、策略创新和目标创新。围绕红色根脉强基下的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进行探究，将基层党建的丰富内涵嵌入到乡村治理中，拓宽坚持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策略。

---

①作者简介：陶启付，男，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潘承恩，男，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电话：15355002000。

## 一、红色根脉强基下农村基农村层党建工作的生态需求

红色根脉强基，平添了基层党建工作的内容。农村党组织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红色根脉影响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围绕延续红色文化、构建绿色生态乡村、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等目标拉开了一场有序的创新竞赛。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裕目标实现、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智慧治理，基层党建工作的生态黏性表现更为抢眼，其内在需求也更为显著。

### （一）基层党建生态文明思想贯彻和落地下沉

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快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的重心，也是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核心策略。常态化的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将乡村振兴和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作为阶段性目标，这一阶段性目标实现既需要基层党组织创新思路，改善党建方式和策略，还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精髓融入到党建具体工作中。一方面，要发挥红色根脉强基作用，运用红色文化、根脉强基的思想理论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生态观念，均衡红色文化与绿色发展的维度。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尽管主张生态、绿色发展，但是在具体工作中，粗放的发展方式依旧存在，对生态保护机制执行不到位现象时有发生。生态文明与发展的矛盾影响了基层党建工作的质量，也导致生态文明的思想贯彻和落地下沉出现了“断层”。基于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需要，生态文明思想贯彻和落地已然成为了基层党组织的刚性手段和科学策略。

### （二）基层党建智慧模式对生态驱动黏性增强

智慧党建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融通现代化信息技术，将党建的组织、学习和治理等活动形成动态化方式。其中远程学习、“指头学习”、动态化学习方式改变了传统的组织活动，促使党建活动实效性得以体现。智慧党建与红色根脉强基作用相互协同，不断拓宽学习内容，有效地将组织学习转变为生态化、生活化和常态化机制。杭州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充分利用大数据，实现了动态化管理，并实现了党建活动的红色根脉向度创新。红色根脉文化与生态文明的黏性增强，增强了基层党建活力，促使内生活力成为了影响乡

村治理的核心资源。

（三）基层党建生态模式的智慧需求系统考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生态文明战略层面驱动各级党组织建设既要实现生态目标，还要实现智慧化的过程，旨在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生态文明理念，并引导基层党建工作在智慧化方面全方位创新。系统考察基层党组织生态党建模式，从红色文化和绿色发展的辩证思维角度可以看出，生态党建将绿色、生态、持续和创新的党建模式演化为基层党建工作的原始动力，而这种原始动力通过红色根脉文化强基，能够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沿着科学的发展轨迹实现党建系统的理念创新、行为创新和组织目标创新。智慧化作为核心的策略，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能够促使这种原始动力更贴合于时代需求和农村基层党建需求。

## 二、红色根脉强基下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智治内涵

红色根脉下强基的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融入智治思想。一方面，生态化统筹合理地将生态校验标准贯穿到党建工作中，改善基层党建工作的被动性、边缘化以及弱质性，有利于智慧党建的方式介入。另一方面，在基层党建以及农村治理工作中嵌入智治，可以全面创新学习方式、组织自治、持续发展以及自我评价等策略。红色根脉强基下的农村基层党建生态化是柔性目标，智治是刚性目标，两者融合不仅会产生最优效率，而且能促使党建方式全面创新，对共同富裕、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以及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引导和约束作用。分析杭州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中智治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发。

（一）智治体现了生态最优

基层党组织智治中，治理手段、治理策略、治理方式以及治理目标等尽管都不同程度体现了智慧化的参与，但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考察，生态发展优先理念在党建工作中体现更广泛，更具有渗透力和说服力。红色根脉强基、绿色理念嵌入、生态文明驱动，促使基层党建工作的生态发展理念更加鲜明。尤其是生态优先策略实施中，红色文化和绿色发展相互协同，相互

影响，相互发展，创新推动生态党建和智慧党建治理目标从组织内部拓展到乡村治理，更广泛地将生态文明建设迁徙到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建设进程中，从而保障了基层党建工作的理论支撑和行为影响支撑，从文化视角和生态发展的视角，实现了生态最优的系统化目标。

（二）智治演进了党建策略

推进智慧党建，即运用“互联网 +”的思维和手段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新时代实现基层党组织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层智治以智慧党建的方式持续推进基层党组织的生态化、智慧化、治理合法化以及治理手段现代化，全面内化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改善了治理策略。基于治理水平和能力提升的智慧化需求，基层党组织则是从学习方式智慧化、党组织目标智慧化、党组织建设能力智慧化等几个方面，改善传统的实施策略，在把握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任务、基本制度和党建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立足本组织工作实际特点，将党建目标、任务、要求等系统分解，运用信息化手段实施精准部署、精细实施、精确评价，实现基层党建策略优化与生态目标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协同发展。

（三）智治提升了治理水平

在杭州推进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建设中，强化基层党组织智慧治理，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基层党建信息化、智慧化，是基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核心要义。一方面，围绕共同富裕目标率先实现，在基层党建中融入信息化手段，通过党建工作的信息化流转、网络化运行、流程化管理，创新了基层治理方法，系统提升了治理效率。另一方面，基于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导向，将乡村治理、乡村振兴与改善民生问题作为基层治理的综合目标，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鉴于杭州的经验和样板效应，更广泛地将智治融入到乡村振兴中，不仅能提升乡村治理的水平，而且还能促进乡村振兴的治理优势扩张为共同富裕的治理优势。

（四）智治彰显了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农村基层党建、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均指

向了同一个目标，即生态文明的智治内涵。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的目标一致，基于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机理，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基层党建工作的生态化指标、智慧化程度，都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程度。因此，基层党建工作生态、智治内核不仅驱动党建工作围绕共同富裕的目标创新治理策略和手段，更将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生态目标与智慧化目标代入共同富裕目标中。

###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态、智治党建模式关系和矛盾处理

生态文明建设和智慧党建影响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考量标准，不仅要厘清生态与智治的关系，梳理其内涵实质对党建工作的深度影响，还应在坚持民生为本基础上，妥善处理生态与发展矛盾、智治与生态矛盾、智治与生态的价值冲突，探索多元要素的关系梳理、矛盾处理以及现实语境。

#### （一）红色根脉强基下的关系确立与厘清

红色根脉强基视阈下的基层党建工作，一方面，要体现生态优先的党建方向，全面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将生态发展、持续发展、绿色发展和循环发展，合理应用到农村基层党建中，以智慧化的策略创新生态党建发展活力。不仅要考察生态党建的生态优势，而且还要将生态党建的目标与红色根脉强基的能力协调为基层党建工作的优势。另一方面，红色根脉强基视阈下的基层党建工作，需要明确生态与智治的关系。生态是总目标和方向，智慧化是微观层面的技术手段。同时，明确生态党建的主体作用，厘清智慧党建的生态黏性和传统党建的生态属性。

#### （二）红色根脉强基下的矛盾处理与调节

红色根脉强基驱动红色文化与生态文明的融合，也催生了基层党建工作的矛盾发展变化。整合生态党建和智慧党建资源，提升生态模式的智治能力，可以调节基层党建工作矛盾，并针对性地实施改善。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生态与发展的矛盾、智治与生态的矛盾以及智治与生态的价值冲突。红色根脉强基视阈下，生态与发展的矛盾要转向生态优先导向，主张红色根脉文化影

响为生态发展赋能，促使生态发展的基础动力更加强劲。智慧治理与生态发展的矛盾尽管不是非常明显，但是，智慧治理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生态发展的方向，两者在党建工作中的权重不同表现为其矛盾性。在规则框架内，到底是以智慧治理为重，还是以生态发展为重，需要红色根脉文化赋能来进行判别。智治与生态价值均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智慧治理的价值在于将生态文明更形象、生动地体现在党组织的治理行为中。生态价值则是要体现生态文明间建设视阈下，农村党建、乡村治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和高质量发展的价值主张。生态价值是目标导向，智慧治理是行为策略，只有使两者融合为平行机制，才能消解它们之间的冲突。

## 四、农村基层党建生态、智治模式构建的实现路径

红色根脉强基视阈下，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生态、智治模式构建，既具有生态化的表征，也涵盖了生态文明建设下智慧党建的时代特征。基于杭州基层农村党建的生态需求和智治内涵，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基层党建生态和智治模式构建的实现路径。

### （一）组织引领人才回流生态与智治内涵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市务工人员返乡规模增大，流动党员在人才回流中能否有效融入到农村基层党组织，遏制流动党员成为“口袋党员”的现象，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生态、智治党建模式的主要工作内容。针对人才大规模回流，农村基层党建生态、智治内涵模式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主张生态善治。面对城市返乡人群，基层党组织要关注返乡人员创业需求，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在创业启动阶段给予帮助。特别是一些流动党员，应当通过组织关怀，为他们创造生态化的环境，鼓励他们返乡创业的同时，让他们体会和感受到组织的温暖。运用智慧化的策略和手段，创设具有温度感的场景，激发他们建设家乡的热情。同时，在组织层面对返乡人员和流动党员予以关心，多元支持、创设环境，发挥其重要作用，防止流动党员变为“口袋党员”。

其次，主张智慧治理。城市返乡人员不仅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生力量，也为乡村治理带来一定的挑战。习惯了城市生活的返乡人员，一时间难以适应农村生活，特别是组织学习、个人诉求等方面，他们更依赖智慧化工具。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则应当运用生态、智慧化党建模式，增强城市返乡人员的学习效率和行政诉求效率。

再次，强化智治内涵。在城市与乡村认知观念差异化影响下，城市返乡人员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难免存在不适应，基层党组织不仅要具有包容的心态，而且还应当通过智慧治理手段，消解返乡人员与农村生活的壁垒，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上，真正意义上做到打通障碍、创造环境、栓心留人。生态、智治党建模式既要体现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也要体现在政策落实和帮扶机制上，最终实现从行为到文化、从文化到文明的生态突破。

（二）智慧党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路径

以智慧党建引领生态文明建设，通过文化渗透、目标设定和持续发展能力建构等途径实现。

首先，建立具有驱动力的智慧党建文化渗透机制。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依托红色根脉与生态文明，要构建相应的组织文化，通过组织文化的深度渗透，促使文化渗透机制在红色根脉强基视角下，产生一定的生态驱动能力。一方面，重构文化机制，让基层党员、流动党员以及城市返乡人员中的积极分子，充分认识到红色文化与绿色发展的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主学习的目标。另一方面，生态文化与红色文化构成了基层党组织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认同，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党员学习、线上教育和思想动态考察，切实落实文化渗透机制的影响力和驱动力，促使组织学习与生态文明建设同频共振。

其次，设定接地气的智慧党建目标。智慧党建涵盖比较广泛，基层党建中，要推动党建目标形成下沉力，排除一些高端的概念干预，如云党建、物联、移动等，将党建目标指定为可视化的目标，不仅要充分诠释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还要在共同富裕建设中，发挥智慧和智能的作用，以智慧化手段引领群众和党员参与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建设中。

再次，形成可持续的智慧党建发展能力。生态化、智慧化是基层党建工作的核心目标，也是智慧党建的持续发展能力构成要素。智慧党建的最终目标是为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服务的。因此，构建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智慧党建模式，不仅需要发掘智慧化手段的潜在优势，还应当具有物化的落脚点，要让群众和党员明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是概念，更是一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要让老百姓更富裕，让乡村更美丽，让群众更有获得感。

（三）生态理念智慧策略下乡村治理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与堡垒。打造生态、智治党建模式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带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程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农村落地生根。生态理念和智慧策略下的乡村治理是战略手段，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的一致目标。生态、智治下的乡村治理路径优化是基层党建的多维体现，也是主要诉求。

首先，设定生态优先的乡村治理目标。基层党建工作要坚持生态发展新理念，创新党建学习内容，将生态理念与乡村的辩证发展统一为学习内容并活学活用，为乡村振兴寻求更科学的实践经验。党员教育工作要建立生态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契合机制，教育引导党员和积极分子树立坚持生态发展就是最智慧的手段的发展理念。乡村治理工作要采用多元机制，其中智慧化手段的应用极其关键，不仅要将互联网、物联网等信息技术应用到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中，还应设定智慧化的目标，以智慧化策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其次，选择恰当的智慧治理工具。实施乡村治理应当充分考虑乡村的实际情况，可借助微信、微博、钉钉等方式创新管理机制，促进乡村治理中的公开、公平和公正。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可以尝试应用新技术和新工具，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农业产业化体系。生态与智治既是基层党建的主要工具和考量标准，也是引领和约束的维度，有效创新，忠于实践，才能促进基层智慧党建的生态影响力在乡村振兴目标实现路径中发挥作用。

（四）行知合一的基层党建驱动共同富裕目标

农村基层党建生态、智治模式构建可以充分调动乡村生态资源禀赋，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创新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红色根脉强基是共同富裕总的精神纲领，生态发展是理念思维，智治是行为手段。行知合一的党建模式驱动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既是忠实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认知，也是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价值所在。

首先，多维视角的党建内容内化共同富裕目标。红色根脉是文化支撑，生态党建是认知协同，智慧党建是实践行为。基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经济学视角下的农村基层党建模式构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精神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进程中的作用。推进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和共同富裕，诠释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的战略机理，也更科学地诠释了基层党建工作的创新节点。要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农村基层党建的总纲，创新构建行为、精神、价值、文化多元渗透机制下的新时代基层党建模式，这是对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动响应，也是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发展方向。

其次，感知思维的党建模式提升乡村治理效率。感知思维下的基层党建工作创新，一方面要以生态发展的思想武装个人，明确生态价值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作用。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理解生态文明建设内涵，鼓励推动群众和积极分子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动智慧党建融入乡村治理，体现了生态文明视阈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富裕，也是乡村治理提升效率的主要武器。另一方面，红色根脉强基既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也丰富了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生态内涵。采用智慧化手段，以善为、善治辅助实现智治，能够精准、敏锐地发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难题，并借助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智慧、集体智慧和群众智慧进行解决，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率和水平。

再次，文化引领下的党建内涵创优乡村振兴环境。红色根脉强基是乡村振兴的利器，也是红色文化、红色精神赋能乡村振兴的主要载体。文化引领下的基层党建内涵既生动践行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又通过文化影响、文

化感染和文化引领实现了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文化让渡价值。一方面，红色文化为基层党建工作增添赋能。在红色文化与区域精神的双重影响下，文化赋能实现了基层党建在乡村振兴中的环境重构。另一方面，文化引领下的基层党建工作内涵突出了智治。智治的核心就是适应时代发展特征和规律，将新时代中国精神和文化自信构建为自觉的文化载体，从而达到文化引领智慧党建、助推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

最后，生态、智治影响下党建模式的自觉升华。生态、智治影响下的基层党建模式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生态为本、智治为辅的党建模式影响着基层党建工作。生态党建的表征方式、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和创新目标均处于生态化资源禀赋的影响和共振机制下，生态化理念贯穿、生态驱动力和生态黏性促使党建工作目标可视、过程透明、策略合理，有利于增强党建工作的持续创新能力。智治党建则强调党建工作中的机理、系统、体系和举措智慧化，通过智慧化的发现和影响，制定治理手段和目标，达到优化基层党建的过程和目标。

红色根脉强基与生态发展，以及智慧党建的延伸结果是要实现智治。无论是共同富裕还是乡村振兴，乃至生态文明建设，智治的手段和策略对红色根脉强基作用具有一定的应然性，而生态党建则是基层党建工作中的基本需求，协调三者之间的统一，明确红色根脉强基赋能的主体，满足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生态需求，主张基层党建中的智治内涵，从不同层面均可以创新农村基层党建工作。这样一个链式路径到目标实现，也恰恰是红色文化驱动生态价值，生态价值驱动智慧治理，智慧治理驱动乡村治理，转而成为了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回馈。

# 杭州“红色基因”焕发新时代发展动力

◎楼韵佳[①]

**内容提要：**百年前，中共杭州小组在皮市巷成立，星火由此点燃，万千劫难未曾消磨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百年后，杭州处在新时代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广阔征途需要共产党人继续砥砺前行。“红色基因”焕发杭州新时代发展动力，不忘初心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以史明志、以史铸魂。本文探讨了杭州“红色基因”起源、杭州“红色基因”传承路径、传承“红色基因”焕发杭州新时代发展动力。研究认为，杭州近年来围绕红色资源投入财力、物力和人力，挖掘资源，推广资源，加强红色资源创新教育，凝聚杭州人民精神，焕发杭州新时代发展动力。

**关键词：**杭州；红色基因；中共杭州小组；新时代；发展动力

## 一、杭州“红色基因”起源概述

### （一）红色基因阐释

基因是生物学概念，基因决定了生物拥有哪些特性，生物的特性随着基因向下传递。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其根本是基因的差异。基因携带的是生物遗传信息，生物遗传信息能够让生物体成长，并适应环境。人作为集体生活典范，人与人不断结合，形成组织，构成团体，从事社会活动，制造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提升人存在的价值。意义与价值需要传递，持续代际传递，

①**作者简介：**楼韵佳，女，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联系电话：13105893853。

类似于生物遗传信息的传递。人与人构成的团体和形成的组织依靠非生物基因而传递属性，让组织可持续发展。从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来说，组织具有“基因”。中国共产党具有红色基因，红色基因依靠红色革命，红色故事，红色文化，凝聚红色资源。红色革命是敢于拼搏的革命，是“敢叫天地换新颜”的激情，是“为中国人民谋自由与幸福”的政治觉悟。红色故事是英烈故事、英雄故事，这些故事背后是英烈们为家国利益而冲在前线，牺牲自我，英雄们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的故事。红色文化是中国人面对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创作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总和。

共和国是红色的，颜色特征是由基因体现的，红色基因是革命活动留下的精神、信念、本质、特征，是由革命英雄的血脉组成，他们曾经奔赴、奋斗、牺牲，他们离开了，但他们的精神留下了，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传承中发展，发展中继续传承。 红色基因的本质包括四个方面，即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爱国国家的责任，对人民的忠诚，坚定不移的勇气和毅力的良好品质①。因此，当讨论红色基因时，讨论的是红色革命、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与红色资源，分析的是信念、担当、情怀和品质。“红色基因指向思想，指向精神，推动共产党人前进，保持共产党人的底色”。②

（二）杭州“红色基因”起源与延续

在杭州历史上，无数革命先辈们为党的事业前仆后继、不惜抛洒热血，书写了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革命历史，留下了丰富的革命历史遗存。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百年前在钱塘江畔成立，掀起红色革命的“潮起”，以星火燎原般的趋势快速点燃钱塘江两岸的红色革命。这股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与信仰密码，推动杭州提升经济发展，让钱塘江的“潮水”更加奔腾。今日的杭州担当高质量发展建设的排头兵，并将实现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

---

①彭正德、江桑榆：《论红色基因及其在新时代的传承》，《湖南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 期。

②刘建平、王昕伟：《新中国成立以来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发展探析》，《红色文化学刊》2019 年第 3 期。

1. 百年前中共杭州小组成立乃红色基因起源

1922 年 8 月，徐梅坤在杭州发展党员，吸引进步群众加入党组织。徐梅坤主要负责上海地区、江浙地区的党组织活动。同年 9 月，中国共产党杭州小组正式成立，成立地点位于皮市巷 3 号“白屋”，成员共有三位，分别是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于树德曾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的教师，积极开展浙江地区党组织的建设工作。金佛庄曾经参与数次武装征伐，一生对党忠诚，对革命执着。沈干城曾多次发动工人运动，多次组织武装斗争。

浙江第一个地方党组织正是中共杭州小组，从这个星火开始，逐渐传向了整个浙江地区，为浙江地区革命运动带来了希望和生机。杭州党小组成立之后，小组成员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推动工农运动。宣传工作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民主革命纲领，唤醒群众，让群众了解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黑暗。金佛庄为宣传新思潮，努力撰写文章进行发表。沈干城创办工人自修夜校，面向工人讲课，宣传民主革命纲领和马克思主义。期望能从工人中选出积极分子，发展党员。1923 年，中共杭州小组发展第一批党员同志，以星火燎原般地趋势推动浙江红色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杭州党支部的工作已取得一定成就，发展了党员人数超过 3000 人，地区遍及杭州及周边县，并辐射到杭州以外的许多地区。皮市巷是浙江地区的红色起点，是初心和原点。

百年前，中共杭州小组成立，乃杭州红色基因的起源。最早一批的共产党人守护红色火种、红色精神，开展红色革命，这个时期的情况越复杂，就越不能忽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信仰理想。红色基因书写红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对后人的影响非常深远。

2. 红色基因传递延续共产主义信念和担当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杭州地区努力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坚定不移地保持良好的作风和优良传统，坚持信仰，奋斗不止。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49 年 1 月，毛主席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杭州地下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护厂、护校、护桥的大规模斗争，保护国家重要资产，并为快速恢复

国家生产建设和经济基础奠定物质基础。地下党成员由工人和学生组成，冒着生命危险参与到支援杭州解放的激烈斗争中，为自己争取权益，为百姓维护权益。这些斗争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城市建设，破坏工业和相关产业，破坏学校的举措。

1950 年 8 月，杭州青年团组织青年群体继承革命精神，发扬红色文化，参加土地改革活动，要求减租，反对地主霸凌，镇压反革命斗争，并参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清理社会风气，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1985 年 9 月，杭州向全市青年群体发出号召“投身改革，为杭州的繁荣和人民的富裕建工立业”，广大杭州青年群体投入到改革、振兴的事业中去。

改革开放时期，杭州实施“八八战略”，实现快速发展，改革举措与创新举措并举，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另一方面是经济产业实现发展，二者共同努力，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互联网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杭州乘势抓住机会，大力发展互联网，推动杭州经济转型，并实现快速发展。杭州吸引了诸多互联网企业在此落地生根，为杭州带来税收，带来丰富的就业资源。

2005 年，浙江率先发布《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关注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共同发展，城市发展的福利要惠及乡村。

2006 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该文章明确了浙江精神，“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弘扬浙江精神，就是发展浙江。发展浙江离不开对浙江精神的探索。

新时代奋进，为高质量打造共同富裕的“杭州样本”，杭州积厚成势，夯基垒台，努力探索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效路径。新时代更要从红色文化和红色故事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传承革命精神，弘扬吃苦耐劳作风，续写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乐章。

2021 年，浙江省正式发布《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 年）》，该实施方案表明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探索共同富裕先行道路，浙江省是探路者，是先行者。

上述历史事件中可知，红色基因在历史进程中传承和发展，共产主义信念被不断强化。不忘初心，铭记使命，坚守共产主义信念，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利。百年来，杭州发扬光荣传统，继承美好愿望，深化杭州社会、经济等多项改革，努力创造成绩，求上进，求突破，求创新，实事求是，务实为本，才有了杭州今天的成绩。杭州多方面的发展，比如经济活力、基础建设、社会风貌、人民生活等。这些均为杭州实现共同富裕任务打下坚实基础。当前，杭州的城市排名、工业经济、产业投资、社会福利、百姓生活等诸多方面均位列国内城市前列。杭州成为全国互联网行业重镇，互联网产业关联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形成重要产业，各项产业朝向数字化转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数字化转型。杭州拥有一批世界级领军企业，产业链辐射全国、全世界，比如阿里巴巴、海康威视、新华三集团。随着经济发展，杭州人均GDP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说明杭州百姓群众生活迈步小康，增进民生福祉。

## 二、杭州“红色基因”传承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基因的重要论述，在多个场合强调“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弘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为工作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红色基因”传承路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挖掘和利用红色资源；第二，加强和创新红色教育①。杭州近十年来，推进“红色基因”传承路径叙述如下。

### （一）挖掘和利用红色资源

红色资源指的是革命先辈们开展革命活动而留下的各类物质资料，可分为可移动的红色资源和不可移动的文物资源。可移动的文物资源包括烈士遗物、影像资料、文书资料，不可移动的文物资源包括烈士公墓、陵园、重要活动地点。红色资源是红色基因在现实中呈现的载体，是现实活动中的活动痕迹。挖掘红色资源是将红色资源从陈旧的书柜中，或者遗忘尘封的地点中挖掘出来。挖掘主要是从横向和纵向上开展，横向挖掘，找到各类有革命痕

①彭正德、江桑榆：《论红色基因及其在新时代的传承》，《湖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迹的物质资料，并清理相关革命文物。纵向挖掘，红色资源背后牵连着革命烈士，革命故事和革命精神，不仅展示红色资源，更要呈现红色资源背后的故事与精神。

杭州自 2011 年开始，投入资金主要用于革命遗址和革命遗迹保护工作、修缮工作和开发利用。杭州筛选出 20 余家高质量党史纪念馆，包括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钱学森故居纪念馆等，持续新建和扩建这些党史纪念馆。2020 年，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新馆正式开馆，新馆基于中共杭州小组成立的历史，设计了三个主题，中共杭州小组成立，杭州小组发展党员，党组织壮大。设计五个展厅，分别是序厅、“潮起钱塘”展厅、“星火钱塘”展厅、“奔腾钱塘”展厅、“今日钱塘”展厅。“星火钱塘”展厅呈现了四位进步青年开会场景，会议所在皮市巷 3 号“白屋”进行了还原，革命气息较为浓烈，革命人士曾多次在皮市巷集合统筹策略，并组织了萧山衙前农民运动。以及，于树德的个人笔记被陈列在展柜中，他写下个人的志愿、奋斗，表明个人投身革命的无怨无悔，一心奔赴。这是红色基因的起点，这是红色基因以燎原之势发展的原因。

革命遗址、党史纪念馆是红色资源的承载，发挥着积极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因此，挖掘和利用红色资源非常重要。资源是物质资料，是实物，是历史遗迹，是能够让人触摸和感受的历史。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纪念馆参观，大学生群体来到纪念馆进行入党宣誓，并在纪念馆进行党员活动。在纪念馆中了解杭州的红色文化。红色资源的利用就是要让年轻人、青少年来到基地，瞻仰先辈们的事迹和精神，感悟红色精神。当代年轻人和青少年要接受教育和洗礼，了解党史，了解革命史，“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把历史当做一面镜子，回顾历史，把前赴后继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先辈们当做榜样，对标学习，提高个人的格局和视野，继承先辈们的红色基因。

（二）加强和创新红色教育

当代社会浮躁，各类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各种“主义”对人的影响更加深刻，愈加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传承红色基因，学习红色精神显得更为重要。面向

党员干部、军队、青少年和群众百姓开展红色教育，让各行各业传承红色基因，了解红色政权是如何获得的，新中国如何建立，各地区的有志之士抛头颅洒热血坚定信念，捍卫理想，自觉继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文化。

创新红色教育形式，把抽象的理论形象化、生动化和可视化，转换为人人都能知晓的红色故事，人人都明了的红色文化。形象化是将枯燥单一的故事或文化附以形象表达。生动化是灵活地以参观、体验等方式呈现红色资源，可视化是通过影像资料宣传红色故事。红色教育形式等待创新，等待突破，以当代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包装，提升红色教育的感染力、影响力，加强红色基因的教育效果。汲取红色营养，强化使命意识，今日的成果不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不是“偶然”，而是努力奋斗之后获得“必然成果”。当代人接过几代人的奋斗的果实，要继续奋斗，不忘初心，继续传承和发扬红色精神和文化。有意义有价值的追求，表达忠诚，无怨无悔，自强不息。

近年来，杭州面向全市人民征集有价值的革命文物、党史资料。比如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开馆前，积极向杭州人民了解文物资料，比如文字、图片、实物等。收集讲话、指示、政策等，并溯源历史。为了完善党史资料，我们找到了 50 多名抗战老兵，整理了老兵口述历史资料和党史档案，编纂了党史书籍。拍摄老兵、革命遗迹等视频资料。综合整理相关资料后，出版《红色胜迹—杭州市红色旅游指南》，杭州市各区县专门打造红色旅游线路，上城区发布“走红巷，游上城”旅游品牌，并上线微信小程序，在该小程序上可聆听红色歌曲、红色诗篇，并收听红色故事，写下个人的红色感言等多元化的红色文化体验。杭州发挥地区互联网产业优势，精心打造“红色记忆”网络宣传平台，在该平台上，展示了杭州上千个可移动文物和几十个不可移动文物。人人都可通过互联网登入宣传平台，全社会参与，全民共享。深刻认识红色基因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人民群众从红色文化中了解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自中共杭州小组成立百年来，发展薪火之路，“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不忘初心，发展杭州。今日的杭州借助各种形式挖掘和利用

红色资源，并在杭州全域范围内传递红色基因。红色基因融入杭州的城市血脉，凝聚杭州市民强大精神力量。百年征途值得铭记和回顾，未来征程更需要精神养分。坚守初心，在困难面前展现力量与精神，奋斗与担当。

## 三、传承“红色基因”焕发杭州新时代发展动力

2022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杭州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大会宣布“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向着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阔步前进”。杭州将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新征程。未来五年，杭州拥有三个重要窗口期，举办大运河、建设大都市、推进现代化。重大机遇伴随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面对挑战和困难，杭州要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强大精神力量。百年征程中，共产党人带领杭州人民克服困难和挑战，建设了城市，发展了经济，让百姓安居乐业，带领民众跨过小康。从革命先辈们手中继承的红色基因，发展红色基因，创新红色基因，今天城市拥有的发展成绩让人骄傲。面对未来，传承红色基因，夯实自信底蕴，焕发杭州新时代发展动力。

### （一）坚定信念克服困难打造杭州七个“新天堂”

杭州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杭州打造七个“新天堂”，分别是创新创业新天堂；产业兴盛新天堂；活力迸发的新天堂；别样精彩的新天堂；共享幸福新天堂；独特韵味新天堂；良法善治新天堂。七个“新天堂”关乎科技创新、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历史文化、国际创意、共同富裕、公共服务、城市外貌、绿色生态、社区治理等多个方面。

建设新天堂不是易事，需要面对的困难繁多，需要克服的障碍复杂。做大事，完成艰巨任务，需要经验、理论、作风和精神等进行支撑。传承红色基因就是继承宝贵精神财富，任何时刻都需要铭记来路，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经历的艰难困窘，曲折困难无数，仍然坚定信仰，持续奋斗，把为人民谋自由，谋福利，为国家谋经济，谋发展等重任扛在肩上，永不卸下重担。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的勇气赞歌，爆发惊人的创造力，克服对困难

的恐惧。从党史中学习，了解何谓革命精神，何谓理想信念，何谓爱国情怀，通过深层次的思考才能更加坚定地投身社会建设浪潮中，赋能杭州建设与发展。

（二）以史明志绝对忠诚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在“十四五”期间，杭州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包括“亚运会、大都市、现代化”等重要任务。数字化和智慧化的新杭州，建设宜居宜创的新天堂。这要求杭州联系实际，找准突破口，在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关方面拿出重点举措，要率先实现突破。这并不容易，改革寻求突破，强化系统思维实践，干出新业绩，展现新气象。

利用杭州独特的党史资源，继承和弘扬红色基因，增强红色文化教育的影响力。从党史中学习，从党史中感悟，以史为镜，以史明志。今日的杭州是党带领人民团结奉献才有的成就，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就，回顾历史时要有高度自觉，并为今后的杭州发展贡献力量。在挑战和困难面前砥砺前行，强大胆识，激发个人奋斗的信心和动力。

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增强全球资源配置，构建新发展格局，更需要绝对忠诚之心。开展红色教育，创新载体和形式，让党员干部开展集中学习和自我学习，接受红色洗礼，真切地感受红色革命、红色精神。基于红色基因的继承，共产党人的信仰深深印刻在心中，全力实践和落实人民城市的理念，为现代化杭城建设谱写守正创新的数智新篇章。

（三）以史铸魂使命担当打造共同富裕杭州样本

根据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文件，浙江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政治任务和光荣使命。杭州作为浙江省省会，应率先扛起责任、探索路径、勇立潮头，通过实践突破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率先以浙江为先行示范，推动全国构建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创新，根据计划，共同富裕是优化格局，缩小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和收入差距。打造便民体系，包括公共服务、交通网络、保障支撑。优先设置合理的规划建设体系。打造新局面，形成“大杭州、高

质量、共富裕”；取得标志性成果，形成“先富引领，共富示范”。

注重抓好全社会的宣传教育工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直抵人心，让青少年拾起红色革命精神，了解一代代前辈们为了今日的杭州而牺牲、奋斗。今日的杭州经济、社会、民主法治、百姓幸福等诸多方面呈现加速度发展，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得到强化。今日之甜来自昨日之苦，铭记昨日之苦，才能继续砥砺前行。红色基因传承依靠百姓群众，依靠青少年群体。以史铸魂，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前行，担当时代使命。红色基因在革命时期发挥重大作用，对党忠诚、不惧艰难，现如今红色基因仍然有巨大的传承价值，可杭州打造共同富裕样本，让杭州形成全民推动共同富裕的良好局面。

##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①]。百年前，“星火”在杭州皮市巷点燃，这把“火”从皮市巷蔓延至全市、全省。百年后，“星火”在新时代继续燃烧，传承红色基因，追随前辈们奋斗的景象，憧憬着未来杭州成为“新天堂”，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打造共同富裕杭州样本，今日的我们更应砥砺前行，为未来的杭州书写新的历史篇章。今日的杭州将继续传承“星火”，注入强大的正能量，保持发展定力，为人民谋福利，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①《习近平：不能忘记走过的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网站，http://www.lswz.gov.cn/html/zt/lxyz/2018-06/14/content_236482.shtml。

# 红色资源“隐入”爱国主义教育的三维析论

◎任雅楠[①]

**内容提要：**红色资源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和价值支撑，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创新需要借助与红色资源的创造性融合。红色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两者存在优势耦合，在此基础上借助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工具性价值的多元契合，通过构建需要引领机制、强化暗示引导机制、健全协同配合机制促成实践融合，共同指向更高水平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践。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红色资源；思想政治教育

红色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党和国家始终对爱国主义教育予以高度关注，同时强调挖掘红色资源的教育要素，利用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促进个体既养成爱国之“知”，又落实报国之“情”。在当前爱国主义教育愈加强调“柔性表达”的背景下，探索如何借助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价值促成红色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的隐性融合，进而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创新，已经成为一项亟需予以关注的话题。

## 一、优势耦合：红色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三层意蕴

红色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在目的、内容及特点上有高度的契合性，其优

①作者简介：任雅楠，女，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电子邮箱：13101377200@163.com，联系电话：13101377200。

势耦合能够促使二者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更高水平的爱国主义教育。具体体现在，红色资源的传承性夯实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底蕴，红色资源的多样性契合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需要，红色资源的人民性坚定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导向。

（一）红色资源的传承性夯实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底蕴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富，它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创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形成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传承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其物质化表征与内在文化精神一同构成红色资源的多元样态，在接续的历史实践中得以丰富和发展，体现出丰厚的历史传承性和时代价值。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红色资源体现出多样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其内蕴的文化元素与精神力量在传承中不断得以创新，并与当代现实相互交融，既体现了厚重的历史情怀，又不乏深沉的当代力量。红色资源的传承性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源，而其本身又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构成要素。

从性质上看，爱国主义教育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历史使命，服务于培育时代新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任务。从内容上看，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民族团结和传统文化教育等丰富内容，而“历史”成为贯穿其中的关键元素。“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①] 爱国主义教育必然少不得对于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讲授，也必然要依托丰富的历史资料和事件进行观点阐述和深化，由此，爱国主义教育的性质和内容使红色资源的创造性融入成为必然。红色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能够使得爱国主义教育有历史和现实的依托，能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前后贯通的思想脉络，使学生在感受历史的同时体悟现实，实现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的深化。综上，红色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

①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8 日。

其根本就在于以红色资源之精神表达爱国主义教育之思想，以红色资源之厚重深化爱国主义教育之内涵。

（二）红色资源的多样性契合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需要

红色资源可分为物质形态、信息形态、精神形态三种。物质形态的红色资源包含旧居、遗址、旧址等；信息形态的红色资源包括历史文献、标语、歌曲等；精神形态的红色资源指在历史事件发生进程中形成并凝练的情感要素和精神力量，是特定时期或事件中参与主体内在精神的外化表征。当前，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丰富实践载体、营造浓厚氛围，同时要求在坚持外显性灌输教育方式的同时探索更加多元的教育途径。这一方面需要爱国主义教育本身在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上予以创新，另一方面更需要丰富多样的辅助性载体予以支撑。红色资源因其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能较好地契合爱国主义教育创新发展的需要。具体而言，物质形态的红色资源能够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实践载体，为“浸入式”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平台；信息形态的红色资源能够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教学素材，以史料形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可信度和内容的丰富性；精神形态的红色资源能够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氛围支撑，助力爱国主义教育“蔚然成风”。从另一角度来看，爱国主义教育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灌输”，目的在于巩固统治和维护社会稳定，而红色资源之“红”正是在于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中的革命和奋斗精神，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新时代保护红色资源、挖掘红色精神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强正确思想引导，“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养”[①] 由此，红色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共通性，红色资源无论其形态如何，均体现了和爱国主义教育在目的上的契合性。

（三）红色资源的人民性坚定爱国主义教育的价值导向

从形成过程上来看，红色资源是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产物，体

①曾长秋：《开发红色资源需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7 日。

现了党的领导和群众力量在实践中的深度融合，其所凝聚的人、事、物、魂都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从功能来看，红色资源当前的核心功能在于政治导向，要求体现人民群众意志；主要功能在于文化引领和道德教化，要求服务于人民需求，包括精神文化需求，受教育需求，参观游览需求等；衍生功能则表现为刺激经济增长，体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价值逻辑。红色资源产生于人民又服务于人民的特征，与爱国主义教育在本质上有高度的契合性。爱国主义教育是新时代背景下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应有之义，其根本目的一方面在于保持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为人民创造幸福安全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在于满足受教育者的多元受教需求，促进个体全面发展，进而服务于培养时代新人的任务。红色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融合能够最大程度上挖掘红色资源的当代价值，促使红色资源更好地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在系统性的教育过程中发挥好时代价值。同时，红色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在服务主体上的相通性，能促使爱国主义教育坚定价值导向，站稳人民立场，在与红色资源的交融互动中潜移默化地实现为人民服务和为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服务的教育任务。

## 二、多元契合：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工具性价值发挥的三维逻辑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因其教育设计的内隐性、教育内容的灵活性和教育方法的综合性，能够契合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要求。通过对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工具性”价值发挥的探析，能够明确红色资源以“隐性”方式融入爱国主义教育具备理论上的适切性和路径上的可行性。

### （一）教育设计的内隐性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柔性表达需要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指“寓于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外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开展的、不为受教育者焦点关注（甚或不为受教育者明确感知）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类型。”[①]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存在类

①白显良：《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5 页。

型，采取隐蔽的形式将教育内容“内隐”于其他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隐性”一是体现在教育目的和教育过程的潜隐性。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强调不应使受教育者明确感知或注意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使受教育者在参与其他活动、获取其他知识的同时在不自觉中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其载体包含自然景观、人文环境、课外活动、网络空间等个体生活和实践场域，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就在这些场域中悄然开展，其效果往往和教育目的“隐性程度”的高低呈正相关。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隐性”二是体现在教育结果具有潜隐性。一方面，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影响持久且广泛。个体思想培育需要经历知，情，意，信四个过程，最终才能上升到“行”的实践阶段，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打通从知到行的整体过程，借助生活和实践场域中的各种因素灌输教育内容，促使受教育者在日积月累中既受到“知”的教育，也采取“行”的实践，在“知”与“行”的一贯性中实现个体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由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其他社会实践为媒介展开的，其教育效果往往为其他实践所遮盖，受教育者在知识掌握、思想启迪、行为规范等方面受到的影响不能及时表现出来，具有滞后性的特征。

从教育目的层面看，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关怀在于激发受教育主体的爱国情怀和报国行为，其一方面要体现鲜明的政治立场，系统性全方位地开展教育任务；另一方面更要注重方式的新颖性，创新柔性的教学表达方式。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隐性为爱国主义教育话语表达提供了更多选择路径，助力爱国主义教育实现效果最大化，而红色资源作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载体，起到连接隐性教育方式和爱国主义教育效果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教育过程的内隐性有利于调和爱国主义教育主客体间的被动关系。“任何一种教育现象，孩子们越少感到教育者的意图，它的教育效果就越大，我们把这条规律看成是教育技巧的核心。”[①] 苏霍姆林斯基的这一论述证明，爱国主

①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的艺术》，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年，第 142 页。

义教育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防备”心理，特别是当受教育者感知到教育者的行为是试图有目的地对其施加影响，更会加剧二者之间的“逆反性”矛盾。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将教育目的最大程度地隐藏在其他载体中，起到弥合受教主体心理隔阂，保障教育效果的作用。红色资源以其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本身就与受教育者的文化需求相契合，具备充当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条件。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中运用依托红色资源开展的各类实践活动，能够更好实现教育目标。

（二）教育内容的灵活性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与时俱进目标

爱国主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新时代背景下凝聚个体力量，维护国家团结的现实需要，逻辑终点是增进个体爱国的意识自觉和行为主动，逻辑中项就在于内涵丰富的教育过程和内容。当前，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外部环境正呈现出新的特点。从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形势看，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到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加剧，各种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粉墨登场，以更加难以察觉的形式对我国青少年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加以影响，这使得受教育主体呈现出思想上的复杂性，既需要正面的教育引领，又需要肃清不良思想的影响。从受教育主体自身来看，新媒体背景下受教育者接受信息的渠道得以拓宽，其自身具备自由选择信息的权利以及较高的信息加工处理能力，更加需要爱国主义教育以更为新颖而具有说服力的形式吸引受教育者，发挥主流价值观的行为导向作用。在新时代语境下，个体“四个自信”得到普遍增强，对于高品质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明显增强，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和更高要求。同时，爱国主义教育自身的性质也要求其做到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新，根据教育主客体、教育需求以及教育环境的改变做出相应创新调整。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就其内容而言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能够与爱国主义内容多样化和形式丰富化的创新需要构成良好的契合关系。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能适应多样化的实践要求：一是能根据教育目标选择适宜的实践载体。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涵盖了个体生活的各个领域，涉及各种类别的实践活动。

爱国主义教育的需求会随着教育活动开展场域、教育主客体素质、教育环节差异等而呈现出不同的样态，而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多样性使其可以根据爱国主义教育的不同需求进行针对性选择，在充分体现载体价值的同时满足教育需求。二是为教育者提供更大选择空间。由于教育者素质的差异性，在实施隐性爱国主义教育时需要考虑到教育者的施教能力，使教育者能够在自身水平和教育内容的动态平衡中更加从容地进行教学设计，更好地赋予相关实践活动以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从红色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角度来看，红色资源作为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依托，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愈加丰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既能满足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多样性和内容灵活性的要求，又符合爱国主义教育与时俱进的发展需要。三是与显性爱国主义教育形成互补互动关系。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质就是将显性课堂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元素以实践的方式予以展现，是显性教育内容的“实践感性化”[①]，由此，显性和隐性两种教育形态是不可分割的，隐性教育成为显性教育的再现和深化，隐性爱国主义教育及红色资源内容的多样性为其再现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要素提供了必要支撑。

（三）教育方法的综合性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丰富样态追求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在实施方法上强调“彰显蓄意”，要求将显性教育方式与隐性渠道结合起来，创新授课形式，开发教学场域，拓宽教育影响范围，期望在整体上体现出形式多样化，载体多元化的发展面貌。“方法也就是工具，是在主体方面的某个手段，主体方面通过这个手段与客体相联系。”[②] 这就是说，方法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为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方式。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充当着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和媒介，其自身固有特征也在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丰富样态的追求。

首先，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实践上的美感性。隐性思想政治教育

①白显良：《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195 页。
②《列宁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189 页。

总是寓于其他活动中开展，不拘泥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课的单一性理论灌输，将教育阵地从课堂转移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教育元素被赋予了更加多元的价值要素。如在运用从红色资源开展隐性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中，红色资源所蕴含的知识价值、游览价值等被充分放大，其内蕴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也在这种实践中被赋予了更加富有美感的“外包装”。其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形式上的多样性。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类别多样，包含旅游观光、文艺活动、学术交流、校园环境、榜样示范等多种类型，并可以根据教育需求和实际教育需要加以调节。就红色资源这一载体而言，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利用精神形态的红色资源开展榜样激励教育或各种文体活动，寓教于乐；利用物质形态的红色资源开展参观游览和实践调研活动，寓情于景；利用信息形态的红色资源进行校园文化及社会环境塑造，寓思于物。再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实施场域的广泛性。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实践上的非专门性，在教育形式上，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其没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甚或教育过程也不甚明晰，常给人以“附带而为”的感受。教育形式的这种非固定性使得隐性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更大的教育创新潜力。在与红色资源的配合中，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利用起红色资源类型多样和形式丰富的特征，将更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元素纳入其中，在丰富教育样态的同时更好地实现“教育无痕”的目标，最大程度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效果的说服力。

## 三、实践融合：红色资源“隐性”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三重路径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红色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构建引领机制，强化暗示引导机制，健全协同配合机制，以此打通红色资源“隐性”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通路，使红色资源与隐性教育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更高水平的爱国主义教育。

### （一）聚焦供求适配，构建教育需要引领机制

爱国主义教育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组成部分，无论其形态如何，均离不

开对人的需要的关注。“任何思想……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①。实际上，“需要”对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资源的隐性融入起到引导作用。若想明晰红色资源如何隐性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知晓其如何与爱国主义教育共同发力，必然少不得对需要引领机制的分析与重构。

构建需要引领机制的目的在于明确红色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的要素关联点，在需求引领下为二者的融合提供内在驱动力和发展生长点。需要引领机制的构建包含三方面的关键措施：一是挖掘红色资源的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红色资源的内容主体是革命精神、革命文化和物质形态的文化留存，在长期发展中，红色资源随着环境变化不断融入新的内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对“四史”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其目的之一就是使学生在纵向的历史视域中感知党和国家的产生与成长，在古与今的交融对比中深化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在这一过程中，红色资源起到了融汇古今历史，生动展现史实的作用，要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爱国教育功能，势必要对其中蕴含的相关教育元素进行深入挖掘，对红色资源的来源及其背后蕴藏的生动史实进行系统性梳理，将之与爱国主义教育的需求点相匹配，为教学设计作支撑。二是找准红色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需求的契合点。红色资源的形式多样，种类丰富，只有与爱国主义教育需求精确匹配，才能更好发挥二者的育人合力。爱国主义教育在进行红色资源载体的选择时应以自身教育需求为核心关照，在此基础上充分考量红色资源的适用性和可融入性后再进行施教，切忌盲目套用红色资源开展相关实践活动，将爱国主义教育强行加上红色资源的“外包装”。三是把握隐性教育要素与个体需求的关联点。红色资源隐性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就在于，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与社会实践要素相关联，通过个体对社会实践的需要作用于其思想发展。概而述之，红色资源隐性融入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方式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其核心在于个体对红色资源本身的需求

①《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64 页。

与隐寓其中的爱国主义教育需求具有契合性，个体对红色资源相关的活动有娱乐及审美等方面的需要，这为其参加相关活动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在这一前提下，个体才有可能在参与过程中愉悦接受相关教育信息。由此，必须把握好隐性教育要素与个体需求的关联点，以此为切入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设计才可以保证教育信息被明确传达和接受。

（二）协调多层资源，强化教育暗示引导机制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之“隐”，核心就在于教育方式的非直接性。在隐性教育实施过程中，教育者不采取灌输或说服等教育方式，受教育者也不会被要求掌握特定的知识或实现特定的目标，其教育影响得以发挥的过程体现出强烈的暗示性，即“在非对抗条件下，用某种间接的方法对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从而使人们按照一定的方式去行动或接受一定的意见或思想”①。红色资源“隐性”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质就是在暗示机制作用下对个体行为进行调节，对红色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路径进行设计，其关键就在于强化暗示引导机制，充分发挥暗示在隐性教育中的作用。

在红色资源“隐性”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整体路径中，红色资源是起点，以暗示机制为引导的教育过程是中介，经暗示调节后的个体爱国行为表现是目的。暗示机制作用的发挥不仅关系到红色资源能否有效融入到爱国主义教育中，更直接影响着爱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效果。对于暗示机制的强化，尤要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配合：一是物质资源与精神影响相配合。能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红色资源在表征上主要是物质形态，而物质形态的红色资源若要发挥教育影响功能则少不得凝练其中的精神性教育因素，唯有将二者相结合才能运用暗示的方式达到影响个体精神世界的效果，而“暗示”之所以形成，也在于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非违和性。由此，暗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物质资源与精神内涵的融合，暗示机制作用效果则取决于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的协调性，即是否被受教育者感知到了二者的存在。二是直接暗示与间接暗示相结合。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直接暗示就是将教育内容直接呈

①时蓉华：《现代社会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433 页。

现在受教育者面前，使其在无意识状态下迅速接受的一种暗示；间接暗示指的是将教育内容通过间接形式提供给受教者的形式。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红色资源教育要素可以由标语口号或名言警句等直接方式呈现，如在教学楼中设置名人论述，放置展现历史事实的史料图片；也可以通过文艺活动、榜样塑造或实践参访等间接方式呈现，如国家对抗疫模范人物和集体的表彰，一方面是对疫情背景下爱国主义精神的宣扬，另一方面在榜样形塑中间接传达了先进典型的标准。在隐性爱国主义教育实施中，应注重直接暗示的隐性教育与间接暗示的隐性教化相结合，发挥二者在不同场域中的独特作用和效果，以此更好发挥隐性爱国主义教育的暗示功能。三是大环境与小环境相融合。隐性爱国主义教育不受场地限制，可以存在于个体活动的各个场域中。整体来看，隐性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领域可以分为大环境和小环境两个层次。大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校园环境，网络环境等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个体活动空间，小环境就是隐性爱国主义教育所依托的实践载体，即由教育主客体及教育工具等要素构成的教育实施空间。“单单在儿童上学和回家的路途上，他们受的思想教育，就比在学校里待几个小时所受的教育都强烈、鲜明得多”[①] 红色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不仅要关注到红色旅游及文艺演出等小环境空间，更要渗透到个体生活实践的大环境中，特别是在新媒体环境中更加需要推动红色资源影响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在网络空间中通过微视频、小游戏、虚拟博物馆等途径创造性地将爱国主义教育与红色资源相融合。

（三）凝聚教育合力，健全要素协同配合机制

红色资源融入隐性爱国主义教育涉及到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情境六大要素，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要实现红色资源的隐性融入及教育实践，需要综合考虑六大因素的协同配合。

整体来看，隐性与显性爱国主义教育在目的、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教育实践形式，而实践形式的这种区分

①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的艺术》，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年，第 103 页。

对教育者施教过程、教育方法的运用以及教学情景的营造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实现隐性爱国主义教育中六大教育要素的协同配合，为红色资源创造性融入爱国主义教育提供路径支持，有必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一是教育者的能力配套。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同时扮演着相关活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同时也是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者。教育者需要明确自身身份的复合性，既牢记自身作为教师的主导地位，又应有潜隐意识，做到张驰结合，协调好实践活动与教育活动的关系；同时这也要求教师要具备更高综合素质和教学机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①，同样的，对于缺乏相关知识储备和文艺素养的教师来讲，很难得知怎样寓爱国主义教育于红色资源。二是教育方法的综合创新。红色资源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过程凸显“隐”的特征，这一过程中要避免把红色资源与爱国主义教育“形神分离”，也不能止步于红色资源与教育实践的表层结合，更不能将二者简单相加。在方法上，可以首先通过组织专家研判，对红色资源的教育元素进行科学把握，进而结合对受教育主体的需求调研结果，确定红色资源“用什么”的问题；其次结合各地教育条件和教育需求邀请专家学者和一线教师共同进行活动的设计，解决“怎么用”的问题；最后，在活动结束后一段时期内定期开展教学效果测评，对隐性爱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效果进行量化检验，并据此进行针对性的活动调整。三是教育情境的柔性创设。教育情境指的就是为开展隐性爱国主义教育而专门创设的实践情境。红色资源因其内容本身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具有易被感知和察觉的特征。这要求在进行相关活动设计中尽可能以柔性方式创设教育情境，一方面应体现出充分的涵容性，不过于强调红色资源的主导性，尽可能使活动参与者的注意力集中于活动本身；另一方面应体现出强烈的感染性。通常情况下，隐性教育的“设计感”越明显，参与者的厌倦感就越强烈，要尽可能以生动鲜活、内涵丰富的活动吸引参与者，使其感受到思想和心理层面的共鸣，以此淡化教育元素在活动中的痕迹，使受教育者在自然心理状态下接受教育影响。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125–126 页。

# 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教学的三重维度[1]

◎朱金玲　林　洁[2]

**内容提要：**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教学需要讲清楚“为什么融”“融什么”“如何融”等问题。从价值向度阐明“融入”的必要性，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教学有助于增强“德法”课的支撑性和党史教育的持续性；从逻辑维度论证“融入”的可行性，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教学在教育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的诸多契合点；从实践维度积极探索融入路径，挖掘地方党史教学元素，丰富教育内容；讲好地方党史典型故事，激发道德情感；活用地方党史实践资源，创新教育方法；提高地方党史知识储备，加强队伍建设。

**关键词：**地方党史资源；“德法”课；教学融入；三重维度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大学阶段“重点引导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了解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认识世情、国情、党情，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思想道德与法治”课（以下简称“德法”课）是高校思政

①本文系浙江中医药大学2021年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经典阅读融入‘动态授课’——以‘思想道德与法治’为例”（编号：YB210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作者简介：**朱金玲，女，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联系电话：13429617323；林洁，女，浙江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③《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j_kcjcgh/202012/t20201231_508361.html。

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从价值向度、逻辑维度和实践维度阐明融入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对提升“德法”课教学实效具有重要意义。

## 一、价值向度：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之应然

从价值向度出发，阐明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的重要作用，是“融入”的基本前提。地方党史资源因其地缘性等特点呈现出较强的亲和力，将其融入“德法”课教学有助于完成双方的价值转化，提高育人成效。

### 1. 以“史”为“料”，提升“德法”课的支撑性

“德法”课是一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大学生开展实践、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法治素养的必修课。该课程所包含的概念和教学内容在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比较容易接触到，看似都是人人皆知的“大道理”，但要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并非易事。部分大学生存在重专业课程、轻思政课的情感倾向，更是加大了“德法”课教学的难度。“德法”课要开展价值观引导，但不能“把课讲成简单的政治宣传”①。党史涵盖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史、革命史、建设史和奋斗史，是共产党人实践活动的集体记忆，是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支撑材料。地方党史资源是党史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特有的育人价值和教育优势。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将理论问题、社会现实和历史事实相结合，借助地方党史大量的史实来支撑和论证“德法”课抽象的理论，这有助于增进大学生对地方党史的了解，促进他们从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产生情绪共鸣，不断强化历史思维和历史自觉。将理论扎根到有说服力的史料中，有助于增强理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增进大学生对“德法”课教学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切实提高教学实效。

### 2. 以“课”为“媒”，增强党史教育的稳定性

近几年，《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关

①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 第 17 期。

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陆续出台，都强调高校要加强“四史”教育。“四史”教育事关共产主义信仰者的培养，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旦忽视“四史”教育，历史虚无主义就容易在学生群体中滋生和抬头。党史教育只有借助稳定的教育渠道，才能形成长效持久的育人机制。思政课作为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具有制度化、规范化、稳定性、持续性等特点。思政课教师是一支政治素养较好、思想觉悟较高、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的队伍，他们对党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具备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是开展党史教育最好的宣讲员。地方党史资源融入高校“德法”课，借助地方党史这个切面来展现中共党史的宏伟叙事，能提高教育的针对性，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包括“德法”课在内的思政课都可以成为党史教育稳定的教育渠道，推动党史教育在大学生群体中持续性、规范化地开展。

3. 以“学”促“行”，筑牢时代新人责任担当

大学是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巩固的关键时期。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学生是都拥有积极的人生三观、是否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是否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是否形成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否拥有高尚的道德品质，都会他们的人生价值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产生重要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①] 一批批先进的共产党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起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带领全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新时代大学生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前所未有，也迎来了最好的时代际遇。共产党人为了实现共同的理想，一代接着一代砥砺奋斗，这些感人的党史故事依旧在当代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将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用党的奋斗历程激励人，用党的革命道德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引导人，有助于大学生理解共产党人的初心

①《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 年 7 月 8 日。

和梦想，理解中国取得辉煌成就背后的曲折和艰辛，理解时代新人所应扛起的历史责任和担当，并将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

## 二、逻辑向度：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之实然

在思考地方党史资源如何融入“德法”课之前，应审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地方党史是“德法”课重要的历史基础和现实依据，“德法”课是地方党史的价值凝练和精神升华，二者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等存在诸多契合点。这是进一步探寻将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1. 教育目标相契合。准确理解教育目标，是开展各项教育工作的基本参照和重要前提。“德法”课教材进行几次修订，在课程名称、教学框架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调整，但是其教育目标和核心要求体现了一贯性和连续性。《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明确指出“德法”的教学目标，强调该课程要“帮助学生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中国精神，尊重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①] 党史在坚定理想信念、弘扬中国精神等方面呈现出重要的教育价值。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理想信念的教育，他强调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要“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②] 地方党史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地缘性等特点，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独特优势。用好地方党史资源，有助于大学生从身边人身边事的变化中深刻理解上述三个“为什么”，也能让他们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汲取自给所需的精神力量。大学生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才能筑牢理想信念，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青春力量。由此可见，地方党史和“德法”课在教育目的上是存在契合点的。

---

①《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j_kcjcgh/202012/t20201231_508361.html。

②习近平：《学好“四史”永葆初心、永担使命》，《求是》2021 年第 11 期。

2. 教育内容有增益。从教育内容来看，地方党史资源有助于丰富和补充“德法”课的教学内容，是非常好的佐证材料和支撑材料。讲述当地的革命前辈在面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抉择时，始终将革命利益摆在首位，展现出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引导大学生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讲述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用数据和事实展现当地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增强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深刻把握爱祖国、爱社会主义和爱共产党相统一。讲述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型事例，培养大学生的集体主义意识和高尚道德情操。讲述当地各行业各岗位涌现的优秀党员、劳动模范、工作典型的先进事迹，培育大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职业观，养成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热情服务的职业道德。讲述共产党人严于律己，带头遵纪守法的案例，阐明“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道理。讲述社会主义五百多年来在曲折中发展，引导大学生深刻理解实现共产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培养大历史观，鼓励大学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地方党史资源与“德法”课在教育内容是高度契合的，两者相互融合，形成协同效应，有助于提高二者教育的成效。

3. 教学载体更丰富。教学载体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地方党史资源蕴含着丰富且生动的历史资料，呈现出特有的魅力。这些史实以各种方式呈现，有的是实物载体，比如著作、杂志、报纸、影像资料、电影、纪念馆；有的是流传在百姓心中和口中，比如歌曲、经典语录等。这些史料是对党史最有力的证明，是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奋勇拼搏共同铸就辉煌历程的见证。它们具有政治性，符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属性要求，又兼具教育意义，是培育时代新人极具说服力和感召力的教学素材和教育载体。对党史最好的告慰，是当代大学生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顺着前辈走过的足迹，从中汲取自身成长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德法”课的教学内容较为抽象和宏大，需要借助具体的案例来增强认知，借助丰富的教学载体引发情感共鸣。地方党史丰富的素材和资源只要进行合理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应用，就可以融入“德法”课的教学。“德法”课可以运用多种教学载体来增强大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提升他们的情感认知和理性认同，逐步推进大学生从德向善，形成坚定的理想信念。

### 三、实践向度：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之使然

教学是多因素共同参与、综合作用的一项实践活动。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教学，既要考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也要结合高校的性质、学生状况以及内在需求进行统筹安排。只有做好教学设计，丰富教学方法，开展针对性的教学，地方党史资源在融入“德法”课教学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1. 挖掘地方党史教学元素，丰富教育内容。地方党史中生动的历史实践为“德法”课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用好这些资源和素材，有助于丰富“德法”课的教学内容，提高育人效果。一是地方党史素材要围绕教学内容进行选取。党史时间跨度大，内容范围广，在融入“德法”课时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厘清内容结构，构建合理的内容体系是“四史”教育内容整合的结果呈现，亦是最关键的环节。[①] 教师要花真功夫、下大力气，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围绕“德法”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对地方党史资源进行整理和筛选，使其更好地论证和支撑教学内容。二是积极关注当下社会热点问题和社会思潮。从当下社会热点问题为切入点，关注学生内心的疑问，以问题为导向，回溯地方党史的人物和事件，引导学生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辩证地看待社会事件，培养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只有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分析历史，才能不为历史虚无主义所迷惑。[②]

2. 讲好地方党史典型故事，激发道德情感。思政课就是要讲故事，要把故事讲生动、讲深刻。讲好地方党史故事，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选好故

---

①周苏娅：《“四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重维度》，《思想教育研究》2021 年第 4 期。

②程美东、刘辰硕：《从三个维度理解加强“四史”教育的重大意义》，《思想教育研究》2020 年第 12 期。

事。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串联起来的。讲好故事的前提是选好故事。在挑选地方党史故事时，既要考虑故事的典型性，又要与教学内容紧密相关，帮助学生增强对“德法”课的教学内容和思想观点的认识。比如杭州党小组创建人、工人运动先驱徐梅坤，杭州党小组成员、北伐名将金佛庄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党史人物。二是讲好故事。故事能否讲得好，与教师的准备工作、精神状态和表达能力等密切相关。教师一方面要不断提高自身讲故事的水平和能力，用精彩的言语、饱满的情绪感染人打动人；同时，教师要善于激发和培养学生讲故事的能力，通过举办演讲比赛、主题发言等课堂活动，让学生发挥主动性，共同讲好故事。三是用好故事。讲故事的目的是引发学生的思考，增进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故事讲完后，教师要及时创设情景，通过提问或者小组讨论等方式，引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在交流中提升思想认知水平。

3. 活用地方党史实践资源，创新教育方法。思政课教学要结合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根据教学内容选取恰当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效果。一要充分考虑受教育者特质，创新教学方法。“00”后大学生作为原生网民，他们有着典型的互联网思维和行为习惯。“德法”课教学要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精准开展教育。善用多媒体设备，播放地方党史相关视频和音频，丰富课堂形式；开展启发式教学，创设教学情景，引导大学生开展讨论；巧用网络教学技术，借助“弹幕”“线上投票”“云参观”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既符合他们的行为习惯，也能在互动中激发他们参与课堂讨论的热情，激发思维的火花，提高教学的效果。二要用好地方党史实践元素，组织实践教学。教师应组织大学生采用线上线下的方式参观纪念馆、博物馆，走访红色革命纪念地，铭记历史记忆，增进爱国情怀。同时，鼓励大学生走进医院、走进社区，走进人民群众，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与真实的社会进行接触，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服务人民的过程中体会志愿服务的获得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

4. 提高地方党史知识储备，加强队伍建设。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

课的育人效果，很大程度取决于教师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只有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建设水平，教育目标才能更好得以实现。一要加强地方党史知识储备，提高理论自信。许多“德法”课教师并非中共党史专业出身，对“四史”尤其是地方党史的了解程度较为有限。“四史”融入思政课的基础是深入研究“四史”，以正确的原则评价历史。[①] 因此，教师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夯实理论基础，这是开展地方党史教育、讲好地方党史的基本前提。二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当代大学生信息来源的渠道非常多，他们喜欢借助网络探索未知的世界，但又尚未形成成熟独立的思考能力。“德法”课教师要真懂、真信，从理论层面向学生讲清楚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并能经得起学生追问“为什么”。否则，思政教师权威性和感召力就大为减弱。地方党史融入“德法”课时，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去讲明白其内在的逻辑。教师可以从新旧中国的强烈对比中，在当地肉眼可见的发展成就中，让大学生真切地感受“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接受了实践检验，也是经得起检验的伟大科学。思政课教师只有不断提升理论知识储备，才能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彰显理论自信和行动自觉。

总之，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教学，从逻辑向度是相互契合，从价值向度是具有重要作用，从实践向度需要不断完善融入路径。在开展“德法”课教学中，教师要积极探索、总结完善，不断提高地方党史资源融入“德法”课教学的实效，讲好地方党史故事和中国故事，加深大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引导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三观”，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主动承担起时代所赋予青年人的责任和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

①王炳林、刘奎：《关于“四史”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考》，《思想教育研究》2021 年第 8 期。

# 场域嵌入：新时代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路径探析[①]

◎高仓健[②]

**内容提要：**高校基层党组织具有明显的“嵌入性”特征，但基层党组织与高校之间并不是单一的“政治嵌入”关系，基层党组织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特殊场域。本文从“场域嵌入”视角审视高校基层党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嵌入”偏差问题，并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对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高校，党组织，组织力，场域，嵌入

##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

①根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本文中的“高校基层党组织”是指“高校院（系）级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和党员人数，经学校党委批准，设立党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的统称。

②**作者简介：**高仓健，男，浙江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党委组织员、讲师，浙江省社会工作与志愿服务协会秘书长，联系电话：18358183609。本文是浙江工商大学2022年校级学科建设管理重点项目“高校党建与学科建设融合发展机制研究”（XXK2022006）的阶段性成果。

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①]，这为我国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近年来，专家学者围绕“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这也为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从研究视角来看，目前有关于我国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在单一维度和微观视角下讨论，缺乏从系统性、整体性、宏观性的理论视角审视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问题的研究。事实上，基层党组织与高校之间并不是单一的“政治嵌入”，基层党组织本身就是一个特殊场域，而基层党组织置身其中的高校更是一个涵盖学习、生活、研究、校园文化等要素在内的复杂场域。场域理论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论，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由于该理论具有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后被广泛应用于管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从场域嵌入视角审视我国高校基层党组织及组织力建设情况，可以发现组织力提升面临的一些更为系统性、整体性、宏观性的问题。

我国高校基层党组织具有鲜明的“嵌入性”特征：高校基层党组织作为学校的内部组织体系，在科层结构上深深“嵌入”于高校内部的行政体系之中，同时，在地理位置上深深“嵌入”于高校校园的物理空间之内。然而，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研究逻辑不应该只是单一维度的“科层性嵌入”或者“地理性嵌入”，高校作为基层党组织“嵌入”的客体，不仅表征为一个“地域”(region)概念，还应该被看作是各功能要素的集合，表现为一类“场域”(field)形式”。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看来，社会是高度分化的，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自身逻辑性与必然性的社会小世界所构成，这些“小世界”即是“场域”。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 network) ，或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②] 。显然，从这个理论角度来看，

---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第 52 页。

②易艳阳 :《场域嵌入 : 助残社区组织发展路径探析》，《南京大学学报》2019 年第 3 期。

高校就是一个复杂的场域，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嵌入性”发展，不能够仅仅局限于物理空间的进入与转化，更应当从多维综合的“场域嵌入”进行考察，基层党组织要与高校的各类“场域要素”从相互嵌入、相互融合到相互建构、互生共栖，最终实现共赢共享的融合发展路径。

## 二、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面临的“嵌入”偏差

我国历来重视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依照组织嵌入和“支部建在连上”的党组织建设原则，基层党组织有序“嵌入”到高校这一场域之中，并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基层党组织在高校普遍建立的时间还不长，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在“嵌入性”发展中出现了“失位”、“不足”、“错位”、“失衡”偏差与发展困境，严重阻滞着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

### 1.“政治场域”的嵌入失位

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政治职能是党的第一功能，体现党的本质属性。高校基层党组织通过不断强化党的政治建设、积极发挥党的政治功能，得以实现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我国高校党建是党中央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从外部将基层党组织深度嵌入到高校的“政治场域”之中，并通过颁布《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为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功能发挥提供制度保障。从组织设置来看，高校基层党组织按照党中央政策文件的要求和标准“基本实现应建尽建”[①]，构建了系统完善的党组织体系。从队伍建设来看，基层党组织书记的队伍建设水平差异较大，虽然教育部党组在 2018 年颁布了《关于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特别是教师党支部“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实施意见》，逐步培育了一批政治强、业务精的“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但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群体中“重科研、轻党建”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部分教师党支部支委工作意愿不高。从党员发展来看，个别地区教师群体入党意愿不高，

①《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 2019 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党建研究》2020 年第 7 期。

高知识群体党员发展缓慢，学生入党动机存在一定的功利性，学生党员发展考察时存在“重学习、轻思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表明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嵌入”存在严重失位，影响了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的发挥，导致高校基层党组织出现政治功能缺位和虚化。

2.“理论场域”的嵌入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①]。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在坚持实践中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制度化的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不断提高了各级党组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但是，从高校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的现阶段情况来看，“部分支部存在走过场的现象，翻开文件、书本随便读一下即完成任务”[②]；个别党政干部和师生党员常常以学习工作繁忙为由，很少主动进行理论学习；一些支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还不高，呈现科学理论与实践应用脱节的问题。从深层次原因来看，这些问题背后折射出的是高校基层党组织“理论场域”嵌入不足，导致高校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被弱化、虚化，从而影响了高校基层党组织先进性体现和组织力提升。

3.“实践场域”的嵌入错位

“实践场域”是指由高校基层党组织开展的实践活动与实践对象所构成的实践系统。群众路线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高校基层党组织开展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高校基层党组织要主动联系师生、全面了解师生、日常关心师生，及时帮助师生，主动拉近与师

---

①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求知》2019 年第 12 期。

②金伟琼：《青年组织行为与高校基层学生党组织组织力提升》，《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 年第 3 期。

生的距离，融入到师生群体，做到“师生在哪里、党组织就在哪里”，通过开展服务师生的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师生最贴心、最信赖的组织依靠”[①]。但是，目前有一些基层党组织联系师生的主动性还不够强，党员服务师生的能力还不够好，工作方式僵化，实践活动与中心工作脱节，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走过场”的现象。根据一项关于基层党组织联系基层、服务群众、解决群众问题的调研显示，有 72.53% 的认为基层党组织开展的活动“流于形式、效果一般”[②]，从高校基层党组织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是在实践对象方面，还是在实践活动方面，都呈现出“嵌入错位”的特征，使得高校基层党组织的开展的实践活动深陷于服务对象“局限化”、实践活动“形式化”的窠臼。

4.“话语场域”的嵌入失衡

法国社会学家福柯（Foucault,M.）在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演讲《话语的秩序》中提出了著名的“话语即权力”这一隐喻。高校是包含党政话语、教学话语、知识话语、生活话语、网络话语等在内的复杂“话语场域”，在多重文化境遇下，各类话语体系与话语力量在高校中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消解，使得高校成为了争夺话语权的重要阵地。基层党组织在高校党政管理体系中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理应在高校的“话语场域”中同样处于核心位置，但实际上，高校基层党组织在“话语场域”的主动权正在逐步被减弱。近年来，受到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媒体技术影响，一方面，多元文化和社会思潮涌入校园，高校的话语体系衍生出诸如平民化、平等化、大众化的话语表征，基层党组织囿于传统的话语方式、话语内容，导致各方话语主体在高校原有“话语场域”中失衡；另一方面，网络空间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大学生的强烈求知欲促使他们快速而熟练地掌握新媒体传播

①陈宝生：《认真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开启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新征程》，《中国大学教学》2018 年第 10 期。

②刘红：《广东高职院基层党组织组织力调研及提升》，《现代商贸工业》2019 年第 29 期。

方式，并逐步尝试占据信息传播主导地位”[①]，抢占了网络空间的话语权，高校基层党组织在网络空间出现了“话语真空”。

## 三、“场域嵌入”：高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路径重塑

### 1. 夯实基础，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政治场域”嵌入的强度

针对基层党组织“政治场域”的嵌入失位，高校应当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建设，真正发挥高校基层党组织的政治职能。首先，要创新党支部设置方式，在“基本实现应建尽建”的基础上，探索将支部建在寝室区、建在团学组织、建在项目上、建在实验室、建在实习实践基地等形式，探索本硕博跨学段共建、相同专业师生联建等方式。同时，高校要坚持“党的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参与，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教学、科研、人才引进、职称评审、评奖评优等事项中的政治把关和堡垒作用。在此基础上，高校还要为基层党组织选优配强支部班子，教师党支部要把政治意识强、业务能力强、管理能力强、担当意识强的党员吸收到支委班子，发挥好“头雁”作用；学生党支部要注重从团委、学生会、社团、班级中选拔爱党爱国、品学兼优、向上向善的学生干部，发挥他们在学生群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 2. 制度为纲，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理论场域”嵌入的厚度

注重理论学习，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工作，既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成功经验，也是提高执政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内在需要。为此，高校要坚持党的理论学习制度和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在“理论场域”的嵌入，以制度化学习、常态化学习的方式，解决基层党组织在理论学习中出现的弱化、虚化问题。第一，高校要完善理论学习的管理体系，健全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的考核制度，以制度方式驱动基层党组织的常态化理论学习。第二，高校基层党委要把理论学习纳入到意识形态责任制和基层党委党建工作，抓好基

---

①高仓健：《从自组织理论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发展》，《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9 年第 3 期。

层党委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的要求开展学习，积极发挥基层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的示范带动作用。第三，高校基层党支部可以依托“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创新理论学习形式，提高理论学习的实效。在每次会议和活动前要认真准备学习资料，精心策划学习方式，想方设法提高党员的学习兴趣，让党员愿意学、主动学，这样才能取得理想的学习效果。

3. 问题导向，提升高校基层党组织“实践场域”嵌入的温度

高校基层党组织应当围绕院（系）的中心工开展党建活动，坚持“问题导向”，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党员思想，指导基层党组织的实践活动，提升基层党组织服务院（系）发展、回应师生诉求的能力，解决事关师生切身利益的问题，强化师生对高校基层党组织的认同。比如，在实践活动的内容方面，针对青年教师成长中在课堂教学、职称评审、科学研究等方面遇到的困惑和问题，教师党支部可以组织党员老教师为青年教师提供“一对一”、“多对一”的帮扶，引导青年教师更好、更快的成长为优秀教师；学生党支部要围绕大学生普遍关心的课程学习、课外实践、创新创业项目、学科竞赛、职业规划、实习就业等问题，及时做出回应，为大学生提供有效的服务和指导。在实践活动的形式方面，高校基层党组织要用心策划、精心准备每次实践活动，比如通过师生党支部联建、校内校外党支部共建的方式，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提高师生参与实践活动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师生参与实践活动的获得感。

4. 创新思维，加强高校基层党组织“话语场域”嵌入的力度

由于基层党组织在高校传统的“话语场域”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在话语表达时不需要过多的考虑话语受众的感受，只要依赖基层党组织的权威就能够顺利的完成信息传递、达到期望的活动效果，这也使得高校基层党组织建构出政治性与行政化的话语“惯习”。然而，随着高校大学生的话语意识逐步觉醒，基层党组织传统的话语“惯习”已经不能满足日常活动的需要，基层党组织在高校“话语场域”中的主动权受到冲击和动摇。面对急剧变化

的环境，高校基层党组织应当打破以往话语传播的路径依赖，创新话语传播方式，重塑基层党组织的话语“惯习”。一方面，高校基层党组织要创新话语方式，“淘汰过时话语，吸收新的话语”[①]，建构贴近师生群体、融入师生生活、体现时代特色的话语“惯习”，以此增强基层党组织在师生群体中的话语亲和力、说服力以及认同感。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提高党建工作者的新媒体素养，关注国内外的时事新闻和校内外的热点事件，主动在线上和线下构建话语议题，用师生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传播党的思想，提升基层党组织话语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引导力。

①构建中国执政党理论的话语体系》，《光明日报》2012 年 10 月 31 日。

# 在传承红色基因背景下
# 杭州党史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陶莲君[①]

**内容提要：**重视红色基因传承、加强革命传统教育是高校思政课程的重要任务。杭州党史内容丰富、红色基因鲜活，将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既可以有效补充思政课程并为学生提供深厚的精神滋养，又可以通过师生共讲党课，增加杭州党史的红色基因传播广度和深度。本文通过分析杭州党史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创新思政课程管理体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新思政课程教学模式三方面的对策，希望各方形成合力，为杭州党史红色精神的继承和传播发挥积极作用。

**关键词：**红色基因；杭州党史；思政课程

## 一、传承红色基因和杭州党史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忘初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红色基因，强调“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资源加强文化建设”和“要讲好党的

①作者简介：陶莲君，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讲师，联系电话：13819125429。

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①]。

杭州是一座红色基因厚重的城市。1919 年，为了响应北京和上海的五四运动，杭州学生联合救国会成立，在学生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下，杭州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运动”迅猛发展起来。自此，杭州开启了“觉醒的年代”。从“一师风潮”到工农运动的兴起，奠定了中共杭州小组成立的思想基础和阶级基础。[②]

随着中共一大的召开，杭州的红色火种亟待点燃。皮市巷 3 号就是杭州红色火种的初燃之地。1922 年 9 月初，中共杭州小组在这里正式成立，于树德任组长，成员有金佛庄、沈干城，隶属于中共上海地委兼江浙区委。1923 年春，中共杭州小组在发展了徐白民、唐公宪、何赤华、倪忧天等人入党后，扩建为支部，于树德任书记。[③] 杭州的党史由此开始叙写，标志着浙江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此后，一代代的先烈们在这片土地上开展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为建立一个新中国，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前赴后继，即使是在力量弱小的低谷时期，依然不畏不惧，不屈不挠，抗争到底，甘愿献出生命，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杭州市委带领人民进行了巩固新政权的斗争，完成了三大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几经曲折，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杭州各地，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跨越，在中国梦的寻梦之旅上越走越快，越走越稳。

---

①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求是》2021 年第 10 期。

②参见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年，第 13–77 页。

③中共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杭州简史（1921—2021）》，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5 页。

百年杭州党史中，轰轰烈烈有之、艰苦斗争有之、波澜壮阔有之、曲折发展有之、春风唱响有之、引领潮头有之，百年历史，百年故事，精神不灭，代代相传。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和平的家园，建设者们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富庶的家园，为了纪念先辈、牢记历史，要学习与传承杭州党史，更重要的是传承红色基因，将视死如归、不屈不挠、奉献牺牲、改革创新、奋斗突破等红色精神传递给一代又一代的杭州学子，传递给即将承担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使命的青年们。

## 二、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的必要性和现状

### （一）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的必要性

新时代高校是青年聚集地，肩负立德树人和文化育人的根本任务，其作用在于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于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必须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和中央部署，引导当代大学生学好党史这门“必修课”，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①] 通过党史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明确共产党的性质，深刻领悟党的根本宗旨和党知行合一的工作作风，了解党在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使他们在思想上信任党、在行动上支持党，提高政治素养，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②]

思政课程是一门塑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大课程，不仅是弘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途径，是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渠道，[③] 更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任务的主阵地，是回答与实践“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重大问题的关键课程。习近

---

①朱晓梅：《引导青年学生用知识和汗水传承红色基因》，《中国教育报》2021年6月8日。

②汤凯宁：《党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决策探索（中）》2021年第12期

③蓝晓霞：《三个向度讲好新时代的“大思政课”》，《中国青年报》2021年8月30日。

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思政课在提升青年学生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在引导青年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①] 将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有如下几点必要。

1. 杭州党史内容丰富，为思政课程提供切实可用的素材。杭州党史历时百年，历史故事丰富，其中或惊心动魄、或曲折复杂的故事发生在杭州大地上。75 年前，浙大农学院学生于子三在浙大"求是"校训的熏陶和革命思想的启迪下，毅然投身到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后，敌人用尽酷刑，但他坚强不屈，宁死不从，最终英勇牺牲。他用生命和鲜血保卫了党的机密，保卫了进步组织和战友。[②] 彼身躯虽死，"学生魂"未灭，引发了 15 万学子反迫害、争自由的斗争，成为了照亮了万千学生的火炬。从求是英魂于子三的事迹，到瞿秋白和杨之华的革命爱情，皆有迹可寻。截止到 2021 年 4 月 30 日，杭州公布党史现场教育基地 51 家。这些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既有故事性，又有实践性，可以为高校思政课程提供丰富的知识素材和实践载体，让思政课程不但能够具备故事性，还能够走出课堂，走入城市小巷或者乡间地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 杭州党史红色基因鲜活，为学生提供精神滋养。在西湖东南的云居山上的浙江革命烈士博物馆内，矗立着一个《八位省委书记》群雕，此群雕场景宏大，英雄们眼神坚毅，步伐从容，这幅恢弘画卷则是由一桩桩一件件生动具体的故事谱写而成。他们是年仅 21 岁就英勇就义的王家谟，是明知自己的身份早已公开、却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临危受命、上任三天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张秋人等杭州解放前牺牲的 8 位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的奋不顾身和奉献牺牲，才有了杭州今日的经济活跃、政治清明、文脉隽永、民生安定、绿水环绕。这种英勇无畏、满腔热血的革

①秦宣：《善用"大思政课"培育时代新人》，《人民日报》2021 年 8 月 2 日。
②《于子三："学生魂"永恒》，《浙江大学报》2021 年 3 月 19 日。

命精神形象鲜活，可以激发学生们爱党爱国爱杭州的热情，焕发能够勇敢面对挫折攻坚克难的正能量，激励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3. 师生共讲杭州党史，传承红色基因。杭州是个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为了让杭州党史走进千家万户，让红色基因传承得更有广度和深度，我们需要更多的宣传力量。杭州共有在校大学生 58.5 万人。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让杭州党史能够展现在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眼前。越来越多的“00 后”学生加入党史宣讲团，通过师生共讲党史，让大学生成为传承和宣传红色基因坚实的力量，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汇水成河，河聚成海，凝聚磅礴力量。杭州党史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研究室、书卷里，更应该出现在每一位杭州人的记忆里，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精神融入百姓生活，给予市民们生活的信心和动力，激发向上的力量和向善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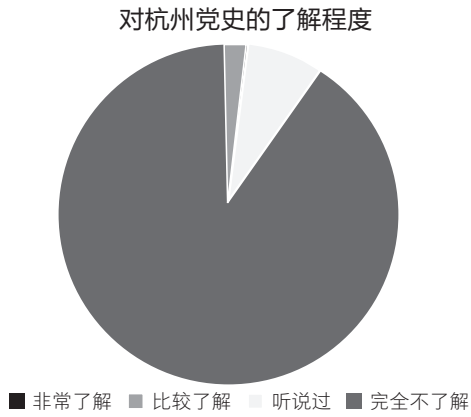
（二）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的现状

为了了解杭州高校的学生对于杭州党史的学习现状，我们制定和发放了 220 份调查问卷，后回收有效问卷 213 份。我们发现如下几个现状。

1. 大学生对杭州党史缺乏了解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只有 10% 的同学了解过杭州党史，另有 90% 的同学从未接受过任何杭州党史的知识或者信息。说明在杭大学生普遍的对杭州党史缺乏了解，亟需将杭州党史融入高校教育之中。（详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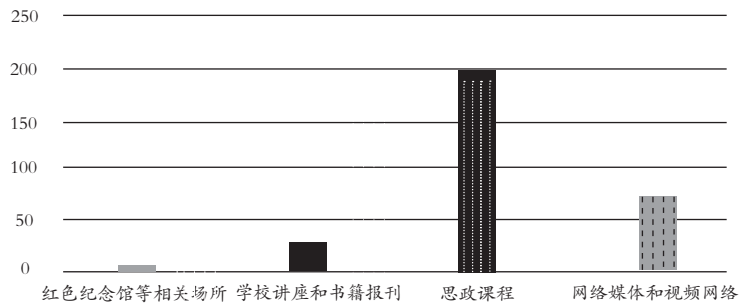
图 1



2. 大学生了解党史的渠道主要来自于思政课程

调查发现，只有极少部分同学通过参观红色文化相关的场所、学校讲座和书籍报刊来学习党史，有 13% 的同学通过网络媒体和视频网站来接党史。而有将近 93% 的同学表示学习党史的主要渠道是通过思政课程学习。这就意味着，一旦失去思政课程这个主阵地，杭州党史将很难在大学生中进行传播和学习。（详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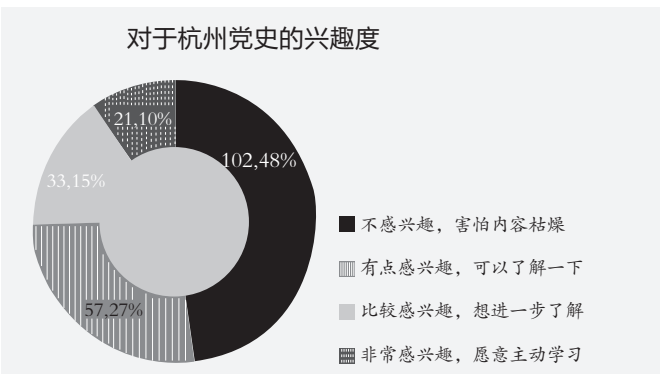
图 2
学习党史的主要渠道




3. 趣味性是学生学习杭州党史的动力来源

经过调查发现，约有 48% 的同学对于学习杭州党史不感兴趣，主要原因是害怕杭州党史学习内容枯燥乏味，另外 52% 的同学可以通过党史学习过程中的趣味性来进行吸引。这说明，趣味性问题是影响杭州党史走进大学生的重要因素。（详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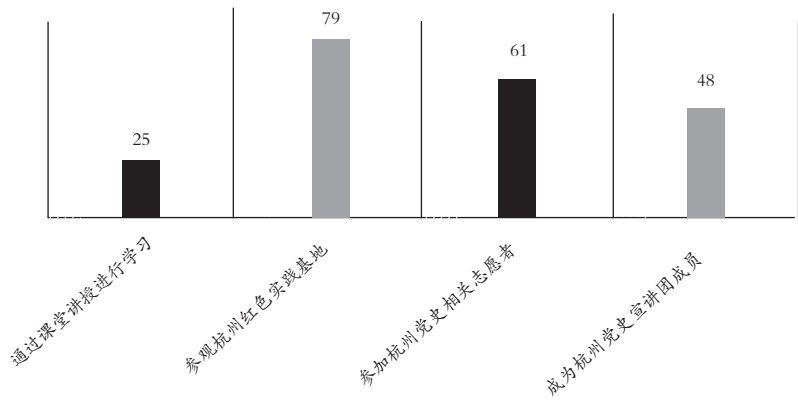
图 3



4. 大学生对于学习杭州党史的途径选择

12% 的同学选择通过课堂学习杭州党史，37% 的同学选择参观红色实践基地进行学习，还有将近 28% 和 23% 的同学选择通过成为杭州党史志愿者和宣讲团成员进行杭州党史学习。比起传统的课堂学习，大学生更愿意通过参观红色实践基地、参加志愿活动和担任党史讲解员等实践学习方式。（详见图 4）

图 4
学习杭州党史的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杭高校大学生学习党史现状不佳，大量学生缺乏接触杭州党史的渠道和机会，杭州党史的内容也极少进入高校的思政课堂，思政课程是高校学生学习党史和传承红色基因的主阵地，理应将杭州党史融入高校思政课程，充分调动在杭学子学习杭州党史、传承杭州红色基因的积极性，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杭州青年而努力。

## 三、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高校对于思政课程和党史教育的重视度不够，对于思政课程改革缺乏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

通过大学生学习杭州党史现状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杭州党史学习与传承的一大问题就在于高校对于思政课程和杭州党史教育的重视度不够，并且

对于思政课程管理缺乏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

1. 不少杭州高校对于思政课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仍将思政课程看作是普通的通识课程。高校对于杭州党史教育的重视度也不够，杭州党史的研究局限于论文和课题中，或者高校对于红色基因的传承主要落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受众层面，没有形成将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当作大事来抓的意识。

2. 不少高校并没有针对思政课程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目前的思政课程改革仍停留在思政教师一个人、一个团队的工作上，并没有在体制机制上进行科学构建，也未形成多部门协调合作的机制。

（二）高校思政教师的杭州党史专业知识不足，教师考核一刀切。

杭州党史是一门极具地方特色的专门史，其内容丰富，需要大量的史实资料积累和研究才能完成系统的整理。高校思政老师的专业知识比较深厚，但是对于杭州党史的研究往往不够，可能仅停留于一些大事件和片段化的故事中，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杭州党史知识体系。

1. 高校思政教师因考核压力困于日常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既没有太多学习杭州党史的机会，也缺乏自学杭州党史的实践和精力。学校对于思政教师开展的各类培训往往是基于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的提升，几乎没有进行杭州党史相关内容培训。

2. 在原有的思政课堂中，已经包含一些比较成熟的党史案例，老师们更容易把握住这些熟悉的案例来进行教学，对于杭州党史的熟悉度不高，导致教师在使用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的时候缺乏信心。

（三）高校思政课程的教学模式单一，影响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的教学效果。

常规来说，目前高校思政课程的教学模式有两种：传统教学和现代化教学。目前看来，高校思政课程存在教学模式单一的问题。思政课程的教学模式单一会给学生学习杭州党史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甚至会导致学生对学习党史知识产生抵触情绪。传统教学与现代化教学模式之间的失衡将会导致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效果大打折扣。

1. 传统的思政课堂仍采用“输入式”的教学方式，以教师为教学主体，对于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没有任何的改革和创新。如果思政课只有教师在主动的传授杭州党史知识，学生仅仅是被动的接受杭州党史知识，那就不容易培养学生学习杭州党史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认真领会杭州党史知识中的红色精神，对于传承红色基因不能提供很大的能量。

2.“00 后”大学生具有非常鲜明的特征，他们常常沉浸在网络世界中，传统的授课模式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对于提升思政课程的教学效果发起了很大的挑战。

3. 部分高校过分强调现代化教学方式和手段的应用，过于依赖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的后果是学生只是在表面参与了思政课程中的党史学习，并没有进行理论提升，没办法内化成大学生自己的知识和素能。这种教学模式较容易出现教学表面化的现象，教师与学生之间不能建立正确有效的交流，当然也无法有效提升教学效果。

## 四、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的对策

### （一）发挥思政课程的主渠道作用，创新思政课程管理体制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党的历史是贯穿思政课教学体系的重要脉络，也是思政课教学的应然内容。习近平同志说：“思想政治理论课能否在立德树人中发挥应有作用，关键看重视不重视、适应不适应、做得好不好。”[①] 高校要紧扣党史学习教育的主题和主线、目的和方法，积极促进党史学习教育与思政课教学的深度融合，达到以史育人、鉴往知来的教育目标。[②]

1. 高校要重视思政课程，将思政课建设列入学校发展工作重点，为思政

---

①《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0425/c1024-32408556.html。

②《弘扬革命精神 深化思政课建设》，《山西日报》2021 年 5 月 25 日。

课建设创造良好大环境。增加对思政课程的重视度和对思政教师的认可度，这样才能保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才能增强办好思政课的认识自觉和行动自觉，才能发挥好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的关键作用，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高校要加强思政课程改革，为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提供有效的平台。高校需要加强思政课程改革和思政教师考核体制，为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提供助力。思政课程是公共必修课而非专业课，在进行课程改革的时候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或者真空管理。高校进行思政课程改革，需要加强整体设计和部门联动。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并不是思政教师的个人选择，而是要整体设计，根据学校自身特色和校园文化进行顶层设计，同时还需要形成教师团队、辅导员、学生处等各部门联合工作机制，要有效整合各个建设项目和平台的资源，为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提供可靠的支撑。

（二）创新高校思政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工作最核心的就是思政教师的作用。有些思政教师侧重于调查研究、文献整理等科研工作，有些教师擅长教学竞赛和指导学生参与比赛，有些思政教师擅长与学生交流，能够做好学生管理工作。但是现有的教师考核机制往往是“一刀切”，用人机制较为僵化。

1. 完善高校思政教师考核评价机制。进一步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职业地位和认同。改变现有的“一刀切”政策和用人机制僵化的现状，根据思政教师的专长和特点进行分类管理和考核。建立团队评价和个体考核并重的考核机制，鼓励团队合作和协同创新，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

2. 加强思政教师杭州党史学习和培训。高校必须要重视思政课教师培养，拓展教师的杭州党史知识储备，通过定期学习培训、研讨交流，帮助思政教师进一步把握杭州党史专业知识里的思政成分，力求做到讲好、讲透。深入开展教师队伍杭州党史学习教育等综合培训，针对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教研活动。引领思政课教师针对党史融入思政课程进行研学，

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专项课题研究，探索总结创新成果，创新形式。[①]

（三）创新思政课程教学模式，提高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程的教学效果

要想提高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堂的教学效果，必须创新思政课程教学模式，既要符合思政课程立德树人的课程定位，又要将杭州党史的丰富内容做鲜活的展现，激发学生学习杭州党史的热情和缅怀致敬先辈的情感，做到理论和实践切合，方式方法多样新颖，师生信息沟通流畅。

1. 积极探索新的课堂教学方法。可以采用问题导向式和研究式相结合的教学内容设计，使用微视频、博客、微信公众号、红色电影观影等多种教学载体，结合线上线下平台进行杭州党史学习互动，进行小组作业分享、课堂辩论、唱红歌、红色诗歌朗诵等课堂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教师发挥教练员的作用，帮助学生进行展示、归纳和总结。打造学习理论与研究问题相结合的思政课堂，进一步丰富课堂教学形式和内容，提高学生学习杭州党史的兴趣。

2. 注重课程实践，将杭州党史学习从课内引到课外。一方面，运用好杭州丰富的党史教育基地，帮助学生走出课本，充分利用好中国共产党杭州历史馆（杭州市方志馆）、杭州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小营·江南红巷、衙前农民运动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浙江受降纪念馆、南堡精神纪念馆等各类红色教育资源，让学生带着问题真走真看真思考，提升学生学习杭州党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通过组建杭州党史讲解志愿者和宣讲团，让学生将所学的党史知识转化为行动，发挥大学生继承和传播杭州党史的能量，使得杭州党史的学习不局限于学校，可以进入企业、进入社区、进入千家万户，让红色精神永续，红色基因永传。

## 五、结语

为了积极推进高校传播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的工作，为了深化浙江

①赵倩：《党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思考》，《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1 年第 9 期。

省委文化建设“八项工程”，高校要切实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强化举旗铸魂这个根本，突出培育时代新人这个关键，增强传承“红色根脉”的文化自觉，凝聚起高校师生共同奋斗的磅礴力量。①

在思政课程中融入杭州党史是思政课程需要担负的立德树人责任和传播红色文化应有的任务，杭州党史丰富的资料和鲜活的故事能够为思政课程带来新的活力，为大学生带来丰厚的精神滋养。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在杭州学习也有义务学习和了解杭州党史、传承红色基因。通过杭州党史融入思政课堂，还可以发动大量青年学子的宣传能量，将杭州党史引入更多的百姓生活，为传播红色精神赓续红色基因发挥青春力量。

①毛鸽：《守好“红色根脉” 培育时代新人》，《浙江日报》2021 年 9 月 6 日。

# 新时代非公企业红色基因的传承

## ——杭州万事利集团的新丝路

◎吕明艳[①]

**内容提要：**红色基因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淬炼的先进本质、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企业生生不息、繁荣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精神密码。在近50年的发展历程中，杭州万事利集团在两代领导人的带领下，以红色思想织就红色内核、以红色内核赓续红色血脉、以红色活动驱动红色匠心、以红色匠心担当红色使命，厚植红色基因、汲取红色力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竞争优势。同时，员工对企业红色文化认知不够，党员组织生活质量不高，部分特殊岗位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工作不强等难题亦亟待探索解决，以进一步完善红色基因在企业的传承机制。

**关键词：**红色基因；传承；非公企业；万事利集团

红色基因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传承，代表着坚不可摧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蕴含着忠诚坚定、艰苦奋斗、永不言弃、奋勇向前、不畏牺牲、大公无私的优良传统和永不褪色的精神信仰及价值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色基因的传承，明确提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

①作者简介：吕明艳，女，浙江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联系电话13857696612；邮箱 lv.mingyan@163.com

血脉永续”。[①] 此外，总书记还在不同场合就红色基因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反复强调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并将传承红色基因上升到坚定中国文化自信和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为我们在新时代焕发红色基因精神伟力、铸魂固本培元、赋能建设发展立起了根本遵循、提供了根本指引。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非公企业走出国门，向世界提供了“中国制造”、展示了“中国经济”、彰显了“中国奇迹”。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不同场合频繁力挺非公有制企业，并表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②]。作为我国当前吸纳就业的主要领域、推动创新创业的关键主体、扩充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及促进科技发展的中坚力量，非公企业理应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主体，这不仅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基因重要论述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非公有制企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在新时代切实传承好红色基因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本文以杭州万事利集团为研究个案，对新时代非公企业红色基因的传承实践进行梳理总结，分析企业在红色基因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 一、万事利集团简介

万事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事利集团”或“万事利”）是一家创办于 1975 年，以丝绸文化创意为主导产业，辅以生物科技、资产经营、投资管理等多产业的现代新时尚产业集团。万事利集团不仅因规模大、实力强、名列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而为国人所周知，并且因作为国家级盛会礼宾服务重要保障单位之一，成功服务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G20 杭州峰会、北京冬奥会等我国举办的一系列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活动和重大会展活动及重量级主场外交活动，而为世界所瞩目。万事利集团不愧为中国民

①《传承红色基因 不忘初心使命》，《湖南日报》2018 年 8 月 8 日。

②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 年 11 月 2 日。

营企业的优秀代表，不愧为中国丝绸文化的优秀传承者。

回望发展程，不忘领路人。事业腾飞路，红色基因铸。早在1978年6月，在有着高度政治自觉和对党深厚感情的企业创始人沈爱琴的重视和支持下，万事利就设立了党支部，成为全国第一家拥有党支部的非公企业；1995年2月，由乡镇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的万事利，随着企业党员人数的增多，又设立了党委，成为浙江省首批非公企业党组织之一。在省市区镇（街道）各级党委的指导和直接领导下，在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领导的关心和鼓励下，在“党建强、发展强”两强目标的指引下，在沈爱琴、屠红燕两任党委书记的带领下，万事利集团党委更是不断优化基层党组织结构，不仅设立4个基层党支部，覆盖党员157名，且形成了特色鲜明的“3344”党建工作体系，初步打响了万事利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品牌，企业党委也先后获得“中国纺织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十佳示范企业”“浙江省‘民企党建百家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示范典型’”“杭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杭州市‘诚信服务先锋’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在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集团党委更是获得了“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一重量级荣誉称号。万事利集团不愧为我国非公企业党建的模范典型，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优秀传承者。

## 二、新时代非公企业红色基因传承的万事利实践

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万事利集团始终秉承着“不忘初心跟党走”的决心，把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作为重大政治责任，成为了传承红色基因的民企先锋。

### （一）以红色思想织就红色内核

“听党话、跟党走、感党恩、促发展”是万事利集团从成立之初到现在探索出来的富有成效且极具特色的发展密码。47年来，万事利集团能从风雨飘摇的笕桥小厂成长为多元化现代集团，离不开党史的指引教育，离不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培育，离不开时代政策的利好支持，更离不开集团两代

领导人对红色思想的坚守与传承。

“毛泽东思想哺育了我，邓小平理论富裕了我，三个代表提升了我，科学发展观改变了我。”集团创始人沈爱琴的格言至今仍在万事利广为流传，并引领着万事利集团的成长与发展。在沈爱琴看来，跟着共产党走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只有学习了党和国家的政策，把握好形势，找准发展定位，企业才会有长远的发展，这也是她在领导企业发展过程中始终所坚持和在做的。也正因如此，成立于 1975 年的万事利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茁壮成长，成为党在时代变迁过程中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不断向前的受益者。在艰苦创业的岁月里，万事利集团的党员们也一直以身作则，并始终记得沈爱琴那句“党员能给企业带来凝聚力，也能带来战斗力。”

2012 年 1 月 1 日，沈爱琴正式辞去万事利集团董事长职务，由其女儿屠红燕担任董事局主席。如何在新时代背景下，在企业转型接力中传承好红色基因，使党的红色种子在非公企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形成党建强与发展强齐步走的良好局面，是屠红燕一直思考并始终为之努力的目标。“党建引领决定企业高度，国际视野决定企业宽度，文化积淀决定企业深度”，在母亲沈爱琴红色思想的熏陶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屠红燕以高度的红色信仰和政治自觉，不断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坚持发挥党建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作用，积极将党建与集团发展相融合，为万事利在新时代的发展装上了“红色引擎”，也使得党的红色基因在传承中焕发出时代的光芒。

（二）以红色内核赓续红色血脉

万事利集团早就提出并实践多年的“三培养”人才培养机制和“三优先”人才培养政策是集团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制度保障和核心经验，反映了以创始人沈爱琴为代表的万事利集团管理层和企业党委对企业发展党员、传承红色基因的高度重视。

“三培养”是指在培养人才时，坚持把党员培养成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把骨干党员培养成管理干部。“三优先”是指招聘人才时优先录取党员、

在内部培养时优先提拔党员、在考核奖励时优先考虑党员。自“三培养三优先”提出以来，万事利集团就始终坚持这一理念，并一直传承至今。通过党建引领发挥“三培养”“三优先”的指引优势，使得党组织领导下的党员培养与董事会领导下的人才培育相互促进、协同发力，为非公企业实现党委班子与经营班子“交叉任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正因多年的坚持与沉淀，现如今万事利集团党委班子与总裁经营班子、支部的支委班子与分公司的经营班子达到了高度重合，实现了高层管理人员党员覆盖率高达 98%，中层管理人员党员覆盖率高达 95%。此外，在调研过程中，多位党员也指出，在万事利，很多优秀员工都很想向党组织靠拢，并且已经入党的也都是工作比较积极和同事公认优秀的。这也表明，“三培养”机制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党组织对文化程度较高、能力较强的优秀员工的政治吸纳，这也无疑是为全党提高党员发展质量、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传承红色基因作出了万事利贡献。

2020 年 6 月 23 日，万事利集团又发布了《万事利青年党员 2025 培养计划》，引起了全体员工的瞩目。这份由屠红燕提出的培养计划将进一步传承和创新万事利集团“三优先三培养”人才培育机制，为新时代充分巩固党在集团内部的绝对领导地位，赓续集团党组织队伍红色血脉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以红色活动驱动红色匠心

近年来，每遇七一建党节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及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等重要纪念活动，万事利集团党委都高度重视、精心策划、认真组织。其中，有创意或有影响力的活动主要有五类。第一类是上党课活动。一是各支部书记在每年“七一”前后，为支部的党员上好一堂党课，突出理想信念、党性观念、党史党建等内容的宣讲，引导广大党员青年干部适应新时代的潮流，锐意进取，不断追梦，争做传承创新的红色丝路人。二是先后邀请了时任两任区委常委、组织部长王涛和邵雪荣、淳安县下姜村党总支书记姜浩强以及原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著名党建专家胡坚给全体党员上党课，不断深化广大党员对党史的理解，增强党员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促发展的

积极性。第二类是参观考察活动。近年来，集团党委先后组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参观考察了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杭州革命烈士纪念馆、杭州党史馆、杭州市党群服务中心、浙江六任省委书记基层联系点淳安县下姜村、“两山”理念发源地安吉余村等红色教育基地，追寻红色足迹、聆听革命故事、诵读红色经典、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入党初心，在回顾党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的过程中，鼓舞和鞭策集团的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初心使命。第三类是表彰活动。每年七一都会选树和表彰一批在工作中乐于奉献、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为实现集团新发展作出贡献的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员，以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凝聚向上向善、奋发有为的正能量。第四类是展览活动。不定期举办红色作品展，将抽象的红色文化转化为辨识度高且乐于被人们接受的精美红色丝绸文创产品，不断赋予红色基因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如在建党百年之际，在“礼赞百年——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红色文创展”上展示了一系列以南湖红船为主要元素的“辉煌百年”方巾、“初心百年”方巾以及“初心百年”丝绸笔记本等红色文创“百年彩”产品，吸引了不少人驻足欣赏。这些红色丝绸文创产品不仅丰富了企业红色文化内容，也让大家看到了红色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所迸发出的新生命活力。第五类是朗诵活动。如“喜迎十九大我在万事利‘读新语’”系列活动，纪念建党96周年“丝绸‘有政治、有文化、有责任、有追求’争做合格党员”主题朗读活动，优秀青年党员朗读《一个老党员的精神遗产——万事利集团创始人沈爱琴人生丝语》《一个优秀青年的入党申请书》以及红色诗歌等活动，用声音传递共产党员在行动的红色动力，增强全体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爱党”“信党”“护党”的政治觉悟。此外，还有“学先进，树榜样”学习强国之星争先活动、万事利“党员红色故事”实践活动、走访慰问老党员等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把红色正能量融入到企业每个员工的血液中。总体看，这些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主题鲜明、参与广泛、政治性强，有效增加了党员对党史和党的优良传统的了解，有效增强了党员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效促进了党员对红色

基因的传承，深受他们的欢迎。

（四）以红色匠心担当红色使命

2021 年 6 月 19 日，万事利集团庆祝建党 100 周年纪念大会隆重召开。为树立先进典型、凝聚榜样力量，大会现场表彰了一批集团 2021 年度党员先锋岗和优秀共产党员，充分肯定了他们在新时代万事利集团发展过程中展现出的新担当和新作为。“学习强企”“创新实干”“营销突破”“匠心筑梦”“敬业忠诚”“优秀共产党员”“光荣在党 50 年”“光荣在党 30 年”，这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正是万事利集团党员员工以红色匠心担当红色使命、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真实写照。

在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万事利集团始终致力于打造锤炼服务型党支部，按照“生产经营活动到哪里，党的组织建设到哪里，党员活动开展到哪里，先锋模范作用就发挥到哪里”以及“关键岗位是党员，困难面前有党员”的思路，把红色基因滋养的成效释放到经营运营、市场开拓、疫情防控、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等实践中，让红色基因成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集团在国际盛会上的靓丽风采离不开党委班子成员、基层党组织干部、业务技术党员的模范带头和攻坚克难；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双线战疫中离不开广大党员的冲锋陷阵和以身作则；文化商城搬迁攻坚战中离不开党员攻坚克难专项小组的积极作为和勇于担当；企业经营业务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基层一线党员的扎根坚守和无私奉献。在集团党委的有力领导下，万事利的党员们不断展现出“我带头我作为”“党旗飘起来，党员动起来，项目快起来”的昂扬风采，使党员的红色正能量深入到了每个员工心里。

此外，在集团党委的有效引领下，万事利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汇聚强大动能，担当红色使命，积极参与到疫情防控、乡村振兴、社会慈善、公益扶贫等事业中。如在新冠疫情期间，集团党委第一时间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捐款捐物驰援抗疫第一线，以强有力的执行力部署企业转产口罩重任，为疫情防控作出了积极贡献；积极参与“千企结千村、消灭薄弱村”“助力 26 县跨越式发展”等各项乡村振兴活动，先后帮扶衢州开化溪东村、

丽水景宁县、桐庐合村乡等数十个乡村实现农户增收、产业脱贫，并荣获“联乡结村”共建活动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出资 2000 万成立“爱宝基金”，用于扶持丝绸产业发展并帮助困难群体，累计捐款捐物价值近二千万元；连续 16 年主动参与市、区组织的“春风行动”，帮扶特殊群体再就业，被授予“春风行动爱心单位”等等，在履行企业使命中锤炼了红色基因的鲜红底色。

## 三、新时代非公企业红色基因传承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与此同时，万事利集团在红色基因传承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值得重视和改进。

### （一）员工对企业红色文化的认知不够

在座谈过程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员工包括党员员工对企业红色文化了解掌握不佳。在谈及企业创始人沈爱琴时，多数人仅局限于对“四个我”人生格言的了解。此外，对于企业发展历程中的红色历史事件以及现有的“3344”党建工作品牌和体系的了解也不够深入和全面。一方面，企业员工队伍庞大、人数众多，加之文化背景差异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员工们对企业红色历史有所淡忘。另一方面，近年来，新晋青年员工较多，他们对于企业红色文化更是知之甚少。这其中反映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企业红色基因的传播载体和渠道还不够多，影响了员工对企业红色文化的认知和记忆。

### （二）党员员工的组织生活质量不高

从座谈情况来看，支部在落实主题党日制度、“三会一课”制度、谈心谈话制度、组织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制度）等这些《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明确规定的重要的基础性的制度方面，存在着规范性不够和质量不高的问题。当被问及“印象深刻或者感触较深的支部活动有哪些”时，大部分党员都只提到了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走访下姜村、安吉余村等参观考察类活动，而对支部安排的其他活动印象不深，甚至有部分党员不清楚最近一次主体党日活动的主题。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组织的自身建设以及党员员工组织生活的质量，对企业红色基因的传承产生了不利影响。

（三）处于特殊工作岗位党员员工的教育管理监督工作比较薄弱

这部分党员主要包括做销售业务的党员，以及被派到外地开展某项工作且时间较久同时当地又没有建立党支部的党员。从座谈情况看，这些党员大多数很少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活动，也很少通过补课学习等方式予以弥补。一般而言，如果这种现象持续较久，往往会影响到党组织对这些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会影响到这些党员对党组织的归属感以及他们作为党员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进而导致党性意识的逐渐淡化。

## 四、新时代加强非公企业红色基因传承的对策建议

基于上述问题和分析，着眼于新时代更好地完善非公企业红色基因的传承机制，具体建议如下。

（一）加强对企业红色文化的梳理、总结与宣传，提高知晓度

一方面，加强对企业红色文化的系统梳理和总结。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可以设计推出一本图文并茂、故事性强、精练简洁的万事利红色文化宣传册，以回顾集团近 50 年来，两代万事利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听党话、跟党走，顺应国家改革开放大势，紧扣时代节拍，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传承与创新的发展历程；对集团“3344”这一党建工作品牌进行系统梳理及凝练优化，并将其中的具体内容、内在逻辑联系写到企业党建工作手册中。另一方面，拓展企业红色文化的宣传渠道。如可以考虑在新员工入职时发放集团红色文化宣传册，并在入职培训时增加相关内容的培训；将集团两代领导人的人生格言、“三培养三优先”等企业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红色基因浓厚的内容做成标语牌放在员工活动室里，印在专门用于集团相关活动的一次性纸杯上、文化衫上、工作包上、桌垫上、鼠标垫上、笔记本上等，确保企业红色宣传随时可见、随处可见，从而增强员工的了解和理解。此外，还可以选择在支部主题党日、集团取得重大成就或遇到挫折时，一起重温这些内容，不断筑牢企业红色思想根基，弘扬企业红色文化主旋律。

（二）从严落实主题党日制度，提高主题党日活动质量

考虑到主题党日制度的实践频次最高（每月一次），涵盖范围广泛，并可与支部的“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与民主评议一并进行）、谈心谈话等工作结合起来、融入其中，因而应重点提高主题党日活动的质量，以从严落实主题党日制度带动从严加强党支部组织生活进而促进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为企业红色基因传承提供坚实的保障。大致说来，努力的方向可以有以下两个方面：（1）增强主题党日活动的政治性。因为党是政治组织，作为党的细胞的党支部，其开展活动无疑应突出政治性，而不能只注重娱乐性。具体来说，党支部每月一次的主题党日活动，应把学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每年一次的中央全会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论述乃至整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党的历史、党的优良传统，以及开展党员民主议事、观看红色电影或纪录片、领导干部上党课、与党员谈心谈话、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等作为重点内容予以安排。当然，这样的活动也可与一些文化性甚至娱乐性突出的活动，如竞走、登山比赛等结合起来，以提升党员参与支部活动的热情。（2）增强主题党日活动的仪式性。可以考虑在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之时，要求党员一起重温入党誓词、朗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甚至合唱红歌或企业自己的司歌，以提振党员的精气神，增强主题党日活动的仪式感。

（三）加强对特殊工作岗位党员员工的教育管理监督

对于从事销售工作经常需要外出、被外派到外地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子公司且不能经常回来的党员，在态度上，应该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管理监督。在企业的生产发展中，可以有处于特殊岗位做特殊工作的党员，但在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中，不可以有降低要求、特殊对待的党员。在实践中，则应主要考虑优化对这些特殊工作岗位的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具体而言，一是考虑补课的方式。例如，如果这样的党员在某月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中，因为在外地，而不能前来学习党代会精神，可以让他自学后提交一定文字数量标准的学习心得；又如，如果这样的党员缺席了某次支部邀请专家学者上党课的主题党日活动，可以将专家讲课视频或课件发给这位党员，让他观看后提交

一定文字数量标准的学习心得；再如，如果这样的党员缺席了某次以谈心谈话为主题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可以趁着他在下次回公司之际，与其谈心谈话。二是考虑技术手段的支持。例如，主题党日活动邀请专家、领导上党课时，可以考虑视频直播或录制上传到“万事利微党校”微信平台，使得外地党员同样可以观看和学习；又如，主题党日活动开展党员民主议事，可以让外地出差党员同时或事后在党支部微信群发言和提出意见建议；等等。

# 三、探寻共富之路

# 高质量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杭州密码”

◎周　爽[①]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党建引领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高质量党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要素。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杭州蕴藏着由战略、精神、航向、理论、动力构成的五大密码，闯出了一条可供复制的党建引领共同富裕之路。解锁这些密码，有助于为浙江乃至全国高质量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践样板。

**关键词：**高质量；党建；共同富裕；杭州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不懈的追求。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政党建设的核心命题。当前，统筹推进共同富裕的区域化党建工作，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城市，在争创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城市范例过程中，已打造出独具特色的党建引领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板。深度破解高质量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杭州密码”，既是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内

①**作者简介：**周爽，女，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高校领军青年拔尖人才。联系电话：17826812455。

在要求，也是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在新征程上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现实需要。

## 一、“八八战略”：杭州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密码

战略密码即是战略思维。一指格局，二指方向，即全局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①]。习近平指出，战略思维，“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②]。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以战略思维高度重视政治路线，加强党的质量建设，始终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把党的建设落实到推动浙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上，从根本上抓住了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关键。

2003 年 7 月，习近平同志在洞悉大势、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作出了“八八战略”重大决策部署，为浙江发展赢得主动，为抢占发展机遇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他提出地方党委要吃透“两头”，即中央精神和地方实际，运筹帷幄，谋划地方发展。“提出战略，就是要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长远规划，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③] 地方党委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制定出既符合中央科学发展要求，又体现本土特色、发挥本地优势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杭州做出了“四个杭州”“四个一流”等系列重要指示，这些都是“八八战略”在杭州实践的具体要求，也是习近平总书记留给杭州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发展进程中，杭州市委市政府始终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杭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政

---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87 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9 页。

③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 年，第 412 页。

府决策部署，坚持以“八八战略”为统领，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党建引领，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坚定不移“干好一一六、当好排头兵”，统筹推进“战疫情、促发展”，加大“六稳”力度，做好“六保”工作，大力提振服务业，持续做强数字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双引擎”，拓展都市经济、幸福经济、未来经济三大新蓝海，推进新基建、新消费、新制造、新电商、新健康、新治理，着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积极探索具有杭州特点的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确保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奋力在我省打造“重要窗口”中走在前、作示范。近 20 年来，杭州全市上下以当好“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排头兵的使命担当，不断丰富和发展行之有效的实践探索，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更多的杭州素材。

“八八战略”虽然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提出的，但仍是当前杭州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理念，它既是引领杭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南针”，又是引领杭州科学发展的“宣言书”，同时也是引领杭州实践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金钥匙”，因而成为引领杭州党员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精神“动力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八八战略”潜藏着杭州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密码。

## 二、红色基因：杭州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精神密码

红色基因是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精神密码。红色基因根植于共产党人的血脉之中，成为共产党人的遗传因子。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2005 年 6 月，习近平同志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概括提出了“红船精神”，精准标注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源头坐标。凝聚起浙江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强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学习传承党的红色基因非常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调研时，到访革命纪念地，瞻仰革命纪念场所，多次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让红色江

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色。[1] 红色基因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根本动力，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灵魂指针。

赓续不绝的红色基因，是党在杭州百年奋斗历程中最鲜明的底色。红色基因是推动杭州共同富裕的精神力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需要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杭州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面对的目标是远大的、任务是繁重的，需要解决的困难矛盾问题是很多的，需要我们秉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精神，万众一心、同心协力开创发展新局面。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城市，肩负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光荣使命，在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杭州不断继承和发扬红船精神、红十三军精神、浙西南革命精神、一江山精神、大陈岛垦荒精神、萧山围垦精神、蚂蚁岛精神、海霞精神、千鹤妇女精神、南堡精神、四千精神、浙江精神以及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等。在从革命走向建设、从改革开放走向深化改革的历史大潮中，通过党建统领的整体智治体系的构建，红色基因不断内化为杭州人民的精神品质，直接促成了建设“重要窗口”的历史机遇，助力杭州跑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2]。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红色基因传承，这也是杭州高质量党建引领共推进共同富裕的精神之基。杭州市委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红色精神，推动党员、干部和群众自觉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化作基因。经过长年不懈的坚持探索，杭州在推进共同富裕的基层治理中创造出不少新思路、新方法。比如，融合党建红色阵地和惠民服务空间，高标准建成了“邻里中心”150 多个，推动党群服务矩阵向居民“家门口”延伸；坚持“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普遍建立党建引领下的社区议事协商机构，涌现出“湖滨晴雨”“红茶议事会”等协商共治平台；打造出了“老娘舅”“和事佬”“武

---

①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求是》2021 年第 10 期。

②郑莉娜：《全面小康看杭州 在党的建设上更显担当再续华章》，《杭州日报》2021 年 8 月 4 日。

林大妈”等一批高质量党建引领共同富裕的“金名片”。再比如，杭州开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改革项目，包括全面建强小区党组织、织密党群服务矩阵、深化“三方协同”治理构架、推进数智社区建设等，在下城区、拱墅区等11个区，推进小区党建、“四治融合”等18项试点任务，并在此基础上发布《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聚力赋能社区治理二十条举措》，强化社区治理的组织运行、服务供给、基层民主、多方参与、智治支撑等五大机制，努力把社区打造成为居民离不开的组织，切实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执政基础，为展现“重要窗口”头雁风采注入红色力量。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继续为红色基因增添活力，是杭州人民全力以赴追求的目标。

### 三、党的全面领导：杭州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航向密码

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也是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航向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坚实的领导力量。习近平深刻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①]。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但最终目标不等同于实现的过程。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共同富裕过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要对一定时期内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具有容忍度，也要对实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具有坚定的目标意识。因此，只有依靠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够有效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凝聚全社会关于共同富裕的共识。要依靠党的全面领导保证政策的整体性和连续性，既要做好系统推进，构建关于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要做好重点突破。新时代必须以党的建设为抓手，在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过程中带动和促进共同富裕。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以不断提高党的领

①《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58页。

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同时结合当时正在进行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现实任务和工作实践，对“共同富裕”远景目标做出了一系列深刻论述和重要部署。2002 年，他在考察调研时指出，“先富带后富，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我们的政策立场”[①]；2003 年，他在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上谈到了对浙江工作的八个认识，明确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鲜明特色。习近平特别重视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强调党是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事业实施全面领导的执政党；为民造福、走共同富裕道路也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必须以党的建设为引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强和创新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有效的市域治理能够将风险隐患解决在基层。为实现市域党的全面领导，杭州市提出了建立市域党建统领的“六和塔”工作体系目标。六和塔是杭州钱塘江畔地标性建筑，取名“六和塔”，既寄托古代传说中的六和愿景，也意蕴构建六大体系、提升六大能力：构建党的领导体系，提升党建“领和”能力；构建群防群治体系，提升社会“协和”能力；构建纠纷化解体系，提升多元“调和”能力；构建科技支撑体系，提升智慧“促和”能力；构建平安宣传体系，提升文化“育和”能力；构建依法治理体系，提升法治“守和”能力。[②] 同时，借助塔之造型，将塔尖、塔身、塔基分别与党建统领、四化支撑、三治融合相对应：塔尖是“党建统领”，强调将党的领导贯穿于市域共同富裕过程，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模范带头作用；塔身是“四化支撑”，着力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强化主体整合、队伍建设、技术支撑、法治保障等方面的整体联动；

---

①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年，第 158 页。

②刘一鸣：《杭州建设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法制日报》2018 年 10 月 8 日。

塔基是“三治融合”，促进基层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不断提升社会基层治理自我革新、自我完善、自我修复的能力和水平，夯实基层治理基础，切实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①] 由此可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了杭州迈入高水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新征程上不偏离航向。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杭州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密码**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武器，它从理论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是引领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石。关于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些科学论述为人类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和美好生活指明了前进方向。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待和科学构想。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断推进对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要性。他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始终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和研究。杭州市委以领导班子为模范，创新学习载体，积极探索和完善全员化、常态化、长效化的学习机制，大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的本领。创造性地推动杭州各项事业的新发展。

实践上升到认识，再以理论指导实践，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推进高质量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杭州十分注重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形成了对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在杭州市委领导下，全市上下不忘初心，加强思想建设；以上率下，锤炼党员队伍；固本培

①张仲灿：《杭州市构建“六和塔”社会治理体系》，《杭州》2019 年第 1 期。

元，夯实基层基础。“抓好党建是最大的政绩”，成为杭州上下的共识。杭州市委立足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实绩，突出重点，有的放矢，积极组织开展理论研究阐释，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杭州的实践，组织全市社科工作者深入持续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宣传、研究和阐释工作。杭州市委宣传部会同有关高校，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牵头举办了理论研讨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社会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讲话精神，牵头举办提振杭州消费经济、促进复工复产研讨座谈会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杭州及时总结党建理论与实践，持续加强党的建设。新时期，杭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浙江省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精神，自觉主动地扛起使命担当，纵深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快形成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相适应的党建工作新格局，实现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闯出了一条卓有成效、可供复制的党建引领发展之路。

### 五、以人民为中心：杭州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动力密码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也是习近平同志始终坚守为民情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他在《之江新语》中谈到：“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背离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些公仆就会被历史所淘汰”[①]。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回答了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的发展根本问题。他还多次强调：“必须明确经济发展不是最终目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才是终极目标”[②]。“民有所呼，我有所应”[③]。习近平强调：“我们要经常扪心自问：手中的权力是从哪

---

①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16 页。

②习近平：《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 23 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49 页。

里来的？是用来干什么的？要经常告诫自己，权力只能用来为民谋利，而不能成为牟取私利的手段”[①]。这些重要论述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始终践行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同时又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人民群众的劳动成果、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宣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强调人民作为新时代阅卷人的地位作用，“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②]他高度重视党建引领共同富裕，始终将其作为首要工作狠抓落实，通过一系列规定、措施、制度的施行，为新时代推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各项保障。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原动力，其关键在于建设服务型的政党机关。在浙江省委领导下，杭州打造“三走进三服务”活动品牌。2006 年，习近平在杭州调研时强调“各级党委、政府一定要深化认识，拓展方式，切实做好为民办实事工作”，“坚持以人为本，重民生、办实事，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最紧迫的需求”。[③]为认真贯彻习近平的指示精神及落实党的十八大作出的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部署，健全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杭州市直机关工委在认真总结既往广泛开展为民服务活动经验的基础上，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市直机关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整合力量，拓展渠道、丰富内容，深化服务的外延和内涵，前移机关服务群众的形式，组织开展大型广场、“雷锋角”、组团式等为民志愿服务，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服务，形成“工委管协调、社区管具体”和“在

---

①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260 页。

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2020 年，第 94、1、54 页。

③习近平：《落实以人为本的要求 重视民生 办好实事——在杭州市调研为民办实事工作时的讲话摘要》（2006 年 12 月 31 日），《市委办通报》【2007】1 号。

职党员自我管理、服务对象监督管理”相结合的“2+2”管理模式；完善“万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万户城乡困难家庭”和“‘1+X’结对帮扶城乡困难家庭”的杭州模式；打造了具有杭州特色的“走进社会开展志愿服务、走进社区开展贴心服务、走进家庭开展结对服务”的“三走进三服务”活动品牌。通过开展“三走进三服务”活动，建立健全了项目化、集中性、普惠式的服务群众机制；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问题，转变了机关作风，增强了机关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形成了规范化、长效化、社会化机关党员服务群众的完备体系；让人民群众得到了实惠。[①] 该活动得到了中央和浙江省直机关工委的充分肯定，人民网、新华网、《新华日报》等媒体先后对有关活动进行了宣传报道，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可以说，以人民为中心是杭州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动力密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已经融入到我们党新时代全部的奋斗实践中。

## 结 语

实现共同富裕是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加强党的质量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政治前提。回顾总结杭州高质量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八八战略”是战略密码，红色基因是精神密码，党的全面领导是航向密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理论密码，以人民为中心是动力密码。推动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决定了这一历史过程必然表现为循序渐进、接续奋斗的过程，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需要把对杭州高质量党建统领推进共同富裕的规律性认识“解码”转化为奋力前行的宝贵经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①《紫光阁》杂志社编：《建设服务型机关党组织典型案例100个》，党建读物出版，2015年，第89–92页。

# 乡村共同富裕过程中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机制及其作用

◎杨曦娥[①]

**内容提要：**浙江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面临着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双重挑战”。本文基于社会实践理论建立分析框架，选取临安上田村和指南村作为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展示两个村在实现共富过程中各种治理主体间的冲突和融合，以及其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实现共富的路径。本文对乡村治理和社会实践理论研究内容进行了拓展，同时为当前乡村如何通过提高治理能力走向共富的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会实践理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共同富裕；实现路径

## 一、引 言

浙江要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面临着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双重挑战”。要实现乡村振兴，在治理上关键是要解决村民的精神思想、村庄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重大问题和现实难题[②]。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将有助于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然而，在实现现代转型过程中，乡村治理普遍面临着经济失衡、乡规失范、

①作者简介：杨曦娥，女，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校讲师，联系电话：19884168417，邮箱：1349027898@qq.com。

②秦中春：《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目标与实现途径》，《管理世界》2020年第2期。

人才流失、文化失语等困境[①]。例如，自然禀赋差异导致村庄经济基础薄弱，人口大量流动导致原有社会关系衰退，“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问题突出。对于这些困境，单一的治理主体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乡村宗族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基层民主；基层政府因工作繁重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而陷入“无为无效”；普通村民公共意识淡薄，存在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年轻骨干外流，村组织队伍结构老化、力量虚化。那么，什么样的治理主体机制能够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呢？

本文基于社会实践理论建立分析框架，选取临安上田村和指南村作为案例进行归纳分析。展示两个村在实现共富过程中，各种治理主体间的冲突和融合，以及其对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实现共富的路径。

## 二、文献和理论

### （一）乡村治理主体作用的概述

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着多元主体并存的局面。基于乡土文化的影响，乡村宗族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直至今天，这种作用虽有弱化，但依然有着重要影响。从 1982 年开始，村民通过自治的方式解决其面临的问题，因自治能力有限，自治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而伴随村干部行政化，基层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得到加强，村民自治进一步被挤压[③]。然而，基层政府的作用也存在局限性。一方面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是农村资源匮乏，基层政府力不从心。精英治村，又称为“能人”治村，即乡村精英凭借着个人优势和资源，决策和整合乡村发展，领导和管理乡村生活[④]。当乡村精英与基层政府合作或是权力没有得到约束

---

①李金哲：《困境与路径：以新乡贤推进当代乡村治理》，《求实》2017 年第 6 期。

②Greif A.and Tabel Lini G.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Bifurcation：China and Europe Compared [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0,（100）：51−56 。

③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三联书店，2007 年，第 98 页。

④杨善华：《家族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一个分析框架》，《社会学研究》2000 年第 3 期。

时，就容易产生“精英俘获”现象[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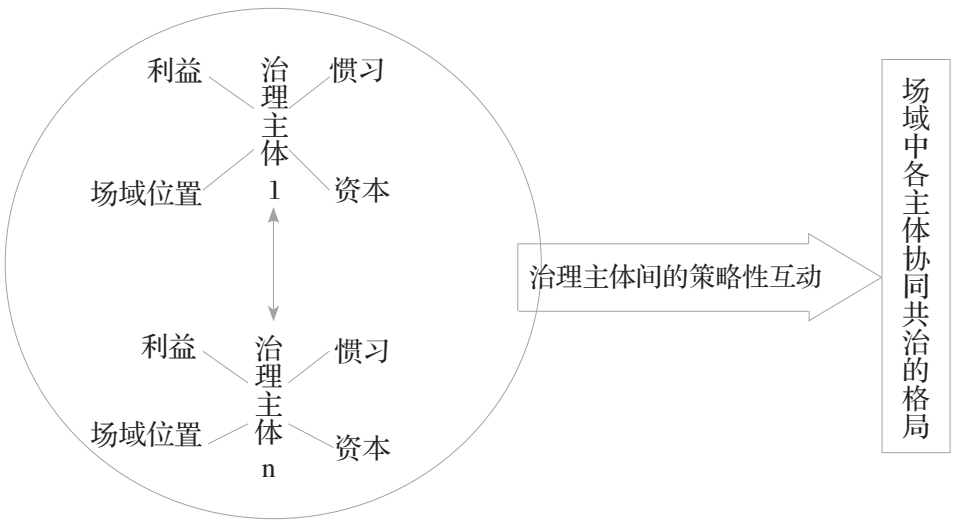
上述的这些治理主体在乡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前乡村发展的目标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治理主体机制的创新。在此背景下，研究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机制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作用是非常必要的。

（二）社会实践理论视角看乡村治理主体机制及其作用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学习和吸收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上，提出社会实践理论。“场域”“惯习”“资本”“利益”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是构成社会实践理论的重要内容和分析方法。该理论对认识乡村治理主体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依据社会实践理论研究的相关文献，各行动者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共同影响组织的决策和行为。基于此，在乡村治理的场域中，各治理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必然存在冲突和兼容的关系。

社会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图 1）




①胡联、汪三贵：《我国建档立卡面临精英俘获的挑战吗》，《管理世界》2017年第 1 期。

综上所述，乡村治理中不仅存在着多种主体，而且这些主体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同时，这些关系会随着主体在场域中的位置改变而改变，并对乡村振兴产生影响。基于社会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见图 1），本文将选取临安上田村和指南村作为典型案例，分析各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以及各主体间的关系和演化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作用。

## 三、案例选择和研究

### （一）案例选择

本文在考虑案例的典型性、稀缺性及“目的性抽样”的基础上，选择临安已实现共富的乡村作为研究对象。作为本文案例的上田村和指南村都曾被评选为“浙江省善治示范村”和“杭州市第一批共富村”，它们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实现乡村经济发展和村民收入提高，是乡村走向共富“临安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

上田村隶属于临安板桥镇，面积 10 平方千米，560 户农户，总人口 1901 人。20 世纪 70 年代，上田村以种植水稻为主，交通差村民穷，“有女不嫁上田郎，旧房泥路漫天灰”是当时上田村的真实写照。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发展竹笋业，村民生活得到改善。而到 21 世纪初，受竹笋业的生命周期限制，村民收入受影响并离开村庄外出务工。直到 2005 年，在基层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通过调整村领导班子，优化产业布局，逐步形成竹笋、茶叶、天目小香薯等为主的特色产业。同时，利用生态和文化优势，规划发展农旅、文旅融合产业，塑造了“茶香竹海、文武上田”的新形象。民风村貌得到大大改善，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村民每年人均纯收入达 3.8 万元，上田村实现了“脏乱差”到“绿富美”的蝶变。

指南村隶属于临安太湖源镇，面积 6.86 平方千米，268 户农户，总人口 742 人。过去，“指南山上山，土薄三寸三，要产三百三，堪比登天难”，村民只能通过高山造田解决吃饭问题。2002 年，在地方政府的鼓励下规划建设休闲度假村，农家乐经营兴起。很快，由于“低散乱”运营模式，生态破坏，

交通拥堵，未能形成品牌和影响力。2017 年，启动红叶指南村落景区建设，与旅游公司签约合作运营，引入运营团队，解决村庄管理运营不专业等问题，对民宿开展“瘦身运动”，提升服务品质和“含金量”，精品民宿应运而生。目前，村里共有农家乐 78 家，高端民宿 16 家，村民每年人均纯收入达 4.1 万元。“红叶指南”成为杭州旅游的一张金名片，指南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

（二）数据收集及分析

根据前期的文献梳理可知，乡村治理主体主要包含基层党委政府、村“两委”干部、乡村精英、乡村宗族、村民、市场、企业。在实地调研中，针对不同的主体进行访谈，整理形成了访谈文本资料。然后，通过临安发布、杭州日报、浙江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渠道了解案例的相关信息。同时，收集《临安年鉴》、乡村振兴展览馆的相关档案资料。为提高案例可信度，本文采取多时间节点和多种来源获取数据，对研究资料进行相互印证和补充。

本文遵循典型归纳逻辑进行数据分析①，在选取案例、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过程中，均注重提升研究的信效度。笔者在梳理上田村和指南村脱贫致富的过程，关注不同时期对乡村治理有重要影响的关键主体和事件，以此来划分不同阶段。通过对原始资料的相关数据进行归类，提取形成一阶概念，接着归类一阶概念之间的关系形成二阶主题，最后对二阶主题深入分析，反复对比原始资料提取聚合构念，形成分析本文的数据结构（表 1）。

**数据结构（表 1）**

| 一阶概念 | 二阶主题 | 聚合构念 |
|---|---|---|
| 村民收入来源于种植、思想保守，行为不文明 | 早期落后贫穷 | 面临困境 |
| 商品同质化严重，拉客低价竞争 | 恶性竞争 | |
| 村办企业经营困难，农户增收难 | 集体经济萎缩 | |
| 缺乏旅游资源和旅游活动项目 | 服务业基础匮乏 | |
| 村民外出务工，返乡年轻人少 | 难以吸引年轻人才 | |

①毛基业：《运用结构化的数据分析方法做严谨的质性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 (2019) 综述》，《管理世界》2020 年第 36 期。

| 一阶概念 | 二阶主题 | 聚合构念 |
| --- | --- | --- |
| 传承家风家训，遵循家庭孝道 | 传承传统道德 | 乡村宗族 |
| 重视宗亲和血缘关系，尊重村民主体地位 | 亲缘地缘关系 | |
| 带头人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和人格魅力 | 精英声望 | |
| 说服村民开展“五水共治”，拆除违规建筑，改善村庄环境 | 村干部积极动员 | 基层政府（及村委会） |
| 制定和执行村规民约，传承优良家风家训 | 规范村民行为 | |
| 政策引导、支持村庄发展，约束经营主体相关行为 | 政策引导、支持和约束 | |
| 村民开会商议乡村发展，大会投票选举 | 民主投票决策 | 民主决策 |
| 成立相关协会，民主推选，协商自治 | 商户民主自治 | |
| 调解村民矛盾，帮助困难村民 | 服务村民 | 基层党组织（及村党组织） |
| 树立村民主人翁意识，组织村民参与经营 | 组织村民 | |
| 书记做表率，党员做示范 | 党员带头 | |
| 定期开展“固定主题党日”，加强思想学习教育，引导村庄发展契合中央政策要求 | 思想引导 | |
| 自由买卖，拉客挣钱 | 自由交易 | 市场主体 |
| 低价竞争，相互拉客 | 市场竞争 | |
| 规划和增加旅游活动项目，丰富游客体验 | 业态补充 | |
| 利用自身资源，发展特色产业，打造品牌，提升知名度 | 提升竞争力 | |
| 现场评比公正分配，严格管控村庄业态 | 严格招商审查 | 村庄规划 |
| 聚焦生态和文化资源，打造乡村品牌 | 制定品牌策略 | |
| 改善村容村貌，最大化利用村里闲置资源 | 规划村庄空间格局 | |
| 建好员工成长的路径，激励员工留村发展 | 管理员工 | 公司主体 |
| 约束监督商户，公平公正竞争 | 约束业户 | |
| 开拓项目吸引游客，统一管理避免恶性竞争 | 统一运营 | |

| 一阶概念 | 二阶主题 | 聚合构念 |
| --- | --- | --- |
| 土地扭转到公司，村民自愿入股，村集体资源入股新项目 | 明晰产权 | 股份合作 |
| 村集体资产按比例分配，收入分配一户一策 | 利益分成 | |
| 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双提升” | 收入提升 | 提升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
| 扩大产业链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就业 | 帮扶周边村民 | |
| 优质项目集资入股，补贴低收入农户 | 调节商户收入 | |
| 建设村文化礼堂，村民集体荣誉感提升 | 道德素养提升 | 促进乡风文明 |
| 村容村貌大大改善，山青水绿，环境优美 | 生态环境改善 | |
| 公司与村民相互依赖，村民信任村干部，游交信任村民 | 互惠互信 | |
| 村民生活满足，满意度高 | 幸福感高 | |
| 商户进行创业和行业学习，掌握新技能 | 文化素养提升 | |

## 四、乡村走向共富中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逻辑与发展历程

### （一）乡村走向共富中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逻辑

通过调研和分析可知，在走向共富过程中，上田村和指南村的乡村宗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乡村宗族礼法以及亲缘地缘的关系，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受道德和家族等条件约束。而村民自治在执行中也遵循村规民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乡村宗族治理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上田村通过举办新人礼、启蒙礼、成人礼、孝老礼等方式树立好家风，引导村民行为，打造乡风文明新气象。另外，与文献研究相似的，乡村宗族治理也存在负面影响①。比如指南村进行村庄规划时，需拆除违规建筑，村干部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就遭遇宗族阻力，最终只能依靠村规民约和民主决策来解决问题。同时，乡村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基于个人的威望和能力等因素，对两个村的发展也起了积极

①吕萍、胡元瑞：《人情式政策动员：宗族型村庄中的国家基层治理逻辑——基于江西省余江县宅改案例的分析》，《公共管理学报》2020 年第 3 期。

的带头作用。

在乡村治理中，基层政府关注的重点是整个区域和公共事业的发展，它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影响乡村发展。在上田村和指南村，基层政府通过“五水共治”“五气共治”、三改一拆、美丽公路、垃圾分类、生态文明创建等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促进乡村公共事业发展。虽然国家政策的传达能够对乡村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是如果仅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村庄发展和村民自治[①]。此外，除了政策上的影响，基层政府还通过村民选举和村规民约等方式约束村民行为，以有效提升乡村精神文明。

基层党组织作为上田村和指南村的政治、组织和资源中心，在其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领头雁”的作用。2017 年修订的《党章》明确指出，村党组织领导本地区社会治理，支持和保证行政组织、经济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充分行使职权。2018 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村党组织的职责，要努力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在上田村和指南村，村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组织、宣传、凝聚、服务村民的策略，有效落实党的思想、法规和政策，提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工作水平。

以上田村和指南村商户为代表的市场主体，在乡村治理中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指南村引出市场主体初期，各商户相互竞争，农家乐的经营项目和商铺的农特产品同质化严重，游客体验感变差，乡村的美誉度受影响。通过买卖自由和相互竞争，市场主体追逐利益最大化破坏了原本和谐的宗亲关系和邻里关系，与内生的乡村宗族治理形成冲突。

为解决这一矛盾，两个村都引入了专业运营公司，补充新业态，对乡村进行整体规划，最大限度激活乡村闲置资源，积极开展乡村品牌建设，保护村集体利益，尽可能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与市场主体相比，运营公司分别以股份合作和雇佣关系的方式，约束商户和管理员工，从而使得市场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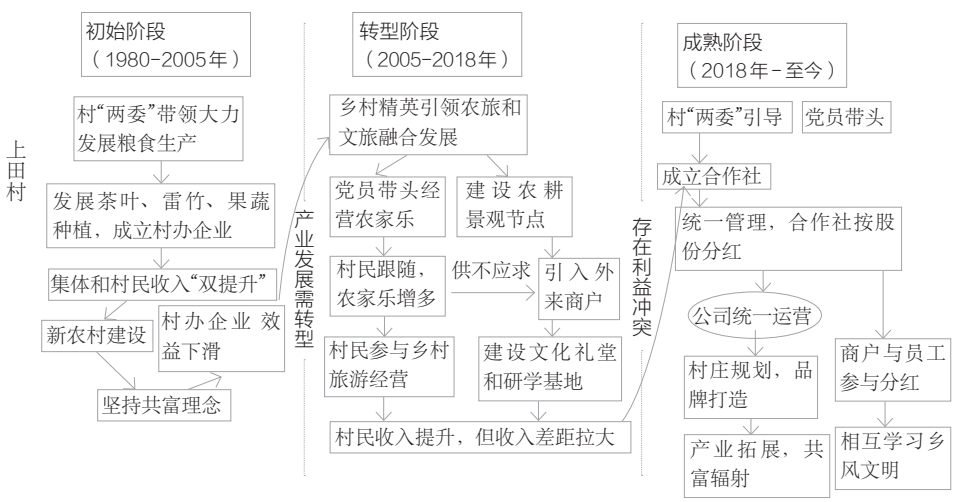
①马华、村治实验：《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样态及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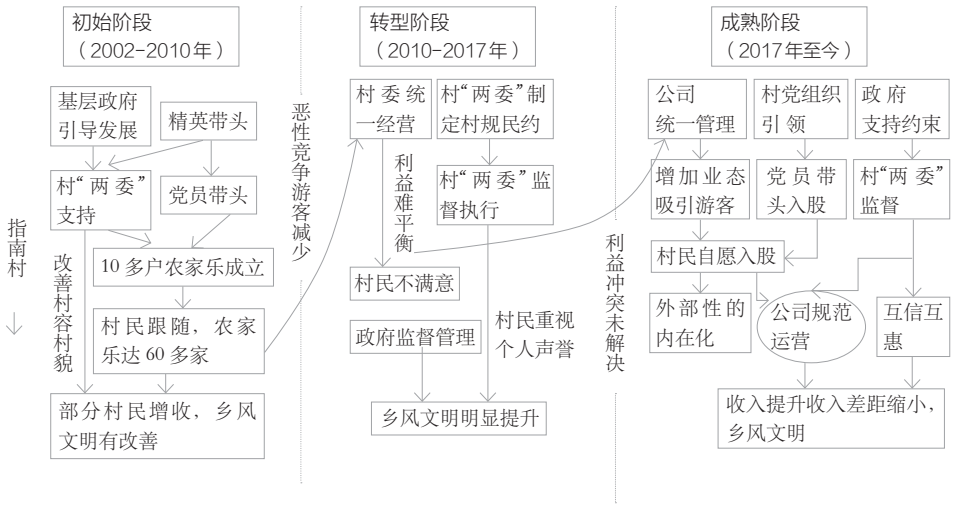
和公司主体能够在乡村治理中并存。

（二）乡村走向共富中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发展历程

在走向共富的过程中，上田村和指南村在不同发展阶段遭遇了不同的困境。1980 年以来，上田村经历了从发展种植业、种植业加工，到转向发展农旅、文旅融合产业，再到变革发展农村合作股份制，乡村治理主体也因此而发生变化。依据其治理主体的演变，将上田村走向共富的历程划分为初始阶段（1980–2005 年）、转型阶段（2005–2018 年）和成熟阶段（2018 年 – 至今）。2005 年开始，上田村潘曙龙被选任为村委主任，通过土地流转成立茶叶合作社，年产值超过千万，实现村民增收。2018 年，开始打造“文武上田”村落景区，随后文武上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为上田农旅和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上田村不同，指南村自 2010 年以来，经历了转型发展农家乐的乡村旅游业和公司统一运营的变革，乡村治理主体也随之发生变化。笔者将指南村治理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初始阶段（2002–2010 年）、转型阶段（2010–2017 年）、成熟阶段（2017 年 – 至今）。图 2 为两个案例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历程图。

**上田村和指南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历程（图 2）**






1. 两村发展历程中多元主体协同共治逻辑的相似点

在上田村和指南村的治理过程中，基层党组织服务、组织和凝聚村民，加强对村民的引领作用，推动了多种治理主体的演化并存。基层政府也通过政策影响和民主决策，推进其与其他治理主体协同并存。在上田村发展的初始阶段，在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主导下，村民大力发展种植业和种植业加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类似的，在指南村的发展初期，也是在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主导下，“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项目有效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初显成效。

在走向共富的历程中，上田村和指南村都引入了市场及公司主体。它们通过村庄规划、业态补充和股份合作制等方式，实现了市场、公司与其他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的场域中融合并存。在这个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共存策略也进行了调整，整个乡村治理的主体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尽管是在不同时期，面临不同困境，两个村治理各主体引进的契机和并存的局面不同，但是其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逻辑内涵是相似的，对乡村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也是接近的。

2. 两村发展历程中多元主体协同共治逻辑的差异性

引入市场和公司的时期不同。指南村在发展初期，即2002年开始发展农

家乐，游客进入村庄就开始引进市场。直到 2017 年，开始专业化运营才引进公司。与指南村不同，上田村初期是通过发展种植业和种植业加工，增加农民收入的。村民被雇佣到村办企业获取工资收入，此时公司治理主体已进入上田村。到 2017 年，上田村要融合农旅和文旅产业发展，才将市场治理主体引进村庄。

引入市场和公司的情境不同。上田村和指南村因发展乡村旅游引进了市场，但是指南村的农家乐在初期是处于恶性竞争的状态，而上田村有意识地进行发展规划，发展初期农家乐之间的市场竞争没有充分显现。同时，指南村是在总结失败经验基础上，为解决商户间利益冲突，实现村庄资源的有效利用，才引进运营公司的。而上田村引进公司是在发展初期开办村企时，而后期发展是基于共富的目的。

两个案例地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演化中，对共富的推动作用也不同。指南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演化，在成熟阶段实现了乡风文明、村民增收、初步辐射周边村民收入提高。而上田村在初期就普遍提高了村民收入，在后期的发展中村企吸纳了更多人就业，进一步扩大了共富的影响。

## 五、社会实践理论视角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体系演化及乡村振兴

乡村走向共富的过程是各主体相互协作、共同推进发展的治理过程。外生主体在进入初期，因不适而对乡村治理发挥的促进作用存在有限性。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村“两委”及乡村精英对过去的发展不断进行反思和调整，寻找有效路径解决问题，最终使得各主体能融洽的在乡村治理的场域中并存，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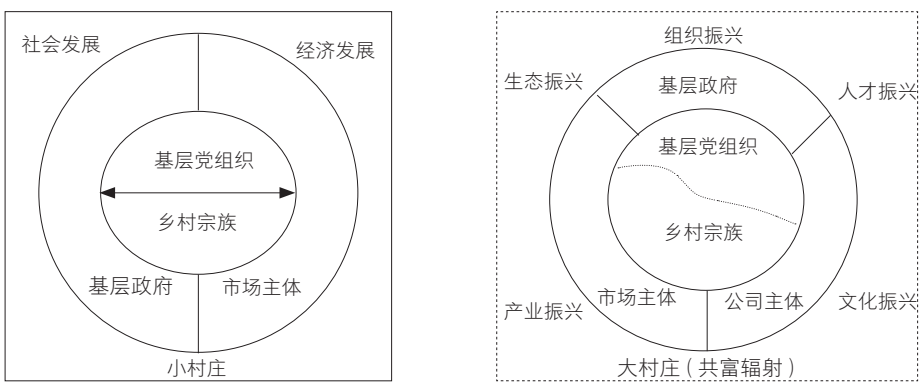
上田村和指南村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受不同治理主体的影响，面临的困境和采取的策略也不同。在发展初期，两个案例村都以村“两委”为治理主体，而基层党委政府和乡村宗族共同发挥作用。同时，通过加强党的领导和民主决策不断提升了村“两委”的决策水平，随后引入市场主体。市场主体进入乡村，对乡村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与其他主体在乡村治理的场域中形成一定的格局（如图 3 左边）。然而，受市场自由竞争属性的影响，

新问题表现为：指南村农家乐出现内部恶性竞争，乡村旅游业发展受阻；而上田村则经历发展瓶颈，种植业转型困难。指南村村“两委”试图用统一管理来解决问题，但是基层政府、市场主体和乡村宗族之间没能形成融合，问题依然存在。上田村则进行发展转型，依靠农旅和文旅融合发展，市场主体的进入也产生了利益竞争的问题。经反思和调整，两个案例村都通过村庄规划、新业态补充、股份合作等行动策略，实现了乡村宗族和市场主体、公司主体并存，最终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如图3右边），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并实现共同富裕。

通过对上田村和指南村发展历程的分析可知，乡村在走向共富的过程中，乡村宗族、村“两委”、村民、基层党委政府、公司、市场同时发挥作用。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对村民进行价值引领，激发其勤劳致富的内生动力；同时引领乡村突破发展瓶颈，促进产业转型发展。此外，研究还发现乡村治理主体具有一定的能动性。比如，基层政府通过民主自治，保障村民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打破边界促进多种治理主体融合并存；市场主体进入对乡村发展带来负面作用时，村“两委”通过反思和调整，提出引进专业运营公司解决产业发展问题。

综上所述，两个案例村走向共富是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作用下，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基层政府的民主决策、公司和市场的村庄规划、业态补充及股份合作为重要行动策略，最终实现了村民增收、村风文明、村庄高质量发展，并不断扩大其辐射作用的过程。

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动态演化及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图3）



## 六、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临安区上田村和指南村作为案例进行归纳分析，较为详细地展示了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在乡村走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及其作用。通过对调研资料的整理和归纳，提炼出分析本文的聚合构念。在此基础上，展现了乡村走向共富三个阶段的演进历程，然后对各阶段的主体要素进行分析阐释。本研究对乡村治理和社会实践理论研究内容进行了拓展，同时为当前乡村如何通过提高治理能力走向共富的提供借鉴，具体而言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牢牢抓好村党组织建设。本研究指出村党组织在乡村治理和发展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这不仅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基础，也是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工作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组织保证”的重要精神，也符合省、市委关于大力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程”推动基层党建工作质量整体跃升的工作部署要求，说明乡村要实现共富必须牢牢抓好村党组织建设。以上田村为例，上田村党组织被评为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上田村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浙江省文明村、浙江省双强百佳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实现了乡村环境面貌和村民的精神面貌“两个焕然一新”，“上田现象”社会影响日益扩大，这充分彰显了高质量党建凝聚乡村治理合力、引领乡村全面振兴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是优化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乡村走向共富，要重视内生主体和外生主体的融合发展，积极探索建立基层党委政府、村“两委”、村民、公司、市场、游客、新型社会组织等多方参与共治的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村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促进其与乡村宗族的深度融合，实现基层政府、市场主体和公司主体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和谐并存。健全和规范民主决策机制，有效解决基层政府与乡村宗族间的冲突。市场主体和运营公司利用专业、平台和人才等优势，因地制宜地进行村庄规划和项目引进，努力形成乡村发展的特色品牌，保持产业兴旺的长期竞争力，实现乡村宗族与运营公司、市场主体的分层融合。

三是着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2021 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单一的物质生活富裕，而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因此，

乡村走向共同富裕，要物质和精神“两手抓”、村民收入和乡村文明“双提升”，这也回应了关于乡村治理要解决村民精神思想、村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现实难题的呼吁。上田村和指南村定期开展固定主题党日活动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建立行业协会组织村民进行交流学习、邀请专业人士开展服务业宣传教育，提升村民的思想认识和专业技能；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完善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村集体居家养老项目，乡村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同时，上田村和指南村严格执行家风家训、村规民约，挖掘传承与本村发展历史相契合的传统文化，向村民灌输勤劳致富、与人为善的思想理念，乡村氛围良好，游客口碑持续上升，有效解决社会管理问题。

四是夯实乡村共富人才基石。2006 年上田村成立乡贤参事会，广泛凝聚正能量参与乡村治理。在调研中，指南村书记邵华锋说：“村里农家乐和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都是年轻人，他们有思想、有活力、有干劲。”上田村和指南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了村民共富，离不开大量的人才支撑，尤其是有学历、有能力、有见识的年轻人的支撑。因此，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说明乡村走向共富，也必须做好人才振兴这篇大文章。积极推进“两进两回”“双招双引”等政策的落地实施，引导科技、资源等要素流向农村，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乡村建设事业来。

# 杭州共同富裕模式创新：生态效应转向价值链效益的模式探究

◎孙　丽[①]

**内容提要：**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融汇了浙江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浙江精神驱动下的生态效应转向价值链的生态发展模式。杭州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样板，率先在全国实现了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本文研究从生态文明的转向视角，将研究目光瞄准了生态效应与价值链效益的和谐统一层面上来，试图通过对杭州共同富裕模式创新研究，为共同富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价值链融合构建提出一些战略性的思考。

**关键词：**共同富裕；生态效应；价值链；宜居天堂

生态效应转向价值链利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深度挖掘了杭州的生态资源，借助生态文明建设的“东风”，整合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政策红利，促使杭州共同富裕模式得以全方位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关乎杭州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杭州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价值输出机制。因而，本文研究以构建主义和批判主义的视角，宏观、中观、微观分析杭州共同富裕模式创新，既是立足于生态价值链层面构建的严谨思考，也是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优化共同富裕与生态文明之间应然性的基本体现，更是共同富裕价值输出视角的样板效应和示范作用的具体表征。

①作者简介：孙丽，女，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联系电话：13429161022

## 一、生态效应驱动下的共同富裕价值表征

共同富裕是共同和富裕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共同用来诠释富裕目标实现的范畴，它能调节私有制导致的两极分化，主张富裕目标实现的运行机理[①]。富裕则是用来表征生活丰裕的程度，它存在相对性，共同富裕就是消除两极分化和消灭贫穷的基础上实现普遍富裕。生态效应也具有两面性[②]。一方面，生态效应是要通过群众生产生活，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行统一的布局，以递进的方式实现生态环境、生态资源、生态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循环机制，从而创新共同富裕目标的自然、社会和合理性。另一方面，生态效应具有一定的物化，不仅指青山绿水的资源禀赋，而且要通过生态资源禀赋影响，创新生产方式，改善生产关系，根本上改变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结合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生态效应的价值表征则充分体现了生态资源禀赋的高度利用，创新经济发展模式和创造社会化财富中，生态效应高度代表了共同富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契合，并将这种契合以价值机制、价值战略和价值输出机制为条线，表现为更广泛的社会价值，从而对共同富裕实现科学的价值驱动。

2021 年，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落地浙江，杭州作为浙江的经济重镇，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领军力量。同时，杭州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战略和新方针当做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内核特征，有机融通了生态文明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战略机制，将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创新转化为示范区的价值链输出模式。首先，生态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努力探索生态完备与经济发展、资源丰富与社会进步、产业发达与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相互促进的过程中，以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目标，大力发展生态型主导产业，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工业经济发展，走依托科技创新、延长产业链条、降低资源消耗、优化生态环境的绿色工业化道路[③]。杭州采用

---

①罗湘明，《和谐社会建设中思想政治工作功能拓展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南大学，2012 年。

②陈正伟、郑建华：《人民币等效用测度及应用》，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 年。

③高红贵：《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论》，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5 年。

了数字高地建设、海绵城市建设、智慧能源大脑建设等科学有效的策略，构建了科学发展与资源环境相适宜的接续和替代产业。其次，绿色产业赋能强基战略。生态文明视阈下，杭州力主绿色导向的产业结构创新，节能减耗、绿色生产成为推动杭州发展的内生动力。杭州城市经济、县域经济和区域经济全力支持绿色导向的新技术、新业态发展同时，集聚生态资源创新要素，构建了产业链的创新体系，发展绿色产业，打造绿色经济模式，尤其是在发展思路、观念和价值转变的语境下，整体推进、综合施策、标本兼治，有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并引进和培育了战略机制驱动下的新兴产业，重塑高效、绿色、生态的产业结构。有效地通过绿色赋能产业根基的手段，促进杭州的样板效应通过生态赋能的方式，实现了产业结构持续性战略转型的目标。再次，生态赋能宜居天堂战略。生态赋能视角下的宜居天堂建设，实现了城市、乡村、区县的生态化发展，创新了生态效应的引领机制。杭州从“千万工程”到“美丽城镇”“美丽乡村”“美丽杭州”的视角实现了农村到城市的生态化发展，因地制宜不断塑造绿色空间，厘清绿色发展的思路、观念和价值链，全面推进“数智杭州，宜居天堂”的建设，为全国的城市建设和城镇建设提供“杭州样板”。

杭州共同富裕模式创新，实现了生态效应驱动共同富裕生态价值现实表征。一方面勾勒出了“生态转向价值”、“价值突破转向价值输出”、“生态效应转向样板效应”的共同富裕生态图谱，另一方面，实现了“生态－文明－文化－价值”的循环机制构建目标，通过示范区样板效应，将生态效益与价值链效益之间的转向，转化为基于价值链视角下价值突破到价值输出的生态模式。

## 二、价值链利益影响下生态效应驱动机理

构建生态价值突破产业结构价值、继而转向价值链的生态表征，再通过生态表征，生动践行共同富裕示范区样板效应和价值，既体现了杭州生态效应发展的演化路径，也生动诠释了杭州生态发展融合共同富裕生态价值链的科学本质。

生态价值链影响下，杭州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充分发挥了样板作用，形成了生态效应让渡到样板效应的循环模式，以循环链式为端口，本文研究探索了价值链利益影响下生态效应的驱动机理。首先，生态发展优先机理。生态发展优先阐明了杭州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交互为具有示范、引领和样板作用的优势导向。一方面，杭州通过生态产业化的布局，将生态文明嵌入到产业经济的循环发展中，创新了生态效应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合理驱动作用，并突破了生态价值的桎梏，将其价值拓宽到各个领域，实现了“杭州样板”由生态资源到经济发展方式的驱动。另一方面，杭州致力于打造“数智杭州·宜居天堂”的生态发展模式，无论从产业结构布局，还是数字经济的深度渗透，乃至影响民众生活和消费的服务行业，生态发展优先理念以其特殊的让渡方式，促进生态驱动价值让渡，丰富了杭州共同示范区建设的内涵，并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样板效应。基于样板效应和生态效应的叠加，杭州共同富裕模式创新不仅彰显了方式、方法和策略的创新，还实现了价值层面的突破、传感、影响和输出的目标，切实使杭州的样板效应和生态效应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得以价值回归。其次，生态效应循环机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了著名的“两山”理论，随着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持续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理念得到了生动践行。一方面，生态效应驱动下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既体现了杭州生态效应的内卷性，又体现了其外向型。生态效应的循环机制促进产业经济循环发展，并保持了高质量持续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内外循环模式的深度契合。产业西迁促使落后产能、高消耗产能，有序西迁实现了生态效应的落地生根，并形成了稳健的产业输出。以内卷性巩固发展并增长的产业，如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和互联网金融等在扩大内需层面达到了一定体量的增长，在生态价值层面突破了传统的生态型产业的价值，内外兼修地实现了价值链构建的基础熔铸。此外，价值链构建，改善了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产业经济均衡发展以及“数智杭州·宜居天堂”的价值取向，更合理地将价值输出机制转化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生态价值效

应。链式上的所有资源禀赋不仅相互交叉影响、叠加均衡、链式循环，而且实现了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有效地维护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生态效应和样板效应的正向性。再次，生态经济共振机理。生态经济的原理将生态学原理贯穿到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产业生态化是依据生态学原理，运用生态、经济规律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经营传统产业，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资源利用率最优、生态环境损害最小等多层次目标①。基于生态驱动价值层面的思考，杭州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生态经济不仅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自性发展目标，而且也从生产、市场和消费等领域实现了全过程的生态化，生态资源禀赋配置和谐化，生态资产再造功能被激活，从而使生态经济由经济目标最大化转变为可持续发展力。其间，生态经济的共振机理非常显著。一方面，生态经济交互与各个行业、领域的关键节点，生态效应对经济活动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既存在一定规模的驱动影响，而且也在目标层面实现了共振。另一方面，基于共同富裕视角下的生态经济，其价值驱动能力本身围绕共同富裕这个中心化实现了合理驱动。显然，这种驱动模式体现了生态效应最优，也体现了生态效应在任何一个环节对共同富裕这一中心化的共振和维护。最后，生态文明驱动机理。杭州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全面补齐生态环境短板、建立长效治理机制，高标准推进了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建设美丽杭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率先进入了快车道，成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窗口。生态文明驱动下的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杭州的生态治理策略、生态发展理念、生态经济模式以及生态产业化实践，均指向了对全国的示范作用，因而构建生态价值链，以链式效益的影响机理，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的效益机理，正是杭州样板效应和生态效应的真实写照，更是生态效应转向价值链效益发展模式的价值突破。

①高红贵：《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思考》，《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13 年。

## 三、共同富裕驱动生态文明建设内涵分析

共同富裕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杭州样板”的内核，也是生态视角下共同富裕观的升级形态，全面富裕、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富裕和人民共同体富裕其实更是一种生态化的表征。共同富裕驱动生态文明建设内涵，不仅囊括了如何富裕，还应当体现其生态效应，产业结构生态化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如何在多层次分配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内涵，这种生态效应虽然有一定局限性，但是其意义却较为广泛。我们知道共同富裕的要义在于共同，富裕的界定不仅是物质的，而且也是精神的，随着精神形态的认知改观，共同富裕最终演变为一种文明。所以，共同富裕驱动生态文明建设，更接近一种战略价值的形态改造，而影响这一改造过程的恰恰是文明。

首先，生态文明驱动共同富裕的“生态－心态”。“生态－心态”转向，包括了个体差异与群体需求的差异，生态文明驱动共同富裕的最终诉求，是由生态的多层次目标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影响行为的心态则决定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效率。辩证唯物论的视角考察共同富裕的需求，物质和精神的富裕均不能完全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而是要通过心态的调整，促使人的认知、观念和价值与共同富裕的形式形态形成契合，才能完全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杭州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共同富裕模式创新和传感影响，不仅要建立在对生态文明的认同和理念落地中，还应当将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突破转变为样板效应承载的内容，其中心态的构建、认知和从众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次，生态文明驱动共同富裕的“形态－行为”。共同富裕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形态，生态文明驱动下的形态需要通过精神传导、行为影响和文化认同以及价值契合刺激人的行为，满足了人的双重需求时，人的行为才能构成对共同富裕模式的回馈。杭州共同富裕模式创新则恰当地体现了意识形态到担当行为的过渡，促使生态文明和共同富裕模式耦合，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生态效应与人本思想的整合，从而促进共同富裕的文化影响了生态效应和样板价值。再次，生态文明驱动共同富裕的“文化－文明”。共同富裕文化是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结合体，文化到文明的转向则代表了共同富裕不仅是生态

价值的表征，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表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征，而且也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的一种反思。因此，生态文明驱动下的共同富裕是生态效应，全体人民富裕是生态效应的文化表征，而人民共同体富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杭州共同富裕模式创新，表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生动践行了共同富裕文明的内涵，完成了共同富裕模式中“生态－心态－形态－行为－文化－文明”的价值突破，形成了生态价值链，考量生态价值链的标准，生态效应固然重要，但是价值链利益更关键。

## 四、生态效应转向价值链利益的共同富裕模式构建思考

基于杭州共同富裕模式创新的现状，本文研究从更宽泛的视角，提出了生态效应转向价值链利益的共同富裕模式构建思考。

### （一）理性均衡共同富裕价值创新目标

共同富裕模式构建中，最值得商榷的问题就是处理好共同和富裕的关系。生态效应驱动下，共同贴合生态目标，富裕凸显两者的价值，因此妥善处理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均衡非常关键。基于杭州共同富裕模式创新出发，本文研究认为：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创新，要将共同扩大至全体人民，甚至人民共同体，保证共同富裕的目标范畴达到最优。共同富裕的富裕价值则是要在物质、精神双元目标的基础上，演化为以物质和精神相融合的生态文明为抓手，推动“生态－心态－形态－行为－文化－文明”的链式最优模式。诚然，这种生态价值链能够均衡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免发生倾斜。共同富裕的内涵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劫富济贫，而是要通过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利用，以认同、认知、归属以及价值肯定的心态作为参与共同富裕模式构建的基本心理预期，而后通过将生态资源利用和心态构建、修正升级为个体的意识形态，并促使这种和而不同的意识形态转化为创富行为，在共同富裕模式构建中勇于担当、实干图强。秉承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创新共同富裕的文化价值目标和文化发展能力，最终将文化影响与生态的影响程度整合为文明。也就是说，“生态－心态－形态－行为－文化－文明”既具有链式的发展优势，又存在合理的循

环模式，能够催生共同富裕的生态价值更合理地满足群众的文明需求。

（二）深入考察共同富裕价值链的效益

共同富裕的生态价值链利益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共同富裕的生态最优化则是实现全体人民富裕和人民共同体的共同富裕。趋向于物质评价的价值链利益以经济利益的目标实现为核心价值，考察经济利益的规模则需要评价群众的收益，群众的福利待遇和获得再次分配的机会。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精神层面最优则是要实现生态文明视阈下的价值认同、价值肯定以及价值发散，也可理解为一种社会利益，既保障了群体或者个体的精神目标实现，而且也能够通过一定的精神影响，创新生态文明的效益机理，促使精神层面柔性效益和社会利益产生高度契合，转而成为一种生态链价值利益的具体体现。构建共同富裕模式，应当将杭州模式创新作为基础的切入点，并考察共同富裕的价值突破节点，构建全新的价值体系，促使价值输出机制转向内源性。一方面，要将价值链利益的柔性节点评价标准提升为可视的，具有一定场景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纵向梳理生态价值链的社会利益，切实围绕社会责任感、第三次分配、人民共同体的富裕和文明做好文章。此外，价值链的利益还应当兼顾当地的文化、政治、经济、民族、地域特征等因素，要充分考虑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多元结合，并促进这种价值链的兼顾机制能够产生多样性的影响，以适应不同条件下的共同富裕模式构建。

（三）样板效应视阈下价值权重为导向

“杭州样板”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战略引领作用，也更生动地展现了杭州充分利用生态资源禀赋的价值取向。然而，在样板效应视阈下，价值权重的选择非常关键。在构建共同富裕模式中，一方面要关注本土的实际情况，不能一刀切，更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细分样板效应对应本土的短板，要将资源短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缺陷理顺，充分调动资源禀赋，运用生态化的手段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价值权重的配置问题。价值权重在这里体现为：共同富裕模式构建与发展的矛盾梳理，发展与生态文明的矛盾梳理，共同富裕文化与生态文明的矛盾梳理。在实践中，应当将价值的突破作为共

同富裕模式构建的核心，并促使价值突破能够形成共同富裕模式孵化之外的价值产品，对下辖的县区、乡镇具有价值输出的功能。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环境优势、政策优势和文化优势，借力造势实现共同富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合，创新价值链构建，以生态资源禀赋为创新基础，构建适应于本土，又具有本土特色生态价值链构建。

（四）基于文明形态共同富裕模式再造

文明形态的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最高级形态，是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的最高层级。本文研究认为：基于文明形态的生态效应，参照“杭州样板”样板效应的经验和模式，全面创新构建共同富裕的内涵，不仅要将共同富裕目标范畴界定科学，而且要在结果诉求中，体现全体人民。在价值链构建中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思维和视角，对人民共同体的共同富裕给予价值肯定。游离于生态文明和共同富裕之间的价值链集中了生态效应的诉求过程，也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为此，构建文明形态下的共同富裕模式，不是照搬某个地方的经验，实现定向的生态效应突破或者价值趋附，而是要将价值目标与生态价值链深度融合，创新共同富裕的最优生态形式。

（五）精神孕育共同富裕价值输出机制

共同富裕价值输出绝非一日之寒，“杭州样板”之所以能够产生样板效应，浙江精神在背后的支撑作用功不可没。浙江精神与生态文明建设一脉相承，两者虽有差异，但是对共同富裕示范区落地浙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G20 杭州峰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精神再次做了 12 字概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浙江精神不仅成为了杭州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的座右铭，而且也成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行为准则。样板效应下的共同富裕模式创新，尽管离不开浙江精神的影响，但是，可以通过创新地域文化、地域精神和地域文明，提升共同富裕生态价值链价值输出的标准。本文研究认为，共同富裕模式构建中，应当正确对待地方人文资源、人文环境、生态驱动和生态效应，坚持统筹兼顾，有效创新区域精神的价值突破能力，促使价值目标转向价值产品，从而实现价值输出的目的。

（六）共同富裕生态效应创新模式重构

共同富裕的生态效应与共同富裕模式构建中的生态效应是不一样的。共同富裕生态效应是基于杭州样板的样板效应而提出的，在构建共同富裕模式实践中，生态效应重构除了注重生态环境、生态资源禀赋和生态文明建设之外，还应当注重模式构建中，生态效能的效应重构。所谓的生态效能则是指在实践中，要将共同富裕目标生态化，共同富裕的路径生态化，共同富裕的产业模式生态化。不仅如此，行为、理念、精神、心态、形态、文化、文明、产业结构、价值观、认同感以及归属感均要实现生态化。生态化聚集效应能够产生一定的规模影响，更能产生要素之间的共振，这种要素之间的共振就是共同富裕生态价值链的全要素共振，而嵌入其中的生态价值链利益则是生态效应与样板效应的深层次博弈。诚然，置身样板效应之外的价值链效益比较，其诉求目标必然是共同富裕。所以，共同富裕模式构建中的生态效应创新模式重构目标尽管同而不和，但是最终的目标还是一致的。

# 赓续红巷精神赋能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

◎高明明　刘　毅[①]

**内容提要：**2012 年 9 月，以“敢为天下先，甘做孺子牛”为核心内涵的红巷精神在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90 周年座谈会上发布。红巷精神是杭州百年奋斗史的精神源头，是完成第一个百年建设站稳脚跟、勇立潮头的坚强根基。第二个百年建设已经开启，特别是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两个先行”的关键期，红巷精神仍具有不可替代、不可估量的精神价值作用。本文以红巷精神的起源地——上城区为主要切入口，拟从红巷精神的价值内涵与现实价值、赓续红巷精神为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提供不竭动力，以及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高潮中，上城区如何发挥独特优势，赓续红巷精神，赋能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提出路径思考与分析。

**关键词：**红巷精神；“敢为天下先”；“甘做孺子牛”；共同富裕典范城区

2012 年 9 月，中共杭州市委和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纪念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90 周年座谈会，会上由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坤明发布了以“敢为天下先，甘做孺子牛”为核心内涵的红巷精神。红巷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代杭州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百年实践中，一路敢为人先、披荆斩棘，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创造出来的。

---

①作者简介：高明明，中共杭州市上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红色资源利用科科长，联系电话：19511269002；刘毅，中共杭州市上城区委党史研究室方志科科长，联系电话：15958031949。

作为红巷精神的起源地、提炼地、实践地，上城责无旁贷肩负着赓续红巷精神的初心与使命。2022 年正值中共杭州小组成立 100 周年、红巷精神发布十周年，也是上城全面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开局起步之年。在这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关键期，赓续红色基因，发挥红巷精神的动力支撑作用，赋能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一、红巷精神历久弥新

红巷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红船精神一脉相承，其本质内涵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敢为天下先”的开创、探索、创新精神和“甘做孺子牛”的为民、奉献、实干精神。杭州百年发展之所以能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艰巨任务，红巷精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第二个百年建设已经开启，红巷精神并没有过时，不应淡化弱化。相反，红巷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永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 （一）红巷精神彰显“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

20 世纪初，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战斗洗礼，浙籍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陈望道、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茅盾）、沈泽民、沈玄庐等一批浙籍先进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他们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是中共创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集中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部分党员也开始注意农民运动。浙籍先进知识分子最先自觉走上与现代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道路，1921 年 9 月爆发的萧山衙前农民运动，被称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迅速在各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杭州是全国最早有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城市之一，徐梅坤、于树德、金佛庄、沈干城 4 名党员于 1922 年 9 月初在皮市巷 3 号成立浙江省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中共杭州小组，开辟了浙江红色新天地。杭州成为全国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城市之一。中共杭州地方党组织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中，红巷精神应运而生。从诞生之日起，红巷精神就彰显出“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尤其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期间，体现出革命者不怕牺牲、寻求真理、救亡图存的开拓品质，是杭州的精神之源、使命之源、力量之源。

（二）红巷精神镌刻“甘做孺子牛”的奉献精神

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们在白色恐怖下坚守信仰、流血牺牲，在枪林弹雨中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中共杭州小组创建者金佛庄、沈干城；杭州党组织负责人安体诚、贺威圣、郑馨、曹素民等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人民革命事业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杭州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杭州人民满怀激情，克服困难，大刀阔斧开始建设新杭州；并时刻与民族同命运，满腔热血投身国家建设。1955 年 10 月，“两弹一星”之父钱学森怀着科学救国、振兴中华的执着信念，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怀抱，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钱学森尽其一生阐述了不顾个人安危、冲破重重阻力，勇挑重担的红巷精神品质。1958 年毛主席亲临小营巷，对小营巷的爱国卫生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64 年来，小营巷社区持续发扬爱国卫生运动精神，勤勉工作、务实为民，多次被评为爱国卫生先进，2021 年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筑起基层社区党建工作的新高地。疫情发生以来，杭州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2022 年疫情起伏反复，上城以最快速度、最小代价连续成功控制 9 轮本土疫情，高度诠释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红巷精神。“甘做孺子牛”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与使命的具体体现，百年征途中尽显无产阶级革命先驱鞠躬尽瘁的牺牲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情怀、基层党员干部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形成红巷精神最鲜明的政治品质。

（三）红巷精神永葆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红巷精神诞生后并非一成不变，它在近代以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革命风潮中萌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敢闯敢试中逐渐升华，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搏击前行，在新时代奋力推行“两个先行”的争先进位中不断成熟。1949 年 5 月 3 日杭州解放；8 月 27 日至 29 日，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提出团结一切力量建设新杭州的目标；10 月 23 日，

上羊市街率先废除保甲制，诞生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一个完全新式的人民政权系统开始形成。1991 年，娃哈哈“大鱼吃小鱼”兼并杭州罐头食品厂，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留下重要一笔，对全国整个国有企业的改革产生突破性影响；1994 年万向集团所属“万向钱潮”(000559)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进入新时代，杭州持续打造数字动力引擎，在电子商务服务、云计算能力、第三方支付能力等方面全球领先，数字发展、数字治理指数居全国城市首位；2020 年杭州在全国首创健康码防疫措施，为公共风险的国家治理提供地方创新举措；上城区率先将城市大脑应用于基层治理实践，“湖滨街区智慧治理”场景在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杭州时现场展示。百年峥嵘，红巷精神从来没有过时，反而越发熠熠生辉。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征程中，赓续红巷精神仍是时代之声。

## 二、赓续红巷精神为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提供不竭动力

2021 年 12 月中共杭州市上城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上城区因地制宜地提出“全面建设独具韵味的国际化现代化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奋斗目标。上城为什么有自信擘画独具韵味的国际化现代化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至美蓝图？内在的精神力量是最根本最本质的因素。红巷精神名副其实为上城过去为什么能够成功及未来怎样继续成功的精神密码。新的伟大实践同样需要本土精神力量的支撑。红巷精神最是能激活曾经胜利斗争的激情岁月，继续发挥鼓舞人心、增强披荆斩棘的勇气的作用，为上城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生活凝聚强大的精神动力。

### （一）赓续红巷精神 有助于守牢上城党员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初心与使命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①]。实现共同富裕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 页。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新阶段的战略任务和发展实践。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是上城区因地制宜的战略定位，其初心和使命必然是为全体上城人民谋幸福、为上城区谋发展。而红巷精神自形成之日起就“甘做孺子牛”，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把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目标。当下，这种为上城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坚守集中体现为团结带领全体上城人民实现共富。今年 1 月，上城区新一届区委常委班子参观了中共杭州小组纪念馆，瞻仰先辈事迹，重温入党誓词，表达了对党忠诚、为民服务、开拓创新的理想信念。上城已经全面开启独具韵味的国际化现代化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新征程，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上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红巷精神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引领，赓续红色根脉，保证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赓续红巷精神 有助于丰富上城打造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历史底蕴与精神内涵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不仅强调物质生活富裕，还突出精神生活富裕的重要性。所谓典范，毫无疑问包含了精神要素的得天独厚、垂范百世。上城千年文脉延绵不断，红巷精神在此诞生，构成上城红色文化最源头的革命历史底蕴，是精神生活富裕的重要内容。2019 年红巷精神入选杭州市第一批红色资源点；2021 年红巷精神纪念旧址群入选浙江省第四批党史教育基地，家门口的“红色宝藏”不仅是全区党员干部进行党史学习教育的“活教材”，也越来越成为老百姓丰富精神生活的“加油站”。与此同时，推进精神生活富裕的重点方向与举措要求赓续红巷精神。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精神文明建设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关键方向。可见，实

①《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 年。

现精神生活富裕，必须赓续红巷精神，统筹推动全区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利用，切实守好红色根脉，用好红色文化，共筑共富精神家园。

（三）赓续红巷精神 有助于凝聚上城人民共建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智慧与奋斗力量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①] 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正是回应了上城人民群众的期盼，是朝着实现上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这一奋斗目标的具体体现，有利于推动全体上城人民的全面发展。面对全新的历史阶段，任重而道远，如何使全体上城人“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②]，最广泛地凝聚起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投入到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创建中。红巷精神当之无愧拥有最源头的革命底蕴、最丰富的成功经验、最恒久的价值意义和最强大的凝心聚力作用。2021 年 4 月区划调整后，上城整体实力叠加升级，形成“拥江揽湖走运”的最优区位，成为“最韵味”“最精彩”“最杭州”的“城市之窗”，实现城区能级和综合竞争力历史性跨越，2021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417.5 亿元，位居全市第二、全省第三。这是上城儿女共同奋斗的成绩，坚实的综合实力也极大地增强了上城人民的凝聚力，推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合力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生动局面。

（四）赓续红巷精神 有助于坚定上城干部建成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毅力与信心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③] 面对总书记、党中央交给浙江的历史重任，踏上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新征程，

---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55 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85 页。

③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 20 期。

上城全体党员干部是掌舵者，切实发挥着把全区上下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和区委决策部署上来，凝心聚力、团结一致，开创上城发展新局面的领航作用。百年掌舵前行中，红巷精神早已成为上城党员干部内化于心的革命传统作风，在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中更是一把亮剑，时刻强化敢于做先行者、开天下万物之先河的魄力勇气和俯下身子甘愿为老百姓做孺子牛的责任担当。区划调整后，上城党员干部在融合中创先争优，今年以来更是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域筑就共富现代化基本单元，创新构建幸福邻里坊，红梅、青荷苑社区等首批成果登台展示，14 个街道幸福邻里坊建设全面开花；高质量推进现代社区建设，21 个项目列入省市未来社区创建名单、数量全市第一；高标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望江、九堡等区块腾笼换鸟。未来很长时间里，上城全体党员干部将坚持赓续红巷精神，以“上城之窗”的责任担当和“首战必胜”的坚定决心，为建成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冲锋在前、率先示范。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次意义重大且过程艰难的全新探索，既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现成的经验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照搬，还会遇到很多难啃的骨头、难过的险滩。而这最是需要“敢为天下先”“摸着石头过河”“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勇气、魄力与毅力；需要“甘做孺子牛”“不破楼兰终不还”“千磨万击还坚韧”的实干、付出与奉献。在这场长期的蹚水探路中，红巷精神无可厚非是一把冲锋号、一面前进的旗帜、一颗红色的信仰，击退彷徨迷茫，引领全区党员干部群众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三、践行红巷精神，赋能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的路径思考

在奋进“两个先行”中加快建设独具韵味的国际化现代化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历史新起点上，上城区作为省会城市中心区、“红色根脉”承载地，要继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践行红巷精神为已任，努力在杭州“奋进新时代，建设新天堂”的时代征程中体现上城担当，在推进共同富裕新的赶考之路上继续交出上城的高分答卷。

（一）践行红巷精神，用红色资源激活红色基因，为加快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提供精神动力

红巷精神蕴含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情怀等丰富内涵，是开展政治信仰教育、民族精神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价值引领，对于全区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上城区作为红巷精神的发源地，应积极传承红色基因，将红巷精神转化为广大党员干部加快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精神动力。一是健全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建立上城区红色资源数据库，实行红色资源定期普查制度，对普查中发现存在险情的红色资源点及文物，加紧制定保护修复计划，并视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做好红色资源点保护、修缮工作。将红色文物保护利用工程保障资金列入上城区年度财政预算，建立健全资金多元投入体系，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红色资源保护工作。实施“红色记忆”工程，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亲历者开展抢救性采访，以面对面访谈、口述历史经历等方式编纂回忆录、制作纪录片，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二是规范红色资源管理运营。完善红色文物改陈布展管理机制，指导革命纪念馆、名人故居等红色资源点定期实施基本陈列改造提升工程，深化研究、及时补充体现时代精神的展陈内容。构建“老、中、青”相结合、“专职 + 兼职”相补充的讲解员梯队，把参与经历过历史事件的革命前辈、党史研究专业人员、先烈先辈家属、青少年学生等吸收到“红色讲师团”和讲解员队伍中，定期组织培训学习。三是丰富红色资源展陈形式。实施“互联网 +”红色场馆运营模式，运用移动互联网和 VR 技术，打造线上红色虚拟场景体验馆和线下红色历史实景体验区。依托上城区红色资源，结合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传统节庆，推出爱国主义教育、党性教育相关动漫、微电影、舞台剧等文艺作品，让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学党史、悟初心。四是强化红色资源宣传推广。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不断创新方法手段，运用移动互联网、5G 技术开展红色资源系列 5G 直播活动，将场馆展览、主题活动、原状陈列在云直播上展示，不断增强新时代依托红色资源开展党性教育的生命力、感染力、影响力。

（二）践行红巷精神，塑造变革能力，打造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生力军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打造共同富裕典范城区，是一项开创性事业、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没有可供借鉴的范例，需要全区党员干部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市的决策部署上来，弘扬“敢为天下先”的红巷精神，提升变革能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努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上城的创新实践为省市共富事业提供新经验、新范例。一是加强干部培训力度。围绕塑造干部队伍的变革能力，把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有关共同富裕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作为基层干部培训的重要政治任务，锚定全面建设独具韵味的国际化现代化共同富裕典范城区总目标，紧扣经济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优质共享、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治理等内容开展培训，帮助基层干部吃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深刻理解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重大意义、战略考量、主要目标、重点任务，着力提升基层干部推动共同富裕的新能力。要加强数字化改革专题培训，让干部学习掌握运用数字化改革理念、思路、方法、手段，进一步提升多跨协同的能力、系统重塑的能力、战略目标选择和管理的能力，为推进共同富裕加油赋能。二是重视干部梯队建设。要对照新时代好干部标准，选优配强关键岗位，优化班子专业结构，加大年轻干部使用力度，配出结构优功能强的好班子。根据各部门、各单位在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中的功能定位，精准培养选拔急需紧缺的专业干部和优秀年轻干部，加快年轻干部队伍迭代升级的速度和力度，尽快培养出一批理念超前、视野宽广、专业素养高、创造性思维活跃的优秀年轻干部。三是完善干部考核体系。推行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重大难题、重大创新揭榜挂帅和考核奖励机制，将推动共同富裕有关目标和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绩效考核，开展实干实绩实效赛马比拼，健全综合绩效评价机制，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

（三）践行红巷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铸强共同富裕典范城区建设的“红色引擎”

红巷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航定向、依水行舟的中流砥柱形象。在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要继续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高质量落实省委、市委关于“红色根脉强基工程”“争星晋位·全域建强”行动等决策部署，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多元化需求，把党的领导贯穿上城奋进“两个先行”的各领域全过程，为加快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提供坚强保障。一是把党的领导体现在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经济工作是中心工作，党的领导当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抓住了中心工作这个牛鼻子，其他工作就可以更好展开。”要落实好、履行好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能和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组织领导机制、会商讨论机制、协调运行机制，放大区域融合新优势，优化城区发展新格局，加强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攻关，推动“1+6”产业体系迭代升级，加大重大项目招引力度，不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二是把党的领导体现在丰富共同富裕服务供给上。以党建统领为核心，推进“幸福邻里坊”建设，全力打造现代社区建设的标志性成果，让居民体验到更具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的社区生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全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积极推进名校集团化办学，构建教育“新共同体”，努力打造优质均衡、人民满意的美好教育引领区。建立“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长效机制，打造更高水平“健康上城”。坚持以“一老一小”为重点，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开展职住平衡创新工作。三是把党的领导体现在优化共同富裕群体结构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提出“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要对照党中央的要求，按照就业优先、创业为源的策略，推动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清单化、均衡化、标准化建设，实现覆盖城乡、联系到户、服务到人，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优化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

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四是把党的领导体现在共筑共同富裕精神家园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落实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人民立场，努力提供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与服务，实现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统一。建立宋韵文化研究智库，深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钱塘江文化挖掘和传播，不断丰富宋韵文化体系和内涵。加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深化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持续推进之江文化产业带“两极”建设，深度融入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全面打造“时尚经典、古今交汇”的文旅融合标杆区。五是把党的领导体现在营造共同富裕宜居环境上。把党的领导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碳排放达峰，全面提升城市建设现代化水平，构建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加强法治政府建设，深化“平安上城”建设。以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和城乡风貌样板区为微观抓手，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建设，统筹推进老旧小区设施、环境、文化、空间、管理等综合改造提升，全力打造设施完善、环境优美、人文彰显、功能齐全、管理有序的现代化宜居社区。

（四）践行红巷精神，坚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以共同奋斗实现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目标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①] 红巷精神的生命力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只有继续弘扬红巷精神，人人参与、人人尽力，才能真正实现人人享有。一是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就一定能够不断创造出更多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间奇迹！”群众的基层实践是推动改革攻坚的智慧和力量之源。在建设共同富裕典范城区的过程中，要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深化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

①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 年第 20 期。

和创造性，坚持制度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统一，对重大改革要坚持试点先行，善于总结来自于群众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改革的思路、决策、措施更好地满足群众诉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树立“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共创共建”理念。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共创共建，在各自“机位”上开足马力。要大力弘扬勤劳创新致富的精神，营造机会公平的社会环境，不断凝聚共识和力量，创造各尽所能、各尽其责的良好社会氛围，激发各方共创幸福生活，共建美好家园的内在动力。三是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和各社会团体的职能作用，画好统一战线“最大同心圆”，动员各方力量，积极推进“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依托民情恳谈会等基层民主协商平台，保证人民广泛参与到涉及共同富裕的公共决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阶段和环节，使实现共同富裕的各项思路举措更加符合民主的原则、更能体现人民的利益与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①] 杭州市上城区作为浙江省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的诞生地、红巷精神的起源地，以及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城市窗口”，承载着百年初心，肩负着时代新使命，必然继续赓续“敢为天下先，甘做孺子牛”的红巷精神，团结带领全体上城人民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高水平推进现代社区建设，筑牢奋进“两个先行”，为全面建设独具韵味的国际化现代化共同富裕典范城区而奋进！

---

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 年 7 月 1 日。

# 共同富裕视野下杭州未来社区建设探微

◎吴　帅[①]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是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基础上的普遍富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社区是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的幸福美好家园，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共同富裕的视野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城市社区治理水平在邻里文化、党群建设、智能治理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新冠疫情之下社区更成为疫情防控的焦点重点，这将成为新时代社区治理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在这个过程中酝酿着未来社区等社区治理新理念新趋势。通过对杭州未来社区治理建设的现状进行分析，探讨杭州现代社区的变迁、困境和未来路径。

**关键词**：共同富裕；未来社区；治理机制；优化路径

社区是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场所，根据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社区已经成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城市社区治理中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依然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更让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焦点，迫切需要构建现代社区治理模式，探索社区治理精细化路径。社区治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随着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①作者简介：吴帅，男，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治理研究，联系电话：18157186095，邮箱：wushuai00007@163.com。

的系统总结，城市社区治理范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着力开创民生优享的社会发展新局面，其中要求“一体推进城乡风貌整体提升和未来社区未来乡村建设……加快城乡社区现代化建设，构建居民幸福共同体”。[①] 作为共同富裕现代化基本单元的社区建设是浙江省“两个先行”目标的重要衡量标准。“开展未来社区建设，是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内在要求，是构建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现代化平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举措”。[②] 然而，人民群众对社区建设满意度还不高，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在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暴露出来不少问题。而且，城市化进程在进入新阶段之后，粗放型“摊大饼”式城市空间资源利用模式难以为继，寻找城市高质量发展转型突破口刻不容缓。当前杭州各地扎实开展未来社区试点工作正是基于此种背景展开，所以本文从现代社区建设的意义，分析杭州未来社区建设现状，聚焦当前存在的未来社区“社区性”不足、过度迷信和依赖技术、当成单纯住宅区建设、治理规划与标准不清晰、建设资金来源不明确、数字标准化问题突出等六方面问题，并提出强化未来社区的社会属性、明确建设主体、把公共服务建设作为关键议题和突破口、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等四条建议。

## 一、未来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巨大历史跃升，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同样体现在全国近 10 万个城市社区治理中。中共十九大指出：“要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

①《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浙江日报》2022 年 6 月 27 日。

②孟刚：《未来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和浙江追求》，《浙江经济》2019 年第 7 期。

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①] 这意味着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是未来趋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加强社区治理机制建设。未来社区是浙江省新时代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探索，未来社区可以初步定义为以引领未来生活方式变革为导向，以居住街坊为基本单元，由若干个基本单元 + 公共服务模块构成的社区空间，容纳合理的人口数量，打造以地缘关系或居住关系为纽带，以人的需求为核心、生态友好、先进技术迭代应用的复合型生活圈。浙江省关于未来社区所形成的基本理念是与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机制的构建方向相一致，顺应了新时代治理精细化的治理理念。

1. 未来社区是社区治理的理论创新。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传统以散居为主的居住方式已被集中规模化的社区居住方式所取代，社区治理必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城市社区治理是在社区范围内，依托治理的多方主体和治理方式的多样性，共同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居民自治能力、增进社区公共生活整体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②] 城市社区治理在新时代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城市发展及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社区认同归属感不强、社区服务不完善、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等问题依然存在。“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超过社会文化、市民素质提升的速度，治理理念更新的速度快于实践推进的速度，在公民权利意识觉醒、阶层分化加快、社会连接转弱的结构转型期，社会矛盾频发。”[③] 所以，新时代的社区治理要改变长期以来社区的逆向负责制，改变只对上负责而无暇顾及基层群众切身需要的状况，采用新技术新理念，探索未来社区治理机制。

2. 未来社区是“后疫情时代”的必然选择。在本次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

---

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党员网，http://www.12371.cn/2017/10/27/ARTI1509103656574313.shtml

②张平、隋永强：《一核多元：多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 年第 5 期。

③张成甦、包雅钧：《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以实现社会有序》，《社会科学报》2020 年 7 月 2 日。

情的过程中，社区处在疫情联控的第一线。从疫情防控态势看，社区治则居民安；社区控，则城市胜。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作为城市基本组织单元和细胞的社区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同时暴露了当前社区治理存在的一些问题，突显了未来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未来社区建设造福民生，拉动内需，带动产业发展。未来社区作为浙江在全国首创的重大民生工程，是老旧小区改造的高级形态。

3. 未来社区是打造“重要窗口”的重要抓手。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在出席省委党校 2020 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并作开学第一课时，提出了浙江在新阶段面临的十大新课题，要求浙江交出包括民生、平安、生态等在内的“高分报表”，解答这 10 大新课题，打造“重要窗口”。当前有必要对未来社区试点情况进行跟踪梳理，确保试点获得先行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典型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提出加强未来社区建设的相应对策，构建新时代的社区共同体，为未来社区从试点走向全域探索路径。

未来社区是浙江新时代社区治理机制的重要探索，未来社区要作为浙江省“两高”现代化平台打造，要以“人”为核心，以“高品质生活”为主轴，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未来社区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价值，集成未来邻里、教育、健康等九大创新场景，为未来社区建设绘出蓝图。未来社区是现代社区发展的新趋势，加强未来社区的研究将为“中国窗口”建设提供一种新的可供借鉴的社区发展和治理模式，对社区治理创新突破政策供给，确保试点项目高性价比落地的经验进行总结。

4. 未来社区是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动力。未来社区建设理念获得了试点社区积极回应，浙江省发改委（浙江省发规院）等单位对于浙江省政府提出的“139”建设指导意见给予了积极解读，阿里巴巴、华东院、京东方、绿城等企事业单位建立了未来社区产业联盟，初步形成了政府牵头、市场主导、产业支撑的建设模式。《浙江省未来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指出，要通过未来社区建设，打造新型城市功能单元，夯实未来城市发展基础，有力支撑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启动未来社区建设使“四大行动”有了

基层建设坚实的“落脚点”，是浙江省继特色小镇建设后，所要书写的又一篇“大文章”、打造的又一块“金招牌”。未来社区与特色小镇既有承续性又有差异性，除了两者皆可推动资源整合、产城融合、创新创业，未来社区把建设的“主战场”直接对准社会需求和公共服务领域，开辟了发展新蓝海。在当前全国老旧小区改造中开展未来社区建设，选择合适的老旧小区先行谋划更高标准建设，对未来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因此，未来社区建设既利于完善民生、促进投资、拉动产业，更利于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 二、当前杭州未来社区试点工作的现状

未来社区建设是浙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民生工程，美好家园浙江方案的重要载体，其目的在于颠覆传统的开发逻辑，实现美好生活，这是从开发城市到运营城市、从建造房子到营造城市的蝶变。杭州在未来社区建设逐渐扩展的过程中，创新投融资模式、政策赋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利用智慧平台整合社区管理等，在未来社区试点谋划建设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实践经验。自 2020 年 1 月 12 日起，杭州市开始实施《高质量推进杭州市未来社区试点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积极回应并围绕在杭试点开展工作，切实以未来社区建设理念示范统筹“棚改旧改”和新建小区建设。从调研情况看，未来社区建设理念获得了当地群众积极回应，相关各方对于省政府提出的“139”建设指导意见给予了积极解读，并在如何推进未来社区建设方面提出了各种建议，同时也反映了存在的问题及顾虑。

目前，浙江省发改委已先后确定五批未来社区试点项目，杭州市试点数量位居全省首位，未来社区试点以对老旧小区改造更新为主。既有全部拆迁重建（如上城区望江街道始版桥社区），又有拆迁重建和插花式改修建相结合（如上城区采荷街道荷花塘社区）；从了解到试点工作的进展情况，目前试点尚处在前期筹备与方案规划阶段，也有个别试点正进入运营管理期。杭州市试点涵盖全拆重建类、局部改建类、规划新建类、全域类等多种类型，其中，上城始版桥社区、萧山瓜沥七彩社区分别被确定为省长、常务副省长

联系点。2021 年 12 月，浙江省城乡风貌整治提升（未来社区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正式公布全省未来社区场景运营“最佳实践”优秀案例名单，其中杭州市共有 5 个社区入选，分别是上城杨柳郡社区、拱墅和睦社区、拱墅瓜山社区、萧山七彩社区和余杭良渚文化村社区。这些社区有一定典型性，以瓜山社区和七彩社区为例：

瓜山社区为改造更新类试点创建项目。规划单元 384.4 公顷，实施单元 45.3 公顷，建筑面积 34.8 万平方米，直接受益居民 1620 人，引进各类人才 2400 人，总投资 11.3 亿元，2020 年计划投资 1.4 亿元。社区通过 5G、智慧停车、远程医疗、人脸识别等数字化技术赋能，将农居房打造成科技感、现代感并存的“青年创客”社区，提出“城市眼、云共治”长租公寓升级版，增加环境建设、设施配套，但受经济大环境影响租金下降。

七彩社区为改造更新类试点创建项目。规划单元 79.2 公顷，实施单元 40.3 公顷，建筑面积 99.8 万平方米，直接受益居民 9261 人，引进各类人才 3806 人，总投资约 47 亿元，2020 年计划投资 4.7 亿元。项目以社会资本参与开发运营为特色，先有运营再延伸做产业园，社区借鉴新加坡“交通 + 邻里”的复合式开发经验，保留原有老旧公交首末站地块不外迁，推动公交 TOD 功能混合建设。项目 A 区块已建成运营，建成的 TOD 公交综合楼、文化客厅、24 小时智慧公共服务中心、七彩人生健康生活馆等功能性场所，是目前全省唯一具有九个场景雏形的创建试点。

笔者对试点情况获得如下印象：一是受访者普遍认为未来社区引领了社区建设新导向，积极回应了基层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未来社区九大生活场景，为改善民生和推动城市进步描绘了“看得见”的前景；二是未来社区的理念和行动得到社区居民、干部以及所属街道、区等各层面的积极响应，相关社会机构、企业也十分关注并自愿参与其中，为推进未来社区建设创造了良好社会氛围；三是九大场景中的“邻里”、“服务”和“治理”等场景大大高于其它六个场景的关注度，成为走访中热议话题，反映出未来社区建设具有的显著社会属性，以及人们对未来社区后期运营管理的普遍关注。

## 三、当前杭州未来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杭州未来社区建设不管在总量还是速度上都在全省居于前列，但是依然要清醒认识到未来社区建设是一个长期工程，不能一刀切、一阵风，必须用理性的态度看待存在的问题。比如未来社区建设的动力问题：在未来社区建设中涉及的拆迁、投资拉动、产业推进等如何解决各方积极性；未来社区软硬件的平衡问题：规划中如何关注居民的内在需求以及遵守社区治理的基本规则；生活共同体的构建问题：在建设过程中如何促进各方交流达成共识；未来社区试点的碎片化、孤岛化开发问题：如何从盆景变成风景；未来社区与老旧小区改造的界限问题，彼此划分以及互补以及社会力量的参与问题，如何实现资金平衡，等等。这些问题主要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一是未来社区的“社区性”不足。当前未来社区建设存在重“未来性”轻“社区性”的趋势。单纯从组织架构上设计、实施未来社区建设，把社区建设混同于组织建设、单位建设。只注重社区的组织与制度层面，忽视社区非组织的层面与文化特点，试图只用组织与制度统合社区，容易使社区组织叠床架屋，而且也不可能使居民获得正常的社区内容与过程。

二是过度迷信和依赖技术。把社区视为可以完全规划和技术治理，忽视了未来社区的居民共同体本质，滥用各种名词创新并不代表理解社区并把握住了社区未来。上述偏向已经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例如，有关调查表明现在高达 53.8% 的基层干部群众认为未来社区就是智慧社区，对其他内容的了解程度只有 20% 左右。

三是把未来社区当成单纯住宅区。往往只把未来社区视为居住小区，眼光只盯着居住环境、设施场所设置，忽视社区组织与非组织、文化与邻里、交往与互动层面。一部分人对未来社区建设认知仍停留在旧城改造上，甚至有居民认为未来社区建设可以带来更加优惠的拆迁补偿，可以通过拉动居住周边的房价上涨得益。

四是治理规划与标准不清晰。缺乏从总体角度将未来社区 9 大场景内涵融入其中来进行全方位的规划。包括建设过程、运营模式、社区治理等一系

列问题缺乏前置规划，在规划过程中没有提前考虑未来社区营建空间与社区的治理适应性、原生居民需求在未来社区建设场景中的获得感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与居民生活休戚相关的民生问题。

五是建设资金来源不明确。未来社区建设通过提高建设用地使用率来进行资金平衡的政策尚待市场检验，而未来社区后续运营所需大量资金从哪里来，更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虽然政策要求探索形成产业联盟支撑未来社区可持续发展，但是人们对于通过企业化运作能否全部满足民生需求心存疑虑。市场主体供给侧和试点社区需求侧之间还缺乏精准对接，未来社区产业联盟目前还处只是一个交流平台，缺乏产业粘性。

六是数字标准化问题突出。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抗击过程中，暴露了社区缺乏公共卫生应急机制，社区数字标准不一，在车辆识别、行程收集方面的数据安全和共享难保证，缺乏具有公信力的社区发布系统。一些社区在数字化应用中只注重管理，服务不够人性化，忽视了以人为本和居民自治的初衷。

## 四、关于杭州未来社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通过未来社区九大场景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能源、物业和治理等纬度，对新时代社区治理进行衡量亦具有实践意义。未来社区不仅仅是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更重要的是要依靠智慧治理推动社区公共空间的成长，构建新时代的社区共同体。

1. 强化未来社区的社会属性。要做到未来社区建设“双规合一”，即空间设计规划与社区治理规划合一。在现有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后设立建设标准，做到两个规划彼此照应、相互融合。充分尊重未来社区建设的社会属性，遵循社区治理的客观要求。首先，在未来社区建设的营建阶段，社区策划师应先期介入，与社区空间规划设计师及回迁居民代表共同商议社区营建方案，使空间规划与治理规划、设施“硬件”与制度“软件”相适应；其次，在已建成的未来社区试点，应及时构建未来社区“九大场景”项目运作与社区整体运行协同开展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强化后期的社区营运管理。在未来

社区建设的方法层面上，可借鉴成都、上海等地经验，从未来社区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构建“导师团 – 规划设计师 – 众创组”三级队伍体系，形成未来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营建与营运工作机制，确保未来社区的社会和治理属性能够有效体现。

2. 明确建设主体，做好政策创新。按照“谁来建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各地设立一批 PPP 试点项目，在政府购买服务方面进行倾斜，调动基层的积极性。省发改委应尽快研究出台针对社会需求和公共服务的民生改善、投资促进、产业拉动等有关具体政策，借鉴《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让未来社区建设在建筑密度分区、居住地块容积率、混合用地容积率计算等方面以政策突破，及时纠正对未来社区建设目标的误读，避免陷入拆迁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的惯性中。为此，要及时纠正目前试点工作中只有发改委一家“唱独角戏”的局面，应在发改委牵头下，成立由试点属地的民政、城建、街道、社区等代表组成的工作专班，确保未来社区营建规划完善实施、营运治理机制有效落实。

3. 把公共服务建设作为关键议题和突破口。把发展公共服务体系作为未来社区建设的立足点，形成省、市、区（县）三级财政对未来社区建设的资金投入，通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有效统筹各种最新的城市发展理念，提升未来社区建设的标准、质量和服务，有效实现各项建设目标。同时，通过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吸引更多的市场资源加入，加强未来社区产业联盟建设，积极开展市场化运作，有效发展出多样丰富的社会服务，从而形成以公共服务为基本框架和导向，整合各类社会资源运作的长效机制，确保未来社区规划建设和营运管理顺利展开，使广大社区居民通过未来社区建设真正拥有获得感和幸福感。

4. 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社区治理。这次疫情防控中，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未来社区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数字技术应用，结合“最多跑一次”改革，搭建跨部门“多元协同”社区治理基础数据库，通过阿里云等平台实现各业务条线专业数据信息流畅对接和交互相

行。抓住疫情后新基建的有利时机，以疫情为未来社区数字化的导向，建立一个基于未来社区建设开放、标准、统一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加大未来社区的物联网、5G 等先进技术装备力度，建立完善便捷的社区数据系统和线上服务平台，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或信息发布延时而造成的公共卫生风险。

“建构在管理技术演进和高科技发展基础上的城市管理的‘超前治理’，更大意义上体现在城市管理理念的重构和城市管理流程的再造，而不仅仅是硬件平台建设。”[①] 所以，新时代社区治理不应该过度迷信新技术，要坚持以人为本为价值准则，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针对社区治理出现的新问题，构建一种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因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还在探索中，一个完善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社会治理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对社会治理机制的探讨更多的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当前城市社区存在的问题迫切需要探索出一条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其中未来社区是浙江省对社区治理机制探索的有益尝试。我们可以从“未来社区、老旧小区改造、未来社区建设与城中村改造、拆迁安置房建设、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提升、智慧安防小区建设”等各种社区建设探索中看出端倪，在以后的社区建设中以“社区性”为主导持续探索。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对城市社区治理提出更高的要求。从“新时期”到“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从党的建设要求、数字治理的理念、治理创新的动力、社会资本的参与等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新时代社区治理体现出更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的举措上。“针对社区人文价值缺失，如何树立‘以人为本’价值坐标，重塑邻里关系，推进史文脉传承和文化再生，强化人文氛围、规则意识等社区软实力，推进社区自治与居民参与式治理，创造有利于人才落户的新机制等，成社区治理补短板的重中之重。”[②]

---

①徐林：《花园城市的“管”与“治”——新加坡城市管理的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

②孟刚：《未来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和浙江追求》，《浙江经济》2019 年第 7 期。

# 全域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吴　昌　喻　佳[①]

**内容提要：**党建联盟既是基层党组织创新发展的生动体现，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对马克思党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建立在抱团发展这类实践经验基础之上，也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基层党建回应新任务新挑战的结果。在实践中，因成员主体作用发挥不够有力、制度机制运行不够完善、综合效应发挥不够有力等现实因素，制约了以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为此，需从党的领导、制度机制、全面发展等方面入手，做大做强党建联盟，切实提升党建联盟引领推动共同富裕的成效。

**关键词：**共同富裕；党建联盟；基层党建；现实困境；优化建议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奋进新征程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对新时代党的基层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各地不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通过组建党建联盟，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优势。2021 年，浙江省基层党建工作会议提出，要全面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程”，以强党建引领促进共

① 作者简介：吴昌，男，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校教师，联系电话：15558373180，邮箱：wuchangzj@126.com。喻佳，女，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校教师，联系电话：18767164925。

同富裕，探索推进全域党建联盟建设。2022 年，杭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着力建设变革型组织、提高塑造变革能力，实施“红色根脉强基工程”，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建强全域党建联盟。不同于以往，党建联盟的组建与运行，“既有别于整合过程中的被动吸纳，也不同于嵌入过程中的单一组织行为，它是党建引领社会组织联合而成的行动共同体”①。从现实环境看，无论是党自身建设，还是推进现实工作，都需要“运用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将分散和分化的社会因素联为一个整体并置于有效治理之下”②。总体上看，学界虽不乏有关党建联盟实践案例、经验总结、实践逻辑等方面的探讨，但仍有诸多需要深入探讨的地方。如相比于实践和经验总结，有关学理研究以及对党建联盟产生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等的研究较少。加强有关党建联盟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基层党建提质增效，更有利于推进党建联盟建设，发挥好党建联盟作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 一、共同富裕背景下全域党建联盟产生的内在逻辑

全域党建联盟是基层党建体制机制的一种创新，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从本质上看，党建联盟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联合”思想是高度契合的，并在党的实践中得到灵活有效的应用，而共同富裕背景下基层党建所面临的新的发展要求也迫切需这种“联合”的出现。

### （一）理论逻辑：组织能使力量倍增

马克思主义为共同富裕背景下党建联盟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运动必须在党领导下开展，必须依靠强大的组织力量。其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联合思想，深刻昭示

①薛美琴、马超峰：《关系网络再造：社会组织联合党建的行动逻辑——以江苏省党建联盟的实践为例》，《探索》2020 年第 6 期。

②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62 页。

了团结凝聚力量的客观作用。[①] 无论是作为结构的组织自身，还是组织这一行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及无产阶级运动来说这有着巨大的意义。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②] 从党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就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断推进探索与实践。早在 1929 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党的组织力”概念。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重视组织建设，善于组织动员群众，发挥合力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领导全面、协调各方的作用，最广泛最有效地动员一切力量，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坚强战斗堡垒。党建联盟就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用党建的强大力量把各类组织凝聚起来，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然需要发挥出组织的优势和力量。

（二）实践逻辑：抱团发展的重要启示

近年来，各地基层党组织不断强化党组织建设，以党建为统领，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注重发挥不同主体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抱团发展”模式，如各地采取的机关与镇（街道）、企业、村（社区）结合“三服务”，结成帮扶组团全覆盖；推进“强村带弱村”“东西协作”“飞地经济”行动。通过融入跨村、抱团、组团的理念，不断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基层党组织实现了从过去“单兵作战”到“抱团发展”的转变，大大激发了党建活力，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这一形式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立足不同区域、强村弱村的实际差异，创新联合发展模式，做到靶向明确、精准施策”[③]。实践表明，抱团发展能够发挥强大合力作用，推进形成多元共赢局面。事实上，我们党在推进事业中，有许多类似的实践和经验，如建立统一战线。这些都为共同富裕背景下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党建联盟提供了有

---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60–61 页。

②《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60 年，第 510 页。

③屠霁霞:《抱团发展模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浙江的经验分析》,《河南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 期。

益启示和有力的实践基础。

（三）现实逻辑：面临新任务新挑战

基层党组织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第一线，必须紧盯时代发展，及时回应实践需要和人民期待。从地位上看，它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任务的战斗堡垒”①。当前，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也进入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对于浙江而言，承担着为全国实现共同富裕先行先试的重大任务。同时，数字化改革正深刻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如何强化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关乎共同富裕发展大局。然而，对照新目标新要求，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发挥还不够强，面临新的矛盾、问题和挑战。② 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建联盟的出现就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 二、全域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面临的现实困境

从各地实践看，因产业发展、地方治理、公共服务等不同需求组建而成的多类型的党建联盟，织密建强基层党的领导，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制约着以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党建联盟成员主体作用发挥还不够有力

党建联盟围绕共同的目标实现了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和行业力量的整合，得以调动多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但这一优势的发挥不是自动生成的，依托于每一个成员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在实际运行中，不同主体力量作用发挥是参差不齐的，“在组织发展合作中会受到时代特征、个性特征和工作

①徐振：《全媒体时代背景下基层党建工作的机遇与挑战》，《新东方》2020 年第 6 期。

②林悟然、梁宇超、杨璨灿：《基层党组织建设：现状、困境与突破》，《国家治理》2021 年第 45 期。

理念等方面的影响”[①]。

1. 目标定位认识不够清晰。一是存在“上热下冷”的现象。调研中发现，对党建联盟的性质、目标、作用等的认识，更多的还是停留在镇（街道）领导和一部分村（社）干部上，普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了解不多，认识较浅。二是存在“定位偏低”的现象。一些村（社）党组织、部门、社会组织、企业等加入了联盟，但对联盟作用的定位主要还是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建设、活动联建，通过党建联盟推动多领域、更深层次发展的意识还不足，导致实际中各成员在许多方面还是各干个的、单打独斗比较多。三是存在“党建弱化”的现象。一些联盟成员对“党建与业务”的关系把握有偏差，热衷于业务和具体的工作，认为要有大的项目、大的产业才能带动起党建联盟，否则党建联盟只是“花花架子”，否则无法真正意义上发挥以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作用。

2. 担当有为能力不够突出。一是存在一定的“本位意识”现象。一些党员干部、党建联盟成员，认为党建联盟成立加大了工作量，工作任务变多，影响了日常的一些工作，参与联盟工作不够积极主动。即使参与也大多停留在一些简单的工作活动上，或应付于考核，对要攻坚克难、关系中心大局工作的能够主动担当作为的较少。二是存在担当能力不足的现象。一些党建联盟虽然有许多的成员参与，看似整体实力有很大提升，但由于一些成员自身基础相对薄弱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与联盟实际所期望的存在一定差距，难以担当重要任务。三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现象。一些负责单位和领导干部在推进党建联盟工作中，偏重于讲政策、谈责任、提要求、定任务，忽视成员能动作用发挥，又将自身置于“评判者”“看客”地位，深入帮助和支持联盟建设与发展的实际行动较少，导致党对联盟的领导不足。

3. 创新进取意识不够强烈。一是存在任务观念、“等靠要”思想。调研中反映，一些加入联盟的成员，尤其是一些经济基础发展和党员干部队伍比

①孙敬良：《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员工的需求冲突与化解策略》，《领导科学》2019 年第 2 期。

较薄弱的村，认为既然有大家的帮助，自身就可以“轻松点”“歇一歇”“听安排”，主动谋划、争当先进的意识与行动不足。二是数字化应用不足。由于思维认知、基础设施、路径依赖等原因，借助数字化应用于党建联盟日常运作的不多，尤其是以数字化撬动党建联盟目标任务实现的能力还不足，如各类资源、产品活动的线上交流与合作，更谈不上精准服务、精密智控。三是存在一定功利意识。对于党建联盟的工作和活动，一些成员出于自身利益是否得到满足和实现考虑，有选择性的参加，对自身没多大关系的参与少，导致很多时候，联盟的日常运行和重点工作最后就变成牵头单位、核心成员或属地镇（街道）几位领导干部及相关科室的工作，并未真正发挥出联盟“联”的优势与力量。

（二）党建联盟制度化建设与运行还不够完善

与传统的单一的基层党组织相比，党建联盟成员众多，彼此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无论是正式制度中的法律制度、激励政策和监督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对组织行为选择及其有效性都能产生重要影响”①。如何有效协调好各类关系，是确保组织本身有序发展的关键，也是各主体成员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当前党建联盟建设引领共同富裕中亟待理顺的地方，如“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耦合”②问题。

1. 规章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由于缺乏科学指导，及缺少较为权威和成熟的可供借鉴的联盟组织建设与运行经验，一些党建联盟更注重这一组织的实际运转，对一系列组织章程、发展规划、议事规则等的研究制定相对较为滞后。从调研情况反映，党建联盟中制定有较为系统全面的规章制度的较少，有些甚至虽然已组建却还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对自身要实现什么目标、发挥什么作用、建成什么样、各成员如何参与等问题还没有清晰的规划和认识，

①李青霞：《制度环境、组织能力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学习论坛》2021 年第 1 期。

②葛亮：《制度环境与社会组织党建的动力机制研究———以 Z 市雪菜饼协会为个案》，《社会主义研究》2018 年第 1 期。

导致其实际运行还停留在一些基础工作层面。尽管组建的党建联盟都制定了相关的目标和工作推进节点安排，但因缺乏长效机制和闭环管理，从联盟组建到运行，存在“先热后冷”的现象。一些党建联盟组建后几近“悄无声息”，没有真正高效运转起来，如成员对于是否要参加联盟活动、完成联盟制定的目标等随意性较大，长期性、系统化推进工作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 内部统筹协调存在难度。一方面，由于联盟成员在组织关系、工作时间、业务专长等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管理模式上的不同，对组织牵头负责人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而这类基层“能人”大多有许多工作在身，投入到联盟的精力就非常有限，对联盟的工作安排存在较大变数，其组织动员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联盟的实际成效。另一方面，党建联盟的组建基于成员平等自愿之上，在制度建设和机制运行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联盟”组织对成员行为的约束不够大，且统筹联盟内部成员的工作需要付出较大精力，难度也比较大。特别是两新组织、企业等的加入或退出具有较大的可变性，其加入联盟更多的是考虑自身的业务需求，较少关注联盟的整体目标的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建联盟看起来“联”了，实际作用发挥与预期之间存在着差距。

3. 人员经费保障不够充实。一方面，党建联盟的日常运行需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对于联盟的负责人和主要成员需要有较强的能力要求，特别是主要领导的关心和重视能更好地统筹项目、资源、资金和人员。但从基层反映情况看，各个联盟缺少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各地对于担任联盟的负责人也有很大差别，有些虽然“挂帅”了，也是勉为其难，“赶鸭子上架”。另一方面，党建联盟日常运行的资金主要靠镇（街道）的拨付，及一些成员的提供，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和相关明确的政策规定，也无统筹使用党建经费的政策支持，光靠政府的投入难以持久。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联盟作用的发挥，特别是举办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活动，资金支持就比较困难。

（三）党建联盟综合示范带动效应还不够明显

从目标上看，组建和推广党建联盟意在有效激活基层党建活力，更好地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在党建联盟实施过程中，“要在目

标指引下建构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以此统一思想、选择路径和开展行动”[①]。但从实践来看，党建联盟在这方面的示范带动效应还不够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党建联盟覆盖影响范围有限。出于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人员状况等多种考虑，现实中联盟所覆盖的范围常常仅限几个村（社区）或组织，在短期内较少有进一步的“扩面”。而由于联盟与其他的村（社区）和组织缺乏有效的“合作”方式和路径，联盟示范带动更多的局限于联盟内部，联盟之外的一些地区难以借助联盟获得较多的推动共同富裕的“福利”。从已组建的联盟情况看，联盟的工作成效有目共睹，但相比于各项工作的推进，对相关做法举措的提炼和总结推广不够，在省内及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不够多、不够有特色。

2. 党建联盟精准对接需求有限。实践中，联盟在广泛发动普通党员、基层群众上还不够明显，联盟的许多工作更多的还是以成员所在组织的集体性行为为主。一些活动的开展看似非常火热，或受众范围有限，或偏离了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群众认可度不高，群众对联盟的支持和参与也随之大受影响。而由于缺少对基层群众需求的深入了解，一些联盟成员“空有一身才艺”，没有施展舞台，其作用发挥与基层的实际需求之间还没有实现“精准”匹配。

3. 党建联盟合作发展程度有限。从联盟内部合作情况看，党建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还不够。尽管成员自身趋向于要实现多方面的“全科发展”，但大部分成员间的合作和精力投入主要还是集中于某一项工作、某一个产业、某一个领域上，系统化、整体性推进的不多，成员各领域发展表现出“参差不齐”的现象。而从联盟整体的外部合作看，联盟与联盟之间以工作商讨、现场学习、打擂比武等形式的交流为主，具有实质性的合作较少。这些使得联盟在综合示范带动能力上还显不足。

---

①吴新叶、吕培进：《在“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之间：基层党建联盟的活力空间》，《学术界》2021 年第 7 期。

## 三、全域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优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抓基层党的建设都不可放松。共同富裕背景下，作为基层党建工作实践的重要创新，党建联盟被赋予了重要使命，需要着力解决制约其发展的现实因素，才能更好地将联盟优势转化为共同富裕的发展优势。

### （一）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凝聚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发展力量

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一切工作的根基所在。遵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促进、共同提高”的基本原则，注重发挥党对党建联盟的领导，统筹好联盟发展目标、资源、队伍等要素，才能将各参与主体汇聚成推进共同富裕的整体合力。一是发挥党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通过政策宣讲、党校培训、专题讲座、实地调研等形式，加强联盟成员内部交流，增强各成员的主体意识、共建共享意识，打破“门户壁垒”，精准定位各成员在联盟中的角色及其作用，以实现成员各尽其才、各显其能。二是发挥党管干部优势。切实加强“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理念，强化各级书记抓党建联盟第一责任人职责，通过“书记抓、抓书记”，“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党建联盟，为各成员搭建起全力施展作为的“大舞台”。三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个性化定制“一支一案”党建责任状和结对帮扶协议，推动基层党组织建强，确保在联盟中起到战斗堡垒作用。推动联盟内部党员干部联育和协作，着力提升党员干部七种能力，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联盟中的带头示范作用。四是加大对群众和各类组织的动员。发挥各类媒体的舆论主阵地作用，精心打造各类教育基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党建联盟的知晓度和认知度，根据党建联盟发展需要引导群众和各类组织参与，为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更好地凝聚智慧与力量。

### （二）以制度机制为牵引，推动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有序发展

制度机制是任何组织得以持久稳定、有序发展、充满活力的基础和前提。注重党建联盟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快制定和出台相关制度及配套政策，创

新完善运行机制，才能为各成员主体作用的发挥提供保障，为联盟各项工作开展搭建起“四梁八柱”。一是健全制度机制。加大制度和政策研究力度，明确各类型党建联盟标准，建立并不断完善联盟组建与运行的组织章程、轮值主席、议事规则、准入与退出、利益联结、经费保障、人员配置、阵地建设、督导考核等制度机制，形成行业细分、统筹有力、上下贯通的党建联盟体系，确保联盟工作开展和落实科学、有序、高效。二是注重分类指导。坚持宏观指导和分类管理相结合，充分发挥好县（市、区）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和镇街业务科室的具体作用，深化分层分类，指导联盟结合实际制定发展目标、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以常态化服务机制，创新服务方式和内容，及时帮助解决联盟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三是强化考核运用。树立闭环管理思维，根据各类党建联盟的不同职责定位，以“契约化”形式分类制定共性和个性责任清单，压实联盟牵头组织和成员责任。对照清单开展双向认领、双向服务，建立相应积分制，作为各类先进评比、项目落地、政策扶持等的重要参考依据，形成比学赶超氛围，推动联盟成员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以全面共同为目标，释放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带动效应

共同富裕涉及方方面面，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也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和艰苦性的事业。按照全面协同高质量发展要求，必须强化党建联盟内外合作程度，拓宽辐射影响范围，精准对接基层群众需求，推动落实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一是科学有序推进全域覆盖。坚持“一盘棋”，注重片区统筹、条块集成，科学规划片区发展蓝图，因地制宜、分类组建不同类型的党建联盟，构建产、供、销、服务等一体化联动发展体系，防止只抓点不抓面、以点代面、顾此失彼，让每一个村（社区）都能在联盟的整体带动下获得发展。二是推进各领域全面发展。突出补短板、强优势，坚持“抱团发展、整体提升”原则，着力主推“一盟一策”“一组织一优势”“一村一品”，推动实现联盟成员从“单科发展”到“全科发展”。通过培育、设计、创新等方法来丰富党建联盟项目业态，找准当前与长远相结合的发力点，统筹安排各类项目，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要素跟着项目走，推动形成“以大带小、以强扶弱、

全链合作、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推动党建联盟可持续发展。三是精准对接基层群众需求。坚持调研开路，找准服务的突破口、结合点和共同点，以“党建联盟 +”模式，提供多样化、多元化、精准化的服务，引导联盟单位、社会各方、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做好和扩大“亲密朋友圈”，发挥联盟集群效应。四是提升数字赋能能力。以产业发展、产品销售、服务供给等为主线，集宣传、管理、教育、服务、沟通、决策、考核等于一体，加快联盟数字化场景运用，推动形成线上与线下互动局面，强化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带动效应。

总之，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各项事业发展的关键。共同富裕背景下，必须推进基层党建工作创新发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要求。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载体，党建联盟在实践中取得课显著的成效，但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在新征程上，大力推进党建联盟建设，才能将党建联盟的各项优势转化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不竭动力，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 共同富裕示范区“县域样板”效应对全国县域经济借鉴作用研究

◎杨乃如[①]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建设示范区落地浙江，不仅标志着浙江在共同富裕建设道路上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而且也意味着浙江经济在生态发展、自性发展的同时，以其绝对优势领跑全国的经济建设。县域经济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高品质发展，不仅是浙江、杭州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头雁”使命，而且突出“县域样板”的优势导向、样板效应和目标诠释能力，可以在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富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和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构建过程中，为全国县域经济建设提供一定借鉴，进而提升县域经济在社会经济中的核心能力。

**关键词：**县域经济；竞争与合作；政策红利；样板

县域经济的样板效应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借鉴作用，杭州县域经济高速发展对杭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融合到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样板效应释放的不仅是政策红利，而且也将县域样板的优势激发了出来。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杭州县域经济，并对其“样板效应”实施了深度考察，明确了杭州县域经济的优势导向、样板效应、目标诠释和持续发展影响力等

①作者简介：杨乃如，女，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联系电话：13819107882。

要素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杭州县域样板的分析，深刻解读了样板效应的持续影响力，就多结构的产业影响形式进一步提出了创新思考，继而从多元视角梳理了杭州县域样板对全国县域经济建设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 1.“县域样板”的内涵及示范作用

### 1.1 县域样板的生成及内涵

2021 年 6 月，共同富裕示范区落地浙江，加速了浙江县域经济规模发展，具体到杭州县域经济，共同富裕政策导向下的县域经济发展，无论是规模、效益、环境、持续发展力，还是县域经济的样板效应、导向作用和影响方式都具有显著的优势。杭州县域经济体数量不多，但是在浙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中，以萧山的服装产业、杭州县区的平台经济、桐庐的快递产业以及淳安的旅游业等为代表的县域经济不仅充当着主力军角色，而且其样板效应凸显。

县域样板不仅是经济，而且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数字化治理、战略规划和制度制定等层面都具有显著的样板作用。深层次解构杭州县域样板，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扩张了县域经济产业影响力，实现了产业转型借助数字经济，转向生态发展、绿色发展；县域经济的生态经济发展，杭州下辖的淳安县，充分发挥生态资源禀赋的优势，打造现代化旅游产业，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旅游经济，促进该县旅游经济实现了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影响下，杭州县域经济围绕补齐短板、发挥优势、创新环境的目标，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全方位致力于打造县域经济的循环发展模式，桐庐县做大做强快递产业的同时，构建了全国首家县域经济产业大脑。

高质量发展的县域经济，促进杭州共同富裕样板建设，其县域样板效应深层次影响全国县域经济建设，并实现了产业社会化分工以及规模化的影响，促使产业孵化机制、创新机制更具有持续发展能力。

### 1.2 县域样板的创新内容和示范作用

全面创新是杭州县域样板的核心，持续创新则是通过创新效应、样板效应、

产业转型效应形成了经济产业发展的生态图谱。县域经济样板效应下的创新内容，兼顾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杭州县域经济实现了全域生态资源高效利用，以生态文明理念驱动和生态经济嵌入的方式，优化落后产生模式，改革传统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提升产业转型的效率和效益，高度创新环境效益，促使样板效应的传感能力增强。再一方面，共同富裕目标下的杭州县域经济，重点突出以高质量经济发展为支撑，打造共同富裕的强大引擎，在不断提升县域经济发展的规模、质量、效益与后劲同时，有机做强项目支撑力、扩大产业竞争力、提升平台承载力。充分调动资源，实现城乡一盘棋的发展思路，以城带乡，以乡促城注重统筹协调构建城市品质化、村镇特色化、设施一体化的发展格局。此外，杭州县域经济通过优势发展的导向、扩张产业规模、体量、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利用数字赋能、生态赋能、价值赋能突破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让渡价值标尺，将更持续、更稳定、更协同的经济发展优势激发出来，不仅带动了杭州县域经济的整体发展，也为县域经经济发展塑造了标杆，同时实现了对全国的县域经济建设效应到优势的引领转化。

**2. 样板效应的持续影响力解读**

2.1 样板效应精神层面的补给

共同富裕浙江示范区建设，明确了杭州县域经济的“县域样板”作用，样板效应之所以具有持续影响力，关键在于精神层面的共振机理。一方面，从美丽中国的样板效应，到百工之乡的行为落地，杭州县域经济在浙江精神的感召下，沿着共同富裕的总目标，全面优化产业结构转型的精神引领机制，以浙江精神为总导向，加快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在县域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浙江精神和浙江工匠精神形成了对杭州样板的精神补给。促使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融合，产生最优结果的创新目标。再一方面，杭州样板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与理论支撑。从生态文明建设视角考虑，杭州县域经济的生态发展理念权重比较大，对县域经济的生态资源禀赋高效利用，开发和系

统化的链式管理创造了条件。从浙江精神的层面考虑，杭州县域样板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以精神激励优势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全方位创新，由表及里地体现了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共振，不仅涵盖了县域经济的生态化发展思路，而且也将浙江精神转化为非精神层面的生产力驱动，促使样板效应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生态黏性显著，有利于创优县域经济生态发展环境。

2.2 样板效应对产业模式的补充

样板效应视阈下的产业发展模式，一方面要补充资源短板带来的负面影响，创新产业升级转型的路径，改善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再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融合到产业经济发展中，对县域经济的样板效应具有一定的生态兜底作用。

杭州“县域样板”通过增长能力有机内化了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潜在问题。首先，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短板问题对县域经济的影响较为严重，杭州县域经济通过产业孵化机制规模化效益，重点将生态资源转变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资源，以优化产业环境、数字技术赋能的方式，延伸了产业结构的链式增长，促使结构性矛盾得到了有效解决；其次，杭州“县域样板”通过生态资源优势和人才资源优势，不仅实现了生态发展的目标演进，更加注重经济方式的规模化效应。桐庐作为民营快递之乡，不仅在县域经济中通过产业赋能，创新了县域经济的产业格局，该县还通过建立长期鼓励性政策引导，制定桐庐快递物流产业链的发展规划，打造快递物流“产业链 + 价值链 + 供应链”特色小镇。致力于打造全球快递物流高端产业链智能制造基地，引进快递上下游企业入驻，形成高端、高质、高智的快递产业链集群。[①] 杭州县域样板突破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的固态思维，加快了产业协同机制建设，充分利用导向优势，示范作用和生态资源禀赋的优势，形成了产业的关联模式聚集模式，梯队模式和全链式发展的模式，为产业持续发展内涵创新奠定了

①《黑科技满满！600 多名业内大咖 在桐庐为你揭晓未来快递业的风向》，杭州网，https://ori.hangzhou.com.cn/ornews/content/2019-09/10/content_7264187.htm。

基础。

2.3 样板效应综合效益的分析

经济、社会、环境以及规模等效益形态构成了杭州县域样板综合效益组合体。首先，杭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效益优势。进入发展新时代，杭州县域经济转型发展不断加快，呈现出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块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快等态势，成为推动区域转型升级的主要力量①。杭州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优势主要体现在县域经济的经济效益比较显著，块状经济产生的经济效益均衡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短板，从而实现了县域经济广泛的经济效益优势对杭州区域经济的支撑；其次，杭州县域样板社会效益驱动产业转型升级。考虑到杭州样板效应的影响，其社会效益的显著性增长，拓宽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一方面，外部的资金、技术、人才涌入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中，为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力奠定了基础。再一方面，无论是共同富裕还是美丽中国的样板效应，都通过政策红利的方式，彰显了杭州县域样板的社会效益，关乎经济、社会、生态文明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对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模式都贡献了力量；再次，环境效益和规模效益融合刺激产业发展呈正增长。数字经济、生态经济、链式经济以及循环经济，几乎囊括了杭州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上下游，环境效益和规模效益均能对县域经济产生绝对影响。增效、增益机制下的县域经济自觉地以样板效应的优势，促进了县域经济与环线经济、都市圈经济的融合，从而壮大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根基。

## 3. 多元视角的借鉴和启示

3.1 产业结构转型的借鉴与启示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杭州县域样板立足培育创新驱动的产业，内化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从技术创新、规模创新、生态

①哲宣：《解析浙江高质量发展“密码”》，《今日浙江》2019 年。

创新和价值创新等要素层面实现了全方位的创新驱动。基于杭州县域样板效应的影响，县域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要架构产业结构的创新动能体系。以传统产业的发展模式为导向，通过科技赋能、数字赋能、生态赋能，全面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破传统产业发展的壁垒，招引高科技企业入驻县域，从科技创新的底层带动农业、工业、服务业、商业以及消费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切实创优发展环境，切实将企业的生存黏性与县域经济的生态黏性融为一体，改善产业创新驱动力匮乏的现状。再一方面，培育新兴产业增长能力。积极创办省级以上的各类产业园区，大力发展市场化运作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依托产业发展的特点需求，建设专业化、面向市场化，具有品牌能力的双创基地以及综合创新体，实现功能集成，提供专业化、特色化的共同赋予，发挥效应机理的带动作用①。此外，还要培育多层次市场主体。聚焦现代农业、智能制造业、互联网 + 产业模式，加大招才引智、研发创新、技术创新和企业融资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力争培养一批带动作用强，创新能力强，质量效益好的企业。巩固发展中小企业，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有机形成县域经济产业的“专精特新”模式。

产业结构转型的核心不仅要实现产品溢出机制，而且要突破产业价值的桎梏，从工业、农业、文化业、旅游业、服务业和消费领域的根本出发考虑。一方面要丰富产业结构创新的内容，将传统的产能低下产业实现升级改造，发挥资源优势。再一方面，要将产业创新与双碳经济联动起来，依托生态资源的优势，形成以县域经济为单元的产业集群，促进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模式。

3.2 生态经济发展的借鉴和启示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两山理论”是浙江生态经济发展的总纲领，也是杭州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资源优势。杭州县域样板依托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基础，全面创新生态经济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县域经济发展生态

①吴传清、邓和顺、张诗凝：《湖北与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比较研究》，《长江大学学报》2021 年第 6 期。

经济既要遵循“两山理论”的生态思想，还应当参照杭州县域样板效应，进一步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健全双碳经济目标下的绿色生产体系。一方面，以生态发展为导向，全面推动县域经济的绿色低碳发展，着力于绿色产品、低碳农业、绿色工厂以及绿色消费通道的建设，以供给链的优势创新绿色产业的升级发展。再一方面，生态经济的绿色生产能力与绿色消费能力遥相呼应，创新生态经济发展的层级，要保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绿色生产力是产业结构正向发展的驱动，绿色消费能力培养，则是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影响，创新产业化绿色化的过程，设计－研发－生产－消费的全链式绿色闭环流程，多角度增强生态经济发展的生态黏性；其次，强化绿色、生态产业的主体作用。大力推动乡村旅游经济，以数字融合、技术创新，互联网技术嵌入的手段，丰富绿色、生态的乡村经济。县域经济视阈下的振兴乡村，不仅要面向乡村推广普及生态经济的理念，而且要从乡村建设、治理、产业改造等方面入手，切实将生态经济的发展理念和策略融入到振兴乡村中。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农村旅游产业化、旅游经济、生态经济带、一村一品以及现代化农业体系均构成了一定规模的产业主体，丰富了县域经济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对促进全面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生态经济模式下的乡村振兴既是对县域经济的贡献，也是共同富裕杭州样板效应的另外一种延续。

3.3 数字经济赋能的借鉴和启示

党的十九大以来，杭州全力打造全国数字高地，催生了一大批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企业。数字经济赋能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成为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创设的主要方式，也是传统产业结构升级改造的主要路径。县域经济建设、内涵发展，通过数字经济赋能，不仅可以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增长方式，也能从结构层面实现产业突围。首先，数字经济赋能是产业转型战略的必然选择。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实现了互联网+、区块链、物联网、电子政务、智慧城市和智慧治理等方面驱动。以数字赋能为手段，县域经济应当将城乡治理、电子政府、平台经济、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远程医疗等产业表现

方式集聚为县域经济战略框架的内容。一方面，通过数字经济的深层次影响，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拓宽经济增长与经济横向发展的空间，并以数字技术的创新成果，嵌入到电子政务、社会治理中，有效地将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凝练为一定体量，从而产生即得规模效应。再一方面，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有利于社会经济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能够及时、科学、合理地构建产业供给链，保障了县域经济产业的刚性资源供给和外源性资源输出。其次，数字经济赋能县域产业结构全要素，有利于培养县域经济的核心竞争优势。数字经济不仅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具有一定作为，而且在现代化农业体系、工业体系、能源体系、消费领域、服务行业都有极其深厚的影响力。一方面，数字经济赋能县域经济产业资源禀赋，可以促使资源禀赋实现和谐有序的供给优化。构建全要素的供给链，能够帮助企业解决融资、技术和销售等问题，有效地影响产业转型的结构性供给问题。再一方面，数字经济赋能下，县域经济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智慧城市、能源企业的转型升级均受到其驱动，不仅能通过产业的发散性发展，创新产业结构的创新空间，而且还能从市场机制、用户端、供给侧的上下游实现智慧化管理。再次，数字技术赋能县域社会治理层面，促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平台的建设，能够增强社会治理的生态黏性，并对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具有一定的约束和控制作用。由于县域综合治理的现状相对复杂，通过大数据进行网格化的管理，能够提升综合治理的效率，降低治理成本，从而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效率。

### 3.4 链式经济模式的借鉴和启示

链式经济在杭州县域样板中占据较大的地位，无论是传统的服装产业，还是旅游经济，乃至桐庐的快递产业，链式经济发展模式在产业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研究试图通过对杭州县域样板的链式经济模式进行分析，从而实现县域经济建设中链式经济模式的构建目标。首先，链式经济促进循环机理目标实现。当前阶段，内外部循环机理下的县域经济，一方面要通过外循环实现产业结构的外向型输出，从产品本身到市场价值，链

式经济的循环影响力合理地嵌入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以确保链式经济上的成员企业均能获得政策红利以及相应的结构性红利。再一方面，通过内循环机理，引导县域内的服务业、消费领域、乡村旅游和乡村经济走向市场，获得市场收益实现第三次分配，不仅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而且能够改善当前国际经济下行现状下的产业发展困境。链式经济模式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城乡经济具有高度契合的特点，发展链式经济不仅能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能带动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其次，链式经济对产业持续发展的影响。供给链为代表的链式经济，从产业的供给端到用户端，包括中间环节的原料供给上下游企业，均具有支配和驱动作用。县域经济发展中，链式经济不仅能够解决产品输出的问题，而且通过产业集聚，产业规模增量获得融资，一方面能解决企业的现金流的问题，再一方面能够将技术成果、高新企业以及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导入县域经济中。链式经济对产业发展持续发展能力构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链式经济的成员企业自性的产业聚集，增强了县域经济的产业竞争力，在市场竞争中，产业聚集能够抵御一定的竞争风险。同时，链式经济具有一定的共生特征。鉴于共生理论的影响，县域经济的共生机制更贴合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同时对产业增效、增益，增强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都不无裨益；再次，链式经济的协同机制可以拉长产业链条。链式经济的原理具有一定的羊群效应的原理，县域经济发展采用链式经济模式，一方面能够带动链式成员企业的共生机制产生协同效应，围绕链式经济的中心化企业，产业聚集模式能够很快实现，既能够降低产业发展的成本，而且通过规模效应和环境效益壮大县域经济的核心能力。再一方面，链式成员企业包含产业机构的供给端、研发端、生产端、资金端、物流端、用户端以及其他第三方，羊群效应下，一旦确立链式经济发展模式，链式经济的中心化企业的集聚效能，能够将链式成员收敛至中心企业的周围，这也就无形中增强了县域经济的体量。

3.5 产业分工协作的借鉴和启示

专业化的产业分工机制，并不是独立的分工，在特定环境下，产业分工

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合作。基于竞争与合作视角的社会化分工，丰富了县域经济的产业内容，也填充了县域经济产业协作的内容。杭州县域样板的产业结构调整中，社会化分工现象极其普遍。县域经济借鉴杭州县域样板，立足产业分工协作，可以重点做好以下几点。第一，专业化分工生态黏性定位。专业化分工是从社会经济和产业调整层面实现，其生态黏性首先要明确分工与协作的从属关系，驱动关系和支配关系，通过社会化分工，将产业发展的目标明确为集群方式，通过集群效应增强产业持续发展和共生发展的生态黏性，合理变革分工与协作的目标，从而实现产业优化的目标；第二，专业化分工的协作内容明确。产业布局中，要明确产业的分工机制和分工内容，同时也要完善协作的框架建设。分工的目标是为了更好的竞争，竞争机制下的协作，一方面可以提升产业布局的效率，促使产业增长水平出现外溢。再一方面，协作能够提升产业集群的效率，可以加快链式经济的增长。分工与协作内容明确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也是生态文明思想下的产业智慧化管理手段。第三，分工协作目标定位。分工与协作的目标定位首先应考虑以县域经济为中心，实现不同程度的分工是为了实现创新竞争，而协作机制构建则是为了提升共同体的效益，不至于产业内隐性效益外溢。第四，共生机制下的分工协作模式构建。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模式构建，必须要确定共生机制的集群目标，县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下，共生机制构建的思想以“共生－共荣－共享”为导向，共生机制的分工与协作是为了达到共荣的目标，而共荣的目标则是实现共享。因此，县域经济的分工协作模式构建基本目标是共同发展，持续发展，核心目标则是要达到共享，这一原理与共同富裕的目标再次具备了生态应然性。

本文意在抛砖引玉，谨谢惠鉴！

# 四、启航新征程　奋进新时代

# 呈现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

## ——杭州城市文化建设的实践逻辑及其启示

◎沈小勇[①]

**内容提要：**“八八战略”在浙江实施以来，杭州以高度的文化自信积极推进文化名城建设，充分发挥城市人文优势，在融通历史与现实中激活了城市历史文化基因，让传统文化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释放出新的魅力，呈现出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有力彰显了城市人文之美。杭州城市文化的实践正是深入贯彻“八八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示了城市人文之窗的独特魅力。回溯历史，照应现实，杭州推进城市文化的实践启示我们：如何精准把握城市人文特色，以“文化城市”的理念引领“城市文化”的建设非常重要，杭州正是通过城市文化的时代重构与国际表达，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自信，在凸显城市人文特色中有力塑造了城市新形象。

**关键词：**杭州；城市文化；实践逻辑；独特韵味

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出席G20工商峰会开幕式时指出：“杭州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重镇和商贸中心。千百年来，从白居易到苏东坡，从西湖到大运河，杭州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说引人入胜。杭州是创新活力之城，电子商

①**作者简介：**沈小勇，男，哲学博士，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文化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主任、教授。联系方式：sxy7866@aliyun.com；18958093187

务蓬勃发展，在杭州点击鼠标，联通的是整个世界。杭州也是生态文明之都，山明水秀，晴好雨奇，浸透着江南韵味，凝结着世代匠心。”[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 G20 杭州峰会致开幕辞时还这样赞美杭州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相信杭州峰会将给大家呈现一种历史和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②] 总结杭州城市文化建设成就，杭州以创新活力之城、历史文化名城、生态文明之都、东方品质之城升华了城市文化软实力，G20 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更是展现了西湖风光、江南韵味、中国气派、世界大同。杭州城市发展的经验表明：打造独具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要立足传统，突出地域文化认同，突出城市形象塑造的精神内核所在，积极构建文化主导的未来城市发展战略，牢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回溯“八八战略”以来的杭州实践，杭州正是通过充分发挥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的优势，激活了城市人文遗存，修复了人文生态，塑造了城市文化新形象。

## 一、在融通历史与现实中彰显城市人文之美

历史和现实表明，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基于城市的旧街、古宅、老树等“历史元素”和城市的“历史文化基因”，所形成区别于其他城市的差异性、独特性甚至是唯一性。正如杜维明先生所言，全球化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它加强了地域性的认同意识，加深了根源意识，“族群、语言、性别、年龄、地域、阶层和信仰这些根源性的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显出各自的威力”[③] 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特别是“八八战略”在浙江实施以来，浙江城市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机遇，浙江精神得到传承和弘扬，历史文化基因得到激活。通过重构城市人文精神，激活文化基因，推动着古老的浙江焕发新的城市活力，不仅让传统文化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释放出新的魅力，更在继往开来中赋予浙江历史文化传统新的时代生机。

---

①习近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讲话选编》，外文出版社，第 1 页。

②习近平：《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讲话选编》，外文出版社，第 23 页。

③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47 页。

杭州人文历史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距今 7000–8000 年的“跨湖桥文化”，杭州先民已经进入耜耕农业时代。距今 4300–5300 年的“良渚文化”，创造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最璀璨的文化之一。作为杭州历史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良渚文化标示“人、禽、兽”三位一体的图腾图案，追求着“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和谐境界。良渚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成为良渚文化鼎盛时期的核心标志，展示了中华文明最初的社会形态。秦汉时期，杭州文化吸收并融汇了越文化和吴文化，“三面环山一面城”的城市格局逐步形成，杭州城市布局开合呼应、山水互融、自然和谐。五代时期是杭州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阶段，吴越王钱镠定都杭州，吴越文化被称为杭州历史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吴越时期政治上“保境安民”，杭州政局稳定、社会安定，丝织、制茶和造纸等工艺发达，国内商业和贸易繁荣，佛教文化盛行，形成了“普度众生”的大气和反战乱、求和平、民为重的思想文化基础，素有“东南佛国”之称。

进入宋代，杭州历史发展进入新的辉煌时期。南宋时期被称为杭州历史文化发展的第三大高峰，也是杭州传统人文精神日趋成熟的标志性阶段。自绍兴八年（1138 年）南宋正式迁都杭州，杭州成为南宋一百多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北方文化和皇家文化与南方文化、市民文化相互交融，既注重精致和谐，又注重开放兼容，凸显了重和谐、重民生、重自然、重审美的江南城市人文精神。南宋时期各地人才云集，文学艺术繁荣，杭州城市与经济社会发展达到极盛时期，文化空前发展，杭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城市，跻身历史文化古都与文化名城。明清以来，杭州经济、文化发展得到延续，西湖自然山水的秀美，丰富的文物古迹，悠久的人文传统都铸就了杭州独特的历史人文地位。

独特的杭州传统文化历史脉络，塑造了杭州丰富的人文价值内涵。历史上，杭州文化在不同时期均形成了“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传统人文精神，追求精致和谐，体现的是对人生、对自然、对生活、对民生的人文情怀；追求大气开放，体现的是对历史、对创新、对融合、对他者的价值认同。西湖文化融自然山水与人文生态于一体，追求“天人合一、诗情画意”的审美境界

与人文精神；运河文化博采南北文化之所长，兼容并蓄，创新创生；钱塘江文化交融华夏文化与海外文化，推动杭州传统人文精神走向新的未来。

基于文化引领城市发展的理念，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杭州市委市政府站在未来杭州发展的文化支撑角度，赋予了杭州文化名城建设新的目标和新的任务。通过积极重构城市人文精神，大力激活城市传统文脉，以文化强市的理念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以文化树人的导向引领社会新风尚。通过顶层设计、系统推进和重点突破，赋予了城市文化实践的有效载体，在融合历史与现实中有力彰显了城市人文之美。在重构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的系统推进中，特别突出了文化建设对名城建设的厚植支撑作用，重点围绕优化创业发展机制和环境加以深化拓展，重点围绕杭州改革开放中的重大问题来进行深化研究，重点围绕杭州重大发展战略来全面拓展，重点围绕杭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亮点和热点问题来具体深化，使得城市文化特别是城市精神真正切入到杭州的城市发展脉络之中，切入到杭州市民的生活状态之中，激活了历史，塑造了现实，引领着未来。杭州的文化建设实践，有力推进了城市的人文之治，着力打造一座有情怀的城市，特别是近年来，杭州坚持打造世界遗产群落和实施“城市记忆”工程有机融合，坚持完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实施文化精品工程有机融合，坚持文明城市创建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有机融合，高水平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彰显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全面支撑作用，努力打造古老又年轻、包容又执着、宜居宜游又宜业的城市，期盼使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在杭州得到全面展现。

## 二、呈现独特韵味：杭州城市文化建设的实践逻辑

杭州城市文化的时代重塑展示了历史与现实交汇的独特韵味，提升了城市文化软实力。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杭州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得益于杭州得天独厚的自然人文环境，得益于中央和省委的大力支持，得益于杭州人“勇立潮头”的实干精神。研究和解读杭州的城市文化建设，特别需要围绕杭州城市人文精神的重塑逻辑，深入研究杭州是如何呈现城市的独特韵味和别样

精彩的，杭州一定做了非常对的事情。

（一）以文兴城：寻找城市特色塑造城市形象

不同城市有不同的禀赋和文化内涵，如何精准把握城市特色，通过文化和城市精神贯通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塑造城市新的形象，这是现代城市形象塑造的难题。对于杭州城市形象塑造而言，如何实现“古意盎然的传统文化”与“前卫时尚的现代文化”完美融合，“历史文化名城”和“创新活力之城”相得益彰非常关键。

从杭州城市人文精神的重塑实践来看，2002 年，在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明确将杭州城市人文精神概括为“精致和谐、大气开放”。杭州人文精神“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八个字既是对杭州近五千年历史积淀所形成的人文精神的概括，更是新时期塑造杭州城市新发展的文化理念和期盼。杭州城市人文精神的重塑是一个寻找“城市个性”的过程。杭州城市管理者认识到：“个性是城市历史的积淀，特色是城市生命的品格。一座有个性、有特色的城市，才是一座有吸引力、生命力、竞争力的城市。”[①] 同时，更是一个设计“城市未来”的过程。通过杭州人文精神的凝练和表达，增强历史感、文化感、自豪感，一方面强调要珍惜地域文化的传统特色，一方面更要用“大气开放”的精神自我砥砺。

“以文兴城”的杭州实践实际上确立了“文化主导城市发展”的战略，使得城市人文精神真正切入到杭州的城市发展脉络之中。从历届杭州党代会主题可以看出杭州城市形象塑造的变化：2002 年，在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了构筑大都市、建设新天堂的城市形象塑造愿景；2007 年，在杭州第十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为建设生活品质之城而不懈奋斗的发展愿景；2012 年，在杭州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明确提出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的城市愿景；2017 年，杭州第十二次党代会则提出要加快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的城市新形象；2022 年，杭州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

①王国平：《城市论（上）》，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70 页。

提出，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城市形象的每一次跃迁都离不开城市人文精神的注入与实践发展，城市人文精神也带来了城市文化的变革，带来了城市发展空间的变化。杭州迎来了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的历史性变化，城区格局也由“三面云山一面城”扩展为“一江春水穿城过”，从“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到全面推进拥江发展，新时代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城市定位更是对杭州城市形象与国际化水平的再一次跃升塑造。

（二）价值引领：凝聚社会认同培育共同价值

“以文兴城”和“以文化人”是摆在现代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两道考题。在价值呈现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如何凝聚人们的共同价值认同？这是培育城市共同价值的难题。因此，“以文化人”需要虚功实做，这样才能使核心价值在城市真正落地生根。

正如斯特斯·林赛所言：“在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价值观确实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影响到人们对进步的想法。”[①] 杭州明确提出以“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打造“最美之城”，有力彰显了城市人文精神。最值得注意的是：立足于“我们”主体，实现了“有意义”与“有意思”的融合，实现了“价值共振”“情感共鸣”“需求共赢”的融合，实现了“共同价值”与“共同责任”的融合。从 2011 年开始，杭州就推出了“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普遍关注。杭州“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是一个融入“社会生活情景”的价值实践。处理了大众化与生活化的辩证关系，突出了与“我们的节日”融合，同时，还强调与“我们的文化”融合。

杭州“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是一个重塑“新时代精神维度”的价值实践。“最美现象”在杭州不断涌现，成为激励人们学习的草根明星、平民英雄。“最美”从网友表达认同的一个修辞，演化为全社会共同发现和

①[ 美 ] 斯特斯 · 林赛：《文化，心理模式和国家繁荣》，塞缪尔 · 亨廷顿、劳伦斯 · 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43 页。

弘扬真善美的一种现象，根本的力量就源于人们心中对善良等人性基本品质的强烈认同，反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向上向善、崇德尚义的坚守与追求。“最美现象”是一种榜样教育，但并不是传统的榜样教育，“最美”强调的不在于多么“完美”，而在于即便在平凡的岗位也能实现对社会最大的价值。“最美现象”塑造着人文精神，也塑造着新时代的职业精神、公共精神和法律精神等。杭州“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是值得学习的地方恰恰不在于“道德高地”，而在于城市“公共文明”。无论是城市走向“大气开放”，还是国家走向“文明崛起”，都呼唤着现代“公共文明”。

“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和“最美现象”给杭州带来了什么？一是城市公共文明水平不断提升，打造“有温度的善城”。如“礼让斑马线”案例。二是城市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凸显“我们”的参与式治理。在杭州，城市的共建、共治和共享理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以民主促民生”的工作机制，“多元主体复合治理”的治理形式，“开放式决策”的政府治理方式。

（三）延续文脉：保护文化遗存实现城市有机更新

在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破坏表现在诸多方面：城市历史文脉在“拆旧城、建新城”中被破坏，旧城原来的历史格局、历史街区遭到拆除和破坏，城市扩容使城市历史记忆消失，城市化出现了“欧美化”“同质化”“千城一面”。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时专门指出：“杭州是浙江的省会城市，在保护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弘扬历史文化方面应该做得更好。”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方面，要确立政府主导型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以工程项目的方式实施以及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超常规方式等都不难，真正的难题是要通过保护实现传统历史遗存与现代城市更新的有机融合，实现活态保护与有机利用相结合，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再造及民生改善的相结合。城市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不是一点、一线、一面的简单保护，而是一座城的保护与文化空间重塑。

摆在杭州城市管理者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在延续历史文脉中当好“薪火传人”？如何通过文化保护释放古老城市的现代魅力？杭州在城市文化实践

中推进以保护文化遗存实现城市有机更新。城市有机更新的理念更加突出将城市当作有生命力的、系统、完整的有机体，城市也有童年、城市也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要让人们在城市“记住回家的路”，强调以全新的城市功能替换功能性衰败的物质空间。杭州在具体做法中，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全面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把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来抓，总体设计、分步实施，由点到面、由线到片，系统综合、有序推进。并把所有文化遗产保护利用项目都使用“综合保护修缮工程”“综合保护整治开发工程”“综合保护与有机更新工程”等概念。典型的如西湖综保、运河综保、良渚古城遗址综保、南宋皇城遗址综保。

杭州通过综合保护系统推进城市形态、街道建筑、自然人文景观、道路设施、城市河道、城市产业、城市管理的有机更新，实现修复自然生态与修复文化生态的有机融合，实现了城市整体的有机更新。同时，实现了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与重塑现代文化空间相结合，重塑城乡文化空间，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杭州在保护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中的实践启示恰恰在于：“城市有机更新”不是一般的“城市改造”，要实现保护、传承与利用的三者融合，保护对象有历史价值建筑和老城，和老城区更新改造以及中村拆迁是不矛盾的。

（四）激发活力：整合文化资源打响东方特色品牌

杭州有着天然的“三大优势”，第一是环境，第二是文化，第三是人才。相比较其他城市而言，杭州最丰富的资源是“文化”，最不缺的是“文化”。但是难题在于：如何整合文化资源，激发城市文化活力？杭州在城市文化的实践中，一是突出打造充分彰显杭州特色的“全国文化创意中心”，提升杭州文化的影响力；二是突出打造“文艺杭军”，提升文艺精品的影响力；三是突出打造“韵味杭州”，建设“东方文化国际交流重要城市”。

杭州早在2007年就率先提出打造“全国创意产业中心”目标，重点发展信息服务业、动漫游戏业、设计服务业、现代传媒业、艺术品业、教育培训业、文化休闲旅游业、文化会展业等八大门类文化创意产业。杭州坚持对文化创

意产业的内涵和外延只做“加法”不做“减法”。2011 至 2021 年，杭州文化产业增加值从 400 亿元增长为 2586 亿元，年均增速达 10% 以上，占 GDP 比重提高了 8.6 个百分点。特别是 2021 年，杭州全市文化企业顶住疫情反复带来的压力，依旧保持蓬勃向上的良好发展态势，全市规上文化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212 亿元，同比增长 11.6%，占浙江比重 61.5%。数据显示，目前杭州文化产业总量居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

文化创意产业对未来城市意味着什么？文化创意产业是 21 世纪的“黄金产业”“朝阳产业”，是城市发展扬长避短的“杀手锏”，是文化创业和生活品质的“代名词”。杭州城市管理者在理念上很早就认识到：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是创意，灵魂是文化，支撑是科技，属性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给杭州带来了新发展，主要得益于杭州创造了最好成长环境。特别是融合了四大优势：文化资源优势、环境优势、政策优势和人才优势。在文化资源优势方面，充分发挥了杭州独特人文优势，将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生产力；在环境优势方面，用一流的环境吸引一流的人才；在政策优势方面，让政策成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有力杠杆；在人才优势方面，通过聚集创意创新创业人才，着力打造文创人才高地。

一座城市如何把独特的文化资源展示出来，实现活起来、传下去、走出去？杭州突出强调了一个理念：“杭州韵味、国际表达”，提出了一个目标：打造“东方文化国际交流重要城市”。通过“韵味杭州”的国际化实践，竭力彰显杭州特色和活力，努力建成“人文之窗”。当然，杭州的国际化很多方面与北京、上海、广州等还有差距，但是更突出“韵味”。如通过打造“互联网 + 创新创业中心”、国际会议目的地城市、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来为“韵味杭州”提供支撑；打造“网上丝绸之路”重要战略枢纽城市；如通过打造国际化的会展之都和赛事之城，提升本土会展品牌，积极引进高端国际会议、展览项目和国际组织；提升本土赛事品牌，积极引进国际性赛事项目；如充分挖掘东方文化内涵，打造世界遗产群落，提升丝绸、茶叶、中医药、杭帮菜、金石书画等东方传统文化国际知名度。

## 三、文化的力量：杭州城市文化建设的实践启示

杭州城市文化的重塑彰显的乃是对于文化力量的不懈追求和文化价值观的共同凝聚。正是在改革开放40余年来，特别是在浙江精神引领下，杭州城市文化建设在承继传统、面向未来中不断超越和创新，有力彰显了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魅力，推动了杭州城市文化形象的历史再塑造。通过杭州人文精神的凝练和表达，展示了城市精神的价值因子，通过激活城市历史文化基因，有力增强了历史感、文化感、自豪感。

不难看出，杭州城市文化在重构实践中，既突出“以文兴城”，更强调“以文化人”，为城市文化建设的落地提供可能。融通历史与现实，既延续城市文脉，更彰显城市活力，这就赋予了城市发展新的文化生机，同时释放强大的社会文化力量，增强了杭州全市人民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凝聚力。杭州城市发展的经验表明：打造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建设国际文化交流重要城市，要立足传统，突出地域文化认同，积极构建文化主导的未来城市发展战略，牢固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杭州正是通过立足于充分发挥历史人文底蕴深厚的优势，激活了城市人文遗存，修复了人文生态，塑造了城市文化新形象。

文化软实力体现的是无形的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和文化感召力。在文化全球化时代，城市的空间组织过程需要文化来体现，城市的经济增长需要文化来支撑，城市的消费品味需要文化来引导，城市的特色形象需要文化来营造。文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离不开城市人文精神和核心价值的引领。“八八战略”在浙江实施以来，杭州城市发展迎来了最好的历史性机遇，也是杭州城市文化软实力提升最快的时期。不难看出，对于杭州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来说，城市人文精神重塑的时代主题就是要力求实现千年古都风韵与现代化大都市风貌同城辉映，使古老名城再次焕发出生机活力，真正凸显城市建设的文化支撑，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总结来看，杭州通过提炼城市人文精神，力求重塑城市文化形象；通过倡导我们的价值观，力求实现山美水美人更美；通过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力求塑造有生命的城市文化空间；通过激发城市文化活力，力求打响东方文化品牌。当

然，杭州的城市文化建设有“成就”也有“痛点”，如“后峰会、前亚运”的交汇期，杭州城市形象还在提升；如城市的公共文明还在前进，期待着“最美现象”成为“普遍现象”；如城市文化遗存的保护还有很多艰巨的任务；如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够，城市文化国际化传播还显得不足。

杭州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打造世界名城充分展示了“重要窗口”的头雁风采，充分彰显了“重要窗口”的文化魅力。杭州城市文化的时代重构和实践留给我们很多思考：第一，对于城市来说，坚定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话，延续历史文脉、展示当代文化气质是每一个城市发展必须谋划的特色路径；杭州的城市文化建设作为一个整体案例，正是贯彻“八八战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重要论述的生动写照；第二，城市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干成的，“八八战略”以来，杭州历届市委高度重视，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为杭州文化建设接力前行、添砖加瓦；第三，重塑城市人文精神，推进城市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有机工程，要写好“城市文化”建设这篇文章，需要深入思考“文化城市”和“城市文化”的辩证关系，力求以“文化城市”的理念引领“城市文化”的建设；第四，文化的力量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也能够变成凝聚人心的力量，城市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为了城市中“人”的成长，要找到“城市成长”和“人的成长”的同频共振、最佳契合，让人在城市中越来越幸福，期盼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 抓住亚运会契机
# 促进杭州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

◎张敬业[①]

**内容提要：**“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举办国际盛会对一座城市来说，既是提升自身发展内涵的强大引擎，也是塑造国际形象、促进国际传播的重大契机。自 2016 年 9 月成功举办 G20 峰会以来，杭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赋予的“历史文化名城、创新活力之城、生态文明之都”城市定位，加快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国际知名度也有了一定提升。本文聚焦“杭州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这一城市发展命题，从“谋”（传播目标）、“道”（传播规律）、“术”（传播方式）三个维度来探讨杭州如何抓住亚运会契机，进一步塑造更具国际化的城市形象。

**关键词：**城市形象；国际化；传播目标；传播规律；传播方式

承办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给杭州的重大政治任务。办好杭州亚运会，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良好形象的重要窗口、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中国建设体育强国路上的标志性事件，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新征程中的重要篇章。尽管当前亚运会已确定延期，但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杭州继续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相信延期后的

①作者简介：张敬业，男，中共杭州市委党校二级主任科员，研究方向：城市形象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联系电话：17857334384。

亚运会终将获得圆满成功。因此，我市仍要抓住举办亚运会为契机，明确传播目标、遵循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方式，大力促进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让世界更好读懂杭州，让杭州更好走向世界。

## 一、明确传播目标：以“重要窗口”统摄杭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

杭州作为“重要窗口”省会城市，要在举办亚运盛会过程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通过这扇窗口展示好洲际体育盛会的活力、杭州城市的独特韵味、中华文明的巨大魅力和“中国之治”的实践伟力。

1. 提高赛会活动传播正向度。应广邀海内外各类媒体，围绕亚运场馆、开闭幕式盛、赛事情况、赛会服务开展一系列高规格、高强度的正向集中传播，展现一届充满“中国特色、浙江风采、杭州韵味”精彩纷呈的体育盛会。同时构建舆情风险管控体系，细致甄别潜在负面舆论信息，第一时间妥善处理包括因延期等因素而可能会引起国际负面舆论的事件，有效规避相关负面舆情，将舆论有力引导向展现中国经济韧性、制度优越性，以及杭州统筹经济发展、疫情防控和赛事筹办的不懈努力等积极方面。

2. 提高城市形象推介有效度。通过亚运会举办前后对杭州的长时间、全方位媒体聚焦，将关注度引流到杭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创新活力之城、生态文明之都和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的各方面，在亚运报道中实现杭州形象得到自然而然的传播，杭州声音得到不知不觉对传递，从而提升杭州城市形象的传播力、影响力和感染力，让杭州更加自信地融入世界，让世界更加可感地了解杭州。尤其是面对赛事延期的客观情况，应继续努力保持传播的热度和有效度，既及时回应公众对亚运会延期的疑虑和筹办进展的关注，又充分展现组委会灵活有力应对延期这一客观情况的举措。

3. 提高中华文化展示认同度。通过对宋韵文化、良渚文化、西湖文化、运河文化、钱塘江文化和茶道文化等杭州本土特色文化的系统展示，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通过亚运会场馆、工作人员服饰、奖牌、场地布置等蕴含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载体，以及志愿者优质服务，展

现中华“礼仪之邦”的传统文化以及杭州“礼仪之都”的城市形象。特别是杭州作为曾经的南宋都城，宋代“风雅处处是平常”的生活方式和隽永深沉的生活美学延续至今。可考虑结合宋韵特色和亚运主题，高标准举办宋韵文化节，实现古典韵味美与现代科技感的精彩碰撞，为国内外市民游客带来古今交汇、时尚经典的文旅飨宴，从而打响宋韵杭式品质生活品牌。

4. 提高“中国之治”方案引领度。作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举办的一次盛会，杭州亚运会还应通过高效高质的组织筹备、运转良好的赛事流程、面对延期的有力应对，向世界更好诠释“中国梦”的深刻蕴意，并向世界展示“中国之治”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显著制度优势，展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追求，理直气壮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中国故事杭州故事，为政党建设、全球治理、国家治理、城市治理等重大课题提供更多方案、贡献更多智慧。例如杭州致力于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数字治堵”“数字治疫”“最多跑一次”等数字化改革卓有成效，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创新，更是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城市未来发展模式的创新，为“中国之治”方案提供了鲜活素材。

## 二、遵循传播规律：以“受众需求”统领杭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

在全球化与全媒体时代，国际受众群体思想多元、需求多样、关注多变。开展城市形象国际传播，要加强对时代特点、传播规律、受众需求等的把握，增强传播的分众化、精准度和有效度。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实现国际化：

1. 实现话题理念的国际化。就国际关注共同的话题，通过体育展示城市，通过城市折射中国。围绕文化遗产保护、缩小贫富差距、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数字经济、体育产业、城市可持续发展、亚洲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等国际共同关注的话题、共同秉持的理念开展交流活动。如以良渚、大运河、西湖西溪等文化遗产为重点，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文化遗产保护论坛”。与亚奥理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协调，合作开展体育文化活动、体育产业论坛，赛后利用亚运场馆举办国际级体育赛事。在友好城市、姐妹城市、

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城市范围内，选择若干个重要城市开展城市文明互鉴活动、数字经济峰会等。

2. 实现载体渠道的国际化。在 Twitter、Facebook 等海外社交媒体开设杭州亚运会专题账号并进行深度运营。与央视外文频道、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社国际部等国家级权威国际传播机构合作，共同邀请世界主流媒体、海外华文媒体来杭采访，深入发掘杭州素材，充分利用各类国际传播报道资源讲好“杭州故事”。杭州日报、杭州文广集团等本地媒体也可开辟对外宣传阵地，加强国际传播内容建设，与外国知名网络媒体保持交流，拓展与境外主流媒体的网络合作传播，把本土优质的外宣产品传播到海外。总之应多措并举实现主要境外社交媒体、国际传播渠道的全覆盖，形成庞大的端网融合全媒体国际传播矩阵。例如杭州市文广旅游局就在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三大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常态化开展了以亚运主题推广活动。通过“杭州老外不见外”人物视频、“苏东坡在杭州的新生活”互动漫画、“亚运知识”图文内容、“我在杭州过新年”互动活动等形式，吸引海内外游客关注杭州亚运会和杭州特色文化。

3. 实现话语体系的国际化。可通过系列宣传片、微电影、短视频、音乐剧等多种形式，用小切口反映大时代、小故事反映大主题，用通俗易懂的国际化话语体系、丰富细腻的视听元素和生动多元的呈现方式，充分展示真实全面立体的杭州。例如拍摄城市微电影，以亚运题材故事为主线，串起杭州的标志景点、地域民风、人文底蕴和亚洲情怀；制作在杭外籍人士看杭州、亚组委工作人员看亚运、杭州普通市民看亚运等相关短片，从不同人士的视角展示城市和盛会，解说词、台词、脚本尽量采用符合国际潮流又蕴含中国文明内核和价值观的话语。还可在海内外的社交媒体矩阵上策划粉丝互动活动，通过一条条高转发量、评论量的爆款推文、图片及与粉丝评论互动的生动话语，增强用户粘性，在粉丝群体中形成情感共鸣。例如杭州市文广旅游局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就通过“杭州姐妹城”投票活动、“杭州文物轻科普”动画、“杭州冷知识”系列等内容版块立体真实讲述杭州故事，创造更多互

动话题，引发杭州与海外粉丝的情感共鸣。

### 三、创新传播方式：以“国际视野”统筹杭州城市形象国际传播

那么在利用举办亚运会重要契机，推广城市形象过程中，如何创新国际传播的方式？建议构建以我为主、丰满鲜活的大外宣格局，推动杭州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方式加快转型升级。

1. 理顺机制体制，塑造统一格局。建议由省市委宣传部统筹建立亚运会外宣联席会议，以此为抓手统筹包括宣传、外事、体育、文旅、侨务等单位在内的全市国际传播资源，构建杭州亚运会高效统一的大外宣格局，做好系列主题发布和舆论引导。做好顶层设计和战略对接，主动融入国家国际传播战略布局，用杭州故事论证中国大叙事，提升国际传播的层级和动能。例如深入挖掘展示具有示范效应的杭州经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数字政务及产业发展、杭州“最美现象”、生态文明实践等。统筹打造亚运会国际传播“中央厨房”，提供兼具权威性与流行性的多语种“信息源”，突出亚运会权威信息供给力度，以权威信息权威塑造杭州城市形象。统筹建立“杭州城市形象资源库”和“杭州城市形象 IP 库”，杭州城市形象资源库”汇集全市优质的影像资料、图片资料、文字资料，搭建杭州城市形象推广“资源库”；“杭州城市形象 IP 库”则设定门槛，接受全球、全社会高品质的城市形象推广作品、产品、项目申报入库，对入库作品、产品和项目给予资金、政策上的扶持①，力争将处于半成品、成品状态的素材作品打造成彰显杭州魅力的经典，输出更多带有杭州印记的城市 IP。

2. 打造文化仪式，开展高端合作。亚运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一场主场外交。应与国家有关部委、亚奥理事会通力合作，搭建好亚运中国年里的主场外交舞台，宣传好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绿色文明”等理念，开展中外务实合作，彰显国家软实力。还要主动策划、积极打造一

---

①吕鸿、孙悦文、陈书焕：《借鉴上海经验，打造海南大外宣格局》，《海南日报》2021 年 6 月 11 日。

系列亚运主题、杭州主题的文化仪式、营销事件，抓住亚运会契机广泛持续吸引眼球，保持长期的城市形象国际传播温度和效果。例如办好“亚洲之光”国际艺术节和世界知识产权大会，创造具有创意性的体育主题城市节日，包括亚洲体育文化节、世界体育产业节等，精心打造国际交流会客厅。加强与海内外权威媒体、高端智库、学术机构、知名社团的合作，借助其既有的知名度、影响力和传播力，将城市形象表达融入国际话语体系，通过国际传播渠道，直面国际主流受众，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促进民间交流，增进国际认同。在城市形象国际传播中，在坚定以我为主的官方、主流传播体系的同时，应加强对多元创造、传播主体的探索和使用。例如发动企业、艺术馆、博物馆、艺术团队等民间力量融合中华传统文化，共同塑造、推广杭州城市形象的视频、图文、漫画、游戏等艺术表现形式；在全市大中小学生和青年志愿者中发起“亚运小信使致信世界知名人士和运动员代表”活动，向世界企业家、国际组织领导人和亚运会运动员代表发出邀请信、鼓励信，让城市形象宣传更有温度、更富活力。组织开展“世界看杭州”“印象杭城”主题沙龙、“爱在杭州”国际文化交流日等系列活动。邀请在杭州外籍人士、全球媒体记者以“杭州新市民”的身份，在日常生活、城市体验中增强对城市的感知和认同。以地方特色文化为元素，通过设计制作“龙井茶具”“DIY 油纸伞”、新派杭扇等兼具文化展示和实用功能的文创产品进行派送，演示非遗工艺全流程，品尝杭州地道小吃等主动贴近服务，使各国朋友加深对杭州的了解和喜爱。推出《你有一封杭州亚运会的来信》互动 H5 游戏，以与杭州有关的设置问答，吸引网民的参与，通过社交媒体发酵，掀起二次传播。

4. 分类精准传播，优化文化体验。可根据目标受众进行分类精准传播，优化提升文化体验。例如将目标受众分为三大类：一是没有来过杭州的一般国外受众，适合通过较为统一的传播内容、大面积覆盖的传播覆盖进行传播，根据不同国别进行针对性内容投放，例如制作城市宣传片，建立国际化社交账号联动传播。二是来过或将要来杭州的外国受众，可通过做好酒店、交通

枢纽、景点等接触点的城市品牌管理，举办相关国际会展、行业论坛，开发介绍杭州的城市形象、交通设施、酒店情况等信息的一站式微信小程序来传播。三是居住在杭州的外籍人士、华侨家属，可开展较长期的渗透式传播活动，例如宣传好杭州亚组委“场馆惠民”理念，报道相关场馆在完成赛事功能验收基础上提前向公众开放的举措，全景展现市民提前感受亚运赛场的氛围、提前享受在高水平场馆运动的乐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杭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也提出“奋力打造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抓住亚运会契机，促进杭州城市形象的国际传播，既有利于讲好杭州故事、浙江故事，打造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也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因此必须牢记领袖嘱托，克服疫情和延期带来的困难和不确定性，确保办一届成功、精彩、经典的亚运会，并乘势而上全面提升城市开放能级，推动杭州的国际城市魅力、国际传播能力再上新台阶。

# 为世界赋码，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 。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契机

◎徐李萍[①]

**内容提要：**杭州在抗疫技术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也走在世界的前列。健康码已经成为全球城市防控疫情的标配。由于多种原因，新冠肺炎疫情还将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流行，这就为健康码在全球的推广和普及留下了时间和空间。国际电话区号作为美国向世界输出的技术标准，在数字化时代已经部分地丧失了先进性，也不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主义政治诉求。鉴于健康码具备标识行政区域的功能，因而有望取代国际电话区号，成为数字时代新的全球标识系统。因此，杭州可以凭借健康码向世界输出“中国标准”，从而确立并巩固其作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地位。

**关键词：**健康码；杭州；新冠肺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近日，安徽爆发了新一轮的新冠肺炎疫情，截止7月5日凌晨，安徽本轮疫情累计确诊858例感染者，泗县798例。新冠肺炎远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在未来不短的时间里，我们仍将与之共处。新冠肺炎已经持续快三年了，给

①作者简介：徐李萍，女，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校教师，联系电话：13588767758，邮箱：ZYS-xlp@qq.com。

世界各国带来的破坏是巨大的，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杭州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来说，是一个契机。以下，笔者将简要论述其中的理由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 一、“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题解

2022 年 2 月 23 日，杭州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会议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成为杭州市未来五年的行动指南。这一宏伟目标赋予杭州的未来多重美好的期待，也表达了新一届杭州市委的雄心壮志。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杭州并不是第一个，学界也已经积累了不少解释这一宏观概念的研究成果，加深了我们对这一奋斗目标的理解。以下笔者将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角度提出一点浅薄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是一个常态化的概念，本来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一阶段性的事件基本没有关联，但是两者事实上存在内在的联系，以下笔者将展开具体论述。

其一，有效的抗疫措施能够满足都市人口对安全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存在的，是城市正常运行的前提。都市是人口密集的区域，尤其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人口规模一般在 1000 万以上。此外，大都市发达的交通系统给个体的流动和病毒的扩散创造了条件，使得疫情防控的形势更加严峻。没有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大都市会成为一个危险的病毒漩涡。因此，在疫情流行的非常时期，大都市作为一个向人类提供幸福美好生活的地方，必须要首先能够保障居民的安全，让安全的需要从幕后走到前台。

其二，抗击新冠肺炎是一个全球性的事件。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在人际间传播的生物性病毒，跨越了所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种族的、性别的、年龄的等人为的界限。目前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并且也都有死亡病例。很明显，新冠肺炎的流行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大都市是人类精英的汇集地，是人类文化的中心和创新能力

的摇篮，成功击退新冠肺炎的希望在大都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任何举措，如果是成功的，都会产生惠及全人类的结果，从而提升城市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其三，城市疫情防控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特征。疫情爆发初期，中央动员全国的力量扑灭武汉的疫情，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而且也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这种集体主义的精神一直在发挥作用。中国的抗疫还践行了“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实行“全面开放、全民免费”，使得城市的最底层也感受到了社会主义的强大和温暖。

此外，目前世界上采用的抗疫技术是发源于杭州余杭区的健康码。余杭区的健康码诞生于紧急抗疫的初期，一周之内在全国推广，之后被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认可和采纳，成为“美版”健康码、“澳版”健康码等的原型。因此，城市抗疫的科技手段诞生于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体制机制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印记。

其四，抗疫采用的技术手段体现了城市的现代化水平。现代城市的规模十分庞大，人口众多，结构复杂，城市的治理依靠人的脑力已不足以应对。进入数字化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手段自然而然就嵌入到城市的治理过程中。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当前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科技抗疫成为不二之选。杭州近十几年来在运用高科技提升城市宜居性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是城市大脑的诞生地，也是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之城。时势造英雄，杭州研制的健康码已经成为全球城市防疫的标配，可以说，杭州具备从科技角度实现世界一流的现代化都市建设的基础。

## 二、新冠肺炎疫情流行将持续较长的时间

新冠肺炎疫情自 2019 年 11 月爆发以来，至今已有两年多了。得益于党中央的英明领导，疫情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转入平稳，转入常态化防控阶段。根据笔者的观察，在医学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之前，常态化抗疫仍将持

续较长的时间。主要基于以下五点理由。

其一，国外资本主义国家消极抗疫。

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常常与该城市从境外输入的新冠肺炎病例数量呈正比。北京、上海是我国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同时也是境外输入病例较多的城市。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时代大背景下，杜绝境外输入的病例的可能性较小。

资本主义国家特殊的文化传统使得抗疫的相关措施难以落实，加上美国等国家奉行错误的抗疫立场，认为新冠肺炎相当于大号流感，选择群体免疫来应对，对疫情的流行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境外输入积累的病患数量越来越多，境外输入病患的危险越来越大，疫情的终结变得遥遥无期。

其二，新冠肺炎病毒的潜伏期长，且变异速度非常快。

新冠肺炎被认为是百年不遇的烈性传播病毒，不仅在人与人之间有极强的传播能力，而且有很长的潜伏期。从目前国内的新闻报道来看，最长的潜伏期有 90 多天。将近三个月的潜伏期，如果用人为干预的方式进行防控，国家的医疗资源和掌握的行政力量是无法与之抗衡的；个人的生活如果停摆三个月，大多数人都是难以承受的。目前实行的隔离期只是一个折中的普遍标准，隔离效果从根本上来还是带有某些不确定性的。

此次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流行，根绝疫情的流行需要医学研制出有效的免疫疫苗。国家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为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防疫资源，疫苗接种方面遵循“应接尽接，全面放开”的原则，人口中的大部分，尤其是社会流动性较大的人群基本都已经接种了疫苗。然而，一旦新冠肺炎病毒再次变异，已接种的疫苗的有效性就会出现变数。

其三，民众的抗疫能力和抗疫意识参差不齐。

遏制新冠肺炎的传播有赖于民众高度的责任感和自我保护意识。在常态化阶段，疫情在国内局部地区间歇性地爆发，有的地区还出现了零星的清零现象。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民众很容易产生麻痹心理和侥幸心理，出现抗疫

松懈的现象，出门也不戴口罩了，聚集也多起来。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社会，人口中的老年人数量多，很多老年人不能及时掌握政府发布的疫情信息，从而及时避开高风险地区的旅居人员；婴幼儿和老年人一样，行动能力和范围有限，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但是婴幼儿自制能力低，不愿意也无法完全配合防疫抗疫的相关要求；还有些流动性大的成年人不能正确地佩戴和使用口罩，一次性口罩高频率地重复使用，对病毒起不到应有的防御效果。

其四，民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错误理解。

病毒的溯源工作揭示出新冠肺炎很可能来自野生动物。事实上，对人体有害的病毒在自然界的分布极为广泛，数量上达到几十万种，目前人类掌握的仅仅有 3000 多种，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些病毒都生存在大自然的原始环境中，大多数时候，我们和病毒是“和平相处”的。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民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很多地区早已越过了温饱的水平线，日常的饮食已经无法满足民众对食物的多样性需求。在多年来国内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不少人便错误地把这种对生态文明的推崇理解为对“野味”的向往和追求。所以，民众贪吃的陋习使得很多本不是大众食谱上的野生动物也进了厨房，这就给病毒接触人类的机会，从而导致疫情的爆发。只要这种对生态文明的错误理解继续存在，人类接触病毒的可能性也会继续存在。

其五，数字技术的基础性建设尚不完善。

防控疫情的第一步是识别病患并加以隔离。由于新冠肺炎有较长的潜伏期，使用传统的肉眼识别的办法已经不可行，尤其是因为潜伏者很可能也带有传染性，识别病患不仅是已经确定的感染者，同样可能的感染者也需要识别出来。自从大数据技术出现以来，这种识别可能的感染者的技术条件就具备了。

大数据依托遍布在城市空间的大量的传感器和数据挖掘技术，实现对个人活动的精准定位，从而满足从时空重叠角度筛查可能的感染者的要求。毫

无疑问，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将有赖于城市新基建的时空分布的广度和密度，还有赖于居民主动的配合，能够主动承担起信息生产者的角色。当新基建的传感设备分布不够广泛和密集或出现故障，或者当民众没有养成扫地址码的习惯或意愿，那么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新冠肺炎的防控就会出现漏洞。

### 三、推广健康码作为全球行政标识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全球常态化抗击新冠肺炎的行动中，杭州从科技角度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机遇已经到来。但是，需要一个现实的机制来帮助杭州进一步巩固由健康码的推广使用带来的国际影响力，并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结束后的更长的时间里继续强化杭州作为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地位。

健康码的基本原理

健康码是一种用来对人群进行分类防控的技术手段。健康码分为红、黄、绿三种颜色。不同的颜色代表疫情防控的不同等级和相应的隔离措施，红码要求持码人员隔离 14 天，黄码要求隔离 7 天，绿码可以自由通行。

健康码的赋码规则从推出到现在经历了两次迭变。健康码最初推广的时候，是通过居民自主申报，即在手机终端上录入健康状况，按照不同的健康状况赋予个体不同颜色的健康码。比如有咳嗽或发烧或四肢无力等一项不良健康状态的居民被赋予黄码，如果多种类同新冠肺炎症状同时出现，就赋予红码。之后赋码规则发生了改变，采用了时空重合的原则，与确诊病例存在时空重合的居民都被赋予黄码，这是健康码的第一次迭代。再之后，时空重合的范围扩大，如果在一个行政区内出现病患，就将整个街道甚至整个区的居民都赋予黄码。如富阳的一个街道出现了病患，整个街道的居民都被赋予黄码；拱墅区也曾因为出现确诊病例而将全区的居民赋予黄码。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健康码的赋码范围逐渐与区域的行政边界重合，由此可以推知，健康码除了为居民分类以外，还具有标识行政区划的功能。

国际电话区号的简单分析

国际电话区号是国际电信联盟根据 E.164 标准分配给各国或特殊行政区的代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被划分为八个区，北美是第一个区，亚洲属于第八区。一个国家对应一个代码，如美国和加拿大的代码为 1，中国的代码为 86。

国际电信联盟是联合国内的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分配和管理全球无线电频谱与卫星轨道资源。国际电联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其成员包括 193 个成员国和 700 多个部门成员及部门准成员和学术成员。这个看似中立的国际组织事实上遵循的是技术为先的原则。全世界划分的八个区，北美排第一个，美国的电话区号也是所有国家中最前面的。这是因为在电话通信的时代，美国处于通信技术的顶端，是当然的“标准制定者”。美国向全球输出“美国标准”，成为“世界一流”的高科技国家。因此，能够向全球输出技术标准的，就成为“世界一流”的某种不言而喻的要求。

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是长久以来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这与美国发达的科学技术有很大关系。美国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发达的经济水平吸引了全世界很多优秀人才，尤其在世界大战期间还收留了许多被迫流亡的世界顶级科学家，其中包括爱因斯坦。在东欧解体之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凭借雄厚的技术优势，美国牢牢占据着全球技术的制高点，不断向世界输出“美国标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处在一个美国为世界制定标准的时代里。形形色色的“美国标准”巩固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也便利了对其他国家实行意识形态渗透。

国际电话区号就代表着美国在电话通讯时代对世界的掌控权。进入数字化时代，电话通讯的先进性已经部分地丧失了，而且由于这一编码系统内部的缺陷，用户在使用方面的体验不是十分令人满意。因此，在客观上，一种新的、符合数字时代的全球行政区划编码规则应该被生产出来。

新的赋码规则的三点说明

健康码具有标识行政区划的功能，这与国际电话区号的功能是一样的。同时，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已经转入常态化阶段，并且在一个不短的时间内都不会结束，这样就为健康码在国际社会的推广和普及留下了时

间和空间。

关于健康码的行政标识的设计和推广，还有三点需要特别说明的地方。

（1）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国际电话区号作为一个“美国标准”，体现了美国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反映了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国提出了在国际社会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这一主张必然不同于全球霸主，不会谋求在技术系统中体现霸主意图，而是将现有的国家和地区都视为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取代国际电话区号的赋码系统必须使用平行的标识，脱离所有歧视性的历史语境。

健康码作为一种国际赋码方案，其目标是取代“美国标准”，推出“中国标准”，但不是制造一种新的“美国标准”，不是要步美国的后尘，而是要在技术系统中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在技术系统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的理念。

国际电话区号使用的是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是具有序列性的数列，有大小和先后之分。在全球很多文化中数字还具有隐喻的象征意义，因此很容易产生超出标识功能之外的文化价值衍生物。健康码是一个二维码，几乎没有序列性，也没有歧视性，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平行标识系统。

（2）实现国际层面的统筹

杭州推出的健康码如果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就是成功输出了“中国标准”、“杭州标准”。作为一个制订标准并输出标准的城市，无疑在全球技术体系中是处于“世界一流”的地位的。但是，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行为，健康码提供的仅仅是技术方案，方案的推广主体是国家，健康码的设置是一次国际层面的统筹。

由于世界上只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适用于千万人口以上的二维码存在信息冗余。由于二维码的信息容量更大，对全球地域的标识能力将远远超过国际电话区号系统，从而使得国际疫情防控更加精确。健康码可以赋予国家、城市甚至更小得多的行政地域一个电子身份标识，就像中国的居民身份证一样，全球统一、全球唯一。

何者在国际社会中被公认为是一个“单元”，这需要国际社会的认同，同时不能与国际法相违背；何者值得被赋予一个单独的标识码，这需要从具体的时代形势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数字世界中的任何一个“1”，都代表了一个合法性的成立。

（3）将当前的抗疫与长远的目标结合起来

国际电话区号使用阿拉伯数字，健康码使用二维码，阿拉伯数字和二维码之间的区别是信息时代和数字时代的天壤之别。相对于日常使用的语言文字，其精确性有质的飞跃。语言文字是在国际电话区号这类阿拉伯数字标识系统诞生之前，国际社会通用的在国家层面上标识行政区划的技术系统，简单说就是国名。如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就是“美利坚众合国”等等。但是我们知道，“美国”只是一个音译，是对 American 的第一个发音的截取，因此“美方”这一称谓是不准确的，由于汉语言文字的多义性，在不同的语境和句子结构下，会产生游离于目的语境的其他意义。总之，国名相对于二维码的数字化身份标识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精确性。

二维码所具备的精确性将能够满足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精准追踪和定位的需要，同时二维码的数字化能力更强，如果将这套编码系统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其他方面，将大大提升国际社会运行的自动化水平。这对于国际社会的发展来说具有长远的意义。

# 餐饮油烟污染监管市监困境与对策

## ——以萧山为例

◎陈　莹[①]

**内容提要：**随着“放管服”改革和机构调整，环评豁免、审批流程简化、二证合一等商事制度改革，证照审批程序简化，激发了创业热情，但流程的简化也使市场监管餐饮油烟工作产生新的痛点和堵点，亟需解决。具体表现在立法不能满足现实发展、餐饮单位经营需求和法律法规之间矛盾突出和餐饮油烟污染监管存在盲区。解决餐饮油烟污染市场监管执法难题需要在法律层面进行制度架构，即市场监管系统内部精简法规统一标准、衔接配套部门间相关法规和监管标准、形成全过程无缝隙审批、监管链条，推动执法重心从事前审批和向过程监管和事后监督转变，以从根本上解决餐饮油烟污染问题。

**关键词：**餐饮油烟污染；市监执法困境；法律对策；杭州市

2013 年 9 月 10 日，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开展餐饮油烟污染治理。2018 年 10 月 26 日，《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2017 年 9 月 1 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华人民共和

①作者简介：陈莹，女，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三级主任科员，联系电话：13675834058。

国环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实施后，餐饮项目环境影响备案表采用网上备案制，无需取得环保审批手续即可获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以下简称环评后置）。2016 年 12 月 21 日，《杭州市大气污染防治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六条：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以下简称“禁开区域”）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申请在上述区域从事餐饮服务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得核发餐饮服务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环评后置及《规定》实施以来，餐饮无证无照及投诉举报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从表面看是餐饮行业准入问题，具体表现在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得核发问题上，究其根源是“禁开区域”餐饮单位油烟问题。

本文通过对 2019—2021 年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油烟类案件查办现状进剖析，分析餐饮油烟案件的特殊性和监管执法困境，进一步提出餐饮油烟污染监管执法的策略和实践建议，为相关案件执法提供参考。

## 一、案件查办现状

2019 年至今，萧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餐饮投诉近 4000 件，其中涉及餐饮油烟的投诉近半数；共办结餐饮无证无照案件 400 起，罚没款 130 余万元。根据目前已办结的案件统计，从案件主体来看，多为“禁开区域”餐饮单位。从案件的违法行为来看，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活动案 24 起，小餐饮店未按规定取得登记案 110 起，无照从事餐饮服务案 240 起。从案件的法律适用来看，以违反《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做出处罚的案件，达 240 件；其次是以违反《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做出处罚的案件数达 110 件；再次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做出处罚的案件数达 24 件[①]。

①张朋、乌云图雅：《重庆市两江新区餐饮油烟污染防治对策的研究》，《皮革制作与环保科技》2021 年第 12 期。

## 二、餐饮油烟污染的特殊性

（一）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饮单位数量多但规模小。被投诉举报的餐饮单位经营类型基本为小型及以下餐饮店，都是涉及民生的中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沿街人流密集等“禁开区域”，经营业主中外来人口比重大，经营场所多为租赁，其中因“禁开区域”而不能办理餐饮许可证照的占多数。

（二）产生油烟污染的餐饮单位多为无证照经营或超范围经营。从事餐饮经营活动应当取得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且经营许可范围均明确规定是否包含热食类食品制售等产生油烟污染的项目。实践中，“禁开区域”部分餐饮单位因不符合《规定》第二十六条，但出于经济利益，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热食类制售。

（三）餐饮油烟污染变动性较大。与其他类型的大气污染相比，餐饮油烟污染排放量不大且可控，并且也不涉及有毒有害和危险品等。投诉主体均为餐饮单位排烟口附近的居民，偶尔同行商业竞争对手；投诉反映时间多集中于早、中、晚三餐前后；油烟排放量与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相关。故城市餐饮油烟污染的变动性较大，不利于油烟污染的监测、采样及执法的现场取证①。

## 三、居民楼宇底层餐饮油烟污染监管执法困境

环评后置及《规定》实施以来，从餐饮单位的反馈以及实际监管执法中面临困境，具体如下：

（一）前置审批取消带来新投诉

自 2016 年商事制度改革启动后，取消了“环保前置审批”，餐饮单位涉及油烟、异味、废气等的环境评价项目不再是餐饮业证照登记的法定前置项目，经营者只需提供房产证、租赁合同、身份证即可办理工商执照。其中对面积 ≤ 50 ㎡的小餐饮店，只需填写三小数据采集表即可完成备案登记；对面积 >

①郑桉：《餐饮油烟排放标准综述及检测技术探讨》，《品牌与标准化》2022 年第 2 期。

50 ㎡的餐饮店，需提供的资料也仅为食品安全规章制度和平面布局图等，去现场核查的核查表内条款也均与食品安全管理有关，并未涉及是否会产生油烟等环境污染内容。因此，单凭申请者提供的资料，市场监管部门是无法确切了解经营场所具体位置、烟道设置情况以及与周边建筑的相对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本行政区域内有“餐饮禁设区域目录”的，则市场监管部门往往也只能告知申请人哪些区域禁止开设油烟餐饮服务项目。于是，在这样的审批制度下，经营者在开店位置的选择上有了更大的空间，而居民针对市场监管部门为何批出这样的餐饮证照的投诉也越来越多，2019 年至今，萧山区因为油烟噪音扰民等原因投诉市场监管部门不作为的政务热线、信访、电话投诉等来件就达 2000 件，还不包括各基层所现场接待的投诉举报等。

（二）立法不能满足现实发展

《规定》涉嫌与上位法冲突。根据《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4〕50 号)、《国务院关于“先照后证”改革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意见》(国发〔2015〕62 号)精神和《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国市监注发〔2021〕17 号），食品经营许可和环保审批均为营业执照的后置审批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登记前必须报经批准的，市场监管单位不得随意增设营业执照前置审批条件。

此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以下简称《2021 年版》)进行修订，餐饮项目无需纳入环保审批手续即可获批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即餐饮行业环保豁免审批备案。而《规定》作为一部环境保护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对包括经营者在内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当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其对市场监管部门“禁开区域”餐饮证照核发设置了禁则，却没有相对应的罚则。且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并非大气污染防治法的执法主体，按照职权法定的要求，不能以遵守法律为由超越职权行使其他行政机关的职能。如萧山某一店面，因为疫情影响已空置数月，房东于 2021 年中旬将该处店铺租赁给他人经营餐饮店。楼上业主得知后赶至市监登记窗口，以行政执法已表态此处不适合开设餐饮店为由，现要求注册人员以《大

气污染防治法》为依据而不予审批。而房东则因自己为合法合规商业产权，疫情影响经济损失巨大，且《大气污染防治法》非行政审批法律依据而要求必须办理。双方人员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争执不下，并双双拿出手机进行录像拍摄，表示不满足己方要求就对市监进行投诉或曝光，给审批窗口工作带来困扰。因而现行的《规定》与上述法律法规难以有效衔接，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且实施六年，尚没有根据新《2021 年版》和现实变化进行相应的修改。

《规定》“禁开区域”界定模糊引发新困扰。《规定》对餐饮业的“禁开区域”或是过于绝对，如“商住综合楼”部分，在城市遍地都是商住综合楼及餐饮业受疫情影响的当下，此类店面禁止开设餐饮是否合情合理；或是对“禁开区域”描述过于笼统，如后期改造或加装了专业烟道的商住综合楼是否可以算“具备特定条件”而准予开办餐饮等等。对此，没有权威的判定依据。例如，萧山市心北路沿线商铺是集商住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区域，楼下商铺以餐营业为主，因噪音和油烟问题，楼上住户和楼下商铺房东、经营户冲突不断，小区业主们除投诉举报市场监管部门不作为、要求此处不予办理餐饮类执照等外，还经常性来属地市监所质问为何审批出此处的餐饮证照，给基层日常工作带来困扰。

《规定》导致食品经营许可审查标准不统一。《规定》实施以来，在“禁开区域”已核发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服务经营者，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后，不再变更、延续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但食品经营许可证与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三小备案”有效期不同。如面积小于 50 平方米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取得的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或是在营业执照上进行“三小备案”的有效期是长期，即使同在“禁开区域”，其也不会面临到期无法延续的问题。对此，近期已有不少“禁开区域”食品经营许可证即将到期无法延续的经营者反映，认为相关政策设置不公平。又如某小区饮品店涉嫌无证照经营投诉举报案为例，该小餐饮店未取得热食类食品制售三小备案证，且在申请备案的过程中，超出《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要求，无法审批通过。在案件调

查处理过程中，发现该小餐饮店通过多次变更，变更了企业类型、单位名称、经营范围，最终获得了热食类食品制售三小备案证。对相似的情况却适用完全不同的规则，执法标准不统一也给基层执法人员造成实践困扰。

（三）餐饮单位经营需求和《规定》之间矛盾突出

目前，萧山区共有餐饮单位近1000家，主要集中在沿街人流密集区域，“禁开区域”餐饮单位占了近半数。“下为店面，上为住宅”是城市设计中常采用的一种模式，很多小区规划开发时，并未明确区分餐饮用房和一般商业用房，更没有修建专用烟道和餐厨废弃物处置设施，为“禁开区域”餐饮油烟扰民等埋下隐患。《规定》实施以来，一方面“禁开区域”已获证照的餐饮经营者在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的过程中，不符合《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另一方面，城市遍地都是商住综合楼等“禁开区域”及餐饮业受疫情影响的当下，因无法新开办或者延续蒙受损失引发不满，甚至部分餐饮单位采取种种策略规避行政审批，或未获审批就擅自开展经营活动，或虽经过审批，但不按照审批批准的内容进行经营。2019年至今萧山局共办结餐饮无证无照案件400起；接到餐饮油烟污染投诉近2000件。无证无照餐饮经营行为愈演愈烈。

（四）“禁开区域”餐饮油烟污染监管存在盲区

《2021年版》实施后，餐饮行业环保审批备案豁免，环保监管、行政审批、执法处罚的各部门之间出现了衔接不良：市场监管负责证照核发、生态环保负责环保监管、行政执法负责油烟扰民的执法处罚，看似泾渭分明的职责划分，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部门职责间的真空区。审批权和处罚权的脱节，导致“禁开区域”餐饮油烟污染监管产生盲区。如在中央环保督查过程后，一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在取缔“禁开区域”无证无照餐饮单位执法需要承担过高的行政成本，如涉及弱势群体、外来人员就业、兰州拉面店的民族政策问题等，查处过程中可能发生暴力抗法、聚众阻挠执法等情况；另一方面在“禁开区域”已经取得的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或是在营业执照上进行“三小备案”的餐饮经营单位油烟扰民环保督查后续处置已成行政行为风险点。这些“证照齐全”的餐饮经营者出于成本或选址等考虑，很多都不配合整改或搬迁，

导致或是利害相关业主投诉市场监管部门审批时不作为，或是商家投诉市场监管部门在其申报证照时未提前告知而导致其经济损失。源头注册审批难以拦住，事中事后监管难以整改，仅仅依靠市场监管部门注册人员对政策的自行解读而进行登记，则容易给市场监管、行政执法及餐饮经营者造成高成本。在现实监管工作中，涉及餐饮业油烟污染举报投诉处理、暗访整改处理中，如某商住一体的综合性商业区，楼下商铺以餐营业为主，因噪音和油烟问题，楼上住户和楼下商铺房东、经营户冲突不断，小区业主们除投诉举报市场监管部门不作为、要求此处不予办理餐饮类执照等外，还经常性来属地市监所质问为何审批出此处的餐饮证照，给基层日常工作带来困扰。似乎市场监管部门成为执法主体，落入“管行业管环保”的怪圈。而《规定》对市场监管部门证照核发设定了禁则，未设定具体罚则，市场监管部门对上述情况执法监管未能找到相关法律支撑。

## 四、应对策略

（一）党建引领，系统内部精简法规、统一标准。更多地考量法规与现实、法规与法规之间是否公平合理的问题。[①] 建议出台一部“食品类总法及其配套细则”，建议《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登记管理办法》与《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相衔接，如在许可、退出等审批机制及流程等方面统一标准，增加一些其他的常见违法类型，并修改完善“三小一摊”认定标准。

（二）数字赋能，衔接配套部门间相关法规和监管标准。推广借鉴各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取得的经验[②]，建议根据现实发展及运行情况加以科学分析

①汤虹、徐莉、谭梦琰：《城市餐饮油烟污染现状及治理策略研究》，《清洗世界》2022 年第 2 期。

②林子吟、林立、戴郡：《上海市餐饮油烟污染控制及管理机制研究 》，《环境保护科学》2020 年第 6 期。

与评估的基础上，调整、修缮《规定》等法律法规及配套细则。[①] 如“餐饮禁设区域目录”设置，考验各地方政府的智慧城市建设水平。要加强顶层设计，尤其是要通过地方性立法，明确各自行政区域内的“禁设区”，并利用大数据技术打破信息孤岛，使该地的环保、住建、行政执法、街道社区等在内的数据平台可以信息共享，尽快补齐符合各地实际的“餐饮禁设区域目录”和餐饮业准入制度，为审批环节提供精准参考依据。[②]

## 五、执法实践建议

（一）“党建＋服务”，形成全过程无缝隙审批、监管链条。目前除个体工商户的食品经营许可由设窗口的基层市场监管所或街道负责，其余由区行政审批分局负责，后续执法则由市场监管所实施。实践中，在涉及餐饮单位未经许可经营热食类制售、经营项目与许可内容不一致等等情形，需要查找许可档案先行认定处理或者出具证明证据，市场监管所根据证据材料做出制止违法行为的决定。因此，建议业务科室、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等开展居民楼宇底层餐饮油烟污染监管信息沟通和共享，审批和执法信息共享和公开机制，对审批注册人员加强法律培训，使其不仅能知道和把握前置审批、后置审批，还要了解我国法律法规对市场准入和准入后的经营事项分类，尤其要明白对于法律禁止性规定不能误解为没有列入前置审批目录就是“法无禁止”，而是要明白法律已经禁止了就无需也不会再作为前置审批项目等法律知识，提高审批和服务质量，促进前置审查和后续执法之间的标准统一和有效衔接。[③]

（二）“党建＋数字化”，执法重心从事前审批向过程监管和事后监督转变。

---

①丁涛：《安徽省城市餐饮油烟污染及政府治理对策》，《工程与建设》2021年第2期。

②李玉、齐丛亮、吴傲立：《我国餐饮油烟排放标准现状及分析》，《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20年第4期。

③吴泽青、郑烁供：《汕头龙湖：餐饮油烟、废水不扰民》，《环境》2021年第1期。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以“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为切入点，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制度，市场监管、住建、综合行政执法、环保、属地街道等部门凝聚执法合力，维护经济秩序，保护合法权益，加快塑造变革，创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全覆盖的整体政府监管体系和全闭环的行政执法体系。[①] 如推行餐饮油烟噪音污染执法“综合查一次”制度，凝聚执法合力，强化执法责任，提高执法效能，着力破解餐饮油烟行政执法执法盲区难题，减少“禁开区域”油烟扰民的“证照齐全”餐饮店出现。[②]

①崔冬冬、薛海涛、于振波：《浅析餐饮油烟污染的危害及治理对策》，《科技视界》2019 年第 32 期。

②杨智棋：《从越秀区看中心城区餐饮油烟防治》，《环境》2018 年第 4 期。

# “八八战略”下基于直觉模糊的杭州营商环境评估与对策研究

◎赵　江[①]

**内容提要：**本研究通过系统建模结合调查分析的手段详细阐述了杭州营商环境面临的困境，通过直觉模糊理论分析了杭州营商指标同国际营商指标的差距。通过调查分析了杭州营商环境存在的具体问题，通过分析，本研究认为八八战略引领了浙江经济“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改革的核心是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动态平衡市场关系中：一方面，政府不断放权，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不断加快市场化运作，构建完备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政府运用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调节经济、实施监管，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保障市场运作的有效性。

**关键词：**八八战略；直觉模糊；营商环境；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一直位于国家的前列，从进入21世纪起，浙江就在全国率先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六大也提出某些经济强省可以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及党的十六大理论思想的指导

①作者简介：赵江，男，复旦大学博士后，绍兴文理学院副教授，联系电话：18458229229，电子邮箱：seuzhaojiang@163.com。

下，2002 年 12 月 19 日，浙江省委也作出了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决定。随后，在 2003 年 7 月的省委第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八八战略这一指导浙江改革发展的总纲领、总方略。

经济转型升级一直是中国和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主旋律。对如何破解“成长中的烦恼”、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一时代难题，2005 年，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了基本蓝图和战略路径。2017 年 11 月，中共浙江省委十四届二次会议再次指出，“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创新力竞争力为导向，坚定不移打好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转型升级仍是浙江未来相当长时期的一个重点任务。在八八战略下从浙江经济发展来看，2019 年浙江全年地区生产总值（GDP）62352 亿元，比 2018 年增长 6.8%。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 2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6229 亿元，年增长率超过 14.5%。节能环保、健康产品、高端装备增加值分别增长 5.7%，8.3%，5.2%。2019 年，浙江新设八大万亿产业小微企业达到 11 万家，占新设小微企业总数的 27.03%，全省新设小微企业中健康产业、数字经济产业、文创产业活动指数分别为 137.26，133.04，139.70，位居全省前三[①]。八八战略下，强调要发挥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就为整体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②]。而在现实层面，如宁波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其中，2020 年宁波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达到 424.6 亿元，增速达到 9.7%。宁波的工业互联网企业数量已经跃居全国第 5 位，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企业数量位居全国第 10 位。雅戈尔 5G 智能工厂、捷创 5G+MOMO 平台应用以及创元模具工业

①浙江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2019 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年，第 3 页。

②李包庚：《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 期。

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工业互联网的示范平台项目。这表明浙江民营企业在八八战略的引导下已经以共同创新为目标，构建起了具有相对稳定的、能激发或促进创新关系的、具有浙江地域属性的交互式的创新网络①。

2. 八八战略下浙江地区营商环境现状

营商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涉及到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外部要素。李克强总理提出“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提高综合国力”，再次表明发展营商环境是推进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2019 年 10 月 24 日，世界银行发布《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②。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排名继 2018 年大幅度提高 32 位后，2019 年又跃升 15 位，升至全球第 31 位。可见，营商环境涉及到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等多个方面，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开放众多领域的系统工程。从内容层面，营商环境的核心是构建法治化的营商体系，构建一套行之有效、公平公正透明的具体法律、法规和监督程序③。从环境层面，就是要构建适合企业发展的包含良好社会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和法律要素相统一的宏观经济环境④。

从城市发展来看，营商环境的关键是构建具有国际化视野的营商环境，建立符合国际通用规则的一整套环境指标。浙江自实施八八战略以来，始终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完善市场主体，优化市场需求。以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抓手，不断推进良好营商环境体系的构建。如针对

①李金华：《广义创新网络的演化结构及其现实意义》，《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 年第 2 期。

②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2020 年第 1–129 页。

③徐旭：《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 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政策瞭望》2021 年第 1 期。

④袁家军：《忠实践行“八八战略” 奋力打造“重要窗口” 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政策瞭望》2020 年第 12 期。

市场主体问题，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等 9 部门推出优化营商环境“10+N”便利化行动方案（2.0 版），其中“开办企业”全流程办理时间将不超过 3 天。“10+N”具体包括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电力、获得用水用气、不动产登记、获得信贷、跨境贸易、执行合同、纳税、办理破产、企业注销、知识产权保护、证照分离等涉企改革任务。浙江省始终坚持将营商环境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作为营商环境评价的重要内容，不断优化浙江省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健全营商环境评价工作协同推进机制，加强省级部门和地方的责任落实、业务协同。目前国内外学者以营商环境为出发点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包括营商环境和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具体关系①，营商环境对民营经济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②、营商环境对企业寻租以及市场创新的影响③、优化经济发展的制度软环境④等。

**3. 基于直觉模糊评价的浙江地区营商综合评价**

根据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浙江省营商环境评价实施方案（试行）》的具体方案（参见附件 1）：可以将将浙江省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分为“服务企业全生命周期”“促进公平竞争”“体现公正监管”“优化服务供给”“激发创新活力”5 个维度，根据事权不同，形成设区市、县（市）2 套评价指标体系。

3.1 指标体系构建

3.1.1 设区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

①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 年第 9 期。

②于文超，梁平汉:《不确定性、营商环境与民营企业经营活力》,《中国工业经济》2019 年第 11 期。

③夏后学、谭清美、白俊红：《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9 年第 4 期。

④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 30 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12 年第 4 期。

包含 21 项一级指标、90 项二级指标。其中，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电力、登记财产、纳税、办理破产、保护中小投资者、执行合同、获得信贷、跨境贸易、政府采购等 11 个一级指标，均为世界银行的评价指标。获得用水用气、注销企业、市场开放、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监管、信用体系和信用监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服务非公经济等 10 个一级指标，为我省特色指标。

3.1.2 县（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包含 20 项一级指标、65 项二级指标。与设区市指标体系相比，主要是删减了事权基本不在县域事权的 1 项一级指标、25 项二级指标。根据相应的指标数据进行打分评价，从而作为营商环境评价的重要内容。本研究提出使用综合评价直觉模糊模型来深入分析营商环境情况。

3.2 构建综合评价直觉模糊模型

3.2.1 根据直觉模糊相关定义，如下所示：

定义 1：设 $X=\{x_1,x_2,x_3,\ldots,x_n\}$为非空有限集，则称$A=\{<x,u_A(x),v_A(x)>|x\in X\}$是 $X$上的一个直觉模糊集，其中 $u_A(x)$ 和 $v_A(x)$ 分别为元素$x$属于$X$的隶属度和非隶属度。显然存在

$$u_A:X\to[0,1],\ x\in X\ \to u_A(x)\in[0,1] \quad (3\text{–}1)$$

$$v_A:X\to[0,1],\ x\in X\ \to v_A(x)\in[0,1] \quad (3\text{–}2)$$

且满足条件：$0\le u_A(x)+v_A(x)\le 1$，$x\in X$

此外，$\pi_A(x)=1-u_A(x)-v_A(x)$，$x\in X$ 表示元素$x$属于$A$的犹豫度或不确定度。如果$\pi_A(x)=0$，则 $u_A(x)+v_A(x)=1$，此时集合$A$ 退化为 Zadeh 的模糊集（Scmidt and Kacprzyk.2000）。

3.2.2 构建直觉模糊判断矩阵

定义 1: 设评价指标集合为$A$，$A=(a_1,a_2,\ldots,a_n)$，两两比较指标 $a_1,a_2,\ldots,a_n$ 的相对重要性程度，得到直觉判断矩阵 $E=(a_{ij}{}^{(k)})_{n\times n}$。其中，$a_{ij}=(u_{ij},v_{ij})$（1,2,⋯,n）；$u_{ij}=v_{ji}$分别表示专家将指标 $a_i$和$a_j$ 两两对比时所给的相对重要性程度，$1-u_{ij}-v_{ij}$ 是专家决策的犹豫度。如果满足

$u_{ij} \in [0,1]$、$v_{ij} \in [0,1]$、$u_{ij}, v_{ij}$、$u_{ji} = v_{ij}$、$u_{ii} = v_{ii} = 0.5$、$u_{ij} + v_{ij} \leq 1$（$i, j = 1,2,\ldots,n$），则称$E$为直觉互补判断矩阵。为了表明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并进行定量的描述，定向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表示如表 1 所示：

**表 1　指标相对重要性程度标度**

| 指标重要性说明 | 直觉模糊度 |
|---|---|
| 因素 i 与因素 j 相比极端重要 | （0.90,0.10,0.00） |
| 因素 i 与因素 j 相比重要很多 | （0.80,0.10,0.10） |
| 因素 i 与因素 j 相比明显重要 | （0.70,0.20,0.10） |
| 因素 i 与因素 j 相比略微重要 | （0.60,0.30,0.10） |
| 因素 j 与因素 i 相比同等重要 | （0.50,0.50,0.00） |
| 因素 j 与因素 i 相比稍微重要 | （0.30,0.60,0.10） |
| 因素 j 与因素 i 相比明显重要 | （0.20,0.70,0.10） |
| 因素 j 与因素 i 相比重要很多 | （0.10,0.80,0.10） |
| 因素 j 与因素 i 相比极端重要 | （0.10,0.90,0.00） |

$\xi_2$

检验直觉模糊互补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本章提出运用直觉模糊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依然无法避免人为决策的主观性，为使决策更具民主性和科学性，本章采用群决策模型，即邀请多位专家对各指标关于上层目标层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从而建立直觉互补判断矩阵。综合各位专家的意见，对群决策下的直觉互补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

定义 2：设 $\alpha_1 = (\mu_{\alpha_1}, \nu_{\alpha_1})$ 和 $\alpha_2 = (\mu_{\alpha_2}, \nu_{\alpha_2})$ 是直觉模糊数，$\overline{\alpha}_2 = (\mu_{\alpha_2}, \nu_{\alpha_2})$ 是 $\alpha_2$ 的补假，$\lambda$ 为大于等于零的实数，$\alpha_1$ 和 $\alpha_2$ 的标准 Hamming 距离与相似度公式分别为：$d(\alpha_1, \alpha_2) = \frac{1}{2}(|\mu_{\alpha_1} - \mu_{\alpha_2}| + |\nu_{\alpha_1} - \nu_{\alpha_2}|)$

$$\eta(\alpha_1, \alpha_2) = \begin{cases} 0.5 & \alpha_1 = \alpha_2 = \overline{\alpha}_2 \\ \frac{d(\alpha_1, \overline{\alpha}_2)}{d(\alpha_1, \alpha_2) + d(\alpha_1, \overline{\alpha}_2)}, & \text{其他} \end{cases} \quad (3\text{–}3) \quad (3\text{–}4)$$

定义 3: 设 $Q_k = (q_{ij}^{(k)})_{n \times n}$（$k = 1,2,\ldots,l$）为专家 $e_k$（$1,2,\ldots,l$）给出的直觉模糊互补判断矩阵，其中 $q_{ij}^{(k)} = (u_{ij}^{(k)}, v_{ij}^{(k)})$（$i, j = 1,2\ldots, n; k = 1,2,\ldots,l$），$Q = (q_{ij}^{(k)})_{n \times n}$（$k = 1,2,\ldots,l$）的集成记作 $Q = (q_{ij})_{n \times n}$。其中，$q_{ij} = (u_{ij}, v_{ij})$；$u_{ij} = \sum_{k=1}^{l} \theta_k u_{ij}^{(k)}$；$v_{ij} = \sum_{k=1}^{l} \theta_k v_{ij}^{(k)}$；$u_{ij} = v_{ji} = 0.5$（i, j=1,2,⋯,n）；$\theta_1, \theta_2, \ldots, \theta_k$为

$k$个专家的评价权重。则$Q_k$与$Q$的相似度公式是：$\eta(Q_k, Q) = \frac{1}{n^2}\sum_{i=1}^{m}\sum_{j=1}^{m}\eta(q_{ij}{}^k, q_{ij})$。若$\eta(Q_k, Q) > 0.5$，则$Q_k$与$Q$符合一致性。

3.2.3. 确定指标的权重值。

（1）一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定义 1：设$\alpha = (\mu_\alpha, \nu_\alpha)$是直觉模糊数，$\mu_\alpha \in [0,1], \nu_\alpha \in [0,1]$，$\mu_\alpha + \nu_\alpha \leq 1$。为使权重的计算更加简便，可以把直觉模糊判断矩阵转换为直觉模糊数，转换公式为：

$$(\omega^{(l)})^T = [\omega_1^k, \ldots, \omega_n^k] = \left[\frac{\sum_{j=1}^{n}\alpha_{1j}^{(k)}}{\sum_{i=1}^{n}\sum_{j=1}^{n}\alpha_{ij}^{(k)}}, \ldots, \frac{\sum_{j=1}^{n}\alpha_{nj}^{(k)}}{\sum_{i=1}^{n}\sum_{j=1}^{n}\alpha_{ij}^{(k)}}\right] =$$

$$\left[\left(\frac{\sum_{j=1}^{n}u_{1j}^{(k)}}{\sum_{i=1}^{n}\sum_{j=1}^{n}u_{ij}^{(k)}}, \frac{\sum_{j=1}^{n}v_{1j}^{(k)}}{\sum_{i=1}^{n}\sum_{j=1}^{n}v_{ij}^{(k)}}\right), \ldots, \left(\frac{\sum_{j=1}^{n}u_{nj}^{(k)}}{\sum_{i=1}^{n}\sum_{j=1}^{n}u_{ij}^{(k)}}, \frac{\sum_{j=1}^{n}v_{nj}^{(k)}}{\sum_{i=1}^{n}\sum_{j=1}^{n}v_{ij}^{(k)}}\right)\right]$$

定义 2：设$\xi_1$，$\xi_2$，…，$\xi_k$为$S$个专家的评价权重，则加权直觉模糊数的公式为：

$$\theta^T = (\theta_1, \theta_2, \cdots, \theta_k) = (\xi_1, \xi_2, \cdots, \xi_s) \begin{bmatrix} \delta_1^{(1)} & \delta_2^{(1)}, & \ldots, & \delta_n^{(1)} \\ \delta_1^{(2)} & \delta_2^{(2)}, & \ldots, & \delta_n^{(2)} \\ \delta_1^{(s)} & \delta_2^{(s)}, & \ldots, & \delta_n^{(s)} \end{bmatrix}$$
$$= \left[\sum_{k=1}^{s}\xi_s\delta_1^{(k)}, \sum_{k=1}^{s}\xi_s\delta_2^{(k)}, \ldots, \sum_{k=1}^{s}\xi_s\delta_s^{(k)}\right] \quad (3\text{–}6)$$

即可计算一级指标权重，公式是：$H(\theta_i) = \frac{1-\nu_i}{2-u_i-\nu_i}$；经归一化得到：$\sigma_i = \frac{H(\theta_i)}{\sum_{j=1}^{n}H(\theta_i)}, i = 1,2,\ldots,n$。

（3）二级指标权重的确定。

定义 3：设专家$S_k$（$1,2,\ldots,l$）对二级指标$b_i$和$b_j$相对于一级指标$E$（E=1,2,⋯,n）的直觉模糊判断矩阵是：$B_A^{(k)} = (b_{Eij}^{(k)})_{m\times m}, b_{Eij}^{(k)} = (u_{Eij}^{(k)}, v_{Eij}^{(k)})$。

其中，$i, j = 1,2,\ldots,m; k = 1,2,\ldots,l; E = 1,2,\ldots,n$。$u_{Eij}^{(k)}$和$v_{Eij}^{(k)}$分别表示专家$S_k$（$1,2,\ldots,l$）对二级指标$b_i$和$b_j$相互对比的重要程度，通过计算可以得到专家对二级指标的评价权重。对一级指标权重相对于的二级指标权重进行综合加权：$\delta^{(2)} = (\delta^{(1)})^T\delta$，得到二级指标的综合权重。

3.2.4. 直觉模糊综合评价法

计算出每个环境因素的权重后，需要对营商环境情况做出最终评价，由于评价指标很多为定性指标，本节拟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其基本思想是运用模糊集理论对待评估对象进行综合评价。设其模型为：$X = \delta \times M$。其中，

$X$为综合评价向量；$\delta$为根据直觉模糊层次分析法所求的指标权重向量；$M$为评价指标矩阵。具体评价过程表示为：

（1）确定评价等级集合，设置每个等级的相应得分值，分值表示该等级在质量评估中的重要性 。

（2）确定评价矩阵，即专家确定各指标的在各个评价等级中所占比重。记评估对象的评价矩阵为：$M=\begin{Bmatrix} e_{11}, & e_{12},\cdots, & e_{1m} \\ e_{21}, & e_{22},\cdots, & e_{2m} \\ e_{n1}, & e_{n2},\cdots, & e_{nm} \end{Bmatrix}$。其中，$e_{kj}$（$j=1,2,\ldots,m;k=1,2,\ldots,n;$）表示某一项营商环境情况在指标$m_i$（$i=1,2,\ldots,n$）上隶属于第$m$等级所占比重，$\sum_{j=1}^{m} e_{kj}=1$。

（3）综合评价向量。运用公式$X=\delta\times M=\{X_1,X_2,\ldots,X_m\}$得到综合评价向量$X$。

（4）计算每一位专家对某一营商环境的最终综合得分：$S=V\times X^T$。

（5）综合各位专家对某一营商环境的评分：$P=(\xi_1\xi_2,\ldots,\xi_l)(S_1S_2,\ldots,S_l)^T$。其中：$\xi_l$ 表示专家权重；$S_i$表示对应专家的综合评分。

3.3 直觉模糊分析结果

针对营商环境进行综合评价后显示评价较高的省内城市分别为杭州市、绍兴市、衢州市、宁波市、湖州市。这些城市的环境治理也在全省居于前列。这表明：八八战略下城市的环境治理直接影响到城市的营商环境。这就需要城市加强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问题，尤其是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优化人才融资环境。针对民生基础设施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围绕城市建设、教育卫生、医疗体育等重点领域加强自己投入，不断提升城市品质。此外，营商环境的核心是构建良好的政务服务体系，不断推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动态平衡关系，让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优化政府服务和管理模式，不断提升政府效率，将“最多跑一次改革”不断深化，切实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 4. 杭州营商环境与国内外先进城市的差距与改进对策

不同的学者、不同的国家对营商环境的认知和评价均有所不同，围绕相

关的要素构建了不同的评价体系模型。从 2003 年起，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数据库每年都会依据相关的指标对世界主要国家的营商环境进行系统研究，衡量的指标包括：开办企业、纳税、国际贸易、保护投资者等系列指标，根据相关的指标数据给各国的营商环境评分。根据世界银行的测评结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平均得分为 67.87 分，比全球营商环境平均分高了 4.83 分。与 2019 年世界银行的测评结果相比，2020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平均得分比 2019 年高了 1.29 分，改善较为明显 ( 表 2)。为了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国家出台了许多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文件。各地也不断简化审批许可、放宽市场准入、规范经营运行等措施，不断优化机制体制改革。当前的许多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营商环境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影响，但缺乏对法治、教育、医疗等公共环境的考察。为此，在八八战略下，浙江省不断加快机制体制改革，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核心撬动各方面改革，为企业创新和城市发展构建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制定了《浙江省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希望以数字化改革引领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具有中国特色、浙江辨识度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此，本研究课题组深入了解了浙江城市营商环境的情况，重点了解浙江城市营商环境与国内外先进城市的差距与改进。

**表 2　2020 年“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营商环境排名**

| 国家 | 2018 | | 2019 | | 2020 | |
|---|---|---|---|---|---|---|
| | 得分 | 排名 | 得分 | 排名 | 得分 | 排名 |
| 新加坡 | 84.57 | 2 | 85.24 | 2 | 86.2 | 2 |
| 格鲁吉亚 | 82.04 | 9 | 83.28 | 6 | 83.7 | 7 |
| 立陶宛 | 79.87 | 16 | 80.83 | 14 | 81.6 | 11 |
| 马来西亚 | 78.43 | 24 | 80.6 | 15 | 81.5 | 12 |
| 阿联酋 | 78.73 | 21 | 81.27 | 11 | 80.9 | 16 |
| 马其顿 | 81.18 | 11 | 81.55 | 10 | 80.7 | 17 |
| 爱沙尼亚 | 80.8 | 12 | 80.5 | 16 | 80.6 | 18 |

| 国家 | 2018 | | 2019 | | 2020 | |
|---|---|---|---|---|---|---|
| | 得分 | 排名 | 得分 | 排名 | 得分 | 排名 |
| 拉托维亚 | 79.26 | 19 | 79.59 | 19 | 80.3 | 19 |
| 泰国 | 77.44 | 26 | 78.45 | 27 | 80.1 | 21 |
| 哈萨克斯坦 | 75.44 | 36 | 77.89 | 28 | 79.6 | 25 |
| 俄罗斯联邦 | 75.5 | 35 | 77.37 | 31 | 78.2 | 28 |
| 土耳其 | 69.14 | 60 | 74.33 | 43 | 76.8 | 33 |
| 阿塞拜疆 | 70.19 | 57 | 78.64 | 25 | 76.7 | 34 |
| 以色列 | 71.42 | 54 | 73.23 | 49 | 76.7 | 35 |
| 斯洛文尼亚 | 75.42 | 37 | 76.51 | 40 | 76.5 | 37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4.1 八八战略后城市创新环境的评价

八八战略后，浙江城市不断优化城市的营商环境，在行政管理、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市场领域等多个领域开展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不断加强体制和机制改革，优化政府行政服务不周，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加强行政监管到法律监管，围绕人才建设不断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等，探索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升了城市的创新环境。

**表 3　八八战略后城市的创新环境评价**

| 企业所在城市的创新环境 / 频次 | 1 分 | 2 分 | 3 分 | 4 分 | 5 分 |
|---|---|---|---|---|---|
| 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 | 12 | 23 | 67 | 89 | 65 |
| 市场环境 | 24 | 45 | 98 | 72 | 17 |
| 人才制度 | 34 | 36 | 113 | 34 | 39 |
| 科技与融资环境 | 24 | 23 | 78 | 89 | 42 |
| 信息和电子政务服务 | 34 | 32 | 89 | 78 | 23 |

根据八八战略下城市营商环境影响情况可以看出：八八战略对城市营商环境的影响都较为显著 ，特别是对企业创新政策支持达到 3.67，其次，对科

技与融资环境的影响达到 3.40。其余包括对市场环境、人才制度以及信息和电子政务服务等的影响都达到 3.00 以上，表明八八战略对城市营商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深入影响到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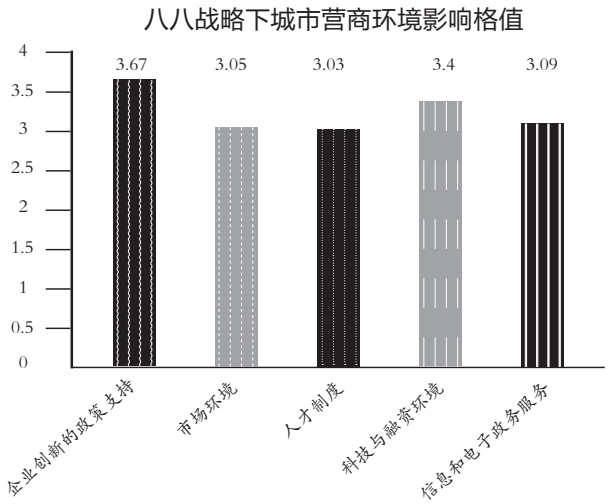



图 1　八八战略下城市营商环境具体的影响均值

4.2 八八战略后浙江城市与国内先进城市的营商环境比较

本研究从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市场环境和人才制度、科技与融资环境、信息和电子政务服务等典型的营商环境要素作为考虑城市营商环境的数据比较。

（一）杭州同国内超一线城市的营商环境比较

首先比较浙江城市中最好的营商城市杭州同国内公认的超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营商环境比较：

**表 4　杭州同各主要一线城市的营商环境比较**

| 营商环境要素 / 均值 | 杭州 | 北京 | 上海 | 广州 | 深圳 |
|---|---|---|---|---|---|
| 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 | 3.67 | 4.68 | 4.23 | 3.78 | 4.56 |
| 市场环境 | 3.05 | 4.32 | 4.56 | 3.65 | 4.78 |
| 人才制度 | 3.03 | 4.12 | 4.13 | 3.45 | 4.89 |

| 营商环境要素 / 均值 | 杭州 | 北京 | 上海 | 广州 | 深圳 |
|---|---|---|---|---|---|
| 科技与融资环境 | 3.4 | 3.98 | 4.35 | 3.56 | 4.23 |
| 信息和电子政务服务 | 3.09 | 3.89 | 4.13 | 3.43 | 4.12 |

将各个营商环境要素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其中，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25%）、市场环境（15%）和人才制度（15%）、科技与融资环境（25%）、信息和电子政务服务（20%）。最终可得图 4–2。可以看出，国内超一线城市营商环境排名分别是深圳（4.472 分），上海（4.275 分），北京（4.209 分），广州（3.486 分），杭州（3.298 分）。杭州同这些城市的营商环境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同深圳相比，在创新政策支持力度、市场环境支持、人才制度等几乎所有要素都显著性的落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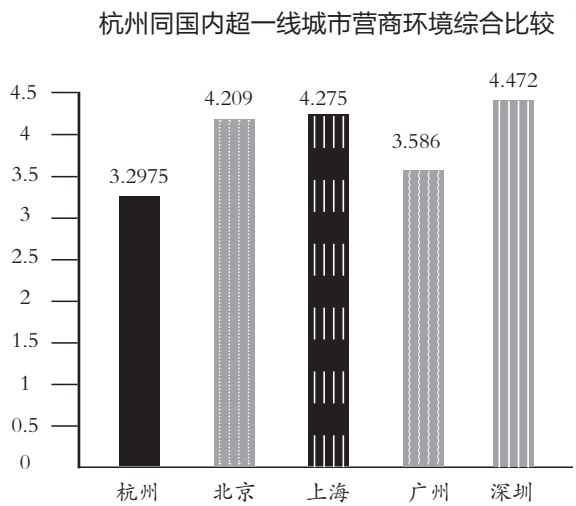



图 2　杭州同国内超一线城市营商环境的综合比较

（二）杭州同国内主要一线城市的营商环境的综合比较

首先比较浙江城市中最好的营商城市杭州同国内公认的主要一线城市（重庆、天津、南京、武汉、青岛、厦门）的营商环境比较：

**表 5 杭州同各主要一线城市的营商环境比较**

| 营商环境要素 / 均值 | 杭州 | 重庆 | 天津 | 南京 | 武汉 | 青岛 | 厦门 |
|---|---|---|---|---|---|---|---|
| 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 | 3.67 | 3.98 | 3.54 | 3.45 | 3.23 | 3.15 | 3.21 |
| 市场环境 | 3.05 | 3.65 | 3.02 | 2.98 | 2.87 | 2.85 | 3.09 |
| 人才制度 | 3.03 | 3.01 | 3.02 | 2.97 | 3.11 | 2.89 | 3.12 |
| 科技与融资环境 | 3.4 | 3.23 | 3.32 | 3.56 | 3.45 | 3.12 | 3.31 |
| 信息和电子政务服务 | 3.09 | 3.07 | 3.56 | 3.02 | 2.98 | 3.04 | 3.13 |

将各个营商环境要素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其中，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25%）、市场环境（15%）和人才制度（15%）、科技与融资环境（25%）、信息和电子政务服务（20%）。最终可得图 3。可以看出，国内超一线城市营商环境排名分别是重庆（3.416 分），天津（3.333 分），杭州（3.298 分），南京（3.249 分），厦门（3.188 分），武汉（3.163 分），青岛（3.036 分）。杭州同这些城市的营商环境相比，差异都很小。其中，相比重庆的营商环境排名主要在于创新的政策与直辖市相比有差距。但在科技和融资环境、信息和电子政务服务等方面都略高。而同天津相比，在信息和电子政务服务方面略有不足。同南京、武汉、青岛、厦门相比，在创新政策支持力度、市场环境支持、人才制度等几乎所有要素差距都不大，仅在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方面显著性领先。这表明：各个城市的竞争日益加剧。八八战略需要进一步深化，在市场环境和人才制度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以提升外部营商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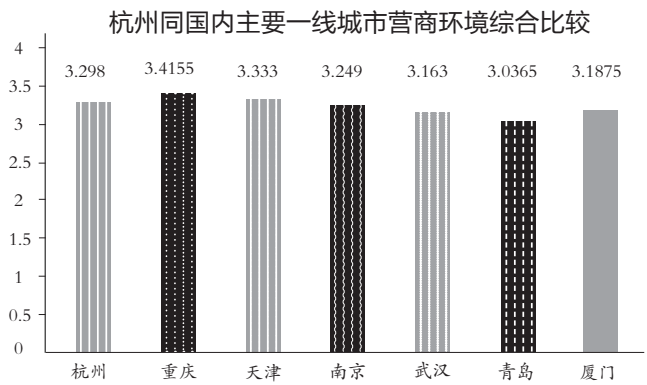



图 3　杭州同国内超一线城市营商环境的综合比较

4.3 八八战略后浙江城市与国外先进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标比较

首先比较浙江城市中最好的营商城市杭州同国外先进城市（重庆、天津、南京、武汉、青岛、厦门）的营商环境比较：

**表 6 杭州同各世界主要一流城市的营商环境比较**

| 创新环境维度 / 指标均分 | 杭州 | 纽约 | 伦敦 | 洛杉矶 | 东京 | 大阪 | 巴黎 | 柏林 | 新家坡 | 香港 | 首尔 |
|---|---|---|---|---|---|---|---|---|---|---|---|
| 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 | 3. 67 | 4. 89 | 4. 34 | 4. 89 | 4. 76 | 4. 67 | 4. 91 | 4. 78 | 4. 82 | 4. 67 | 4. 71 |
| 市场环境 | 3.05 | 4.56 | 4.45 | 4.91 | 4.54 | 4.76 | 4.56 | 4.65 | 4.96 | 4.95 | 4.76 |
| 人才制度 | 3.03 | 4.78 | 4.89 | 4.78 | 4.67 | 4.65 | 4.78 | 4.63 | 4.88 | 4.9 | 4.83 |
| 科技与融资环境 | 3.4 | 4.67 | 4.67 | 4.82 | 4.63 | 4.77 | 4.82 | 4.54 | 4.96 | 4.86 | 4.74 |
| 信息和电子政务服务 | 3.09 | 4.56 | 4.75 | 4.55 | 4.53 | 4.65 | 4.67 | 4.88 | 4.86 | 4.89 | 4.67 |

将各个营商环境要素分别赋予一定的权重，其中，企业创新的政策支持（25%）、市场环境（15%）和人才制度（15%）、科技与融资环境（25%）、信息和电子政务服务（20%）。最终可得图 4。可以看出，新加坡（4.893）和香港(4.838)位居世界前两位。杭州同这些城市相比，综合分数相差1.00以上，同这些国际一流城市的营商环境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特别是同这些城市相比，无论在创新政策支持力度、市场环境支持、人才制度等几乎所有要素都显著性的落后。尤其是作为以电子商务为特色的杭州而言，在信息和电子政务服务方面差距仍然非常显著。这就需要杭州进一步加快八八战略的新深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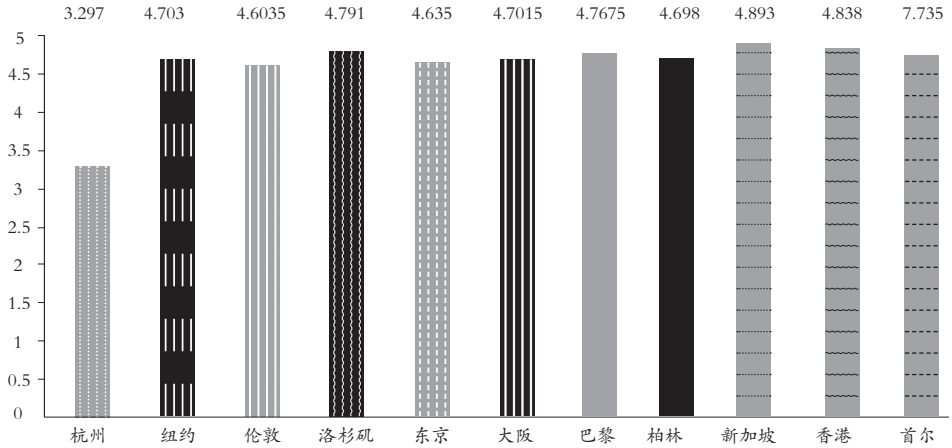


图 4 杭州同国际一流城市营商环境的综合比较

总之，营商环境是一个城市不可替代的生产力，有利于推进社会整体发展。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需要政府还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微观的市场主体。浙江省在八八战略的引导下营商环境已经有了较大的提升。然而，同国内超一线城市以及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城市相比，还存在许多的不足。为此。首先，应当在八八战略指引下，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对标城市的营商环境劣势，优化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资金资源等的各类资源配置，通过加快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构建新型的经济体制和国内国际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其次，充分利用八八战略对创新活动的支持，积极布局跨境电商平台，构建出线上线下、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的贸易体系，加快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最后，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不断优化各类审批程序，提升监管效率和审批效率，进一步加强制度性改革，构建良好的融资环境，吸引外部资本流入，并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5. 研究结论

从八八战略提出的历史阶段来看，八八战略是对浙江以小康社会建设和率先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重要策略。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这就需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是“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矛盾关系。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切实将政府职能转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社会服务”方面，这成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①②]。其次，面对公有制经济和民营经济，如何衡量二者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问题，孰重孰轻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矛盾问题。在2003年时，针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相关的“八八战略”举措，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科学理念，极大地引领了浙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通过将这一战略落地，真正的构建“有为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和有限政府”（图5）。而这一改革的核心是在平衡市场关系中：一方面，政府不断放权，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不断加快市场化运作，构建完备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政府运用法律手段而非行政手段调节经济、实施监管，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保障市场运作的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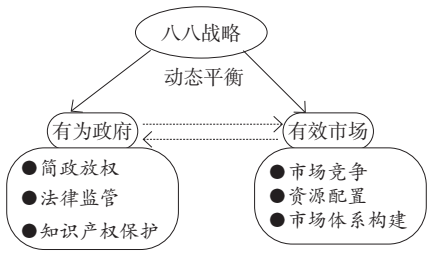



图5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动态关系

① 袁家军：《实施新时代文化浙江工程 书写“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文化新篇章》，《政策瞭望》2020年第10期。

② 吴欣阳：《“八八战略”指引下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研究——以黄岩模塑产业为例》，《营销界》2020年第3期。

# 县域经济产业集聚规模化效应的孵化机制研究

## ——以桐庐快递业为参照

◎潘承恩 ①

**内容提要：**浙江县域经济各具特色，产业结构布局合理，展现出其持续发展能力同时，转而通过产业集聚规模化，在全国各地实现了复制拷贝，其孵化机制构成了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综合优势，不仅带动了本省县域经济的发展，对其他省份的县域经济影响显著。本文研究剖解了快递之乡桐庐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规模化效应，并深入探讨了规模化驱动下产业孵化机制和能力。

**关键词：**县域经济；产业转型；桐庐派；孵化机制

桐庐快递享誉全国，“三通一达”形成了该县快递产业与顺丰以及其他快递品牌“三分天下”的产业格局，不仅提振了桐庐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提升了发展质量，而且对于桐庐快递产业的持续发展、集聚发展和内涵发展也形成了显著的规模优势。然而桐庐快递产业不是简单复制拷贝，也不是机械的加盟扩张，其中具有悠久历史的浙江精神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探究桐庐快递产业的创新活力和发展的内在质量，就必须要认识到桐庐县域经济的集聚效应；集聚效应如何演化为规模发展能力；更要探究规模效应的驱动机理如何促动孵化机制的功效转变为一种生态的产业模式。“桐庐派”的现

①**作者简介：**潘承恩，男，杭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联系电话：15355002000。

象不是偶然，应该说是桐庐人做大做强产业的同时，以产业驱动能力和产业集聚效应的方式，带动市场目标下的产业结构又一次重大创新。

### 1. 桐庐县域经济中快递产业集聚效能与规模效应阐述

桐庐县域经济的核心构成当属“三通一达”的快递产业，素有中国民营快递之乡的桐庐县，借助快递业的高速发展，在浙江的县域经济样板中根基稳固，并实现了以样板效应影响快递产业集聚与规模扩张。

首先，桐庐快递产业集聚效能表现。桐庐快递产业集聚效能不是简单地将快递业整合为县域经济主流产业，而是通过集聚的方式实现了聚财、聚贤与聚能。第一，聚财。2018 年，桐庐快递产业以及关联项的税收为 6.4 亿元，占桐庐县财税收入的七分之一。2020 年，“三通一达”总部的基建项目均“回家落户”，快递企业与桐庐县政府打造的快递产业综合体富春未来城入驻采购商 947 家，供应商 196 家，当年底实现交易 165 亿元。该县打造的快递产业综合平台富春未来城，不到一年的时间，“三通一达”重大产业项目全员回归、全面开工。目前桐庐已有快递关联企业 1200 余家，涵盖快递物流、自动分拣、无人配送车等领域，累计总投资超过 450 亿元；第二，聚贤。桐庐快递实现了服务智能化、生产自动化、信息一体化、运营生态化、管理科学化同时充分依托乡情互动、商贸联动、投资带动、创新驱动、服务促动五大发展战略，从总部经济、快递物流金融、新材料与绿色包装、高端装备研发制造四个方面同步发力，延展产业关联生态，形成桐庐特色的快递产业生态圈层，有机提升了桐庐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第三，聚能。桐庐快递产业通过打通政府侧与企业侧以及企业侧上下游的数据壁垒，充分利用数据优势，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不仅推动了快递产业的高质量、快速发展，而且在外部技术资源获得方面，桐庐县通过入围浙江省第一批行业产业大脑建设试点“揭榜挂帅”项目，增强县域经济的智能引进。

其次，桐庐快递产业规模效应表现。2020 年以来，桐庐快递产业实现了华丽转身，由之前的产业集聚效能转向了规模化发展。2021 年，桐庐县招引

落地和培育快递关联企业311家，涉及到快递业务的智能分拣、包装、智能货架、机器人、服装制造、快递客服、股权基金以及其他方面，实现营收320.64亿元，入库税收12.77亿元，占全县财政总收入的18.90%。快递产业规模增长强有力地推进了桐庐县域经济的长足发展。基于规模化效应影响，桐庐快递产业每年高速增长的语境下，将战略触角转向了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以稳固的产业链优势，创新了快递关联产业的发展规模。该县县域经济立足快递产业发展实际，抢抓快递物流产业高速发展窗口期，以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大力招引总部经济、基础材料、高端装备研发制造、科技引领、后市场服务等产业链项目，打造国家级特色产业发展示范区、快递物流全产业链经济高地、快递物流研发与总部集群、物流装备制造集群、绿色包装产业集群。

2. 县域经济发展中孵化机制渗透能力与产业可塑性

根据上述论述，可以发现县域经济发展中，产业孵化机制的渗透能力，不仅能撬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根基，而且能通过主导产业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以生态、绿色、循环和共享的机理，创新产业模式的可塑性。

首先，县域经济孵化机制渗透能力与产业发展具有高度契合。县域经济孵化机制具有显著的渗透能力，一方面，县域经济具有一定共性，特别是产业集聚效应明显的特定环境下，县域经济的主导产业能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因而，引导较大一部分的关联企业介入到县域经济的价值链中，这些关联企业与主导产业中心化的企业除了保持产业目标上一致之外，其循环方式、盈利模式、商业模式和产业化目标有着相对一致性，所以孵化机制的渗透能力对价值链上的成员的渗透影响作用相近。再一方面，县域经济孵化机制具有一定的“朋友圈”特点，其共性的文化特征、生态特征、运营特征和创新特征，将“朋友圈”的黏性提升，孵化机制仅仅需要所造一个相对完善的目标场景，就能形成与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模式的生态化耦合，基于这种耦合作用的显著性，产业规模扩张、产能改造、产业水平基础上的投融资策略，以及产业的

政策红利和导向优势都会围绕这一耦合作用的生态需求实现演进。此外，县域经济孵化机制渗透能力，由规范性的场景创设转变为产业化发展的规则、目标、共生机制构建，其中涉及到产业生态价值链的刚性需求，孵化机制渗透能力则通盘考虑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而不是单独地驱动主导产业的单边化发展。

其次，县域经济孵化机制渗透能力与产业持续发展具有叠加效果。县域经济孵化机制渗透能力消解了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各种壁垒，有机打破供给侧、政策侧、生态侧、产业侧的相关壁垒，并整合相对应的资源禀赋实现规模创新和效益创新，最终形成一定的环境效益机理。环境效益作为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方面，通过渗透能力的整合，将环境效益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其他资源禀赋实现规模、效益、效应和生态层面的比较，促使生态赋能和技术赋能围绕县域经济产业结构持续发展能力实施能力培养与框架重构。再一方面，县域经济孵化机制渗透能力将县域的人文、自然、政策、供给、金融、市场等资源统合为产业持续发展的能力，以核心能力培养的方式，创新县域经济孵化机制渗透能力与产业持续发展的契合点，并形成一定的契约关系，通过这种契约关系的不断改善，强化产业持续发展的其他资源赋能方式和过程，整体上改变产业持续发展能力与孵化机制渗透能力的目标路径，通过次生的产业发展模式对次优型的产业孵化器进行目标校验。尽管基于目标层面，两者的契合或者是叠加都可能产生最优的模式，但是并不影响孵化机制本身的价值局限对县域产业持续发展能力的负向赋能，因此，双元机制的检验方式，可以更加清晰地勾勒出县域经济产业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再次，县域经济孵化机制对产业发展目标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县域经济孵化机制对产业发展目标存在正向影响，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基于生态驱动力考虑，县域经济孵化机制对县域产业发展目标的可塑性一定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县域经济孵化机制实现了对县域产业的多元共振，促使产业发展目标围绕中心化、生态化的价值链靠拢。鉴于这种靠拢模式对产业发展目标的影响较大，生态文明、产业结构调整，样板效应、规模效应以及

环境效益均受到生态价值链的影响，从而保证了孵化机制对产业目标的正向驱动。相对地，产业发展目标对县域经济孵化机制也有一定的支配力，尽管支配力有限，不过在生态文明、生态经济和产业集聚等要素的影响下，产业发展目标与孵化机制之间存在一定的伸缩空间，基于伸缩空间的弹性较强，柔性评价视角下的目标可塑性的依据相对较少，通过县域经济孵化机制模式影响，创新、重构产业发展目标其实还是有效的。

### 3. 县域经济产业集聚、规模效应和孵化机制的循环机理描述

本文研究立足生态价值链构建的目标，分析县域经济产业集聚、规模效应以及孵化机制的循环机理，试图通过循环机理的辩证分析，佐证县域经济发展影响要素在生态价值链构建中的相关作用，而具体的相关作用表现，以循环的模式趋同生态价值链的目标，有利于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生态价值链构建。

#### 3.1 集聚 – 规模的循环机理分析

“集聚 – 规模”，作为同样影响县域经济产业经济的要素，集聚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链式效应的原理回归，一方面，集聚效应将产业发展的规模定义为一种集群方式，以共生、共享的联动方式，创新产业经济发展路径。集聚效应如果仅仅是产业基础的堆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通过聚财、聚贤、聚能、聚智和聚力才能充分发挥集聚效应的优势。产业集聚本身就是一种优势循环，更是优势目标导向下的产业创新方式。再一方面，规模在产业化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场景，不仅要考虑规模效应的活跃程度，还应当考虑规模效应在产业发展中对产业集聚形式的赋能。

县域经济产业集聚转向规模效应，本身体现了生态经济的发展路径，产业经济体量达到一定规模时，产业规模增益性明显增强，而后产业规模增益性可以通过产业集聚对县域经济实现目标驱动。在这一过程中，规模效应的场景创设非常关键，一方面，需要通过场景创设，改善集聚效应的传导路径。由于集聚效应的效果不同意被表征，特别是县域经济中主导产业的中心化在

产业集群中本身就具备了一定规模，自身的规模效应与产业集聚的规模扩张并不相同，导致相互之间的冲突加剧，因此就难以达到最优循环。再一方面，产业集聚的效率本身就很高，加上产业集群产生的规模也达到了一定体量，从而对县域经济的整体影响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产业集聚的规模加上规模效应，所产生的循环机理其实更接近生态的表征方式。所以，两两相交的循环机理能实现最优。

3.2 规模 – 孵化的循环机理分析

“规模 – 孵化”，产业经济达到一定规模，规模效益的溢出机制自觉地促动循环经济模式实现孵化，与对应的溢出机制产生共振效益的同时，规模转向孵化的也是链式经济延伸的路径。县域经济规模增量，有机地带动相关联产业维系在一个恒定的规模指数，尤其是县域经济规模居于规模临界值时，可能产生外溢。基于外溢效应的纵向考察，一定程度上或促使外溢效应趋同于产业链的循环目标，最终实现孵化。一方面，孵化机制的需求，对产业链的供给端、用户端以及中间成员都具有改善作用，加上产业价值链的目标趋同，能够以杠杆作用撬动县域经济的跳跃型和突破型发展。再一方面，规模 – 孵化的合理转向，既是对产业集聚的延续，也是保证创新力、循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驱动力和生态黏性的有机屏障。所以，规模 – 孵化转向能凸显主导产业的规模效应，以规模效应的扩张优势，驱动孵化机制在产业集群中产生同一性影响。

考虑到县域经济自身的特征，循环机理影响下的产业导向本身就是产业价值链的构建过程，任何条件下的产业发展目标都会自觉地嵌入到产业价值链构建中，因而，规模 – 孵化的转向是实现产业最优的路径。与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联动，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必然带动县域经济实现高速、高质量发展。

## 4. 基于产业孵化视角：县域经济产业孵化机制与能力研究

立足优化县域经济发展的目标，通过产业孵化的手段，创新县域经济产

业孵化机制与能力的目标，本文研究从优势导向与核心能力培育、生态价值与价值突破转向、规模效应扩张能力构建以及生态价值链的辩证思考四个层面，对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4.1 县域经济孵化机制的优势导向与核心能力培育

县域经济发展的优势导向一方面要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以桐庐县域经济为参照，该县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以“三通一达”的总部经济效应而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通过规模效应的深度影响，进行产业孵化。既是优势产业发展导向的基础产业，也就是主导产业创新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优势和导向作用均是非常显著的。再一方面，孵化机制则需要提升产业孵化的核心能力。桐庐快递产业的核心能力则是构成了产业价值链层面的中心化，快递产业规模优势实现了循环增长的同时，产业影响的核心能力则是对其他关联产业的孵化。显然，核心能力培育就有了一定的兼顾性，既考虑主导产业的影响力，也要考虑中心化企业规模效应，更要考虑价值层面的不可替代性。

县域经济孵化机制的优势导向与核心能力培养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孵化机制的优势与核心能力协调。孵化机制的优势则表示以产业集群效应、增长规模、经济体量和产业的收益等方面的行业影响力。而构建产业价值链的核心能力，产业基础是关键的指标，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是关键的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产业孵化中，产业环境以及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则构成了核心能力培育的重点。均衡产业孵化的优势导向与核心能力培育方面的断层，实现生态的协调能力就尤其关键了；第二，孵化机制的优势导向目标与核心能力培育目标一致。孵化机制的优势导向以产业化持续发展为目标，而核心能力培养则是要构建产业的接替梯队，两者目标需要一定层面的均衡，才能促进产业目标的融合；第三，核心能力培育与优势导向的契合并产生效应。核心能力培育是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核心资源。孵化机制优势导向核心能力培育产生契合效应，则有利于县域经济的核心优势构建。

4.2 县域经济孵化机制的生态价值与价值突破转向

县域经济孵化机制的生态价值是服务于整个产业圈层的生态手段校验结果，其价值定位与价值突破的空间显著。县域经济孵化机制构建中，生态价值最优化构建，产业链价值突破等均指向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第一，县域经济孵化机制生态价值驱动力构建。由于县域经济的产业布局大多具有一定的地方产业的色彩，受到环境、资源、政策和文化的影响，很难真正意义上做大做强，因此，其生态价值的黏性并不突出。而产业孵化机制则需要生态价值链的协同目标对价值链的成员产生共同的影响，所以，县域经济产业生态价值链构建要围绕生态价值的发掘和熔铸为基本目标；第二，县域经济孵化机制生态价值协同产业生态价值链构建目标。由于生态系统影响下的县域经济在产业孵化的过程中，具有显著的正向性发展机理，其生态价值与生态文明建设、产业发展政策、产业发展环境以及产业优化目标都具有关联。因而，产业生态价值影响下的孵化机制既需要对生态价值有所驱动，而且还要具有持续发展突破生态价值实现价值重构的能力；第三，县域经济孵化机制的生态价值与价值突破转向应用策略构建。生态价值影响下的县域经济孵化机制，受到生态文明建设驱动，生态价值显著增强，尤其是生态理念下的价值孵化机制需要稳定的策略和孵化机制的核心能力支撑。因此，生态价值到价值突破的转向，一方面体现了生态价值视阈下，县域经济围绕产业优化和产业持续发展所选择的价值战略作为根本框架，从战略层面选择价值发展的路径和走向目标。再一方面，生态价值下的县域经济产业发展持续能力构建，是价值突破的主要方式。如何实现生态价值驱动到价值突破的可持续性，则需要观察县域经济在产业孵化中的应用策略。其中也包含了场景创设和价值重构以及价值输出机制的建设。

4.3 县域经济孵化机制融合规模效应的扩张力构建

县域经济孵化机制扩张能力构建要迎合产业发展的几个节点，以确保实现县域经济孵化价值融合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能力建设。第一，县域经济孵化机制与规模效应的契合点统一。县域经济的发展规模实现正向增长时，县域经济的产业化目标一定会催生孵化机制朝着产业持续发展的方向演进。

正向增长的规模效应，不仅可以驱动生产结构实现自觉调整，而且还能支配具有增益性、增效性的资源禀赋实现系统化的创新。此时，县域经济的增长模式与孵化机制的契合点高度统一，有利于构建循环机制下的产业生态价值链；第二，县域经济孵化机制与集聚效应的张力构建。为了满足产业发展持续能力构建，县域经济孵化机制一方面要通过内容创新，将核心能力培育与产业生态价值链形成协同机理，而且还应当将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循环模式演变为产业价值链的价值突破节点，通过资源整合、价值创新、产业创新和技术创新，有效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构建；第三，县域经济孵化机制的场景创设。孵化机制在目标视阈下，产生的资源的利用效率尽管满足了产业持续发展能力的需求。但是，孵化机制在某种意义上局限于产业模式的优化，对于其价值认同和价值重构，孵化机制的作用并不直接，也就影响了产业孵化机制的综合扩张能力，只有通过孵化机制场景创设，才能促进县域经济孵化机制更科学地嵌入到产业扩张的规模小效应和集聚效应中，生态价值、产业价值、价值战略才得以凸显。

此外，县域经济孵化机制融合规模效应、集聚效应的整体扩张力构建，还应当对孵化机制进行科学的评价，通过对孵化器的加速能力估算，应对规模效应的外溢，并确保规模效应要保持在临界值，有利于县域经济生态价值链构建。

4.4 县域经济孵化机制生态价值链构建的辩证思考

构建县域经济孵化价值的生态价值链首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也是县域经济自性发展、创新发展的需求，更是县域经济高质量的内核。立足县域经济孵化机制生态价值链构建的视角，本文研究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思考。

第一，构建以生态价值链为代表的经济驱动载体。县域经济生态价值链，包含了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和县域经济对生态价值链的特殊需求，构建孵化价值链与生态价值链目标趋同的产业发展框架，可以创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不仅实现了高质高效，

而且还能从生态文明建设视角实现生态价值的突破。

第二，建设县域经济生态价值链的专属孵化器。县域经济生态价值链的专属孵化器建设，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孵化机制原理，改善资源禀赋的权重，将生态资源禀赋的权重增加，实现县域经济的绿色发展、生态发展和创新发展。并将生态价值链的内容改善为常态化的战略目标，实现战略驱动与产业驱动交互，最终形成县域经济产业持续发展专属孵化器。

第三，优化县域经济生态价值链孵化目标与流程。优化流程与目标则需要在县域经济高质量的同时，将产业孵化机制合理地嵌入产业生态价值链的构建中。一方面，要满足不同的经济业态对孵化机制的需求，而孵化机制也需要对主导产业和中心化企业的业态进行目标整合，在实现目标基础上，缩短周期，加快流程改进。

第四，创新县域经济孵化机制的价值战略与输出。县域经济孵化机制价值战略构建要以产业的生态价值、创新价值和价值战略为导向，通过改善价值战略导向，重构县域经济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将战略目标和孵化机制的战略组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价值，也恰是县域经济生态价值链的价值所在，而后通过战略重构和价值匹配，实现县域经济导向下的生态价值链内容补充，从而实现价值输出。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孵化机制构建与能力建设是多元的，既要考虑产业发展的持续能力，还要考察产业机构的导向优势，更要考虑产业经济的链式增长方式，多结构下的县域经济孵化机制与能力的表现是多样性的，但是其最终目标则是相互融通的。

# 基于中外城市比较的杭州创业环境国际化研究

◎高国东[①]

**内容提要：**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须建设世界一流的创业环境、营商环境。元宇宙时代，现代营商环境就是线上、数字化的营商环境。本研究通过搜索实验，采用做生意、加盟创业、注册企业等搜索句进行搜索结果比较实验，分析香港、迪拜、纽约、新加坡、新西兰威灵顿等营商环境高分城市（世界银行[②]等报告）营商信息，特别是数字化营商环境，重点关注中小企业创业环境等，借鉴多主体协力、强化搜索监管、全方位支持营商等先进经验，提出环境机制建设、全方位支持营商、国际化服务等高质量营商环境打造的启示，促进杭州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国际化；中外比较；营商环境；搜索实验；杭州

## 一、引言

杭州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必须建设世界一流的

---

① **作者简介：**高国东，男，杭州万向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高级经济师，联系电话：13750828222。

② World Bank. 2020. Doing Business 202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10.1596/978-1-4648-1440-2.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营商环境、创业环境，以保持城市发展的活力和奠定城市发展的基础。针对新冠疫情长期肆虐、经济发展趋缓甚至下降，优化营商环境，有利于吸引国内外投资，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须体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征，为提高创业质量服务，为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助力；同时也要对标一流，借鉴国际经验，拓展国际视野[①]。当前，“互联网＋政务服务”确实优化了地方营商环境[②]，但下一步如何走，如何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如何便利创业、支持营商，需要我们开拓视野，对标世界一流，确定努力的方向和行动的路径。

## 二、研究方法

现有营商环境研究，主要集中在营商环境构建[③]、评价指标构建[④]、城市营商环境评价、营商环境优化路径[⑤⑥]，营商环境与政府效率[⑦⑧]、企业创

---

① 沈国兵、孟彩霞：《优化城市营商环境与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基于上海与多个国际大都市的比较分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3 期。

② 王法硕、张桓朋：《“互联网＋政务服务”优化地方营商环境了吗？——基于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电子政务》2022 年第 1 期。

③ “包容性绿色增长理论与实践”课题组：《华南地区包容性营商环境构建研究》，《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22 年第 3 期。

④ 李志军：《我国城市营商环境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南北差异分析》，《改革》2022 年第 2 期。

⑤ 黄雅卓：《转型国家营商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分析》，《未来与发展》2022 年第 1 期。

⑥ 姜扬：《新时代东北地区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市场主体的视角》，《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 年第 2 期。

⑦ 唐天伟：《我国政府效率与营商环境的趋同性及作用机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1 年第 1 期。

⑧ 廖福崇：《政务能力如何提升营商环境质量？——来自中国私营企业调查的证据》，《宏观质量研究》2022 年第 2 期。

新[①]、出口贸易[②]、资本吸附[③]等方面。研究方法包括社会调查[④]、量化研究等，也有城市比较、中外比较研究[⑤]，尚未搜索实验研究，也少见一个中国城市与海外多城市比较研究。

比较对象城市选择上，主要考虑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2020）排名、区域代表性、与杭州可比性等因素，限于篇幅和数据充分性、饱和性[⑥]要求，选择5个城市与杭州比较，对象分析见表1“与杭州比较的城市一览表”。

**表1 与杭州比较的城市一览表**

| 城 市 | 所属区域 | GDP（10亿美元） | 人 口（百万） | 面积（平方英里） | 世界银行 ease of doing business 排名 | 备 注 |
|---|---|---|---|---|---|---|
| Hangzhou | 亚洲 | 285.9 | 11.94 | 6505 | 31 | 中国排名按照上海、北京数据 |
| Hong Kong | 亚洲 | 366 | 7.51 | 427.8 | 3 | 人口、GDP2019数据 |

① 王磊、景诗龙、邓芳芳：《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2第6期。

② 刘军、刘凌波：《营商环境优化如何影响进口贸易方式：软环境优化抑或硬环境改善》，《产业经济研究》2022年第2期。

③ 陶雅洁：《城市营商环境的资本吸附效应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考察》，《西部金融》2022年第5期。

④ 解洪涛、陈昶旭、张建顺、祝莉：《营商环境影响企业经营绩效的机制研究——基于湖北省21208户企业的调查分析》，《调研世界》2020年第7期。

⑤ 徐国冲、吴筱薇：《“数字丹麦”建设：战略、特点与启示》，《学习论坛》2021年第2期。

⑥ 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所说数据饱和性，是指再增加数据，只是重复已有概念、范畴，不会产生新的概念、理论。比较城市数量是研究过程而不是研究之前确定的。

| 城 市 | 所属区域 | GDP（10亿美元） | 人 口（百万） | 面积（平方英里） | 世界银行 ease of doing business 排名 | 备 注 |
|---|---|---|---|---|---|---|
| Singapore | 亚洲 | 424.4 | 5.7 | 279.6 | 2 | 人 口 2019，GDP2022 |
| New York City | 美洲 | 1065 | 8.8 | 468.9 | 6 | 按美国排民，美国排名按照纽约、洛杉矶数据 |
| Wellington New Zealand | 大洋洲 | 243.3 | 0.39 | 111.97 | 1 | GDP 为新西兰 2019 数据 |
| Dubai | 亚洲 | 421.14 | 3.48 | 1588 | 16 | GDP 为阿联酋 2019 数据 |

数据主要来源：维基百科 **wikipedia.org**

比较对象中，杭州市与浙江省不同，纽约市和纽约州不同，迪拜也不同于阿联酋，但在不影响内容分析的前提下，考虑到信息获取，有时候不特别区分。

比较的内容如果从设立企业、建筑许可、水电供给、雇工等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就不能深入，也难以超越现有研究。考虑到比较方法，搜索内容上选择了“doing business in X”（在 X 市做生意）“X franchise search”（X 市特许经营搜索）和“registering a business in X”（在 X 市注册企业），内容选择分析如表 2“研究内容和方法分析”。

**表 2 研究内容和方法分析**

| 搜索词 | 搜索引擎 | 分析 | 方法 | 备注 |
|---|---|---|---|---|
| “doing business in X”（在 X 市做生意） | 必应国际版检索 | 采用世界银行营商报告“Doing Business”加城市名 | 搜索结果排序，分析信息提供者（来源），广告、政府、商事服务企业 | 杭州搜索参考必应国内版 |

| 搜索词 | 搜索引擎 | 分析 | 方法 | 备注 |
| --- | --- | --- | --- | --- |
| “X franchise search”（X 市特许经营搜索） | 1. 必应国际版检索 2. 杭州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搜索中文“杭州加盟搜索” | 比“Doing Business”更进一步，更具体 | 搜索结果排序，分析信息提供者（来源），广告、政府、商事服务企业；分析信息质量、权威性。 | 杭州搜索同时使用百度搜索中文句内容 |
| “registering a business in X”（在 X 市登记一个企业） | 必应、百度 | 主要了解商事登记的便利性 | 弱化排序，深入了解政府官方商事登记便利性、可达性：进入商事登记官网，关注特色设置和服务项目 | registering a LLC 有限公司登记等也比较普遍，因侧重于内容分析，词句不重要 |

英文和中文搜索的选择。国际一流营商环境，要中国和外国人都感受到。外国人来杭州做生意，会方便获得完整、权威、有用信息，体验到便利性、安全性。了解国际市场的中国人，也能体会杭州的便利。当然，作为非英语官方用语城市，杭州的互联网英语营商信息数量积累还比较少，不具备比较优势。在比较时，研究也兼顾中文信息内容搜索。但为利于比较，总体上还是以英文搜索为主。

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的选择。谷歌 Google 以 78.78%[①] 的市场占有率居搜索引擎市场第一位，微软必应搜索 Biying 以 7.65% 居第二位（数据来源同上），考虑到获得性便利，本研究主要采用微软必应搜索。中国搜索市场百度 Baidu 居统治地位（82%）（数据来源同上），但百度的英文内容搜索难与谷歌、必应等抗衡。且因监管机制、搜索算法不同，百度与必应的搜索结果排序差别较大，下面研究中会有呈现。

搜索人、时间、地点。鉴于搜索引擎算法（搜索机制）的不同，不同人、

①Swadhin Agrawal:《Top 17 Best Search Engines in 2022: Alternatives to Google》，March 2, 2022https://www.digitalgyd.com

搜索时间、地点（IP 地址）不同，搜索结果也会不同，但会有一定重复比例。本研究搜索，时间主要在 2022 年 6 月下旬，从杭州搜索，部分结果显示搜索引擎认定搜索人是中国商业人士。

### 三、搜索 doing business in X（在 X 市做生意）信息分析

行动前，获得充分的决策信息，是正确决策的基础。互联网时代，通过网络，获得知识和信息，甚至通过网络办理商事登记，已经比较普遍。5 年前，杭州就实现商事登记 49 个事项 100% 网上办理，网上自主申报核准名称 7.82 万个，占名称申报总量的 98.9%①。元宇宙时代，数字化营商环境几乎等于营商环境的全部。

搜索句取自世界银行营商报告“Doing Business2020”，鉴于该报告的影响性和历史性（2020 年度已经是第 17 次报告），该句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不同搜索引擎都有“People also ask 人们还会问”的算法，展示除了该搜索词句之外，用户一般都在搜索的相关内容。在实际搜索中，都未发现更具普遍性、代表性的搜索词句。因此该搜索句具合理性。搜索结果和初步分析见表 3“必应搜索 doing business in X（在 X 市做生意）信息分析”。

搜索信息数量。考虑的研究效率和信息饱和性（前已注），搜索后结果一般取前 10 个，但若出现不直接相关信息，则截止到该位置，以排除掉干扰信息。

**表 3 必应搜索 doing business in X（在 X 市做生意）信息分析**

| X | 搜索结果排序、核心词（信息源） | 初步分析 |
|---|---|---|
| Hangzhou | 1.Hangzhou Company Registration(corporation china) | 1. 官方信息少 ;2. 官方信息排名靠后，甚至首页没有此类信息；3. 官方信息中，没有或很难发现杭州、浙江政府提供的信息；4. 咨询公司、服务公司信息居多并占靠前位置。 |
| | 2.Doing Business in Hangzhou, China – Subnational Doing（世界银行） | |

①新华社：《杭州：商事登记 49 个事项实现 100% 网上办理》，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7-09/01/content_5222040.htm

| X | 搜索结果排序、核心词（信息源） | 初步分析 |
| --- | --- | --- |
| Hangzhou | 3.Cover Stories – Starting a Business in Hangzhou（More Magazines） | 1. 官方信息少 ;2. 官方信息排名靠后，甚至首页没有此类信息; 3. 官方信息中，没有或很难发现杭州、浙江政府提供的信息; 4. 咨询公司、服务公司信息居多并占靠前位置。 |
| | 4.Doing Business | govt.chinadaily.com.cn（China Daily，中国日报） | |
| | 5.China Regional Focus: Hangzhou, Zhejiang Province（Dezan Shira & Associates） | |
| Dubai | 1. The Top Five Challenges Of Doing Business In Dubai （Entrepreneur Media, Inc.） | 1. 政府相关部门官网排搜索第 2 位，靠前，友好、权威；2. 大型企业服务类公司多条信息，占优势地位，成为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3. 德勤、普华永道这类会计行、咨询公司提供了权威信息，可见此类咨询服务公司对该市场的重视；4. 出现了 PDF 格式的完整报告，更权威、更完整、更便捷。但版本较旧。 |
| | 2.Start Your Business in Dubai | Business in Dubai( 迪拜经济和旅游部 ) | |
| | 3.The Do's And Don't's Of Doing Business In Dubai（Entrepreneur Media, Inc.） | |
| | 4.67 Profitable Business in Dubai at Low Cost – Avyanco（Avyanco 创业顾问公司） | |
| | 5.[PDF]Doing business in the UAE – PwC( 普华永道与汇丰银行 2013，24p） | |
| | 7.Doing Business in Dubai Emirates – Al Tamimi & Company | |
| | 8.The Top Five Challenges Of Doing Business In Dubai（Entrepreneur Media, Inc.） | |
| | 9.15+ Pros and Cons of Doing Business In UAE (You …（ Burban Media ） | |
| | 10.Doing business guide UAE | Deloitte Middle East（德勤咨询） | |

| X | 搜索结果排序、核心词（信息源） | 初步分析 |
| --- | --- | --- |
| Singapore | 1.Doing Business in Singapore: 21+ Pros and Cons (You Must Know)（Burban Media ） | 1. 咨询服务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为主，有的登陆网站，直接有对话窗口可以进一步沟通需求；2. 每个地域主流咨询公司不同，但也有跨多区域的服务公司、咨询公司；3. 政府官网居第 5，也比较靠前；4. 增加了视频内容，增强了传播多样性表达；5. 院校、研究机构提供了信息。 |
| | 2.Doing business in Singapore | Grant Thornton …（Grant Thornton Singapore Pte Ltd） | |
| | 3.Doing Business in Singapore [5 Benefits（Horizon，a technology company） | |
| | 4.Doing Business in Singapore | Wolters Kluwer（reported 2021 annual revenues of € 4.8 billion） | |
| | 5.Starting a business in Singapore（新加坡政府人力资源部） | |
| | 6.[PDF]Doing business in Singapore – PwC( 普华永道，打不开 ) | |
| | 7.Videos of Doing Business In Singapore | |
| | 8.Doing Business in Singapore: 21+ Pros and Cons …（Burban Media ） | |
| | 9.Singapore Business Etiquette: Doing Business in …（London Image Institute） | |
| | 10.[PDF]Singapore – 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the world bank) | |
| New Zealand | 1..Doing Business in New Zealand | Expat Arrivals（Globe Media Ltd.） | “提示（tips）”“挑战”、“环境”成为关键词。其他同上。 |
| | 2.Doing business in New Zealand | New Zealand …（新西兰外事和贸易局） | |
| | 3.Doing Business in New Zealand | Expat Arrivals（Globe Media Ltd.） | |
| | 4.Doing business in New Zealand | New Zealand …（新西兰外事和贸易局） | |

| X | 搜索结果排序、核心词（信息源） | 初步分析 |
| --- | --- | --- |
| New Zealand | 5.Doing Business in New Zealand | The Place Brand Observer | “提示（tips）”“挑战”、“环境”成为关键词。其他同上 |
| | 6.5 Tips for Doing Business in New Zealand – Velocity （Velocity Global, LLC） | |
| | 7.Doing business in New Zealand – PwC 普华永道 | |
| | 8.Doing Business in New Zealand: 17+ Pros and Cons …（Burban Media） | |
| | 9.[PDF]New Zealand – 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 世界银行，64P) | |
| | 10.Top 10 challenges of doing business in New Zealand …(TFM Group) | |
| | “提示（tips）”“挑战”、“环境”成为关键词。其他同上。 | |
| Hong Kong | 1.A Practical Guide to Do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in 2021（Statrys Ltd） | “指南 Guide”、“须知”成为关键词。还存在他国政府指导本地居民对外投资或贸易的信息。 |
| | 2.Do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 World Business Culture（WBC 培训商） | |
| | 3.Do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The Ultimate Guide For …（ BBCIncorp Limited） | |
| | 4.Do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11 Things to Know(Founders Guide) | |
| | 5.A Practical Guide to Do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in …（Statrys Ltd） | |
| | 6.[PDF]Do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 PwC,2012 | |
| | 7.Videos of Doing Business in Hongkong | |
| | 8.Export.gov – Do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美国国际贸易办公室 ) | |

| X | 搜索结果排序、核心词（信息源） | 初步分析 |
| --- | --- | --- |
| Hong Kong | 9.Do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 Definitive HK Guide（Prism Consultancy） | “指南 Guide”、“须知”成为关键词。还存在他国政府指导本地居民对外投资或贸易的信息。 |
| | 10.[PDF]Do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 Baker McKenzie(律师事务所，2020，26P) | |
| NewYork | 1.Start a Business in New York State（纽约州政府 New York State，13 种语言） | 联邦、州、城市政府多部门官网信息占主要位置；<br>非盈利组织发挥作用。 |
| | 2.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 | USAGov（美国联邦政府信息和服务 USA.gov 官网） | |
| | 3.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 | Empire State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 |
| | 4.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 City |NYCEDC（New York 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NYCEDC), 非营利组织） | |
| | 5.Start a Business in New York State（纽约州政府 New York State，13 种语言） | |
| | 6.Running a Business in New York? What You Need to …（Business News Daily） | |
| | 7.Videos of 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 | |
| | 8.Doing Business Search – New York City（THE DOING BUSINESS SEARCH） | |
| | 9.New York City business information（纽约州政府税务和金融局） | |
| | 10.[PDF]Corporate Matters: Are You Doing Business in New York?（Simon H. Prisk，公司法） | |
| | 11.Form a Corporation or Business | Department of State（纽约州政府州务院 Department of State） | |

搜索算法一般把与搜索句最直接相关、点击量较大的信息靠前排列，使用户快速获得想知道的、可靠、全面的信息，增加用户搜索的良好体验，搜索引擎也增加了客户粘性。当然，排名靠前的信息内容与搜索排名机制有关，弱监管下，搜索引擎公司倾向于给付费主体（商家或个人）的内容排名靠前，增加其曝光度，以获得广告或其他推广收益，但过多的广告、推广信息，会降低搜索体验，影响搜索结果公信力。

关于杭州营商搜索结果分析。从以上杭州的搜索结果看，主要侧重于这样的应用情景：①外国人想了解杭州营商环境；②中国人想了解关于杭州营商环境的英语资料。如果是中国人想在杭州做生意，一般会通过百度搜索“在杭州办企业”之类。搜索结果堪忧，广告信息过多，权威、客观、有价值信息较少。详见表 4“百度搜索‘在杭州办企业’（2022–6–23）结果一览表”。

**表 4 百度搜索“在杭州办企业”（2022–6–23）结果一览表**

| 搜索结果排序 | 来 源 | 性 质 |
|---|---|---|
| 1. 在杭州自己注册公司需要准备哪些材料？ | 杭州注册公司本地通 | 百度快照 ① |
| 2.2022 年最新杭州注册公司流程指南（超详细，手把手教程） | 纯真财税 | 百度快照 |
| 3. 杭州 公司注册流程和费用一览 | 企之家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 广告 |
| 4. 在杭州，开办一家企业只要 14 分钟！数字赋能市场监管 让企业 ... |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 | 百度快照 |
| 5.2022 年杭州注册公司流程（详细图解） | 杭州注册公司点点财税 | 百度快照 |
| 6. 杭州企业名录 – 企业信息查询系统 | 深圳市锐眼视界科技 | 广告 |
| 7. 在杭州注册公司需要什么？_ 地址 _ 材料 _ 参考 | 搜狐网 | 百度快照 |

①百度在百度平台给自己“百度快照”做的广告：如何上百度快照，每天几十元就可以做，让“硬线索”主动上门，获客不再是难题，快速提高订单量，效果收费，智能之选，现在开户还有超值豪礼等你来拿！

| 搜索结果排序 | 来 源 | 性 质 |
| --- | --- | --- |
| 8. 在杭州如何注册公司？－知乎 | 知乎 | 百度快照 |
| 9. 杭州公司注册去哪里办理－知乎 | 知乎 | 百度快照 |
| 10. 在杭州注册公司有什么条件 － 好顺佳 | 好顺佳 | 百度快照 |

通过必应国内版搜索“在杭州办企业”。排第一位，是驻杭办地图，暴露了了必应搜索的中文弱项；排第 2 ~ 5，“知乎”[①] 内容；第 6，杭州公司注册的操作流程－杭州本地宝－Bendibao；第 7 位，杭州注册公司流程和费用标准 –【杭州工商局网上办事大厅】，先是显示 404 错误网页，然后跳转到“杭州网上办事大厅”，疑是钓鱼网站；第 8 ~ 10 都是“知乎”内容。相比其他对比城市的搜索，信息丰富度、完整度、可信度较差，信息质量差距很大。

**四、X franchise search– X 市特许经营搜索信息分析**

相比以上在某地经商的搜索，X 市特许经营搜索就更加具体。特许经营 Franchising，我们一般称“商业特许经营”“连锁加盟”“品牌加盟”等。商业特许经营（以下简称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特许人 franchisor），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被特许人 franchisee）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②]。对于被特许人（俗称“加盟人”）来说，特许经营是一种更容易的创业方式。

因此，此搜索可以更进一步考察某地创业、营商环境。当地政府、企业事业机构有无为具体创业者提供切实服务，有力支撑他们创业成功，由此可

①知乎公司 Zhihu Inc. 纳斯达克和香港上市公司，领先的线上内容社区，CIC 统计，据 2019—2021 月活用户和营业收入，知乎为中国五大内容社区平台和最大的问答社区。笔者译自知乎官网：https://ir.zhihu.com/Company-Profile

②国务院：《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中央政府门户网站，www.gov.cn（2007 年 02 月 14 日）

见一斑。详见表 5“X franchise search–X 市特许经营搜索比较”。

**表 5　X franchise search–X 市特许经营搜索比较**

| X | 搜索结果排序 | 信息来源 | 特征分析 |
|---|---|---|---|
| Singapore | 1.Franchising in Singapore | Franchise Update Media, | 1. 创业服务企业信息为主流；2. 服务企业历史悠久，权威性高，提供信息有较高应用价值；3. 行业协会提供了权威、全面的信息；4. 新加坡本地服务企业占据显著地位。(不直接相关) |
| | 2.Franchises in Singapore – The Best Franchise … | topfranchise.com | |
| | 3.Singapore Franchises for Sale and Franchise … | BusinessForSale.sg | |
| | 4.45 Popular Franchises in Singapore and How Much … | Entrepreneur Campfire | |
| | 5.Franchise Singapore: 15 options with fees and initial … | Wise Asia–Pacific Pte Ltd | |
| | 6.10 Trustworthy Franchise Business in Singapore [2022] | Singapore Finest | |
| | 7.7 Rising Franchises In Singapore: How Much Does It Cost To Start? (2021) | SingSaver PTE LTD. | |
| | 8.Franchises in Singapore (2022) – Starting Investments Fees | SingSaver PTE LTD. | |
| | 9.Singapore \| 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 | 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 | |

| X | 搜索结果排序 | 信息来源 | 特征分析 |
| --- | --- | --- | --- |
| Singapore | 10.Companies.sg – Singapore Company Search | companies.sg | 1. 创业服务企业信息为主流；2. 服务企业历史悠久，权威性高，提供信息有较高应用价值；3. 行业协会提供了权威、全面的信息；4. 新加坡本地服务企业占据显著地位。（不直接相关） |
| New York | 1.Franchisors & Franchisees \| New York State Attorney … |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New York 纽约州总检察长 | 1. 美国把加盟投资者作为消费者保护，因为创业者买了一个连锁店 buy a franchise；那些在招商加盟的叫 for sale；2. 总检察长办公室、州务院、税务、通信等政府多部门参与监督、服务。 |
| | 2.New York Franchise Opportunity Guide | Franchise.com | |
| | 3.Franchises for Sale in New York – Franchise … | Franchise.com | |
| | 4.Franchises in New York (NY) – Franchise Opportunities | FranchiseOpportunities.com | |
| | 5.Corporation and Business Entity Search Database | Department of State | |
| | 6.FRANCHISE SEARCH, INC. – New York Company | New York Company Directory | |

| X | 搜索结果排序 | 信息来源 | 特征分析 |
| --- | --- | --- | --- |
| New York | 7.NYS Franchise Oversite aBoard – Government of New | 纽约州务院 –Franchise Oversight Board | 1. 美国把加盟投资者作为消费者保护，因为创业者买了一个连锁店 buy a franchise；那些在招商加盟的叫 for sale；2. 总检察长办公室、州务院、税务、通信等政府多部门参与监督、服务。 |
| | 8.LinkNYC Franchises – DoITT – New York City | 纽约州信息和通讯部 | |
| | 9.Corporation tax – Government of New York | 纽约税务和金融局 | |
| | 10.Franchisors annual reporting requirement | 纽约税务和金融局 | |
| Hong Kong | 1.Hong Kong Franchise Association | 香港特许经营协会 | 1. 国际、香港特许经营行业协会发挥主流作用；2. 大型服务企业提供权威信息；3. 阿联酋、美国等政府国际贸易部门从市场信息、商务指南等角度提供信息 ( 不直接相关 ) |
| | 2.Best Franchise Opportunities in Hong Kong | topfranchise.com | |
| | 3.Top Franchises for Sale in Hong Kong \| Franchise Asia | N.Bar( 阿联酋 ) | |
| | 4.Franchising in Hong Kong | Franchise Update Media, | |
| | 5.Hong Kong Franchise Association | 香港特许经营协会 | |

① 应为 Oversight Board，政府设立的特许经营监督机构。

| X | 搜索结果排序 | 信息来源 | 特征分析 |
| --- | --- | --- | --- |
| Hong Kong | 6.Hong Kong Franchise Industry – International Trade … |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 1. 国际、香港特许经营行业协会发挥主流作用；2. 大型服务企业提供权威信息；3. 阿联酋、美国等政府国际贸易部门从市场信息、商务指南等角度提供信息（不直接相关） |
| | 7.Hong Kong – Franchise Industry – International Trade … |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 |
| | 8.Hong Kong \| 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 | 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 | |
| | 9.Online Search | 香港贸易与产业局 | |
| | 10.Intellectual Property Department–Search | 香港知识产权局 | |
| New Zealand | 1.Franchises for Sale NZ, franchise New Zealand … | nzfranchises, NZ BizWorks Limited | 1. 国际特许经营协会、当地特许服务企业提供主流信息；2. 美国等政府国际贸易部门从市场信息、商务指南等角度提供信息。<br>不直接相关 |
| | 2.Franchise New Zealand Home Page | magzine, https://franchise.co.nz | |
| | 3.Franchises for Sale New Zealand – Top NZ | Franchise New Zealand | |
| | 4.Best Franchise Opportunities for Sale in New … | Franchise Direct | |
| | 5.New Zealand Franchise Overview – International … |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 |

| X | 搜索结果排序 | 信息来源 | 特征分析 |
| --- | --- | --- | --- |
| New Zealand | 6.Franchises for Sale \| Buy a Franchise Business Opportunity | Dynamis Ltd | 1. 国际特许经营协会、当地特许服务企业提供主流信息；2. 美国等政府国际贸易部门从市场信息、商务指南等角度提供信息。<br>不直接相关 |
| | 7.New Zealand – Franchising – International Trade … | US：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 |
| | 8.New Zealand \| 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 | 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 | |
| | 9.New Zealand Companies Register | | |
| Dubai | 1.Franchise Businesses For Sale Dubai, 12 Available To … | BusinessesForSale.com | 1. 特许经营的平台服务企业提供主流信息，重复出现；2. 其他区域搜索信息特征此处重复出现。 |
| | 2.Franchise Opportunities in Dubai – SMERGERS | SMERGERS Online Services Private Limited | |
| | 3.50 Popular Franchise Opportunities in Dubai and … | Profitable Venture Magazine Ltd | |
| | 4.List of Franchises for Sale – The Best Franchise … | topfranchise.com | |
| | 5.Top Franchise Opportunities in Dubai – BDM Franchise Dubai | BDM Franchise | |
| | 6.Franchise Arabia \| Business Franchise Opportunities | franchisedirect.com | |

| X | 搜索结果排序 | 信息来源 | 特征分析 |
| --- | --- | --- | --- |
| Dubai | 7.Franchise Opportunities and UAE Franchise Businesses for Sale | BusinessesForSale.com | 1. 特许经营的平台服务企业提供主流信息，重复出现；2. 其他区域搜索信息特征此处重复出现。 |
| | 8.United Arab Emirates \| International Franchise … | IFA | |
| | 9.Looking for Investors in Dubai \| Business Exchange Bureau | Business Exchange Bureau | |
| Hang Zhou | 1.Franchis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Hangzhou, China | Distributors Circle India. | 较少英语信息，缺少行业服务。<br>不直接相关 |
| | 2.Distributors, Dealers & Franchise Business Ideas in … | Distributors Circle India. | |
| | 3.Franchise opportunities in China | topfranchise.com | |
| | 4.Hangzhou Jiuzhou Pharmacy Franchise Co., Ltd. | | |

特许经营，作为创业的重要路径，是营商环境的一个小切口，起码在网络环境上，杭州差距还很大。政府、行业协会、企业都有必要创作更多有价值信息，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现代特许经营是舶来品，杭州不具备行业优势，本地国际品牌企业还在培育中。

### 五、registering a business in X——商事登记比较

数字化是浙江、杭州的战略和目标。本主题重点比较 6 城市商事登记中

的便利性，对创业、对企业的支持。与之前不同，主要不是分析搜索结果页面排序和内容，而是进入登记页面，重点分析政府商事登记平台的便利性。搜索句为“ registering a business in X”在 X 市注册企业。6 城市商事线上平台特色项目和分析评价见表 6“registering a business in X– 在 X 市注册企业搜索比较”。

**表 6 registering a business in X– 在 X 市注册企业搜索比较**

| X 政府官网搜索排序和呈现内容 | 语言 | 特色项目 | 分析评价 |
|---|---|---|---|
| Singapore 第 2 位 Register your business – GoBusiness Singapore | 英语 | 电子顾问 e–Adviser 不知道怎么选择企业类型？ 3 个方案：方案 1. 使用电子顾问 e–Adviser，用户回答 5 个问题，平台给出匹配用户需求的若干建议（不同匹配度），同时列出该建议类型长短；方案 2. 下载企业架构比较表；方案 3. 看视频学习。 | 1. 容易找到官网；<br>2. 不是单独设帮助栏，而是在注册企业的难点处，提出针对不同用户的多个简便解决方案 |
| New York State 第 2 位 Start a Business in New York State | 英语、中文等 13 种 | 得到支持 Get Support 包括：启动协助、获得资本和激励、市场调查。1. 启动协助：①纽约州立大学 1984 年设立的纽约州小型企业发展中心项目，已帮助 54.8 万纽约市民，创造 25.6 万就业岗位。“获得免费咨询以帮助您开展业务，接受有关如何编写业务和营销计划的培训，以及与州开展业务的其他技巧”；②获得技术和小型企业援助，主要是 NYS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实施的“New York State Directory of Small Business Programs”（33 页报告，大量实用链接）. | 1. 都采用链接形式，简单直接，清晰、用户友好、便利；<br>2. 支持系统完备：从商业计划、资本、市场、雇工等全方位支持；<br>3. 大学、公益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 |

| X 政府官网搜索排序和呈现内容 | 语言 | 特色项目 | 分析评价 |
| --- | --- | --- | --- |
| New York State 第 2 位 Start a Business in New York State | 英语、中文等 13 种 | 2. 获得资本和激励：①商业融资计划；②探索贷款方案、可用赠款、税收抵免，并获得融资和技术援助。3. 市场调查：① SizeUp – 小型企业管理在线工具：绘制您的竞争对手、基准性能并找到最佳广告位（在线工具已不在）；②纽约州劳工部数据中心：比较全州和各行业的工资；③纽约州房地产税服务办公室：研究纽约各地的当地税率。 | 1. 都采用链接形式，简单直接，清晰、用户友好、便利；<br>2. 支持系统完备：从商业计划、资本、市场、雇工等全方位支持；<br>3. 大学、公益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 |
| New Zealand 第 2 位 Registering your company to do business in New …（New Zealand Companies Office）第 4 位 How to start your own business \| New Zealand Government | 英语 | Buying a business or franchis 和 Compliance Matters tool<br>1. 收购一桩生意 Buying a business 栏目下有 Buying a business or franchise（有链接），提供特许经营权衡利弊指南：作为新西兰特许经营协会会员的特许人遵从如下规则：<br>提供一个包含重要企业信息的披露文件给被特许人；<br>特许合同签订后给被特许人 7 天的冷静期。<br>2. 在运营企业 Running a business 栏目下，配备了合规工具 the Compliance Matters tool，发现、理解和管理企业需要向政府申报的事项。 | 1. 把特许经营作为创业一种路径；<br>2. 鉴于特许经营的实际，规定了特许人必要义务，保护中小创业者利益，营造良好创业环境；<br>3. 运用小工具解决复杂问题。 |

| X 政府官网搜索排序和呈现内容 | 语言 | 特色项目 | 分析评价 |
| --- | --- | --- | --- |
| Dubai 无（前 2 页）<br>How To Open a Start-up Business in Dubai \| Visit Dubai（迪拜旅游商业推广部） | 12 种语言 | 商事登记合作伙伴网络<br>填写用户信息， 政府通过一个商事登记合作伙伴网络，在 2-5 个工作日内，合作伙伴（中介服务企业）会联系服务用户。 | 1. 中介服务企业信息成为主流；<br>2. 比较适合大型企业、大额投资；小企业可能不愿承担服务费用。 |
| Hong kong 第 2 位<br>GovHK: Business & Company Registration | 11 种语言 | “注册易”电子服务<br>24 小时网上服务，向公司注册处处长提交依据《公司条例》（香港法例第 622 章）及《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香港法例第 32 章）须登记的成立本地公司或注册非香港公司的申请、指明表格及相关文件。用户可以免费委任注册代理人。 | 1. 清晰的分类；<br>2. 易寻找的官网；<br>3. 清晰的法律依据。 |
| Hanzgzhou<br>第 12 位（必应国内版）<br>浙江政务服务网统一认证——[ 浙江省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 ... | 中文 | 在线智能客服<br>1. 业务指南，有 6 分钟视频指导登记。<br>2. 在线智能客服，随时回答问题：7*24 小时在线为您解答！如需进一步咨询，请点击“在线客服”进入人工服务（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 8: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有移动版推荐，“极速响应，随时随地，一键触达微信版本”。 | 1. 丰富的办理内容；<br>2. 有些须知篇幅太长，不方便阅读；<br>3. 需要用户注册登录；<br>4. 有老年模式，无障碍阅读；<br>5. 不容易找到官网。 |

## 六、 结论和讨论

### （一）研究结论和理论贡献

#### 1. 互联网杭州营商信息缺陷

相比其他对比城市的搜索结果，互联网杭州营商信息丰富度、完整度、

可信度、官网可达度较差，中英文搜索、多搜索引擎搜索都有印证。

2. 高质量的网络营商信息需多主体协力

数字营商环境是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中介服务企业、学校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公益组织共同建设的结果，是知识产权创作，也是经验总结和社会价值创造。少一些内卷，多一些价值贡献。

3. 监管和算法导致有用信息排名靠后

劣币驱逐良币，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会牺牲搜索用户利益，造成信息失真甚至欺诈信息横行，直接导致创业和营商决策偏差。

4. 优秀商事登记重在支持企业和创业者

填哪些表，如何填表，登记步骤有哪些，都是比较容易的。要从创业、营商的全生命周期考虑，支持创业者学习成长，从商业计划、融资、雇工、市场开发、技术创新等，全方位帮助规避风险，获得持续成功。

5. 理论贡献

第一，研究从具体词句搜索的小切口出发，放眼世界，发现杭州营商环境建设的差距，为建设一流国际大都市，确定路径和方法。

第二，分析搜索结果，建立了做生意、特许经营、商事登记的英文搜索组合，从宏观、微观多个视角考量，借鉴优秀城市经验。

第三，从网络搜索角度，研究营商环境，操作简便，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培育国际视野，树立标杆，追赶一流，快速提升杭州营商环境。

（二）杭州营商环境建设启示

1. 杭州要努力建设清朗数字营商环境

政务服务平台通过搜索引擎优化提升可见性[①]。同时，建设清朗网络营商环境，政府权威信息为主流，坚决清理垃圾信息、处罚欺诈信息制造者。尽快立法规制搜索引擎操纵搜索结果的垄断违法行为。

2. 建立市场和监管机制，促进优质信息持续产出

---

① [1] 龙怡、云太真：《中美政务服务资源的搜索引擎可见性研究——基于谷歌和百度对典型政务服务事项的搜索结果分析》，《情报科学》2021 年第 9 期。

保护原创有价值信息，培育优秀中介服务企业，支持、鼓励高校、研究机构、行业协会贡献研究成果，发挥研究成果指导实践、指导创业的作用。

3. 做好店小二，周到服务创业者

从细节出发，提供全方位、多形式支持，不仅要容易办，还要保赚钱。从全生命周期支持、服务企业和创业者。

4. 大力促进商事服务国际化

建立培育本地国际商事服务企业，增强政府资源的国际化。

（三）研究局限

1. 样本数量、样本选择需保证研究信度和效度

从信度和效度处罚，考虑比较城市选择合适性，没有欧洲城市、没有发展中国家城市是否影响结果；城市数量是否充足，数量越多、信息越多。搜索词句选择及其组合，是否匹配本研究，是否增加词句搜索。

2. 尚未关注和研究移动端搜索

当前互联网用户迁移移动端趋势明显，本研究尚未对手机、平板等移动端搜索，对社交媒体如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搜索进行研究。